

文革史稿

文革史料彙編

第二冊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上）

徐志高

世界華語出版社

文革史稿：文革史料彙編(第二冊)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上）
編者：徐志高 (zhigao Xu)
封面：密歇根大學珍藏文革剪紙
出版：世界華語出版社（World Chinese Publishing）
發行：穀歌圖書（電子版）
電郵：minelle@gmail.com
網站：www.worldchinese.us
版次：2016 年 5 月第一版
字數：400 千字
電子書定價：19.99
國際書號：ISBN 978-1-940266-15-2

目錄

第一章	首都工作組	
第一節	首都工作組的成立.....	6
第二節	首都工作組任務.....	13
第三節	首都工作組的動盪.....	29
第二章	“5.16”通知	
第一節	起草“5.16”通知經過.....	43
第二節	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	45
第三節	“5.16”通知出籠.....	50
第四節	通知附件.....	56
第五節	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批示.....	80
第六節	周恩來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	98
第七節	陳伯達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	106
第八節	康生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	108
第九節	“朱德批判會”主角是劉少奇、周恩來、林彪.....	113
第十節	劉少奇在中共中央召集的民主人士座談會上的講話.....	124
第十一節	鄧小平、周恩來、劉少奇在北京大、中學校師生 文化大革命積極分子大會上的講話.....	140
第三章	聶元梓等七人	
第一節	大字報的由來.....	154
第二節	第一張大字報.....	178

第四章	五十多天	
第一節	劉少奇、鄧小平與“文革”初期的工作組.....	181.
第二節	工作組的工作.....	201
第三節	“文革”初期的北大工作組.....	209
第五章	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事件	
第一節	羅瑞卿.....	228.
第二節	葉劍英是批羅主角.....	241.
第三節	中共中央批轉中央工作小組關於羅瑞卿錯誤問題的報告...	248
第四節	楊尚昆事件.....	266
第六章	橫掃一切牛鬼蛇神	
第一節	《人民日報》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	278
第二節	橫掃一切的“首都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	282
第三節	破四舊.....	311
第四節	文革紅衛兵抄家戰果.....	322
第五節	紅衛兵怎樣破四舊.....	339
第六節	毀滅文物.....	385
第七節	似曾相識.....	430
第八節	停課鬧革命.....	435
第九節	文革初期毛澤東的部分講話和批語.....	444
第七章	社會各界造反	

第一節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成立.....	482
第二節	工總司成立宣言.....	488
第三節	上海文革《解放日報》事件紀實	490
第四節	上海文革康平路事件紀實.....	498
第五節	京西風雲.....	505
第六節	暢觀樓事件.....	520
第七節	典型的批判.....	526
第八節	三審王光美.....	561
第九節	“桃園經驗”	577
第十節	“桃園經驗” 批判	604
第十一節	鄧小平檢查.....	610
第十二節	首都批判劉鄧資反路線大會 聶元梓批判發言.....	643
附：	中央专案组“刘少奇的罪证”	652

第一章 首都工作組

第一節 首都工作組的成立

一、“五月會議”的血雨腥風

在召集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 5-16 通知的同時，毛澤東秘密成立了這個機構。這個機構很長時間一直不為外人所知，卻對保證文革按毛澤東意圖發動及向縱深發展推進，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而且更關鍵的是，它的組建和存在，對劉少奇等所謂中央一線領導，起著實際的震攝及監控、防範作用。也有力地防止劉或其他任何人有條件和膽量發動對毛澤東不利的任何形式的“政變”。

“首都工作組”成立於 1966 年 5 月中旬，其時，正是所謂“五月會議”（即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期間。

兩個多月後，毛澤東決心對劉少奇公開攤牌，並讓林彪接替其接班人位置。據吳法憲回憶，有次他與周恩來同乘一輛車（其時吳已是最高核心層的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在車上周對他親口講過當時情形。八屆十一中全會期間，毛澤東曾問他：“看來劉少奇不行了，我對他觀察了二十一年，完全失望了。對鄧小平也觀察了七年，也失望了。要把劉少奇拿下來，現在怎麼辦？”他回答說：“那就只有林彪了，由林彪代替劉少奇最合適。”他說完後，毛澤東點頭說：“好，那就把林彪接來北京吧。”（《吳法憲回憶錄》下卷第十一章，香港明鏡出版社）

第一位自殺者是曾擔任過《人民日報》社長兼總編，已經被打為“三家村”黑幫的北京市委書記鄧拓。他在林彪作“五一八講話”的當天自殺身亡。第二位自殺者，是擔任過毛澤東秘書，時任中央辦公廳副主任的田家英。其自殺於 5

月 23 日晚。第三位，是時任國防科委副主任兼秘書長的安東將軍，5 月 22 日清早服大劑量安眠藥身亡（安東將軍因聶榮臻元帥為之說話，死因未作“自殺”結論，後來定性為“非正常死亡”。按當時規定，自殺屬“背叛革命”，“自絕於黨和人民”。政治上背黑鍋不說，還會禍及家人）。

5 月 4 日至 26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北京舉行。毛澤東當時在外地，會議由劉少奇主持。會議批判了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的“反黨錯誤”，並決定停止和撤銷他們的職務。十六日，會議通過了由毛澤東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通知（簡稱《五一六》通知）。……十八日，林彪在會上發表長篇講話。頌揚毛澤東的個人天才，大造我們黨中央內部有人要搞政變、搞顛覆的，製造恐怖氣氛。這次會議標誌著“左”傾方針在黨中央佔據了統治地位。（《大事記》第 276 頁至 277 頁。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9 月第一版）

6 月 18 日，毛澤東離開杭州去長沙，第二天，往家鄉韶山，住“滴水洞”。毛澤東在這裏呆了將近一個月，靜心思考下步舉措。7 月 8 日，毛澤東給江青寫了一封長信，信中談及政變問題。毛澤東寫道：我的朋友的講話（引者注：指林彪“五一八講話”），中央催著要發，我準備同意發下去，他是專講政變問題的。這個問題，像他這樣講法過去還沒有過。中國如發生反共的右派政變，我斷定他們也是不得安寧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會容忍的。（轉引自《毛澤東傳》下冊第 1420 頁至 1421 頁）

這是毛澤東在兩個來月中第三次談及“黨分裂”和“右派政變”問題。這段時間，他所思慮謀劃的，除了文革運動佈局，主要就是對“政變陰謀”的提防和反制。其中最主要的“防政變”措施，就是暗中指示在北京的周恩來，以“保衛首都”之名，建立“首都工作組”。然後進行一系列人事安排和部隊調動。

二、 周恩來奉命組建“首都工作組”過程

《周恩來年譜》記載，1966年5月15日，根據毛澤東關於“保衛首都”的指示精神，周恩來與葉劍英兩人聯名給毛澤東及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報告。該報告提出組建一個以葉劍英為組長的“首都工作組”，“負責保衛首都的安全工作”。（《周恩來年譜》下卷第31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5月第一版）至於毛澤東是如何向周恩來下達這個“保衛首都”的相關指示，得指示後，周、葉兩人又是如何商議，兩人聯名寫信具體經過等，至今未得其詳。

但是，成立“首都工作組”的想法和最後決定，是由毛澤東在杭州親自作出，並遙控在北京的周恩來予以落實執行的。

說直接一點，毛澤東發動文革運動，就是要搞掉中央及地方高層的一大批他不滿意的人，建立起淫威。但他要提防，那些可能被搞的物件，不惜“背水一戰”，聯合起來搞他。

毛澤東這時，就必須著力提防一年多以前蘇共中央那些人搞赫魯雪夫的事情在他身上發生。“保衛首都”，不過是個藉口，是個幌子。此時，中國並無外敵入侵危險，也無內亂。首都北京不存在危險，“保衛”二字從何說起？

據《周恩來年譜》，擬建的“首都工作組”共有11名成員，他們分別是組長：葉劍英；副組長：楊成武、謝富治；組員：劉志堅、李雪峰、汪東興、周榮鑫、鄭維山、傅崇碧、萬裏、蘇謙益。“首都工作組”直接對政治局常委負責（《周恩來年譜》下卷第31頁）。從成員名單來看，這個小組的11位成員，都是當時中央黨、政、軍及負責安全保衛等要害部門關鍵位置上的關鍵人物。葉劍英代表中央軍委，楊成武代表總參謀部，謝富治代表公安部，劉志堅代表總政治部，李雪峰代表中共中央華北局，周榮鑫（國務院秘書長）代表國務院，鄭維山代表北

京軍區，傅崇碧代表即將擴建的北京衛戍區，萬裏代表北京市委。就是說，當時中央及北京地區分管一方的實權人物，都進入了這個“首都工作組”。

更重要的是，報告提出，新組建的這個“首都工作組”，直接對中央政治局常委負責。也就是說，這些人可以超越所在機構和部門行事。其處理問題許可權和指揮許可權，不受原機構或部門的管轄及指揮，“只對政治局常委負責”。因此，這實際上是一個橫跨黨政軍並超越其上的重要機構。而所謂“只對政治局常委負責”，是一句空話。只對周恩來一個人負責。而周恩來，只對毛澤東負責。從此舉看，其時，毛澤東對周恩來是充分信任的。否則不會將關係著毛自身安全的如此權力，如此重責，放心交付于周。

周恩來、葉劍英的報告呈上後，獲得了毛澤東的認可，批示照辦（其實，本身就是遵毛澤東之意行事的，只不過小組人員構成上須報知毛澤東最後審批認定）。在“首都工作組”召開第一次正式會議之前，周恩來在葉劍英協助下，已經有所動作。據文獻資料及相關當事人回憶，周、葉二人當時主要抓了北京衛戍區的改組擴建，以及相關部隊的調動及協調，如何加強北京的安全警衛等一系列相關事宜。換言之，此時整個首都地區已被周、葉二人主掌的“首都工作組”從軍事上以及“安全警衛”方面控制了。再說得具體一點，也就是，包括劉少奇、鄧小平在內的整個“黨中央”，已實際上處於這個特殊的“首都工作組”的控制和監視之下。

三、 周恩來作軍事部署

接下來，周恩來繞開黨中央，也不經過中央軍委，獨自作了相關軍事部署，並進行了幾項關鍵性的部隊調動和軍方人事安排。也據《周恩來年譜》，5月18日，周恩來單獨約見代總參謀長楊成武、北京軍區副司令員鄭維山（此二人都是當時實際控制和指揮首都地區部隊的關鍵實權人物），就部隊一系列調動安排進行具體落實。沒有任何資料顯示，周恩來這次單獨約見軍方實權人物，是事先經中央軍委批准或授權，或起碼告知了中央軍委領導。

該文獻記載，三個人（實際是周恩來一人，其他兩人都聽周的）當天就作出了幾項關鍵性的決定，並由周恩來下來後書面報告毛澤東。注意，這裏有個細節十分重要：周恩來是寫親筆信，派信得過的“信使”專送在外地的毛澤東，而不用領導人專用的“紅機子”保密電話，或是機密電報等。主要是防洩密。

文獻顯示，周恩來當天書面報告毛澤東審批的決定和相應部署主要為：

其一，改組擴建北京衛戍區，並由傅崇碧任司令員；

其二，調解放軍第63軍駐防石家莊的189師，以及第65軍駐張家口的193師來北京，作為衛戍部隊，擔任首都衛戍任務；

其三，待這些部隊到京後，立即對原來擔任中央及北京要害部門以及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人民日報》、新華社等新聞宣傳機構的警戒保衛部署，全部作重新調整。（以上見《周恩來年譜》下卷第31至32頁）

周恩來這份報告，毛澤東閱後批示：照辦。

自此，正式開始了北京衛戍區的擴建重組，進行相關部隊的一系列調動，以及首都各要害機關部門警衛力量的大調整。後來在文革中地位關鍵、知名度很高的北京衛戍區首任司令員傅崇碧，也就此走馬上任。幾天後的5月26日，由葉

劍英主持，召開了“首都工作組”成立以來的第一次正式會議。這次會議，主要是就“首都工作組”面臨的任務，以及內部組織情況，當前最主要的工作安排，機構運轉程式，還有工作方法等重要內容，進行全面研究，並作出了相關決定。周恩來“代表政治局常委”，出席了“首都工作組”第一次全體會議，並在會上作了定調子的講話。周恩來在講話中，告誡與會者說：“首都衛戍工作，既要抓緊，又要穩，要有領導、有步驟地進行。頭腦要清醒，不能急，一急就容易被壞分子鑽空子。”恩來還說：“首都衛戍工作牽連全域，必須把形勢觀察好。反革命畢竟是少數，我們掌握著大權，有槍桿子，軍隊是可靠的。”在這次會議上，還作出了一個重要決定，即在“緊急情況”時，需要調動北京地區的衛戍部隊，如果周恩來在京，由周恩來批准。周恩來不在時（因周恩來作為國務院總理還有出訪等外事活動），可報鄧小平批准（以上均見《周恩來年譜》下冊，第33頁）。

這個決定在當時政治背景下，可謂有點意味深長。5月15日，周恩來與葉劍英給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報告中提到，“首都工作組直接對中央政治局常委負責”。當時在京主持中央政治局及常委會工作的，是黨中央第一副主席劉少奇。但從整個過程及軍隊調動部署情況來看，劉少奇並未參與其事，而是周恩來在全權負責。前文已述，報告中提到的“直接對政治局常委負責”，實際上是一句空話。顯然，這個“首都工作組”，只有周恩來有權拍板作出決定。周的身後實際做主的，是毛澤東。

這就是說，“首都工作組”一切舉措、行動和部署，只對周恩來負責，它不僅繞過了中央書記處，也繞過了當時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劉少奇，還繞過了中央軍委和總參。這第一次全體會議，也是周恩來代表政治局常委出席並作出

決定。不過，這樣重大的決定，顯然不會是來自周恩來本人，而只能是來自毛澤東。

這個事實說明，儘管名義上仍是劉少奇在京主持政治局及常委會，但實際上毛澤東已經在另搞一套。其時，文化大革命還未全面鋪開，“工作組”等問題甚至還未發生，距毛澤東《炮打司令部》大字報還有兩個多月。這說明毛澤東對劉少奇的不滿、並要藉故搞他的想法，由來已久。也就是說，不管有沒有後來的“派工作組”等情況。

第一次全體會議之後的5月31日，周恩來將會議所作出的相關決定以及衛戍部隊調動安排等軍事部署情況，一一向在杭州的毛澤東作了書面報告。這些決定與部署，亦均獲毛澤東批准認可。“首都工作組”第一次全體會議之後，葉劍英就著手建立工作組下面的辦公室，負責處理日常事務等。辦公室地點在軍委“三座門”。

關於這個“首都工作組”日常工作班子的組建及負責人，據傅崇碧回憶是：辦公室主任由總參作戰部部長王尚榮擔任；辦公室副主任3人：總參作戰部副部長雷英夫，總政保衛部部長史進前，公安部副部長于桑。辦公室其餘工作人員由北京軍內外各大單位選調。（見《傅崇碧回憶錄》第178頁，中共黨史出版社，1999年12月第一版）

其辦公室正副主任均由總參作戰部正副部長，及負責安全警衛的總政保衛部部長，公安部副部長出任，可見其“反政變”的色彩很濃。而那個雷英夫，正是後來最先向中央高層寫材料揭發劉少奇的始作俑者。傅崇碧還回憶說，“首都工作組”第一次會議還決定，今後，“每週至少開一次領導小組成員會議，聽取辦公室的彙報和研究討論有關問題”。

第二節 首都工作組任務

一、“首都工作組”初期的主要工作

“首都工作組”成立後第一項實施的工作就是調兵遣將。

“首都工作組”辦公室為了在毛澤東回京之前完成選調部隊的工作，在周恩來的直接領導下，很快就擬定了一份初步方案：（一）原中央警衛師改稱為警衛第 1 師；（二）北京市公安總隊改編為警衛第 2 師；（三）調第 24 軍的第 70 師作為警衛第 3 師，仍住懷柔地區；（四）調第 63 軍的第 189 師作為警衛第 4 師；（五）衛戍區領導機關相應擴大編制。周恩來很快就同意了這份方案。

5 月 26 日下午，“首都工作組”為了保密在人民大會堂的一間茶爐室召開了會議，出席會議的人有周恩來、葉劍英、李雪峰、謝富治、鄭維山、劉志堅、王尚榮、雷英夫等人。會議就調兵方案達成共識，周恩來最後說：“今天的會議，研究和決定了‘首都工作組’的任務、組織、當前工作安排、工作方法以及增調兩個陸軍師加強首都警衛力量等問題。就這樣定下來。衛戍區司令員擬由北京軍區副司令傅崇碧同志擔任。”葉劍英最後強調說：“北京衛戍部隊的調動是一件大事，不能馬虎，要按原則辦事，按軍委關於軍隊調動的規定執行，要有嚴格的程式。今後遇有緊急情況，需要調動警衛部隊執行任務時，一定要經總理批准。”

據原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傅崇碧的回憶：5 月 27 日，中央軍委發佈關於北京衛戍區部隊擴編的命令，自 6 月起，將首都警衛師和北京公安總隊及陸軍第六十三軍第一八九師調歸北京衛戍區建制。6 月 15 日，軍委又電令第二十四軍第七十師自 6 月 3 日起調歸北京衛戍區指揮。首都警衛師和北京公安總隊番號改稱中國人民解放軍警衛第一、第二師，第七十、第一八九師番號不變。北京衛戍區擴

編後，首都工作組對衛戍區的工作作出如下部署安排：6月10日前完成保衛重要目標的衛戍部隊的部署調整；6月底以前分步完成師、團幹部及保衛重要目標的連隊的幹部調配；6月中旬大體完成所有衛戍部隊的調整。衛戍區部隊受北京軍區和北京衛戍區黨委領導，具體任務按照周總理、首都工作組和葉劍英的指示辦。〔9〕

林彪作為主管軍隊的軍委副主席卻很少過問“首都工作組”的工作，惟這次在北京調兵遣將，擴編衛戍區的兵力，茲事體大，林彪也不能不重視。據邱會作回憶：在調動部隊時，林彪特別囑咐代總參謀長楊成武：“選衛戍區部隊的條件是要同你（指楊成武）有濃厚感情的部隊，能夠指揮自如，十分踏實的部隊。”

〔10〕林彪此時向楊成武說出了毛澤東的心裏話。林彪的思想很明確，這支部隊必須絕對服從上級的領導，絕對效忠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而非他人。惟林彪的表態僅此而已，並未參與“首都工作組”的實際工作。

6月3日，京西賓館召開了北京衛戍區營以上幹部大會，楊成武宣讀了中央軍委關於調整、擴編北京衛戍區的命令，衛戍區司令員傅崇碧代表衛戍區全體官兵宣誓：堅決保衛毛主席、保衛黨中央、保衛文化大革命、保衛首都的安全。中央軍委副主席葉劍英也講了話。〔11〕葉劍英在講話中說：“擔任首都衛戍任務的部隊，同野戰部隊有許多不同的特點。小分隊執勤和一兩個人分散執勤的情況比較多，接觸的環境比較複雜，會遇到資產階級各種各樣的誘惑和攻擊。所以，必須加強對部隊的政治思想工作和管理教育，把工作做到基層，做到每個戰士的心上。林彪同志提出，在戰鬥中要發揚孤膽精神。今天在城市裏執行警衛任務，我們要提倡孤忠執勤。在任何情況下，要對毛主席、對黨、對人民無限忠誠，要成為黨和人民的馴服工具，忠心耿耿地愉快地完成任務。”〔12〕

擴編後的北京衛戍區共有 4 個師，每師 6 個團，加上一個獨立團，一個軍樂團，一個幹部大隊，級別為兵團級。舉凡中央開會，大軍區司令員、政委、省委書記一級的人參加，衛戍區司令員和政委也要參加。文革期間，衛戍區人數達 10 萬人。後來根據葉劍英的指示，高碑店的 112 師，天津的 196 師，宣化的 193 師，必要時也可以由衛戍區調動。由此可見，北京衛戍區在中國政壇的位置舉足輕重。

又據《周恩來年譜》記載，6 月 5 日，周恩來就中南海、中央領導人的安全問題約周榮鑫、李質忠、童小鵬、汪東興談話，做了具體的佈置和指示。〔13〕事實上，周恩來在“首都工作組”中起了核心的領導作用。據參與“首都工作組”工作的邱會作回憶說：“‘首都工作小組’既沒有正式檔，也沒有定時定點的辦公。我們多在京西賓館的八樓葉劍英住處旁邊的幾間房子裏辦公，由葉劍英或楊成武口頭召集我們到一起，商辦有關事宜，當場拍板，分頭辦理。參加者心照不宣、很默契，所辦的事情，該讓誰知道，不讓誰知道，該怎麼辦，心裏都明白。首都工作小組的工作非常保密，因為要用錢，周恩來總理特地向我交待：‘這事不能轉手辦，你自己親自管著，用多少，直接向我（周）打交道，不要驚動別人。’”〔14〕

通過北京衛戍區的這次調兵遣將，北京地區的軍隊系統統一由衛戍區領導，歸中央軍委和北京軍區指揮，軍隊的實際權力掌握在林彪、葉劍英和楊成武的手上。毛澤東完成了對北京地區全面的軍事掌控，毛澤東可以放心大膽地為所欲為，為他下一步召開八屆十一中全會推動文革運動的執行奠定了穩固和堅實的基礎。在這一過程中，周恩來充分發揮了其運籌帷幄、滴水不漏的行事風格，將毛澤東囑意所辦之事處理得既隱秘又完滿，向毛澤東交了一份滿意的答卷。

“首都工作組”實施的另一項重要工作是，清理整頓首都的治安，消除安全方面的隱患，確保毛澤東和黨中央的安全。

曾參與“首都工作組”具體工作的邱會作回憶說：“對首都安全的任務暫定了兩項：（一）制定對首都的設防、警衛、主要目標控制的方案；（二）準備對首都進行全面的清查清理。清查清理的對象包括社會人口、槍支彈藥、電臺、監獄、僑民等。為了具體進行工作，在首都工作小組領導下，組織了一個勘察小組。小組成員有楊成武、邱會作、汪東興、萬裏（當時的北京市副市長）、李靜（總參作戰部副部長）等，楊成武為主持人。勘察小組對北京城進行一個多月的實地勘察。對遠郊區曾經勘察過的有：南口、紫金關兩個中央首腦指揮工程；房山、長辛店的廣播發射台和勞改農場、秦城監獄等。對近郊區曾經勘察過的有：玉泉山（毛主席住地，中央戰時指揮所），象鼻子溝（國務院戰時指揮所），西山（中央軍委戰時指揮所）；還勘察過密雲、順義、通縣、長辛店等處衛戍區部隊的週邊部署地區。對城內曾經勘察過的有：電視大樓、電訊大樓、地下污水道和中南海周圍的高層建築。電訊大樓屋頂上，距離中南海毛主席住房直徑只有幾百米，肉眼看得很清楚。我們就在樓頂開會，研究過對中南海的保衛和安全問題。”〔15〕

據參與勘察工作的張民回憶，6月上旬開始“首都工作組”對北京各重要的警衛目標進行實地勘察，明確各部隊的具體警衛工作。這次勘察先城區後郊區，首先勘察了廣播電臺、電視臺、中南海周邊的高大建築物，外國使領館。接著又勘察了廣播電臺的發射天線、危險品倉庫、發電廠、水庫，最後勘察監獄和勞改農場。在勘察過程中，瞭解有關情況，現場研究解決各種問題，當場決定兵力部署，並提出注意事項和有關要求。〔16〕

“首都工作組”在6月6日後從京西賓館搬到中央軍委所在地三座門，有關工作全面展開，人員也增加到二十多個。此時的“首都工作組”辦公室下設七個組：（1）部隊指揮組，主要負責警衛部隊的調動，首都重要目標的警衛；（2）治安組，主要負責社會治安工作，清除和整治各種不安全因素；（3）槍支彈藥清查組，主要負責對軍隊、地方和市民非法槍支彈藥的清查和收繳工作；（4）電臺組，主要負責對地方團體和民間各種無線電收發機的清查、整頓工作，特別是對私設電臺的清查、清理和收繳工作；（5）社會人口清查、清理組，主要對非法居留北京和危險人口的清查、整頓工作；（6）監獄、看守所組，主要負責北京市各監獄、勞改場、拘留所和看守所臨時關押人員的安全警戒和清查、清理和整頓工作；（7）外事、僑務組，主要負責各國駐京大使館和領事館的安全警衛工作，負責北京華僑的清查和安全工作。葉劍英則親自參加領導工作，周恩來也多次就有關工作作過指示。〔17〕周恩來在1967年1月21日接見科學院京區各單位代表時說：“我們搞文化大革命，搞四大、搞大串連，就有秩序，既有民主又有集中，首都警衛部隊要加強，要保衛中南海、釣魚臺、人大會堂，保衛首都的機要地點、電臺、尖端要害部門，要保衛首都的安靜，要把過去公安、保衛系統掌握的地、富、反、壞分子清洗出去。”〔18〕

二、“首都工作組”主要任務是“防政變”

周恩來、葉劍英5月15日的報告，以及5月26日的第一次全體會議，都規定了“首都工作組”的任務，這就是，加強首都北京的警衛，確保首都的安全。所謂“保證黨中央的安全”，其實，這只是個藉口。說穿了，就是保證尚在外地的毛澤東，一旦返京後絕對安全。並在毛澤東以文革之名，對一批黨政軍高層（以劉少奇為首）大清洗時，防止有人會對毛澤東搞所謂“政變陰謀”。時任總政治

部副主任，後來也是這個“首都工作組”成員的劉志堅將軍，文革後接受訪談時，曾有一段很關鍵很說明問題的回憶。據劉志堅說，早在文革正式發動前的1966年4月中旬，他受周恩來委派，與總政文化部副部長陳亞丁同赴上海，參與對批判《二月提綱》的《五一六通知》的討論修改（這種委派，不是由主持中央工作的劉少奇指派，而由周恩來直接指派，這也十分耐人尋味。說明彼時毛澤東與周恩來的關係，已非同一般）。其時，中央政治局在杭州開擴大會，陳伯達、江青、康生等人受毛澤東指派，正在上海主持這個檔的修改事宜。其間，檔草稿已作過多次討論修改。有一天，幾個人正在座談討論時，江青突然聳人聽聞地當眾說，她擔心“毛主席在杭州安全沒有保障”，並表現出深為憂慮的樣子。幾個人聽了不免吃驚。作為軍方人員的劉志堅，深感江青此說事關重大。思索之後，下來立即通過軍內保密電話，將情況告訴了北京的總參謀部。總參謀部負責人對此自然也萬分重視，當即以總參名義，向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下令，要許世友採取緊急措施，調動可靠部隊，加強杭州地區的警戒，保障毛澤東的安全。同時，總參負責人要劉志堅立即趕赴杭州，向周恩來及中央軍委領導報告。劉志堅第二天即秘赴杭州，分別向周恩來、林彪、葉劍英告訴了南京軍區許世友已經採取的軍事警戒及安全部署情況。（《動亂之初——劉志堅在文革初期的經歷和遭遇》，載《“文化大革命”風雲人物訪談錄》第4頁，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93年。）

之後，江青還多次對楊成武等人說過這樣的話：“主席在北京的安全沒得到絕對保證之前，主席不能回北京。”江青還要總參及中央軍委，特別加強毛澤東的安全保障工作。

總參謀部讓許世友作加強對杭州毛澤東保衛的軍事部署，是4月中旬的事。周恩來與葉劍英向毛澤東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提交成立“首都工作組”的報告，是

5月15日。周恩來約楊成武、鄭維山談擴建北京衛戍區，調動部隊加強對中央要害機關及電臺、報社等的安全保衛，也正是林彪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講話的5月18日。林彪是政治局常委，黨中央副主席，又主持中央軍委工作，這些情況他應當是知情者。

由此看，林彪“五一八講話”中這番話，就不是他有意危言聳聽，故作驚人之語，而是基本上是事實。他講的其實就是在周恩來、葉劍英一手操持下，關於成立“首都工作組”及相關軍事部署等一系列動作。只不過，這是只有少數人知道的核心機密，在座者（包括絕大多數政治局委員），對此並不知情。

3天後的5月21日，周恩來也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表了內容幾乎相同的講話。周恩來說：“完全同意林彪同志的講話，講得好。”又說，“這次在中央揭發的彭、羅、陸、楊，是中央領導機關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看起來修正主義不可避免，中央地方都會出現。說哪個國家的工作做得很好，不會出修正主義，是不對的，這就忽視了左、中、右的客觀存在，這就是‘一潭死水’。主要問題是防止修正主義當權。彭、羅、陸、楊是一個一個地奪取我們的陣地，有筆桿子、有槍桿子、有黨權。第二是防止修正主義發生政變。第三要防止修正主義的軍事政變。”（轉引自丁凱文：《周恩來與林彪文革作用之比較》）現在看，毛澤東發動文革時，先是要搞掉彭真、羅瑞卿等，後來要搞掉劉少奇等，確實擔心這些人會反抗，甚至對他搞“政變”。這些話他對江青講過，也對林彪講過。可見，毛澤東決心將文革大規模發展並深入搞下去，一直到他7月18日正式返回北京之前，“防政變”確實是他曾經認真考慮過的主要問題。建立“首都工作組”，以及由此而來的改組擴建北京衛戍區，並作相應軍事調動和部署，都是針對他即

將搞掉的劉少奇等人，“防其政變”的具體措施。“首都工作組”的建立及其幕後一系列運作，在 1966 年 5、6 月那種特殊而敏感的政治格局中，起碼說明兩點：

一、是周恩來此時已明確傾向於毛澤東（或者說站在毛澤東一方，而不是站在主持中央工作的劉少奇一方），並全力支持毛深入發動文革；

二、是毛澤東在文革全面發動的前夕，通過周恩來及其所控制的“首都工作組”，已經控制了北京的局勢。北京當時的實權，實際上掌握在周恩來手中，而不是劉少奇手中。

此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在座者，均為黨政軍最高層人物，毛澤東公然聲稱“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其所指何在，已是不言而喻。

大概，劉少奇也被激怒了，失去了冷靜，當場多少帶有頂撞毛澤東的態度作答說：“無非是下臺，不怕下臺。有五條不怕。”（《劉少奇年譜》下冊第 648 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 年 9 月第一版）

劉少奇這裏所說的“五條不怕”，即當時高幹中廣為傳播的“五不怕”：

“不怕撤職，不怕降級，不怕開除黨籍，不怕老婆離婚，不怕坐牢殺頭”。這是毛澤東當年在黨內的一次講話中說的，號召黨員幹部要敢於講真話，要有“五不怕”精神。劉少奇在此用毛澤東自己說過的話來回敬他，可見其對毛的忍耐已達極限。劉少奇夫人王光美文革後也說，這是劉在公開場合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頂撞毛澤東。

在此之前，毛澤東和劉少奇的分歧矛盾，尚未在公開場合爆發，毛澤東《炮打司令部》大字報也尚未寫出。葉劍英在這種場合，說出“我們有幾百萬軍隊，

不怕什麼牛鬼蛇神”這樣的話，顯然與他“首都工作組”組長這個身份有關。他既是從軍委這個角度向毛澤東表態，也是從“首都工作組”這個角度表態。

如果說，葉劍英此話不一定是專門針對劉少奇而發的話，起碼可以表明，他這番講話，明顯帶有代表軍隊全力而且無條件支援毛澤東的意思。從另一個角度上，這也帶有向已經與毛澤東公開攤牌的劉少奇示威施壓的味道。

傅崇碧回憶說：“1966年5月，首都工作領導小組成立時的第一次會議，葉劍英副主席讓我參加。會議由周總理主持（引者注：其實是葉劍英主持，周恩來代表政治局常委參加並講話），宣佈首都工作領導小組成立，任務是清理整頓首都治安，保證中央和首都安全。領導小組組長是葉劍英副主席。”（見《傅崇碧回憶錄》）

三、“首都工作組”領導下的北京衛戍區

“首都工作組”第一次全體會議之後大約一周，經周恩來同意，於6月3日由“首都工作組”與北京軍區聯合召開了一次大型會議，地點在軍委所屬的京西賓館。這次會議，在北京衛戍區的歷史上比較重要，被稱為“六三會議”。出席參加人員是新擴建後的衛戍區營以上幹部。會議由周恩來親自主持，出席會議有國務院的幾位副總理，軍委幾位副主席，以及解放軍三大總部、各軍兵種、在京的各軍事院校負責人，以及北京軍區的正副司令員，正副政委等領導（當時北京衛戍區建制還屬於北京軍區管轄）。

這次會上，正式宣佈了中央軍委關於北京衛戍區擴編的命令。葉劍英和楊成武分別代表中央軍委和總參在大會上講話。

葉劍英在講話中說，今天的大會，總理、副總理、軍委副主席、各總部、各軍兵種、各院校，以及北京軍區的負責人都來參加，對會議寄予很大希望。為了保衛首都的安全，毛主席、黨中央決定加強首都衛戍部隊，在原來基礎上，增加到三個師另一個團。這幾個部隊各有特長，有的熟悉警衛勤務，有的善於野戰。為了把任務完成得更好，你們應該互相學習，取長補短。楊成武則以代總參謀長的身份，在講話中說，中央、中央軍委決定首都衛戍部隊由原來的一個師另一個團，增加為三個師另一個團，在北京軍區和北京衛戍區領導下，擔負保衛毛主席、黨中央，保衛首都的任務，是一個非常光榮的任務。在講話中，楊成武特別指出，衛戍部隊的具體任務，按總理和首都工作組以及葉帥的指示辦。這話說得意味深長。在中共歷來奉行“黨指揮槍”的原則下，北京衛戍部隊，不是按劉少奇主持的黨中央的指示辦，而是按周恩來、葉劍英和這個“首都工作組”的指示辦。這無論如何是不正常的。北京衛戍部隊擴編的同時，在葉劍英主持下，“首都工作組”當即提出了對衛戍部隊的部署調整，及一系列整編安排方案。

該方案主要內容為：

- 一，在6月10日前，完成保衛北京重要目標的衛戍部隊的部署調整；
- 二，6月底以前分步完成衛戍師、團幹部，及擔負保衛重要目標的連級幹部調配；
- 三，6月中旬大體完成所有衛戍部隊的調整。

也就在6月3日當天，周恩來對“首都工作組”上報的首都警衛部隊調整方案作出批示。其批示如下：“劍英、成武、王尚榮三同志，同意這一報告中所提的警衛部隊的部署調整方案，請即組織實施。望在4天內將部隊部署和調整具體落實，並將營連的駐地和機動兵力駐地繪圖標出送閱，其他三事均同意。”（以

上見《傅崇碧回憶錄》第 180 頁)北京衛戍部隊擴編，最初說是由原編制的一個師另一個團，增加到三個師另一個團。但其後的組建和擴編，大大超出這一原訂計畫，部隊實力強大得多。據傅崇碧回憶，擴編後的北京衛戍部隊共有 4 個師(其中包括第 24 軍最強的機械化師第 70 師)，而且每個師轄 6 個團，而不是通常的 1 個師 3 個團或 4 個團。另外還有一個獨立團，一個幹部大隊，一個軍樂團，總兵力達到 10 萬多人，成了當時國內實力最強的軍事集團之一。而且，傅崇碧將軍還說，後來根據葉帥的指示，還作出決定，“在必要時”，駐高碑店的 112 師，駐天津的 193 師等 3 個野戰師，也可以由北京衛戍區調動。(以上均見《傅崇碧回憶錄》)從這些安排部署上看，北京衛戍部隊“防政變”的成分很大。因為，如果僅僅是負責警衛任務，或維護首都社會治安，哪裡需要這麼多野戰部隊甚至包括當時國內還為數不多的機械化師？在政治待遇及級別上，北京衛戍區升格為與大軍區平級。中央及中央軍委開會，凡有大軍區司令員、政委及省委書記一級的領導參加，北京衛戍區的司令員和政委也都參加。到後來，據說北京衛戍區收到的中央文件，甚至比原來的頂頭上司北京軍區還要多。可見其在文革特殊背景下，北京衛戍區地位的舉足輕重。

吳德談“首都工作組”

吳德原是中共吉林省委第一書記，文革發動的 1966 年 5 月，中共中央改組北京市委時，被選中調來北京，任改組後的北京新市委第二書記兼市長。中共“十大”吳德進入中央政治局，一直擔任北京市主要負責人。吳德近年有一部關於文革的回憶錄《吳德口述：十年風雨記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經歷》問世。雖然有人認為吳德這部口述回避了些東西，但總體上，還是為世人提供了許多鮮為

人知的當年高層內幕史實，也為海內外文革史家所矚目。吳德這部回憶錄中，就談及當年他所接觸到的“首都工作組”一些很重要的史料細節。據吳德的回憶，“首都工作組”不僅主持改組北京衛戍區，改組北京市公安局，甚至連改組北京市委這樣的大事，都是由這個“首都工作組”在具體主持操作。由此，一方面可見當年這個“首都工作組”確實非同尋常，另一方面，也可證實，當時劉少奇主持的“黨中央”，實質已成應付日常事務的“傀儡中央”。連改組北京市委這樣本是黨中央應有職責和權力的事，竟無法參與做主。吳德在回憶錄中談及他由吉林調北京這段特殊經歷時寫道：“1966年5月中旬，李富春同志打電話給東北局，傳達中共中央調我到北京市工作的決定。我當時任吉林省委第一書記。”

“我在瀋陽呆了幾天，5月24日到了北京。那時為全面發動‘文化大革命’，中央正在開政治局擴大會議（5月4日—26日）。毛澤東在外地，劉少奇主持。”

“我到北京後，先去見了鄧小平。小平同志笑著說，歡迎你來。中央決定你到北京市委工作，李雪峰任第一書記。鄧小平要我先參加政治局擴大會議，北京的情況由李雪峰與我談。”“我到北京後，也就去見了葉帥。當時中央成立了一個首都工作組，葉帥是組長，辦公室主任是王尚榮。”於“首都工作組”面臨的主要任務和工作，吳德談了三個方面：“工作組一是改組了北京衛戍區，傅崇碧任司令員，黃作珍任政委，衛戍區調進了兩個野戰軍的主力師（七十師、一八九師）。葉帥對我說：‘北京的秩序、安全工作沒有搞好前，毛主席不能回來’。”這裏也可見，建立“首都工作組”的主要目的和任務，是保證毛澤東回北京的安全。換句話說，也就是“防政變”，防止黨內高層或其他什麼人對毛澤東搞政變。“二是改組北京市委。”吳德談到，在他來北京之前20多天，華北局已派出以池必卿、黃志剛為首的工作組進駐北京市委。不過可能因為涉及到自己，對如何改組

北京市委的詳情，吳德並未多說。而吳德對改組北京市公安局的情形談得比較具體。

“三是改組北京市公安局。根據工作報告，中央負責同志批示將北京市公安局局長、副局長等八個負責人逮捕。（《吳德口述：十年風雨記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經歷》第3至6頁）

“首都工作組”成立後接連搞的北京衛戍區、北京市委、北京市公安局這三個重大改組行動，體現或執行的正是毛澤東這種意圖，由周恩來具體負責實施。

四、劉少奇成“籠中鳥”束手就擒

在周恩來主持和指揮的“首都工作組”完完全全控制了北京後，毛澤東終於在1966年7月18日乘專列回到北京。自1965年11月12日，即《文匯報》發表姚文元《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文章（同天楊尚昆被撤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職務由汪東興繼任）兩天後，毛澤東離京赴南方，算起來，他有半年多沒在北京。此次返京，北京政治形勢可謂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本來，自毛澤東發動文革以來，在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劉少奇、鄧小平，因對文革運動到底怎麼搞法，心中全然無數，多次請毛回京坐鎮，毛澤東執意不回北京。毛澤東及江青等，是擔心毛的安全得不到百分之百的保證，擔心遭到劉或其他人的“暗算”。

這裏有個值得重視的細節，毛澤東返京前一周的7月11日，周恩來曾專機到武漢，在當時國事那麼忙的情形下，還破例呆了兩天。當天及第二天，周恩來連續單獨見正在武漢的毛澤東。周為何赴武漢？是毛澤東召他去還是他自己決定去？詳情內幕相關文獻至今均無披露。《周恩來年譜》僅簡單記載：“7月11日 飛武漢。”“7月11日、12日 到毛澤東處談話。”至於談些什麼內容，未作更多披露，只提及毛給周看了那封幾天前寫給江青的信。周建議為此找林彪談談

（《周恩來年譜》下卷第 40 頁）。由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被認作最權威的上下卷《毛澤東傳》，對此更是隻字未提。反而如此寫道：“七月八日，毛澤東給江青寫了一長信。信寫好後，給正在武漢的周恩來、王任重看過。”（《毛澤東傳》下卷第 1420 頁）好像周本來就在武漢。可見官方正史在關鍵問題上多麼不可靠。筆者推測，毛因為打算返京，獨召周恩來赴武漢，詳細瞭解首都現狀及高層動向，尤其是北京安全保衛及局勢控制方面是否萬無一失，以決定是否返京及何時返京。周恩來也一定會向毛澤東全面彙報“首都工作組”組建運作詳情，以及衛戍區部署、部隊調動等等，讓毛對北京安全以及對整個局勢控制心中有數，並百分之百放心。其後，周恩來又專飛上海見江青。名義上是將毛 7 月 8 日那封信轉交江青。實際上，也是將北京高層動態，及北京安全防範情況包括部隊部署告訴江青（如果不用彙報二字的話），讓其徹底放心。因為此前江青說過這話，“在北京的安全沒得到絕對保證以前，主席不能回北京。”

正是如此，才有了 7 月 18 日毛澤東離京半年多之後，正式返京，而且重回第一線親自主政——就是不管是名義上，還是實際操作上，從劉少奇手中把黨中央大權奪了過來。

劉少奇得知毛澤東返京，曾想登門彙報一切，卻被毛拒之。而毛澤東卻接見了陳伯達、張春橋等。

7 月 19 日深夜，參加毛澤東親自在懷仁堂主持的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劉少奇才見到了毛澤東。以後幾天，至 8 月初，劉少奇名義上還主持了幾次政治局常委會，但一切按毛旨意行事。毛澤東卻緊鑼密鼓，暗中佈局，準備與劉少奇正式攤牌。返京後，10 天之內，毛澤東採取了兩個重大行動。

其一，宣佈撤銷文革初期派往各學校和單位領導運動的“工作組”，並以此為由，追究劉少奇和鄧小平的責任。實質是開始對劉、鄧的清算。

其二，決定緊急召開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對中央機構（包括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常委會、中央書記處）進行全面改組。臨時決定召開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是一個“非常舉措”。本來，中共八大黨章規定，每年或至少兩年召開一次中央委員全體會議。但自從 1962 年 9 月召開了八屆十中全會後，過去了差不多整整 4 年，中共再未開一次中央全會。如今毛澤東卻突然提出開全會，事先未作任何商議甚至通報，完全是想開就開，說開就開。沒有任何一點事先籌畫準備的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出席人員也十分奇特。僅有 74 名中委、67 名候補中委與會，卻另有 47 名非中委或候補中委的人“列席”。這列席者，有包括江青在內的中央文革小組全體成員，還有北大“第一張馬列大字報”作者聶元梓在內的十多名所謂“革命師生代表”，有的甚至連黨員也不是。

毛澤東做事，真是敢想敢幹，不按常理出牌。正是這批“列席者”，組成了全會上圍攻批判劉少奇和鄧小平的先鋒和主力。全會議程和時間上也多變。原定開 5 天，後來開了 12 天。原定議程，會議第一天由鄧小平以總書記名義向與會者宣佈說明，主要有：討論批准十中全會以來中央政治局關於國內國際問題的重大決策和措施；討論通過《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補議確定 5 月政治局擴大會議關於人事變動的決議等。會議中途，毛澤東於 8 月 5 日，寫下那張所謂《炮打司令部》大字報，並於 8 月 7 日臨時作會議文件散發。由那批列席者帶頭，會議立即轉入了對劉、鄧的批判圍攻。這次中央全會的議程和結局，也由此大變。那些“議程”，不過是毛澤東提出要召開中央全會理由的一個幌子。

曾列席這次全會閉幕式的吳法憲，在回憶錄中，談及當時自己所經歷的一些內情。吳法憲說：八號那天下午，周恩來突然之間又來電話通知我，要我晚上到人民大會堂的福建廳開會。我剛到了不久，就有一些其他人陸陸續續地來了。我記得參加那天會議的有楊成武、張愛萍、蕭華、許光達、蕭勁光、蘇振華等人，還有中央各部門的負責人，總共大約有二十多人。我們這些人都是周恩來親自通知來開會的，但不知道開的是什麼會議。等了大約兩個多小時，先是陶鑄來到福建廳，隨後周恩來也到了。周恩來一來，就從上衣口袋裏掏出一張紙說：“這是毛主席在八月五日所寫的一張大字報，是手稿，我念給你們聽聽。”

周恩來所念的，就是以後眾所周知的毛澤東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

對這張大字報，周恩來一連念了兩遍。念完之後，他又說：“現在看來，多年的事實證明，劉少奇不行了，他不能再主持中央的工作了。主席原來想培養劉少奇當接班人，現在看來不行了，他辜負了毛主席的希望。現在中央決定，把林彪同志接回北京接替劉少奇擔任中央第一副主席。現在先通知你們一下，暫時不要再往下傳，就你們知道就行了。待中央決定往下傳達時，再通知你們。”（《吳法憲回憶錄》下卷第 595 至 597 頁）

吳法憲還說，當時在那 20 多位高級將領和部長們，聽後全部都沉默不語，有些不知所措的樣子。“當時在場的陶鑄，也沒有講話。周恩來講完以後，他們兩個人就一起走了。會也就散了。”

8 月 12 日，全會閉幕當天，根據毛澤東提議，改組了中央機構，重選了政治局常委（本來選政治局成員和常委應是在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時），劉少奇從排名第二降到第八位。當天，劉少奇在會上作檢討性發言。他說，主席不在北京時，

中央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路線錯誤，主要由我負責。我說過的話，作過的事，我都負責，決不推脫。其他同志所犯錯誤，我也有責任。我當遵守黨起碼的紀律，不搞兩面派，不搞地下活動。有意見擺到桌面上來。劉少奇還請求辭去政治局常委、國家主席職務。（見《劉少奇年譜》下卷第 649 頁）現在看，劉少奇當時的想法還是天真了。他以為毛澤東和江青這些人會因此放過他。就在全會閉幕的前一天和當天，葉群兩次找總參作戰部副部長雷英夫，寫誣陷劉少奇的材料。8 月 14 日，林彪將這兩份材料通過江青，交到了毛澤東那裏。

9 月 10 日左右，劉少奇寫出了《在北京各工作組領導幹部會議上的檢討提綱（草案）》，呈報毛澤東審閱。毛澤東此時還是不露聲色，於 9 月 14 日復函劉少奇說：“基本上寫得很好，很嚴肅，特別後半段更好。建議以草案形式印發政治局、書記處、工作組（領導幹部）、北京市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各同志討論一下，提出意見，可能有些收穫，然後酌加修改，再作報告，可能穩正一些，請酌定。”（《劉少奇年譜》下卷第 650 頁）

劉少奇接毛澤東復函的當天，向已接替他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來致信，請示說：我的檢討提綱，毛主席已經看過，並批了一段話，退還給我。現送上，請你看看。我贊成毛主席的意見，以草案形式印發政治局、書記處、工作組領導幹部、北京市委、中央文化革命領導小組各同志討論一下，並請他們提出意見，退還給我，然後酌加修改，再作報告。關於印發事，請你批辦，請各同志在幾天之內提出意見告我，給我以幫助。主席的批語也印發。如何？請你酌情安排。（《劉少奇年譜》下卷第 650 頁）

第三節 “首都工作組” 的動盪

一、文革期間“首都工作組”

在完成調兵遣將這一最重要的任務之後，“首都工作組”很快就陷於事務性的工作。據參與該工作組的張民回憶，日後的工作主要有幾個方面：一是協同北京衛戍區為毛澤東檢閱紅衛兵搞好組織指揮和安全警衛工作；二是在周恩來的領導下保護一批老幹部、民主黨派人士、科學家等；三是維持好首都的秩序，使首都不致發生重大的動亂事件。

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門廣場舉行了首都百萬群眾“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革命群眾大會”，毛澤東、林彪一同出席。“首都工作組”辦公室除留一人在三座門看家外，其餘全部到天安門城樓值班和參加現場工作，大會的警衛工作即由“首都工作組”和北京衛戍區共同擔負。現場的參謀人員在臨時的作戰值班室完成了通訊系統的檢驗，並與軍內各重要部門取得聯繫和溝通。這次慶祝大會實際上成為毛澤東第一次對“紅衛兵”的接見。

“818”毛澤東首次接見紅衛兵後，“首都工作組”又馬不停蹄地為毛澤東組織了以後多次的檢閱紅衛兵活動。比如毛澤東第二次檢閱紅衛兵時，“首都工作組”提出的方案之一是，50萬紅衛兵排列在天安門廣場，由毛澤東乘敞篷汽車檢閱，再登上天安門城樓，以接見大會的方式完成整個接見過程。由於各地紅衛兵紛紛湧入北京，組織方面存在“散”和“亂”的嚴重問題。在周恩來的指示下，“首都工作組”辦公室組建了八個聯合指揮部，簡稱“聯指”，下面分別編組若干個團、營、連。各大“聯指”分別由北京軍區、總後、海軍、空軍、各兵種等單位抽調幹部組成。“聯指”的總指揮由師以上首長擔任，其他團長、營長、連長由部隊相應幹部擔任。另外，還從中央直屬機關、國務院各部委和北京市抽

調幹部，分別到各營、連做紅衛兵的政治思想工作，並負責物資供給，保障紅衛兵的生活需要。事實證明，“聯指”確實發揮了重要作用，各“聯指”對紅衛兵進行了軍事化的訓練，按班、排、連、營、團組織序列，由部隊的幹部帶領，不僅加強了紀律教育，而且還嚴格管理，在以後毛澤東多次檢閱紅衛兵時，紅衛兵們原來的“散”和“亂”得到有效的改進。毛澤東第七次接見紅衛兵時，“首都工作組”在三天內籌集了 6000 輛卡車。當時“首都工作組”辦公室幾個參謀以總參作戰部的名義，分別打電話從總後、海軍、空軍、各兵種司令部，及瀋陽、北京、濟南等軍區抽調汽車，火速集中到北京，由北京衛戍區統一指揮編隊，最終所調的 6000 輛汽車全部準時到達指定地點，保證了 11 月 10 日檢閱活動的進行。

文革初起時，一些老幹部被點名批判，一些人被“造反派”、“紅衛兵”抓走，最早被抓的有彭真、劉仁、萬裏、夏衍等人。“首都工作組”辦公室得到報告後，緊急報告周恩來。周通知北京衛戍區儘快將被抓走的人找回來。後來幾經周折將這批被抓人士找了回來。事後周恩來指示“首都工作組”辦公室協同衛戍區認真研究，如何防止類似事件的發生，要對老幹部們加強警衛工作。在中國科研前沿搞“兩彈一星”的專家們在此時也未能倖免被揪鬥和關押，這引起老師聶榮臻的憤怒，北京衛戍區在聶榮臻的要求下派出軍隊保護這些專家的人身安全，以保障科研工作的進行。此外，一批著名的統戰人士在毛澤東指示下，周恩來也通過衛戍區予以保護，如章士釗、宋慶齡、郭沫若、程潛、何香凝、傅作義、張治中、邵力子、李宗仁、蔣光鼐、沙千里、張奚若等。當全國各地均陷入動亂之時，惟有軍隊還處於相對穩定的狀態，也只有軍隊能有效地執行命令，在上級的

指示下有限度地保護一些老幹部和重要的知名人士，保護首都的要害部門和科研機構。

文革期間，北京衛戍區在周恩來的指示下對一些老幹部實施了“監護”。據傅崇碧回憶：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組規定，一批老幹部，如彭真、羅瑞卿、黃克誠、彭德懷、王尚榮、劉志堅等人被送到北京衛戍區實行“監護”。據周恩來解釋：就是把他們臨時看護起來，不能隨便自由，同時也是保護起來，不要讓造反派隨意批鬥。〔19〕周恩來的這個解釋冠冕堂皇，名義上是把這些老幹部保護起來，實際上就是將這些人變相關押、審查，唯一不同的是，他們只不過沒有被送進監獄而已，實際待遇相差無幾。以彭德懷為例，彭被關押在北京西郊一處部隊駐地的小院，基本上就是一個與世隔絕的秘密監獄。除了每天反省之外，還要經常被各種不同的人帶出去到各種不同的場合接受批鬥，批鬥會當中還多次被毆傷。彭每天上下午各只有 15 分鐘放風，身旁有軍人隨時監視。〔20〕彭德懷身體狀況日益惡化，卻得不到必要的治療，在那裏一直被關押到死。

“首都工作組”在文革中還有一項工作就是維持好首都的秩序和安全。1966 年 8 月底，北京某中學紅衛兵把蘇聯駐華大使館門前的路牌換成“反修路”，並要在現場召開命名大會。“首都工作組”辦公室立即向周恩來報告，並提出加強警衛力量，以免發生不測。周恩來連夜召開緊急會議，立即採取三項措施：（1）紅衛兵可以改路名，但不要在大使館前開大會，不要把大字報貼到大使館牆上，更不能衝擊大使館；（2）北京衛戍區派出一個營的兵力徒手到現場執行警衛任務，防止紅衛兵採取過激行動；（3）“首都工作組”辦公室和衛戍區要派人到現場檢查巡視，防止發生不測事件。如有緊急狀況要立即報告。“首都工作組”在維護北京地區秩序與安全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文革中的“造反”活動

屬革命行動，受到毛澤東、中央文革小組的大力支持，這樣的動亂是無法從根本上制止的，“首都工作組”對首都秩序的維護也只能是頭疼醫頭、腳疼醫腳，治標不治本而已。

二、“首都工作組”的動盪

“首都工作組”的動盪來源於總參“八二五事件”。1966年8月22日，總參謀部在北京京西賓館召開師以上幹部會議，由代總參謀長、黨委書記楊成武作機關開展文革運動的動員報告。下午總參通訊兵部有人到總參機關所在地旃壇寺貼大字報，指責楊成武的講話壓制革命群眾。此後總參的一些部、局也貼出大字報，矛頭對準當時的代總參謀長楊成武。

8月25日上午，毛澤東按照預定安排在釣魚臺12號樓接見坦桑尼亞軍事代表團，陪同的有總理周恩來、代總長楊成武和副總參謀長彭紹輝，國防部外事局長潘振武為引見人。陪同和引見的人還沒有到場，外事局參謀孫啟祥給毛澤東的秘書徐業夫打電話，說他代表革命群眾，要求毛澤東不要讓潘振武參加接見。周恩來與楊成武商量後，同意潘振武不參加當天的接見活動。〔21〕

關鍵的問題還不在於潘振武參加上述毛澤東接見坦桑尼亞軍事代表團的活動，而在於當天葉劍英以軍委名義做出限制軍隊文化大革命的多條規定，並下發全軍。這些措施是針對軍隊自己的，只在軍隊內部實施。〔22〕

8月25日，中共中央轉發了解放軍總政治部關於正確處理地方學生要求鬥爭部隊重點批判物件問題的意見。該指示要求：

一、學生和群眾到軍隊機關抓黑幫分子，要向他們說明，他們要鬥黑幫分子的革命熱情，我們表示熱烈歡迎。請他們相信解放軍，一定會把軍隊內部的黑幫分子鬥倒，鬥臭，鬥垮。軍隊中的黑幫分子，由軍隊負責處理。他們對軍隊內的黑幫分子有意見，有材料，有大字報，歡迎送來。

二、各大單位可向各地黨委建議，在地方參加四清的軍隊幹部，如確有嚴重錯誤缺點，應當在所在工作的單位進行批判令其檢討，回軍隊以後再酌情處理。

三、軍隊幹部宿舍有武器、機密檔和常通軍事機密電話，建議地方學生不要到軍隊幹部宿舍進行搜查。〔23〕

這一指示顯然與軍內機關造反派思想格格不入，自然引起他們的強烈反彈。

8月25日，總參作戰部和國防部外事局的一些人貼大字報，敲鑼打鼓，高呼口號，拿著質問信、抗議書等，質問代總長楊成武和潘振武“壓制群眾罪責難逃”等等。當天晚上，外事局的大字報貼出來了，作戰部連夜開會，支持外事局群眾“革命行動”的大字報也貼出來了。總參作戰部部長王尚榮、副部長雷英夫等帶頭簽了名。此時，解放軍測繪學院劉清明也貼出批判楊成武的大字報，賀龍元帥辦公室的工作人員亦貼出《炮打總參辦公廳黨委》的大字報。由此，楊成武一時成為眾矢之的。

對於這一波針對楊成武的大字報，周恩來十分警惕，於26日親筆寫信給總參黨委。周的原文是：

“楊成武同志轉告總參謀部各部、局黨委：

昨（25）我陪同毛主席接見坦桑尼亞軍事代表團時，楊成武同志向我反映，總參外事局同志提出不要潘振武同志參加接見。楊成武同志同意這一要求，並向

我建議不讓潘振武同志參加接見，我同意他的意見，並於事後報告了主席。可將這一情況轉告有關同志。”

毛澤東的秘書徐業夫在 27 日也寫了證明信如下：

“總參黨委：

8 月 25 日毛主席接見坦桑尼亞軍事代表團之前，總參外事局孫啟祥同志打來電話說，不讓潘振武同志參加，我當即報告了楊成武請他決定。這時總理已到，他即向總理反映了我接外事局電話的情況，並向總理建議不讓潘振武同志參加，總理當時同意了楊成武同志的意見，並及時告訴了潘振武同志不要參加了。”

[24]

據在總參工作的張民回憶，王尚榮和雷英夫當時受到一批“極左派”群眾的壓力，並未細看大字報內容，也沒有慎重考慮大字報的後果，不知道其中有攻擊楊成武、王新亭的內容，就稀裏糊塗地在上面簽了名。〔 25 〕惟這張大字報的出現引起了總參各部的連鎖反應，總參各部、各局陸續出現揭發、批判楊成武、王新亭的大字報，解放軍的中樞部門——總參謀部出現不穩、動亂的跡象。

8 月 30 日，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兼秘書長葉劍英，在軍委辦公廳三座門緊急召開軍委會會議，蕭華、張愛萍和楊成武等都到會參加。葉劍英在會議作了指示。總政治部主任蕭華講了話，指出王尚榮與雷英夫的做法是錯誤的，及時制止了事態的擴大。林彪認為僅僅批評王尚榮、雷英夫是不夠的，堅持撤銷此二人的職務。在 31 日召開的軍委常委會上，林彪表示了自己的看法，並得到與會者的贊同，會上決定撤銷王、雷二人的職務，停職反省。不僅林彪重視軍內發生的奪權活動，周恩來也十分重視。在“八二五事件”剛剛發生時，“周總理知道

後很生氣，很快給楊成武打來電話，詢問情況，要楊提高警覺，並說人家都要奪你權了，你還不知道。”〔26〕這個看法實際上與林彪不謀而合。

發生在總參的這一事件，毛澤東本人也是瞭解的。1967年2月3日，毛接見阿爾巴尼亞的卡博、巴盧庫時說：“比如楊成武，他是代總參謀長，總參管好幾個部，其中一個作戰部的部長、副部長寫大字報要打倒他。那是賀龍挑起來的。”〔27〕

1966年的7、8月份，文革運動剛剛興起，毛澤東將北京大學聶元梓的的大字報譽為“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中共中央在全國範圍內展開對吳晗、鄧拓、廖沫沙的“三家村”批判，紅衛兵運動也應運而生，被毛澤東掀起的文革運動開始如火如荼地開展起來。軍隊內部自然不會免俗，緊跟“偉大領袖”號召者大有人在，他們站出來批判“當權派”在當時被認為是革命行動，只是參加運動的大多數人心裏並不清楚誰是“偉大領袖”心目中的“走資派”，誰又是響噹噹的革命派。軍內一部分人批判楊成武如同前不久空軍、海軍一些人批判吳法憲、余立金、蕭勁光、蘇振華等人如出一轍。但是作為軍委第一副主席的林彪卻是要穩定軍隊，不能容忍地方文革運動中的造反奪權事件在軍內發生，故必須煞住軍內奪權的風潮。王尚榮、雷英夫雖然是小人物，但快刀斬亂麻地撤銷他們二人的職務卻可起到殺一儆百的作用，及時地制止軍內任何類似事件的再次發生。此外，軍隊的領導權是一個極為敏感的問題，自從羅瑞卿事件後，楊成武實際上成為僅次於林彪、葉劍英的軍隊實權人物，是毛澤東、林彪極為信任的軍隊領導人，軍委已經形成了新的政治格局，如無毛澤東、林彪、葉劍英的同意，任何人都無法動搖楊成武在軍內的地位，任何對楊成武的挑戰都會被視為“反對毛主席革命

路線”、“破壞文革”的罪行。王尚榮、雷英夫等人對此不察，政治上的幼稚終於導致自己的下臺。

由於“首都工作組”的正副組長皆被打倒，周恩來臨時抽調總參作戰部副部長王德出面領導，然後再調北京軍區副司令員鄭維山兼管“首都工作組”辦公室的領導工作，使之能夠繼續運轉。

三、“首都工作組”的撤銷

最後，談一下一度權力無邊的“首都工作組”以後的結局。隨著文革運動的深入，整個政局的複雜多變，以及各方面利益及權力的較量與衝突，“首都工作組”的工作也就不那麼正常和順暢了。到1966年下半年，基本上處於半癱瘓的狀態。這首先是“首都工作組”的一些成員先後受到衝擊，以後甚至被打倒靠邊。其自身難保，無法再參加“首都工作組”任何工作。最先是北京市委的李雪峰、萬裏，再以後，身為國務院秘書長、一直是周恩來總理手下主要助手的周榮鑫，因為“西糾”問題，在一次大會上被江青點名。之後就是挨批鬥，被停止工作。到1967年初，劉志堅、鄭維山兩位軍中將領，也先後遭受被中央文革小組點名的厄運。辦公室負責日常事務的王尚榮、雷英夫、于桑等，也先後在本單位挨批鬥。放眼整個“首都工作組”，僅剩下葉劍英、楊成武、謝富治、汪東興、傅崇碧等少數幾個成員。而江青為首的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卻日漸得勢。

1966年12月26日，毛澤東在家裏舉行了一個別開生面的生日慶祝會，參與人有江青、陳伯達、張春橋、王力、關鋒、戚本禹、姚文元。毛澤東就新的一年文革運動發出了全國全面奪權的號召。1967年初上海、山西、山東、貴州、黑龍江分別發生奪權運動，各地奪權也逐漸進入新的高潮。“三支兩軍”的工作走上議事日程，成為控制社會動亂的主要力量。

到 1967 年春季，軍委秘書長的葉劍英因為“二月逆流”受到毛澤東的嚴厲批評，被迫靠邊站。全軍文革小組組長的劉志堅在 1967 年 1 月倒臺。鄭維山接替楊勇成為北京軍區司令員也無暇顧及“首都工作組”辦公室。北京市副市長萬裏很早就被打倒，根本沒有參加過“首都工作組”會議。更主要的是，北京政壇的焦點問題已經發生重要的變化，不再是一年前毛澤東所擔心的“安全”問題了。特別是北京衛戍區的建制、擴編早已完成，與軍委各總部也建立了正常的工作關係，“首都工作組”的政治使命已然完成，沒有什麼大事需要它去辦了，而日常的軍隊的調動、應付突發事件等也可交由總參作戰部負責處理，此時的“首都工作組”已成為多餘。

1967 年春，“首都工作組”辦公室向周恩來呈送了一份報告，請示撤銷該辦公室，但周恩來有意壓下沒有理睬，此後該報告又多次送呈周恩來，但一直沒有下文。據周恩來辦公室秘書張作文說：“據我觀察，周總理對撤不撤‘首都工作組’辦公室問題，還在考慮，看來他想再等一等，看看還有什麼新的需要沒有。”直到 1967 年 6 月周恩來才最終同意撤銷“首都工作組”辦公室。從此，“首都工作組”走進了歷史。深層次的原因是毛澤東 7 月 18 日返京，尤其是八屆一中全會以後，徹底掌握了局勢。

四、幾點總結

第一，“首都工作組”成立的初衷，是毛澤東為發動一場旨在打倒劉少奇的文革運動時在軍事上做的萬全準備。加強首都的警衛力量並非是針對所謂的外來敵對勢力，恰恰是針對負責中央一線工作的劉少奇、鄧小平這些曾經的“自己人”。1967 年 2 月 3 日，毛澤東會見阿爾巴尼亞的卡博、巴盧庫時說：“當著公開發表北京市委改組的時候，我們增加了兩個衛戍師。現在北京有三個陸軍

師，一個機械化師，一共有四個師。所以，你們才能到處走，我們也才能到處走。原先那兩個師是好的，但是，分散的一塌糊塗，到處保衛。”〔29〕“首都工作組”成立之時處於極端的保密狀態，決不是某些人所說的為了防範林彪，而是為了防範劉少奇。一言以蔽之，“首都工作組”的成立與工作就是毛澤東為確保文革運動在軍事上的做的戰略部署。

第二，林彪在 1966 年 5 月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絕非是偶然和孤立的。林彪這篇被中共官方批為“政變經”的“五一八講話”明確指出：“毛主席最近幾個月，特別注意防止反革命政變，採取了很多措施。羅瑞卿問題發生後，談過這個問題。這次彭真問題發生後，毛主席又找人談這個問題。調兵遣將，防止反革命政變，防止他們佔領我們的要害部位，電臺、廣播電臺、軍隊和公安系統都做了佈置。毛主席這幾個月就是作這個文章。”“毛主席為了這件事，多少天沒有睡好覺，這是很深刻很嚴重的問題。”林彪一語道出了毛澤東的心病，點到了毛澤東暗中調兵遣將的實質核心內容。林彪這篇講話不過就是配合了毛澤東在軍事上的部署。林彪的特點在“說”，而周恩來的特點則是在“做”。

第三，“首都工作組”的具體工作均在周恩來的領導之下進行。從調兵遣將到清理整頓北京市的治安，從負責毛澤東檢閱紅衛兵的各项部署到對一批軍隊被打倒的老幹部們實施“監護”，再到維持首都的秩序、治安等，這期間主要工作是由“首都工作組”與北京衛戍區共同完成，而這些主要工作的直接領導者是周恩來、葉劍英、楊成武等人，具體工作則是“首都工作組”辦公室負責操作。周恩來實際上是毛澤東打倒劉少奇的得力工具，而林彪在此期間反而並未起什麼作用。

第四，“首都工作組”辦公室主任王尚榮、副主任雷英夫的倒臺，並非是林彪為了“篡黨奪權”設法換上自己的親信，而是及時制止軍內發生類似地方造反奪權的動盪，將此類現象在萌芽時就及時予以制止。王、雷倒臺後，“首都工作組”由鄭維山負責就是明證，鄭維山是原紅四方面軍的將領，與林彪毫無淵源。那種說林彪堅持撤換王尚榮等人是為了換上自己的人從而孤立周恩來，如非無知，就是別有用心。

第五，事實證明，軍隊介入文革運動，絕非是 1967 年“三支兩軍”才開始，而是貫穿于整個文革時期。毛澤東在 1965 年 2 月打倒了羅瑞卿，接著又端掉了彭真、陸定一和楊尚昆，掃清了打倒劉少奇的前沿陣地，而此時又在北京成立“首都工作組”，進一步加強軍隊部署，軍隊成為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得力工具，有了軍隊這個堅強的後盾，毛澤東遂在 1966 年 8 月召開八屆十一中全會，貼出《我的一張大字報》，將文革鬥爭的矛頭直指劉少奇。由此可見，軍隊在文革中的確發揮了無可替代的作用。

注釋：

〔1〕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下冊，中共黨史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759—760 頁。

〔2〕張民《周恩來與“首都工作組”》，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50—51 頁。

〔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周恩來年譜 1949—1976》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31 頁。

〔4〕張民《周恩來與“首都工作組”》，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51-52 頁。

〔5〕張民《周恩來與“首都工作組”》，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54—56 頁。

〔6〕吳德口述《十年風雨紀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經歷》，當代中國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4—5 頁。

〔7〕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 2010 年版。

〔8〕張民《周恩來與“首都工作組”》，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63—70 頁。

〔9〕傅崇碧《傅崇碧回憶錄》，中共黨史出版社 1999 年 12 月版，第 179—180 頁。

〔10〕邱會作《邱會作回憶錄》上，新世紀出版社 2011 年 1 月版，第 440 頁。

〔11〕張民《周恩來與“首都工作組”》，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76—77 頁。

〔12〕邱會作《邱會作回憶錄》上，新世紀出版社 2011 年 1 月版，第 442 頁。

〔1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周恩來年譜 1949—1976》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36 頁。

〔14〕程光《心靈的對話——邱會作與兒子談文化大革命》上冊，香港北星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5 頁。

〔15〕邱會作《邱會作回憶錄》上，新世紀出版社 2011 年 1 月版，第 441 頁。

- [16] 張民《周恩來與“首都工作組”》，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07—108 頁。
- [17] 張民《周恩來與“首都工作組”》，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95—98 頁。
- [18] 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 2010 年版。
- [19] 傅崇碧《傅崇碧回憶錄》，中共黨史出版社 1999 年 12 月版，第 201 頁。
- [20] 沈國凡《一九六五年後的彭德懷》，當代中國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64—269 頁。
- [21] 陳虹《總參“八二五”事件》，載《黨史博覽》1999 年第 9 期。
- [22] 範碩《葉劍英在非常時期 1966—1976》，上，北京華文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88 頁。
- [23] 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出版 2010 年版。
- [24] 陳虹《總參“八二五”事件》，載《黨史博覽》1999 年第 9 期。
- [25] 張民 《周恩來與“首都工作組”》，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11 頁。
- [26] 陳虹《總參“八二五”事件》，載《黨史博覽》1999 年第 9 期。
- [27] 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出版 2010 年版

。〔28〕張民《周恩來與“首都工作組”》，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438 頁。

〔29〕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出版，2010 年版。

——摘自《昨天》2014 第二期 作者王銳

第二章 5.16 中國共產黨委員會通知

第一節 起草“5.16”通知經過

第二次杭州會議

杭州會議後，學術批判不斷升溫。4 月 9 日—12 日中央在北京召開書記處會議，會議內容之一就是研究學術批判的問題。

會後馬上就召開了第二次杭州會議，又叫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

我於 14 日從邯鄲返京，15 日飛上海，從上海到杭州。當時來的人比較少，就安排在西泠賓館（八層樓）。

彭真來得晚，我們還換了一下房子，住在同一層。

葉帥也來得晚，來了就問我：“這個會議是幹什麼，三月不是剛開了會？”

我說：“我也不知道。”

葉帥說：“送彭真上飛機時，彭真和我講了兩句話，說現在又出事了，他出事了。”

彭真到杭州後，要求和毛主席見面談話。彭真和徐業夫講時我正在旁邊。彭說：“我要求和主席見面，只講 20 分鐘。請你轉告。”徐業夫會轉告的，可是主席沒有見彭真。這樣我們就知道事情大了。

會還沒有正式開，18 日關於彭真問題的材料就出來了。一個材料是 4 月 16 日《北京日報》以三個版的篇幅發表的批判吳晗、鄧拓、廖沫沙“三家村”的文章，並加《北京日報》、《前線》的編者按。在編者按中有所檢查，並提到《前線》發刊詞。康生講這是個假批判，真包庇，假裝自我批評。又說《前線》也發了一篇文章，他始終沒有看到。我們知道“三家村”的問題牽涉到北京市委。

4 月 18 日《解放軍報》發表社論，是按照江青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的精神寫的。社論宣佈：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已經到來。

19 日開始開會。

20 日、22 日、24 日、25 日在主席那裏開了幾次會。主席談得很活躍、和緩，但講話中插的那幾句話就重了。主席說：北京的空氣很沉悶，他不願在那裏住，願到上海來。那時柯慶施和江青已聯繫較多。1965 年初，江青就躲到上海來密謀策劃批判吳晗的《海瑞罷官》一文。

我們在西泠賓館吃過飯出去散步時，六個大區書記包括劉瀾濤在內，沒有一個敢和彭真並行，也不和他講話。我還和他講話，因為彭真 1938 年就是我的上級，關係可以。但我們也只能講些廢話，“天熱了……”。誰也不敢講正題。

4 月 21 日少奇訪問巴基斯坦、阿富汗、緬甸三國後回到杭州，主持了類似政治局的會議。因為少奇從 3 月 26 日就不在國內，對這段情況根本不瞭解，所以會議實際是總理主持。在會上少奇點了兩個人的名。

王任重說：主席講得很好，很重要，是否將毛主席的講話整理成一個檔下發全黨。陳伯達說：那你根據你的記錄寫一下。這就是《五一六通知》的由來。王任重記錄的特點是誰的話都記，但只記要點。我的記錄是記毛主席的原話，但是別人的插話就記不下來了。我一看他的記錄同我的不盡相同，就沒有往外拿我的記錄稿。王任重起草的檔，後來改動很大，康生說改了八遍。（但也有另一種說法，比如劉志堅回憶：4月14日總理把他叫到釣魚臺8號樓說，中央確定劉和陳亞丁到上海參加一份中央文件的討論和修改，這就是《五一六通知》。16日他倆飛上海，當天陳伯達、康生、江青召開會議讓大家討論，5月1日劉回到北京。這就是說，第二次杭州會議還沒有開，中央已在組織人起草《五一六通知》了。）

4月24日，會議基本通過《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即《五一六通知》）草稿。

會議結束，中央指定我和宋任窮兩個人和彭真一道乘飛機回京，明是陪送，實是押送。在26日晚杭州到上海的火車上，27日上海到北京的飛機上，都沒話講。開始三個人在一起，面對面幹坐著，後來宋任窮離開前艙，到工作人員那邊，只剩下我和彭真。大家心裏都明白，我們倆的任務是“護送”他回來。

到機場後，我們各自坐車走了。後來有人說我把彭真交給安子文了，這是不對的。

第二節 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

1966年5月4日—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北京舉行。毛澤東當時在外地，會議由劉少奇主持。康生負責向毛澤東請示彙報。參加會議的成員共

76 人，包括“文革小組”（即會後正式成立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提議增加的江青、張春橋、關鋒、戚本禹等八人。

會議主要內容：揭發批判了所謂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的“反黨錯誤”。通過中共中央通知（簡稱《五一六通知》）。

會議前，1965 年 11 月 10 日，楊尚昆以“背著中央私設竊聽器”被免去中辦主任；1965 年 12 月 8 日至 15 日，毛澤東在上海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以“反對突出政治”、“篡軍反黨”解除了羅瑞卿所有職務；1966 年 3 月 30 日，毛澤東在上海同江青、康生、張春橋等談話時說“中宣部是閻王殿，要打倒閻王，解放小鬼。”針對陸定一；1966 年 4 月 16 日，毛澤東召集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集中解決彭真問題，揭了蓋子，會議於 5 月 23 日作出了決定：一、停止彭真同志、陸定一同志、羅瑞卿同志的中央書記處書記職務，停止楊尚昆同志的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的職務，以後提請中央會議追認和決定。二、撤銷彭真同志的北京市委第一書記的職務，撤銷陸定一同志的中央宣傳部部長的職務。24 日上午政治局常委決定成立專案審查委員會，審查“彭羅陸楊”陰謀反黨集團的問題。

五月政治局會議一般說法是 3 日開始，先召開了幾次座談會，由康生、陳伯達、張春橋介紹情況。我更多的精力是放在北京市、華北局，準備開華北工作會議，工作十分緊張。

5 月 7 日中央文件正式通知，我去北京接彭真的工作任第一書記，主持北京市工作。

5 月 11 日下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由劉少奇主持。少奇、小平、總理等都坐在主席臺上。毛主席仍在外地沒有回來參加。

我坐在第一排，對著主席臺的左手。我的左邊是聶帥，右邊是彭真。我走進去，坐下看見桌子上放一張文件，字有核桃大，我拿起看是林彪的手書，未看得很清楚，大致是說他證明葉群和他結婚時的純潔的處女之類的話，說嚴慰冰的揭發信全系造謠。

彭真已經知道是我接他的工作，他交待我去後應注意的事。他站在那裏俯身對我說：“你去了之後……”剛開始講，聽見有人在後面拿著什麼材料念。彭真一聽就火了，態度激昂，回過身朝著後面大聲說：“誰是第一個喊叫萬歲的！”證明歷史上是他先喊主席萬歲的。坐主席臺上的少奇馬上制止，吵架就停了。

此時，當我拿起來看林彪的手書，還未看明白，就聽見聶帥拿著林彪的手書，生氣的沖著主席臺上的人說：“發這個做啥？收回！”這等於是給主席臺上提意見。

這事和政治局又沒關係，這種事還發檔，丟人！可笑！這個檔是針對陸定一和他夫人嚴慰冰的。這麼嚴肅的會，發這種檔，真讓人啼笑皆非！很快檔就收回了。

不久，中央派人通知彭真，停止他出席會議。

從會上看，少奇是同情彭真的，認為他有錯誤，但不同意這樣搞。看得出少奇有氣，壓力很大，表情不自然。他主持會議，等於反對他自己。總理也很慎重，不講話。康生挺得意。

5月16日上午9時，在人大會堂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第二次全體會議。會議仍是少奇主持。小平講話，介紹《五一六通知》內容。

討論通知時，大家都是贊成的，沒有提出不同意見。因為是擴大會議，少奇說所有參加會的人都有權舉手。全體舉手通過，一字未改。這個《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通知》，因為是5月16日通過的，又叫《五一六通知》。通知重點

批判《二月提綱》，說它是“反對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反對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線，打擊無產階級左派，包庇資產階級右派，為資產階級復辟作輿論準備”，是“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通知說，“撤銷原來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及其辦事機構，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隸屬於政治局常委之下。”通知中最嚴重的話是：“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雪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通知》一通過，形勢就嚴重了。

這次會議還通過了中央工作小組關於羅瑞卿錯誤問題的報告。

會議休息了兩天，到 18 日繼續開，仍是劉少奇主持。林彪在會上發表講話，即有名的“五一八講話”。

林彪在正式講話前問陸定一：“我對你怎麼樣？”

陸定一說：“很好。”

林說：“我對知識份子歷來是很尊重的（言外之意，我知道你是大學生），你怎麼那麼整我。”

因為林彪點了名，會後，政治局常委繼續開會，決定停止陸定一出席會議。當時，我們還在外面沒有走。陸定一則在旁邊的屋裏等著。

鄧小平喊我進屋，讓我和李富春去跟陸定一談話，通知他不再出席會議。

富春非叫我領頭。我讓他：“你是政治局的。”

我們倆站起來，從開會的地方到陸定一房間的門口只有幾步路，誰也不願意走在前面，一直並行，走得很慢。走到門口，他推我，我年輕，只好服從。一進門，我就靠邊坐下。坐下後，應由他先說，他又推說讓我先說。陸都看到了。我只好先講。傳達了鄧小平的一句話：“中央決定從現在起停止陸定一同志出席這個會議。”這是小平找我談的，誰找富春說的我不知道底細，只能講這一句。既不能批評，也不能同情。

陸定一說：“雪峰同志，我可是要搞共產主義的，我還希望我能看到共產主義！”他講話的聲音很大。看出他負擔很重。我們也無法回答。

我勸慰：“會議定了，休息吧。事情總會弄清楚的。”富春也說：“是啊，事情總會弄清楚的，中央決定……”。

林彪講話事先做了準備，他有個簡單的提綱，字有核桃大，他說：“這次是政治局擴大會，上次毛主席召集的常委擴大會，集中解決彭真的問題，揭了蓋子。這一次繼續解決這個問題。羅瑞卿的問題，原來已經解決了。陸定一、楊尚昆的問題，是查地下活動揭出來的，醞釀了很久，現在一起來解決。四個人的問題是有聯繫的，有共同點。主要是彭真，其次是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他殺氣騰騰，大講“政變”，從古到今包括世界各國的政變，認為我們社會主義國家也會有。他沒有點名，但大家都知道是指劉少奇。劉沒有講什麼。

5月23日，會議通過對彭、羅、陸、楊的處理決定，進行專案審查。調陶鑄擔任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兼中宣部部長，調葉帥任中央書記處書記兼軍委秘書長，我任北京市委第一書記。討論時我說：“我一個人不行，調一個人做副書記。”候選人提了兩個，吳德和華北局的什麼人。1936年我和吳德搭過班子。

他在棗園工作過，康生瞭解他。最後決定吳德任第二書記，郭影秋、高揚文、馬力為書記。

24日又發了《關於陸定一同志和楊尚昆同志錯誤問題的說明》，這兩個文件都下發到縣團級。

第三節 “5.16” 通知出籠

1966年4月9日至12日中央書記處會議決定

一、擬以中共中央名義起草一個通知，徹底批判文化革命五人小組《二月提綱》的錯誤，並撤銷這個提綱；

二、成立文化革命檔起草小組，報毛澤東和政治局常委批准。

起草小組由陳伯達（62歲）任組長，江青、劉志堅（54歲）任副組長，康生任顧問。

起草小組寫成的檔主要有兩份：

一是陳伯達、王力（時45歲）主筆的《中共中央通知》，後因於5月16日通過，故又叫《五一六通知》。

二是以康生為主編選的《通知》附件：《1965年9月到1966年5月文化戰線上兩條道路鬥爭大事記》。

《五一六通知》由陳伯達起草後，14日送給在杭州的毛澤東。毛澤東看後作了三次修改，加寫了許多重要的話，其中就有“撤銷原來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隸屬於政治局常委之下”等語。

中央和中央各機關，各省市、自治區都有這樣一批資產階級代表人物。

必須同時批判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文化領域的各界裏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清洗這些人，有些則要調動他們的職務。尤其不能信用這些人去做領導文化革命的工作，而過去和現在確有很多人是在做這種工作，這是異常危險的。

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使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雪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

1966年3月28日至30日，毛澤東在上海先後同康生、江青、張春橋等進行了多次談話，嚴厲批評《二月提綱》混淆階級界限，不分是非，是錯誤的。

毛澤東尖銳地提出：“如果包庇壞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組要解散。”

毛既然說了“如果”，下面傳達時就沒有了什麼如果不如果。

3月31日，康生奉命回北京向周恩來、彭真等中央負責人詳細傳達了毛澤東幾次談話的內容。

4月9日至12日，康生又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傳達了毛澤東的談話。

書記處只能照辦，對彭真進行了批評，彭真也作了“初步檢查”。

二、毛澤東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

1966年4月16日——24日，毛澤東在杭州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說是“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其實出席會議的人擴大到各省市自治區，中央及國務院各部門的負責人。

4月22日，毛澤東在會上作了長篇講話。

他一開始就提出吳晗的問題“朝裏有人”，修正主義不只文化界出，黨政軍也有。

毛澤東認為全國、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他要發動一場大革命，來解決這個迫在眉睫的問題。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陳伯達提的

在此前，“文化革命”的提法已經有了，發動“一場大革命”的提法也已經有了，但還沒有將兩者結合起來，更沒有冠以“無產階級”的定語。是陳伯達在起草會議檔時第一個將三者結合起來，完整地提出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從此，以這個九個字冠名的政治運動，在神州大地肆虐了十幾年。

陳伯達死活不肯當組長

毛澤東直接提議陳伯達當新成立的中央文革小組組長。

陳喜憂參半。

喜的是他能在這場即將到來的又一場政治運動繼續受到毛的重用；憂的是與有著特殊背景、性格乖張的江青難以相處。

於是他向毛提出請江青當組長。

但毛對自己老婆的使用一直有著自己的算計。

毛既要放老婆出來攪世界，幫自己，又怕世人的口舌；

既要讓老婆出來既有實權，也能撒開手幹，又要留點餘地。

所以，他必然要為老婆找一個傀儡、劉盆子，既當墊腳的，也當墊背的。眼前的這位老傻子正是他選中的最合適的人，也是唯一合適之人。

誰知道陳伯達不肯幹。

周恩來奉毛澤東的指示同他談話，再三動員他擔任中央文革小組組長的職務。

無奈陳伯達就是不鬆口，以不能勝任為由不肯接受。

談過兩三次，陳伯達仍是這個態度。

周恩來不滿地說：“難道中央不能分配你的工作？”

陳伯達這才接受。

不久，毛澤東回到北京，陳伯達又向毛澤東提出：“我是書生，擔任不了這個職務。”

毛澤東說，你可把“書生”兩個字去掉。

話說到這份兒，陳總不能敬酒不吃吃罰酒，只好坐蠟。

後來，他又找機會向毛澤東表示：“讓江青同志當組長，我當她的助手。”

毛澤東聽也不要聽。

陳伯達組閣

周恩來讓陳伯達開名單。

陳將康生列為顧問，江青列為副組長，另將王力、關鋒、戚本禹列為組員，因為他想到毛澤東要擬檔，曾指示他找關鋒、戚本禹、王力合作。既然王關戚是毛信得過的人，陳就將他們的名字列入了。

江青既當副組長，第一件事就是提議“春橋同志應該擔任副組長”。

當這些進入中央文革小組名單的成員在上海錦江飯店召開成立會議時，江青在會上提議增加姚文元為組員。

陳伯達當即反對說：“姚文元不合適，他的父親姚蓬子是叛徒，容易叫人抓住小辮子。”

江青拿出她的“王牌”：“我請示一下主席。”

第二天，江青在會上說請示過主席了，於是姚文元也進入了中央文革小組。

中央文革全家福

1966年4月24日，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初步通過了毛澤東修改審定的中共中央通知稿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名單。

5月28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名單的通知，這應該就是中央文革小組的生日。它活了13年，直至1969年4月九大召開。

組長：陳伯達；

顧問：康生；

副組長：江青、王任重、劉志堅、張春橋；

組員：謝鏜忠、尹達、王力、關鋒、戚本禹、穆欣、姚文元。

共13人。

另準備在華北、東北、西北、西南四大區再選4人，名單確定後再通知。

後來補充的4人為：華北局郭影秋，東北局鄭季翹，西北局楊植霖，西南局劉文珍。

中南局因已經有了王任重，華東局有了張春橋，不再另增人選。

8月2日，中共中央又發出通知，“決定陶鑄同志兼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組顧問”。

所以，中央文革小組的“全家福”應為上述18人。

中央文革一成立即搬進國賓館釣魚臺去辦公，並生活、住宿，佔據了釣魚臺七座樓。

中央文革又下設中央文革辦公室。毛江的親生女李納也當過辦公室主任。

李納化名肖力，是“小李”的諧音。意思是老李（江青姓李，化名李進）小李齊上陣。

花自飄零水自流

僅半年後，到1966年底，尹達、郭影秋、鄭季翹、楊植霖、劉文珍受到衝擊，不再參與。

1967年元旦剛過，1月4日，陶鑄被打倒。

隨之，王任重也被打倒。

同月4日，劉志堅也被打倒，

謝鏜忠是總政的，自然也被打倒。

到1967年8月，王力、關鋒被揪出來。

9月，穆欣成了“特務”。

1968年1月，戚本禹又被揪出。王關戚小爬蟲系列成員悉數被殲。

至此，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僅剩下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了。

陳伯達漸漸地向林彪靠近，康生因病公開露面漸漸地少了。

在 1968 年 8 月以後實際上僅江青、張春橋、姚文元三人而已。

第四節 通知附件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及原件附件之二 1966. 05. 16

中發〔66〕267 號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中央各部委，國家機關部門和各人民團體黨組、黨委，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

中央決定撤銷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批轉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彙報提綱》，撤銷原來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及其辦事機構，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隸屬於政治局常委之下。所謂“五人小組”的彙報提綱是根本錯誤的，是違反中央和毛澤東同志提出的社會主義文化革命的路線的，是違反一九六二年黨的八屆十中全會關於社會主義社會階級和階級鬥爭問題的指導方針的。這個提綱，對毛澤東同志親自領導和發動的這場文化大革命，對毛澤東同志在一九六五年九月至十月間中央工作會議上（即在一次有各中央局負責同志參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上）關於批判吳晗的指示，陽奉陰違，竭力抗拒。

所謂“五人小組”的彙報提綱，實際上只是彭真一個人的彙報提綱，是彭真背著“五人小組”成員康生同志和其他同志，按照他自己的意見製造出來的。對待這樣一個關係到社會主義革命全域的重大問題的檔，彭真根本沒有在“五人小組”內討論過、商量過，沒有向任何地方黨委徵求過意見，沒有說明要作為中央正式檔提請中央審查，更沒有得到中央主席毛澤東同志的同意，採取了極不正當的手段，武斷專橫，濫用職權，盜竊中央的名義，匆匆忙忙發到全黨。

這個提綱的主要錯誤如下：

(一) 這個提綱站在資產階級的立場上，用資產階級世界觀來看待當前學術批判的形勢和性質，根本顛倒了敵我關係。我國正面臨著一個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高潮。這個高潮有力地衝擊著資產階級和封建殘餘還保存的一切腐朽的思想陣地和文化陣地。這個提綱，不是鼓舞全黨放手發動廣大的工農兵群眾和無產階級的文化戰士繼續衝鋒前進，而是力圖把這個運動拉向右轉。這個提綱用混亂的、自相矛盾的、虛偽的詞句，模糊了當前文化思想戰線上的尖銳的階級鬥爭，特別是模糊了這場大鬥爭的目的是對吳晗及其他一大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中央和中央各機關，各省、市、自治區，都有這樣一批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的批判。這個提綱不提毛主席一再指出的吳晗《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問題，掩蓋這場鬥爭的嚴重的政治性質。

(二) 這個提綱違背了一切階級鬥爭都是政治鬥爭這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論點。當報刊上剛剛涉及吳晗《海瑞罷官》的政治問題的時候，提綱的作者們竟然提出“在報刊上的討論不要局限於政治問題，要把涉及到各種學術理論的問題，充分地展開討論”。他們又在各種場合宣稱，對吳晗的批判，不准談要害問題，不准涉及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對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罷官問題，不准談吳晗等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問題。毛澤東同志經常告訴我們，同資產階級在意識形態上的鬥爭，是長期的階級鬥爭，不是匆忙做一個政治結論就可以解決。彭真有意造謠，對許多人說，主席認為對吳晗的批判可以在兩個月後做政治結論。又說，兩個月後再談政治問題。他的目的，就是要把文化領域的政治鬥爭，納入資產階級經常宣揚的所謂“純學術”討論。很明顯，這是反對突出無產階級的政治，而要突出資產階級的政治。

(三)提綱特別強調所謂“放”，但是卻用偷天換日的手法，根本歪曲了毛澤東同志一九五七年三月在黨的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所講的放的方針，抹煞放的階級內容。毛澤東同志正是在講這個問題的時候指出，“我們同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思想還要進行長期的鬥爭。不瞭解這種情況，放棄思想鬥爭，那就是錯誤的。凡是錯誤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應該進行批判，決不能讓它們自由氾濫。”又說，“放，就是放手讓大家講意見，使人們敢於說話，敢於批評，敢於爭論”。這個提綱卻把“放”同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反動立場的揭露對立起來。它的所謂“放”，是資產階級的自由化，只許資產階級放，不許無產階級放，不許無產階級反擊資產階級，是包庇吳晗這一類的反動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這個提綱的所謂“放”，是反毛澤東思想的，是適應資產階級需要的。

(四)在我們開始反擊資產階級倡狂進攻的時候，提綱的作者們卻提出，“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這個口號是資產階級的口號。他們用這個口號保護資產階級，反對無產階級，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反對毛澤東思想，根本否認真理的階段性。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鬥爭，馬克思主義的真理同資產階級以及一切剝削階級的謬論的鬥爭，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根本談不上什麼平等。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在上層建築其中包括在各個文化領域的專政，無產階級繼續清除資產階級鑽在共產黨內打著紅旗反紅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這些基本問題上，難道能夠允許有什麼平等嗎？幾十年以來的老的社會民主黨和十幾年以來的現代修正主義，從來就不允許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有什麼平等。他們根本否認幾千年的人類歷史是階級鬥爭史，根本否認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根本否認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革命和對資產階級的專政。相反，他們是資產階級、帝國主義的忠實走狗，同資產階級、

帝國主義一道，堅持資產階級壓迫、剝削無產階級的思想體系和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體系和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他們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們同我們的鬥爭是你死我活的鬥爭，絲毫談不到什麼平等。因此，我們對他們的鬥爭也只能是一場你死我活的鬥爭，我們對我們的關係絕對不是什麼平等的關係，而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關係，即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實行獨裁或專政的關係，而不能是什麼別的關係，例如所謂平等關係、被剝削階級同剝削階級的和平共處關係、仁義道德關係等等。

(五)提綱說，“不僅要在政治上壓倒對方，而且要學在學術和業務的水準上真正大大超過和壓倒對方”。這種對學術不分階級界限的思想，也是很錯誤的。無產階級在學術上所掌握的真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真理，毛澤東思想的真理，早已大大地超過了和壓倒了資產階級。提綱的提法，表現了作者吹捧和抬高資產階級的所謂“學術權威”，仇視和壓制我們在學術界的一批代表無產階級的、戰鬥的新生力量。

(六)毛主席經常說，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講道理，講道理就是立，破字當頭，立也就在其中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就是在破資產階級思想體系的鬥爭中建立和不斷發展起來的。但這個提綱卻強調“沒有立，就不可能達到真正、徹底的破。”這實際上是對資產階級的思想不准破，對無產階級的思想不准立，是同毛主席的思想針鋒相對的，是同我們在文化戰線上進行大破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革命鬥爭背道而馳的，是不准無產階級革命。

(七)提綱提出“不要像學閥一樣武斷和以勢壓人”，又說“警惕左派學術工作者走上資產階級專家、學閥的道路”。究竟什麼是“學閥”？誰是“學閥”？

難道無產階級不要專政，不要壓倒資產階級？難道無產階級的學術不要壓倒和消滅資產階級的學術？難道無產階級學術壓倒和消滅資產階級學術，就是“學閥”？提綱反對的鋒芒是指向無產階級左派，顯然是要給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戴上“學閥”這頂帽子，倒過來支持真正的資產階級的學閥，維持他們在學術界的搖搖欲墜的壟斷地位。其實，那些支持資產階級學閥的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那些鑽進黨內保護資產階級學閥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才是不讀書、不看報、不接觸群眾、什麼學問也沒有、專靠“武斷和以勢壓人”、竊取黨的名義的大黨閥。

(八) 提綱的作者們別有用心，故意把水攪渾，混淆階級陣線，轉移鬥爭目標，提出要對“堅定的左派”進行“整風”。他們這樣急急忙忙拋出這個提綱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整無產階級左派。他們專門收集左派的材料，尋找各種藉口打擊左派，還想借“整風”的名義進一步打擊左派，妄圖瓦解左派的隊伍。他們公然抗拒毛主席明確提出要保護左派，支持左派，強調建立和擴大左派隊伍的方針。另一方面，他們卻把混進黨內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修正主義者、叛徒封成“堅定的左派”，加以包庇。他們用這種手法，企圖長資產階級右派的志氣，滅無產階級左派的威風。他們對無產階級充滿了恨，對資產階級充滿了愛。這就是提綱作者們的資產階級的博愛觀。

(九) 正當無產階級在思想戰線上對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發動一場新的激烈鬥爭剛剛開始，而且許多方面、許多地方還沒有開始參加鬥爭，或者雖然已經開始了鬥爭，但是絕大多數黨委對於這場偉大門爭的領導還很不理解，很不認真，很不得力的時候，提綱卻反復強調鬥爭中要所謂“有領導”、要“謹慎”、要“慎重”、要“經過有關領導機構批准”，這些都是要給無產階級左派劃許多框框，

提出許多清規戒律，束縛無產階級左派的手腳，要給無產階級的文化革命設置重重障礙。一句話，迫不及待地要剎車，來一個反攻倒算。提綱的作者們對於無產階級左派反擊資產階級反動“權威”的文章，已經發表的，他們極端懷恨，還沒有發表的，他們加以扣壓。他們對於一切牛鬼蛇神卻放手讓其出籠，多年來塞滿了我們的報紙、廣播、刊物、書籍、教科書、講演、文藝作品、電影、戲劇、曲藝、美術、音樂、舞蹈等等，從不提倡要受無產階級的領導，從來也不要批准。這一對比，就可以看出，提綱的作者們究竟處在一種什麼地位了。

(十)當前的鬥爭，是執行還是抗拒毛澤東同志的文化革命的路線的問題。但提綱卻說，“我們要通過這場鬥爭，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開闢解決這個問題（指‘徹底清理學術領域內的資產階級思想’）的道路”。毛澤東同志的《新民主主義論》、《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看了〈逼上梁山〉以後寫給延平劇院的信》、《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等著作，早已在文化思想戰線上給我們無產階級開闢了道路。提綱卻認為毛澤東思想還沒有給我們開闢道路，而要重新開闢道路。提綱是企圖打著“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這個旗幟作為幌子，開闢一條同毛澤東思想相反的道路，即現代修正主義的道路，也就是資產階級復辟的道路。

總之，這個提綱是反對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反對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線，打擊無產階級左派，包庇資產階級右派，為資產階級復辟作輿論準備。這個提綱是資產階級思想在黨內的反映，是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同這條修正主義路線作鬥爭，絕對不是一件小事，而是關係我們黨和國家的命運，關係我們黨和國家的前途，關係我們黨和國家將來的面貌，也是關係世界革命的一件頭等大事。

各級黨委要立即停止執行《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彙報提綱》。全黨必須遵照毛澤東同志的指示，高舉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大旗，徹底揭露那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術權威”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而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同時批判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文化領域的各界裏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清洗這些人，有些則要調動他們的職務。尤其不能信用這些人去做領導文化革命的工作，而過去和現在確有很多人是在做這種工作，這是異常危險的。

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雪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在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 這個通知，可以連同中央今年二月十二日發出的錯誤檔，發到縣委、文化機關黨委和軍隊團級黨委，請他們展開討論，究竟那一個檔是錯誤的，那一個檔是正確的，他們自己的認識如何，有那些成績，有那些錯誤。

中 央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

已發：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中央各部委，國家機關和人民團體各黨委、黨組，總政治部。共印三九，九八五份。

中共中央辦公廳機要室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九日發出

康生主編的附件

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戰線上兩條道路鬥爭大事記

中發〔66〕267號附件二

一九六五年九月至十月間

毛主席早就察覺到吳晗的問題，是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向党向社會主義倡狂進攻的問題。中央工作會議期間，毛主席在中央常委會議上（有各大區同志參加），從階級鬥爭的觀點出發，問彭真同志，吳晗是不是可以批判？彭真同志回避問題的實質，只回答說，吳晗有些問題可以批判。這件事直到一九六六年一月二日以前，彭真同志對康生等同志都沒有說過。

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三日

彭真同志在文化部召集的文化廳局長會議上講話，多次指名攻擊毛主席。他還說“在真理面前，是人人平等的，管你是黨中央的主席也好”。他還用“錯誤人人有份”的口號來打擊左派，包庇資產階級右派。兩天後，陸定一同志也在文化廳局長會議上講話，大反史達林。

十一月十日

上海市委根據毛主席在這次中央工作會議上的指示，加緊準備了批判吳晗的文章。《文匯報》於十一月十日發表姚文元同志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這篇文章指出，《海瑞罷官》鼓吹“單幹風”、“翻案風”，是毒草。

十一月十二日至二十六日

上海《解放日報》、浙江《浙江日報》、山東《大眾日報》、江蘇《新華日報》、福建《福建日報》、安徽《安徽日報》、江西《江西日報》先後都轉載了姚文。

十一月十一日至二十八日

北京各報刊，在十八天內，都未轉載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各報刊多次請示是否可以轉載，彭真同志和中宣部都不讓轉載。彭真同志還在許多場合，責備上海市委發表姚文元同志文章不打招呼，“黨性到那裏去了”。

姚文發表後，《北京日報》社長范瑾同志曾兩次詢問《文匯報》負責同志，摸姚文元文章的“背景”。

十一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九日

上海市委因北京各報都不轉載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即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將姚文印成單行本。二十四日上海新華書店急電全國新華書店徵求訂購數字，大多數地方都有複電。北京新華書店奉命不復，電話詢問也不表示意見，直到二十九日，才複電同意。

十一月二十八日

在周恩來同志的督促下，彭真同志被迫在人大會堂西大廳開會，討論北京報紙轉載姚文元同志文章的問題，有北京市委的同志和中宣部副部長周揚、許立群、姚溱等同志參加。彭真同志一到，就問“吳晗現在怎樣？”北京市委書記鄧拓說，“吳晗很緊張，因為他知道這次批判有來頭。”彭真同志大聲說：“什麼來頭不來頭，不用管，只問真理如何，真理面前人人平等。”這是狂妄地露骨地反對毛主席。

十一月二十九日

《文匯報》發表一個版的讀者來信，要求開展《海瑞罷官》問題的討論。

《解放軍報》轉載姚文，編者按語指出，《海瑞罷官》是一株大毒草。

《北京日報》轉載姚文。但該報編者按語不表示支持姚文，反而強調對《海瑞罷官》這出戲有不同意見，應該展開討論。

十一月三十日

《人民日報》在《學術研究》欄轉載姚文。編者按語按照彭真同志的意見，只把這個問題作為學術問題來討論，並且強調“既容許批評的自由，也容許反批評的自由”，沒有表示支援姚文元同志文章。按語的最後一段，引用毛主席的話，指出對那些有毒素的反馬克思主義的東西，要進行鬥爭。這是周恩來同志加的。

十二月二日

《光明日報》轉載姚文，比《北京日報》遲了三天。這是根據姚溱同志轉達的彭真同志的意見，說不能同時轉載，以免震動太大。

十二月六日

《文匯報》、《解放日報》同時報導全國各報轉載姚文元文章的情況，登載了《解放軍報》、《北京日報》、《人民日報》和《光明日報》的編者按語，按發表先後把《解放軍報》的編者按語登在前面。彭真同志對此極為不滿。

十二月八日

《紅旗》發表戚本禹同志題為《為革命而研究歷史》的文章，批評了以翦伯贊、吳晗為代表的反動的歷史觀，但沒有指名。

十二月十二日

《北京日報》、《前線》發表鄧拓的文章，署名向陽生，題為《從〈海瑞罷官〉談到“道德繼承論”》，企圖把對吳晗的批判，從政治問題拉到所謂道德繼承的“學術”問題上去。這篇文章是在彭真同志親自指導下寫的，最後由彭真同志親自修改，經過北京市委書記處傳閱定稿。

十二月十四日

彭真同志在國際飯店開北京市委工作會議時，把吳晗找去，對他說，“你錯的就檢討，對的就堅持，堅持真理，修正錯誤”。這是直接向吳晗示意，給他撐腰，要他堅持他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

十二月二十一日

毛主席同陳伯達、艾思奇、關鋒等同志談話中指出：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點是沒有點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點了名，對戲劇界、史學界、哲學界震動很大，但是沒有打中要害。要害問題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廬山會議是討論工作的，原來打算開半個月，會議快結束了，彭德懷跳了出來。他說：你們在延安罵了我四十天的娘，我罵你們二十天的娘還不行！他就是要罵娘的。

十二月二十二日

毛主席同彭真、康生、楊成武等同志談話，又講了前一天同陳伯達等同志談的那些意見。毛主席說，要害是“罷官”，我們廬山會議罷了彭德懷的官。彭真同志立刻辯解說，我們經過調查，沒有發現吳晗同彭德懷有什麼組織聯繫，掩蓋吳晗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政治問題。

十二月二十三日

彭真同志要求單獨同毛主席談話。談話後，彭真同志故意造謠，說毛主席贊成他的所謂“放”的方針，還造謠說，吳晗問題要兩個月以後做政治結論。又說，兩個月以後再談政治問題。彭真同志造的這個謠，在許多場合散佈過。

十二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

上海市委同志向彭真同志彙報情況，談到姚文元的文章是根據九月中央工作會議時毛主席指示發表的，彭真同志未置可否。他說對姚文元的文章也要“一分为二”。彭真同志講了他的所謂“放”的方針，還說吳晗問題要作為學術問題討論。彭真同志批評上海轉載北京各報按語不該把《解放軍報》按語放在第一篇，應當把《北京日報》的按語放頭一篇。彭真同志還說：吳晗在民主革命時期和反右派鬥爭時都是左派，鄧拓是左派，他署名向陽生的文章是我叫他那樣寫的。

十二月二十七日

《北京日報》發表吳晗《關於〈海瑞罷官〉的自我批評》。這篇文章是假檢討，真反攻。他為了辯解同“單幹風”“翻案風”無關，提出了《海瑞罷官》是在《論海瑞》一文的基礎上寫的，而《論海瑞》是根據廬山會議精神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吳晗的《海瑞罷官》同廬山會議聯繫起來，這就自己暴露了自己的要害。《北京日報》急忙發表，卻不加按語，實際上是對吳晗的支持。這是彭真同志從上海打電話催著要這樣發的，還要《人民日報》轉載。

十二月二十九日

《人民日報》發表中宣部主持寫的署名方求的文章，題為《〈海瑞罷官〉代表一種什麼社會思潮？》。這篇文章關於“清官”問題的觀點是很錯誤的。

十二月三十日

《人民日報》轉載了吳晗的所謂《自我批評》，加了一個編者按語。這個按語沒有一句話揭露吳晗的所謂“自我批評”的實質。這是彭真同志決定的。

一九六六年一月二日

彭真同志召集了文教、報刊、北京市和部隊的有關負責同志三十多人參加的會議。首先由胡繩同志傳達毛主席同陳伯達等同志的談話，他在傳達時，有意隱

瞞了毛主席指出的《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康生同志說，毛主席講了要害問題是罷官，廬山會議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吳晗六月寫了《海瑞罵皇帝》，九月寫了《論海瑞》，年底，也就是彭德懷罷官以後，開始著手寫《海瑞罷官》。彭真同志講話強調要所謂“放”，說扯得越寬越好。他批評《解放軍報》的按語中指出吳晗《海瑞罷官》是一株大毒草“妨礙了放”。他說政治問題兩個月以後再說，先搞學術。他還攻擊上海，說他們只批評《海瑞罷官》，而對《海瑞上疏》不作檢討。實際上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已經批評到了《海瑞上疏》。《海瑞上疏》的創作，是周揚同志親自向上海京劇院佈置的。

陸定一同志在會上攻擊上海發表姚文元同志文章沒有同他打招呼。他還說，要先搞學術問題，政治問題以後搞。他還在其他場合說，姚文元的文章，要是沒有最後一部分（指揭露《海瑞罷官》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政治問題）就好了。陸定一同志的基本觀點，同彭真同志是一致的。

一月六日

上海市委發出《關於討論（海瑞罷官）問題的通知》。要求全市各級黨組織重視這場大辯論，加強領導。八日，召集全市黨員幹部會議，講了要害問題是罷官，要求發動全黨、工農兵群眾參加討論，從大辯論中提高認識，培養隊伍。

一月八日

姚溱同志把一九六二年《宣教動態》八十八期刊登的慶雲（即關鋒）的一篇雜文《從陳賈說起》，送給彭真同志，為彭真同志整關鋒同志提供材料。

一月九日

彭真同志批發《毛主席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同陳伯達等同志的談話紀要》，故意隱瞞了關於《海瑞罷官》的要害問題部分。

一月十三日

《人民日報》刊登思彤（即王若水）的文章，題為《接受吳晗同志的挑戰》。這篇文章提到要害是罷官，提到廬山會議。這篇文章發表幾天以後，許立群同志責問，為什麼要講廬山會議和要害問題？

一月十三日至十七日

關鋒同志和戚本禹同志的兩篇批判吳晗《海瑞罷官》要害問題的文章寫成。這兩篇文章都送給了中宣部，一直被他們壓著。

一月十七日

許立群同志召集《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北京日報》、《紅旗》、《前線》、《新建設》六個編輯部的同志開會。他在會上說，根據彭真同志的指示，要把三報三刊的學術批判管起來，稿件和版面要審查，《紅旗》先不要搞。他強調要“放”，把“放”同講要害問題對立起來。不同意先集中搞《海瑞罷官》問題，要同時討論歷史人物評價，歷史劇，道德繼承等問題，說要“有領導地造成一場混戰”。

在這個會上，北京市委《前線》雜誌的同志說，根據市委的意見，他們不打算再發表批評吳晗的文章，只準備將來轉載帶結論性的文章。

一月十八日至二十七日

戚本禹同志打電話問許立群同志，批判吳晗政治要害問題的文章可否發表？許立群同志答復：攻要害的文章不止你一篇，別人還有，現在都不能發表。

關鋒、戚本禹同志又把他們攻要害的文章送給彭真同志審查，彭真同志叫他的秘書打電話說，彭真同志工作很忙，最近要下鄉，沒有時間看文章。

一月三十一日

彭真同志要許立群同志馬上把攻擊左派、包庇右派的材料送給他。許立群同志立即送去了。

二月二日

江青同志根據林彪同志的委託，邀請劉志堅、謝鏜忠、李曼村、陳亞丁四位同志，就部隊文藝工作的若干問題，開始進行座談。

二月三日

彭真同志召集五人小組擴大會。會上發了七個攻擊左派、包庇右派的材料。

會上有兩種根本不同的意見。

一種以彭真同志為代表，他們大肆攻擊關鋒等左派同志。彭真同志說，左派也要整風，不要當“學閥”。他還說，已經查明吳晗同彭德懷沒有關係，因此不要提廬山會議。彭真同志還要北京市委第二書記劉仁同志和北京市委書記鄭天翔同志證明，鄧拓是擁護三面紅旗的，長期以來是堅定的。彭真同志說，為了“放”，不要談《海瑞罷官》的政治問題。象郭沫若這樣的人都很緊張了，學術批判不要過頭，要慎重。陸定一同志在會上又大反史達林一通。

另一種意見以康生同志為代表，指出根據毛主席的指示，同吳晗的鬥爭，是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鬥爭，要分清階級界限，要保護關鋒等左派同志，依靠他們組織我們的學術批判隊伍，要把鬥爭的鋒芒針對吳晗，要揭露吳晗的政治問題、要害問題，要聯繫廬山會議的階級鬥爭背景來談。康生同志批評許立群同志不收集吳晗的材料，專門收集左派的材料。

會後，彭真同志要許立群同志和姚溱同志起草“彙報提綱”。

二月四日

許立群同志和姚溱同志，根據彭真同志自己的意見，在釣魚臺關起門來製造所謂“五人小組彙報提綱”，誰也不許進去，誰也不讓知道，連對同住了一個樓裏的所謂五人小組成員康生、吳冷西兩位同志也嚴密封鎖，不透露一點消息。

二月五日

政治局常委開會。臨開會前，彭真同志把所謂“五人小組彙報提綱”送給常委。上面寫著：“此件因時間匆促，來不及在五人小組傳閱和商酌。”在會上，叫不是“五人小組”成員的許立群同志口頭彙報情況，彭真同志插了一些話，沒有讀“提綱”，沒有提出“提綱”中的關鍵問題請常委討論，也沒有說要作為中央正式檔發給全黨。

二月八日

彭真等同志向毛主席彙報。彭真同志採取了欺騙常委的同樣手法，叫許立群同志向毛主席彙報，然後彭真同志說了一些話。在彙報過程中，毛主席的意見同彭真同志的意見是完全對立的。毛主席一向認為，吳晗的《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是同廬山會議，同彭德懷的右傾機會主義有關的。這次，毛主席又當面問了彭真同志兩次，吳晗是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而彭真同志事後卻故意歪曲，說毛主席認為吳晗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彭真同志否定解放以後毛主席親自領導的各次對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批判，他認為這些批判都是虎頭蛇尾，沒有結論，他說這次要做政治結論。毛主席明確地反對和批駁了這種意見，指出對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鬥爭，是長期的階級鬥爭，決不是匆促做一個政治結論就可以解決的。這裏也就戳穿了彭真同志假造說毛主席主張兩個月以後做政治結論的話，是徹頭徹尾的謊言。當彭真同志說到，要用“整風”的方法整左派的時候，毛主席立刻反駁，說“這樣的問題，三年以後再說”。當許立群同志攻擊關鋒同志的雜文時，毛

主席明確地頂了回去，說：“寫點雜文有什麼關係。”“何明（即關鋒）的文章我早就看過，還不錯。”

這一系列的問題，都說明毛主席是不贊成這個所謂“五人小組彙報提綱”的。但是，彭真同志根本不理睬毛主席的指示，濫用職權，搞了一個中央的批語，把這個“提綱”變成了中央的正式檔。這個批語沒有送給毛主席審閱，而彭真同志竟然用欺騙手法，打電話告訴常委同志，說檔已經毛主席同意，火速發給全黨。

二月十二日至十四日

彭真同志對上海市委的同志說，“彙報提綱”是常委討論過，毛主席同意了，問題都解決了，也不需要跟你們談了。上海市委的同志提出：“提綱”中“不要局限於政治問題”等還需要研究。十三日，彭真同志指定胡繩同志同張春橋同志談話。胡繩同志說，不能講吳晗反黨反社會主義，不能聯繫廬山會議，並且硬說是毛主席的意見。胡繩同志說，這是彭真同志要他這樣講的。

二月十八日

許立群和胡繩同志在北京召集學術界和各報刊負責同志傳達“彙報提綱”。他們根本不傳達毛主席反對他們收集左派材料、反對對左派進行“整風”、反對他們要倉促做政治結論的指示，講了一套同毛主席指示完全對立的錯誤意見。他們繼續包庇吳晗，不准講吳晗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問題，不准把《海瑞罷官》同廬山會議聯繫起來。他們對抗毛主席的保護左派、建立和擴大左派隊伍的方針，繼續打擊左派，把鋒芒針對著左派。

傳達後分組討論，鄧拓被指定為第一小組的召集人。

二月二十日至二十八日

北京聽傳達的同志正在討論的時候，彭真同志帶著許立群和胡繩同志到三線參觀去了。許立群同志在臨走前說，問題已經解決了，讓他們討論討論就行了。

三月一日

在許立群同志指定專人整理並以他自己的名義發出的《學術批判問題座談會討論簡況》中，吹噓所謂“五人小組彙報提綱”是“學術界興無滅資的綱領性檔”，是“思想鬥爭的二十三條”，“總結了過去學術批判和討論的經驗”，“中央這樣直接地抓學術問題，過去還不多，說明中央很關懷，並且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三月二日

《紅旗》發表尹達同志的文章，題為《必須把史學革命進行到底》。這篇文章被中宣部壓了一年半。

北京市委叫吳晗當了四清工作隊員，下鄉參加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為了怕暴露是吳晗，化名為“老李”。

三月十一日

許立群同志向彭真同志彙報上海市委宣傳部長楊永直同志請示“學閥”是否有所指，彭真同志叫許立群同志給楊永直同志打電話，就說我彭真說的：第一，學閥沒有具體指是什麼人，是阿 Q，誰頭上有瘡疤就是誰。第二，問上海發姚文元文章為什麼不跟中宣部打個招呼。在講這兩點的時候，彭真同志又怒氣衝衝地說，上海市委的黨性那裏去了！

三月十二日

《光明日報》發表穆欣同志的文章，題目是《評（賽金花）劇本的反動傾向》。這篇文章，被中宣部壓了一年又四個月。

三月十七日至二十日

毛主席在政治局常委擴大會上，專門就學術批判問題講了話。講話中指出，我們在解放以後，對知識份子實行包下來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現在學術界和教育界是資產階級知識份子掌握實權。社會主義革命越深入，他們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們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面目。吳晗和翦伯贊等人是共產黨員，也反共，實際上是國民黨。現在許多地方對於這個問題認識還很差，學術批判還沒有開展起來。各地都要注意學校、報紙、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麼人手裏，要對資產階級的學術權威進行切實的批判。我們要培養自己的年青的學術權威。不要怕年青人犯“王法”，不要扣壓他們的稿件。中宣部不要成為農村工作部（注：中央農村工作部一九六二年被解散）。

三月二十五日

《紅旗》發表戚本禹、林傑、閻長貴的文章，題目是《翦伯贊同志的歷史觀點應當批判》。

三月二十八日至三月三十日

毛主席同康生同志談了兩次話，然後又同康生、趙毅敏、魏文伯、江青、張春橋等同志談了一次話，批評所謂五人小組彙報提綱“混淆階級界限，不分是非。指出這個提綱是錯誤的。毛主席說，一九六二年十中全會作出了進行階級鬥爭的決議，為什麼吳晗寫了那麼多反動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而發表姚文元的文章卻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呢？難道中央的決議不算數嗎？毛主席指出，扣壓左派稿件、包庇反共知識份子的人是“大學閥”。中宣部是閻王殿。要“打倒閻王，解放小鬼！”毛主席說，我歷來主張，凡中央機關作壞事，我就號召地方造反，向中央進攻。各地要多出些孫悟空，大鬧天宮。去年九月會議，我問各地同志，中央出了修正義，你們怎麼辦？很可能出，這是最危險的。毛主席要求支持左派，

建立隊伍，進行文化大革命；批評彭真同志、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壞人，壓制左派，不准革命；如果再包庇壞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組”要解散。對於三月十一日彭真同志叫許立群同志給楊永直同志打電話的問題，毛主席要彭真同志向上海市委道歉。

三月三十日

中央軍委批准《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並報中央和毛主席審批。

三月三十一日

康生同志向周恩來同志和彭真同志詳細地傳達了毛主席的指示。彭真同志說，他沒有包庇吳晗，只是主張“放”，“五人小組彙報提綱”可以修改一下。他頑固地抗拒毛主席的批評。

四月一日

彭真同志在深夜向上海市委書記曹荻秋同志打了兩次電話，不是根據毛主席的指示向上海市委道歉，而是編造一套謊言，抵賴和掩飾自己的錯誤，推卸責任。

四月二日

周恩來同志報告毛主席，完全同意毛主席的指示，指出“五人小組彙報提綱”是錯誤的，準備召開書記處會議討論毛主席的指示。

彭真同志向毛主席作了簡單空洞的表示，沒有任何具體內容，只說“在這一方面確有嚴重錯誤和缺點”。他強調所謂“這一方面”，就是說，他在“這一方面”以外的各方面都是正確的。

《光明日報》和《人民日報》同時發表了戚本禹同志的文章，題目是《（海瑞罵皇帝）和（海瑞罷官）的反動實質》。這篇文章被彭真、許立群同志壓了兩個半月。

四月三日

總政治部劉志堅同志根據彭真同志的意見，於三月三十一日，代中央為《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起草了一個批語。這個批語送給彭真同志後，劉志堅同志感到太一般化，於四月三日又代中央起草了第二個批語，增加了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的意義和重要性，毛主席一向十分重視文化戰線上的階級鬥爭，毛澤東文藝思想是社會主義文化革命的方向等重要內容。新的批語於四月四日送給彭真同志，被他壓下了，沒有採用。

四月三日

彭真同志召開北京市委常委會，掩飾自己的錯誤，繼續包庇鄧拓，佈置對抗中央。

四月五日

彭真同志召集十幾個人開會，他在會上說：他在合作化、工商業改造、農村工廠四清、國際反修等方面，都不是落後分子，唯獨在學術方面是落後分子。他說，這是因為上學遲，知道的情況少。他還說，他的嚴重錯誤在於“放”，想再放出幾個吳晗來，結果是幻想。他還提出要取消清規戒律，不要受任何束縛，燒著誰就是誰。又說，吳晗問題已經差不多了，到定案的時候了。

《紅旗》雜誌發表關鋒、林傑同志的文章，題為《（海瑞罵皇帝）和（海瑞罷官）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兩株大毒草》。這篇文章也被彭真、許立群同志壓了兩個半月。

四月七日

中宣部副部長林默涵同志在全國創作會議上作報告，在中央尚未正式批准《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之前，全面地剽竊了《紀要》的內容，並且作了嚴重的歪曲，為所謂三十年代的錯誤的文藝路線辯護。

四月九日至十二日

鄧小平同志主持書記處會議，周恩來同志參加。先由康生同志傳達了毛主席的指示。然後，彭真同志作了幾句形式主義的表態，誇耀他過去、現在和將來都不會反對毛主席，實際上卻繼續頑固地抗拒毛主席的批評。康生同志系統地批評了彭真同志在這次學術批判中所犯的一系列嚴重錯誤。陳伯達同志從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問題上、從政治路線方面批評了彭真同志的一系列嚴重錯誤。最後，周恩來同志和鄧小平同志指出，彭真同志的錯誤路線，是同毛主席的思想對立的，是反對毛主席的。

這個會議決定：（一）起草一個通知，徹底批判“五人小組彙報提綱”的錯誤，並撤銷這個提綱。（二）成立文化革命檔起草小組，報毛主席和政治局常委批准。

四月十日

中央批發了《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注：中央的第一次批語已經撤銷，另換了一個新的批語）。

四月十日到十五日

彭真同志連續召集北京市委常委開會，匆匆忙忙地要所屬各級黨組織進行所謂對吳晗、鄧拓、廖沫沙的批判，用假積極來掩護他們包庇壞人的錯誤。

彭真同志背著中央，把中央的《通知》草稿交給北京市委的同志傳閱，這是違背黨的紀律的。

四月十六日

毛主席召集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彭真同志的錯誤，撤銷所謂《文化革命五人小組的彙報提綱》，撤銷原來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等問題。

四月十六日

在彭真同志直接指揮下，北京市委在《北京日報》上，以三個版的篇幅，發表了吳晗、鄧拓、廖沫沙三個人的材料，並且加了一個《北京日報》和《前線》的編者按語。這個毫無自我批評、別有用心的按語，內容和分寸，都是彭真同志具體規定，並且由他最後定稿，下令在十六日見報的。

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和新華總社當天廣播了這個按語。當晚新華總社通知撤銷。

四月十八日

《解放軍報》發表社論，題為《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積極參加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第二天，全國各報轉載了這篇社論。

四月十九日

中央書記處通知首都各單位：

（一）《北京日報》十六日的編者按語和材料，因為北京市委毫無自我批評，首都各報都不要轉載。各報按原訂計畫發表學術批判文章。

（二）各高等院校、各機關、各基層單位，停止執行北京市委佈置的那種製造混亂的措施。

四月二十四日

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基本上通過了中央的《通知》草稿，提交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

五月四日

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彭真、陸定一、羅瑞卿、楊尚昆四同志的錯誤問題。

五月四日

《解放軍報》發表題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社論。

五月九日

《解放軍報》發表高炬同志的文章：《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開火》。

《光明日報》發表何明同志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別真偽》。

《解放軍報》和《光明日報》同時發表一批材料：《鄧拓的（燕山夜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話》

五月十日

上海《解放日報》和《文匯報》同時發表姚文元同志的文章：《評“三家村”》。

第二天，全國各報刊轉載了這篇文章。

五月十一日

《紅旗》發表戚本禹同志的文章：《評（前線）（北京日報）的資產階級立場》。

五月十四日

《人民日報》發表林傑同志的文章：《揭破鄧拓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面目》。

五月十六日

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中共中央《通知》

中共中央關於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名單的通知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八日)

中央決定設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組，隸屬於政治局常委領導下。現將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名單通知你們。

組 長：陳伯達

顧 問：康 生

副組長：江 青、王任重、劉志堅、張春橋

組 員：謝鏜忠、尹 達、王 力、關 鋒、戚本禹、穆 欣、
姚文元

華北、東北、西北、西南四大區參加的成員（四人）確定後，另行通知。

第五節 關於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批示

中共中央關於《林彪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的批示

一、中央批示

林彪同志 1966 年 5 月 18 日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是一個極為重要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檔。林彪同志根據毛澤東同志關於社會主義時期階級和階級鬥爭的理論，根據黨內兩條路線鬥爭的嚴重現實，根據國際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教訓，特別是蘇聯赫魯雪夫修正主義集團篡黨、篡政、篡軍的教訓，對如何鞏固無產階級專制、防止反革命政變、反革命顛覆的問題，做了系統的、精確的闡述。

林彪同志尖銳地指出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以後，還可能喪失政權的問題。他指

出，無論怎樣千頭萬緒的事，永遠不要忘記政權。忘記了政權，就是忘記了馬克思主義的根本觀點。那就是糊塗人，腦袋掉了，還不知怎麼掉的。

林彪同志把毛澤東思想紅旗舉得最高。在這篇講話中，他對毛澤東思想作了全面的、正確的、科學的評價。他指出，全黨和全國人民，都要以毛主席為中心來團結，以毛澤東思想為中心團結。他號召在全國開展活學活用毛澤東同志著作的群眾運動。他指出，這是保證我國防止修正主義，避免資本主義復辟，加強和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最根本的關鍵問題。

林彪同志說，毛主席是我們黨的最高領袖，毛澤東思想是永遠的普遍真理。誰反對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

林彪同志這個講話，是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的典範，是指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一個重要檔。全黨全軍都應當認真學習，認真討論，認真領會，把它運用到文化大革命和一切行動中去。

這個檔發到縣、團。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二日。

二、林彪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

本來是常委其他同志先講好。常委同志們讓我先講，現在我先講一點。我沒有寫出稿子來，憑口來講，有些材料念一念。

這次是政治局擴大會。上次毛主席召集的常委擴大會，集中解決彭真的問題，揭了蓋子。這一次繼續解決這個問題。羅瑞卿的問題原來已經解決了。陸定一、楊尚昆的問題，是查地下活動揭出來的，醞釀了很久，現在一起來解決。四個人的問題，是有聯繫的，有共同點。主要是彭真，其次是羅瑞卿、陸定一、楊

尚昆。他們幾個人問題的揭發、解決，是全黨的大事，是保證革命繼續發展的大事，是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大事，是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大事，是防止修正主義篡奪領導的大事，是防止反革命政變、防止顛覆的大事。這是使中國前進的重大措施，是毛主席英明果斷的決策。

這裏最大的問題，是防止反革命政變，防止顛覆，防止“苦迭打”。

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政權問題，有了政權，無產階級，勞動人民，就有了一切。沒有政權，就損失一切。生產關係固然是基礎，但是靠奪取政權來改變，靠奪取政權來鞏固，靠奪取政權來發展。否則，是經濟主義，是叫化子主義，是乞求恩賜。無產階級拿到了政權，百萬富翁，千萬富翁，億萬富翁，一下子就可以打倒。無產階級就有了一切。所以，無論怎樣千頭萬續的事，不要忘記方向，失掉中心，永遠不要忘記了政權。要念念不忘政權，忘記了政權，就是忘記了政治，忘記了馬克思主義的根本觀點，變成了經濟主義、無政府主義、空想主義。那就是糊塗人，腦袋掉了，還不知怎麼掉的。

上層建築的各個領域，意識形態、宗教、藝術、法律、政權，最中心的是政權。政權是什麼？孫中山說是管理“眾人之事”。但他不理解，政權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工具。反革命是這樣，革命也是這樣。我想用自己的習慣語言，政權就是鎮壓之權。當然，政權的職能不僅是鎮壓。社會上的反動派，混進黨內的剝削階級的代表人物，都要鎮壓。有的殺頭，有的關起來，有的管制勞動，有的開除黨籍，有的撤職。不然，我們就要喪失政權，就是糊塗人。

毛主席近幾年來，特別是去年，提出防止出修正主義的問題，黨內黨外、各個戰線、各個地區、上層下層都可能出。我瞭解，只要是指領導機關。毛主席最近幾個月，特別注意防止反革命政變，採取了很多措施。羅瑞卿問題發生後，談

過這個問題。這次彭真問題發生後，毛主席又找人談這個問題。調兵遣將，防止反革命政變，防止他們佔領我們的要害部門、電臺、廣播電臺。軍隊和公安部門都做了部署。毛主席這幾個月就是做這個文章。這是沒有完全寫出來的文章，沒有印成文章的毛主席著作。毛主席為了這件事，多少天沒有睡好覺。這是很深刻很嚴重的問題。

政變，現在成為一種風氣。世界政變成風。改變政變。大概是這樣，一種是人民革命，從底下鬧起來，造反，如陳勝吳廣、太平天國、我們共產黨，都是這樣。一種是反革命政變。反革命政變，大多數是宮廷政變，內部搞起來的，有的是上下結合，有的和外國敵人顛覆活動或者武裝進犯相結合，有的和天災相結合，大轟天下大亂。歷史上是這樣，現在也是這樣。

歷史上政變的事，遠的不說，一九六〇年以來，據不完全的統計，僅在亞非拉地區的一些資本主義國家中，先後發生六十一次政變，搞成了的五十六次。把首腦人物殺掉的八次，留當傀儡的七次，廢黜的十一次。這個統計是在加納、印尼、敘利亞政變之前。六年中間，每年平均十一次。

馬克思主義者是唯物主義者，在任何時候都是重視現實的。我們不能聽而不聞，視而不見，無動於衷。別的事情搞的熱熱鬧鬧，忘了這件事。看不見本質問題，就是糊塗蟲。不警惕，要出大亂子。

我們過去幾十年來，解放以前，想做的就是奪取政權，許多同志就不大注意政權本身的問題，只是搞建設，對付蔣介石，對付美國，沒有想到奪取了政權還能喪失政權，無產階級專政還可以變成資產階級專政。在這個消極方面，我們，至少是我，沒有去多想這個問題，更多想到的是打仗、發生戰爭的問題。從大量的事實看，是要防止內部顛覆，防止發生反革命政變。道理很簡單，很多事情要

靠大量事實才能加深印象，才能認識。人的認識規律就是從感性到理性。

從我國歷史上來看，歷代開國後，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很短時間就發生政變，丟掉政權的例子很多。

周朝建立以後，不久就發生了叛亂，到春秋戰國就大亂了。“春秋無義戰”，各國互相顛覆，內部相互殘殺。楚成王的兒子商臣，以衛兵包圍王宮，逼成王自殺。成王好吃熊掌，要求讓他吃了熊掌再死，企圖拖延時間，以待外援。商臣不許，說“熊掌難熟”，成王被迫自殺。吳國公子光派專諸殺了王僚，奪取了政權。晉獻公、齊桓公、齊懿公當政前後，多次發生政變殺人。春秋戰國這類事太多了，我就不說了。除了相砍相殺奪取政權外，還有用其他陰謀詭計掌握實權的。例如，呂不韋送懷孕的趙姬給秦莊襄王，生了秦始皇，是呂不韋的兒子，秦始皇統治的初期，實際上政權落到了呂不韋的手裏。秦朝三代共統治了十五年。秦始皇只有十二年就死了，以後趙高捧出秦二世當皇帝，秦二世把他的兄弟姐妹殺了二十六人。

漢高祖在位十二年，後來呂後專權，奪取了劉家的政權。周勃、陳平勾結起來，又把呂家搞掉了。

晉朝司馬炎統治了二十五年，以後爆發了八王之亂，出現了互相殘殺的局面。

南北朝的時候，為奪取政權，互相殘殺的事就更多了。

隋文帝在位二十四年，就被隋煬帝殺了，兒子殺老子。有一出戲叫《禦河橋》，就是楊廣殺父，還殺了他的哥哥楊勇。

唐朝李世民兄弟相殺，奪取皇位。李世民殺了他的哥哥建成、弟弟元吉，即玄武門之變。

宋朝趙匡胤，在位十七年，被他的弟弟趙光義殺了。“燭影斧聲，千古之

謎”。有一出京戲叫《賀後罵殿》，講了這件事。

元朝忽必烈，統治中國十六年，他的兒子鐵木耳在位十三年，皇族爭位。大亂，兩宮相爭，一個是皇孫，一個是皇后，也是奪權殺人。

明朝朱元璋在位三十一年，他的四子燕王朱棣，帶兵打朱元璋的孫子建文帝，相殺十三年，南京的王宮被燒，建文帝是燒死了還是跑了，弄不清楚，後來還派人到外國去找。

清朝統治中國不久，到康熙晚年，他的兒子們為了爭奪權利，互相殘殺。傳說康熙病時遺詔“傳位十四子”，雍正改為“傳位於四子”。據說康熙是喝了雍正送去的“人參湯”死掉的。雍正爭奪了政權後，還把他的好多兄弟都殺死了。

辛亥革命孫中山當了大總統，三個月就被袁世凱奪去了政權。四年後，袁世凱做了皇帝，又被人推翻。此後，軍閥混戰十幾年，兩次直奉戰爭，一次直皖戰爭。蔣介石，正是靠奪取軍權、黨權、政權，發動反革命政變上臺的，對革命人民進行了大屠殺。

這些歷史上的反動政變，應該引起我們驚心動魄，高度警惕。

我們取得政權已經十六年了，我們無產階級的政權會不會被顛覆，被篡奪？不注意，就會喪失。蘇聯被赫魯雪夫顛覆了。南斯拉夫早就變了。匈牙利出了個納吉，搞了十多天大災難，也是顛覆。這樣的事情多得很。現在毛主席注意這個問題，把我們一向不注意的問題提出來了，多次找負責同志談防止反革命政變問題。難道沒有事情，無緣無故這樣搞？不是，有很多跡象，“山雨欲來風滿樓”。

《古文觀止》裏的《辨奸論》有這樣的話：“見微而知著”。“月暈而風，礎潤而雨”。壞事事先是有徵兆的。任何本質的東西，都由現象表現出來。最近有許多鬼事，鬼現象，要引起注意。可能發生反革命政變，要殺人，要篡奪政權，要

搞資本主義復辟，要把社會主義這一套搞掉。有很多現象，很多材料，我在這裏不再詳細去說了。你們經過反羅瑞卿，反彭真，反陸定一和他老婆，反楊尚昆，可以嗅到一些味道，火藥的味道。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混到我們黨內，混到黨的領導機關，成為當權派，掌握了國家機器，掌握了政權，掌握了軍權，掌握了思想戰線的司令部。他們聯合起來搞顛覆，鬧大亂子。

羅瑞卿是掌軍權的，彭真在書記處抓去了很多權。羅子長的手長，彭真的手更長。文化戰線、思想戰線的一個指揮官是陸定一。搞機要、情報、聯絡的是楊尚昆。搞政變，有兩個東西必須搞。一個是宣傳機關，報紙、廣播電臺、文學、電影、出版，這些是做思想工作的。資產階級搞顛覆活動，也是思想領先，先把人們的思想搞亂。另一個是搞軍隊，抓槍桿子。文武相結合，抓輿論，由抓槍桿子，他們就能搞反革命政變。要投票有人，要打仗有軍隊，不論是會場上的政變，還是戰場上的政變，他們都有可能搞起來，大大小小的吳晗、鄧拓、廖沫沙，大大小小的“三家村”不少哩！毛主席說，十六年來，思想戰線我們沒有去佔領。這樣下去，人家就不會投我們的票，不投毛主席的票，而投他們的票。打起仗來，人家就會跟他們走，拿起槍來打我們。筆桿子、槍桿子，奪取政權靠這兩桿子。所以，很值得我們注意。思想上不能麻痹，行動上要採取措施，才能防患於未然，要把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定時炸彈、地雷，事先發現，挖掉。不然，一旦時機成熟，就會發生反革命政變，或者遇到天災，或者遇到戰爭，或者毛主席百年之後，這種政治危機就會來了，七億人口的大國，就會亂起來。這是很大的問題。

當然，還是兩個前途。他們的陰謀，不一定得逞，不一定能勝利，不一定能實現。因為我們的黨是毛主席領導下幾十年的黨，是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黨，是成熟的黨。我們的黨，緊緊地掌握著槍桿子，始終沒有離

開過槍桿子，沒有搞過什麼議會活動，和歐洲的黨是不同的。我們的黨，是同廣大勞動人民群眾血肉相連的，是有長期的革命傳統的，是有豐富的革命經驗的。

整個形勢是大好形勢，世界是大好形勢，中國也是大好形勢。他們想得逞，是很不容易的。他們可能得逞，也可能失敗。如果我們不注意，大家都是馬大哈，他們就會得逞。如果我們警惕，他們就不能得逞。他們想殺我們的腦袋，靠不住！假使他們要動手，搞反革命政變，我們就殺他們的腦袋。

任何時候，不管形勢多麼好，總有陰暗的一面。形勢好的時候，要看到壞的一面。如果沒有壞的一面，好就不成其為好。好之所以好，是有壞。壞之所以為壞，是有好。

現在毛主席健在，我們是大樹底下好乘涼。毛主席已經七十多歲了，身體很即可，可以活到一百歲。

正因為形勢好，我們不能麻痹，要採取措施，防止發生事變。有人可能搞鬼，他們現在已經在搞鬼。野心家，大有人在。他們是資產階級的代表，想推翻我們無產階級政權，不能讓他們得逞。有一批王八蛋，他們想冒險，他們待機而動。他們想殺我們，我們就要鎮壓他們！他們是假革命，他們是假馬克思主義，他們是假毛澤東思想，他們是背叛分子。毛主席健在，他們就背叛，他們陽奉陰違，他們是野心家，他們搞鬼，他們現在就想殺人，用種種手法殺人。陸定一就是一個，陸定一的老婆就是一個。他說他不知道他老婆的事！怎麼能不知道？羅瑞卿就是一個。彭真手段比他們更隱蔽更狡猾，使人家不容易看出來。他冒充擁護毛主席，他在晉察冀是百分之百的王明路線，比王明路線還王明路線，超過王明路線。一九三八年黨的六屆六中全會批判了王明路線，他參加了這次會議，會後他還把蔣介石說成是“最有政治眼光的人”，“要竭誠的擁護蔣委員長”。他說，

“抗戰最堅固的中心是蔣委員長”。他還說，“國共兩黨之間，要互助互愛互讓，反對利用困難，與政府（即國民政府）為難。”他在延安裝著反對王明路線，到東北又搞王明路線。彭真在東北拒不執行黨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在炮火連天的時候，他幻想和平，幻想和國民黨蔣介石談判，沒有戰爭打算，幻想在談判桌上取得勝利。他沒有一點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味道，不搞階級鬥爭。他不把重點放在農村，不把幹部和主力派到農村去建立根據地，戀戀不捨大城市。不願意離開大城市。撤出瀋陽，還賴在郊區不走。搬到本溪，搬到撫順，又搬到河口，不肯在農村安家不準備打，只準備和。在東北，他想把主力孤注一擲，和敵人硬拼，以軍事上的冒險主義掩蓋他政治上的投降主義。他藉口照顧山東，實際上是培植他個人的實力。他不注意補充主力，只是從散兵游勇中收編和建立一些地方部隊，後來這些部隊都叛變了，成了“座山雕”。他說反山頭，就是他在搞山頭，招降納叛，搞他自己的軍隊，搞小圈子，高“桃園三結義”。北京市水都潑不進去，針也插不進去。黨內搞黨，黨內搞派。毛主席、周總理和其他同志都有感覺，我也有感覺。

不少人掛著馬克思主義的招牌，毛澤東思想的招牌，實際上反對馬克思主義，反對毛澤東思想。他們掛著共產黨的招牌，實際上是反共分子。這次揭露是黨的偉大勝利，不揭非常危險。再讓他們搞下去，就可能不是黨揭露他們，而是他們要“審判”黨。

我們的社會還是建立在階級對立的基礎上。資產階級、地主階級、一切剝削階級是打倒了，但是沒有完全消滅。我們沒收了他們的物質，但是不能沒收他們的反對思想，把他們關起來，也沒有法沒收他們的腦袋。他們是想復辟的。他們在整個人口比例上占很少數，但是他們政治上的能量很大，他們的反抗力量比他

們的人口比例大得多。城鄉小資產階級的自發勢力，不斷地生長新的資產階級分子。工人當中，也摻雜一些複雜成分。黨和國家機關有些人腐化。加上帝國主義和現代修正主義的包圍和顛覆活動。這些，使我國產生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這種危險是綜合的，各種反對力量是互相聯合的。國內國外，國內是主要的。黨內黨外，黨內是主要的。上層下層，上層是主要的，危險就是出在上層。蘇聯出了赫魯雪夫，全國就變了顏色。

現在，我們把剝削階級打倒才十六年，他們的人還在，心不死。地主把他的地契還秘密地保存起來。被推翻的地主和資產階級，隨時都在夢想恢復他們的天堂。他們的槍桿子被繳械了，他們的印把子被奪過來了。但是，他們在思想文化陣地上還佔有相當的優勢。他們拼命利用這種優勢到處放毒，為資本主義復辟製造輿論準備。當前正在進行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這種資產階級陰謀復辟和無產階級反復辟的尖銳的鬥爭。它是關係到黨和國家的命運、前途和將來面貌的頭等大事，也是關係到世界革命的頭等大事。

我們一定要嚴重注意資本主義復辟這個重要問題，不要忘掉這個問題，而要念念不忘。要念念不忘階級鬥爭，念念不忘無產階級專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不然的話，就是糊塗蟲。不要在千頭萬緒、日理萬機的情況下，喪失警惕性，否則，一個晚上他們就要殺人，很多人頭要落地，國家制度要改變，政權要顏色，生產關係就會改變，由前進變成倒退。

說社會主義沒有矛盾，這是錯誤的，是違反馬克思主義的，是不合辯證法的。哪裡會沒有矛盾呢？一千年、一萬年、一億年後仍仍然有矛盾。地球毀滅了，太陽熄滅了，宇宙還是有矛盾。不久前，邢臺發生了地震，自然界也再鬥爭著，我們總理親自去處理。太陽黑子增加到一定程度，無線電就發不出去。任何事物都

處在矛盾中間，鬥爭中間，變化中間，這才是馬克思主義的看法。從沙粒到太陽，大到銀河系，小到基本粒子，大到宏觀世界，小到微觀世界，都充滿矛盾。馬克思主義的本質是批判的、革命的。它的基本點是要批判，要鬥爭，要革命。無產階級，只有經過批判、鬥爭和革命，才能奪取政權，保持政權，推動我們的事業前進。因此，要提高警惕，要鬥爭，不能存有和平幻想。鬥爭就是生活，你不鬥他，他鬥你嘛！你不打他，他要打你，你不殺他，他要殺你。喪失這種警惕性，不團結起來鬥爭，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全黨越團結越好，越要鬥爭，越有戰鬥力。但是，絕不同反黨分子講團結，而是批判他們，揭露他們，一直到開除他們出黨。不是絕對的團結，而是相對的團結，是批判反黨分子、揭露反黨分子的團結。

總之，要鬥，這次我們鬥了彭真、羅瑞卿、陸定一和他的老婆，還有楊尚昆，是馬克思主義的行為，是辯證唯物主義的行為，是重大的政治措施，是防止反革命顛覆的措施。不然，我們得了天下，要喪失天下，創了業不能守業，我國人民一百多年來、幾十年來為革命前赴後繼，無數先烈所流的血，統統付之東流，我們就成為歷史的罪人，成為機會主義者。

我們同他們鬥，但內部要團結，要以毛主席為中心來團結，以毛澤東思想為中心來團結。他們這些傢夥的共同點，就是反毛主席，反毛澤東思想。無論是彭真、羅瑞青、陸定一、楊尚昆、鄧拓、吳晗、廖沫沙等等，都是這樣。材料太多了。他們或者明目張膽，或者暗中射影，採取不同的語言、不同的體裁，不同的手段，惡毒地反對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

毛主席是我們黨的締造者，是我國革命的締造者，是我們黨和國家的偉大領袖，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毛主席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繼承、

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毛澤東思想是在帝國主義走向全面崩潰，社會主義走向全世界勝利時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是全黨全國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我們一定要把毛澤東思想在全國人民面前端出來，同全國人民更廣泛地見面，同全國人民更廣泛地結合，讓毛澤東思想更加深入人心，促進全國人民思想更進一步革命化。我們要以毛澤東思想為武器，批判揭露各種修正主義，批判揭露各個戰線，各個部分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批判揭露為資本主義復辟鳴鑼開道的資產階級思想，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這樣，就能保證我們防止修正主義，避免資本主義復辟。這是最最根本的關鍵問題。很多黨內的壞傢伙，他們反對學習毛澤東思想，宣傳資產階級思想。不宣傳革命思想，宣傳反動思想，不是把革命推向前進，而是拉著革命倒退。別人宣傳毛澤東思想，他們就冷嘲熱罵，千方百計加以壓制，加以攻擊，加以反對。

馬克思主義者起碼要知道，存在決定意識，物質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同時，意識又有巨大的能動作用。物質變精神，精神變物質。毛主席說：“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裡來的？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嗎？不是，是自己頭腦裏固有的嗎？不是，人的正確思想，只能從社會實踐中來，只能從社會的生產鬥爭、階級鬥爭和科學實驗這三項實踐中來。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思想。而代表先進階級的正確思想，一旦被群眾掌握，就會變成改造社會、改造世界的物質力量。”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同志的認識論觀點就是這樣。我們要很好地運用毛澤東思想，就能大大到前進。精神潛力大得很。

幾十年來毛主席經常闡明瞭精神和物質這兩方面的辨證關係。馬克思的核心是辯證法。毛主席對辯證法運用自如，滲透一切，在每個問題上都體現了辨證唯

物論的無產階級哲學基礎。毛主席全面地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

毛主席所經歷的事情，比馬克思、恩格斯、列寧都多得多。當然，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是偉大的人物。馬克思活了六十四歲，恩格斯活了七十五歲。他們有很高的遠見，他們繼承了人類先進的思想，預見了人類社會的發展。可是他們沒有親身領導過無產階級革命，沒有像毛主席那樣親臨前線指揮那麼多的重大政治戰役，特別是軍事戰役。列寧只活了五十四歲，十月革命勝利以後六年就去世了。他也沒有經歷過像毛主席那樣長期、那樣複雜、那樣激烈、那樣多方面的鬥爭。中國人口比德國多十倍，比俄國多三倍，革命經驗之豐富，沒有哪一個能超過。毛主席在全國、在全世界有最高的威望，是最卓越、最偉大的人物。毛主席的言論、文章和革命實踐都表現出他的偉大的無產階級的天才。有些人不承認天才，這不是馬克思主義。不能不承認天才。恩格斯說，十八世紀的天才是黑格爾、聖西門，十九世紀的天才是馬克思。他說，馬克思比我們一切人都站得高，看得遠，觀察得多些和快些，他是天才。列寧也承認天才，他說要有十幾個天才的領袖，才能領導俄國取得革命的勝利。毛主席是天才，我們同毛主席哪一點不同？一起搞革命鬥爭，有些人年齡比他老，我們沒有他老，但經歷的事也不少。書我們也讀，但我們讀不懂，或者不很懂，毛主席讀懂了。我看到很多人讀書圈圈點點，把書都圈滿了，證明他沒有讀懂，不知什麼是中心，什麼是主次。辯證法的核心，毛主席在幾十年前就讀懂了，我們沒有懂。他不但懂了，而且還會熟練地運用。從懂到用，有很大的距離，懂了未必會用。打乒乓球，你懂得了規則，你也打不過莊則棟、徐寅生。打仗也一樣，你懂得一點書本上的軍事知識，打的時候不一定能打勝仗。毛澤東思想全部貫穿著辯證法。毛主席廣泛運用和發展了馬

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在當代世界上沒有第二個人。十九世紀的天才是馬克思、恩格斯。二十世紀的天才是列寧和毛澤東同志。不要不服氣，不行就不行。不承認這一點，我們就會犯大錯誤。不看到這一點，就不曉得把無產階級最偉大的天才舵手選為我們的領袖。

人和一般動物的根本區別是，人是能夠製造工具的動物。人在勞動過程中，逐步發展自己的頭腦，能夠去思想。思想是人的最大特點之一。思想在一定條件下起決定作用。我們應該重視先進思想的作用，重視社會主義時代先進思想的作用，重視毛澤東思想的作用。不重視思想的作用，是庸俗的唯物論，機械的唯物論。在社會主義時代，在財產公有的條件下，忽視先進思想的作用，搞物質刺激，是不行的，是非常危險的。我們同修正主義不同，我們不能像他們那樣搞物質刺激。資產階級的物質刺激這條路，我們是決不能走的。我們必須用毛澤東思想，用偉大的正義的事業，來激發人民的熱情，放眼世界看未來，堅定不移地向前進，擺脫幾千年來一切剝削階級傳統勢力和習慣勢力的影響，從這種狹隘的影響下解放出來，表現出強大的力量，發生強大的作用。

文化、思想戰線被壞傢伙控制了。彭真、陸定一控制的中宣部是為了資產階級服務的宣傳部。他們控制的文化部是為資產階級服務的文化部。他們仇恨毛澤東思想，他們阻礙毛澤東思想的傳播。毛澤東思想一定要最廣泛地同人民群眾見面。不同人民群眾見面，我們國家的面貌就不能改變。我們一定要把毛澤東思想深入到人民群眾中去。毛澤東思想和人民群眾一結合，無論哪一方面，就會發生很快的變化。

毛澤東思想是無產階級思想的集中表現，是同私有制思想，剝削階級思想根本對立的。我們反對私有制和私有觀念。私有制和私有觀念是產生修正主義的重

大因素。這兩種因素非常廣泛。農村有自留地，有集體的地。一筐糞，是先送自留地，還是先送集體的地，都是有鬥爭的。這是兩個階級的心理，是兩個階級的思想，是兩條道路的表現，是階級鬥爭的表現。我們不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去戰鬥，資產階級思想就會佔領陣地，引起蛻化變質，出亂子。匈牙利不就有裴多菲俱樂部這批學閥嗎？在他們的煽動下，二十萬人圍著國會，要納吉當政。我們黨內這些壞傢夥，就是納吉。一旦有事，他們振臂一呼，就會有些人跟著跑。幸虧過去幾年各個擊破，打掉了一批納吉，打掉了高崗、彭德懷、張聞天。著次有打掉了一批納吉，一批赫魯雪夫修正主義分子。

這次鬥爭以後，不要存太平觀念。有些人，私有觀念、剝削階級觀念根深蒂固，滲透到每一個細胞。他們隨時都要搞鬼，還地提高警惕。

人的腦子是存在的反映，是有矛盾的，是有階級性的。我們社會主義社會也不例外。就拿革命隊伍裏的人來說，腦子裏也有正確思想和錯誤思想的矛盾，有無產階級思想和資產階級思想的矛盾，有集體主義、共產主義同個人主義的矛盾，有真馬克思主義和假馬克思主義的矛盾有走群眾路線與反群眾路線的矛盾，等等。這一系列的矛盾，不斷地在腦子裏發生鬥爭，不是這個克服那個，就是那個克服這個。

還有一些人的腦子裏，甚至有革命思想同反革命思想的矛盾。有隨時開展鬥爭，兩軍對戰，消滅隱蔽的反革命思想。

要看到地球在運動，萬物在發展的現象，要看清歷史在發展的規律，不要做違反歷史前進的事。做這種事，害人害己，身敗名裂。毛主席提出保持無產階級晚節，就是這個問題。老同志也要按照毛主席提出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五個條件，嚴格要求自己，認真改造自己。不看清楚這個大形勢，打個人小算盤，

必然會犯大錯誤。甚至會參加卑鄙無恥的陰謀反黨集團。

我們現在擁護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以後我們也擁護毛主席。毛澤東思想要永遠流傳下去。毛澤東思想是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是高度同實際相結合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是全國人民最好的教科書和必修課，是全國勞動人民團結和革命的共同思想基礎，是全國人民行動的指南。毛澤東思想是人類的燈塔，是世界革命的最銳利的武器，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毛澤東思想能改變人的思想面貌，能改變祖國的面貌，能夠使中國人民在全世界面前站起來，永遠站起來。能夠使全世界被壓迫、被剝削的人民站起來，永遠站起來。毛主席活到哪一天，九十歲、一百多歲，都是我們黨的最高領袖，他的話都是我們行動的準則。誰反對他，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在他身後，如果有誰做赫魯雪夫那樣的秘密報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壞蛋，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

毛澤東思想永遠是普遍真理，永遠是我們的行動指南，是中國人民和革命世界人民的共同財富，是永放光輝的。解放軍把毛主席著作作為全軍幹部戰士的課本，不是我高明，而是必須這樣做。用毛澤東思想統一全軍、全黨，什麼問題都可以解決。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超過我們一萬句。對毛主席的著作，我領會得很不夠，今後還要好好學。

我們一定要抓住政治不放，抓住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不放。這是革命的需要，是形勢的需要，是對敵鬥爭的需要，是備戰的需要，是徹底取得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勝利的需要，是防止和反對修正主義的需要，是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需要。那些傢伙攻擊我們是實用主義。這決不是實用主義，是行之有效、符合實際的客觀真理。什麼是實用主義？實用主義就是資產階級的主觀唯心論。在他們看來，對資產階級有利的就是真理，對資產階級不利的就不是真理。我們抓突出政

治，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是符合社會主義社會發展規律的真理。如果不根據革命的需要去指導我們的行動，就必然犯大錯誤，必然會失敗。

三 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毛澤東給江青的一封信

江青：

六月二十九日的信收到了。你還是照魏（文伯）、陳（丕顯）的意見，在那裏（即上海）住一會為好。我本月有兩次外賓接見，見後行止再告訴你，自六月十五離開武林（即杭州）以後，在西方的一個山洞裏住了十幾天（即在滴水洞）消息不大靈通。二十八日來到白雲黃鶴的地方（即武漢），已有十天了。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興味的。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過七、八年又來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來。他們為自己的階級本性所決定，非跳出來不可。

我的朋友（指林彪）的講話，中央催著要發。我準備同意發下去。他是講政變的問題。這個問題，像他這樣講法，過去還沒有過。他的一些提法，我總感覺不安。我歷來不相信，我那幾本小書，有那樣大的神通。現在經他一吹，全黨、全國都吹起來了。真是王婆賣瓜，自賣自誇。我是被他逼上梁山的，看來不同意他不行了。在重大問題是，違心地同意別人，在我一生還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吧。

晉朝人阮籍反對劉邦，他從洛陽走到成皋，歎道：世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魯迅也曾對於他的雜文說過同樣的話。我跟魯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歡他那樣坦率。他說：解剖自己，往往嚴於解剖別人。在跌了幾跤之後，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們往往不信。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

我少年時曾經說過：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水擊三千里。可見神氣十足了。

但又不很自信，總覺得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我就變成這樣的大王了。但也
不是折中主義。在我身上有些虎氣，是為主。也有些猴氣，是為次。

我曾舉了後漢人李固寫給黃信中的幾句話：者易折，皎皎者易汙，陽春白雪，
和者蓋寡，盛名之下，其實難符。這後兩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會上，
讀過這幾句。人貴的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會議，我表示對於朋友（指林彪）
的那樣提法的不同意見，可是有什麼用呢？他到北京五月會議上還是那樣講，報
刊上更講的很凶，簡直吹得神乎其神。這樣，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的本意，
為了打鬼，借助鍾馗。我就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當了共產黨的鍾馗了。

事物總是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準備跌得粉碎的。那也沒
有什麼要緊，物質不減，不過粉碎罷了。全世界一百多個黨，大多數的黨不信馬
列主義了。馬克思、列寧也被人打得粉碎了，何況我們呢？我勸你也要注意這個
問題，不要被勝利沖昏了頭腦。經常想一想自己的弱點、缺點和錯誤。這個問題
我同你講過不知多少次，你還知得吧，四月在上海還講過。以上寫的，頗有點接
近黑話。有些反黨分子，不正是這樣說的嗎？他們是要整個打倒我們的黨和我本
人，我則只說對於我起的作用，覺得有一些提法不妥當，這是我跟黑幫的區別。
此事現在不能公開，整個左派和廣大群眾都是那樣說的，公開就潑了他們的冷
水，幫助了右派。而現在的任務，是要在全黨、全國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
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後，還要有一次橫掃牛鬼蛇神的運動。而後還要有多次
掃除。所以我的這些近乎黑話的話，現在不能公開，也說不定。因為左派和廣大
群眾是不歡迎我這樣說的。也許在我死後的一個什麼時機，右派當權之時，由他
們來公開吧。他們會利用我的這種講法，去企圖永遠高舉黑旗的。但是這樣一做，
他們就要倒楣了。中國自從一九一一年皇帝被打倒以後，反動派當權總是不能長

久的。最長的不過二十年（蔣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蔣介石利用了孫中山對他的信任，又開了一個黃埔軍校收羅了一大批反動派，由此起家。他一反共，幾乎整個地主、資產階級都擁護他。那時共產黨又沒有經驗，所以他高興地、暫時地得勢了。但在二十年中，他從來沒有統一過。國共兩黨的戰爭，國民黨和各派軍閥之間的戰爭，中日戰爭，最後是四年大內戰，他就滾到一群海島上去了。中國如果發生反共的右派改變，我斷定他們也是不得安寧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會容忍的。那時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話，得勢於一時。左派一定會利用我的另一些話，組織起來，將右派打倒。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認真的演習。有些地區（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機關（例如北大、清華）盤根錯節，傾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囂張的地方，他們失敗就越慘，左派就越起勁。這是一次全國性的演習，左派、右派和動搖不定的中間派，都會得到各自的教訓。結論：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還是這兩句老話。

久不通信，一寫就很長，下次再談吧

毛澤東

一九六六年七月八

第六節 周恩來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

（1966年5月21日）

講三個問題。一、防止反革命政變問題；二、領導和群眾問題；三、保持晚節問題。

一、主要講防止反革命政變問題。

同意許多同志的講話。完全同意林彪同志的講話，講的很好。

社會主義國家在黨內和國家內部必然要有階級鬥爭的反映，特別當前我們的歷史時代是帝國主義、殖民主義走向沒落，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走向勝利的時代。列寧早就講過：“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之後，資產階級是要反抗的，資產階級的力量比無產階級的力量大多少倍。”“小生產者每日每時都在自發地產生資本主義。”主席說要宣傳這兩點，要經常溫習，要經常宣傳這兩句話，溫習這兩句話。……

什麼叫資產階級知識份子？陸（定一）說：新中國學校培養出來的學生都是資產階級知識份子。怎麼能這麼說？不能這樣講，該叫什麼呢？新舊知識份子。我們學校培養出來的人也是要分化的。從學校出來到社會上也是兩頭小中間大，少數是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少數是無產階級知識份子，大多數是中間狀態的。經過實踐考驗，是要不斷分化的。在一定條件下，無產階級知識份子也要分化的，有的完全變壞的。大慶的知識份子勞動化的知識份子，但是不鞏固，換一個知識份子成堆的地方，也會發生變化，也會變壞的。總之是不能象陸定一所講的那樣一律都是資產階級知識份子。

我們對老知識份子採取包下來的政策。包下來的政策有好處，有壞處。壞處是使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在各方面竊取了領導地位，奪取了領導權。可以看出，產生修正主義國內原因是主要的。“物必自腐，而後蟲生之。”林彪同志講的亞非拉地區六十一政變，也可以看出國內因素是主要的。在社會主義革命的歷史時期，存在著階級鬥爭。

主席在七屆二中全會就講了“糖衣炮彈”。一九六二年八屆十中全會就講得更明確了。一九六三年四清到現在發現基層有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可

以看到一個地方，一個部門，一個時期，修正主義可以成為當權派。這次在中央揭發的彭、羅、陸、楊是中央領導機關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看起來出修正主義不可避免，中央地方都會出現。

說哪個國家的工作做得很好，不會出修正主義，是不對的。這就忽視了左、中、右的客觀存在，這就是“一潭死水”。主要問題是防止修正主義當權。彭、羅、陸、楊是一個一個地奪取我們的陣地，有筆桿，有槍桿，有黨權。第二是防止修正主義發生政變。第三要防止修正主義的軍事政變。我們的三防與陸定一的三防（防潮、防震、防磁）不一樣。對政變的危險，同意林彪同志的講話，中央與地方以中央為主，國內與國外以國內為主，黨內與黨外以黨內為主，上邊與下邊以上邊為主。重點放在內、在上。主席說過，社會主義也會出修正主義，有兩種可能。出修正主義是不可避免的，總是要出的。

（1）一種是搞政變。搞資本主義復辟，然後再推翻。資本主義革命也是這樣，經過一二百年的時間，英法資產階級革命的歷史是這樣，經過封建勢力多次復辟。這樣時間長，困難多，象蘇聯現在的情況。在中國出了修正主義，也可能長，也可能短。中國有革命的傳統，中國出了修正主義、修正主義上了台怎麼辦？地方可造反，主席是有預見的、是天才的預見。主席早就有感覺，早有材料，感覺是正確的。主席抓得准，抓得狠、抓得不准不行，二月七日那個提綱，五天之內就抓住了，抓得准、抓得狠、抓住不放，不能叫滑過去。“四大家族”已經奪了我們許多陣地。主席說過，這是黨內正常現象，去年工作會議時就問地方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你們造不造反？提綱出來後，主席說你們改不改，不改我就發動地方改，叫地方造反。彭、羅的問題可以發到縣、團討論，以後逐步深入到群眾中去的。

(2) 另一種是不斷地清除修正主義，“剝筍”不斷出現，不斷清除。出是肯定的，出來後可採取剝筍的政策，這樣可以避免修正主義復辟，這就是我黨當年對國民黨的政策。一九二七年以後，國民黨分成左、中、右派，中間的轉化為右派的剝筍，但並未實現這個政策。現在用到無產階級專政直到共產主義實現，這是發展規律。如新中國成立以來，一次是高饒事件。二次是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事件，“四大家族”是第三次了，對他們都是採取剝筍政策，修正主義不可能得逞，使我們國家不出修正主義。主席說：“他們得支氣管炎，吃五十片藥就消滅了細菌”。事情是兩種可能，或者我們被他們打倒，或者我們剝掉他們。一種是得逞，一種是剝掉。（林彪同志插話：不是他們剝掉我們，就是我們剝掉他們，這是你死我活的鬥爭，應貫徹到社會主義革命整個歷史時期。）

想一想，不採取剝筍政策，不剝掉，不清除，我們的國家、黨不知怎麼樣了。前後三次事件都是結合起來的，彭和高都是個人利害衝突，不清除他們，他們的陣地會越來越大，這是很危險的。揭開“四大家族”，奪回他們所佔領的陣地是剝削政策的勝利，是毛主席思想的勝利，應該慶祝。現在世界上有些國家好象風平浪靜，不採取剝筍政策，“死水一潭”是不成的，修正主義搞政變，基礎是一文一武，掌握筆桿子、槍桿子，兩個都佔領了就動手，但最重要的是黨權，彭是大黨閥。防止修正主義竊取我們的黨權，防止修正主義的重點要放在上邊、中央、黨內、國內。

林彪同志講的那一段歷史，一方面要記住政變之多，另一方面要相信，北京出了政變總會有黨、國家領導和軍隊造反革命反的人。要有信心，高舉毛主席思想紅旗，團結在毛主席同志周圍，堅持不懈地採取剝筍政策，世世

代代傳下去。

毛主席思想是馬列主義的頂峰，毛主席思想是帝國主義、資本主義走向滅亡，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走向勝利的這個偉大時代的頂峰，就是最高峰的意思，毛主席與列寧一樣是天才的領袖，是世界人民的領袖。解放以來三次事件的情況形式有所不同，都是反黨，反中央、反毛主席的。高饒事件是社會主義建設初期發生的，是反黨、反中央、反毛主席的。打的旗號是反劉少奇同志。在北京有兩個司令部，是點陰風，燒陰火，是見不得人的。彭、黃、張事件發生在我們國家裏遇到暫時困難、強調自力更生的時候，矛頭直接指向毛主席。彭是高山倒馬桶，臭名遠揚，激起公憤。彭、羅、陸、楊的問題，早有察覺，楊不能與那三個人相比。他自己成不了氣候，只是抱了腿。彭、羅、陸都是得到中央信任，各把一方。對彭是逐步認識的，對羅也是逐步認識的。羅是林總發現的，彭也是林總發現的最早。林總在東北講的三句話最生動，最形象；見什麼人說什麼話，兩面三刀沒有章法，本質是政治掮客，投機分子。他們是在國內外形勢大好的時候搞起來的，他們三人在黨內地位是相當高的，羅實際上是國防部長（因林彪病），彭實際上是第二書記。鄧小平對他很放手，為什麼他還要伸手。他們是資產階級野心家。從最近二十三條下達後，彭打出反左的旗號，完全取消四清的一條黑線，不反對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全世界處在大動盪、大分化、大改組的時期，毛主席的思想指導世界革命的意義越來越大，“三家村”、《前線》反黨反社會主義出現在這個時期，他們採取相同的立場、思想、主張，目標是向党向社會主義發起進攻，進攻的目標是林彪同志，針對毛主席，首先砍掉毛主席的左右手。這不是偶然的，

不是巧合。羅是大比武出現的，陸是夫妻老婆店發現的，他們的共同點是反對突出政治，反對毛主席思想，反對工農兵學習毛主席著作，在這個時期他們出來反對林彪同志。因為林彪同志對毛主席思想提得最早，舉得最高，發揮最多，用的最活，做得最力。

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會，林彪的講話是最有分量的講話。高舉毛主席思想，提出了活學活用，四個第一。這次文化大革命，林總於二月二日派江青同志去部隊召開座談會，彭的提綱是二月三日發出的，這是鮮明的對照，一個高舉，一個反對。羅的大比武是反對突出政治，反對林彪同志的。陸的老婆從一九五九年罷彭德懷的官以後，一直到現在寫了六年的匿名信。有一個規律，他在突出政治高潮時寫信也最多的。用公開的名信片寫，是發宣言式的。彭從去年十月開始包庇“三家村”打出了黑旗，主席說：“為什麼迫不及待？”彭答不出。彭經常講民主集中制，實際上是好話對著我們說，壞事背著我們作。羅的事情發生後，主席已經指出他的錯誤，他不去檢查自己的錯誤，還去改羅的報告（指檢查小組報告），為羅打掩護，為自己謀出路。文化大革命最能暴露本質，就在這時候，楊尚昆也象熱鍋上的螞蟻，經常打電話問，不到半年時間，“四大家族”原形畢露，事情不簡單，鬥爭剛開始。我們的陣地一個一個地被奪走了，現在要一個個地奪回來。他們打著紅旗反紅旗，散佈了大量毒素，他們是見不了天日的，我們要把毛主席思想交給群眾（少數人掌握是資產階級）。三件事情有共同性，思想、歷史、社會根源是共同性的。思想是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整風是整別人不整自己，個人主義極端嚴重。彭、羅、陸擺出一付一貫正確的姿態（彭說他既非教條主義，又非經驗主義），驕傲自滿，自高自大，從無自我批評，同主席和林彪同志從

不談東北的問題，個人主義勝過黨性，對他提過意見的人，他恨之入骨，永遠不忘。

陸（定一）根本不講理，副總理要兼一個口，要他搞文教口，常常就不幹，說我要抓大權。叫他兼管文字改革委員會，他也不幹，因為胡喬木同志建議要搞文字改革委員會。只有個人主義思想，沒有黨性，沒有階級鬥爭，陸定一一家是大地主，解放後他回家賣地賣了很多錢，他說把錢交給黨了，自己用了一部分。他家是大地主從來未向我講過，他沒有改造的決心。厚道是有階級性的，有黨性的，對國民黨蔣介石不能講厚道。沒有個性，只有階級性、黨性。他們缺乏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利祿熏心，私心太大，我字當頭，地位越高，野心越大。他對自己歷史從來沒總結，只是總結別人的，把功勞記在自己帳上，冒充正確，自誇有功，騙取信任。……所以說他們從來不說自己的成份。幾家是大地主，他們都隱瞞，不向周圍的人講。講了有好處，便於改造。要念念不忘階級鬥爭，念念不忘無產階級專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舉毛主席思想偉大紅旗（×××說，彭真說總理總講他的社會出身，黨內講，黨外也講，真有點麻煩，講得太頻繁了。總理這樣講是榜樣，警惕自己，改造自己。劉介梅不是由好變壞，又由壞變好了嗎？）他們有宗派情緒，明知鄧拓是個叛徒，彭還要包庇，對鄧拓、吳晗等的包庇要和文化大革命、四清聯繫起來看，要把剝筍政策世世代代傳不去，力爭越剝越少。

二、領導與群眾。

把領導與群眾，領袖與群眾結合起來。關於五人小組彙報提綱，在開會前彭真給我打過電話，提出幾個字的意見，對通知他舉了手表示同意的。他

又給我打電話說“背著、盜竊、造謠要去掉”（背著五人小組，盜竊中央名義，造謠主席說兩個月後吳晗作政治結論）這是三個關鍵問題，非寫不行，不能取消，要寫。這個檔發下去加以說明，主席同意，一個月以來。全國出現了好的氣象。工農兵、革命的知識份子鬥志昂揚，高舉毛主席思想偉大紅旗。章士釗寫了“柳文指要”一百多萬字（很反動，是翻案的）主席說允許他出版，準備印出來批判。他又要求收回，重新修改。這個人能看到氣候，是有眼光的。把毛主席思想交給工農兵群眾，這個力量是很大的，把定時炸彈挖出來，中央更加團結了，全黨全國人民更加團結在毛主席的周圍。通過文化大革命的活動，我們要更好地宣傳毛主席的領袖作用，不僅在中國，而且要在全世界宣傳毛主席的領袖作用，要謙虛謹慎，還要當仁不讓。主席在 1962 年提出形勢、矛盾、階級，十中全會公報，1963 年第一個十條，文化大革命，三線。1965 年備戰備荒為人民，這次又提出文化大革命，中央要加強反修，這次上海市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了大作用，提倡大家學上海，要把毛主席思想交給群眾，為了剝筍，必須用毛主席思想武裝群眾。

三、保持晚節問題。

蓋棺不能定論，火化了也不能定論，象瞿秋白就是一個叛徒，他臨死時寫了一篇《多餘的話》，這篇講話在香港的一個雜誌上發表了，意思是說我不應該參加政治活動。李秀成也是一個叛徒，李秀成的自供就看出了，戚本禹同志寫文章批判過，不因為他死了就是烈士，我提議把瞿秋白從八寶山搬出來，把李秀成的蘇州忠王府也毀掉。這些人都是無恥的。

毛主席的一家，毛澤民、毛澤覃，毛主席的愛人楊開慧烈士，這些人是真正的烈士，這才是領袖的家庭。“為有犧牲多壯志，敢叫日月換新天”。要

跟著毛主席。毛主席今天是領袖，百年以後也是領袖。晚節不忠，一筆勾消。學毛著，作筆記要和自己的革命歷史聯繫起來，作總結，有的人擺樣子，不讀毛著，拿起來讀一段就痛心了。要返回來讀三十本書。

第七節 陳伯達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

(1966年5月24日)

林彪同志的講話，是近幾年來最重要的講話。一切階級鬥爭的核心問題是政權問題。這次對四大家族的鬥爭，是防止反革命復辟，政變的大事。四大家族是地主、資產階級搞反革命復辟的性質。反對四大家族是主席英明偉大的決策。

資產階級復辟的歷史，英國的克倫威爾，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在幾百年的時間內，封建復辟過多少次。文化革命，資產階級在奪取政權以前就在進行著，大體搞了七百年（十二世紀到十八世紀）。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在奪取政權之後解決的。要看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要經過長時期的。是不是比資產階級用的時間短一些？我看可以短一些，我們是依靠工農兵群眾大搞群眾運動。在性質上不同於資產階級文化革命，因為資產階級革命是一個剝削階級代替另一個剝削階級，我們是消滅一切剝削階級。剝削階級幾千年來的習慣勢力是不能輕視的。

這次我們同“四大家族”的鬥爭，他們是搞地下活動，是他們自己挑起來的。高饒也是背後搞地下活動。搞政變的，沒有長期的地下活動是搞不起來的，我們不能有太平觀念。列寧說的兩條：被推翻的剝削階級還沒死，新的資產階級又在生長新的反革命分子。彭真在公佈《二十三條》以後作了兩次報告，是包庇一切壞人，地、富、反、壞、右反攻倒算。在社教運動中，

存在著兩種尖銳的世界觀的鬥爭，他用生產的大帽子壓人，說生產搞壞了，是保護四類分子，保護一切壞人的。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的頂峰，從馬列主義的三大組成部分來看，確是這樣的。主席經歷過的事情，比馬、恩、列經過的要多，列寧只有三十年的工作經驗，主席有五十年的經驗。馬克思主義的哲學，主席的著作滲透著辯證法，不用辯證法是讀不懂的。《人的正確思想是從那裏來的？》，文章很短，概括得很集中，很精闢，最集中地表達了馬克思主義哲學。主席的哲學思想最根本的是對立的統一。列寧也講過，但是毛主席闡述得更明確，更通俗，更容易為工農兵看懂。主席說：《共產黨宣言》很大的缺點是對農民、小資產階級的革命性估計不足。當然那時有局限問題，寫過也不系統。馬、恩、列、斯是主張武裝暴動，都是講的城市，很少說農村包圍城市。（周總理插話：史達林講過建立根據地是指的黑海克蘭、克德兩個海口的小城市）（林總插活：南昌暴動以後，朱德看見山多樹多，說我是拜山教。）沒有人民軍隊就沒有一切。《人民戰爭勝利萬歲》很重要，闡述了主席思想，要很好地、認真地讀，多宣傳。今後世界革命走我們的道路更普遍了，有普遍意義，包括歐洲的資本主義國家革命的武裝，在農村容易存在。這篇文章很重要。

在社會主義時期，存在階級鬥爭，發展了列寧的觀點。列寧講到資產階級有很大的反對力量，小生產者時刻產生出資產階級分子。主席講的更加理論化，系統化。社會主義建設，列寧重視農業，但以農業為基礎是主席發展了。一九五七年，主席在莫斯科向各國黨講過，要注意農業，不然打起仗來沒有飯吃。科學社會主義有了重大發展。主席給林彪同志的信，很有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將來要按主席這封信來編制計畫，作為編制計畫的綱要。

“文人無行”，道德品質不好，很值得知識份子警惕。乾隆時有一部《二臣傳》講的是東林黨的事。蘇斯洛夫、米丁、尤金是“二臣”，是史達林培養起來的，後來跟著赫魯雪夫走了。有些人一到利祿熏心的時候，一切都忘掉了。彭真就是給這些人封官許願，為他奔走。（林總插話：寧可叫修正主義殺掉頭，也要千古流芳）。局限性，是從歐洲的情況出發的，沒有估計到亞洲的局面。工農聯盟的問題。農村包圍城市的。

第八節 康生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

（1966年5月25日）

從去年十二月到現在這半年期間，羅被揭露出來以後又提出了彭、陸、楊。沒有上本的主席思想很值得學習。

在這個期間我聽到主席七次指示。

第一次十二月二十日講到《海瑞罷官》問題要害是罷官。是與廬山會議罷了彭德懷的官有聯繫的，提出文化學術界必須從政治上批判。彭真在場說，作了調查，與彭德懷沒有聯繫。彭真出來後造謠說：主席說了兩個月以後作政治結論。（二月三、四、五日彭指出提綱，修改了四次。）

第二次二月八日到十一日，彭真搞出了提綱，拿到常委會上，匆匆忙忙的當場發了，叫許立群念了一遍，常委同志認為是向主席彙報過了，也沒有說明是作為檔向全黨發出，欺騙了常委。又到上海向主席彙報，說常委已通過，欺騙主席，主席問吳晗算不算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彭說不能算。主席沒有說話。彭真就把檔改了，說吳晗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關鋒在一九六二年寫過幾篇雜文，彭要整左派的風，主席說三年以後再說，主席表示

很不滿意。彭說主席批准了。在上海修改了一下趕快發出去了。

第三次，三月十七日到二十日常委擴大會議，主席說《前線》也是吳晗、廖沫沙、鄧拓的，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提出文、史、哲、法、經要搞文化大革命，要堅決批鬥，到底有多少馬克思主義。

第四次，三月二十八日到三十日，主席講到嚴慰冰這個反革命，他們是穿的一條褲子。講彭羅陸楊經常把主席講的話與自己要講的話分不清楚，把主席的意思變成自己的，講到中國會不會出修正主義。

第五次，四月十八日到二十五日，主席又重複講到中國會不會出修正主義當權的問題，一是出，二是不出，一是早出，一是晚出。還是早出好。搞的好可能不出。在中國出修正主義是困難的，講到書記處也是分化的，彭陸楊譚等當過書記處的書記，是不斷分化的，合乎辯證法，有人怕得要死，不分化是主觀願望，中央有，各省也會有。

第六次，四月二十八日到二十九日，主席講到北京一根針也插不進去，一滴水也潑不進去，彭要按他的世界觀改造黨。事物是向他的反面發展的，他自己為自己準備了垮臺的條件，這是必然的事情，是從偶然中暴露出來的一步一步深入的，歷史教訓並不是引以為戒的，這是階級鬥爭的規律，是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凡是在中央有人搞鬼，我就號召地方起來攻他們。叫孫悟空大鬧天宮。並要搞那些保衛“玉皇大帝”的人，彭是混到黨內來的渺小人物，沒有什麼了不起，一個指頭就捅倒他，“西風落葉下長安”。告訴同志們“不要無窮的憂慮”。“灰塵不掃不走，階級鬥爭不鬥不倒”。贊成魯迅的意見，經本不可不讀，不可多讀。不讀人家會欺負你，現像是看得見，本質也要通過現象表現出來，彭的本質隱藏了三十年。要不要告訴阿爾巴尼

亞的同志，沒有什麼不可告人的。

第七次，五月十二日到十四日主席講彭，黨內矛盾是正常現象，有矛盾就要鬥爭，這是辯證法。彭經常把主席的指示歪曲了。我們要好好學習沒有形成文字的主席思想。

“四大家族”的共同特點：(1) 反對主席是偉大領袖，是世界人民的領袖。(2) 反對主席是全面發展了馬列主義，是當代的頂峰、是最高最活的馬列主義。(3) 完全反對學習，宣傳毛澤東思想，特別不同意向全世界宣傳毛澤東思想。(4) 活學活用主席著作是簡單化，庸俗化，貼標籤。

為什麼說毛澤東思想是當代馬列主義的頂峰，一百多年來，可分為三個時期：(1) 馬克思主義時期是資本主義時代，沒有出現社會主義。(2) 列寧主義時期是帝國主義走向沒落時期。(3) 毛澤東思想或者是毛澤東主義時期，毛澤東思想全面發展豐富了超過了馬列主義。

從馬列主義的三大組成部分來看：

哲學大大發展了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人的正確思想從何而來是馬列主義的精華，精神變物質，一般到具體（林彪同志插話：工人說學習主席著作要占工作時間，這是加法，精神變了物質，這是乘法。）主席批評恩格斯的三個公式：品質互變不對，否定之否定不對，是否定了又肯定，核心是對立的統一，不能三個平列。列寧強調了對立統一，沒有批判恩格斯的。史達林搞成四條，主席否定了。概括為對立，統一，簡成一分為二，是主席第一個這樣講的，大大發展了超過了馬列主義，用矛盾論解決黨內的矛盾，社會主義國家內部，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四大家族的解決也是矛盾論的運用，工農兵學習哲學把學習推向新階段是件大事。

政治經濟學。彭說有資本論就夠了，還能再提高？這是不承認主席思想是當代馬列主義的頂峰。現在有這麼一個人正在寫資本論和帝國主義論。主席一開始就寫《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提出了土地問題，農民問題。主席提出了帝國主義是紙老虎，兩個中間地帶。十大關係的理論，也叫十大矛盾，又是經濟學，又是哲學。人民公社是社會主義奔向共產主義的最好形式。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堅持政治掛帥，自力更生，群眾路線把政治和經濟結合起來的典範，經驗豐富的很。

科學社會主義。毛主席有獨特的創造。革命的一切問題是政權問題，槍桿子出政權，這是最高的概括，是萬古長青的，贊成還是反對這句話是革命派是與反革命派的分水嶺。社會主義時期存在著階級鬥爭，大大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列寧說有階級鬥爭，但列寧說的是社會主義初期。史達林也說有，是在一九二八年以前有，到一九三六年只有因素，一九三六年以後就沒有了，到快死了又說有階級鬥爭。主席認為階級鬥爭是貫串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時期的政治經濟領域中。一九五七年主席說在帝國主義存在的條件下，在一個國家內不能建成共產主義。前人沒有回答的問題，主席作了回答。三月二十八日同日本人講話又發揮了。他說即使帝國主義在全世界打倒了，各個國家都成了社會主義，什麼時候建立共產主義還很難講。因為資本主義還要復辟。要經過長期的復辟與反復辟的鬥爭。

從上述來看，怎麼能說沒有超過呢？怎麼能說不是頂峰，不是最高最活的馬列主義呢？

主席對農民問題發揮的很多，懂不懂農民問題，是能不能取得革命勝利問題，是能不能建設社會主義，能不能鞏固政權的問題。特別是土地問題

的理論是個大發展，這是能不能取得政權的問題。

人民軍隊的理論是馬列主義中所沒有的，主席創造了與十月革命相反的道路，是偉大的創舉，農村包圍城市有世界意義，有普遍意義。人民軍隊，人民戰爭的理論是發展馬列主義很重要的部分。軍事問題恩格斯有著作，是唯武器論，沒有人民戰爭思想。列寧死的早，沒有講。史達林有，但說的不清楚。林彪同志《人民戰爭勝利萬歲》是很重要的。（伯達同志插話，對馬克思、列寧的著作要有批判態度，馬克思說，英國可以和平過渡到共產主義，因為英國沒有地主官僚制度，沒有軍國主義。這種說法不符合具體情況。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說當時是正確的。這和他理論本身就是矛盾的。史達林在列寧主義問題中批判過，說不能和平過渡了。）

英國有一教授來中國幾次，他說：“主席大大超過了馬列主義，提出了四個來源，加上中國古代哲學，在中國辯證法從來沒有中斷過，（總理插話：中國武裝鬥爭從來沒有中斷過，中國的哲學與打倒是分不開的。）稱讚工農兵學哲學。他對京劇改革很感興趣，他說到希臘去宣傳。改革他的戲劇。

這十年主席是反修旗手，反修的理論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論黨和黨的建設理論大大發展了，把黨的建設與馬克思的世界綱領結合起來。主席揭示黨內矛盾和解決矛盾的辦法，沒有矛盾就沒有鬥爭，黨的生命就要停止，這是深刻的。把矛盾的普遍規律運用到論黨和黨的建設上是有重大意義的，把黨性提高到哲學理論的高度。主觀主義是黨性不純的表現，是主席第一位提出來的，理論上入黨，思想上沒有入黨。解決黨內問題採取團結——批評——團結的公式。（主席插話：在馬列主義中沒有說過。）接班人的五個條件，可以保證永不變色，超過了聯共黨史結束語，也超過了布爾什維克化的

十二條。主席說文化大革命是觸及每一個人的靈魂的鬥爭。十中全會主席說：有人利用小說反黨，傳播輿論，這是他們的一個大發明。學校的歷史系不出歷史，文學系不出文學，哲學系不出哲學，要重新寫。我們要站在孫悟空這方面，支援左派，現在好像孫中山與康有為（保皇黨）的鬥爭，要建立起左派的優勢。

第九節 “朱德批判會”上的主角是劉少奇、周恩來、林彪

一、批判會

朱德夫人康克清在 1986 年 11 月 29 日《解放軍報》上的回憶中有這樣的細節：他參加中央的會議回來，將林彪那個大談“政變”的講話交給秘書，轉身就走。以往，凡是中央的檔，或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同志的講話，他交給秘書時都要坐下來講講該怎樣理解。而這次卻不屑一提。

林彪有關“政變”的講話發表在 1966 年 5 月 18 日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朱德為什麼持如此心境，康克清的會議卻戛然而止。

由許農合主編的《開國元帥的晚年歲月》中披露，似乎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小組會上受到過嚴厲的批判。該書有如下的記載：朱德在小組會的發言中，強調要認真學習馬列著作，學習唯物辯證法。他說：“朝聞道、夕可以死矣。我也有時間讀書了，讀毛主席指定的 32 本書，非讀不可。準備化一二年的時間讀完，連下來讀就通了。毛主席也是接受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他的話還沒有說完，就被打斷了。林彪重新提起他去年在上海會議上關於“頂峰”的發言，攻擊他有野心，是借馬克思主義來反對毛主席。康生也攻擊朱德“想超過毛主席”、“組織上入了黨，思想上還沒有入

黨，還是黨外人士。”

二、朱德批鬥會記錄

在中共中央的檔案館裏，有一份標號為“19660523”的會議紀錄。此份檔記錄了1966年5月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在23日的會議，對朱德元帥的嚴厲批判，即發生在那一天。

地點：人民大會堂河北廳

主持人：劉少奇

朱德首先因為對批判彭、羅、陸、楊持消極態度而被責令作檢討：“我過去的錯誤已經作過兩次檢查，第一次是在高饒問題發生以後，我在會上作了檢討。第二次是彭德懷問題發生後，在軍委擴大會議上作了檢討，那次檢討比較長一點。”

朱德接著又講了他過去的錯誤，即二十年代井岡山上的問題和紅軍第四軍“七大”的問題。張鼎丞、林彪、陳毅、周恩來先後發言和插話。陳毅批判朱德歷史問題的發言很激烈很長。

林彪：彭德懷原來就是聯合這個，聯合那個，犯了這個錯誤又犯了那個錯誤，都是為了個人野心。對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必須徹底揭發鬥爭到底把他搞臭，否則不行。這樣做對你對黨都有好處，這樣，你才可能改好，否則不可能。廬山會議揭發出來這個問題，解決這個問題，是一個很大的勝利。消滅黨的一個最大的隱患。主席幾次講黨有可能分裂，實際就指彭德懷——朱德。廬山會議也考慮到是否要徹底揭開，權衡利害，認為應該堅決揭開，消滅這一隱患，否則會繼續發展，萬一主席到百年之後，就會出現更大的問題。現在揭開，展開堅決鬥爭，保衛總路線，教育全黨，鞏固以毛主席為首的黨

中央，這是全黨全軍全國人民利益之所在。要揭發鬥爭到底，你改也好，不改也好。當然我們是希望你改的。

朱德你是有野心的，你檢討得很不夠。有人當是他自己檢討的，不是的！是黨中央決定讓他脫褲子的，不檢討不行。你們是不知道的，陳毅批評他的並不過分。他也不服毛主席，他想當領袖。高崗事情，他也主張輪流，想當主席，自己本事行嗎？

你一天都沒做過總司令，南昌起義後，是無政府，亂走，是陳毅指揮到井岡山的；遵義會議前是李德指揮；以後是毛主席指揮；抗戰時期在前方指揮（按：也不是朱德指揮）。解放戰爭是主席指揮。你是不行的，但自以為還行。你脫離指揮，下井岡山向南打，三個營損失二個，打敗仗無辦法，還是主席接你回來的。

林彪又把問題引導到彭羅陸楊問題上來：“去年羅瑞卿問題發生以後，在上海會議上他（指朱德）還講，不能講毛澤東思想是世界馬列主義的頂峰，頂峰還會發展嗎？大概頂峰不是毛主席，而是你朱德自己，或者是赫魯雪夫。”

陳毅：“朱德我要問你：你是不是要搞政變？”

朱德：“搞政變我沒有這個力量，也沒有這個膽量。”

陳毅：“我看你是要黃袍加身，當皇帝。你還大力讚揚赫魯雪夫。你野心非常大。”

烏蘭夫：“更奇怪的是他（指朱德）還說，人蓋棺了是不能定論的。我們講赫魯雪夫反對史達林是錯誤的，是修正主義的。他說，咱們同蘇聯還是要搞好，他也離不開我們。”

薄一波：“朱老總經常講蘭花。他說，自古以來，政治上不得意的人都要種蘭花。”

朱德：“說到現在我是不是有野心？我八十歲了，爬坡也要人家拉，走路也不行，還說做事？……事情我是管不了了，更不要說黃袍加身。我對於我們這個班子總是愛護的，總是希望它永遠支持下去。”

周恩來：“反對毛主席我都領導過。甯都會議也是我領導的。雖然弼時同志從後方來了，因為我把毛主席的政治委員代替了嘛。這是我一生最大的錯誤和罪惡。王明路線我也犯了，四中全會我也參加了。所以我最大的過錯是 1931 年到 1935 年遵義會議這四年之長。這是我一生最痛心的事。然後洛川會議，然後王明回來。1937 年底到 1938 年武漢時代，這都是路線性質的嚴重錯誤。當然還有其他錯誤。解放後還犯過反冒進錯誤等等。這幾件事都是朱德同志一起嘛。”

“至於朱德同志的賬那就更多了。從井岡山一直打到梅縣，都是盲動主義，軍閥主義，流寇主義。然後是立三路線，你也犯了。然後是王明路線四年，然後又是洛川會議。那時王明沒有回來，那還不是反對毛主席，你沒有領導？然後王明回來。第二次王明路線一直到六中全會，以後還有一些“殘餘”。幾十年歷史，朱德同志跟張國燾鬥爭，前一半應歸功於劉伯承同志的推動。如果沒有劉伯承同志在那裏，黃袍加身，你頂得住嗎？後一半是賀龍同志，弼時同志，關向應同志的共同推動，才北上了。如果沒有這些，你甚至滑到河西去了。”

“解放以後，那多了。毛主席常說，高饒、彭黃的事，你都沾過邊嘛。你到處發表意見，是一個危險的事。……我們不放心，常委中有這樣一個定

時炸彈，毛主席也擔心。毛主席說過，你就是跑龍套，可是你到處亂說話。你要談話，得寫個稿子，跟我們商量。……所以你是不可靠的，是不能信任的。南昌起義，就是有錯誤嘛。我當著資產階級國家的元首尼雷爾的面說：南昌起義，我有錯誤。他聽了很為驚奇：你還有錯誤？那是錯誤嘛，城市觀點嘛。所以，今天我把我對你（朱德）的不滿告訴大家，希望你們大家監督。”

最後鄧小平宣佈了中央對彭、羅、陸、楊處理的決定，與會者一致通過。

三、值得深思的一些問題

朱德曾是紅軍的司令，林彪只有通過打倒他來建立自己在軍內的最高威信。然而，會議的主持人不是林彪，也不是“四人幫”，卻是“文革”黨內的最大受難者劉少奇。對朱德批鬥最凶最狠的也不是康生和“四人幫”，而是中共至今仍要維持高大完美形象的陳毅和周恩來：他們甚至無中生有地指責朱德“要搞政變”、“要黃袍加身，當皇帝”、“是定時炸彈”。另外，積極參與批判的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們，如薄一波、烏蘭夫、張鼎丞等人，也無一不是後來的文革受難者和中共今天的“革命”元老，和中共有關“文革”造孽者林彪、“四人幫”毫無瓜葛。

看完這個記錄稿，最令人心酸的是八十歲的朱德在林彪和陳毅咄咄逼人的“有野心”、“要黃袍加身，當皇帝”的質問下的囁嚅自辯：“我八十歲了，爬坡也要人家拉，走路也不行，還說做事？……事情我是管不了了，更不要說黃袍加身。”——這點淺顯的道理，難道所有這些政治局委員們都不懂嗎？無疑，他們都是有常識的人。然而，數天前通過的“五·一六通知”中，毛澤東用心良苦地加上了這樣一段話：“混進黨內、政府內、軍隊裏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

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雪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在正睡在我們的身旁。”緊接著，林彪在 5 月 18 日作了“防止政變”的長篇報告。“赫魯雪夫那樣的人物”是誰呢？既然彭、陸、羅、楊都已經都揪了出來，還有誰呢？從記錄稿看來，不管他們是否知道毛澤東筆下所指的“赫魯雪夫那樣的人物”還有誰，他們一定會即刻表現出對毛澤東指示的無條件的擁護，一定會找出或製造出一個“階級鬥爭”的目標來表達他們對最高領袖指示的堅決擁護、聞風而動的。其潛意識中的目的，自然是害別人、保自己。‘

如果說參加那個政治局擴大會議的中共要員們對毛澤東要搞的人一無所知，那也未免太小看這些深諳權術的要員們的智力水準了。據當時的華北局負責人李雪峰回憶，他和與會代表在 5 月 18 日聽林彪的“政變經”講話時便知道矛頭所指是劉少奇：“他沒有點名，但大家都知道是指劉少奇。劉沒有講什麼”。據原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和組員王力回憶，中央的不少人在毛發動文革前就已經知道矛頭所指為劉少奇。陳伯達在他的獄中回憶裏說：“到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我才從毛主席的談話中知道，（整個）戰略部署的鬥爭是對劉少奇的。當時除了林彪、江青、總理、康生、謝富治、汪東興和我之外，幾乎沒有人知道”。由此可見，毛並沒有佈置任何人去批鬥朱德，批鬥者也心知肚明朱德並不是毛所言的“赫魯雪夫那樣的人物”。那麼，為什麼最後還會是他成了眾口一詞的批判物件呢？

從上述記錄稿的開卷說明中來看，批鬥的直接起因是朱德“因為對批判彭羅陸楊持消極態度而被責令作檢討”。這說明兩個問題：一是所有的與會

者，包括後來被打成彭羅陸楊“黑後臺”的劉少奇和鄧小平，都對這一冤案的態度要比朱德無情堅決的多。這正說明瞭黨內鬥爭的毫無人性人情的醜陋風氣：只要某人一“出事”，不管他是誰，不管是自己的老部下還是老朋友，也不管他們之間有多大的情誼，這個人便會即刻成為眾矢之的，人人喊打、頃刻為人敝棄。二是如果有什麼人膽敢“持消極態度”（如朱德那樣）不肯助紂為虐，以鄰為壑、落石下井，那麼這個人也會立刻成為人人喊打的眾矢之的。如果說林彪的“政變經”是為了造成一種發動文[和]革絞肉機所必需的恐怖氣氛，那麼幾乎所有政治局成員對朱德的批判正是大力地推行和蔓延了這種恐怖氣氛，推動了文[和]革絞肉機的轟然起動。

如果從中共黨內派系的角度對批判朱德的政治局成員作一個分析，他們幾乎包括了所有的派系：林彪屬“毛系”，周恩來、陳毅屬“周系”，劉少奇、薄一波、張鼎丞屬“劉系”，烏蘭夫大概算是獨立派系。而朱德也正是最沒有任何派系力量的獨立派系。從這一點上來說，在朱德頭上開刀，是“柿子挑軟的捏”：既可以表達自己對最高領袖毛的忠心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的擁護，又沒有任何在未來派系鬥爭中受到報復的危險性。從這一點上來看陳毅等人的醜惡表演，便不難理解個中奧秘了。另外，在井岡山和紅軍時期的所謂“反毛”錯誤，其實陳毅比朱德要卷得更深。陳毅對朱德所謂歷史問題的“很激烈很長”的發言，以及他多次對朱的極端反常的“黃袍加身”的責問，更包含著某種“先發制人”地歪曲歷史、推卸責任的卑下。從這點上來看，陳毅完全是主動地通過批判他的老戰友朱德，歪曲歷史事實來表達對毛的忠心，來支持文革的發動。如此，毛在文革中一再保陳也就不難理解了。

與陳毅相比，周恩來的政治演技要爐火純青得多了。他對朱德的批判從自己與“朱德同志一起”的“反對毛主席”的錯誤誠懇地檢討起，但兇狠的結論卻是“至於朱德同志的賬那就更多了”。在列數朱德解放後的嚴重問題後，周竟把朱上綱上線為“你是不可靠的，是不能信任的”在政治局常委中的“一個定時炸彈”。值得一提的還有，在林彪作了“政變經”報告的第三天，即5月21日，周便做了一個堅決支持，“完全同意林彪同志講話”的報告。除了在報告中積極鼓吹對毛的個人崇拜，他還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來大談“保持晚節問題”，並主張把剛受到戚本禹批判的已故的中共早期領導人瞿秋白打成“叛徒”，提出非常極端的主張：掘掉瞿在八寶山的墓地。周說：“戚本禹同志寫文章批判過瞿秋白，不因為他死了就是烈士，我提議把瞿秋白從八寶山搬出來，把李秀成的蘇州忠王府也毀掉。這些人都是無恥的”。由此，導致了紅衛兵的毀墓暴行。周對朱德的痛下針砭，正是他向毛又一次表示了對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堅決支持。

與林彪、周恩來來相比，劉少奇及其他一系的幹部在朱德問題上的表演具有更大的悲喜劇性。文化大革命明明是毛要打倒他並清洗他一系的幹部，卻要由劉來主持最終走向打倒他自己的會議。在同一天裏，劉少奇和鄧小平毅然通過了斬掉作為自己的左臂右膀的“書記處”（彭、羅、陸、楊大都為書記處書記）的中央決定。劉的幹將薄一波竟然還把朱德種蘭花都胡說成是政治問題。那麼，為什麼劉要這樣做，難道他一點都看不出毛的真實意圖嗎？劉的政治經驗和權術水準決不在與會者之下，他決不會沒有一點感覺。但縱觀歷史便不難明白，劉對毛的攻擊一貫採取犧牲他人和以比毛更為極左的殘酷鬥爭去迎合的“禍水他引”的策略。六十年代年的“四清”運動，毛對他

不滿，劉便立刻搞出“桃園經驗”，搞得比毛還要左的多。1966年7、8月份的派工作隊，也是想用整基層幹部和所謂的“地富反壞右”來換取他對運動的控制權。他和鄧小平拋出彭、羅、陸、楊，主持對朱德的批判，都是為了支持文革、犧牲別人去填飽毛澤東發動的政治絞肉機。一言以蔽之：害別人、保自己。

與劉鄧相比，政治局中唯一的少數民族（蒙族）成員烏蘭夫的表演和下場具有更快更慘的悲喜劇性。在批鬥朱德的前一天，他參加了剛開始的中共華北局“前門會議”。會議自5月22日開始，至7月25日結束，歷時64天，李雪峰受中央委派主持會議。自治區黨委成員、各盟市書記，區黨委各部委、直屬機關黨政負責人，部分旗、縣負責人，共計146人出席會議。7月2日，劉少奇、鄧小平故伎重演，代表中央對烏蘭夫進行了極其嚴厲的批評。此二公以“五一?六通知”為綱，指斥烏蘭夫不搞階級鬥爭，犯了地方民族主義和修正主義的嚴重錯誤。把他打成繼彭真後的又一個省委書記級的“赫魯雪夫那樣的人物”。不久，在劉鄧的指示下，7月底由華北局起草的《關於烏蘭夫錯誤問題的報告》呈送中共中央。報告“根據揭發出的大量事實”，確認烏蘭夫有五大錯誤：

- 1、反對毛澤東思想，另打旗幟，自立體系
- 2、反對階級鬥爭，反對社會主義革命
- 3、對修正主義卑躬驅膝
- 4、以《三五宣言》為綱領，進行民族分裂活動，搞獨立王國
- 5、安插親信，篡奪領導權。報告給烏蘭夫的結論是：三反分子、民族分裂分子、修正主義分子，內蒙古最大的走資派，埋在黨內的一顆定時炸彈——

他的罪行要遠遠超過他批判的朱德。從此，烏蘭夫從中國的政治舞臺上消失了——他開始了漫長的、與世隔絕的軟禁生活

然而，那些所有不懂得唇亡齒寒的基本道理的人，那些一心只想無原則地犧牲別人來換取自己生存和騰達中共領導人們在文革中很少善終。劉少奇和鄧小平剛把彭、羅、陸、楊和烏蘭夫打成“反黨集團”，自己一瞬間卻變成了“反黨集團”的總後台。劉慘死得連被火葬時都只能用“劉衛黃”的假名。陳毅在所謂的反“二月逆流”中被張春橋等人反復用他想推給朱德的“歷史問題”狠整，在中共九大的小組批鬥會上被王洪文、徐景賢、王秀珍等人翻開歷史老賬，批得“呼赤呼赤吐著氣”、“顛巍巍”、“灰溜溜”。最後在比朱德更為鬱鬱不得志的情況下患癌症逝世。周恩來機關算盡，最終也還是沒有得到毛的完全信任。也是在毛的新貴——“四人幫”的一片含沙射影的“批大儒”的圍剿中患癌症辭世。林彪在發動文革上充當了毛的第一號打手，也曾位極人臣，當上了“接班人”，但最後還是被毛猜忌，被迫為保命倉皇出逃，落了個折戟沉沙的下場……

至於薄一波，也只是有權批判別人不到一年：1967年3月便被毛定為“叛徒集團”為首份子，十年文革差不多坐了九年牢。而事實真相卻是，1936年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等人的自首出獄是得到中央批准和毛的首肯的。而毛在30年後公然出爾反爾，為了打倒劉少奇而把他們打成了“叛徒集團”。

如果說這份緊鎖在中央檔案館裏的記錄稿說明瞭什麼，那麼最能說明的一是歷史真相，二是歷史教訓。這個不幸而痛苦的歷史真相是：中共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們”從來就沒有人反對過毛澤東發動宣導的文[和]革和任何

一種殘酷的“階級鬥爭”。有的只是在毛最高獨裁者面前的爭先恐後的表忠心和比賽他們的“革命性”。更為醜陋的是，這種表忠心和比賽“革命性”的行為是以出賣和犧牲戰友、朋友、親人和無辜者為必要前提的。可悲的是，這種毫無原則的“害別人、保自己”的行為，在中共黨內已由恐懼到麻木，由麻木到蔚然成風、最後到了見怪不怪集體無意識的地步。

說到歷史教訓，從這一歷史真相的記錄中人們所看到的“文革”的發動完全是一種積極推動革命絞肉機發動又不希望自己成為絞肉機中的消極犧牲品的集體合力，這種集體犯罪並不一定時時是有意識的，但最可悲和最可怕的正是作為這種醜陋之風盛行底基的無意識狀態。這種集體無意識的一種非常特殊的表現，首是在於“害人者”和“受害者”在角色上的差別性和在意識形態上和對所謂的黨內鬥爭的認知上的一致性。中共研究劉少奇的黨史專家張化在分析劉為什麼在文革發動期主持那些最後導致打倒自己的會議時指出：“從‘文化大革命’發動前後劉少奇的思想狀況來看，這場‘革命’與他思想中的某些認識存在著相通之處，這構成了他接收‘文化大革命’的思想基礎。”張化進一步指出了諸如“擁護開展反修防修運動”、“誇大階級鬥爭”和“開展奪權鬥爭來解決基層問題”等三條。當然要補充的是：劉少奇所宣導的所有文革式的“階級鬥爭”是只準備殘酷地鬥爭別人的。歷史的邏輯向他設想的反面走去：他所支持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卻最後殘酷地鬥死了他自己。

在李雪峰回憶 1966 年 5 月的政治局會議上發動文革的文章裏還有這樣一個細節：彭真是所謂“彭、羅、陸、楊反黨集團”的首要，他非但在表決把他打成“反黨分子”的“五一六通知”時舉手贊成，還大聲和人爭論誰在歷

史上對毛“第一個喊了萬歲”（意下指他自己）——彭面對毛對自己一手製造的冤獄，沒有半點正面的抗爭，卻死到臨頭還要爭獻媚骨。這已經不是一種自保，而是一種自戕了。

做這一如是觀，如果不進行政治改革，文革式的悲劇在中國是一定還會以各種各樣的形式重現的。

第十節 劉少奇在中共中央召集的民主人士座談會上的講話

1966年6月27日下午4時，人大會堂安徽廳

鄧小平（主持人）：

中共中央今天約請在座各位同志、各位朋友，談談大家關心的問題，談談我們黨內發覺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幾個同志的問題。大家已經看了黨內的五個檔，大家都關心文化大革命的問題，現在就請劉主席同大家談這個問題。

劉少奇講話：

最近，在我們黨內鬥爭中，揭露了幾個負責人的問題，從性質上講，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是嚴重的事件。這個事件，不僅影響到我們黨內，而且影響到黨外，影響到我們的國家、我國的人民，可以說就是我們黨和國家的重大事件。這就是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事件，進行地下活動、陰謀活動、反黨活動的事件。因此，應當讓我們各位黨外民主人士，各民主黨派，無黨派的負責人，知道一下黨內的這個情況。前幾天，徐冰同志已經同各位談了，並將黨內的五個檔送各位看了，各位也舉行了座談。今天我就檔中的某些重要方面的情況談一下。

不論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這四個人都是掌握我們黨和國家要害部門的負責人，要害都掌握在他們手裏。他們在黨內，在人民中間，都有一定的影響。

彭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鄧小平同志不在的時候，實際上他又是付總書記，他還是北京市的市長、市委第一書記，人大、政協他也都有負責的位子，並且也參加了不少國際活動，經常參加黨和國家的核心領導，他雖然不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卻經常參加常委會議。公安、政法，書記處分工由他管，人大常委、公安、政法方面（徐冰：還有統戰部）的事務，都歸他分管或是插手管的。彭真有些工作能力，但有許多缺點，過去也犯過不少大的錯誤，他有濃厚的宗派情緒，長期地進行了宗派活動；他沒有自我批評的精神，有架子；他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是不大懂的，又不大去研究。在歷史上他犯過盲動主義的錯誤，在晉察冀犯過王明路線的錯誤，兩次王明路線錯誤，他都有份；在解放戰爭中，在東北，他也犯過錯誤；全國解放以後，在參加領導的活動中，他在重大問題上，提不出解決問題的意見，創造性的意見也提不出。對彭真，我們批評過他，毛主席也曾多次地批評過他，我們是要把他培養成為黨和國家的領導人，對他基本上也是信任的。這幾年來，他濫用了對他的信任，極力培植他的私人勢力，他同毛主席、同我們搞兩面派，背著毛主席、黨中央進行了不少地下活動，與羅瑞卿、楊尚昆有密切關係，有些地下活動是聯合搞的；與陸定一也有密切的聯繫，例如北大四清，最近在文化大革命上與毛主席對抗，就是和陸定一共同搞的。彭真對城、鄉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實際上也是反對的、抵抗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是當前偉大的、深刻的社會主義革命，彭真是堅決反對的，

他極力把運動拉向右邊去，拉到與毛主席思想相反的方向去。對文化大革命，對城鄉四清運動，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實際上也都是反對的。這是這幾個人的共同點，就是說，當社會主義革命繼續深入到當前緊要關頭，他們就過不去了，他們就不能不出來，採取各種方式進行反抗。彭真在文化大革命中，採取了各種非法手段，玩了那麼一些小手腕，這從“大事記”中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他迫不急待地用非法手段來反對毛主席，反對文化大革命方針。這不是偶然的。這件事情上，暴露了他們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本質。彭真在城鄉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上，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也是很猖獗的，他極力爭奪領導權，反對群眾的革命運動，包庇壞人壞事，他對主席親自主持的“二十三條”，表面贊成，實際抵制。他在河北廳的幾次講話，都不是“二十三條”的精神，相反，他是要按照《前線》發刊詞辦事，以發刊詞來領導運動。有人講，每年要學習一次發刊詞，有人講，工作隊隊員要人手一冊。這個發刊詞，是不講階級鬥爭的。這是彭真的綱領，他要以發刊詞來代替“二十三條”。華北局派工作隊到北京，參加四清運動，都被他趕走了，有的地方，四清搞得好的，北京市委卻去翻案，進行打擊、報復。因此，北京市多數單位的四清是搞得不好的。當然還要調查一下，看看究竟有多少是基本好的，多少是基本不好的，但就現在已經發現的，都證明是壞的。北京是個獨立王國，老虎屁股摸不得，誰也不能批評，別人是不能插手的，我去插手也不行。針插不進，水潑不進。在彭真領導下，北京違反中央政策，違法亂紀的事是不少的。彭真參加了一些國際反修鬥爭，我和鄧小平同志出去，都帶他一道去的，是想在鬥爭中培養他，但他在多次鬥爭中，我們親身看到，都是提不出什麼意見的。我們中央寫了許多反

修文章，是康生主持的班子搞的，文章發表以前，我們看過，也都送彭真看，他也是提不出什麼意見的。反修鬥爭，只有一次是由他負責，當團長，參加了布加勒斯特會議，同去的還有康生、伍修權同志。這是一次激烈的鬥爭會，那時中央每天都有一個電報指示去，抓得很緊，還有其他一些同志的幫助。但是就是在這次會下，他也是表現得不夠堅強的，是比較勉強地去進行鬥爭的。還有一次，由他帶隊，代表黨中央去參加印尼共四十五周年紀念會，他沒有履行黨中央討論的任務，卻用了絕大部分時間去拜訪印尼政府的負責人、拜訪蘇加諾，對黨的活動不積極參加；他在印尼共馬列主義學院的演說，內容是好的，但那篇東西，是北京草擬好帶去的，我也看過（康生：他也是沒有提過一點意見），不是他寫的。他在同外賓接觸中，有多次講話是喪失立場的，送外賓禮品，外交部是有規定的，但他代表北京送的禮品，卻超過了黨中央主席、國家主席和總理，表現了北京的特殊地位。我和周總理合送三千，他卻送四千、五千、甚至五千、六千。彭真上實際上是反對毛主席的，他在幹部中多次講，毛主席犯了許多錯誤。他也反對黨內外幹部學習毛主席著作，全國掀起學習毛主席著作高潮，各省、市委作出了學習毛主席著作的決定，中央批發了，到今年年初北京市委才不得不也作出了學習決定的通知。彭真不接觸群眾，不接觸實際，喜歡搞個人突出，他在相當長的時間裏，就反對周總理，也反對陳毅、小平同志，也反對我。在我面前搞兩面派，當面一套，背後一套。彭真是長期隱藏在我們黨內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者。在階級鬥爭深入到當前階段，他就不能不站出來，反對毛主席思想，這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在階級鬥爭的緊要關頭，各個階級的代表人物都要站出來表演，表現自己，頑固地反映本階級的利益。

這是他們的本質決定的。

羅瑞卿是軍委總參謀長。國防部部長是林彪，但林彪長期生病，經常工作實際上是由他來做的，可是他還是不滿足。林彪同志雖然有病，也還管些事，研究一些問題，講幾句話。林彪同志在軍隊裏威望比羅瑞卿高得多，他講話，大家都照辦，這就觸犯了羅瑞卿，認為幹擾了他。他不願意讓林彪同志“幹擾”國防部、總參謀長的工作，因此，林彪講幾句話，他就跳起來了，他要林彪把國防部長的位子讓出來；他長期不把國防部的情況向林彪同志報告，別人去向林彪同志彙報，他反對；林彪同志找人談話，他也反對，甚至採取了惡劣手段反對林彪同志，可以說是虐待一個病人。他還反對黨的軍事路線，毛主席在軍事問題上，有一套完整的路線，林彪同志和毛主席的軍事路線是一致的，並且有些發展，羅瑞卿是反對主席、林彪軍事路線的。林彪同志提出突出政治，他反對突出政治，要突出軍事、突出技術，或者政治、軍事、技術都要突出，有人批評他是折衷主義，實際上就是反對突出政治。他實行的是資產階級的軍事路線。此人盛氣凌人，鋒芒畢露，對老的元帥、老幹部，都加以打擊，他是專搞一言堂，不聽別人的意見；他到處伸手，干涉地方工作；到處突出個人。羅瑞卿問題是在去年十二月揭露出來的，並作了處理，是毛主席親自處理的。處理以後，在今年二、三月間，召集了幾十個人，有地方、軍隊幹部參加的會議，進一步討論羅瑞卿的問題，他在會上講了一次話，大家不滿意，沒有讓他過關，此時他就在自己住的三層樓跳樓自殺，受了點傷，沒有死，現在住在醫院裏。本來，自殺要有點技術，應該是頭重腳輕，他卻是腳先落地，腳壞了點，頭部沒有傷。（鄧小平：就象女跳水運動員那樣，跳了一根冰棍）他的這種行動，是對抗情緒，是嚴重地對

抗黨，對抗同志們的批評。在這次會議作出決議的過程中，發現了彭真的問題，彭代表中央參加處理羅瑞卿問題，但彭真在作結論時，在關鍵問題上，包庇了羅瑞卿，這暴露了彭真、羅瑞卿之間的不正常的關係。

陸定一的問題。首先是從陸的老婆嚴慰冰反革命案件上的暴露的。嚴慰冰是嚴樸的女兒。嚴樸在大革命時期參加了革命，很早就離開了家，他家是個大地主。抗戰時期，嚴樸的老婆帶了女兒到延安找嚴樸，嚴樸沒有見他們。嚴樸是個好同志，現在已經死了。嚴慰冰的反革命案件，兩年前就發現了，當時我們懷疑陸定一是否知道她的反革命活動。這事是交給彭真去處理的，因為這是一個具體案件，我們沒有直接去處理。兩年以來，嚴慰冰的反革命活動越來直猖獗，她打入黨內，探聽林彪同志的行蹤，林彪同志什麼時候到什麼地方，住在那裏，這些事我們都不太清楚，但是她都打聽得清清楚楚。嚴慰冰跟著陸定一，參與很多黨內機密，知道很多事。幾個月前，要彭把嚴慰冰的材料告訴陸定一。而陸定一回去卻把情況全部告訴了嚴慰冰，並用多種方法來包庇嚴。最近已把嚴慰冰這個反革命分子逮捕了。根據各種材料判斷，陸定一是知道嚴的情況的，陸嚴是合謀的，許多事陸定一如果不告訴嚴慰冰，嚴是無法知道的。

陸定一當中宣部長的時期相當長，我們黨的宣傳部不宣傳毛澤東思想，卻反對宣傳毛澤東思想。別人宣傳毛澤東思想，陸定一也反對。全國工農兵學習毛主席著作，學習毛澤東思想，取得很大成效，工農兵學哲學，寫了許多很好的文章，這些文章關在屋子裏是寫不出的，沒有實際鬥爭經驗，也寫不出來。陸定一反對工農兵學哲學，楊獻珍也反對，他們對工農兵哲學是看不起的，冷嘲熱諷，說什麼“簡單化”、“庸俗化”、“實用主義”等等。

陸定一還反對毛主席著作進課堂，教科書上也是不許寫的，長期反對毛主席的文藝路線，同彭真一道反對文化大革命，右派寫的文章不積壓、不審查、也不用批准；對左派的文章就要審查，一審查就沒有下文，長期扣壓左派寫的文章，有的一壓好幾年，打擊左派。他們對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政策，是只許右派放，不許左派放。一九五六年赫魯雪夫上臺後，陸定一多次同外國人、中國人談話中都是大反史達林，不反赫魯雪夫。這是這個人的特點。史達林有缺點錯誤，但重點不應該反對史達林，而應該反對赫魯雪夫；陸定一反對教條主義，不反修正主義；反對宗派主義，不反投降主義；從來是反左不反右。這些問題上，他從來不請示，就是一個人在那裏搞。他對康生同志搞的反修文章是不提意見的。作為副總理，對文教口卻不大管，但副總理是要當的。

楊尚昆是黨中央辦公廳主任，當了二十多年，掌握全黨的機密文件，各種重要的事情。近來發現他把黨內重要機密、核心機密文件，讓不少人抄走了，有幾萬件，不請示中央就讓人家抄走了，到底抄到什麼地方去了，不知道，是否出國了，很難講。現在還查不清楚。楊尚昆歷來是反對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的。毛主席鑒於蘇聯的經驗和外國的經驗，多次決定：不論黨內、黨外、對中國人、對外國人都一律禁用竊聽器。搞這些東西黨內緊張，黨外也緊張，外國人也緊張。（鄧小平講：搞竊聽器，盡聽一些小話，結果是自己上當，大方向要看清楚，不要靠聽小話。）我們到外國去，在室內就講相反的話，真正的話是不那裏講的。歷來黨內是禁止用竊聽器的，楊尚昆在五八年以前，中央開會楊是公開安裝答錄機錄音，後來禁止了，他就秘密的搞竊聽器。五九年毛主席發現了，再一次加以禁止，他還是不聽，仍然背

著主席搞，我們常委開會、談話，甚至毛主席坐的火車上他都裝了竊聽器，我們常委幾個人的談話他都知道。一九六一年又給毛主席發現了。搞這事他一個人搞不了，總還要別人來按裝，要有人收聽，還要放。事情暴露後，毛主席就要嚴加追查，是誰搞的，就要開除誰的黨籍。這時楊尚昆就把機要室的主任、副主任推出來承擔責任，說他自己不知道。最近發現在毛主席辦公室按裝的竊聽器就是楊尚昆指示的，這事就不簡單了，就成為政治問題了。這不是一般的紀律問題，是嚴重違反黨紀和國家綱紀的。最近讓楊尚昆隔離反省，要他交代這個問題，楊尚昆是犯了罪的。今後有些會議，要公開錄音的，都要經過請示，批准；按竊聽器是絕對不允許的，任何情況下也一律禁止。

彭、羅、陸、楊他們的互相關係是不正常的，到底是什麼關係，達到何種程度，我們組織了審查委員會，正在進行審查。他們共同特點是反對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都是搞地下活動的。他們的企圖不是個人要點什麼東西，而是企圖根本改變我們黨和國家的根本路線、根本政策，要按照他們的路線辦事，要按他們的面貌改造黨，改造全中國，企圖在中國實現修正主義政策，也就是復辟資本主義的政策，如果他們的企圖得逞，就可能實現政變。

最近世界上不是政變成風嗎？亞非拉地區自六零年以來發生六十多次政變，其中有五十多次搞成功了。有些國家的領導人被殺了，有的被趕走了，有的被推翻了，有的當了傀儡。社會主義國家，赫魯雪夫就是用政變的形式上台的，波匈事件，保加利亞、捷克等也都是政變性質。

彭、羅、陸、楊事件是有發生政變的可能的，這是激烈的、國際、國內階級鬥爭在我們黨內領導機關的反映。如果他們政變成功，我們的國家就要

變顏色。主席前幾年同羅瑞卿、賀龍同志講，我們國家是否會變顏色，如果發生政變，會不會把我們也抓起來？賀龍同志當時聽了傻了。不要以為政變是沒有可能的，是有這種可能的。當然如果他們搞政變是不可能成功的，特別是毛主席還健在的時候。這次彭、羅、陸、楊還來不及搞政變，就被揭露了。這次事件的揭露是黨和國家的偉大勝利，是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從階級鬥爭的觀點來看，黨內發生這類事件不足為奇，是正常的現象。解放後，黨內發生大事件有三次：高崗、饒漱石；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這次是第三次。歷史上也有過。過去發生過，以後還會發生，不發生那才奇怪。是好事還是壞事？我看是好事。少數人從領導崗位上撤下來了，可以教育千百萬用毛主席思想武裝的無產階級革命家，黨和人民的力量不是削弱了，而是大大的加強了。

現在黨內外，有人覺得發生這類事件不可理解，他們地位相當高，待遇也不錯，權力也很大，為什麼還要這樣做。從個人來說，是可以不搞了，但是從階級鬥爭的觀點來看，是正常的，不奇怪的，階級鬥爭是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他們為什麼要搞，是他們的階級要他們搞，他們錯誤估計了形勢，到一定時候，就要站出來。在當前階級鬥爭形勢下，國內的、國際的反動派要想在中國得勢，必須在黨的各級領導中找他們的代理人，美國在找，蘇聯也在找，國內的反動勢力也在找。黨內一些階級立場不穩、沒有改造好的，鑽到黨內剝削階級代表人物，在一定條件下，一定溫度之下就要站出來，同我們進行鬥爭。這是階級鬥爭客觀規律，是不由自主的。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是不能停止的。有了大陸就可以不要臺灣？！中國革命勝利就不要世界革命？！你不搞，人家要搞你，反動派要搞你，非鬥不可。蘇聯赫魯雪夫不搞

世界革命，搞和平共處，美國高興，但是到最後美國還是不會饒過蘇聯的。帝國主義之間還要打仗，帝國主義同修正主義就會搞得那麼好、那麼一致，是不可能的。階級鬥爭是不可避免的。你不搞世界革命，世界的反革命就要搞你。這是階級鬥爭的規律。我們一定要堅持無產階級的立場，階級鬥爭高潮過去，會有低潮，但以後還會有更大高潮。階級鬥爭是不能停止的，一直要到消滅一切階級，階級差別也消滅，不然總是沒有完，停止不了的。不論你地位高也好，不高也好，階級鬥爭是你死我活的鬥爭。結果只有兩個，要麼是革命的打倒反革命，要麼是反革命打倒革命的。彭、羅、陸、楊事件就是這樣，要麼是他們推翻毛主席，推翻我們，要麼是我們把他們推翻，和平共處是不可能的。我們黨內發生這種事解放後有三次。辦法只有把他們從領導崗位上撤下來，用剝筍政策，剝筍政策是大革命時期鮑羅庭提出的，搞國民黨右派要一層層剝掉，剩下一個筍心。你不剝他，他就剝你。把那些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分子剝掉，這是一個好辦法。剝不掉，他就要上臺推翻我們，改變政策。一年多前毛主席對地方上、軍隊的一些同志說，假如黨中央搞修正主義，你們怎麼辦？修正主義在中央占了優勢，你們怎麼辦？這是一個新問題，當時他們沒有準備，不好回答。毛主席說，中央實行馬列主義政策，應當擁護，如果實行修正主義政策，你們可以造反。歷史上造反的事情多得很，修正主義要把中國統一，是很困難的，不容易的。結果只會有二個，辦法只有剝筍政策，剝不掉，搞修正主義，就應當造反。

有這麼一個問題，彭、羅、陸、楊搞政變，如果成功了，要各民主黨派出來擁護，你們怎麼辦？他們占了優勢，你們怎麼辦？這是個難問題。從中國的形勢看，大概是這樣，各民主黨派自己來搞政變是不可能的，談不上的

(陳毅同志插話：章伯鈞、羅隆基是想搞政變的，但是沒有力量)，是沒有力量，搞不起來的。但是我們黨內有人搞政變，他們搞的政變，合你們的心意，與你們是一個味道，他們要你們擁護是可能的。我勸各位提高警惕，不要上當。你們如果同他們搞在一起，他們被消滅了，你們的結果是同歸於盡。在這個問題上是不能輕易表態的。

識別他們是馬列主義還是修正主義是不容易的，因為他們是打著紅旗反紅旗，表面上是紅旗，他們講的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講的是社會主義，搞的是資本主義的一套（鄧小平說：赫魯雪夫也是這樣，擁護列寧反對史達林）。識別他們是有些困難的，但是是可以識別的，需要站穩無產階級立場，無產階級立場就是站在全國最大多數人民的最大利益的立場上，不是某一個黨派、某一個階級的利益。站在最大多數人民的最大利益的立場上看問題、想問題，就可以識別。如果站在某一個階級的立場上，特別是資產階級立場或小資產階級立場上就可能看不清，識別不清。特別是迎合你們的某些需要，就會被迷惑更看不清了。站在最大多數人民的最大利益的立場上，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運用階級分析的方法，就可以識別那些違反最大多數人民的最大利益的反黨分子的面目。因此，彭、羅、陸、楊事件不是說同各位沒有關係，不是說同各黨派沒有關係，你們是贊成還是反對，是擁護還是造反，要不要表示態度，在這個問題上是增加了你們自己的責任。黨內發生這個重大事件，各位是很關心的。

這次大革命在歷史上是空前的，來勢很猛，對資產階級，封建階級的文化來了一個很大的衝擊，最後是要摧毀，消滅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建立無產階級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這是很廣泛的革

命，不是一下可以做到的，是個長期的鬥爭過程。但是這是大革命的群眾運動，有了這個大革命運動可以來個突變，來個大的變化。有不少黨外朋友擔心這個問題。這次文化大革命反對的重點，是反對黨內的反黨、反中央、反毛主席、反毛澤東思想的當權派，彭、羅、陸、楊都是黨內的，陸平是黨內的，蔣南翔也是黨內的，清華大學的運動起來後，他壓制民主，怎麼能壓制的了。黨外也有這種當權派，不論是幕前、幕後的也必須反對。但是黨外的當權派實際上不多，在幕後的恐怕多一點，我們在城鄉四清運動中，搞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追到幕後，就是地、富、反、壞、資本家和小業主。黨外的當權派是幕前的少，幕後的多，總起來講為數不多。有些人的資產階級世界觀沒改變，不知不覺地放了一些毒也要批判，進行幫助，不是重點，對他們還是採取團結——批評——團結政策，團結、教育、改造的政策。資產階級、封建階級的世界觀要改變，但不能太急。在這次大革命的群眾運動中，只要你不對抗群眾運動，在運動中認真考慮問題，可能會改變得快一些；有些人的世界觀是固定了，不能改變，只要不是系統地反黨反社會主義，在這種情況下，就不作為重點人物批判。批判的方式也要考究一些，要採取幫助的態度，團結的態度，善意的態度。如對資產階級的學術觀點要批判，但不能同批判鄧拓、陸平一樣。你們關心文化大革命，恐怕主要就是關心這點：怕搞到自己頭上，是不是都一樣的批判。可能有些中學生、大學生亂搞一氣，但他們以後也會懂得的。聯繫到資產階級權威的問題，有黨內的，也有黨外的，翦伯贊、吳晗是黨內的，還有是黨外的。黨內權威統治了學術部門、統治了一個系的情況，要改一改，不要再壟斷的。不論中國和外國的，封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文化、舊文化，作為體系是必須徹底攻破；但在這些

文化中間，對今天人民鬥爭有些有益的東西，還應該吸收過來，做為無產階級的新文化的養料。對中國和外國歷史上的一切舊文化，進行研究是必要的，不研究就不瞭解。但是，必須在徹底批判分析後，才能吸收有用的精華。不徹底批判，對什麼要吸收，什麼要揚棄就搞不清楚。同時，必須創造性地建立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新文化。僅僅吸收舊的是不夠的，無產階級還必須有很大的創造。要把舊的吃掉、消化，好的吸收，不好的揚棄。馬克思主義就吸收了人類歷史上一切好東西，毛澤東思想也是這樣。要在馬列主義體系的基礎上向前發展，吸收舊文化中有用的東西。無產階級革命，不僅要消滅一切剝削階級，而且要消滅一切階級差別，工農之間的差別，城鄉之間的差別，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之間的差別都要消滅。剝削階級的文化也要消滅，要吸收有用的東西，創造新的東西，搞徹底的革命。當然不是斬斷歷史，否定一切，這是很長的歷史時期的鬥爭，要同消滅剝削階級，消滅三個差別，同時並進。京劇現代戲、沙家浜、紅燈記、芭蕾舞白毛女、紅色娘子軍，就吸收了好的東西，如唱腔，動作，基本功等。芭蕾舞是外國的，是從來不敢動的。中國的兩個芭蕾舞就搞的不錯，這是開始，是成功的典型，發展前途是無限的，遠大的。

毛澤東思想確確實實是當代馬列主義的頂峰，是國內、國際階級鬥爭最新的總結。毛主席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的發展了馬列主義，不論在哲學、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建設、無產階級革命方面，都把馬列主義發展到完整的新階段，最高的階段。毛澤東思想和馬列主義是同一個體系，是在馬列主義體系上發展起來的。馬克思曾經說過，他的思想體系還會有發展，還沒有完結。馬克思死了，列寧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體系，形成了列寧主義階

段。在列寧以後，毛澤東發展了馬列主義思想體系。馬列主義有三個階段，即馬克思主義階段，列寧主義階段，毛澤東思想階段。這是世界性的。當然還要繼續發展，不是到毛澤東思想階段就為止了，如果這樣，就是機械唯物論。毛主席親自經歷的國際、國內重大事件，比馬克思、列寧多得多，鬥爭激烈多得多，也偉大的多得多。當然馬克思、恩格斯是偉大的人物，馬克思活了六十四歲，恩格斯活了七十五歲，他們繼承了人類一切先進思想，創造性地建立了無產階級革命的思想體系，有很高的預見，預見到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前途。但是，馬克思、恩格斯沒有親身領導無產階級革命取得勝利，就去世了，沒有同毛主席那樣親臨前線指揮重大政治戰役和軍事戰役。列寧活了五十四歲，在十月革命後六年就死了，他是了不起的天才，也有很高的預見，他的著作是不朽的。但是，列寧也沒有經過同毛主席經歷的那樣的長期的、激烈的，複雜的多方面的鬥爭。中國人口比德國多十倍，比俄國多三倍，中國革命的豐富經驗，是任何一個國家超不過的。我們是經過各種事變，勝利，失敗，再到勝利，既打國內的敵人，又打國外的敵人，有公開的鬥爭和秘密的鬥爭，同修正主義和半修正主義的鬥爭。毛主席天才地總結了中國革命的經驗，也總結了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無產階級專政勝利和失敗的經驗，提出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階級鬥爭學說，這是完全新的理論，它指導著中國勝利地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也指導著世界革命鬥爭。

現在我國工農兵群眾、革命幹部、革命知識份子，學習毛主席著作運動取得了重大成功，證明毛澤東思想一旦為革命群眾所掌握，就化為極為巨大的物質力量，這是可以看得到的。中國億萬人民學習毛主席著作，正在改變

我國人民群眾的面貌，就是用毛澤東思想，發展了的馬列主義來改變人民群眾的精神面貌。說工農兵不能學理論、哲學，這完全是書生的話。工農兵寫的文章，你們寫不出，我也寫不出，沒有豐富的經驗，不經過反復實踐，是寫不出來的。學了而且要用，要經過多次失敗，成功，最後才能成功，寫出文章，用毛澤東思想解釋一切。山西的解悅是個細紗女工，寫了一篇哲學文章，這樣的文章工農兵喜歡看，我也喜歡看，文化水準不一定高，小學畢業就可以，不識字也可以，文盲的記憶力就很好，我們是把事情記在本子上，他們是記在腦子裏。廣大群眾的精神面貌，就有可能儘快地改變我們國家和社會的物質面貌。現在是否可以說，少數人壟斷文化、理論、知識的時代已經過去。在房子裏搞東西，總是要錯誤百出的。毛主席著作有許多特點，其中一個特點，就是用工農兵的語言，通俗的語言，寫出馬列主義高水準的理論著作。毛主席說，馬列主義的通俗化是個大問題。通俗化是從史達林開始的，史達林的文章比較容易看，但是毛主席的通俗化比史達林更進了一步，把毛主席著作給工人、貧下中農一念，他們一聽就懂，不識字也懂，因為是代表他們講的。（陳毅：毛主席著作沒有學生腔。）知識份子故意把文章寫的人家不懂，好象人家一懂就水準不高了，這個問題在許多人的思想中還沒有解決。很高的理論水準，又能為大家很容易理解，這二者的統一，許多人還沒有解決。毛主席很好地解決了這個問題，單憑這一點就值得我們學習。少數人壟斷文化知識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廣大工農兵群眾、革命幹部、革命知識份子掌握文化、理論知識的時代已經到來了。十月革命以後，馬列主義在全世界普及，但就其規模深度講，沒有象中國人民學習毛主席著作這樣普遍深入。我們國家的文化、理論將出現一個繁榮的時代，這是可以預料到的。

由此再聯想到那些講工農兵學習毛主席著作是“簡單化”、“庸俗化”和“實用主義”的人，會認識到應當把他們打倒。這樣，要搞修正主義，要反對毛澤東思想，對毛澤東思想採取陽奉陰違的態度，企圖篡黨，篡軍，復辟資本主義，就不可能得逞了。因此，這是防止修正主義，反對修正主義的根本條件。

我們現在擁護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之後也擁護毛主席。毛澤東思想要延續下去，毛主席著作應該成為全國人民的教科書，成為全國人民的行動指南，全體黨員的行動指南。毛澤東思想是人類的燈塔，是世界革命的銳利武器。毛澤東思想能改變中國的面貌，也能改變世界的面貌。我們用毛澤東思想戰勝了一切反黨分子，也能戰勝國內一切反動派，也能戰勝國外一切反動派。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什麼時候召開，已經延期一次了，上半年是開不成了，文化革命搞的大家抽不出時間來，勢必要延期。（康生同志：這是全國最大的民主。）改到什麼時候開，人大常委可以討論，是下半年開，還是明年開？可不可以改成不定期？憲法規定一年開一次，有時多開，有時少開，戰爭來了也可能幾個月開一次，有時幾年不能開，這個問題請各黨派交換意見，什麼時候開現在不定，請人大常委決定。（完）

小平：

兩件大事，劉主席講了。彭、羅、陸、楊問題的揭發是黨和人民的大事，在某種意義上講，比高、饒事件，彭、黃、張事件更大。這是正常的現象，是健康的現象，用剝筍的辦法，是健康的現象。這樣理解，就不會憂心忡忡了。文化革命才開始，連我們自己也還要經歷新的改變，高校招生將用選拔

與推薦相結合的辦法，就是改變。我們還要不斷的接觸新的事變，都會接觸到各階層，要經常引起內心的鬥爭和社會鬥爭，很值得大家研究這些問題。根本觀點是要從最大多數人的最高利益來考慮問題。

第十一節

鄧小平、周恩來、劉少奇

在北京大中學校師生文化大革命積極分子大會上講話

(1966. 7. 29)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九日，北京市委召開全市大專院校和中等學校師生文化大革命積極分子大會。

鄧小平在會上說：

同志們：

我以中央工作者的名義講幾句話。現在市委宣佈從大專學校撤走工作組，必須說明，在北京新市委成立以後，以新市委名義向大專學校派工作組是中央同意的。當時舊市委垮了，新市委工作人員很少，各大中學校革命學生和教師起來鬧革命，紛紛要求新市委派人領導運動，新市委只好向各方面求援。學校的工作組，一種是在新市委直接派的；一種是在新市委要求下，由河北省以及四清工作隊抽調的幹部，臨時集合起來，由新市委派出的；另一種是在新市委要求下，由中央各部門，國務院各部門派出的。

現在市委根據毛主席和黨中央的指示，撤銷工作組，這是因為經驗證明，工作組的形式，不適合於大中學校文化大革命的要求，必須加以改變。

自從中央宣佈改組舊市委，報上公佈聶元梓等七位同志的大字報，北京

市大中學校掀起了偉大的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聲勢浩大，猛烈地衝擊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資產階級當權派，衝擊著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衝擊一切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衝擊資產階級的教育制度，這是很可喜的現象。在這樣大的群眾的自覺的革命運動中，不可能是溫文爾雅的，難免出現這樣那樣的問題，這些問題，以我們大學中學革命師生的覺悟程度和思想水準來說，是不難解決的。我們對待這樣新出現的問題，採取了派工作組的辦法，我們這個決定是比較倉促的；還有的決定，例如中學集訓，軍訓等問題的決定，也是比較倉促的。有的同志說“老革命遇到新問題”，的確是這樣，而工作組到各校又是非常倉促的，沒有經過充分的研究和討論。我們在中央工作的同志，在市委工作的同志，自己對這樣史無前例的運動也沒有經驗，也沒有在一些方面給工作組作具體交待。工作組的同志按老一套的工作方法去指導運動，有些不好的工作組還違背我們黨歷來對群眾運動的方針，自己搞一套，瞎指揮，亂鬧一通。結果在一個多月中，把轟轟烈烈的革命運動搞得冷冷清清，有的學校甚至搞得很糟糕，這是一個很大的教訓，也是一個很大的經驗。基本的教訓是對廣大革命師生的革命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估計過低，對於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文化大革命的群眾路線的方法，引導群眾自我教育，自我鍛煉，自我革命的偉大意義估計不足，從而推動和帶動我們無產階級專政下麵實行廣泛民主的偉大意義認識不足。這一個多月是一個曲折，要從這一段反面經驗中得到益處，使我們更好地學習毛主席著作，從中掌握毛澤東思想，無限信任群眾的革命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虛心向群眾學習，善於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先做群眾的學生，然後才能領導群眾運動。我們在中央工作的

同志要從中得到教訓，市委工作的同志要從中得到教訓，工作組的同志也要從中得到教訓。

再重複說一說工作組的問題。工作組有的是好的，有的是比較好的，但犯有這樣或那樣的錯誤，有的是犯有嚴重錯誤的。他們在壓制群眾，打擊革命左派和不同意見的人，嚴重違反了黨的方針政策，把運動引到錯誤的方向上去，阻礙了文化大革命的進行，引起了廣大師生的不滿，以至要求撤換他們，這是完全可以的。工作組的大多數同志在主觀上是想把事情搞好的，領導上對他們的幫助也不夠，上面已經講了；加上沒有搞過這樣的文化大革命的經驗，大多數同志沒有學會運用毛主席的群眾路線和民主集中制，倉促上陣，用過去在工廠，農村中工作的經驗，有的甚至憑自己的想法去領導運動，所以犯了這樣或那樣的錯誤，有些責任要由上面來負擔。工作組不少同志受到群眾的批評是完全應該的。工作組的一切好的同志都要採取積極的態度。應該虛心聽取群眾的意見，接受群眾的批評，得到群眾的幫助，這對他們在今後的工作中學會群眾路線和民主集中制是很有好處的。

現在，毛主席和黨中央決定撤銷大中學校的工作組很必要，市委根據中央的指示作出這個決定。這個決定的根據是按照毛澤東思想的教導，人民群眾是世界的創造者，只有依靠和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眾，才能把階級鬥爭，生產鬥爭和科學試驗三大革命運動搞好，才能保證黨的領導，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制度鞏固，才能保證在我國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工作組撤銷後，北京市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能恢復運動開始時的轟轟烈烈的局面。

在大中學校文化大革命的任務是一鬥，二批，三改。鬥倒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資產階級當權派；批判資產階級反動的學術“權威”；改革教育制

度，改革教育方針，方法。這三大任務不但工作組擔當不了，市委和中央工作的同志也擔當不了，只有依靠大中學校的廣大革命師生員工來實現。因為你們瞭解情況，你們有能力，有本領來擔當起這個任務。中央完全相信，北京市的文化大革命能夠依靠群眾的積極性和自覺性用群眾自己革命的組織形式革命師生員工代表會議，文化革命委員會，文化革命小組，動員師生員工自己鬧革命，也就能夠通過運動，包括教育犯錯誤的人。來實現毛主席和黨中央制定的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的大多數的方針和政策。

我們相信，只有依靠群眾自己教育自己，才能把文化大革命搞好。在運動中難免出現這樣或那樣的毛病，但是我們相信，群眾能夠依靠自己的智慧，依靠自己的創造力，及時總結經驗，克服困難，奮勇前進，奪取大中學校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

革命的師生員工萬歲！

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

毛主席萬歲！

周恩來在會上講話：

同志們、同學們：

剛才小平同志已經代表我們中央工作同志講了話。我現在根據他講的話補充幾句，特別是站在做政府工作的這方面，更重要的是，我這個禮拜下去，向群眾們學到一些東西，所以想講幾句。

這兩個月來，我們全中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轟轟烈烈地搞起來了。在毛主席號召下，在我們報紙上社論的鼓舞下，群眾幹文化大革命的勁兒很高，特別是我們北京，在我們最接進的地方出現了高潮。但是剛才小平同志說了，就是運

動起來兩個月了，有些曲折，就是說，開始是轟轟烈烈，中間有點冷冷清清的現象，也有些地方轉為各個學校或各個機關內部群眾鬥群眾這樣的現象，那麼，現在又在轉，又轉到新的高潮。

那麼為什麼會出現曲折呢？依我看，我們做領導工作，不論是中央的，在地方的。在政府裏的，我們對形勢的估計有錯誤，就是對人民群眾的革命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還是估計不足。第二點是我們解決問題的認識上的錯誤。在北京，過去舊的北京市委，舊高教部的領導，舊的中共中央宣傳部的領導，都犯了嚴重的，也就是大家所說的黑線性的錯誤。這就是一種罪行了，不單是普通的錯誤嘍！這些部門的領導直接地影響了我們的文教工作，首先是北京市的文教工作，教育工作，如學校哇，許多大學，中學甚至小學，各個文化團體單位。

群眾在毛主席和黨中央的號召下起來了，他們就要問自己機關裏，學校裏的黨的領導是否也是黑線，黑幫，起碼他要懷疑，都不信任了。所以六月上旬北京新市委成立以後，大家一方面敲鑼打鼓，歡呼新市委的成立，改組；另一方面要求新市委派工作組，幫助他們搞文化大革命，不相信原來的領導，原機關的領導，這是很自然的，他們的要求合情合理。問題在於我們做領導的，要想一想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如何解決群眾的要求。我們倉促地決定了，迫不及待地到處派工作組。工作組是從另外的機關另外的地方調來，倉促上陣的，他們沒有經驗，特別是從政府各行政部門調來的工作組更是習慣於老一套，自上而下，命令式地做工作，不是象我們報紙上號召的相信群眾，依靠群眾來做工作，這樣，新的工作組去，開始同學們不論大學，中學都是熱情歡迎，但不久情況就變了，從隔閡走到對立。那麼，一個情況，剛才小平同志講了，也有的工作組是好的，但工作組大多數同志主觀上是好的，主觀上不是想這樣做，但他們的工作方法是老一套，這

就是大家所說的“老革命遇到新問題”，不適應新形勢的要求，也不符合毛澤東思想的要求，儘管工作組的絕大多數同志是好的，但是效果就是這樣冷冷清清，或造成了群眾鬥群眾的現象，把學校和學校的聯繫也隔開了，那勢必就冷冷清清了。這套方法完全不適合這種轟轟烈烈的革命師生的革命運動的要求。

在這種形勢下當然出現了些問題。有些問題在群眾運動中常常是不可避免的。對這種現象也把形勢估計誇大了，就是怕亂，怕群眾。群眾鬥群眾，互相批評，因為青年批評起來，鬥爭和辯論的界限很難分，鬥爭中必然有批評，有時候卷起袖子，站起來了，馬上緊張了，搞不好就打起來了。這種現象我們以前也有過，我們也是從青年來的。當年，但是比起你們，我們慚愧得很了。那個時候搞學生運動幼稚得很。因為你們是在毛澤東時代，你們進步多嘍！

當然，凡是學生，老師都不可能那麼按框框辦事，創造性就在這裏創造出來了，按框框就不可能。對當時出現這種形勢，個別事件有壞人挑撥，但整個問題的解決方法的選擇不當，造成這種形勢。因此，出現了問題，就是怕亂，造成這種形勢，使北京各大中學校的運動就更走向冷冷清清了，有點停頓了，把我們鬥爭的主要目標也轉移了。這麼一個形勢，這就是六月下半月到七月上半月。

那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呢？對形勢如何估計呢？那就要按毛主席的教導，第一，我們應該求教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讀毛主席的書，翻一翻群眾運動應該怎麼做，如何走群眾路線，如何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這一套求教于毛主席的書還不夠，解決的最重要，最直接的一環是到群眾中去，自己去實踐，這才能看出問題。到群眾中去學習，這才是真正的群眾路線。這是幾十年來的革命真理嘛！這是毛主席的教導，毛主席親自給我們做了最偉大的典範，示範嘛！我們怎麼能忘記呢？所以只有我們做領導工作的都到群眾中去，去實踐，去學習，

才能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別的辦法是沒有的。一到群眾中去，就會看出來了，的確有的地方從轟轟烈烈變為冷冷清清了；有的鬥爭轉移了方向，主要的鬥爭方向改變了，鬥爭了群眾；有的鬥爭停止了，甚至有的同學很不滿意，這個是很自然的嘍！所以一去看就會知道。第二，再看看工作組的工作方法，照老辦法，老一套去做工作，依靠自上而下行政命令的方法，不是接進群眾的方式，不是啟發群眾，不是依靠群眾，不是啟發幫助群眾，叫他們自己作主，就看出來了嘛！就是說，只要去接觸，就可以看出問題，就可以發現問題。那麼看問題也就自然而然地認識了然後依靠群眾，相信群眾，解決這個問題。另外我們的文化大革命的方向就清楚了。在高校依靠革命的師生員工，首先是革命的學生，他們做主人，由他們來鬥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學校的當權派，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那種人，把他們鬥倒，接著，我們就要批判學校裏反動學術權威。那些反動的資產階級學術權威，也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我們就要鬥那些人。再進一步，我們就要改革我們社會主義的教育制度和教學方針方法，也就是我們平常所說的教育革命和教學改革。這是我們在學校中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三大任務。我們的矛頭要指向這些，要在破中來立。

那麼這個任務依靠誰來完成呢？只能依靠各校的革命師生，首先是革命的學生。只有你們才知道，才能夠解決這些問題。我們從上面去的人只能幫助你們。其他沒有能力。誰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教員中誰是反動的學術權威？如何在我們的各個學校來施行我們社會主義教育制度？就是如毛主席所說的，要把我們的學生培養成有社會主義覺悟，有文化的勞動者。這樣一個教育，總之也就是德，智，體全面發展，政治掛帥，首先是思想領先的這樣的勞動者。這些只有你們大中學校的同學，革命的教員學生懂得。人民大學七個同學給中央和毛主席

的信，寫得很清楚……，怎樣實行半工半讀，只有你們清楚。用什麼組織方式來作，你們已經創造了，就是你們作的，成立的各級文化革命委員會或文化革命小組，或者開全校的群眾大會或各系的代表大會。這種組織形式你們已經創造出來了，當然不是那處每個學校都創造出來了，但雛形已經有了。這就是大中學校的革命師生作主人的組織形式。這種形式一看就證明瞭，那點小毛病，或個別的亂子那是影響不了我們的大局的。不信。這月二十二日那天，天安門前六十萬人的示威遊行滿有秩序地走出來，你們大中學校的多數同學還不是整齊齊，威威武武地，浩浩蕩蕩地走向天安門嗎？那不就是一通知就行動起來了嗎？那樣的革命秩序就在我們的文化大革命中，這樣的經驗就證明瞭你們的革命師生員工中絕大多數是毛主席的好學生，你們是適應毛主席的戰略的號召，備戰要求的。所有這些事情都要到群眾中去學習。我們中央的同志，首先是文化革命領導小組的同志：陳伯達同志、康生同志、江青同志、陶鑄同志和其他同志到群眾中去，他們去體驗，我們現在跟著去學習。但是在中央負責同志未下去時，我代表我們全體中央的同志向你們提出個要求：給我們學習和鍛煉的機會和自由。我們要求自由。我想臺上的同志會贊成我這個要求……因為我們下去一下，面孔熟一些，就圍起來，看大字報也不自由，談話機會也困難。所以今天我向你們提出要求，你們回學校去說，中央同志下來時給我們自由，給我們方便嘛！一句話，當然我們要跟你們談話，大會談，小會談，也要參加你們的討論。上千上萬人圍起來，就沒法談了。尤其到大學區，電話一打，一下子幾萬人來了，那這樣我們的革命秩序就亂了，這樣就容易擠傷人。現在的辦法，我們只有在你們睡覺的時候，我們偷偷地去看大字報，這樣不好嘛！這樣就只能看你們寫的，不能聽你們說的了，這個感性知識還只是一半，還不完全，還很不完全。林彪同志說要抓活思想嘛，

不直接接觸，怎麼能抓活的思想呢？建議你們回去傳達我們這個要求，大家注意一點。（熱烈鼓掌）

好，謝謝你們的支持！今後我們首先是下去學習，學習，再學習。跟著就是支持你們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學習你們的鬥爭經驗，學習你們的創造，那麼我們現在已經有了創造，剛才講了，北京市委根據中央指示，提出你們所創造出來的辦法，這就是在各個院校成立了革命師生員工的委員會和代表會議，各級代表大會，成立各級文化革命委員會，分會和文化革命小組，根據你們各校具體情況來解決。有的學校現在已經有了，還不完全，有很多地方還沒有。過去有的學校的各級文化革命委員會常常是指派的，不是完全選舉的，當然有的經過群眾討論以後，充分地醞釀，又討論又醞釀，然後自己選出來的。如果沒有過經充分的討論，醞釀，現在可以進行籌備工作，現在可以成立籌委會，負責成立全校的代表大會，成立文化革命委員會，分會，文化革命小組。因為學校有好多事要辦，要靠文化革命委員會來管，你們自己是主人，所以籌備工作，市委重要決定也說了，要由你們自己解決。（鼓掌）經過籌備，把各級文化革命委員會，分會，文化革命小組成立了，全校的組織就解決了嘛！革命領導解決了，進一步籌備全市的大專學校文化革命委員會，文化革命代表會議，產生它的領導機構。這要很快進行，這樣不難嘛！今天市委要各校派積極分子來開會，不是很快就選出來了嗎？當然有的推選的比較倉促一點，有的已經成熟了，很快就推選出來。你們各院校成立了，全市的也不難。只有全市成立了領導機構，常設機構，才能領導全市的文化大革命。有的學校黨委，總支，群眾信任，還可以領導，通過學校黨團組織領導。中央工作的同志，中央文化革命領導小組的同志，北京市的領導同志，要到學校去接觸，到學校去學習。只有學到東西，支持你們，才能說得

上對你們有幫助。如果下去，我們不可能去那麼多學校，北京市六十多所大專院校，三百多所中等學校，還有半工半讀學校，一共五百多所，最好都能去學習，但不見得都能去。

但是如果發現了問題，你們還可以找市委，中央文化革命領導小組，或中央和國務院接待室解決。我們有責任，有義務回答你們的問題，或通過必要手段幫助你們解決問題。這樣能上下通氣，互相支持，從群眾中得到經驗。有很多外地來北京取經驗的嘛！北京是將進五十年前中國共產黨誕生前的“五四運動”的發源地嘛！那時是反動統治，現在是毛澤東時代，是在共產黨，毛主席領導下，無產階級專政的首都，新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作得更好！應該上下通氣，互相支持，互相學習。所以你們把工作做好是對我們的幫助，你們做好，得出經驗，全國來學習，也是對全國的支持，幫助。換言之，你們有了學習毛主席著作，文化革命經驗，也是對全世界人民做出了重大貢獻嘛！（熱烈鼓掌）各校師生員工工作了主人，工作組撤離要留下學習，主要的首先向你們學習，如果工作組做錯了事應該向你們交待，你們提出批評，他們聽，應該向你們學習我們不熟悉的新的東西的經驗。他們不熟悉的，犯錯誤免不了，犯了錯誤可以改正，改正就是好同志。絕大多數是好同志，經過幾次接觸，可以互相瞭解。清華最多，接近五百人嘛！這是不少的接觸，經過這個接觸，雖然有錯的地方，但是老年，壯年，青年建立了革命的聯繫，革命的友誼嘛！（鼓掌）這樣才不會忘記工作組的工作，工作組的同志也很辛苦嘛！我相信革命師生懂得這個道理，一說就懂了！如果原單位工作組的同志，有的問題沒有交待清楚，要他們回去就回去，這是個學習經驗，鍛煉的機會。不管是政府的或軍隊的，不能他們年紀大就不聽你們的，那不對！你們是主人，他們跑到學校搞出亂子，應該到學校交待。還有，有些地方派

了調查組，聯絡組，那麼他們只能是調查，聯絡，僅僅是聯絡，不能超出這個範圍，他們不能指手劃腳，亂說亂道。所有現在機關中派了工作組，他們不屬於這個範圍，我們也正在考慮這個問題。

總之，這一個新的事情，新的運動，我們過去都不熟悉，我們離青年時代遠，要到你們中間去學習，取得新的經驗，老革命做新工作就年輕了，革命工作就能做得更好！（鼓掌）只有這樣才能算得上毛主席的戰友和學生。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熱烈鼓掌）

劉少奇在大會上的講話：

我同意剛才鄧小平、周恩來同志他們兩位的講話。在黨中央包括我在內熱烈支持北京高等、中等各校革命的同學，革命的教師，革命的員工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是黨中央的總的方針，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至於怎樣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你們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們問我們革命怎麼革，我老實回答你們，我也不曉得，我想黨中央的其他領導人也不知道，主要的要靠你們革，要靠各學校廣大革命師生員工在革命實際中間來學會革命。我們當年參加革命的時候也是這樣，也是青年，也學得一些馬克思列寧主義，比你們學得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少得多，比你們更加幼稚，更不曉得怎麼革命，只有革命的熱情，就革了，在革命中幹，革命中學，經過一些曲折，後來就慢慢地慢慢地學會一些了。犯了一些錯誤就改正，再犯錯誤再改正，就會革命了。我們過去遇到的事情，你們以後不會遇到的，因為以後的革命不是我們以前的革命。這是在新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下革命，要重新學習，你們要學習，我們也要重新學習。

怎麼革命？只能講一句話，放手發動群眾，依靠廣大的群眾，依靠革命的老師們，革命的教師，革命的員工，團結廣大群眾，放手發動他們進行革命。只能講這個辦法，更具體的辦法你們同學不知道，我們也不知道，現在你們知道的比我們多，我們向你們學習。你們現在有飯吃，吃飽了也不上課。中央決定半年不上課。半年又吃飯又不上課幹什麼呢？幹革命！就是要你們鬧革命！如何鬧，在這半年裏，你們可能取得很大進步，我們也要跟著你們學習一些。我相信，廣大的革命師生員工在偉大的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下，一定能夠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搞好！特別是遇到具體問題的時候，向毛主席著作請教，希望你們真正地努力學習毛主席著作，希望你們在這次運動中更多地熟悉，更多地掌握毛澤東思想，更努力地學習。

剛才鄧小平講，這次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目標是什麼？第一個鬥爭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當權派，這只是一小撮，不是很多的，有一些人犯了錯誤是可以改正的。第二個批判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第三個，進行教育革命，改革教育制度，改革教學方法，教學方針。這三件事我們都不熟悉，我們都不能做，更主要的是靠我們廣大的革命師生員工團結廣大的群眾，你們來做才能搞好，請你們做。

剛才李雪峰、鄧小平、周恩來同志已經講了，派工作組是中央決定的，中央同意的。現在工作組這個形式不適合於當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需要。中央決定撤出工作組。如果你們讓他們走他們就走，不讓他們走，你們要提意見就提意見。要批判就批判，批判夠了，沒什麼批的了，他們也檢討了，你們也覺得他們可以走了，就走。因為過去這段時間，他們和你們在一起，做的好的，做的錯的，也是和你們一道，你們都看見了，看得很清楚，他們在運動中間的錯誤，

缺點是由你們做結論，當然他個人的歷史情況，你們不太清楚，那你們也沒有辦法做了，你們就不能做了。

現在你們高等學校，中等學校以你們為主，你們是主人，工作組留在你們那裏是聽你們的意見，聽取你們的批評。你們要選舉你們相信的人，選舉革命師生員工代表大會，革命委員會。怎麼選呢？你們大家討論、醞釀，醞釀成熟後，選舉出來，那麼這樣，因為你們當了主人，以後學校裏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由你們去組織起來進行。黨中央的同志如果能幫助你們的話，儘量幫助你們，支援你們，現在我只能向你們學習。一句話，包括我在內，我們只能向你們學習，只能聽取你們的意見，不能提出什麼意見來幫助你們，因為我不瞭解情況，首先向你們學，學習了一個時候，過後有什麼問題，有些什麼經驗，那時我們可以提。你們的責任更大了！也只有你們能夠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搞好！如果把北京市的文化大革命搞好了，對全國有意義，對將來有更大的意義，對我們的共產主義事業也有更大意義。剛才周恩來同志要求給我們自由，我也有這個要求，如果你們給我們自由，我們領導同志就跟你們一道，聽取你們的意見。但是我們不能到處發表長篇大論，演說，不可能，我不懂。今天我可以向你們提點經驗，請你們考慮，斟酌，由你們決定。

你們運動中要保護少數，意見不同的要保護，因為以後有各種不同的意見，要討論，有時候要辯論，大字報、大鳴大放、大辯論。剛才周恩來同志講了，辯論會和鬥爭會很難分，不要把辯論會變成鬥爭會，辯論會上發生各種可能，那麼你今天是多數，明天可能變成少數，你在這個問題上是多數，在另外問題上可能是少數，不正確的意見是少數，正確的意見也可能是少數，我已有這樣的經驗。有些意見我講的並沒錯嘛，也是少數，毛主席也是這樣，很長的時間是少數，保

護少數這個問題是一個重要的問題。運動才能正常。怎麼保護少數？對少數有不同意見的人，少數犯了錯誤做了錯事的人，講了各種話的人，不能限制他們的自由，更不能打他們，一打就不好了。他們可以保留自己的觀點，即使是錯誤的，也可以保留，正確的當然不要去成天和他們辯論，使他們不能休息，不能吃飯，不能睡覺，這不得了了，更可以保留了，不要強迫他們改變自己的觀點，強迫他們承認錯誤。他們也可以參加辯論，也可以不參加辯論。大家罵他，辯論什麼都來了，什麼沒有分寸的話很多，青年嘛，我知道的，不同的意見是有的，溜嘛，凡是不願講的意見可以不講，各種意見都可以講，不限制他們的自由，不要打他們，不要成天跟他們辯論，使他們不能休息，他們可以保留自己的觀點，他們也可以參加辯論，也可以不參加。為什麼要這樣呢？為什麼要保護少數？目的主要是為了保護好人，當然也可能保護少數壞人，少數的壞人貼大字報，寫反革命大字報，寫反動標語，發表反動言論，也要保護，也只是寫了幾張大字報，貼了些標語，說錯了幾句話，做了些錯事，和右派，反革命不一樣，要多教育，保護一些時候，讓他多搞些活動再做結論。清華大學一個學生，寫了這麼一個口號——“擁護黨中央，反對毛主席”。同學們就揍他。這是反革命標語，一揍他，揍垮他了，只好拿去拘留，這是保護性拘留，如果你們保護他自由讓他活動，不揍他，讓他多寫點反動標語，多發表點反動言論，不妨礙大局嘛！過後再作結論。保護一個時候，保護一個月，根據群眾的認識，群眾的要求，這樣做結論不會錯，這樣不會冤枉好人。不要怕亂，經過辯論可以弄清楚，讓他們自由，讓他們活動，可以抓住線索，有好處，怕保護了壞人，主要為了保護好人，也可能保護壞人，保護一下，保護一個月不要緊。我們無產階級天下是不會垮臺的。同志們是能夠識別的，這樣可以使同志們知道什麼是反革命，那天，我在清華大學看大字報，你們那個

薛恐，那個思想反動得很。讓她活動，讓她講話，讓她寫大字報，在運動中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假革命，寫反動標語，進行反革命活動，總的來講不是壞事，是好事，讓他們進行活動。只有殺人的，放火的，在食物裏下毒的，在飲具裏放毒確有危險的，把這些危險的抓起來，除此以外不抓，讓他們活動，活動一個時期，最後做結論，你還沒定案就不能向他施行專政，到了時候，定案後，就向他實行無產階級專政，不讓他活動，怎麼能定案呢？定案怎麼定，當然要大家討論，還應有一定的手續，一般應運動後期做結論，在做結論以前，暫時保護一下，讓他們活動一個時期。我就是一點建議，是否同意你們考慮，請你們做決定。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勝利萬歲！

革命的同學萬歲！

革命的師生員工萬歲！

中國共產黨萬歲！

毛主席萬歲！

第三章 聶元梓等七人

第一節 大字報的由來

一九六三年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在全國展開，中央決定首先從農村開始，“清政治、清組織、清思想、清經濟”的“四清”工作，也就是人們所說的“四清”運動。為了搞好這場運動，毛澤東又親自主持制定了對《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即二十三條），作為“四清”運動中的指導綱領，並在農村全面展開，同時城市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也在部分省市推廣進行。一九

六四年十二月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開全國工作會議，在毛澤東的主持下，正式討論通過（即二十三條）。提出：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毛澤東一錘定音地給“四清”運動指定了方向。

一九六四年年底，北京市的北京大學，進駐了“社教運動”工作隊，工作隊通過調查瞭解，發現北京大學的校領導，在工作中存在有很多問題，工作隊認為校領導的工作問題，主要責任在陸平等人身，他們在教育路線上犯了嚴重的錯誤。於是工作隊為了開展社教工作，又發動了一些師生和積極分子，對揭開北京大學的“階級鬥爭”蓋子起了很大的作用。工作隊根據陸平等領導人的錯誤行徑，支援師生們對他們進行了嚴肅的批判和鬥爭。當時確實湧現出許許多多的積極分子，和工作隊依靠的中心骨幹分子，聶元梓等人根紅苗正，當然就是協助工作隊工作的骨幹之一，也就順理成章了。

不久“社教”工作隊莫名其妙地被中央書記處的決定撤走了，北京市委領導又委派來第二工作隊，再次進駐北京大學，並對北大校園領導存在的問題重新梳理和調查，結果是同前工作隊有截然相反的態度。這使原來有革命熱情的積極分子和骨幹力量受到了嚴重的打擊，使他們倍感無法理解和接受北京市委再次派來工作隊的企圖，於是紛紛找工作隊談話，並憤怒地指責工作隊的工作人員。

北京市委領導得知這一情況後，也多次到北大校園，現場表示堅決支援以陸平為首的北大校園領導的工作，導至“社教”工作中的骨幹積極分子遭到挫折，也和陸平等領導人之間的矛盾，日益迅速激化，加深了難以彌合的裂痕。

一九六五年，第二工作隊在校領導的協助下，結束了在北京大學的“社教”工作。北大校領導在北京國際飯店和民族飯店，分別召開了北京大學的黨員幹部，學習整風的總結大會。陸平在會上總結了“社教”工作的成績，他在講話中

譏諷了部分提意見的黨員幹部和一些追隨第一工作隊的骨幹積極分子，使他們蒙受了很大的傷害。很多人因此轉變了態度，被迫在會上作了深刻的檢查才倖免過關，從而給今後的工作埋下了，反對陸平為首的校黨委的隱患。導至後來的一九六六年六月五日，《人民日報》社論《做無產階級革命派，還是做資產階級保皇派？》一文的評擊，社論指出這次的“社教”運動是：“‘陸平保皇黨’對‘革命左派’，‘殘酷鬥爭’竟達七個月之久，這是一九六五年發生的一個極端嚴重的反革命事件……”為聶元梓等受壓的師生鳴叫不平。

一九六六年春天，北京大學的校園內再也不平靜了，這種氛圍除了“四清”運動留下的後遺症，引發的一些人事糾紛之外，最為直接的原因，便是由討論《海瑞罷官》和有關“清官”問題的爭論。

剛開始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內容雖然言詞激烈上綱上線，但人們一般都認為這是學術界，關於歷史問題的商榷事情，並沒有引起多少人的關注，所以在現實的社會中顯得特別的平靜。當然誰也不知道此時，中央內部正因為姚文元的文章，進行著一場激烈的爭辯。

三月二十一日，戚本禹發表了《翦伯贊同志的歷史觀點應當批判》，給勤勤懇懇研究歷史的老教授，中共老黨員翦伯贊雪上加霜。在北京大學的校園裏，一股愈來愈濃的火藥氣味迅速傳播開來。此時北京大學處處發動，揭發批判翦伯贊“反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史學觀點”的反動思想，校園裏討伐聲響成一片，大標語、大字報貼滿了校園內和教學樓道裏，形成了戰無不勝的局面。

四月十六日，《北京日報》又刊發了批判鄧拓、吳晗、廖沫沙《關於“三家村”和〈燕山夜話〉的批判》文章後，北京大學校園裏又引起極大的反響和震動。

師生們爭先恐後地寫大小字報，用這種形式來表達自己的觀點和階級立場，仿佛是座一觸即發的火藥庫。

四月十八日，《解放軍報》刊出題為《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積極參加社會主義文化革命》的社論，號召全軍全國人民“積極參加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堅定不移地把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五月四日，《解放軍報》又刊發五四社論《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文中說四月十八日本報社論，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廣大工農兵群眾紛紛來信來稿，對文化領域裏的反黨反社會主義黑線，表示極大的憤慨。“五四社論”針對當前的形勢，進一步點明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的表現形式，並引用毛澤東在全國勝利前說得一句話，告誡關心文化大革命的人們：“在拿槍的敵人被消滅後，不拿槍的敵人依然存在，他們必然要和我們做拼死的鬥爭，我們決不能輕視這些敵人。如果我們現在不是這樣地提出和認識問題，我們就要犯極大的錯誤。”在這篇社論的煽動下，批判“三家村”黑幫的浪潮掀得更猛更高。

五月十日，姚文元的《評“三家村”》文稿，經過毛澤東再三修改後，在上海《文匯報》發表。矛頭直指北京市委，文中要上揪“指使、支持、吹捧者”，挖出最深的根子。下掃“新聞、教育、文化、學術界、中的讚賞者和追隨者”。

五月十一日，北京市市委書記彭真，因為辯護吳晗的《海瑞罷官》問題，被毛澤東撤職，然後毛澤東立刻決定改組舊北京市委。舊北京市委被毛澤東徹底地摧垮解體後，一系列的形勢發展勢如破竹，在各種政治媒體社論的宣傳煽動下，群眾批判反黨反社會主義黑幫運動更加升級。全國各地的批判運動，首當其衝是從大專院校開始的，然後是中小學、各級機關到工礦企業，所有的黨團員骨幹和

積極分子，紛紛響應中共中央的號召，聯繫實際口誅筆伐地貼大小字報，用這種方式來表達自己的思想和階級立場。

但是這場暴風驟雨的來臨，竟使許多黨員幹部措手不及，各級黨委領導成員也不知所措，甚至感到恐慌。紛紛向上一級黨委領導反映和彙報所發生的情況。北京最高層的中共中央領導者，針對這種局面，華北局緊急召開會議，制定了臨時對運動進展的約束要求，強調各級領導要堅持崗位，加強對運動的領導，控制混亂的局面。要求遵守紀律，積極投入批判“黑幫”的鬥爭中去，各級黨委可根據實際情況規定：“大小字報內外要分開，國內黨內外要分開，原則上大字報不准上街”等等。

五月十四日，北京大學黨委書記陸平，接到了市委轉達的中央要求，急忙召開了全體黨員幹部大會。他在會上傳達了中共中央對運動的要求，並結合本校的情況說：“因有十幾個國家的留學生在校學習，搞運動要慎重”。“北大不宜貼大字報”，“群眾要貼，要積極引導”，“一定要內外有別”。因此陸平的講話立刻引起了北京大學師生們的爭論，北大校園內更加混亂起來。

一部分師生認為陸平以轉達中央要求為藉口，有意阻撓揭發給校黨委貼大字報，指責他們是阻礙運動的絆腳石，他們群情激昂形成了擁護，反對兩派的不同看法。擁護的認為陸平是代表校黨委傳達上級指示的，應該積極支持和維護校黨委的權威，不應該反對。

以聶元梓為首的少數人，對陸平的講話很不滿意，認為他的講話不符合當前的形勢，是借上級之口定框框，來壓制北京大學學生，寫大字報批判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幫分子。聶元梓他們認為陸平為首的校黨委，是北京市委的黑幹將，是

黑幫的黑窩子，是壓制文化大革命的黑手。並因北京大學校黨委的問題，與擁護校黨委派進行了口頭辯論，受到多數擁護派的圍攻。

正在這關鍵時刻，康生以中央理論組的名義，讓北京大學的聯絡員曹軼歐，正式進駐北京大學，進行文化大革命的調研。於是曹軼歐帶領著七人調查組，走進了北京大學陸平的辦公室裏，陸平等領導人熱情地接待了他們。曹軼歐對陸平說，進駐北大是來瞭解學術批判的情況，調查組為了便於開展工作，委婉拒絕了陸平安排在校居住的請求。並告訴陸平調查組所有成員，都居住在離校不遠的西頤賓館內，那裏僻靜離校園只有五裏之遙。

調查組常常工作到深夜，主要是和北大的教職員工及學生們談話，來瞭解北大校園內文化大革命發展的情況。為了儘快揭開北大的階級鬥爭蓋子，調查組所有人員，都拒絕參加北京大學黨委召開的一切會議，拒絕和陸平等領導人會面會談，秘密派一些骨幹分子，想方設法地搜集北大黨委的情況，終於找到了部分在“社教”中和現在受壓的聶元梓等人。

聶元梓十七歲時，在華北軍政幹校學習，當年參加了中國共產黨，不久被送到了延安學習和工作，在那裏結識了康生和曹軼歐等人，這次在北大重逢。曹軼歐鼓動他們起來造反，造舊黨委的反，造陸平、彭佩雲的反，明確表示對他們的行動給於堅決的支持。由於歷次政治運動的教訓，使得聶元梓等人仍然躊躇不前，不敢跨越批判陸平、彭佩雲的雷池半步，仍在觀察運動的形勢動態，就在這關鍵時刻，毛澤東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通知》發表了，給一切造舊黨委反得人們提供了合法的武器。

五月十六日，在北京由劉少奇主持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通過了毛澤東親自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通知》，由於是5月16日召開通過的，也稱《五·一六通

知》，簡稱《通知》。《通知》中除公開宣佈解除彭真的黨內外一切職務外，還撤銷了他所領導的“五人小組”，毛澤東同時還設立了新的文化大革命五人小組。《通知》向全國人民發出號召：“高舉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領域中的領導權”。《通知》中還說：“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義，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成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有些被我們認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識破，有些正受我們的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雪夫那樣的人物，他們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這無疑是指劉少奇是中國的赫魯雪夫，給全國的紅衛兵造反者們，指明了鬥爭的目標和方向，當然北京大學的聶元梓們也認識到了這一點。

《五一六通知》發出之後，文化大革命的帷幕正式拉開了，從此文化大革命得到了合法化。在毛澤東的指揮下，全面向階級敵人和資產階級開始大反攻。對於北京大學校黨委來說，他們也聚集在一起，認真地研究了當時稱為綱領性檔的《通知》，結合目前的形勢分析了校園存在的問題，發動師生們寫大字報，針對不符合毛澤東思想的現象相互批判，相互攻擊，出現了群眾鬥群眾的局勢，但對揭批校黨委問題的大字報，人們仍然不敢輕易去觸發這個雷區。

大概是由於 1959 年反右傾思想的原因，全國劃右派分子達 55 萬人，廬山會議之後又增劃右派分子 365 萬人，造成黨委領導者仍認為，文化大革命是放長線釣大魚的又一次反右行動。部分黨委領導人員放風說：反黨委就是反黨行為，是嚴重攻擊黨領導的反革命行動。他們靜觀事態的發展，同時組織黨團員骨幹分子

和靠近黨組織的群眾，操縱他們對給黨委貼大字報的群眾進行圍攻和人身的攻擊。

時局的急劇變化，令聶元梓等人不知所措，聶元梓和幾位師生到西頤賓館，找到了曹軼歐的調查組，向他們彙報了北大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進展情況。在談話過程中曹軼歐並不多語，只是微笑地點點頭，意欲著文化大革命，以到了兩兵相接的白刃化時刻。只是再三強調回校後，要認真地學習《五·一六通知》，並提醒他們這是文化大革命的總綱，要認真領會，積極宣傳《通知》的精神。後來聶元梓幾次被曹軼歐召見，決心要和陸平等人鬥爭到底。

五月下旬調查組親自出馬，召集北大的一些人開會，直接授意寫大字報來指責宋碩、陸平的五·一四講話是捂階級鬥爭的蓋子，是阻擾文化大革命運動的。聶元梓等人回到北大校園裏，立刻四處聯絡被陸平、彭佩雲以黨委名義壓制和迫害的師生，並向他們透露了形勢的動態和估計，組織學習《五·一六通知》，結合北京大學及全國的政治形勢發展和運動的深入趨勢，一一作了詳盡的分析，最後決定運用大字報的形式，回擊陸平、彭佩雲等人，指責他們利用手中的權力，壓制北京大學文化大革命的行徑，一場“圍攻”和“反圍攻”的鬥爭逐漸展開。

五月二十二日，聶元梓他們秘密集中在 23 樓某教師（楊克明）家中，大家研究決定從 5 月 14 日的講話上開刀。大字報首先敘述了北京大學的形勢，批評北京大學校黨委領導按兵不動，使運動冷冷清清，死氣沉沉，廣大師生的強烈革命熱情被壓制下來。大字報質問“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原因在哪裡，這裏有鬼！”接著是把陸平 5 月 14 日的講話，逐條逐句地進行了批駁，文中使用了大量的問號和驚嘆號。大字報認為他們不執行黨中央和毛主席制定的文化革命路線，不積極引導群眾開大會，寫大字報，並借種種事端限制文化大革命，製造清

規戒律約束文化大革命，“這不是壓制群眾革命，不准群眾革命，反對群眾革命嗎？”“我們堅決不答應！”“你們是什麼人，搞的什麼鬼，不是很清楚了嗎？”……

聶元梓他們晝夜仔細研究大字報的內容，經過三易其稿，終於在5月24日的晚上，拿出了他們認為很有份量的精稿。聶元梓仍不放心，逐字逐句地又修改一番，總覺得還有什麼地方不夠完善，於是在稿子的結尾處，添加了幾句口號。“誓死保衛毛澤東思想！”“打破修正主義的種種控制和一切陰謀鬼計！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消滅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魯雪夫式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聶元梓認為這幾句口號更具有爆炸力和煽動力，也正是聶元梓的心裏話。

五月二十五日，聶元梓又親自審閱了一次大字報樣稿，然後用毛筆謄寫清楚，又校對了一遍。聶元梓抄起毛筆首先簽上自己的名字，接著其餘五人也依次簽了名，在簽名過程中恰巧來了位研究生，經聶元梓說明大字報的內容和觀點後，也動員他簽上了自己的名字，於是這張題為《宋碩、陸平、彭佩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了些什麼？》的七人大字報。

當天下午二點多鐘，聶元梓、宋一秀、夏劍彖、楊克明、趙正義、高雲鵬、李醒塵七人，在聶元梓的親自帶領下，拎著漿糊桶來到北京大學的大飯廳，把醞釀很久的大字報，貼在飯廳的東牆上。

這張大字報一貼出去，立刻圍上大批的師生們，接著象地震後的衝擊波一樣，引起了全校的激烈爭論。大家七嘴八舌地評論著，絕大多數持反對意見，有些過激的師生，立刻針對聶元梓大字報的觀點，用大字報的形式進行了反駁。首先是北京大學法律系的全系師生，指出他們違反中央“內外有別”的規定，來指責聶元梓七人的大字報，用歪曲事實的卑劣手法，誣陷宋碩的5月14日的講話。

反駁者們還說：“要急切地加強黨的領導，引導運動向正確的方向發展”是正確的。“聶元梓七人大字報，是十足的反對黨中央，反對毛澤東思想的修正主義路線。”

三個小時以後，也就是下午五點多鐘左右，北京大學校黨委領導，組織了全校園內的黨、團員骨幹分子，對聶元梓七人大字報，進行了猛烈的攻擊。反擊的大字報貼到了聶元梓七人大字報的周圍，顯得聶元梓七人大字報，象無邊海洋上的孤島，那樣地孤單而又蒼白無力。僅僅在聶元梓等人，貼大字報的半天時間裏，全校貼出了一千五百餘張大字報，對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進行無情的駁斥和揭露，還有上千人圍著聶元梓等人進行口頭的辯論，這一切都是在校黨委的操縱指揮下進行的，對聶元梓七人來說是毫無知情的，對於憲法中提倡的民主來說，對於憲法中規定的言論自由來說，都是極不公平的。

晚上，聶元梓等人為宣傳自己大字報的觀點，更進一步地揭露宋碩、陸平、彭佩雲壓制運動的行徑，在五院哲學系召開聲討會。這時北京大學內的激進師生，都湧到會場門外，指名道姓要讓聶元梓出來辯論，並高呼要找聶元梓算老賬。聲討的會議在圍攻者們的幹擾下，再也無法進行下去，接著聲討會議被圍攻者們沖散，聶元梓在夥伴們的護衛下惶惶逃出會場。此時北京大學的校園裏，師生思想極端混亂，雙方辯論的局面仍在繼續；在辯論的過程中互不相讓，發生了推推搡搡，相互扭打時有發生。

爭論的焦點有兩個方面，一方認為要堅決擁護黨中央，就應該聽從校黨委的指揮，攻擊代表黨的領導就是反黨行為，是新右派分子向党進攻的表現，應群起而攻之，而誅之。另一方也就是毛澤東所指的“少數派”，他們認為校黨委領導沒有放手發動群眾，沒有正確引導革命群眾，開展文化大革命。反而利用整頓的

條條框框，對革命群眾捂蓋子，來壓制革命群眾的革命熱情。因此北京大學按兵不動，冷冷清清，死氣沉沉，把嚴重的政治鬥爭引導到“純學術”的批判上去。

深夜十二時許，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劉少奇、周恩來總理，派華北局國務院外辦和高教部的負責人李雪峰，親臨北京大學校園裏，安慰師生們要冷靜，不要衝動。他對師生們演講時，重申了中央關於運動，張貼大字報的指示，並傳達了周恩來總理的三點補充指示。周恩來特別指出：作為黨和國家的紀律，要嚴格遵守“內外有別”，批評聶元梓搞亂了中央的運動部署，違反了中央的規定原則。李雪峰還說：“我們驚動了你們，但你們也驚動了我們，你們貼出了大字報鬥爭要有組織紀律，不要弄得亂七八糟，大小字報內外要分開，國內外黨內外也要分開。”

五月二十六日上午，北大校黨委派校長黃一然，在臨湖軒同聶元梓談話，黃一然曾擔任過駐蘇大使館文化參贊，辭令爛熟於口上，他娓娓動聽地勸說聶元梓主動檢查，把大字報撕下來。聶元梓沉吟良久後說：“檢查可以，不過把大字報撕下來我不撕。”後來在校黨委組織下，圍攻隊伍越拉越緊，事情也越鬧越大。時事分析引起辯論分歧，辯論分歧引起扭打，聶元梓等人不同程度地受到人身攻擊，在校園內大勢已去，猶如過街老鼠人人喊打，他們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打電話要求黨委立刻制止對他們的圍攻，但事態的發展早以無法控制，這時驚動了一直為北大形勢，擔憂的黨中央周恩來。

翌日，周恩來急派張彥到校園平和事態，張彥在校園裏講演時，再三強調指出貼大字報，要嚴格遵守內外有別的原則，使大字報事件的擴散事態受到控制。此時圍剿大潮在校黨委的領導和操縱下，配合張彥的工作組又掀起了批判的高

潮，那些緊跟黨委的黨團員和積極分子口誅筆伐地圍攻他們，他們像汪洋大海中的弱水者一樣，不知所措。

聶元梓等人正處於難以招架，度日如年之時，在京的康生毅然派曹軼歐親臨北京大學，找到聶元梓等人，鼓勵他們繼續鬥爭。

2003年12月出版的、由逢先知、金沖及主編、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的《毛澤東傳（1949—1976）》（下）在敘述這件事時是這樣寫的：“就在《人民日報》發表《橫掃牛鬼蛇神》社論的同一天（即6月1日），正在杭州的毛澤東看到了《紅旗》雜誌社和《光明日報》總編室所編的《文化革命簡報》第13期刊載的北京大學聶元梓等7人所寫的《宋碩、陸平、彭佩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麼？》的大字報，……毛澤東覺得，如果公開發表這張大字報，可以成為一個有效的突破口，可以打亂原有的秩序，使群眾的手腳放開。他當即寫了指示：……”並在引毛澤東指示的注釋中明確寫到：“毛澤東在《光明日報》總編室《文化革命簡報》第13期上的批語，手稿，1966年6月1日。”

這至少可以說明，即使康生給毛澤東寫過密信，抄送過那張大字報，送到毛澤東手裏也是在毛澤東作過批示之後，否則毛澤東就不會把批示寫在《文化革命簡報》第13期所刊載的大字報上面。換句話說，毛澤東作出這個批示並非因為受到康生密報的影響。實際上，自“文革”發動至6月1日，毛澤東對局勢仍然不滿意，他想尋找一個合適的突破口，自上而下地把群眾充分發動起來，揭露一切“陰暗面”，衝破舊體制。北京大學大字報的出現，可謂恰逢其時，成為毛澤東進一步推動“文化大革命”的契機（胡尚元）

六月一日中午，毛澤東草閱後立刻打電話給康生和陳伯達說：“這是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要立即向全國廣播這張大字報。”並提筆在聶元梓七人大

字報底稿上寫了批語：“此文可以由新華社全文廣播，在全國各報刊發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學這個反動的堡壘，從此可以開始打破。”下午四時從杭州傳送回北京，給康生和陳伯達這個重要的批語。

傍晚，王力、關鋒、唐平鑄、胡笏等人，根據毛澤東的批示，集體起草了評論北大聶元梓七人大字報的評論員文章，並通知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全文播發。晚上八時正，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在新聞聯播的節目裏，準時向全國各地全文廣播聶元梓七人大字報。這個出人意外的舉動，不僅使北京大學的師生感到震驚和意外，就連中央政治局委員們及國務院副總理陳毅也感到非常的意外。他們紛紛找劉少奇、周恩來詢問：“這麼大的舉動，為什麼事先不給個通知。”周恩來回答說：“我也是臨近廣播時，才接到康生的電話通知，今晚由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向全國播放。”他們儘管怨言紛紛，但是毛澤東的家長製作風，使他們沒有辦法，只好靜觀其變。01

當北京大學師生們在大飯廳，收聽到這個廣播時，氣憤地高喊，他們沖上臺去發洩自己的不滿，紛紛喊叫“不盲從”，“在三個小時內，把中央廣播電臺的氣焰壓下去。”這些天真的師生們哪裡知道，事件的背後隱藏著深刻的背景，是無人知道的。

六月二日，《人民日報》通欄出現大黑字標題“熱烈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同時以《北大七同志一張大字報揭露一個大陰謀》為題，報導了“新華社北京一日電”關於五月二十五日下午二時許，北京大學哲學系聶元梓、宋一秀、夏劍彜、楊克明、趙正義、高雲鵬、李夢醒七人，在大飯廳東牆上貼出了題為《宋碩、陸平、彭佩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麼？》的大字報，並全文刊登了這張大字報。《人民日報》的評論員加了評論文章，題為《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

文中指責宋碩、陸平、彭佩雲是“三家村”黑店的黑幫分子，他們利用“加強領導，堅守崗位”是壓制起來革命慣用的伎倆，妄圖保存實力，待機而動，“革命者要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堅決消滅一切牛鬼蛇神。”

《北大風波和“馬列主義大字報”》（下）

同日康生也來到北京大學視察，校園內受壓的師生們把康生團團圍住，他在30樓和32樓之間的空場上，向師生們發表了激昂的講演：“聶元梓的大字報是巴黎公社的宣言，是20世紀60年代的‘北京宣言’，大字報一廣播聶元梓解放了，我也解放了。”聶元梓聽後深深地舒了口氣，她的同伴們百感交集地相互歡呼起來，僅僅幾天的時間裏，聲援的大字報貼滿了北京大學校園內，北京大學霎時成了全國的“文化大革命”中心。同時中央領導組成員不斷來這裏演講發號施令地指揮作戰。

六月二日至六月三日，《人民日報》接二連三地發表社論《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奪取資產階級霸佔的史學陣地》《撕掉資產階級“自由、平等、博愛”的遮羞布》等等，來鼓勵師生們起來革命造反。這時陳伯達也兩次到北京大學看大字報，針對北京大學仍有部分師生們不怕高壓，寫反對聶元梓的大字報，來支持黨委的行動，是犯了方向性，路線性的錯誤現象存在。陳伯達回到《人民日報》社後，立即指示報社工作組寫了題為《做無產階級革命派，還是做資產階級保皇派？》的社論，於六月五日全文在《人民日報》第一版上發表。社論指出：“北京大學過去被壓抑的無產階級革命派站起來了。他們推翻了以陸平為首的資產階級保皇派的統治。一場粉碎資本主義復辟陰謀的鬥爭正在勝利展開，資產階級保皇派陷入了廣大群眾的包圍之中。”同時又指出：“陸平等是這一小撮保皇黨、頑固地執行前北京市委的修正主義路線，在北京大學實行資產階級專政。”陸平

的教育路線是資產階級修正主義路線，他們對工農子弟極端仇視，以及進行極粗暴的鬥爭。還揭發了陸平等人在社教運動中所犯的嚴重錯誤。社論最後尖銳指出：“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生死鬥爭中，究竟站在那一邊，是做無產階級革命派，還是當資產階級保皇派？每個人必須做出自己的選擇。”就這樣把全國許許多多為保衛黨委威嚴的骨幹分子，黨團員幹部指責為保皇派，少數反黨委的被封為革命派。於是許多保黨委的群眾看到這篇社論後，紛紛反戈一擊地投身於革命派這一邊來，但仍有部分維護舊黨委執迷不悟者，堅持陣地地被稱為鐵杆保皇派和鐵杆保皇組織，頑固地堅持、堅守自己的觀點，一直和反黨委的組織對立下去，遭到了無數次的迫害。

在《人民日報》社論的煽動下，全國的文化大革命運動，由平靜有序的批判轉為激烈無規則的批判，大批反舊黨委的造反派組織悄然而起。僅僅幾天的時間裏，千千萬萬封聲援聶元梓的信件和電報，從全國各地飛進北京大學的校園裏，全國各省、市、地區的報刊，連連刊登工農兵學商各界人士，支持聶元梓大字報的文章，北京大學頓時成了全國文化大革命的中心，各種大字報佈滿校園。

首都北京各個學校、機關、廠礦、企業單位的成千上萬群眾，像沸騰的水一樣，紛紛湧向北京大學聲援聶元梓。此時北京大學校園裏人山人海，聶元梓每到一處就會被數以百計的仰慕者簇擁著，渴望親耳聆聽聶元梓對“文化大革命”的高見。

為了激發北京大學革命群眾的鬥爭熱情，在聶元梓七人貼大字報的地方，用桌子搭了一個講壇，各個單位來訪的群眾，排成一列長長的隊伍，爭先恐後地跳上桌子發言，表示對聶元梓七人的支持，不少年輕人戴著紅衛兵袖標，和前來瞭解情況的群眾學生，守在哲學系辦公室的門前，振臂高呼：“打倒走資派！打倒

陸平！”，“支持你們，支持你們！”等口號。同時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用激昂的語調不停地播放著《人民日報》的社論—《做無產階級革命派，還是做資產階級保皇派？》。

有的學生把北京大學冰窖 11 號的院牆外，裏三層外三層地包圍著，那裏是陸平等領導人的住所。他們高聲呼喊著“打倒陸平”的口號，有的跳入院牆的夾道，敲打著朝院牆的窗戶，叫喊著：“黑幫陸平滾出來！”後來，陸平被批判者們帶走，受到了非人的殘酷虐待，勒令在校園內勞動改造，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

一九六六年六月四日，各大報刊刊登新華社三日訊，中共中央新改組的北京市委決定：“（一）派以張承先為首的工作組到北京大學對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進行領導；（二）撤銷中共北京大學黨委書記陸平、副書記彭佩雲的一切職務，並對北京大學黨委進行改組；（三）在北京大學改組期間，由工作組代行黨委的職權。”其實六月二日，新市委工作組就已經進駐了北大校園。

工作組組長張承先原是河北省委主管文教的書記，他進駐北大的十幾天來，對聶元梓等觀點的人們，並沒有表現出多大的熱情，或聽取聶元梓她本人的意見。他完全是按著自己的設想，企圖把運動的混亂納入正常的軌道上去。

六月十八日，北大校園裏突然刮起一股亂揪亂鬥的旋風，四十多名校系幹部和教授被帶上“鬥鬼台”，造反者們把他們揪上去，轟下來，掛牌子、抹黑臉、戴高帽，有的被押著“噴氣式遊鬥”，有的女性被批鬥時遭到猥褻污辱，這些非人的批鬥現象歷歷在目，任其自由發展，號稱革命造反行動。

為了制止這種行動，張承先率領工作組乘著汽車四處奔波，聲色俱厲地制止亂揪亂鬥，當晚他發表了校園廣播講話，嚴厲批評了亂揪亂鬥的行為，工作組緊

急出了簡報，同時送到黨中央彙報情況。而聶元梓毫不隱晦地表示：“六·一八事件是革命行動！”，“紅色恐怖萬歲！”，“北大工作組是右傾”的態度。

七月底的一個最炎熱的日子，一連串黑色的高級轎車，穿過剛剛降臨的夜幕，駛進了北京大學的校門，車剛剛停下，從車門內先後鑽出陳伯達、康生、江青、王力等人。他們通知在場的師生，相互轉告同學們到東操場，召開關於工作組的大辯論會，同時聶元梓和蒙在鼓裏的張承先，先後被請上了主席臺。

康生親自主持會議，他讓師生們辯論工作組，在這裏執行的是什麼路線？他還不斷地插言，宣佈遞上來的條子，都是反工作組的，每念一個條子都會引起一陣激烈的辯論。在辯論會上江青格外的活躍，她伸直脖子地喊，顯然她是非常的激動：“我們不怕雨，我們沒有那麼嬌貴。革命的站過來，不革命的滾出去！”後來這句話發展成“要革命的往前站，不革命的滾他媽的蛋，滾他媽的蛋，滾他媽的蛋！”

此時的辯論會早已失去辯論的位置，突然變成了控訴工作組的聲討大會，左派們紛紛上臺發言，一個個聲淚俱下，聲嘶力竭地怒斥工作組，壓制文化大革命運動的罪行，在場的師生無不義憤填膺。康生站起來一拍桌子，瞪著眼珠子吼叫道：“張承先，你站起來！”康生和江青二人相互責罵著張承先，火上澆油地煽動台下的紅衛兵，不一會兒台下的紅衛兵和師生們，象著了魔似的發狂起來，似乎場面難以控制。這時北大附中的一個女紅衛兵沖上主席臺，掄起皮帶劈頭蓋臉地抽打工作組組長張承先來。在萬人面前遭到這般的凌辱，卻不得又不忍氣吞聲，不敢有半句的聲辯。

第二次萬人大會召開之前，江青在北大燕南園 65 號小樓，密召了聶元梓。江青告訴她派工作組與趕工作組，涉及到兩個司令部，兩條路線的鬥爭，為此康

生、江青同劉少奇等同志進行了激烈的辯論，雙方在會上都拍了桌子，言外之意地點明瞭運動的方向。康生還在這次萬人大會上，公開宣佈了工作組在北京大學，執行了鎮壓革命群眾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條路線的罪證之一，就是壓制了堅定的革命左派聶元梓。同時陳伯達宣佈了撤銷工作組的決定。

趕走了工作組後，“六一八”紅色恐怖又重新出現，陸平、彭佩雲以及校系兩級幹部、教授、講師，二百多人被打成黑幫、走資派和反動學術權威，他們除了批鬥、遊鬥外，還要強迫勞動。在審訊中用煙頭燙、鐵棍打、鋼絲鞭抽等等的酷刑，不堪忍受而自殺身亡的就有 21 人，其中著名史學家、中共黨員翦伯贊教授夫婦都服毒自殺身亡，其現場慘狀目不忍睹。又因其林彪之女林立衡，因病兩次留級勸其退學，而執行陸平決定的教務長崔雄昆，和中文系總書記程賢策也在數難逃。他們在“向迫害林彪副主席女兒的兇手討還血債”的叫喊中相繼自殺，身亡後暴死野外無人收屍。

聶元梓也因一張大字報的功績飛黃騰達，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一帆風順，步步升高。先是北大校文革籌委會主任，繼而八月十八日毛澤東接見百萬紅衛兵和革命群眾時，聶元梓應邀登上天安門城樓，受到毛主席的親切接見並握了手。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日，北京市革命委員會成立時，她擔任副主任，兼任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代表大會核心組組長等職。一九六九年中共黨的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候補中央委員，這真是一步得道升天，步步無可阻擋啊！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七日，江青在國賓館召見聶元梓，要派她去上海串聯，並告訴她上海的運動開展得不錯，但主要是工人，學生卻很落後，你們去了要找學生組織多接觸。上海市委問題很嚴重，問題也沒有揭透，你們到上海串聯時可以見見張春橋，先從他那裏瞭解瞭解情況，做到有備無患。江青的一番叮囑的授

意之後，聶元梓離開國賓館回到校園，立刻召集“五虎上將”，傳達了江青的秘密命令，又詳細地制定了行動計畫，次日十一月十八日，帶孫逢一為上海之行的付帥。孫逢一和聶元梓同是社教運動的積極分子，同是陸平的打擊物件，文化革命運動中，在校內一系列重大問題上，同聶元梓的觀點態度始終保持一致，他辦事老練有幹勁，是打開新局面的能手。

他們剛到上海就將車駛入華東師大，在那裏住下。他們立刻研究串聯的分工，聶元梓負責發動學生、工人；孫逢一負責機關幹部。他們在學生和工人中間活動看大字報，召開座談會聽大家介紹情況。聶元梓在會上說：“光打到曹獲秋是不行的，還要反陳丕顯。”我們要“打進市委機關，讓市委後院起火。”後來聶元梓同張春橋秘密會晤，雙方決定“以打倒常溪萍為突破口，進而奪取上海市委”，不久又會晤了王洪文。

聶元梓組成了新北大、新師大聯合造反兵團，並同王洪文的工總司聯合起來。“召開了十五萬到二十萬人的大會，通過大會的決議，要求中央改組上海市委！”在批鬥會上聶元梓發言說：“堅決罷掉曹獲秋的官，堅決改組上海市委！”會後還支持王洪文到《解放日報》社奪權。

十二月十六日，聶元梓離滬返京，留下孫逢一繼續造反，孫逢一帶領造反者，進駐上海市委，並參與了康平路武鬥事件。致使上海市委書記、市長曹獲秋，市委書記楊西光，市委常委、教育部、衛生部長常溪萍多次挨鬥，最終曹獲秋、常溪萍被迫害致死。

一九六七年一月，上海市人民政府癱瘓，震撼人心的“一月風暴”傳遍全國。此時張春橋任上海市革委會主任，姚文元副主任。聶元梓、孫逢一在上海的造反活動，受到了王力、江青等領導人的鼓勵和表揚。此外，孫逢一還起草了一

份炮打鄧小平的大字報草稿，聶元梓簽名同意。這是全國貼出的第一張公開炮打鄧小平的大字報，指責“鄧小平是全國第二號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印發了鄧小平罪行錄之類的宣傳材料，還株連了鄧小平的兒子鄧撲方及妹妹鄧楠。在學校裏聶元梓主持成立了“一四零專案組”，對鄧朴方及其友好的同學立案偵查，非法拘禁了鄧朴方，並命名為“鄧朴方反革命小集團”。

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九日，聶元梓召集專案組成員，詢問拘審鄧朴方及同學的進展情況時，彙報人員對她說：“技術物理系哪個班，共 49 名學生中有 25 人，明確表示反對聶元梓，8 人同鄧朴方結成了‘反革命小集團’。這些人與鄧朴方和彭真之女傅雁等人有聯繫，他們常到鄧朴方家中活動。”另一個彙報人員補充說：“這些人都是死保劉鄧的，抓了他們對弄清內幕是有很重要的作用。”聶元梓聽完彙報後，表示支持對鄧朴方等人的審查，於是對鄧朴方的審訊加劇了。

八月九日和八月十四日，聶元梓主持的文化大革命北大委員會，向江青、陳伯達寫了報告和絕密《簡報》，聲稱“鄧小平通過其子鄧朴方組織反革命集團，控制北大運動。”鄧朴方立刻被剝奪了人身自由和申辯的權力，並開除中共黨籍，每日刑訊逼供。二十幾歲的鄧朴方，再也忍受不了非人道的折磨，從樓上縱身一跳以死抗爭來發洩自己的憤慨與不平，造成脊椎骨骨折。那時如果及時採取有效治療措施，還不至於終身殘廢，但是在那個年代，那個醫院，那個醫生敢收他呀？由於得不到充分的治療，鄧朴方的傷情惡化造成終身的殘廢，一個永久的文化革命烙印。

一九六七年一月，聶元梓聞訊江青在講話中說：“朱是反毛的”，她立刻召集手下由“新北大公社”與“中國作協會”組織聯合批判的班子，發起對朱德總司令的攻擊。他們先後炮製出《篡黨、篡軍大野心家朱德的自供狀》《歷史的偽

造者，反黨的野心家一再揭（《朱德將軍傳》）的大陰謀》等文章，刊登在北京大學“文化大革命委員會”主辦的《新北大》報上，發行五十五萬份。

一九六七年四月，聶元梓接到了康生的親筆信，要她“組織調查組系統地調查彭真、劉仁的問題”，聶元梓立刻照辦，馬上成立了“北大文革委員會揪叛徒兵團”，（即：新北大公社第二戰鬥隊）並將組建情況和“揪叛徒”的進展等，報送康生、謝富治，同時要求謝富治幫忙，請求公安機關大力的協助。

謝富治答應了他們的要求，委派一位副部長接見了“第二戰鬥隊”負責人，准許他們到全國各地的公安機關，查閱機密檔案。接著“第二戰鬥隊”的專案人員，根據聶元梓提供的線索進行調查，製造了“彭真、薄一波、安子文…胡仁奎、李陀特務案”。給中央專案辦公室“彭真專案組”提供了大量的材料，這些材料，造成中央認定彭真是“大特務”，致使彭真遭受逮捕入獄多年，劉仁被折磨而死，李陀被指定為特務，冤獄八年之久。

“一月風暴”之後，武鬥不斷上升，北京市各大專院校，武鬥也逐步升級。北京大學從聶元梓貼出的那張大字報之日起，反聶元梓的爭論就從未停止過。北大校園裏大大小小的眾多組織，掛滿了各自的造反旗幟，天天播放著相互攻擊的言詞，批駁著對方的“謬論”。

不過這些派別大多是，聶元梓的主要對手，為了反聶的共同目標，他們利用自己掌控的廣播站，鉛印的小報、傳單來攻擊聶元梓，咒罵她是“新北大”的“老佛爺”，是生活中的“破鞋”等等，不堪入耳的話語四處傳播，令聶元梓十分反感。

這些組織還利用聶元梓三月份“炮打謝富治”的事件，是攻擊北京市軍委，“反對謝富治罪該萬死！”來脅迫聶元梓。那知道三月二十五日，謝富治竟在北

大廣播台講話時說：“給他貼大字報的批評好…” ，明確表態支持聶元梓的行動，給那些反聶派殺了個回馬槍。

聶元梓借此機會，成立了許多專案組，把校園內的各個反聶組織，打成一個個“反革命小集團”，引起了反聶派的憤恨。自北大文革委員會成立後，一部分委員公開分裂，常委相繼退出，原來七人寫得大字報，已有六人加入反對派的行列。為了反對聶元梓，他們拉隊伍，立山頭，樹旗幟，聯合成一個號稱七千人的組織。聶元梓不給反聶派一分一厘的活動經費，他們就在校園裏外設立募捐站，向社會各界募捐。那些被聶元梓欺負的無路可走的教授、學者、幹部們，找到了宣洩不滿的機會，一個個解囊相助。反聶派利用這些捐資建立了廣播台，出版了鉛印小報。攻擊聶元梓占山為王，“破壞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攻擊聶元梓的生活作風，把一隻破鞋扔到了她的辦公室和家中。反聶派抓住聶元梓在策略上的失誤，用大標語貼到了天安門，王府井等繁華地區。

雙方鬥爭急劇白熱化，從貼大字報到大標語，從口頭辯論到高音喇叭相互亂罵，自然而然地發展到拳頭棍棒，長矛火槍。一九六八年立春以來，武鬥似連鎖反應一樣，在首都北京先後發生。

三月二十八日夜，北京大學的兩派終於武鬥起來了，聶元梓親臨陣前觀察陣勢，由於她經過戰爭年代的鍛煉，顯得臨危不懼，指揮若定，她要集中優勢兵力，武力解決反聶派。

三月二十九日凌晨，反聶派雖然號稱七千人，但是沒有一個統一領導機構，武鬥起來不堪一擊，被聶家軍打得落花流水。

四月二十六日，聶元梓指揮大舉進攻，把所有反聶派逼迫到宿舍樓內，他們斷水、斷電、斷糧，反聶派人員奄奄一息，完全喪失了抵抗的能力，被聶家軍抓

去當了俘虜，一個個被蒙上眼睛，接受專案人員的非法審訊，武鬥期間聶元梓不費吹灰之力，就取得了鎮壓反聶派的勝利。

武鬥期間聶元梓觀戰之後，在返回的路上，被一些激動的師生包圍起來，其中有聶派們上前慶賀武鬥告捷的，也有反聶派指責聶元梓挑起武鬥，“屠殺革命群眾”的，現場一片混亂，於是又發生了爭吵，扭打。混亂中有兩名反聶派學生擠近聶元梓，一個打了她兩拳，另一個用改錐捅了聶元梓的手背，但均沒有刺破她的衣袖受傷。當時聶元梓也沒有在意，回去後經人一提醒，聶元梓憤憤難平，立刻借題發揮，製造出“刺殺聶元梓”的事件來。

經過一番策劃後，聶元梓的廣播台播出了“刺殺聶元梓”的聳人聽聞的消息，同時還播出一個以北京衛戍區名義，發佈的通緝令，勒令反聶派立刻交出“刺殺聶元梓兇手”，這件事驚動了社會各界。那兩位反聶派的學生，原來本想動手解解恨氣，不料授人以柄加速了自己一派的瓦解。那兩位所謂的“刺殺聶元梓兇手”，一直受到同伴和社會有關人員的保護，免遭其害。

一九六八年七月至八月間，各地武鬥不斷升級，血案、慘案頻頻發生。在這種形勢下，毛澤東決定派解放軍宣傳隊、工人階級宣傳隊進駐北京大學，“佔領上層建築舞臺”，解除了雙方的武裝，兩派各自拆除武鬥工事，內戰狀態基本結束。

七月二十八日凌晨三點半，毛澤東召見了北京“五大學生領袖”——聶元梓、蒯大富、韓愛晶、譚厚蘭、王大賓，進行了長達五個小時的談話，毛澤東對他們發出警告，告誡他們不要再打內戰了。並說誰再不聽進行武鬥，就是土匪，就是國民黨，就要包圍起來，實行殲滅。這番話使得解放軍宣傳隊，工人宣傳隊

能夠儘快地控制各學校的局勢，校內武鬥結束後，聶元梓也失去了往日的威風，失去了北大造反派領袖的地位。而且軍宣隊、工宣隊一直沒有給她以適當的安排。

一九六八年九月至一九六九年四月，聶元梓被隔離審查。

一九六九年八月，聶元梓被分派到江西省鯉魚洲北大分校農場勞動。

一九七一年二月七日至一九七三年四月二十四日，聶元梓再次被隔離審查，並限制自由行動。

一九七三年，聶元梓被安排到新華印刷廠參加勞動，吃住在廠內。

一九七五年，聶元梓又轉回北京大學儀器廠勞動。“四人幫”被粉碎後，她第三次被隔離審查。

一九七八年四月十九日，聶元梓正式被捕銀鑰入獄。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判處其有期徒刑十七年，那年聶元梓才 57 歲。

1968 年聶元梓就在“文革”派系鬥爭中失去了人身自由，接受勞動改造。

“文革”結束後，1983 年，聶元梓被以“反革命煽動罪、誣告陷害罪”正式判刑 17 年，並於 1986 年 10 月 16 日獲得釋放。

在監獄中，聶元梓拒穿囚衣，她一直認為自己無罪。18 年失去了人身自由

假釋後，依據國一辦司字 133 號檔精神和北京市勞改局的通知規定，她不斷表示希望回到原單位北京大學，但一直沒有獲得回音。至於摘掉“反革命”帽子的平反訴求，更如石沉大海。

剛出獄的時候，聶元梓生活困苦，“到處流浪，住在學生、親戚家，所有關係都住過了。都是社會上認識或不認識的人給我錢，才活下來。”這之後，她曾有過一段從商的經歷，但並未因此致富。

1998年，北京市民政局給她每個月600元錢的救濟款（現在漲到2600元），次年，她又獲得了醫保。2006年4月，她住進北京市民政局免費借助的樓房內。

第二節 第一張大字報

宋碩、陸平、彭佩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麼？

現在全國人民正以對黨對毛主席無限熱愛、對反黨反社會主義黑幫無限憤怒的高昂革命精神掀起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為徹底打垮反動黑幫的進攻，保衛黨中央，保衛毛主席而鬥爭，可是北大按兵不動，冷冷清清，死氣沉沉，廣大師生的強烈革命要求被壓制下來，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原因在哪裡？這裏有鬼。請看最近的事實吧！

事情發生在五月八日發表了何明、高炬的文章，全國掀起了聲討“三家村”的鬥爭高潮之後，五月十四日陸平（北京大學校長、黨委書記）急急忙忙的傳達了宋碩（北京市委大學部副部長）在市委大學部緊急會議上的“指示”，宋碩說：現在運動“急切需要加強領導，要求學校黨組織加強領導，堅守崗位。”“群眾起來了要引導到正確的道路上去”，“這場意識形態的鬥爭，是一場嚴肅的階級鬥爭，必須從理論上徹底駁倒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論。堅持講道理，方法上怎樣便於駁倒就怎樣作，要領導好學習檔，開小組討論會，寫小字報，寫批判文章，總之，這場嚴肅的鬥爭，要做得很細緻，很深入，徹底打垮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論，從理論上駁倒他們，絕不是開大會所能解決的。”“如果群眾激憤要求開大

會，不要壓制，要引導開小組會，學習檔，寫小字報。”

陸平和彭佩雲（北京市委大學部幹部、北京大學黨委副書記）完全用同一腔調佈置北大的運動，他們說：“我校文化革命形勢很好”，“五月八日以前寫了一百多篇文章，運動是健康的。……運動深入了要積極引導。”“現在急切需要領導，引導運動向正確的方向發展”，“積極加強領導才能引向正常的發展”，“北大不宜貼大字報”，“大字報不去引導，群眾要貼，要積極引導”等等。這是黨中央和毛主席制定的文化革命路線嗎？不是！絕對不是！這是十足的反對黨中央、反對毛澤東思想的修正主義路線。

“這是一場意識形態的鬥爭”，“必須從理論上徹底駁倒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論”，“堅持講道理”，“要作的細緻”。這是什麼意思？難道這是理論問題嗎？僅僅是什麼言論嗎？你們要把我們反擊反黨反社會主義黑幫的你死我活的政治鬥爭，還要“引導”到哪裡去呢？鄧拓和他的指使者對抗文化革命的一個主要手法，不就是把嚴重的政治鬥爭引導到“純學術”的討論上去嗎？你們為什麼到現在還這麼幹？你們到底是些什麼人？

“群眾起來了，要引導到正確的道路上去”。“引導運動向正確的方向發展”。“要積極領導才能引向正常的發展”。什麼是“正確的道路”？什麼是“正確的方向”？什麼是“正常的發展”？你們把偉大的政治上的階級鬥爭“引導”到“純理論”“純學術”的圈套裏去。不久前，你們不是親自“指導”法律系同志查了一千五百卷書，一千四百萬字的資料來研究一個海瑞“平冤獄”的問題，並大肆推廣是什麼“方向正確，方法對頭”，要大家學習“好經驗”嗎？實際上這是你們和鄧拓一夥黑幫一手製造的“好經驗”，這也就是你們所謂“運動的發展是健康的”實質。黨中央毛主席早已給我們指出的文化革命的正確道

路、正確方向，你們閉口不談，另搞一套所謂“正確的道路”，“正確的方向”，你們想把革命的群眾運動納入你們的修正主義軌道，老實告訴你們，這是妄想！

“從理論上駁倒他們，絕不是開大會能解決的”。“北大不宜貼大字報”，“要引導開小組會，寫小字報”。你們為什麼這樣害怕大字報？害怕開聲討大會？反擊向党向社會主義向毛澤東思想猖狂進攻的黑幫，這是一場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革命人民必須充分發動起來，轟轟烈烈、義憤聲討，開大會，出大字報就是最好的一種群眾戰鬥形式。你們“引導”群眾不開大會，不出大字報，製造種種清規戒律，這不是壓制群眾革命，不准群眾革命，反對群眾革命嗎？我們絕對不答應！

你們大喊，要“加強領導，堅守崗位”，這就暴露了你們的馬腳。在革命群眾轟轟烈烈起來響應黨中央和毛主席的號召，堅決反擊反黨反社會主義黑幫的時候，你們大喊：“加強領導，堅守崗位”。你們堅守的是什麼“崗位”，為誰堅守“崗位”，你們是些什麼人，搞的什麼鬼，不是很清楚嗎？直到今天你們還要負隅頑抗，你們還想“堅守崗位”來破壞文化革命。告訴你們，螳臂擋不住車輪，蚍蜉撼不了大樹。這是做白日夢！

一切革命的知識份子，是戰鬥的時候了！讓我們團結起來，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團結在黨中央和毛主席的周圍，打破修正主義的種種控制和一切陰謀詭計，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消滅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魯雪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

保衛黨中央！

保衛毛澤東思想！

保衛無產階級專政！

哲學系 聶元梓 宋一秀 夏劍彖 楊克明 趙正義 高雲鵬 李醒塵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

(原載《人民日報》一九六六年六月二日)

《紅旗》一九六六年十一期

大字報貼出去，引起很大的反響，一石激起千層浪。事情非常巧合，當年反右派運動的前期，大鳴大放的時候，譚天榮(1957年因為參加“鳴放”發表個人言論被打成右派的北大學生)的大字報也是貼在這裏的。歷史的巧合，讓人產生聯想，看著我們的大字報，有人說，譚天榮又出現了；有人說，這是反革命大字報，是反黨；當然也有贊成我們的大字報而反對這些意見的，自然地形成了辯論的場面。學生們本來是下午要去上課的，這樣一來，教室也不去了，就在大飯廳外面，三個一群，五個一夥地，爭論得熱火朝天，而且像滾雪球一樣地，越滾越大，人越來越多。高雲鵬還受到了他人的圍攻和推打。

第四章 五十多天

從1966年5月16日起“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後，以6月初到1966年7月18日，毛澤東返京北京這段時間，毛澤東稱“在五十多天裏”。

第一節 劉少奇、鄧小平與“文革”初期的工作組

1966年“文化大革命”發動之初，在中共中央第一線主持日常工作的劉少奇、鄧小平等，以派遣工作組為契機，進行了一場艱難抗爭。這是一場同林彪、

江青的抗爭，也是同不斷發展的黨內個人崇拜趨向的抗爭；是一次艱難而又曲折、複雜而又特殊的抗爭。其目的是力求使內亂初起便受到遏制。儘管這場抗爭最終未能阻擋錯誤進一步發展，黨、國家和人民遭到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但這畢竟是于“文革”初期就挺身而出制止內亂的首先之舉，它和“二月抗爭”等行動一起，為後來糾正“文革”錯誤，實行全面撥亂反正作了一定準備。

一、劉少奇、鄧小平等派遣工作組的前前後後

劉少奇、鄧小平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所做的抗爭，是在極其艱難的條件下進行的。

是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發表的姚文元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以彭真為組長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①於1966年2月擬定了《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彙報提綱》（簡稱《二月提綱》）。對於這樣一個力求在黨的領導下，糾正文化領域批判運動中極左傾向，限制其發展成為嚴重政治鬥爭的《提綱》，劉少奇於2月5日召集包括鄧小平參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討論後表示同意。12日，鄧小平簽發了這份《提綱》。

毛澤東在上海嚴厲地批評《二月提綱》是“混淆階級界限，不分是非，是錯誤的”，並對劉少奇、鄧小平等沒有從階級鬥爭和反修防修鬥爭的高度及時支援姚文元文章表示了強烈不滿。他說：只反國際的修，不反國內的修？我歷來主張，中央不對時，地方攻中央。“如果中央出修正主義，地方要造反”，“要支持小將，保護孫悟空。再不支持，就解散五人小組、中央宣傳部、北京市委，不管哪個省市！”不久，毛澤東在杭州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決定撤銷《二月提綱》和彭真為組長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代之以《中國共產黨中央

委員會通知》和成立直屬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陳伯達為組長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隨後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雖然由劉少奇主持，但會議主要內容已由中央常委會決定。會議通過了《五一六通知》，十多天後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宣告成立。這兩件不同尋常的事情標誌著“文化大革命”的開始。圍繞著派遣工作組問題，劉少奇、鄧小平等和林彪、江青、陳伯達等展開了爭論，實際上這是劉、鄧對林、江、陳亂中奪權的堅決抵制，也可以說是派遣工作組的背景。

（一）劉少奇、鄧小平決定派遣工作組之初各方面並沒有異議

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以後，鑒於聶元梓在北京大學內突然張貼出北京大學黨委和中共北京市委的大字報，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這 3 位負責中共中央、國務院日常工作的政治局常委召集會議，決定由陳伯達率臨時工作組進駐《人民日報》社，由華北工作組進駐北京大學。這一決定由周恩來當即打電話彙報給在杭州的毛澤東，並取得同意。為慎重起見，第二天，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又聯名致信毛澤東，正式請示派工作組問題。信中說：鑒於人民日報社許多同志“迫切要求中央派工作組去”，我們開會討論，“擬組織臨時工作組，在陳伯達同志直接領導下，到報館掌握報紙的每天版面，同時指導新華社和廣播電臺的對外新聞。在京工作組人員擬於五月三十一日即進報館工作。” 4 小時後，毛澤東即批示：“同意這樣做。”可見，派遣工作組最初是得到了毛澤東的首肯的，就連林彪、陳伯達也一度表示贊同。解放軍總政治部抽調了 300 多名幹部參加向文化系統派出的工作組，就是經林彪同意的。當時，包括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都沒有對此提出異議。

本來，劉少奇、鄧小平等決定陳伯達率領工作組進駐《人民日報》社，是為了遏制該社有些失控的局面，但該報 6 月 2 日不僅登載了聶元梓等 7 人的大字報，而且還發表評論員文章，鼓動各地青年學生“造修正主義的反”。北京和許多大中城市的大中學生，錯誤地把學校領導和一些教師當作“黑幫”來批鬥，亂批亂鬥亂揪之風，無政府主義之風迅速蔓延，許多學校的黨組織很快就陷於癱瘓。針對這種情況，劉少奇於 6 月 3 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鄧小平等參加，聽取中共北京市委關於“文化大革命”情況的彙報，同意北京市委在彙報中提出的關於運動的八條要求。劉少奇認為，社會主義文化革命已是高潮，因此，要使北京市大中學校有良好秩序，要把學生很快地組織起來，走上軌道。鄧小平則明確地說：中央的八條傳達要快，開個 10 萬人大會，一杆子插到底！可見，他們急於扭轉嚴重的混亂局面。鑒於北京市委領導提出：“有的學校領導癱瘓了，領導不起來，就派工作組進去領導，希望團中央、中組部組織人力幫助。”會議同意這個建議，決定向北京市一些大學、中學派出工作組，成員分別由中組部從各部委和團中央從機關幹部中抽調。這時，北京市大多數學校的青年學生紛紛要求派工作組進駐學校。鑒於無政府主義狀況日趨嚴重，經黨中央同意，中共北京市委加快了各校工作組的進駐。全國許多省、市和中央一些部委，迫於嚴重混亂、近乎失控的局勢，也紛紛仿效北京市的做法，自動向一些單位派出工作組。6 月 16 日，鄧小平主持的中央書記處決定向中央宣傳部派出工作組。

為了引導運動的正常發展，控制日趨混亂的局面，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幾乎一兩天就召集一次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研究對策。並於 6 月 10 日至 12 日，前往杭州兩次參加毛澤東主持召開的討論“文革”運動的會議。對於工作組問題，會議也沒有專門討論，只是毛澤東在議論過程中說：派工作組太快了並不

好，沒有準備，不如讓它亂一下，混戰一場，情況清楚了再派。過早地派工作組對於文化革命並不利。可見，毛澤東對派工作組太快了表示異議，但也沒有要求把北京已基本進校的工作組都撤回來。

（二）工作組作用

“杭州會議”結束以後，在北京指導運動的責任落在了劉少奇、鄧小平身上。6月13日，在劉少奇、鄧小平主持下，中共中央、國務院聯合發出通知，宣佈1966年高等學校推遲半年招生，中共中央還批准了中南局、西北局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意見和報告。6月14日，劉少奇、鄧小平又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傳達杭州會議精神，此後又多次主持會議，聽取情況彙報，研究運動中出現的問題。

6月18日上午，北京大學一些學生把40多名“黑幫”、“反動學生”揪到校園批鬥，北大工作組堅決制止，結果引起一些學生不滿。第二天，清華大學出現公開驅趕工作組的情況，北師大一附中，也貼出了反對工作組的大字報。劉少奇決定將《北京大學文化革命簡報（第九號）》轉發全國，並代中共中央起草批語說：“中央認為北大工作組處理亂鬥現象的辦法是正確的，及時的。各單位如果發生這種現象，都可參照北大的辦法處理。”這一舉措，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北京內外已發生的一些亂批亂鬥亂打的違法亂紀現象。6月20日下午，劉少奇還專門同北師大附中部分工作組成員談話。他主張發動多數師生支持工作組。要把討論反工作組大字報這一仗打好，隊伍才放心，先打好這一仗。6月21日，劉少奇提出：特殊情況下，工作組可以代行黨委職權，有的學校出現趕工作組、向工作組奪權，要奪檔案、槍支、廣播這些權，這不能允許，不准隨便提出奪權。

不好的工作組也可以撤走，但是不要黨的領導、中斷黨的領導是不好的。鄧小平也在會上提出了關於工作組工作方法的意見。6月22日，劉少奇、鄧小平致信毛澤東：“為了更好地推進全國文化大革命運動，幫助各級黨委和幹部貫徹執行黨的民主集中制，發揚民主，改進工作”，準備在“七一”黨的45周年紀念日公開發表毛澤東1962年1月《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並請毛澤東批示。毛澤東閱後說：在黨內發表就行了。暫不公開發表，再等一年。②6月28日，劉少奇、鄧小平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又提出：運動要有步驟，要制訂一些便於掌握的具體政策。鄧小平還提議8月份完成計畫進度的1/3。後來，劉少奇講：在當時無政府主義氾濫情況下，“一開始就要業已發動起來的廣大群眾按照我們和工作組主觀設想的計畫和步驟行動。”

6月30日，鄧小平起草一封和劉少奇的聯名信，請示毛澤東，要求發出《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工業交通企業和基本建設單位如何開展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通知》，得到毛澤東的贊同，表示：“應當迅速將此通知發下去”。7月11日下午，劉少奇聽取了進駐北師大一附中工作組的彙報後又指出：對於犯錯誤的青年學生，“只要改正錯誤，交待清楚。改正錯誤，我們還歡迎嘛，如果有錯誤不改，就跟他辯論，擺事實，講道理嘛。”你們要注意，不要打人，不要罵人，對於老教師，“批評一下，改一些，還可以用。”他要求工作組同志“很好調查研究，充分準備，才能講出好話，才能有教育意義。”③

上述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開始恢復了學校的教學和工作秩序，相當程度地控制了無政府主義的蔓延。社會治安開始好轉。

（三）工作組的撤與不撤之爭

劉少奇、鄧小平等採取的措施，同陳伯達為組長的中央文革小組要求取消工作組，製造更大社會混亂做法格格不入，雙方就領導“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方針、政策等出現了嚴重分歧，具體表現在對待工作組的問題上。實際上，背後煽動青年學生大鬧無政府主義的正是中央文革小組，他們在工作組制止混亂已見成效時，就把矛頭直接對準了工作組。他們一方面通過某些人在下面挑動學生同工作組對立，另一方面公開在某些場合對工作組提出種種非議。結果使不少學校內，在擁護還是反對工作組問題上分成了兩派，驅趕工作組的事件屢屢發生。身為第一個工作組組長的陳伯達，竟在他參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召集的彙報會上，提出取消工作組，遭到與會多數人的反對，劉少奇、鄧小平支持多數人意見，否決了陳伯達代表中央文革小組提出的意見。但是，爭論並沒有中止，而是越來越尖銳、激烈。7月19日，陳伯達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上講：“工作組不會比學生高明，工作組都自稱是黨中央、毛主席派去的。有的工作組整學生。”對陳伯達的責難，多數人仍表示不同意。鄧小平說：“對工作組要正確估計。我們對這樣運動沒有經驗，他們也沒有經驗。壞的工作組可以先撤，好的工作組可以留，代理黨委工作。”主持會議的劉少奇也說：“工作組有好的，有壞的，他們在第一線，有他們的辛苦，要求不能過高。現在是如何幫助他們、教育他們、總結工作經驗。”有的老同志認為，還有個“七月會議”，矛頭是對著陳伯達中央文革的，半年後發生了“二月抗爭”，使“七月會議”表現出來的鬥爭沒有那麼引人注意。④

1966年7月22日，劉少奇主持會議，討論《北京市高等院校文化大革命初步規劃》。會議先是聽取北京高校目前“文革”運動情況彙報。之後，中央文革小組的人立即發言，他們大批市委工作組，說工作組怕群眾，壓制民主，給群眾

運動潑冷水。劉少奇駁斥了“文革”小組的發言，說：我們有材料，你們這裏挑動群眾鬥群眾。康生拍了拍皮包說，我們也有材料。陳伯達接著講了一番話，重彈中央領導怕群眾的調子，提出要從北京大學撤回工作組。小平同志忍無可忍，他霍地一下站起來，一手叉腰，一手指著陳伯達，厲聲說：你們說我們怕群眾，那你們去前邊試試！他還明確表示：“撤工作組我不贊成。”^⑤劉少奇也明確講：多數工作組是好的，還是幫助教育，改正錯誤。趕工作組，有的不應該趕。這次會議還確定了關於高等院校如何開展運動的4條指示。關於這次會議上大多數中央領導人批評和抵制陳伯達、康生的情況，從江青十多天後的談話中也略見一斑。她說：“二十二號晚上胡克實同志彙報說‘已經走上正軌了’。這次彙報會雪峰同志參加了。我們的組長、顧問沒有發言權，講一句話就被打斷。這次彙報會共用了五個多小時，薄一波、陶魯笏卻講了三個多小時，他們的鋒芒完全針對學生的，他們有充分的發言權。”後來，劉少奇也客觀地敘述了這場關於工作組問題的爭論，他說：陳伯達“早就提出了不派工作組或者撤出工作組，提了三次”，“第一次提出來沒有多討論。第二次陳伯達書面提出兩條。討論時，多數同志還是要工作組，發言要工作組，認為工作組有方便之處，要去就去，要撤就撤”。當時劉少奇考慮：這樣大的運動，北京各院校部分組織已經癱瘓，怕中斷了黨的領導不好。第三次，陳伯達“又提出這個問題，又討論了一次，多數同志還是不主張撤。我仍是以前的觀點。我認為這一方法較機動，沒有下決心撤。同時，主席快回來了，回來再請示決定。”

（四）毛澤東對工作組工作狀況的嚴重估計

劉少奇、鄧小平等派遣工作組指導運動取得的成效，與毛澤東“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的設想很不一致，加上陳伯達等的彙報，於是，毛澤東於7月24

日、25日連續同中央政治局常委、各中央局書記和中央文革小組負責人談話，嚴厲地批評了工作組：有這麼一段，運動冷冷清清；工作組一不會鬥，二不會改，只會起阻礙運動的作用，都要把它撤出來。他進一步說：最近一個月，工作組是阻礙群眾運動，阻礙革命勢必幫助反革命，幫助黑幫。工作組搗了很多亂，要它幹什麼？⑥這番嚴厲地，其指責對像是不言而喻的。於是，在當時黨內生活已很不正常的情况下，劉少奇、鄧小平等服從了毛澤東的決斷。7月26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決定撤銷工作組；27日，中央文革小組起草了撤銷工作組決定；28日，中共北京市委發出了鄧小平代為起草、周恩來審定的《關於撤銷各大專學校工作組的決定》。

不過，劉少奇、鄧小平仍主張對工作組要具體分析，區別對待，不能一概而論。在7月29日召開的北京市大專院校和中等學校師生文化革命積極分子大會上，劉少奇一方面對派工作組問題代表黨中央承擔了責任，同時又說：“工作隊員過去這一段時間的工作是在你們學校裏作的，他們犯了錯誤或者作了好事，是在你們學校裏作的，成千上萬的人看到了，你們都清楚。當然，各學校工作組的工作不會是一樣的，或不完全一樣的。”⑦周恩來在會上說：工作組“絕大多數同志是好同志，經過這次接觸，你們瞭解他們，他們也瞭解你們，建立了革命的聯繫，革命的友誼。”⑧鄧小平在這次會上也說：“作組有好的；有的是比較好的，但是也犯過這樣那樣錯誤的。”“工作組的大多數同志在主觀上，是想把事情搞好的。領導上對他們的幫助也不夠。”加上他們“沒有搞文化大革命的經驗。”他認為，“工作組多數同志是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錯誤，有些責任要由上級來負擔。”⑨這次會議上，宣佈撤銷所有的工作組。

和劉少奇、鄧小平要區別對待工作組的態度相反，毛澤東更為嚴厲地指責工作組，他認為劉、鄧指導運動走了彎路，工作組犯了方向、路線錯誤，壓制了剛剛興起的運動。這就使得劉、鄧不得不一再地作檢討。8月1日，劉少奇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作報告，報告的後半部分著重談“文革”以來的工作，在工作組問題上又作了自我批評，他說：“這一段我在北京，‘文化大革命’中有錯誤，特別是工作組問題上出了問題，責任主要由我負。”^⑩8月2日，劉少奇參加了北京建築工業學院的大會，3日晚，又到該院找幾派學生組織代表談話，4日晚，他又在中南海找工作組負責同志談話，詢問了一些情況。可見，劉少奇等儘管思想上沒有通，但都想努力跟上毛澤東。然而，毛澤東對工作組的錯誤估計得相當嚴重，他說：工作組不到10%是好的，90%以上的工作組是完全錯誤的。工作組不管怎麼樣是做了壞事，一不能鬥，二不能批，三不能改。鬥爭壞人它不捨得，批判學術權威，它沒有本領，改革教育制度，它也不行，起了一個鎮壓群眾、阻礙群眾的作用，起了個壞作用。一般說，就是90%以上的工作組幹盡了壞事。(11)

8月4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講話，把“文革”初期劉少奇、鄧小平等主持下的工作，說成是方向、路線問題，是路線錯誤，提出這次全會“要解決問題，否則很危險。”

劉少奇、鄧小平還是努力按照毛澤東對問題提的高度，數次作口頭或書面檢討。尤其是以10月23日的檢討稿最具代表性。劉少奇說：“在工作組派出之後的五十多天中，我是一直支持工作組的，這樣就增加了工作組犯錯誤的可能性、嚴重性。有少數工作組實在不能維持下去了，把工作組撤離之後，接著又派了新的工作組去。工作組的負責人大多數不理解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又沒有好好向群眾學習，一開始就要業已發動起來的廣大群眾按照我們和工作組主觀設想的計

畫和步驟行動。這樣，就違背了革命的群眾運動發展的規律，就發生了許多嚴重事件，就在事實上站到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去了，實行了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革命運動打了下去，顛倒了是非，混淆了黑白，長了資產階級的威風，滅了無產階級的志氣。”（12）這時，劉少奇已由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名第二位下降到第八位。鄧小平雖然排在第六位，但他和劉少奇一起因被指責是犯了“路線錯誤”，已不再參與中央日常領導工作。

二、劉少奇、鄧小平派遣工作組嚴重受挫後的結局

健康、有序地指導“文化大革命”，是劉少奇、鄧小平等派遣工作組的願望，結果工作組被迫撤回，劉、鄧在“文革”初期的這次抗爭以嚴重受挫而告中止。隨後出現的幾種結果更令人痛惜。

（一）由於抗爭嚴重受挫，“文化大革命”運動迅速朝著混亂、反動的方面發展，終於醞成了一場全面內亂

“文革”發動初期，劉少奇、鄧小平在第一線主持工作。但是，林彪、陳伯達、江青等認為，按照劉、鄧的做法，難以達到的目的，所以，一方面直接幹擾劉少奇、鄧小平等代表中共中央做出的較為正確的運動部署，另一方面背著多數中央政治局常委向毛澤東作的彙報。林彪曾說：“要弄得翻天覆地，轟轟烈烈，大風大浪，大攪大鬧，這半年就要鬧得資產階級睡不著覺，無產階級也睡不著覺。在靈魂上來個大震動，徹底打倒資產階級權威。”顯然這裏的資產階級權威是有針對性的。這次全會以後，“文革”運動在全國不受限制地迅猛展開，社會秩序很快就陷入極度混亂。

在林彪、陳伯達的煽動下，全國隨即出現了批判“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狂潮。由於這種批判矛頭指向是劉少奇、鄧小平和各級領導幹部，所以，遭到了大批領導幹部的抵制和反對。1967年2月，一批老一輩拍案而起，公開反對“文革”（即被林彪等稱為“二月逆流”之事），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發生的。儘管這次“二月抗爭”同劉少奇、鄧小平在1966年作的抗爭一樣，最終都受到強烈壓制，但是，這種抗爭一直沒有停止，只是以另外的形式繼續著。

（二）由於抗爭嚴重受挫，作為領導這次抗爭的劉少奇、鄧小平，被誣衊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代表而受到批判和政治迫害，特別是劉少奇被羅織的莫須有罪名永遠開除出黨，直至含冤身亡，從而製造了共和國歷史上最大的冤案。

1966年8月初，儘管劉少奇、鄧小平已經服從了毛澤東撤回工作組的決斷，但毛澤東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期間，仍相當嚴厲地批評劉少奇、鄧小平等主持下的中央領導工作。8月4日他當著劉少奇、鄧小平等人的面講：“在前清時代，以後是北洋軍閥，後來是國民黨，都是鎮壓學生運動的。現在共產黨也鎮壓學生運動。……說得輕一些是方向性的問題，實際上是方向問題、路線問題，是路線錯誤，違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明明白白站在資產階級方面反對無產階級。……這是鎮壓，是恐怖，這個恐怖來自中央。”雖然劉少奇主動承擔責任，說主席不在家，“我在北京主持工作，我負主要責任。”毛澤東卻說：你在北京專政嘛，專得好！第二天，他又寫了大字報並印發全會代表，在較大範圍內公開了中央領導層工作指導思想上的分歧，並把這種分歧提到兩個司令部鬥爭的高度。毛澤東寫道，從6月初以來的“五十多天裏，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

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志氣，又何其毒也！”（13）後來，他又講：過去 50 天，那個司令部只領導了一種思潮。派工作組的人要承擔責任。很明顯，毛澤東的講話和大字報直接針對以劉、鄧為代表的主持黨和國家日常工作的中央領導人。

但是，林彪、陳伯達等在 10 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迫不及待地點名批判劉少奇、鄧小平。陳伯達說：“提出錯誤路線的，是錯誤路線的代表人，即劉少奇和鄧小平兩位同志，他們負主要責任”。10 月 23 日，劉少奇、鄧小平誠懇做完檢討的第二天，林彪仍步步緊逼，他說：“中央有幾個領導同志，就是劉少奇、鄧小平同志，他們搞了另外一條路線，同毛主席的路線相反”，“這次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錯誤路線，主要是劉、鄧發起的。”他們實行的是“一條壓制群眾、反對革命的路線”。這次會議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稱“劉鄧是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是“赫魯雪夫”。張春橋則公開煽動造反派打倒劉少奇、鄧小平。他說：“中央那一兩個提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至今仍不投降”，要“痛打落水狗，把他們搞臭，不要半途而廢。”（14）此後不過一個星期，造反派們就大量張貼“打倒劉少奇！”“打倒鄧小平！”“和劉、鄧血戰到底！”的大字報，公開喊出“劉少奇、鄧小平是黨內最大的資產階級當權派，中國現代修正主義的祖師爺，資產階級司令部黑司令”的口號。並在 1967 年 1 月兩次批鬥了劉少奇、鄧小平。

毛澤東在 1967 年 2 月以前，他會見外國共產黨領導人時，還稱劉少奇為同志，提出在準備召開的中共九大上，“劉、鄧是不是能選上（中央委員），我的意見還是應該選上。”甚至他同張春橋、姚文元談話時還幾次講到，劉少奇看來九大還要選他當中央委員。他同鄧小平面談時仍主張他進中央委員會。

但是，林彪、江青等卻處心積慮地陷害劉少奇、鄧小平。他們一方面鼓動造反派把“打倒劉、鄧”的反動輿論迅速地傳向全國，另一方面設立專案調查組，羅織罪名，誣陷劉少奇有重大歷史問題，有一條“劉少奇叛徒集團組織路線”。江青曾在捏造的“罪證材料”上寫道：“劉少奇是大叛徒、大內奸、大工賊、大特務、大反革命，可說是五毒俱全的最陰險、最兇狠、最狡猾、最歹毒的階級敵人。隱藏如此深、如此久，如果沒有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怎能暴露和揪出來？”林彪也批示：“挖出劉少奇這個隱藏四十多年的特大壞蛋，清除一最大隱患，更加證明文化大革命的意義無比深遠。”林彪、江青製造的關於劉少奇的“罪證材料”，終於改變了毛澤東原有的態度。1968年10月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表決通過了《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決定“撤銷劉少奇黨內外一切職務，永遠開除出黨，並繼續清算劉少奇及其同夥叛黨叛國的罪行。”

（三）由於抗爭嚴重受挫，黨內民主和國家政治社會生活遭到極為嚴重地破壞。

撤回劉少奇、鄧小平等派出的工作組，名義上是直接依靠群眾，實際上既脫離了黨的組織，又脫離了廣大群眾。因為派工作組是針對黨的各級組織普遍受到衝擊難以正確領導運動而採取的有力措施。工作組撤回以後，黨的各級組織進一步受到衝擊並迅速半癱瘓、癱瘓，各級領導幹部普遍受到批判和鬥爭，廣大黨員被停止了組織生活，黨長期依靠的許多積極分子和基本群眾受到排斥。黨內民主和國家政治社會生活受到了極為嚴重地破壞。

實際上，在劉少奇、鄧小平派工作組之前，黨內生活已很不正常了。姚文元的文章形成過程不說，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五一六通知》時，有人從語法文字角度提了點修改意見，也被陳伯達等拒絕。結果是一字未改，一個標點未動。難怪劉少奇當時就責問：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叫大家討論，提了意見不改，連幾個字都不改，這不是獨斷專行，不符合民主集中制嗎？尤其是林彪大講政變問題，鼓吹個人崇拜的“五一八”講話，竟被認為是“一個極為重要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檔”下發全黨，“認真學習，認真討論，認真領會”。

當時召開的幾次中央全會。1966年8月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不僅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都列席，連聶元梓等所謂革命師生代表也始終與會。至於兩年後中共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僅從組織原則看，在195名中央委員、中央候補委員中，被稱為“叛徒”、“特務”等罪名不准出席會議的人達52.7%，中央委員因不超過半數只得增補。而擴大進來與會的人卻達74人，占與會人數的57%還多，有的人連中央委員都不是，還被指定為組長、副組長。後來得知，擴大進來的竟有一人不是共產黨員。

另外，當時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參加會議的常委們實際上已無法平等地集體討論問題。在劉少奇、鄧小平等多次主持的政治局常委會或常委擴大會議上，多數人一直對撤回工作組持否定態度。但是，毛澤東回到北京後連續兩次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批評工作組並決意撤回。在八屆十一中全會原定議程中沒有改組中央領導機構的內容，但由於毛澤東臨時提議，中央委員會、政治局，甚至常委會在沒有醞釀討論的情況下，最終還是按毛澤東的意見選舉了11名常委。事實上，多數常委有名無實，根本不能正常地行使職權。

“無文革”之初，1966年5月底，經中共中央批准並征得在外地的毛澤東的同意，才派出了第一個工作組，陳伯達帶工作組進駐《人民日報》社以後，6月1日就發表了未報告黨中央的《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當日晚，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又廣播了責難北京大學黨委、北京市委的聶元梓等7人的大字報。劉少奇、鄧小平等既不贊同這些不經過組織程式、不採取正常方式的做法，又對這些得到毛澤東支持的做法無法反對。還有，對於劉少奇的處理。從立案審查到在中央全會上通過審查報告的近兩年中，對劉少奇本人一直保密。整個過程既不聽取本人對審查問題的陳述和解釋，又對本人主動作的口頭爭辯和書面報告不予理睬，完全剝奪了他作為黨員按照黨章規定實行申述的權利。

從發動“無文革”之初，毛澤東就感到多數領導幹部並不很支持。他曾擔心說：文化革命能不能堅持到底，政治上能不能頂得住？中央會不會出修正主義？這些問題沒有解決。他還講：“我感覺到，在北京我的意見不能實行，推行不了。為什麼批判吳晗不在北京發起呢？北京沒有人幹這件事，就在上海發起。”不過，運動發起後，中央多數領導幹部還不瞭解毛澤東發動“無文革”運動的真實意圖，思想上也難以接受毛澤東宣導的那種開展運動方式。所以，毛澤東後來講：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時，多數人不同意我的意見，有時只剩下我自己，說我的看法過時了，我只好把我的意見帶到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去討論。而八屆十一中全會期間，毛澤東寫的那份大字報，指責物件實際上就是劉少奇、鄧小平等出席這次全會的多數領導幹部。所以，討論時除陳伯達、江青、張春橋等少數人表示贊成外，多數領導幹部沒有表態。這一點，毛澤東也深有感觸，他後來告訴外賓，自己的看法當時在會上只得到多數多一點的同意，當時有許多仍然是不通的。林彪曾講：“文化大革命高潮被潑下去，是主席扭轉過來。”可見，自“無

文革”開始以來，抗爭就一直此起彼伏地進行著。這一點，毛澤東心中很清楚。1976年6月，重病的毛澤東在一次談話中總結自己一生做過的兩件事：一是打敗了日本侵略者，推翻了蔣介石反動統治。他認為，“對這些事持異議的人不多，只有那麼幾個人”，想及早收回臺灣等幾個海島。二是“發動文化大革命。這事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他看到，自己領導做的第二件事，沒有像在領導做第一件事得到擁護、支持，自己與患難與共幾十年的戰友們在思想上、政治上疏離得越來越遠。

三、劉少奇、鄧小平等派遣工作組不幸結局的深刻原因

劉少奇、鄧小平等派遣工作組嚴重受挫絕非偶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原因之一：這是黨在探索中國社會主義道路進程中，中央領導集體內部關於指導思想方面的意見分歧進一步激化、公開化的結果。“文革”一開始，毛澤東就將處在上述複雜情況中的中央領導集體意見分歧公開化。

1966年8月4日，毛澤東批評劉少奇、鄧小平等主持工作的中央領導：“所謂走群眾路線，所謂相信群眾，所謂馬列主義等等，都是假的。已經是多年如此，凡碰上這類事情，就爆發出來。”第二天，他在大字報中批評劉鄧派工作組時又講：“聯繫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省的嗎？”（15）顯然，從1962年起，毛澤東和劉少奇、鄧小平等在工作中就產生了較大的意見分歧。

關於“一九六二年的右傾”。1962年1月，毛澤東主持有七千餘人參加的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即“七千人大會”。黨的總書記鄧小平負責籌備這次會議。先由鄧小平，後由劉少奇主持起草的會議報告，比較系統地總結了“大躍進”

以來我國經濟建設工作的基本經驗教訓。這個報告和劉少奇的書面講話，受到了與會代表的熱烈歡迎。之後，毛澤東作了自我批評，鄧小平、周恩來分別代表中央書記處和國務院也作了自我批評。這次大會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取得了重要成果，在動員全黨為戰勝困難而團結奮鬥方面起了積極作用。有人曾講到會議的主要籌備者劉少奇、鄧小平，說這是“劉鄧大軍的勝利”。毛澤東聽後感到不快。

1962年2月、5月，劉少奇主持召開了兩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分析了面臨的經濟形勢，決定對國民經濟進一步調整。儘管迫於形勢，劉少奇後來不得不違心地自我檢討：1962年“七千人大會”上的報告、講話，對困難講得過多過頭。保用陳雲，批發陳雲報告。對鄧小平的包產到戶、陳雲的分田到戶都未頂。實際上，正是由於劉少奇主持兩次會議制定的這些措施的貫徹，才渡過了嚴重困難時期。對這兩次會議制定的基本措施，毛澤東原則上表示過贊同，但在七、八月北戴河會議和隨後召開的八屆十中全會上，卻發出了所謂把形勢說得“一片黑暗”和存在“平反之風”、“單幹之風”的指責。上述情況表明，由於在經濟發展問題特別是階級鬥爭問題上“左”傾錯誤指導思想並沒有從根本上糾正，對形勢和政策的許多看法在黨的領導層中實際上還存在著分歧、矛盾並逐步地發展起來。

關於“一九六四年形‘左’實右的錯誤傾向”。這是指1964年下半年劉少奇主持制定《中共中央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一些具體政策的規定（修正草案）》的問題。1964年9月，劉少奇主持的中央工作會議討論通過了“後十條”修正草案，對國內階級鬥爭形勢估計得更加嚴重。劉少奇後來講：“最近幾年，我也想過如何才能避免資本主義在中國復辟，如何才能使無產階級奪到手的政權不至於又失去政權，如何才能使社會主義的中國不至於像蘇聯及其他一些國家那

樣，‘和平演變’為資本主義國家。”修正草案還規定，“整個運動都由工作隊領導，”從而改變了原來依靠基層組織和基層幹部的政策。並提出“訪貧問苦，紮根串連”等一些過去土改運動時實行的方法。毛澤東覺察了上述問題，於1965年1月主持制定了《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即“二十三條”。糾正了打擊面過寬，搞神秘主義等偏向，但是，“二十三條”提出的運動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論斷，則是更嚴重的“左”的錯誤觀點。

在1964年底至1965年初的中央工作會議期間，毛澤東和劉少奇等在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性質、方法等問題上發生了嚴重分歧，前者更多地考慮中央出不出修正主義問題，後者著眼點主要在整頓基層組織和基層幹部上。結果，劉少奇受到毛澤東嚴厲批評。鄧小平後來以檢討的口氣講：我們這些人犯錯誤，總是在階級鬥爭問題上。如六二年的問題，大小三線沒上綱的問題，也是在階級鬥爭的問題上。從劉少奇、鄧小平的“檢討”中不難看出，當時在一些重大原則問題上，中央領導層中的意見分歧。

原因之二：這是毛澤東關於社會主義社會階級鬥爭的理論和實踐上的錯誤，黨內個人獨裁現象發展得越來越嚴重的結果。

1966年1月，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前就講過：去年10月我在北京講過，如果北京搞修正主義，你們地方怎麼辦？我總感到要出問題。我講了以後，一路上從天津到南昌，經過許多地區，都沒有聽到反應。不久，他就提出了這樣的主要論點：一大批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已經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文化領域的各界裏，相當大的一個多數的單位的領導權已

經不在馬克思主義者和人民群眾手裏。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中央形成了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這有一條修正主義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在各省、市、自治區和中央各部門都有代理人。過去的各種鬥爭都不能解決問題，只有實行文化大革命，公開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資派篡奪的權力重新奪回來。這實質上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政治大革命，以後還要進行多次。

建國以來，由於種種歷史原因使我們沒有能把黨內民主和國家政治生活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雖然制定了法律，卻沒有應有的權威。這就提供了一種條件，使黨的權力過分集中於個人，黨內個人專斷和個人崇拜現象滋長起來，連同 1956 年至 1966 年的 10 年中“左”傾錯誤的積累和發展，到後來終於暫時壓倒了正確的發展趨向，而正確的發展趨向由於本身還不成熟、不徹底，因而沒有力量阻擋錯誤趨向的進一步發展，最終導致“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劉少奇、鄧小平等派遣工作組嚴重受挫，正是這種實際狀況的集中反映。

注釋：

①根據毛澤東提議，中央書記處成立的由彭真、陸定一、康生、周揚、吳冷西 5 人組成的小組。

②劉少奇、鄧小平給毛澤東的信及有關批示，1966 年 6 月 20 日。

③劉少奇聽取彙報時的講話，1966 年 7 月 11 日。

④⑤《回憶鄧小平》上，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8 年 2 月版，第 224、224 頁。

⑥(14)(16)《劉少奇年譜》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6 年 9 月版，第 646、652、652 頁。

⑦劉少奇在大會上的講話，1966 年 7 月 29 日。

⑧周恩來在大會上的講話，1966 年 7 月 29 日。

⑨鄧小平在大會上的講話，1966 年 7 月 29 日。

⑩劉少奇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的講話，1966 年 8 月 1 日。

(11) 毛澤東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的講話，1966 年 8 月 1 日。

(12) 劉少奇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的檢討，1966 年 10 月 23 日。

(13)(15)《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 12 冊，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8 年 1 月版，第 90 頁。摘自宋毅軍。

第二節 工作組的工作

部分學校發生的反工作組運動

工作組進校後，由於其表面宣稱的支持文化大革命與來自上級黨政領導的真實使命“滅火”不一致而處於矛盾的境地，不久即引起一些反校領導的學生的不滿和懷疑。部分學生不滿工作組口頭傳達而無白紙黑字檔的“八項指示”（包括北大在內的北京部分學校的工作組藉口貫徹“八項指示”，還封閉了校門，禁止非本校人員出入），認為這是限制了師生們參加文化大革命的權利，有人甚至援引憲法，認為學生應該享有言論和成立學生組織的自由，即使上街遊行也是合

法的。部分學生通過一些反常現象，懷疑工作組與原校領導“穿一條褲子”，懷疑工作組不是來支持文化大革命的，而是來破壞或壓制文化大革命的，

最早喊出“工作組滾出去”的口號的據說是北京郵電學院的學生，時間是6月8日，離該校工作組進駐時間僅相隔4天。接著，其他許多學校也都出現了懷疑或者直接指責工作組的大字報，其中著名的有清華大學學生蒯大富於6月16日貼出的大字報《工作組往哪裡去？》、北京師範大學學生譚厚蘭等人於6月20日貼出的大字報《孫有漁把運動引向何方？》、北京師大附中學生陳永康、何芳芳於6月20日貼出的大字報《揪出鑽進我們肝臟的牛鬼蛇神》等，與此同時，一些學校的學生還刷出了大標語，如“革命不需要保姆！”、“踢開工作組，自己鬧革命！”等。

但是，這些反工作組的學生們並不知道，工作組以及站在工作組背後的上級黨政領導人早就張網以待，就等著“右派”學生們自己跳出來了。

工作組整“右派教師”和“右派學生”。

從1966年的6月上旬起到7月中旬止，從北京到地方各城市的大、中學校中，出現了大量被工作組及派出工作組的上級黨委定性為“反革命事件”的事件。按照習慣，這些事件通常依據其發生的日期而被命名為“六·x事件”或“七·x事件”。每當一個學校“抓出”這類“反革命事件”時，工作組就會動員全校師生將文革運動的重心轉移到對“反革命事件”所牽涉到的教師和學生進行批判、鬥爭的方向來，所以，隨著北京和全國各城市有越來越多的學校被抓出這類“反革命事件”，整個大、中學校的文化大革命便轉了方向，演變成了一場工作組全面整“反革命”師生或“右派”師生的運動。

從時間分佈上看，這類“反革命事件”出現密度最大的是6月下旬到7月中旬，其原因，一方面，各地工作組進校時間有先後，早則在6月上旬，遲則到6月下旬，從工作組進校到抓出“反革命事件”，總得有個間隔時間，而且，前述劉少奇對中共中南局、西北局請示報告上的關於在大、中學生中揪牛鬼蛇神的批示是在6月23日作出的，這一批示精神的傳達，直接放開了工作組整“右派師生”的手腳。這一全國性的工作組整“右派”師生的運動延續到7月中旬便突然終止了，原因很簡單，7月18日毛澤東回到北京，斷然制止了這一整“右派”師生行為的繼續漫延和擴大。

從這些“反革命事件”的起因或內容上來看，通常只是因為某個學生貼了一張或幾張批評或懷疑工作組的大字報，或者因為某些學生和青年教師搞了一次集會，或者因為某些教師或幹部給上級領導寫了一封反映情況的信，等等。

這一時期被工作組及其上級黨委定性為“反革命事件”的事件非常多，普遍發生於全國各地大、中學校，只能列舉幾件：

全國最早被工作組定性為反革命事件的是西安交通大學的“六·六事件”，被工作組認定的“六·六事件”中為首的“反動學生”是一位名叫李世英的女大學生。從事件發生的時間上看，這幾乎是工作組剛進校門就抓了她，這麼高的效率是挺嚇人的，因為從工作組進校到案發到定罪到迫得案犯自殺的間隔時間總共只有幾天。這位李世英遭到工作組的拘禁，並被戴上高帽子和另一些學生一起在校園內遊街，工作組發動大批學生寫大字報批李世英，罵她是“美女蛇”，6月9日中午，李世英從工作組關押她的房間窗戶跳樓自殺，但未遂。

“無文革”中在全國引起反響最大的恐怕是清華大學工作組整肅大富事件。據大富自己說，該學校與他同時被整的有 800 多人（見田炳信的《採訪大富》），規模很大。清華大學是全國最高學府，當時是劉少奇親自抓的點，劉少奇的夫人王光美任該校工作組顧問，親自坐鎮清華。大富被工作組關押 18 天，他和與他持同樣觀點的學生多次遭批鬥。6 月 26 日，清華園內舉行大規模的“擁護工作組”的示威遊行，遊行隊伍高呼：“無限信賴工作組！”、“反工作組就是反黨！”。當時與大富一起挨整的學生中，有一人自殺身亡；大富則宣佈向工作組絕食抗議。

由於劉少奇的 6 月 23 日批示中表示：對於高中應屆畢業生中的一些人，“經過市委批准，可以批判鬥爭和戴帽”，因此，前述北京師大附中的兩位給工作組寫大字報的中學生陳永康和何芳芳也成了“小右派”。這兩位“小右派”是劉少奇女兒劉平平的同學，因為劉平平當時就是這所中學的學生，而且有資料表明，劉少奇當時直接通過劉平平關注著這所學校的運動情況。

再舉一個發生在浙江省杭州市某重點學校的“七·x事件”。7 月初的一個傍晚，該校兩名青年教師吃完晚飯後，因宿舍裏悶熱，相約到校園走走（該校宿舍離校園很近），路上遇到幾名學生，被告知有一些學生今晚要在某教室集會，出於好奇心，這兩位青年教師便跟去聽聽。其實那次集會的到會學生只有 20 多人，會議內容也就是幾名學生發言，表達了一些對工作組的不滿和懷疑情緒，這兩位青年教師在會上是否發言，已經是誰也記不清了。但是，不知是與會者中有人告密，還是工作組早就對這些學生們的行為進行了嚴密監視，反正當晚工作組就知道了這件事，並連夜向市委作了緊急彙報。幾天後，工作組就正式宣佈，將這次學生集會定性為“反革命事件”，將參加這次集會的兩名青年教師定性為這次

“反革命事件”的策劃、操縱者，隨之而來的就是對這兩位青年教師的拘禁和多次大規模批鬥，其他與會學生也遭到迫害。

據對北京 24 所高等院校的不完全統計，“無文革”的工作組時期，有上萬名學生和數千名教師被工作組整成“右派”，至於北京各中學被整人數，以及全國各城市的大、中學校的被整人數，現無統計資料，但可以肯定的是這類工作組以所謂“反革命事件”為藉口整“右派”師生的現象普遍發生於全國各學校中。可以說，如果不是毛澤東於 7 月 18 日及時回京，這場工作組整“右派”師生的運動將擴大到什麼樣的規模是很難估計的，可能會遠遠超過 1957 年反右運動所涉及的規模和人數。之所以這樣說是有事實根據的：各學校的工作組進校後普遍沿襲“四清運動”中工作隊的經驗，暗中對所在學校師生全面進行了“左、中、右”的排隊，同時還整了大量的“黑材料”。據“無文革”後來階段造反派紅衛兵所獲得的部分“黑材料”透露，有不少在工作組時期未挨整的人其實已經上了工作組的“右派”名單和被整了“黑材料”，只是因為工作組尚未找到整這些人的藉口或機會而已，也是因為工作組不久即被毛澤東下令撤走，其整右派學生的行動尚未充分展開的緣故。文革後來階段造反派紅衛兵搶得的“黑材料”只占總量中極少的一部分，絕大部分“黑材料”後來都被中央下令銷毀了，所以，誰也說不清究竟有多少人曾經被工作組整了“黑材料”。這裏順便說一句，工作組時期所整的“黑材料”問題，成為影響運動後面階段的重要問題，在運動後來階段，各地多次發生的造反學生或造反派紅衛兵衝擊黨政機關、公安機關，乃至軍事機關，其起因均與“黑材料”有關。

三、關於“無文革”中工作組整“右派”師生

(1) “無文革”前期各地發生的工作組抓“反革命事件”行為是一場全國性的有組織、有預謀的鎮壓“右派”師生的行動。各地的工作組及上級黨委對所謂“反革命事件”的反應實在是太快了，往往離這些事件的實際發生時間只有短短幾天，上級黨委的定性結論就下來了，給人的印象是，工作組及其上級黨委在事件發生前早就張網以待，隨時在等待著學生們自己跳出來。聯繫到劉少奇 6 月 23 日在中共中南局、西北局報告上的批示，更能使人確信這一點。

(2) 工作組給被整師生所定的罪狀荒謬而不能自圓其說，罪證蒼白無力。當時在校的大、中學生，都是在建國成立後成長起來的，尚未踏上工作崗位，無任何歷史問題可抓；當時情況下，凡是敢給工作組貼大字報的學生，家庭出身通常不錯（如上述的蒯大富、譚厚蘭、陳永康、何芳芳等，出身都是紅五類），工作組在這方面也找不到藉口；至於參加文化大革命，那是黨中央的號召，貼大字報，在當時是被公認的“四大民主”之一；至於運動前期給校領導貼大字報的行為，只要北大聶元梓等人的那張大字報不被公開否定，反對校領導便無法構成罪名，所以，當時工作組能給被整師生定的唯一罪名只能是“反對工作組（或反對市委、省委）就是反黨”，而這一條在當時實際上已經不大站得住腳了，因為全國已經有那麼多的政界要人（如彭、羅、陸、楊等）被打倒，工作組就敢自稱絕對正確？市委、省委、中央部委的負責人就敢說是絕對正確？從目的和動機方面論，這些學生都是尚未完成學業踏上社會的青少年，要說他們企圖“反黨奪權”，是很難說得通的。正因為如此，對當時中學發生的所謂“反革命事件”，只要有教師牽涉其中，不管實際真相如何，工作組都儘量將這些教師指認為“反革命事件”的策劃和操縱者，因為給教師定罪名總要比給學生定容易些。

要說罪證，除了學生們自己貼出的大字報和大標語算得上“白紙黑字”以外，更多的罪證如學生在某集會上說了什麼話，在私底下又跟誰說了什麼話等，只能來自所謂“左派”學生的小報告，其中多有不實之辭，很難經得起當面對質。

重要的是，從6月1日發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論以來，《人民日報》及其他中央報刊連續發表了很多社論和重要文章，這些社論和文章的主旨都是鼓勵群眾積極行動起來向資產階級進攻的，其精神與工作組賣力執行的“八項指示”相悖，而部分學生對工作組的懷疑和不滿也往往表現在反對“八項指示”上。所以，反對工作組的學生們對照中央報刊精神，認為自己沒有錯。

綜上所述，工作組在整學生和教師時，在道理上通常是很難站得住腳的，只能利用手中權力對被整的師生實施拘禁、遊街、批鬥等高壓手段，或者運用職權的影響製造虛假多數，動員大批群眾對被整師生進行批鬥或圍攻式的“辯論”。但即使是在這類仗著人數優勢而進行的圍攻式“辯論”中，工作組及其支持者也往往落於下風，被受圍攻的學生駁得無言以對。

(3) 可能劉少奇等最初以為，只要通過工作組把帶頭鬧事的學生或青年教師抓出幾個，狠狠地整一下，全國校園裏燃起的這場大火就可以壓下去，從而把運動納入“正規”或者乾脆結束運動（據有關資料，劉少奇曾在7月6日指示團中央和教育部門：“中學文化革命要在八月份解決三分之一，九月份再完成一半”）。但沒想到的是，這一時期校園的情勢與1957年反右時是不一樣的，工作組的高壓手段，並不能把所有的學生都壓下去，各地學校都出現了一些寧死不屈的硬骨頭。

1957年反右運動中被抓的那些“右派”，多數是從舊社會過來的知識份子，他們這些人的個性往往比較軟弱，因此，1957年的“抓右派”時並未聽說遇到很激烈的反抗，但文革的工作組時期所抓的“右派學生”就不同了。我在本文的序裏講到過，我國六十年代的青少年在文革前所受教育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革命英雄主義教育，青少年中普遍洋溢著一種勇於為社會、為理想獻身的大無畏精神，他們自幼就渴望成為革命英雄，而決不肯接受自己成為“反革命份子”的現實，如果真要是那樣的話，他們寧願死；另一方面，這些學生認為，參加文化大革命無罪，他們在運動中的言行符合《人民日報》等中央報刊宣傳的精神，相反，倒是工作組的所作所為與《人民日報》等宣傳的中央精神相背離。所以，學生們無論如何也想不通自己到底錯在哪裡？自己為什麼就變成“反革命”了？事隔許多年以後，有一些文革工作組時期被打成“右派學生”的人，還能回憶起自己當時每天晚上在燈下一邊流著眼淚，一邊反復閱讀毛澤東著作和“中央報刊”社論的情景，而閱讀和領會“毛澤東思想”和“黨中央精神”的結果，總是能給這些學生以信心和力量，相信自己沒有錯，相信“真理有時掌握在少數人手裏”。

由於不知多少遍地反復學習《毛主席語錄》和中央報刊社論、重要文章，當時反工作組的學生中有許多人練就了一項獨特的硬功夫，可以隨時熟練背誦、引用大量“毛主席語錄”和中央報刊社論中的話，並且做到一字不差，這使他們在與工作組及其擁護者們的辯論中大佔優勢，這類辯論常常是圍攻式或批鬥式的辯論，反工作組的學生往往在人數上處於一對幾十、乃至一對上百的絕對劣勢，但當他們朗朗地背誦一段“毛主席語錄”或者《人民日報》社論中的話來證明自己觀點正確或批駁對方的觀點時，往往能使對方啞口無言甚至驚慌失措。

有一首歌在這一時期被工作組打成“右派”的學生中廣泛流行起來，這是文革前上演並被拍成電影的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中的一首歌——《抬頭望見北斗星》，歌詞是：“抬頭望見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澤東、想念毛澤東，迷路時想你有方向，黑夜裏想你照路程、黑夜裏想你照路程¼¼”，不少人當年是流著眼淚唱這首歌的。在我搜集到的資料裏，還有一位元當年因被工作組打成“右派”而被關押的青年教師寫的一首詩：“怒海狂飆呼聲急，一洗浮泥見青壁；盼到朝陽從東出，鐵崖盡染紅旗色。”

這一時期，全國各地不斷地有學生和青年教師“赴京告狀”，這成為後來紅衛兵“大串連”的前奏。摘自伴月星

第三節 “文革”初期的北大工作組

1966年6月初，中共中央決定派我擔任北京大學工作組組長，代行北京大學黨委書記職務，領導北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在風口浪尖上，我經歷了一場不尋常的嚴重鬥爭。在處理北京大學“六·一八”亂揪亂鬥事件中，被江青指責為“鎮壓了革命”。康生宣佈我犯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右傾機會主義路線錯誤”，我隨即被打倒。

我作為當事人，有責任將這一段歷史記錄下來。

在極其緊急的情況下，我奉命進入北大擔任工作組組長

1966年5月，我正在北京參加中共中央華北局主持召開的華北地區“文化大革命”工作會議(當時我任河北省委書記處書記)。在會上聽了5月18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他在講話中大講世界上“政變成風”，並稱中國有

些人陰謀搞政變，要殺人。會上還傳達了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等的“反黨錯誤”。當時感到氣氛很緊張。

在這次會上，還傳達、學習了中央決定發動“無文革”的《五一六通知》。我對這一通知進行了反復認真的研讀。其中對國內政治形勢所作的那些極其嚴重的估計，真使我大吃一驚，心想：情況有這麼嚴重嗎？但由於毛主席在我心中的崇高威望，我又不能不相信，也不敢懷疑。當時只是考慮自己要努力學習提高，跟上毛主席的重大戰略部署。同時認真對照檢查我在河北主管的文教工作，考慮在這方面工作中有無問題。

6月1日下午，我突然接到通知，讓我在傍晚到北京飯店向北京新市委第二書記吳德領受任務。吳德對我說：毛主席決定要向全國廣播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七人5月25日貼出的大字報，廣播後北大黨委可能陷入癱瘓狀態，中央決定任命你為北大工作組組長，並由你代行北大黨委書記職務，要趕在廣播前進駐北大，領導那裏的“文化大革命”運動。當晚召開了華北局和北京新市委負責人參加的緊急會議，討論工作組進駐北大後的工作方針和行動計畫。然後，吳德和華北局負責人蘇謙益、池必卿、黃志剛帶領我急忙趕到北大，召開黨委會議，宣佈了華北局決定。這時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已於晚八點廣播了聶元梓等的大字報。6月2日晨零點三十分，緊急召開了全校黨團員、幹部和學生幹部大會，我講了話，表示要堅決支持北大的革命運動，放手發動群眾，把北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北京大學聚集了很多全國聞名的學者，是全國著名的高等學府。而我對這裏的情況一無所知，對“無文革”怎樣搞法也心中沒底。只是覺得在“天子腳下”的北大搞運動可非同一般，只能搞好，不能搞壞。搞不好，不只是對中央無法交待，

對國內外也將產生不良影響。這使我感到擔子很重，壓力很大。怎麼辦？考慮再三，我想務必要謹慎從事，嚴格遵照毛主席的“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堅持對上負責與對下負責的一致性”、“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等一貫教導去做，絕不能下車伊始就胡亂開展“鬥爭”。在具體工作中，一是依靠領導，堅決按中央的指示辦事；二是深入調查研究，摸清學校的情況。

工作組的派出為何如此匆忙？我當時並不知情，1966年5月14日，康生派人以中央理論小組調查組的名義到北大調查，由他的妻子曹軼歐任組長。曹多次找到聶元梓面談有關“文革”問題。曹還兩次找北大黨委常委、法律系主任陳守一談話，說北大的學術批判有問題，你應該揭發；如果同意揭發，還會有人和你一同出面揭發。兩次都遭到了陳守一的拒絕。曹軼歐於是表示說此事“算了”，但又叮囑他對這件事嚴格保密，不能與任何人談。5月23日晚，果然如曹軼歐所說“還會有人出面揭發”，這就是經她面談的聶元梓。聶元梓在邀集某些人商量之後，決定從市委大學部副部長宋碩5月14日關於“文革”的講話開刀，寫出了題為《宋碩、陸平、彭佩雲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麼？》的大字報，向北大黨委和北京市委“發難”。大字報於5月25日公開貼在學校大飯廳東牆上，引起了全校的思想混亂和激烈爭論。大多數師生員工認為：這是一張用誣衊不實之辭攻擊誣陷北大黨委和北京市委的大字報。此事也在社會上引起轟動。當晚周恩來總理就派華北局書記李雪峰和國務院外辦副主任張彥到北大召開黨員幹部會議，傳達國務院有關文件，批評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不應該貼在外面。周總理指示說：“大字報可以貼，但北京大學是涉外單位，要內外有別。”強調黨有黨紀、國有國法，要認真遵守。由於聶元梓的行為受到了周總理的批評，學校內也有些幹部師生批評了聶元梓大字報中的一些誣衊不實之辭，於是曹軼歐派人將大字報底稿取走送

給康生。根據康生自己在 8 月 4 日北大全校大會上說：“6 月 1 日下午四點，我接到通知(指廣播聶元梓大字報的通知)，我感到聶元梓同志解放了，我……也感到解放了，因為我們當時是支持這張大字報的，我們也受到了壓力。”

康生、陳伯達的這種突然行動，使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同志陷於被動狀態。在這種緊急情況下，他們按照過去黨領導運動的通常做法，決定派出工作組，免得使運動陷於無領導的混亂狀態。我就是在那種緊急情況下被派往北京大學的。

6 月 2 日，《人民日報》頭版以“北京大學七同志一張大字報揭穿了一個大陰謀”為題，全文發表了這張大字報，並配發了評論員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隨後，又連續發表了一系列社論，把聶元梓封為、“革命左派”。這就在北大引起了更大的震動。而聶元梓則認為她勝利了，向“圍攻”她的人展開了猛烈反擊，校園內出現了混戰局面。從 6 月 1 日到 6 月 6 日，校內共貼出大字報五萬多張。每天來北大看大字報的近萬人，許多學校派人來聲援。北大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在這種強大的輿論下，迅速激發起來。

6 月 4 日陳伯達到北大看大字報，瞭解情況後，《人民日報》於 6 月 5 日發表了題為《做無產階級革命派還是做資產階級保皇派)的社論，其中提到 1965 年北大社教運動後期召開的國際飯店會議，說那是“一個極端嚴重的反革命事件”，這也使我感到十分突然。我知道，北大社教(四清)運動是經過了多次反復的。開始由中宣部派出的工作隊認定北大已經“爛掉”了，中央書記處決定由北京市委書記萬裏同志主持國際飯店會議進行復查，結果否定了聶元梓等人對北大黨委的“揭發”和中宣部工作隊所作的結論。現在又要來翻這個案，必然引起更大的混亂。果然這篇社論一發表，北大內部就圍繞這一歷史舊賬展開了激烈的鬥爭。聶

元梓對於曾在國際飯店會議上不贊成她的觀點的人進行打擊報復，並要揪鬥萬裏同志，給工作組造成了很大的壓力。

在聶元梓發動的這場鬥爭中，鬥爭方式簡單粗暴，打人、罵人、揪頭髮、撕衣服、戴高帽子遊街，使北大的混亂狀態不斷升級。《人民日報》發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論後，學生們開始漫無邊際地“橫掃”起來。著名歷史學家翦伯贊遭到人格污辱，其住所被貼上“廟小神靈大，池淺王八多”的對聯。有些前來北大聲援的外校學生，隨便勒令“黑幫人物”出來交待問題，有一次還打掉了陸平同志的眼鏡。在這一片混亂之中，如何站在運動前邊領導運動，成為當時十分迫切又非常難辦的問題。

鑒於北大黨委及所屬黨總支(除聶元梓掌握的哲學系外)已全部陷於癱瘓，北京新市委在中央支持下，從中央機關、解放軍和各省市抽調了大批幹部，充實加強北大工作隊的力量。6月7日，從校到系(除哲學系外)全部實現了工作組的領導。據10日統計，共有208名工作隊員。在校一級成立了北大工作組領導小組，我擔任組長，副組長有曹軼歐、劉仰嶠(高教部副部長)、楊以希(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彭林(海軍航空兵政治委員)、武振聲(中央文辦秘書長)、張德華(團中央候補書記)。聶元梓任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楊克明(七人大字報主要成員)為副主任。

校、系領導問題解決以後，根據中央和市委的有關指示精神，我對運動中的一些問題進行了認真的思考和研究，經領導小組討論並反復徵求各方意見後，於6月15日在全校一萬三千人的群眾大會上做了動員報告。這個報告的基調和指導思想是“左”的，但在當時也起到了安定人心的作用。

“六·一八”亂揪亂鬥事件

1966年6月18日上午，工作組召開全體工作隊員大會，研究動員大會後的情況，討論如何進一步貫徹大會精神，領導好運動。九時左右，校園內又突然爆發了亂揪亂鬥事件。三十八齋前還設了“打鬼台”，四處揪人。我們立即停止會議，讓各系工作組迅速回去制止混亂。我也立即趕赴現場，在兩處鬥得最凶、最集中的地方講了話，講明黨的政策，強調指出不講政策的“革命”是不可能取得勝利的，最終制止了亂揪亂鬥。

據當天下午匯總的情況，前後有六十多人被揪鬥，多是一般幹部。被鬥者頭上戴高帽，臉上塗黑墨，身上貼大字報；罰跪、揪頭髮、撕衣服、拳打腳踢、遊鬥，還發生了多起污辱女同志的流氓行為。經查明，在這場亂揪亂鬥事件中，有四個人行為惡劣。一個是庶務科的工人劉佳賓，此人當過國民黨部隊的上尉連長，被我軍俘虜後隱瞞身份混入我們內部，上星期就曾帶頭打過三個人，這次又是他第一個帶頭打人。還有一個人在三十八齋前亂打亂鬥，我到場講話後，其他人隨即散去，此人卻又揪來個女同志亂打亂鬥。工作組成員趕到後制止他，他還蠻橫地說：“你們工作組憑什麼不讓我鬥？”問他是哪個部門的，他說是北大附中的，經查附中並無此人。後查明，此人名叫修治才，1962年因偷竊被開除，現在沒有正當職業。還有一個自稱是東語系姓黃的，是“打鬼台”亂鬥的主角，帶頭打了八個人，還趁機猥褻婦女。後查明此人原名陳應複，有流氓習氣，人稱“小阿飛”。還有無線電系學生夏林翰，混入生物系參加鬥爭會時，上臺扯掉被鬥女同志的褲子，後又在台下猥褻女同學。這個人一貫有流氓行為，曾在王府井大街偷東西被抓住，受過留黨查看處分。

除以上這些壞人外，參加亂打亂鬥的還有兩種人。一種是本身有辮子可抓，怕大火燒到自己身上，趁機表現自己的。如政治系二年級有個調幹生楊XX，曾

積極反對過聶元梓的大字報，當天在亂打亂鬥中表現也很凶。另一種人是單純的個人報復出氣。

在亂揪亂鬥中，還有人故意製造場面，讓外國人拍照。有跡象表明，這場亂揪亂鬥是有人預謀和策劃的。據房產科有個工人反映，17日晚上歷史系有個學生給校外打電話說，“明天上午工作組開會，是個好機會，工作組不在時我們鬥我們的，工作組來了我們就把他們攆出去。”根據工人王煥反映，在三十八齋前有七個未戴校徽、不明身份的人用電話到處聯繫，說已鬥爭過什麼人，現在正在鬥什麼人。還發現十幾個騎自行車的人到處搜尋他們想批鬥的人，把他們拉到同一個“打鬼台”進行批鬥。從這些情況看，這很可能是內外結合、有組織有計劃的行動。

初步摸清情況後，經過領導小組研究，決定抓住這一事件作為“反面教材”，對群眾進行一次政策教育，把問題交給群眾討論，辨明是非。根據這一決定，18日晚召開了全校師生員工廣播大會，說明這次亂揪亂鬥的真相。我在廣播講話中指出：以往的亂揪亂鬥是有些人不懂政策感情用事；經過動員大會講明政策後又發生這種情況，便不是一個簡單的認識問題了，在亂揪亂鬥中已經被壞人鑽了空子，製造了混亂。我講了應該從這次事件中汲取的教訓。對這次廣播講話，廣大師生的反應是好的。我們在群眾討論的基礎上提出：今後進行全系批鬥必須經系工作組批准，進行全校批鬥必須經校工作組領導小組批准；依靠左派建立糾察隊，維護鬥爭秩序；為防止壞人混入，對外校來聲援者，安排專人接待，但禁止他們在北大揪鬥人。

我們領導小組把處理“六·一八”亂揪亂鬥事件的情況寫成了“九號簡報”。當時在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劉少奇看到後，向全國批轉了這個簡報，批語中說：“中

央認為北大工作組處理亂鬥現象的辦法是正確的、及時的。各單位如果發生這種現象，都可參照北大的辦法處理”。

關於“六·一八”事件的性質，在“九號簡報”以及中央的批示中，說的都是“亂鬥現象”，但陳伯達認為“六·一八”事件不簡單，是反革命事件，一定有一個“地下反革命司令部”，要挖出來。他還具體提示要按照他創造的天津“小站四清經驗”來搞，為此還指派張恩慈來繪製北大的“反動系統表”。我在河北工作時，瞭解陳伯達在天津市(當時屬河北省)南郊區小站搞四清的情況。小站原來是個先進單位，受到過表揚。陳伯達在小站搞出了三個“反革命集團”，說小站是“反革命集團”掌權，並株連到南郊區委書記。對此，當時許多同志就有不同看法。現在陳伯達要求北大按“小站經驗”來搞，我是有所保留的，並在實際工作中採取了慎重態度。

康生對“六·一八”事件性質的認識與陳伯達相同。當時，北大工作組領導小組決定寫一個《關於北京大學二十天文化革命情況的報告》，由工作組副組長兼秘書長張德華負責起草。在這個報告中，因受到陳伯達觀點的影響，在反映“六·一八”亂揪亂鬥情況時，作了這樣的表述：“我們抓住這場反革命分子製造混亂，破壞文化大革命的事件……用以教育群眾接受教訓”。報告寫成後送給我和曹軼歐審閱，當時我由於工作太緊張，就說先送“曹大姐”審閱。這份報告經曹軼歐肯定後就發出了，我沒有看，也沒有簽名。當時曹軼歐在北大工作組領導小組中，是受到特別尊重的。因為她是中央文革小組派來的，直通中央，她認可了即可上報。曹軼歐與康生息息相通，她瞭解的情況隨時向康生反映，康生的意見隨時由她到北大貫徹。曹軼歐認可的東西，當然也是康生認可的。

對這一報告中提到的反革命分子的破壞，當時大家並未十分在意，認為就是指在“六·一八”事件中暴露出來的少數壞人，並沒有把事件的參加者都看成反革命

分子。當時的主要工作，是放在處理亂揪亂鬥事件後如何狠抓學習，提高認識，掌握政策，更深入地發動群眾，特別是爭取中間群眾，以壯大革命力量等方面。同時，準備進行深入的調查研究，摸清情況，對重點人和重點事進行分析研究，弄清性質，區別對持。

北大“無文革”的經驗，在一段時間內是得到北京新市委肯定的，中央文革小組這一時期也沒提出什麼意見。這從康生的態度上也可以看出來。7月3日康生找我談話，說曹軼歐今後主要負責中央文革小組辦公室的工作，仍兼任北大工作組領導成員，繼續與北大聯繫。我當即表示同意，並問他對北大的文化革命運動有什麼意見和指示，康生說沒有什麼意見。在7月6日市委書記郭影秋召開的全市工作團(隊)負責人交流經驗的會議上，還專門讓北大工作組介紹了經驗，得到與會同志的肯定。

聶元梓指責工作組是“保皇黨”

1966年7月12日下午，地球物理系陳必陶等五名同學貼出了《把運動推向更高階段》的大字報，批評工作組在運動中不敢放手發動群眾。工作組領導小組決定通過這張大字報，進一步貫徹“放”的方針，把運動搞活。15日上午，市委負責人吳德、郭影秋來北大聽取領導小組的情況彙報。吳德說：“六·一八”事件中好人是多數，壞人極少，但好人也做了檢討，好處是警惕性提高了，副作用是對工作組的意見不敢提了。加上工作組控制得比較緊了些，運動死巴了。現在正確處理陳必陶這張大字報，是把運動搞活的關鍵。下午領導小組召開各系工作組長會議，傳達了吳德的講話，決定拿出三天時間進行工作組的整訓。

17日凌晨一點半，我突然接到吳德電話，傳達李雪峰同志的指示，說對“六·一八”事件要重新進行估計。次日上午，李雪峰在北京市委書記處會議上，對北

大工作組領導小組進行了批評。他說：對“六·一八”事件估計錯了，這件事是萬人革命的行動，估計這個事件是反革命事件是錯誤的，估計錯了就應當進行自我批評。北大的“文化大革命”十八天“轟轟烈烈”，一個月“冷冷清清”，跟這件事有很大關係。當天下午，列席會議的武振聲副組長向工作組領導小組傳達了李雪峰的批評。領導小組多數成員對新的估計思想不通，當日我找到吳德提出不同意見。我說：處理“六·一八”亂揪亂鬥事件得到了中央的肯定並通報了全國，怎麼能一下子又說成是革命事件呢？！吳德對我作瞭解釋，要求我轉彎子，說這樣檢查有利於爭取主動。當時，我感到如果完全按照這樣的口徑向全校進行檢查，廣大工作隊員和廣大群眾想不通，會引起新的思想混亂。因此，怎樣檢查頗費腦筋。經過領導小組的醞釀，決定了檢查的調子。然後召開全校廣播大會，由我代表領導小組做動員檢查報告。我說：“六·一八”事件確實有極少數壞人鑽空子，製造了混亂；但我們對敵情估計過高了，對群眾的革命熱情估計不足，並採取了一些限制和束縛群眾手腳的措施，影響了運動生動活潑的局面。工作組決心進行整改，用三天時間開展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集中批評工作組領導的缺點錯誤。工作組引火焚身的行動，在全校引起很大反響。繼陳必陶等五人大字報後，歷史系也貼出大字報批評工作組。但也有許多學生表示支持工作組，說工作組是革命的，是在革命中出現的缺點錯誤。當時全校運動活躍了起來，連教授馮友蘭也出來貼了大字報。

7月19日夜，聶元梓突然在哲學系發表講話，稱“工作組犯了方向、路線錯誤”。晚11時哲學系學生在大飯廳等處設立演講台，傳播聶元梓講話，批評工作組是保皇黨。當晚我已吃過安眠藥睡下了，突然被叫醒，得知聶元梓講話的內容後，召開了領導小組緊急會議。大家對聶元梓的做法非常氣憤，說聶曾任領導小

組辦公室主任，工作組所有工作情況她是清楚的，處理“六·一八”事件時她也是表示同意的，為什麼又跳出來反對工作組。楊克明也表示非常氣憤，說“聶元梓本身有很多問題，需要向領導反映，讓領導瞭解聶元梓是個什麼樣的人，這個人是不能依靠的”。領導小組決定將這個新情況迅速向市委彙報，取得領導的指示。我於 20 日晨到市委找到了李雪峰同志。李雪峰聽了彙報後說：你們不能把聶元梓的講話簡單看成是違犯組織紀律問題，要從政治上考慮問題，要考慮工作組本身工作上有什麼問題。他要工作組聽取聶元梓的意見，並廣泛聽取群眾意見，多做自我批評，爭取主動。

事後得知，就在聶元梓發表講話的同一天，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爆發了一場關於工作組問題的激烈爭論。據 7 月 23 日李雪峰在全市各工作組組長會議上的傳達，中央政治局常委在 7 月 19 日和 22 日召開了擴大會議，討論“文化大革命”運動的情況。陳伯達在 19 日的會議上提出了反對派工作組的意見，認為工作組起了“壞作用”。劉少奇在會上說，大學裏要不要派工作組的問題，是從當時怎樣實現黨的領導方面考慮的，派工作組比較機動。個別工作組的領導有缺點、出了毛病，但多數基本上是好的，現在還是幫助教育的問題。鄧小平說：多數工作組是好的，不能撤，主要是教會他們如何做工作；多數工作組的成員是好人，搞“文化大革命”沒有經驗。會上還對如何開展運動的問題進行了研究，包括如何開展大辯論，辯論中如何領導，鬥爭面不能太寬，要明確鬥爭目標，大學生能否出去串連，等等。聽了傳達之後，我感到聶元梓 19 日晚的演說是有來頭的，與陳伯達同日在中央會議上的發言絕不是偶然的巧合，二者的關係頗耐人尋味。

聶元梓講話之後，北大內部圍繞著反對還是支持工作組展開了尖銳的鬥爭。當時工作組根據市委的指示，正在認真研究聶元梓的意見，並分頭到各系廣泛聽

取群眾意見。大多數師生對聶元梓帶頭反對工作組的行為很不滿，並要求工作組“站起來”領導革命。21日，校園內貼出不少大字報，大多都是要求聶元梓澄清事實、回答問題的。還有不少學生不斷找我反映對聶元梓的意見，有的表示要貼聶元梓的大字報，其中就有中文系學生張少華(我當時並不知道她的背景)。我勸告同學們說：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是經毛主席肯定的，你們貼她的大字報，就把陣營搞亂了，決不能這樣搞，希望大家還是幫助工作組進行整改。

決定工作組命運的最後時刻

正當工作組在大部分師生的支持下認真進行整改的時候，江青在陳伯達陪同下，於7月22、23日兩次來北京大學調查，說是瞭解北大“文化大革命”運動的情況。第一次來調查時，我正在召開工作組會議，聽說江青來了，正在與聶元梓談話，我感到不便前去打擾，就讓工作組的一位副組長去接待，並說明我正在開會作檢查，什麼時候要聽取工作組的彙報，我即前往。但江青與聶元梓談話後就走了，並未要求聽工作組的彙報。後來聽說，江青、陳伯達這次來北大，說得不多，只是表示對情況不瞭解，要調查研究。第二天，江青、陳伯達再次來北大調查時，我正好去市委聽傳達報告，晚上吳德留我談話，回來已經很晚了。這次來北大，江青也沒表示要聽工作組的彙報。在聽取了聶元梓等的意見後，江青講話說：“我們都站在你們革命派一邊”。還說“革命派跟我們在一塊，誰不革命誰就走開”。陳伯達在講話中強調“江青同志講的也是代表文化革命小組要講的”，“說‘六·一八’是反革命事件是不對的，是錯誤的”。一個月前，正是他首先認定“六·一八”是“反革命事件”，並要求追查“地下反革命司令部”的，現在他不僅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而且閉口不提自己過去曾經發表的意見，反而板起面孔大批別人的所謂錯誤，真使人齒冷。這次江青、陳伯達完全把工作組甩到一邊，只與聶元

梓等少數人接觸，說明他們在如何對待工作組的問題上已經胸有成竹，預示著一場風暴即將到來。

江青、陳伯達講話之後，在北大進一步掀起了反工作組的浪潮。7月25日晚，康生、陳伯達、江青、王力、關鋒、戚本禹等人到北大來召開座談會，隨後又召開了有萬人參加的“辯論大會”。會上的辯論很激烈，多數發言者不贊成說工作組犯了路線錯誤。康生在會上說：“北大的文化大革命，你們是主人，不是工作組是主人”，公開號召群眾起來反對工作組的領導。支持聶元梓的人登臺批判工作組：把“六·一八”革命事件打成反革命事件，把北大“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鎮壓了下去，把學校搞得“冷冷清清”，犯了方向路線錯誤。對他們的觀點，許多同學又登臺加以批駁，說“六·一八”事件的處理是正確的，工作組是“延安”，絕不是“西安”。

7月26日，市委召開各工作組組長會議，我參加了。會上李雪峰講了話，並傳達了毛主席24、25兩日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李雪峰說：前天和昨天開了兩次會，總的方面主要講“文化大革命”運動，其中幾乎都講的是大學工作組要撤退，要改變派工作組的政策。李傳達毛主席的話說：“文化大革命無非是革兩個命。一個是鬥壞人，摘黑幫；一個是搞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搞他們(指“學術權威”)，你們(指與會者)行啊!我看你們不行，省委也不行，我也不行。”“什麼教學改革，我也不懂，只有依靠群眾，從群眾裏邊集中起來。”“要改變派工作組的政策。現在工作組起的什麼作用呢?兩個作用。一個作用，阻礙的作用；一個是不會，一不會鬥，二不會改。”“工作組一不能鬥，二不能改，半年不行，一年也不行，只有他們本單位的人才能鬥、才能改，鬥就是破，改就是立，有破有立，只有依靠他們才行。”李雪峰說，在中央的會議上，有些同志談了各

大學工作組的情況，認為北京大學的情況比較好，“限制了民主，向人家檢討了”。毛主席說：“我回北京的前四天(毛是 7 月 18 日回京的)，我是傾向保張承先的，但是有許多工作組是阻礙運動的。”會上有人講到：工作組的同志是從全國來的，多數是好的，有從解放軍來的。毛主席說：“什麼海軍、空軍、陸軍，什麼張承先，你行？你行？你行？(指在座者)我也不行。”當有人談到貼第一張大字報的七人中有四五個人現在不贊同聶元梓時，毛主席說：“分裂就分裂，不在聶元梓這個人有缺點，這是政治，她打了第一槍。”

聽了傳達後，我感到毛主席當時的想法就是要放手發動群眾，不怕亂，在亂中暴露問題，然後一分为二。對照這一指導思想，北大工作組前一段強調的有領導、有步驟地開展運動的方針，肯定是不符合毛主席意圖的。但毛主席雖然批評了北大工作組，也只是說工作組不會革命、阻礙革命，並沒有說工作組反對革命、是保皇黨。由此看來，我們的錯誤還是被看作工作方針的錯誤，只要我們誠心誠意地檢討自己的錯誤，是可以取得黨和群眾的諒解，順利撤出北京大學的。我在這次傳達會上表態說：工作組在撤出學校之前，要站出來向群眾作一個自我批評。然而，形勢的發展卻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就在 26 日當晚，江青等人再次到北大主持召開了萬人“辯論大會”。康生、陳伯達、張春橋、姚文元、王力、關鋒、戚本禹、曹軼歐和中央文革小組其他成員都參加了大會。李雪峰、吳德等得到消息後也急忙趕來參加會議。會議實際上成了批判鬥爭我的大會，但爭論得非常激烈，雙方相持不下，氣氛十分緊張。大會進行中，幾個北大附中的學生也上臺來“揭發”，說附中工作組壓制了他們，不讓他們革命，他們幾次找張承先反映意見，有時靜坐半天，張承先都不見他們，最後見了，不但不支持他們革命，反而批了他們一頓，云云。在這些中學生發言

時，江青積極插話鼓勵，並帶煽動性地說：“大家看看張承先的官架子有多大，我來北大，他就不見我。”她兩次來北大“調查”都趕上我有事分不開身，都向她作了說明，她也沒表示要聽工作組彙報，現在卻這樣說，顯然是為了鼓動學生起來反對工作組。在當時情況下，對這種事情是無法辯白的，我只能對幾個中學生提出的問題做瞭解釋。我說：北大附中的工作是由張德華同志分管的。附中在運動中出現了違反政策的現象，如提出“打倒一切大大小小的權威”的口號，鬥爭普通教師，提出“老子革命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口號，亂鬥學生，等等，工作組的同志進行了勸阻。當有的學生不服，來找我提意見時，我讓張德華先接見，進行說服教育；後來有的學生非要見我不可，其中為首的幾個是幹部子弟(記得有彭小蒙、宮小吉等)，我即接見了他們，並以長輩的身份批評了他們違反政策的一些做法。我說明瞭這些情況後，會場上鴉雀無聲，看來江青的煽動並沒有發生什麼作用。

這時又有人上臺來“揭發”說：“在‘六·一八’事件後的大討論中，西語系的一名女生孫XX被逼自殺了。”這一聳人聽聞的“揭發”引起了會場的轟動，有人高喊：“張承先交待!”“張承先交待!”但這個所謂的“逼死人命”問題，我事先一無所知，當時只好說：我沒有聽說過有這件事，我查一查，如果確有此事，要認真處理。當時，自工作組成立以來一直是領導小組成員的曹軼歐在主席臺上跳起來高喊：“張承先要老實交待!”有的同學對這種做法不滿，遞上一個條子，要求當場宣讀。條子質問會議主持者：“你們是幹什麼的?你們有頭腦沒有?逼供信是不符合毛澤東思想的。我警告你們，如果繼續這樣下去，會脫離群眾的。”康生聽後勃然大怒，說：“只許工作組逼死人，就不許我們問一問嗎?”事後查明，西語系確有一名女生因婚戀問題自殺未遂，根本與“六·一八”事件後的大討論無關。會後，西語系的

同學立即貼出大字報澄清事實真相，並質問歪曲事實的人意欲何為。西語系的工作組組長方明也立即對此事進行了調查，以備江青查問。但此事的真相已明，也就無人過問了。

由於在辯論大會上未能壓倒支援工作組的意見，聶元梓的積極追隨者孫蓬一上臺發言，拋出了一枚“重型炸彈”。他說：“我剛從中宣部瞭解到，張承先在天津與陸定一有秘密勾結。”當時陸定一同志已經受到了公開點名批判，把我和他拉在一起，無疑是一頂很大的政治帽子。所以，他的話音一落，會場上又響起一片“張承先交待！”的喊聲。我一聽他把問題扯到北大以外的事情上去，就感到聶元梓等人已經沒有什麼文章可作了。我沉著地走到擴音器前說明瞭事實真相：1965年春天，陸定一曾到天津休養，那時我正在天津醫院住院。是河北省委秘書長通知我說：中宣部陸定一部長來天津休養了，你是省委分管文教工作的書記，應該去看望一下。我即去招待所看望了陸定一，並陪他吃了一頓飯。當時，中宣部副部長許立群也在座，聽他說是來向陸定一彙報學校“四清”工作的。當我問他們學校“四清”準備如何搞時，他說準備按延安整風的方式來進行。這次會面後，我即回醫院治療，以後沒再與陸定一等見面。我們之間的接觸，完全是正常的工作關係。聽了我的說明之後，會場上很平靜，沒有人再追問這一問題。

接著，仍有不少群眾上臺來為工作組辯護。我當時心中很著急，因為感到越辯護江青等人越下不了臺，場面越難收拾。果然，江青忍不住出來說話了。她情緒激動地高聲喊道：“我揭發，張承先是個壞人。他把階級鬥爭搞到我家裏采了，我的女兒李訥在歷史系受到壞人的迫害，這個壞人是張承先支持的。中文系有個叫張少華的是個騙子，她自稱是我的兒媳婦，根本沒有這回事，我根本不承認。這個騙子也是張承先支持的。”這種“揭發”，使大家十分驚愕。會後很多師生議論，

真不像話，怎麼把家庭問題也扯進來了。還有的同學故意問我，“你是怎樣把階級鬥爭搞到主席家中去的？”我只有報以苦笑，說我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

辯論大會的最後，陳伯達代表中央文革小組作了結論。他說：“對‘六·一八’事件怎麼看，是革命事件！看成是反革命事件是不對的。對工作組的問題是階級鬥爭的問題。在以張承先為首的工作組問題上辯論得這樣激烈不是偶然的，是階級鬥爭的反映。我贊成大家的意見，撤銷以張承先為首的北大工作組，這是一個阻礙同學們走上革命道路的壞工作組，一個障礙物，是壓制你們革命的蓋子。有的同學為工作組塗脂抹粉，除了別有用心的人不說，在一些同學中，好像沒有工作組就不能革命了？！要把壓在同學們頭上的蓋子揭掉，讓同學們自己起來革命。建議北京市委撤掉以張承先為首的工作組。”隨後，李雪峰即代表北京市委宣佈撤銷工作組。江青建議北京大學“成立文化革命委員會或文化革命代表大會，作為文化革命運動的權力機關，自己起來鬧革命”。她還點名要聶元梓來籌建這個委員會。

我們到底犯了什麼路線錯誤？

26日辯論大會之後，工作組已無法進行工作，事實上被聶元梓奪了權。28日成立了聶元梓為主任的“北京大學文化革命委員會籌備委員會”。從7月30日至8月3日，這個籌委會連續召開三次全校批鬥大會，批鬥我和張德華，清算工作組的所謂錯誤。

8月4日，康生、江青再次來到北大參加大會，代表中央文革小組對北大“文革籌委會”的成立表示祝賀，並再次主持對工作組的批判。會上康生正式宣佈撤銷工作組，並對工作組的“錯誤”定了性。他說：“聶元梓的大字報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北京公社’宣言書，馬克思恩格斯對巴黎公社是什麼態度，你張承先又是什

麼態度!你把工作組的反革命的二十天報告仔細看一下，認真對照一下，完全是反動的報告，完全是反革命的立場，把革命群眾說成反革命。”“你在北大鎮壓了革命!這是什麼行為?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行為!”“你們犯的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右傾機會主義錯誤!”聽了康生的話，我感到十分震驚。康生一向道貌岸然，我也一直把他當作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加以尊重，稱他為“康老”，沒想到竟然是一個兩面派。早在“九號簡報”發出後不久，曹軼歐曾悄悄地給我通氣說，中央對我們處理“六·一八”事件是很滿意的，並將向全國批轉我們的簡報。從曹的口氣中透露，這個消息是從康生那裏得來的，康生本人也是同意的。至于工作組的《二十天情況報告》，則正是他的老婆批發的，他也沒有表示過不同意見。現在他反過來說這是反革命報告，這哪裡還像一個共產黨員呢?關於工作組的“錯誤”問題，在聽到的毛主席指示中，只是說工作組“阻礙革命”、“不會革命”，怎麼到了康生口裏就變成了“鎮壓革命”的“三反”行為了呢?這樣無限上綱，豈不是要置人於死地嗎?江青在大會也作了發言，說“工作組是有靠山的。有什麼靠山你們就揪他出來”。江青還要求學生揪住工作組不放，說：“什麼時候你們不願意聽他們那一套了，再叫他們走。”康生、江青講話之後，北大附中的兩個學生跑上臺來揪掉了我的座位，並用皮帶劈頭蓋臉地抽打我。江青對此不但不加制止，還熱烈擁抱了打我的那個女學生。事後，我被打的事情不知怎麼傳到了毛主席那裏。吳德傳達毛主席的指示說：張承先可以和工作組一塊出來，張承先有心臟病，有錯誤可以批判，但不能整死。此後，在北大的批鬥會上，包括我1967年二次被揪回北大的批鬥會，我都沒有再被打過。我能安全地撤出北大而沒有被整死，不能不說毛主席的這句話起了保護作用。

8月13日，根據市委的決定，工作組全部撤出了北京大學，到市委黨校進行整訓。整訓的主要內容是批判我的“錯誤”。這一時期，在全國也掀起了批判工作組的所謂“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浪潮。整訓中，大家對於康生、陳伯達、江青等人對北大工作組所作的結論是不同意的。主持這次整訓的原工作組副組長彭林是位老紅軍，他在同我的個別談話中就表示不理解：“我們到底犯了什麼路線錯誤？”整訓中，工作隊員在檔案內發現了曹軼歐的材料，特別是發現《關於北京大學二十天文化革命情況的報告》是她批的，上面並沒有我的簽字，於是對康生在群眾大會上的表演非常氣憤，並連續三次派代表到北京市委，要求讓曹軼歐回來檢查交待。市委當然不敢答應。大家的氣沒有地方出，就把曹軼歐的批語用大字報公佈了。在批判我的會上，有的同志故意問我：你和曹軼歐是如何炮製“反革命報告”的？我只好說：“我是工作組組長，報告的指導思想是我的，至於誰批發，那只是個手續問題。”會後有的同志私下對我說，你這樣答復好，如果你把曹軼歐拉出來，康生是絕不會放過你的。

工作組整訓結束之後就解散了，我繼續留在北京聽候中央處理。到1966年10月左右，吳德派秘書來向我傳達他的口頭意見，說北大工作組問題還是一個工作中的政治路線錯誤，市委也要承擔一部分責任，並說經請示中央同意，讓我回河北。這樣我就離開北京回到了河北。但北京大學的事並未就此了結。1967年初，聶元梓等人又根據江青的指示把我揪回北大。到北大後，孫蓬一與我談話，並讓我看了江青批件，大意是說對張承先不能輕輕放過，要揪回來批透鬥臭。根據她的這一“指示”，又對我進行了多次批鬥。這些批鬥會的規模並不大，主要是追後臺。重點追問鄧小平通過他的兒子給工作組下了什麼“黑指示”。我回答說，我根本不知道北京大學裏有鄧小平的兒子，系工作組也沒有向我反映過這一情

況，根本不存在鄧小平通過他兒子給工作組下指示這回事。追來追去沒有結果，但就是不放我離開北大，把我軟禁在一個學生宿舍裏達半年之久。直到後來中央發出通知，提出在運動中不要揪住工作組問題不放，這才放我回到河北。

“北大問題”是“文革”的導火索之一。北大是“文革”初期所謂工作組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發源地。這一段歷史，對於正確總結歷史經驗教訓有著重大的意義。本著對歷史負責的精神，我把這一段親身經歷如實記錄下來，供後人指點評說。

1998年6月1日 張承先（北大工作組組長）

第五章

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事件

第一節 羅瑞卿

1959年林彪主持中央軍委工作，任國防部長後，由於身體原因，許多事務實際上都是由羅瑞卿來具體抓。劉少奇曾公開表示過，羅瑞卿是國防部長的接班人。因此，在林彪看來，對他地位和權力威脅最大的人，莫過於羅瑞卿，只好找機會來除掉羅瑞卿。



1964年6月，羅瑞卿陪同毛澤東檢閱北京、濟南軍區的軍事彙報表演。

本文摘自《中南海風雲人物沉浮錄》，顧保孜 著，杜修賢等 攝影，貴州人民出版社，2011.6

在江青的配合和參與下，1966年3月，林彪在北京連續召開批判羅瑞卿的會議，並指定羅瑞卿在會上做檢查。如果羅瑞卿不承認林彪羅列給他的一系列罪行，檢查就不能通過。因此，會議開得很特別，沒有確定日期，停停開開，每當羅瑞卿要陳述真相時，他們就宣佈休會，這其實是在逼供，他們根本就不想給羅瑞卿申辯的機會。羅瑞卿當時的處境正如他的女兒點點在《生命的歌》一文中所敘述的那樣：“看見的是，他所崇敬的德高望重者背過臉去，賣身求榮者鼓噪淹沒了仗義執言的呼聲，心地善良的人被迫閉口不語，或違心附和，反復無常的人則高舉順風旗，臉上堆滿獰笑，血口噴人。他好像被推進茫茫黑夜中，黎明沒有盼頭；他好像被推上懸崖絕壁，卻只能往前走。他面前的一切使他心境彷徨，迷惑無法解，他意識到有人在逼他，逼他離開這個世界。”

一、毛澤東希望

1965年初，已患晚期肝癌的劉亞樓在上海華東醫院治療。當時林彪、葉群也在上海養病。葉群頻繁出入於華東醫院，要空軍司令員劉亞樓“揭發”羅瑞卿，以便向林彪作“彙報”。據葉群說，劉亞樓“揭發”，羅瑞卿曾經和他兩個人躺

在床上，密談一直到天黑。中心意思，也是核心要點，羅瑞卿要奪林彪的“權”。劉亞樓於當年5月7日病逝，事實到底如何，確實如鄧小平所講——“死無對證”。然而，“死無對證”的“揭發”竟然成了林彪夫婦的“有力武器”，他們等待著時機，向羅瑞卿發起進攻。

他通過空軍司令吳法憲調了空軍一架飛機到蘇州，派他的老婆葉群帶著海軍一份誣告羅瑞卿反對突出政治的材料到杭州向毛主席彙報，並囑咐葉群躲開其他人，直接找毛澤東。

葉群到了杭州沒有很快見到毛澤東。毛澤東不知道她有什麼事，就讓她等著。葉群只好先和毛澤東的秘書談了談。她在杭州打電話請示林彪，想給主席寫個東西送上去。林彪批評她：“你糊塗！真蠢！”意思是必須向毛主席本人講。葉群只好又去找毛，這一次她寫了一個條子，要求面談。

毛澤東於是召見了葉群。這一召見就是六七個小時，富裕的時間與充足的準備，葉群足以將羅瑞卿新中國成立以來不突出政治、搞獨立王國、逼迫林彪讓權、篡軍反黨等各種罪狀數落個明明白白、清清楚楚。

林彪這邊對總參謀長磨刀霍霍，耿直的總長卻沒有過多察覺。1965年11月底，羅瑞卿在陪同毛澤東會見朗諾後告訴毛澤東：他準備去蘇州看望林彪，並彙報工作。毛澤東一聽很高興，囑咐羅瑞卿“去看看好”，要林彪好好休養，“要養得像‘七千人大會’的時候一樣，能夠作三個鐘頭的報告”。羅瑞卿去蘇州後，即去雲南檢查工作。

毛澤東的帶話令林彪格外興奮，他嗅出了不同的味道。

“七千人大會”期間，在大多數人都在“出氣”批評我們黨工作中的失誤時，林彪旗幟鮮明地支持了毛澤東。他肯定了“三面紅旗”，並有一段很著名的

話：“過去工作搞得好的時候，正是毛主席思想不受幹擾的時候。凡是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尊重、受到幹擾時，就會出毛病。幾十年的歷史就是這個歷史。”毛澤東看了這篇講話後說：“這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令人大為高興。”

據說毛澤東聽得很仔細，問得也很仔細，但一直不表態。遺憾的是，最後毛澤東相信了葉群的話。幾天後，12月2日，毛澤東在閱看蘭州軍區黨委關於五十五師緊急備戰中突出政治的情況報告時批示：“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對於突出政治表示陽奉陰違而自己另外散佈一套折中主義（即機會主義）的人們，大家應當有所警惕。”毛澤東這裏所指的，主要就是羅瑞卿。

於是，緊接著1965年12月8日毛澤東在上海主持召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的一幕。

會議開始前，周恩來親自宣佈“不許記錄”、“嚴格保密”等紀律。就連跟隨毛澤東拍攝的記者錢嗣傑也被擋在了門外。以前這樣的事情很少發生。錢嗣傑當然感到異樣，但他忖度：既然是具有高度機密、不需要發新聞稿的會議，拍不拍主席也就不重要了。於是他也就沒再多想，徑直回自己的房間等待通知。其實，不要說錢嗣傑這樣的貼身攝影記者不知內情，就連許多從北京被召來的領導到了上海也根本不知開會內容。劉少奇還為此專門跑去詢問別人。

鄧小平、李井泉原來已在昆明，事先在電話裏和羅瑞卿聯繫好在昆明碰頭，一起去看三線建設情況。可是羅瑞卿12月9日抵達昆明，鄧、李二人已被召到上海開會去了。

12月10日，中央通知剛到昆明的羅瑞卿來上海開會。毛澤東說：“羅回來好嘛，全體參加會議的同志都去機場接他。”由此可見，毛澤東對羅瑞卿還是留

有餘地的。細心的周恩來和鄧小平認為這樣做會使羅瑞卿感到突然，提議讓上海市委書記陳丕顯和他愛人以“東道主”身份去機場接。毛澤東點頭同意了。

陳丕顯已經知道此會極不尋常，於是他便請示鄧小平，萬一羅瑞卿問他開什麼會，應該如何作答。鄧小平讓他先不必講，就說總理和他在住地等著，到那裏去談。

作為空軍司令員的吳法憲也隨同去機場接羅。大概由於同機有一位空軍師長一路“監護”，加上吳法憲一改平日低三下四的樣子，羅瑞卿似乎覺察到有些不對勁兒。他一上車便問陳丕顯：“到底開什麼會呀，這麼緊張？”陳丕顯無法作答，便靈機一動，故意指了指前面的司機和警衛，意思是車上不方便講話。車上不能幹坐著，兩人一路上只好東拉西扯地談談天氣、莊稼、身體，以及工業生產之類的情況。

陳丕顯與羅瑞卿交往很多，以前見面都很親切、自然。這回如此情形，令羅更覺異樣。

羅瑞卿每次來上海都住在錦江飯店，這次卻被安排在建國西路的一棟花園洋房裏。快進城時，陳丕顯向羅解釋：“錦江飯店住滿了，另外單獨給你找了個地方。”直到下車，陳丕顯才不得不告訴他：“總理和小平同志在裏面等著你。”羅頓時感到很吃驚。他一下車就急忙走進了小樓的會議室。周恩來和鄧小平待羅瑞卿坐下後，嚴肅而又平靜地將羅的問題揭開了！

為了防止發生更大的意外，陳丕顯事先和市委主管政法的書記處書記商量，對羅瑞卿的住處採取了一系列保衛措施，拆下了門鎖，在樓下鋪墊了一些草墊子……

為避免他突然遇到如此大的打擊採取激烈舉動，在周恩來、鄧小平與羅談話時，陳丕顯還不時讓服務員和保衛人員送些茶水、毛巾等以觀察動靜，預備好萬一發生緊急情況，立即採取措施。

他們三人談了很久，到當晚 7 時左右，周總理和鄧總書記才離開那個小院。羅瑞卿對於這個突然襲來的致命一擊，精神上毫無準備，儘管他是個很堅強的具有高大身軀的男子漢，談話後出來時怎麼也沒有力氣登上二樓的臥室了。他被這當頭一悶棍打蒙了！

當時給羅瑞卿列的“罪狀”，概括起來有三條：

一是反對林彪，封鎖林彪，對林彪搞突然襲擊；

二是反對突出政治；

三是向黨伸手。

羅瑞卿根本不承認，說他沒有伸手，工作都是黨中央和毛主席任命的，更沒有封鎖林彪，該向林彪講的都和他講了。有些問題他向周總理、毛主席講，聽他們的指示，這是應該的，也是屬於他職權範圍內的事。而且林彪是知道的。

後來，周總理和鄧小平又一次向羅瑞卿傳達毛主席的指示，說：“沒有這一條，有別的，可以檢查別的。”

“別的有什麼呀？”羅瑞卿不理解別的究竟指什麼，反問了一句。

“你和別人的關係不好。”周總理和鄧小平回答了他。

“關係不好！關係不好！”羅瑞卿淒然地重複著這句話。

會議是 15 日結束的，那時只說羅瑞卿不在軍隊任職，專做政府工作。

16 日，周恩來、鄧小平再次向羅瑞卿傳達毛主席的談話，說：

“主席對林彪講，反對你，還沒有反對我呢。就是反對我到長江裏游泳，那

是一片好意。這是一。

第二，主席說，如果沒有這三條，可以把問題先掛起來，中國有很多問題都是掛起來的，掛幾百年不行，還可以掛一萬年。有什麼就檢查什麼。

還說，瑞卿的工作是有成績的。主席講，這個事，我們也有責任，沒有發現，及時教育。然後就說，告訴羅總長回北京，回北京再說吧。”

毛主席說的這些話，當時沒有在會議中傳達。

羅瑞卿聽了周總理、鄧小平的傳達，自然想不通。後來他又給周總理打電話，要求去見毛主席，去見林彪，他相信毛澤東是瞭解他的，能夠把一切向毛主席解釋清楚的。當周總理表示不能見面時，羅就馬上給林彪打電話要求見面。周總理見此情景，感慨地說：“太天真，你太天真了。”

誰都知道，毛澤東走到哪裡，當公安部長的羅瑞卿總是跟著保駕，負責毛主席的安全。應該說毛主席對他是瞭解的。既然“沒有三條”，還要把問題掛起來，掛幾百年到一萬年，這是符合哪一家的法規呢？然而又確實出於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之口！

二、楊成武談揭批羅瑞卿實情

12月6日深夜就在杭州。

我的秘書朱欣接到毛澤東的秘書徐業夫由上海打來的電話，說：“毛主席那裏有事，讓楊副總長快去，要一定在第二天早晨7時以前趕到上海，交通工具自己解決。”朱秘書接完電話隨即報告了我。

什麼事那麼急？是東南沿海有什麼軍事行動？還是帝國主義對我們進行武裝偵察？我心裏頓時產生種種疑問。

“交通工具怎麼解決？”朱秘書問。

“坐火車去來得來不及？”我反問了一句。

“在這段時間內，沒有到上海的車次。”

“坐汽車怎麼樣？”

“時間更長，不能按時趕到。”

“有飛機沒有？”

“我去聯繫。”朱秘書瞭解後告訴我：“南京空軍有一架犁二飛機空著。”

“你通知南空派一架犁二飛機來杭州。”我向朱秘書交代。

7日早上我們乘南空的專機準時趕到上海，在虹橋機場著落。走下懸梯時，徐業夫已站在那裏等我。他一見到我就說：“主席要召開一個會，請你參加，你就住在錦江飯店。”是什麼會？研究什麼問題？徐業夫一個字都沒有吐露。

當時毛主席住在虹橋賓館。我進去一看，主席、周總理、劉少奇、葉劍英、謝富治等人已在那裏了。

住進飯店後，見到幾位老同志，他們也不知道開會的內容。賀龍來上海時，帶來了地圖，可見他原以為討論的也是軍事問題。這和我來前的想法有共同之點。

這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會呢？就當時參加的人來說，既有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志，也有書記處成員，還有軍委委員和軍隊的負責同志，也有在中央不擔任任何職務的人，如林彪辦公室主任葉群和總參作戰部副部長雷英夫。所以這次會既不是政治局會議，也不是書記處會議，更不像軍委會議。當時主持會議的同志也沒有明確宣佈會議的名稱，但就會議內容講，就是揭發所謂羅瑞卿的問題。因此，我們姑且稱這為中央上海會議。理由很簡單：地點在上海，召集的是黨中央主席

毛澤東。現在也有人稱為“上海中央常委擴大會”的。

會議在 1965 年 12 月 8 日舉行。會議分為三個小組，我們組的組長是周恩來，參加的人有董必武、朱德、賀龍、陳毅、陸定一，總參作戰部長王尚榮、副部長雷英夫和我。還有林彪的老婆葉群。其他兩個小組組長分別由劉少奇和鄧小平擔任。

小組會由周恩來主持。他宣佈開會後，葉群首先發言，她是作了充分準備的，講得有聲有色，說：“羅長子反對突出政治，他胡說既要突出政治，也要突出軍事，軍事政治都重要。搞折中主義。”

“翟月英對我講，劉亞樓在病重時要她把羅瑞卿的四條意見轉告我葉群。四條意見是：

- 一、一個人早晚要退出政治舞臺，林總也是要退出政治舞臺的；
- 二、要我照顧好林總身體，勸林總多管一管中央的工作；
- 三、部隊的事情讓他羅瑞卿負責；
- 四、這件事辦好了，羅瑞卿不會虧待我葉群。

我當時就把她的話頂了回去，沒想到後來劉亞樓又找 101（林彪代號）當面談。”

“還有一次，羅長子到林總這裏彙報工作，林總身體不好，沒有聽完就讓走了。他在走廊裏大吵大嚷：‘病號嘛！還管什麼事！病號！讓賢！不要幹擾，不要擋道呢！’這完全是逼林總交權、讓位。他這是存心折磨林總，氣林總。”葉群聲色俱厲，心情激動，一下子講了幾個小時，硬說羅瑞卿反對林彪，反對突出政治，使別人聽起來似乎都是真的。

雷英夫也揭發了所謂羅瑞卿反對林彪的不少重要材料。

我聽了之後，腦子裏產生另一種怎麼也弄不通的想法：說羅瑞卿反對林彪，這怎麼可能呢？從歷史上看，羅瑞卿與林彪在紅四軍，紅一軍團，以後長征到陝北，進“抗大”都是在一起的。林彪雖然擔任抗日軍政大學校長，但“抗大”的具體組織工作，都是任教育長的羅瑞卿幹的，林彪不管多少事。1959年彭德懷被打下台，將黃克誠打成“軍事俱樂部”成員，撤掉了總參謀長的職務。林彪當了國防部長，提名羅瑞卿當總參謀長。他們之間的關係是很密切的，工作是協調的，配合是默契的。

羅瑞卿在1965年下半年總參的一次幹部會議上，講到他和林彪的關係時，對我們說過：“我跟林總是跟定了，彈打不飛，棒打不散，骨頭燒成灰也忠於林總的。”然而會議上確是揭發羅瑞卿所謂反對林彪的。

還有，說羅瑞卿反對突出政治，事實果真是那樣嗎？

1965年林彪對軍隊工作的《關於突出政治五項原則》的指示，它的主要內容，雖然是總政治部劉志堅副主任和葉群在廣州軍區127師調查後向林彪彙報時說的，但形成正式文字，卻是羅瑞卿親自召開軍委辦公會議，主持討論修改了七八遍才定稿，並送林彪審定後簽發的。

總參謀部機關1965年7月召開的“突出政治落實四好”座談會，就是羅瑞卿要我為進一步落實林彪的指示而舉行的。

如果他真的反對突出政治，在行動上能有這麼認真並用那麼大的精力去抓落實嗎？！

至於說劉亞樓講的四條，我5月份在醫院見到他時，劉已不省人事，是醫生打了一針才蘇醒過來的，根本沒有談此事。二三月份我在華東看地形，路過上海，去醫院看望劉亞樓，同去的有王尚榮，在場的有翟月英以及醫生護士，劉也根本

沒有提到這四條。

所以我對葉群的所謂揭發，既不敢苟同，又無法否定，只是聽著。還有小組裏的雷英夫當時揭發羅瑞卿是很積極的，他憑什麼資格出席這樣的會議，我很納悶。因為作戰部已有一個部長王尚榮出席，為什麼還要有一個副部長來參加呢？而總參其他業務部，又沒有一個負責人出席這個會。這樣的情況，也使人感到內中必有蹊蹺。後來的事實表明，雷英夫確是投靠林彪，為打擊羅瑞卿出了大力的。會議期間，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分別找我談話，問我羅瑞卿與林彪之間的情況，我講的與在杭州同毛主席談的一樣。因為其他方面我確實不知道。

三、批判羅瑞卿

沒有被批判對象，並不妨礙林彪夫婦對羅瑞卿的控訴，他們更加地肆無忌憚、信馬由韁地為羅捏造各種罪名。

會上印發了十一份材料。即：

1965年11月30日，林彪給毛澤東的信。

1965年10月25日，雷英夫給林彪的信。

1965年10月25日，雷英夫：《我對羅總長的幾點具體意見》。

1965年6月，張秀川：《羅總長對突出政治的錯誤看法》。

1965年11月27日，李作鵬、王宏坤、張秀川給林彪的信。

1965年5月20日，林辦工作人員的揭發材料。

1965年10月15日，張秀川給林彪的信。

1965年4月15日，劉亞樓給羅瑞卿的信。

張秀川：《羅總長對主席思想的錯誤觀點》。

雷英夫：《羅總長對待主席指示的幾個問題》。

1965年12月6日，雷英夫電話報告紀要。

葉群在會上分三次作了約十小時的發言，繪聲繪色地描述了羅瑞卿如何逼迫林彪退位，要林“不要擋路”，“一切交給羅負責”。葉群不僅會上發言，會下還在串聯，忙得不亦樂乎。

毛澤東只參加了第一天的會議，定了一個調子就不再參加了。其他會議議程就交給了林彪。從12月9日開始，會議就由林彪主持，會議的主要內容自然是批判羅瑞卿。這一批就是一個星期。會議最後一天，林彪在會議上宣佈撤銷羅瑞卿的職務（書記處書記、副總理、國防部副部長、總參謀長、軍委秘書長）。

在那個年代，同志間情誼友愛儘管很深，似乎一出了所謂政治問題就該忘卻，稍有流露就可以扣上沒有劃清界限、立場沒有轉過來、是什麼“分子”等等的政治帽子，壓得你站不起來。

1966年3月，中央決定在北京召開有各中央局各大軍區的負責人參加的會議，繼續揭批羅瑞卿的問題。

會議成立了三人領導小組，由鄧小平任組長，組員是彭真和葉劍英。為了开好這次會，軍委決定設會務組，葉劍英兼組長，成員有蕭華和我。

會議在中南海懷仁堂舉行，開幕那天鄧小平主持並講了話，羅瑞卿也天天出席。

會議的中心是揭發批判羅瑞卿，各人的發言都是有準備的，有的發言是很激烈的。廣州軍區副司令溫玉成、總後勤部長邱會作在發言中都是堅決主張要開除羅瑞卿黨籍的。吳法憲在會上宣讀了一萬多字的發言稿，他聲嘶力竭地當面誣陷“羅瑞卿有野心，反對林副主席，向党伸手，陰謀奪取軍權，你跑遍全國看地形，

幹什麼？就是為將來你自己指揮軍隊，你準備……你……”致使羅瑞卿受到了莫大侮辱，不久發生了3月18日的跳樓事件。

在這之前，羅瑞卿給夫人郝治平寫了一份遺書：“治平：會議的事沒有告訴你，為了守紀律，……永別了，要叫孩子們永遠聽黨的話，聽毛主席的話！我們的黨永遠是光榮的正確的偉大的，你要繼續改造自己！永遠革命。”

由於發生了“跳樓事件”，這就加劇了問題的嚴重性，那時人們一般認為這種舉動是自絕於黨和人民的行為，因而激起到會一些人的發言升溫。葉劍英副主席當時為此還填了一闕詞：

將軍一跳身名裂，
向河梁，
回首望，
故人長絕。

中央從3月18日後，決定會議背靠背地進行，到會的人都得表態、發言。許多同志發了言，我和王尚榮、雷英夫作了聯合發言，稿子是王尚榮、雷英夫寫的，那時不表態是不行的。這個發言有過頭話，但還是留有餘地。對會上有人提出要開除羅瑞卿的黨籍，我明確表示不贊成，並說不能這樣提，那是中央決定的事。

到了1968年3月24日所謂“楊余傳事件”時，溫玉成說我包庇羅瑞卿，林彪據此在大會上說我“實際上袒護羅”，“本來就是一個羅瑞卿分子”。

1966年8月26日上午，毛澤東、周恩來，還有李先念，在人民大會堂老河北廳召開會議，毛主席又向我們指示說：“羅瑞卿的問題，你們可以傳達到全體幹部。”從此，全軍幹部都知道羅瑞卿出事了，該要打倒了。

第二節 葉劍英是批羅主角

葉劍英是“倒羅”的主角。二人在建國伊始就結怨，在廬山會議後，葉羅在工作上的衝突則愈演愈烈。當毛澤東決定要拿掉羅瑞卿，為文化大革命的發動鋪平道路時，葉劍英自然而然成了為毛澤東衝鋒陷陣的幹將。

在《中共中央批轉中央工作小組關於羅瑞卿錯誤問題的報告》

（1966.05.16；中發〔66〕268號）中六次提到葉劍英的名字。此通知所提到的主要有關葉的內容包含：（1）葉劍英在三月份至四月份中央召開的批判羅瑞卿會議上的講話以及葉劍英、肖華、楊成武、劉志堅同志四月二十四日向主席、中央的報告一併發給地委和師級黨委，口頭傳達到縣、團級黨員幹部；（2）彭真在批判羅瑞卿會議上是站在反對毛主席和反對黨中央、反對林彪同志的立場上的，有關事實有葉劍英、肖華、楊成武、劉志堅四同志，另寫一信報毛主席和黨中央；（3）羅瑞卿對葉劍英進行過攻擊和誹謗；（4）由葉劍英親自抓的“郭興福教學法”，事後羅瑞卿發現此舉“大有油水”，便撇開葉劍英，把功勞據為己有。

葉劍英和羅瑞卿之間會產生矛盾，不僅僅是因為1959年後，由於葉只是分管科研和教育訓練工作的軍委常委，其報告有時還要先送給主管軍隊日常工作的總參謀長兼軍委秘書長的羅瑞卿大將，更重要的是羅瑞卿自己倚仗是毛澤東所“信任”的人，在處理事情上根本不留轉圜的餘地，包括對軍科院的資金劃撥。

早在廣東“二陳事件”開始，二人便已經埋下衝突的種子。羅瑞卿一手主導的“建國後公安系統第一冤案”的主角陳泊、陳坤（二陳事件）都是葉劍英點名

到廣州市接管公安局工作的。葉劍英曾經對此嚴厲質問羅瑞卿，陳泊何罪之有？葉對此甚為不滿。羅瑞卿絲毫不買葉的帳，反唇相譏，當面駁斥，根本不把葉放在眼裏。

歷史的真實還在於，此事不久之後葉劍英就被捲入“反對(廣東)地方主義”的政治風波之中，其實“兩陳案”就是廣東政治大地震的先期徵兆。1952年6月，華南分局召開擴大會議，葉劍英在會上檢討道：“主帥無能，累及三軍。”自然“二陳”也是被累及其中。可以推測，如果不是毛澤東此時無意打倒葉劍英，羅瑞卿極有可能把葉燴在“兩陳案”裏面。

1959年廬山會議之後，中共中央軍委改組。9月26日，中央軍委發出通知：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由21人組成中共中央軍委，主席為毛澤東，副主席林彪、賀龍、聶榮臻；常委為毛澤東、林彪、賀龍、聶榮臻、朱德、劉伯承、陳毅、鄧小平、羅榮桓、徐向前、葉劍英、羅瑞卿、譚政等13人；軍委委員有：毛澤東、林彪、賀龍、聶榮臻、朱德、劉伯承、陳毅、鄧小平、羅榮桓、徐向前、葉劍英、羅瑞卿、譚政、粟裕、陳賡、蕭勁光、王樹聲、許光達、肖華、劉亞樓、蘇振華。秘書長為羅瑞卿，蘇振華、蕭向榮為副秘書長。軍委日常工作由林彪主持。

但是中央軍委經中共中央批准，於1959年10月20日發出通知，決定在軍委常委之下，設立一個軍委辦公會議的機構，負責處理一些日常事務。其成員為羅瑞卿、譚政、楊成武、肖華、邱會作、蕭向榮。軍委辦公會議由軍委秘書長主持。

1962年毛澤東又決定，林彪生病期間由軍委第二副主席賀龍主持軍委工作，而日常工作則由羅瑞卿負責，周恩來曾經這樣評價過：“羅實際上是國防部長。”

這樣個人事格局造成了事實是：大將領導元帥—羅瑞卿領導葉劍英。

以前彭掌權時，大將排名第三的黃克誠以軍委秘書長的身份召集聯席會議處理軍委日常工作（在彭德懷、聶榮臻及其他軍委委員不能主持軍委日常工作時），時任總參謀長——大將排名第一的粟裕向黃彙報工作就磕磕碰碰，現在何況大將領導元帥呢？加上羅對其他元帥已也極不尊重。（羅當時的職務為：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付總理、中央軍委常委、軍委秘書長。）

而且正如毛澤東評價：羅瑞卿鋒芒畢露，盛氣凌人，羅不尊重各位元帥。

不尊重不僅表現在對這些老師們的評論上，而且表現在對於他們的工作不支持。吳法憲曾聽葉劍英說過，羅瑞卿對他不夠尊重。葉劍英分管軍事訓練及科研，所需要的經費羅瑞卿就不那麼支持，因而產生了一些意見和矛盾，狀告到了毛澤東那裏。除了老師，軍內外也不斷有其他人到林彪這裏告狀。

王秉璋也回憶到這個事情。

1965年5月，軍委就軍隊戰備問題舉行會議，葉劍英為了這個發言做了長時間的準備。因為此次會議事關中共援越及重大戰備問題，總結發言理應待報毛、林後再做。但是羅瑞卿在部分與會者的要求下輕率地決定，撇開葉劍英，即以會議主持人身份作出總結發言，並在會議簡報上做了預告。

葉劍英自然對此非常惱火，連同聶榮臻，尚華，楊成武，李天佑等人即向毛彙報，並分別在毛澤東和林彪面前表示不滿。

毛澤東為此申斥林彪“不抓大事”“放權”，林彪招此批評，十分惱怒，隨即下達指示口授了一個電話記錄：“會議上不能散佈個人做結論的空氣。如果散佈了要當眾收回。在什麼範圍散佈的，就在什麼範圍收回。63期簡報關於羅總長作總結發言的提法不對。明天在各小組宣讀。”。

就此同個時間，毛澤東開始秘密安排葉劍英收集羅瑞卿的材料。此事由邱會作的回憶得到證實。總後勤部部長邱會作回憶：大約 1965 年 5、6 月間，中央軍委常委會在京西賓館召開。會前，葉劍英、聶榮臻兩位元帥在休息室聊天。我怕打擾他們，想退出，他們招手讓我坐下。葉帥說：他真是利令智昏了，人長、腳長、手也長！聶帥說：壞就壞在手長上！雖然他們沒點名，但我聽明白了，羅瑞卿一向被稱作“羅長子”嘛。葉帥對我說：我們談話，你是懂得的，將來你會知道更多的情況。我們還要給一些同志打招呼。按葉劍英的說法，羅瑞卿是“羅長子”。而軍中老人則對此有兩種說法：一種是外在的，因為羅瑞卿的個子高（1 米 82）；另一種是內在的，來自民諺：“猴拉稀壞腸子”，“羅長(腸)子”言其整人時心腸之壞、之狠。葉劍英因為“二陳事件”和羅瑞卿結怨，指的必定是後者。

1965 年的 11 月 29 日，毛辦通知葉群馬上來杭州向毛做全面彙報。毛澤東在葉群面前就“作戰會議總結發言”和“五級幹部定級問題”大罵羅瑞卿：“羅長子不是軍委主席麼！也不是軍委副主席麼！黨內也不是政治局委員麼！怎麼由他做總結發言？有的老師組織了一個班子，準備了一二個月的總結發言稿，怎麼不讓這位老師做總結？聽說羅長子的總結發言事先沒有經過軍委其他領導看過？大將也不只他一個麼！現在許多元帥和大將怎麼沒工作幹了？黨政軍的工作就靠羅長子一個人幹？中央的五級幹部定級的名單上怎麼連國防部長的簽批也沒有？！”

“這位老師”指的就是葉劍英。

由於林彪在 1963 年 5、6 月曾經兩次讓秘書和葉群打電話給總參謀長羅瑞卿，說身體不好，不能過問軍委的事，讓第一線的同志放手工作。日常工作要各

總部自己負責，較大的事辦公會議討論，再大的事軍委常委討論，更大的事直接報告主席、中央。而如今羅瑞卿卻對一些老師們不尊重，以致告狀不斷，林彪覺得也難辭其咎。邱會作回憶：1965年8月，葉劍英去看望林彪，林彪有些不好意思。平時不管誰來看望林彪，林彪很少先說話，這次他主動說，他這個總長盡在外面惹事，羅長子這人，他對你們不尊敬，我要不斷地刮他鼻子。

葉帥笑了，說林總，今天主席叫我來，羅瑞卿的事你以後不要管了，羅的事以後由中央解決。

1965年11月，葉劍英突然來蘇州，向林彪傳達毛澤東的指示，說不要再保羅瑞卿了，再保對你沒好處。葉劍英沒想到牆後有耳，葉群和林豆豆在屏風後面全聽到了。毛澤東認為羅瑞卿是劉少奇的人，明確要求林彪表態，林彪藉口身體不好拒絕了。毛澤東說：如果林彪身體不好，可由葉群代為彙報。

從上述可以看出葉劍英對於“倒羅”是在毛澤東授意下積極參與的。

據徐厚田回憶：1980年審理“兩案”，意外發現雷英夫交出五個記錄他在高層活動的筆記本。後來說雷英夫有問題，主要是他揭發羅瑞卿。雷英夫坐在總政落實政策辦公室大哭，說我的問題只有葉帥能說清楚，而葉帥當時已經病得不能說話了。總政落實政策辦公室經過調查，認為雷英夫是理解毛主席的意圖才揭發羅瑞卿的，他的揭發並不是什麼要害問題，也沒有誣陷。雷英夫的話表明，葉劍英不僅自己積極參與，而且雷英夫的活動也是其支持或者至少是知情的。

開上海會議之前，謝富治問，羅總長怎麼沒有來，是不是忘記通知他了？葉劍英看謝富治問個沒完，就說，主席不會忘事。張耀祠後來說，看來葉劍英已經知道一點來頭。

葉劍英確實知道。葉劍英不僅是個知情者，而且是參與“編網”者。羅瑞卿的一位部下這樣回憶，1965年11月4日，葉劍英從杭州打電話叫我第二天坐飛機去見他，說事情很重要，但沒有說什麼事，說來了就知道了。第二天晚上下了飛機，葉帥已派車等在機場，然後把他接到空軍療養院，副總參謀長楊成武和總政主任肖華都在。葉帥開門見山地說，家門不幸，羅瑞卿出問題了，一是要當國防部長；二是對林彪封鎖消息，不彙報；三是折磨林彪，要不就不彙報，要不一說幾個鐘頭，林彪在大連養病，羅瑞卿拿地圖講了很長時間，林彪直出虛汗；四是對林彪搞突然襲擊，等林彪報告毛主席，毛主席定了就解決問題。說完，葉帥沒有評論。我說，我回去對羅瑞卿採取什麼態度呢？葉帥說，該怎麼辦就怎麼辦。第二天，我就坐飛機回來了。幾天後，我隨羅瑞卿去參加外國使館舉行的建軍節招待會，路上，羅瑞卿氣得鼓鼓的。原來是李作鵬幾個找他談工作，吵起來了。羅瑞卿還很奇怪，李作鵬過去不是這樣嘛。我心裏有數，李作鵬肯定也被打過招呼。果然，上海會議之前，李作鵬幾個人拿出了一封告羅瑞卿的信。上海會議主要說羅瑞卿反對林彪的問題，給他羅列了許多罪名，羅瑞卿一直不承認那些不實之詞，再三說明自己是支持擁護林彪的。

葉劍英實際就是安排此人回去盯羅瑞卿的梢！而後來葉群說提出的“葉四點”完全是葉劍英提出的這四點的翻版！因為葉群所說羅瑞卿通過劉亞樓講的四點如下：1：林總早晚要退出政治舞臺的。不退出也要退出，現在不退出，將來也要退出政治舞臺；2：要保護好林總的身體；3：今後林總再不要多管軍隊的事情了，由羅總長去管好了；4：一切由羅管，要放手叫他去管。“葉四點”其中心內容是羅瑞卿要主管軍隊，做國防部長，葉劍英對這位羅瑞卿的部下所講遠比“葉四點”厲害，基本上就是後來給羅瑞卿定罪的基礎——由折磨封鎖林彪

發展到反對林彪。但是為什麼後來毛澤東又要借葉群的嘴講出這四點？很明顯，毛澤東決定要打倒羅瑞卿之時，不再象 1959 年廬山會議那樣赤膊上陣，那樣連個轉圜的餘地都沒有。毛澤東要借用林羅的矛盾，這樣通過葉群的口說出無疑要比通過葉劍英的口砝碼重的多！另外比這更重要的一點就是毛澤東通過此舉把林彪捆綁在“倒羅”的戰車上，而對於葉群在上海會議上所講的，事後並沒有得到很大重視，因為後來根本就沒有形成以葉群講話為主要內容的下發中央文件！

1966 年 3 月批羅會議期間，葉是主持會議的七人小組成員之一。儘管範碩百般為葉劍英解脫，說葉在會上採取了「明批暗保」的策略。事實果真如此嘛？就在 1965 年 12 月 15 日上海會議結束當晚，在錦江飯店舉行了文藝晚會，在演出的中間還安排了舞會。因為剛揪出了羅瑞卿，幹部當時還是非常緊張，但是周恩來忽然提議葉劍英給大家唱評彈助興。

作為廣州人的葉劍英結果卻唱出了道地的蘇州評彈，周恩來同葉劍英的配合真是相得益彰。羅瑞卿回憶到，“（在三月會議上）所有到會的人，不僅見面不打招呼，不講一句話，都是以十分敵對的眼光望著我，太難受了。”羅點點則寫道：三月會議停開之後，“參加會議的人餘興未盡，餘怒未消，……也有人不說難聽話，他們詩意大發……

當年三月會議後，被我體察到的這種愉悅，不是從迫害別人中得到，又是從何而來？不是縱欲後的滿足，又是甚麼？”單世聯則認為羅點點所言「詩意大發」且在粉碎「四人幫」的鬥爭中發揮了「無可替代的偉大作用」的，似乎是指葉劍英。

所謂的“詩意大發”指的是 1966 年 3 月 18 日軍委擴大會議即“三月會議”期間羅瑞卿跳樓後，葉劍英以改宋朝辛棄疾《賀新郎送嘉茂十二弟》詞的下半闕

來表達其欣喜之情：“將軍一跳身名裂，向河梁，回首萬裏，故人長絕。易水蕭蕭西風冷，滿座衣冠似雪……”而原來辛棄疾原詞下闕第一句是“將軍百戰身名裂”，為寫漢朝李陵之事。葉劍英的文采風流之至，這“一跳”是改的入木三分，奪人心魄“身名裂”則是形容萬分貼切，葉劍英的幸災樂禍、落井下石的心態躍然紙上。誠如丁抒所言，楊成武所說葉改詩是對羅跳樓表示惋惜是全然不顧事實了。

在三月會議之後，由葉劍英主持寫了 1966 年 5 月 16 日中共中央批轉的《中央工作小組關於羅瑞卿錯誤問題的報告》並被下發到縣團級。至於葉劍英本人如何看待這場“批羅”，葉劍英如是說：我們同彭德懷、黃克誠、譚政的鬥爭，我們同羅瑞卿的鬥爭，都是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鬥爭。羅瑞卿這一小撮篡軍反黨分子雖然被揪出來了，但是他們的陰魂不散，他們的惡劣影響還沒有肅清，在某些方面還起作用。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中，同樣存在著兩條路線的鬥爭。

第三節 中共中央批轉中央工作小組關於羅瑞卿錯誤問題的報告

中發〔66〕268 號

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中央各部委，國家機關各部門和各人民團體黨組、黨委，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

現將中央工作小組四月十三日關於羅瑞卿錯誤問題的報告轉交給你們，中央同意這個報告。

中央認為，羅瑞卿的錯誤是用資產階級軍事路線反對無產階級軍事路線的錯誤，是用修正主義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主席思想的錯誤，是反對黨中央、反對毛主席、反對林彪同志的錯誤，是資產階級個人野心家篡軍反黨的錯誤。

中央認為，這個小組會議開得很好。貫徹執行了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擺事實，講道理，對羅瑞卿進行了耐心的教育和嚴肅的批判。羅瑞卿不但不認真檢查自己的錯誤，反而於三月十八日跳樓自殺（受傷），走上絕於黨、自絕于人民的道路。

鑒於羅瑞卿錯誤極為嚴重，中央決定停止羅瑞卿的黨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職務，以後再提請中央全會決定。

為了教育幹部，吸取教訓，並肅清羅瑞卿錯誤影響，中央決定將中央工作小組的報告和中央批語發到縣委和團級黨委，這個報告所附的葉劍英、謝富治、肖華、楊成武等同志的四個主要發言，羅瑞卿三月十二日的檢查以及葉劍英、肖華、楊成武、劉志堅同志四月二十四日向主席、中央的報告，發給地委和師級黨委，口頭傳達到縣、團級黨員幹部。

中 共 中 央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

關於羅瑞卿錯誤問題的報告

黨中央、毛主席：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八日至十五日，黨中央在上海召開了會議，揭發和批判了羅瑞卿的錯誤，和他進行了背靠背的鬥爭，會後，黨中央指定了周恩來等同志對

他進行了多次的耐心教育和幫助，羅瑞卿不但沒有老老實實檢討錯誤，反而表示受了委屈，各方面為自己辯護，在傳達了黨中央上海會議以後，在軍隊政治工作會議上，在黨和軍隊的高級幹部中，又揭發了羅瑞卿大量的嚴重的錯誤事實。在黨中央直接領導下，從三月四日到四月八日，召開了討論羅瑞卿的問題的小組會議。會議本著擺事實，講道理，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對羅瑞卿進行了面對面的鬥爭。

這次小組會是分階段進行的，第一階段歷時十三天，參加包括軍委總部、公安部、國防工廠、國防科委、軍事科委、軍事科學院、和大部分軍區、軍種、兵種的負責同志，以及羅瑞卿本人，共四十二人，三月二十二日，會議進入第二階段，根據黨中央指示，增加了五十三人，包括黨中央、國務院有關部委和各中央局的負責同志，第一階段未參加會議的軍區、兵種、軍事院校的負責同志。第二階段參加會議的共九十五人。

由於三月十八日羅瑞卿跳樓自殺（受傷），第二階段的會議，只好又轉為背靠背的鬥爭。

根據會議揭發的大量材料，羅瑞卿的主要錯誤事實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敵視和反對毛主席思想，誹謗和攻擊毛主席同志。

羅瑞卿極端敵視毛主席思想。林彪同志指出，要把毛主席的書當作我們全軍各項工作的最高指示，羅瑞卿卻胡說這不符合我們國家的體制。林彪同志指出毛主席思想是當代最高最活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羅瑞卿胡說“不能這樣講，最高還有天高的嗎？難道沒有更高了嗎？最活，難道還有次活的嗎？最高最活不好理解，外國人也不好翻譯呀！”林彪同志提出“毛主席思想是當代馬克思列寧主義

的頂峰。”羅瑞卿卻胡說這句話也不能這樣說，對外國人影響不好。羅瑞卿還不准說毛主席思想的形式包含有“個人天才”的因素，說什麼現在沒有什麼人再敢提個人天才呀！林彪同志提出“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做毛主席的好戰士”，羅瑞卿卻反對向外國人宣傳和解釋這四句話。林彪同志指示《解放軍報》要經常刊登毛主席語錄，羅瑞卿卻嫌搞多了。總政治部根據林彪同志指示，把毛主席、黨中央指示和軍委的檔編成教材，作為幹部、戰士的必修課，羅瑞卿藉口到連隊的東西太多了，不准印發。林彪同志指示，要在民兵中開展學習毛主席著作的活動，羅瑞卿卻胡說“不要單獨給民兵佈置學習毛著任務”。羅瑞卿還指責歌舞劇《水兵的光榮》中，唱“敬愛的毛主席”太多了，說要和共產黨聯繫起來，不要單獨地唱。

羅瑞卿歪曲和反對毛主席關於階級和階級鬥爭的理論。毛主席一貫教導，人民內部也有階級矛盾，羅瑞卿卻胡說：“農民有一部分自發傾向，想搞單幹，不是階級矛盾，而是人民內部矛盾。”還胡說：“我們軍隊本身不存在階級矛盾，但是存在立場不堅定，階級覺悟要提高，要抵抗資產階級封建思想的侵蝕，以及對政治問題要有辯證的分析方法問題。”

羅瑞卿當公安部長的時候，就否定毛主席關於社會主義存在階級和階級鬥爭的學說。毛主席在一九五七年剛剛發表了《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指出階級鬥爭是長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羅瑞卿卻在五八年大搞什麼“十無運動”，限令做到無反革命，無盜竊，無流氓阿飛，無火災，無車禍等等，並把蘇修的東西拿來做依據，鼓吹什麼蘇聯內部已經沒有階級了，那裏的犯罪問題主要是外部的原因了，這是典型的階級鬥爭熄滅論，是徹頭徹尾的階級鬥爭熄滅論，是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觀點。他這種搞法雖然受到黨中央多次批

評，但是他仍然堅持錯誤，仍散佈階級鬥爭熄滅論，而且又接著放出了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熄滅論，1958年x月，他就公開說過“現在基層政權在開始消滅，專政工具也是如此。”“現在反革命更少了，我們的基層政權主要任務不是搞階級鬥爭，而是搞經濟建設，文化建設，就這個意義上講……（不清）在開始消滅。”毛主席黨中央反復強調公安工作一定要在黨委領導下走群眾路線。羅瑞卿卻強調垂直領導，搞神秘主義、孤立主義，搞蘇聯“格伯烏”那一套。

羅瑞卿在新疆地區反對蘇聯搞顛覆活動的鬥爭問題上，違背和反對黨中央和毛主席的方針和指示，他誣衊我們在中蘇邊境上“製造人為的緊張”，對中蘇邊境的糾紛為蘇修開脫罪責，說什麼“不能說多數是他們挑起，要做具體分析”，一九六二年x月x日，xx地區的暴亂事明明是蘇修策劃和組織的，他也是非常清楚的，他卻極力為蘇修開脫，輕描淡寫地說：“我看與他們的領事館有點關係”，接著他又別有用心地說：“不曉得這筆歷史怎麼寫法”。他違背毛主席的指示和黨中央、國務院的規定，擅自宣佈邊境地區的五類分子不要內遷，責備x軍區在x（看不清）邊境製造“無人區”，他還胡說：“現代修正主義攻擊我們進行民族xx（看不清），搞得不好，就是迫害嘛！”

羅瑞卿反對毛主席人民戰爭思想，反對我們武裝力量的傳統體制，我們武裝力量的傳統體制是主力軍、地方軍和民兵遊擊隊相結合，羅瑞卿卻阻撓和反對設地方武裝，忽視民兵工作。

羅瑞卿拒不執行毛主席關於建立和加強地方武裝的指示。毛主席早在一九六零年就明確指出，要從主力軍中抽出若干個師給沿海各省作為地方武裝的骨幹。羅瑞卿對這一極為重要的戰略指示，既不佈置執行，也不……（漏）竟然拖了近三年之久。一九六四年六月、七月、毛主席又連續二次在會議上提出這一問題，

指定要從正規部隊中拔出 xx 個師給沿海各省，並且對羅瑞卿進行了嚴厲的批評。羅瑞卿這時才被迫去佈置。但是，他在佈置時指出：“究竟抽調完整的建制師，還是抽調一部分建制部隊補充一部分新兵，或者是補充新兵和原來的地方部隊結合起來合併組建，還可以研究”。結果，主席的指示還是被打了折扣。

毛主席指示，搞四清要把民兵工作搞好，林彪、xx、徐向前同志也都指出，在四清運動中要自始至終地抓民兵工作，參加四清的軍隊幹部要做民兵工作，羅瑞卿卻一再反對，說四清運動中的民兵工作“只在建設階段抓一下就行了”，並且規定“軍隊幹部下去參加社教工作不要另外賦於搞民兵的任務。”

羅瑞卿在民兵工作三落實的問題上也和毛主席唱反調。近幾年來毛主席多次指出，民兵工作的三落實，第一是組織落實，第二是政治落實，第三是軍事落實，首先是有沒有，隨後是講政治。羅瑞卿卻狂妄地反對毛主席這一指示，他反復說：“民兵三落實，首先是政治落實，在政治落實的基礎上，再做到組織和軍事的落實，”“如果政治不搞好，思想上不搞好，那個組織不落實還好一點，越落實越壞，被壞人奪去領導權或者被壞幹部掌握住了，那個越落實越會幹壞事，”“要把關係搞清楚。”羅瑞卿在這裏好像很強調政治，實際上是用詭辯論否定毛主席把民兵組織起來的重要指示。同時，羅瑞卿搞民兵大比武，也就把毛主席提出的民兵工作三落實統統給衝垮了。

羅瑞卿還反對毛主席的文藝方針。毛主席歷來教導，文藝第一是政治標準，第二是藝術標準，首先要解決文藝的政治方向問題。一九六四年六月，毛主席批評文藝界“十五年來，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執行黨的政策，做官當老爺，不去接近工農兵，不去反映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最近幾年，竟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羅瑞卿多次在部隊文藝隊伍中強調，部隊文藝方向問題解決了，要突

出藝術。他胡說什麼“光搞政治性、戰鬥性很強的東西，就顯得太單調，太枯燥”。 “我軍有些文藝作品，比較生硬，藝術加工很不講究，使人看到很枯燥。我不主張這樣。不然還有什麼藝術？光讀毛選就行了。”

羅瑞卿公然修正毛主席關於凡是有群眾的地方就有先進、中間、落後三種狀態的理論。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他說什麼：“我們部隊不要搞先進、後進，不要提後進戰士，” “後進戰士這種概念應該取消”，“我們軍隊中，只要有黨員、團員、五好戰士、英雄模範、革命軍人這些名稱就行了”。

羅瑞卿還對偉大領袖毛主席進行惡毒的誹謗和攻擊。他多次在大庭廣眾之中散佈對毛主席的不滿，他還對別人說毛主席不信任他，會整他，他想到上海當市長，早點離開毛主席。以後因為上天安門毛主席並沒有要他陪，到 xx 開會，毛主席沒有讓他一道坐飛機去，他又說毛主席不信任他，要整他。這證明他對毛主席懷恨在心由來已久的。

羅瑞卿這樣敵視和反對毛主席思想，誹謗毛主席同志，實際上就是敵視、反對和攻擊無產階級專政，力圖以資產階級政治來代替無產階級政治。

第二、推行資產階級軍事路線，反對毛主席軍事路線，擅自決定三軍大比武，反對突出政治。

羅瑞卿擅自決定全軍大比武，反對突出政治，是他資產階級軍事路線的大暴露，是他力圖以資產階級軍事路線，代替以毛主席同志為代表的無產階級軍事路線的陰謀的大暴露。

一九六四年一月，羅瑞卿沒有經過軍委辦公室會議和軍委訓練委員會，也沒有請示林彪、賀龍、聶榮臻同志和軍委常委，擅自決定全軍大比武。一月至十月，他還十三次到各地督戰，各省市民兵比武也是他個人擅自決定的。

大比武是比軍事，比技術，提倡軍事第一，技術第一。一搞大比武就否定了四個第一，否定了軍委決定的一九六四年全軍工作的方針。大比武衝擊了政治，衝擊了學習毛主席著作，削弱了部隊的政治思想工作。大比武造成了嚴重的惡果。為了在比賽中爭第一，拼湊尖子，弄虛作假的現象非常普遍，單純的軍事觀點，錦標主義的傾向大為發展，嚴重地破壞了部隊的作風，嚴重地脫離了群眾，嚴重地影響了內部的團結。由於大比武，部隊中的資產階級思想大氾濫，歪風邪氣上升，四好連隊大幅度下降。為了比武，不加 xx 選拔幹部和發展黨員、團員重技術、輕政治。有些單位排擠工農幹部，把政治思想品質好，但技術稍差的幹部撤換了不少，完全違背了毛主席關於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五個條件的指示。大比武也衝擊了正常的軍事訓練，練為看，不是練為戰，搞了一套形式主義，花架子，根本不符合實戰要求。比武中浪費現象十分驚人，訓練事故也大量增加。民兵大比武衝擊了民兵工作三落實，影響了生產，脫離了群眾，增加了人民群眾的負擔，也發生了許多事故。

一九六四年底，林彪同志根據毛主席一貫建軍思想，建軍的歷史經驗和當時部隊反映的大量材料，作了突出政治的指示，嚴肅地批評了大比武的錯誤。對於這個指示，羅瑞卿不僅不執行，反而千方百計篡改和歪曲。十天之內他對林彪同志指示內容反復篡改了八次之多，竭力閹割其革命精神，塞進了許多私貨。一九六五年初，他在軍委辦公室會議第八次擴大會議和全軍學習軍師機關革命化經驗大會上，以及後來多次到部隊、院校的講話中，他都竭力反對林彪同志突出政治的指示，並且惡毒地進行煽動。例如，一九六五年一月十五日，羅瑞卿在高等軍事院校軍以上幹部讀書班結束時的講話中，公然煽動大家說，對於林彪同志突出政治的指示“你們贊成不贊成，可以討論一下，你們今天就要走了吧！不贊成的

以後寫信來。”他到處別有用心的講，對於林彪同志的指示要有“全面的”、“正確的”、“辯證的”理解。他還說一九六四年的軍事訓練工作是建國以來最好的一年，大比武的成績是主要的，氣可鼓，不可泄，不要潑冷水，他到處散佈折中主義（機會主義）的謬論。極力反對毛主席關於政治領導軍事的基本觀點，而強調單純的軍事觀點，說什麼軍事就是政治，軍事，政治應該並重，反對所謂“政治家”，說什麼“政治搞不好別的就搞不好，但是，單純把政治搞好，別的就搞不好，垮下來，這種政治恐怕不能算政治好，是空政治，那裏有這種政治。”“一定要明確理解林彪同志的指示，政治搞得不好，打起仗來向後跑，但是，軍事沒有一點功夫，我們訓練就是為了打仗，打得不准，一打人家就撲過來，你說向不向後跑？軍事作戰搞不好，浪費事小，打起仗來就亡黨亡國”等等。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林彪同志提出突出政治五項原則以後，五項都遭到羅瑞卿的反對和歪曲。羅瑞卿反對把毛主席的書當作我軍各項工作的最高指示。他還把“苦練過硬的技術和近戰夜戰的技術”這一條說成是五項原則中最重要的一條，而把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抓活思想等主要的幾條放到次要地位。軍委已經決定把五項原則作為一九六六年全年工作的方針，他卻別有用心地強調主要是解決方法問題，說什麼“不解決方法問題最好的方針也要落空”，影射林彪同志的五項原則是“瞎說一通”。

第三、目無組織紀律，個人專斷，搞獨立王國，破壞黨的民主集中制。

前面說過羅瑞卿個人擅自決定大比武，反對林彪同志突出政治的指示，在公安部搞“十無運動”等等，不但在政治上是嚴重錯誤，而且在組織紀律方面，也都是嚴重的錯誤。

關於東南沿海對敵鬥爭的方針問題，毛主席、黨中央、軍委曾再次明確指示，臺灣海峽的鬥爭，不單是對蔣匪的鬥爭，主要是對美帝的鬥爭，不單是軍事問題，主要是政治問題。因此對蔣匪採取的一切作戰行動都必須從政治上、戰略上加以全面的考慮，由黨中央根據整個形勢的需要掌握決定，未經中央批准，任何人不得自作主張，輕舉妄動。羅瑞卿不請示毛主席黨中央和軍委，竟然於一九六X年X月X日私自指示福建軍區，今後海上作戰，軍區可以根據情況，“積極主動地打擊敵人”，“為了不失戰機，可以邊打邊報告。”

羅瑞卿對許多重大的軍事行動和作戰計畫，往往不向軍委常委請示報告。有時軍委常委開了會，作了決定，只要不合他的意，他就發脾氣，要回去。如一九XX年擬制的XX協同作戰計畫，一九六五年九月、十月在中緬邊境的兩次軍事自衛行動，羅瑞卿沒有向軍委常委請示報告。又如一九六二年X月，軍委常委開會邊境鬥爭和軍工生產兩個問題，大家根據當時的情況，認為最好調一個部隊到中印邊境西段去，當時軍事工業對常規武器的生產應加強，使常規武器、彈藥能增加一些儲備。會議上常委同志要作戰部同志向羅瑞卿報告一下常委的意見，要XXX決定。他聽了彙報後大發雷霆，當著很多人的面，連著說：“不要迷失戰略方向”，“請問什麼地方影響了軍工生產？”

關於國防工業建設和國防科學技術等問題，黨中央、毛主席和軍委已制定了一系列的正確的方針和政策。但是羅瑞卿不但不貫徹執行，反而任意篡改和取消，一九六X年底，他在國防工業辦公室會議上，竟狂妄宣佈：“新軍委成立後，中央、軍委、林總隊國防工業提出的一系列方針，軍總的三級幹部會議上總結的十七條經驗教訓凡是正確的，一定要堅持，部分或大部分正確的，加以修改，不正確的取消，他否認聶榮臻同志直接領導的國防科委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在我們

的原子彈出來以後，他還狂妄地攻擊國防科研工作是从資料到資料，從設計到設計，一事無成。”

林彪、聶榮臻同志不同意羅瑞卿提出的在國防工業中馬上取消軍代表的主張，多次主張，多次提出：“軍代表制度的改變應當慎重考慮，在未弄清情況以前暫時不動”。羅瑞卿狂妄地說：“軍代表制度是彭、黃思想，我就要冒這個風險。”

羅瑞卿在公安部門工作的時候，就有許多無組織無紀律的錯誤。例如：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他不請示毛主席、黨中央和軍委，即擅自決定將軍隊系統警衛北京的兩個師和一個團，改為公安部所屬的人民公安中央縱隊，歸公安部建制。這個受到了毛主席和軍委的批評，以後他就積極地擴大公安部隊，並且企圖建立公安工作和公安部隊的垂直領導系統，竭力擴展自己的權力。

羅瑞卿還利用各種機會，當著下級幹部面，散佈流言蜚語，破壞軍委領導同志的威信。他對林彪同志、賀龍、聶榮臻、陳毅、劉伯承、葉劍英、徐向前和已故的羅榮桓同志，妄加議論、攻擊和誹謗。

羅瑞卿身為黨中央書記處書記、軍委秘書長、總參謀長，但是他很少認真地系統地向幹部傳達黨中央會議的精神和毛主席、黨中央的指示。有時他雖然也傳達一點，但是很少原原本本地講述，而且常常和他個人的東西攪在一起，使幹部搞不清那些是黨中央、毛主席的指示，那些是他自己的東西。林彪同志自一九六一年以後，曾對他多次教育，希望他通氣。一九六五年四月，林彪同志又正確指示，今後軍隊七級以上幹部和總部各部長的任免，要請示報告軍委各同志，然後再報上級黨中央審批，羅瑞卿對這一指示卻置若罔聞。一九六五年五月，全軍中將以上幹部的定級，他不請示報告林彪同志和軍委常委，即擅自決定用軍委名義

報中央書記處。羅瑞卿還經常以林彪同志和軍委常委身體不好為藉口，不准別人去請示工作和彙報情況，誰去請示工作或彙報情況，他就訓斥和打擊。

羅瑞卿是典型的“一言堂”，極端不民主。嚴重地破壞了黨的民主集中制。許多重大問題，他不經過軍委常委，不經過軍委辦公室會議，不經過總參、總政，常常是個人批示決定。即使是軍委常委、軍委辦公室會議上決定了的事情，他也可以隨便推翻，任意改變。軍委辦公會議經常是他一個人講話，別人發言，常常被他打斷頂回去，不讓人家把話說完，甚至諷刺挖苦，惡言傷人。軍委常委開會，也是他講的多，軍委各位副主席的講話也常常給他插斷。他沒有一點自我批評精神，聽不得半句反面意見，老虎屁股摸不得，誰要給他提意見，他就長期懷恨在心，尋機打擊報復。

第四、品質惡劣，投機取巧，堅持剝削階級立場，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登峰造極。

羅瑞卿個人突出，飛揚跋扈，鋒芒畢露，稱王稱霸，想盡一切辦法爭名譽，爭地位，爭風頭，不擇手段地為個人撈取政治資本，他特別熱衷於以個人名義發表文章和講話，極力為自己爭版面，爭頭條，爭畫面，爭鏡頭。在國內外重大政治問題上，他常常搶先發言表態，把自己宣揚成黨和國家的權威發言人的樣子。

羅瑞卿是最會投機取巧的，例如：一九六四年葉劍英同志親自抓了郭興福教學法，召開了現場會議，並向中央軍委建議在全軍推廣，毛主席林彪同志同意這一建議，並表示很讚揚。羅瑞卿一看這裏面大有油水，便把葉劍英同志撇在一邊，興師動眾，親自召開了一個規模很大的現場會議，把功勞據為己有，並乘機搞起來大比武，推廣他的資產階級軍事路線。再如：羅瑞卿還把自己裝扮成反彭、黃

的英雄，到處說自己是受害者，說延安整風時，他批評了彭德懷，是彭恨死了他。實際上，抗日戰爭時期他在野政工作時他跟彭德懷是跟得很緊的。延安整風時，他看到彭德懷又擔負了重要職務，到太原前線來了，於是又跟了上去。當時，彭德懷表示反對延安整風受批判不滿，羅瑞卿接著向彭說：“我也覺得對你的批判過火了。”一九五三年彭、高、饒聯盟反黨時，他又陷了進去。這說明羅瑞卿是一個很典型的投機分子。

羅瑞卿在軍委工作的這幾年，一直高高在上，脫離群眾，脫離實際，從來沒有到基層去作調查研究，也不願意聽取人家的彙報。他在工作上極端不負責任，嚴重失職，他倒裝成很忙的樣子，並且到處吹噓自己忙得不得了，其實他忙是為了撈取政治資本，搞陰謀活動，忙的是吃喝玩樂，甚至在作戰或戰略最緊張的時候，他還照常去看戲、跳舞、釣魚、遊山玩水，他在生活上也是揮霍無度糜爛透頂的。

羅瑞卿雖然入黨幾十年，但是他的剝削階級立場並沒有改變，羅瑞卿對於培養他幾十年的毛主席和林彪同志，對於革命的同志和戰友毫無革命的階級感情，冷酷無情，視若仇敵。

羅瑞卿對待他的公務員殷光富同志和自己的地主親屬的態度完全暴露了他的剝削階級立場。殷光富同志是苦大仇深雇農出身的烈士之弟，他在羅處工作十年，照顧羅的生活，把自己的身體都搞壞了。但羅對他百般虐待，猶如奴隸，相反，羅對於他的地主家庭卻很有感情，甚至把反革命的地主岳父，窩藏起來，成為反動地主的“防空洞”。

第五、公開向黨伸手，逼迫林彪同志“讓賢”讓權，進行篡軍反黨的陰謀活動。

羅瑞卿在他的篡軍反黨活動中，首先把矛頭指向林彪同志。他把林彪同志當敵人看待，常常製造謠言，誣蔑和打擊林彪同志，並且採取種種陰謀手法逼迫林彪同志“讓賢”讓權。

一九六四年九月中旬，劉亞樓同志說過，羅瑞卿向他說：林總講，他身體不好，今後軍委的工作，軍隊方面的事情要羅獨立主持，要大膽處理問題，不需要向林總經常請示，也不要到處去請示。又說林彪同志還要羅瑞卿現在就多抽出時間去全國把全國的地形戰場都看一看，一旦發生戰爭都要靠羅瑞卿指揮了。這件事經過查對，完全是造謠，明顯地暴露了他篡軍反黨的野心。

一九六四年國慶日之後，第三屆人民代表大會準備召開之前，羅瑞卿迫不及待地要林彪同志交位“讓賢”。當時他跑到林彪同志處，在談幹部問題時，借題發揮，指桑罵槐地說：“病號嘛！就是養病，還管什麼事！病號，讓賢，不要幹擾！”他走出房門外在走廊裏還叫嚷說：“不要擋路”。

一九六五年一月第三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林彪同志被任命為第一副總理兼國防部長，一月十七、八號即人代會後，羅瑞卿到上海私下對劉亞樓同志說：“想不到這個人又東山再起了！”為了騙取林彪同志的信任，羅瑞卿對劉亞樓同志說：“這次我認定了，跟定了，今後彈打不飛，棒打不走，我羅瑞卿死了燒成骨灰都忠實于林彪同志”。並要劉亞樓同志把這些話報告給林彪同志。二月廿二日，羅瑞卿又到上海，和劉亞樓同志談了半天，第二天上午去見林彪同志，向林彪同志表示，今後他更相信林彪同志的領導，更擁護林彪同志的領導。說今後是跟定了。林彪同志指出：“要跟黨中央、毛主席”。並要他今後改正過去的一些想法，好好工作。林彪同志因羅瑞卿對劉亞樓同志談了許多不應該談的話，批評了他。羅瑞卿上午剛講了更相信更擁護林彪同志和跟定了林彪同志的話，下

午一到廣州就又大造林彪同志的謠言。

一九六五年二月十日、十五日，劉亞樓同志在羅瑞卿的指使下，向葉群同志講了四條意見，希望她勸林彪同志接受。這四條意見是：第一、一個人早晚要出政治舞臺的；第二、要好好保重林彪同志的身體，這一點就靠你了；第三、今後林總再不要多管軍訓的事情了；第四、交給羅去管，勸他多尊重羅，要相信羅，軍隊的事情放手讓羅去管。林彪同志當時嚴肅地批評了劉亞樓同志，還指出了一九六一年以來羅瑞卿的思想情況，惡劣影響及近來對他進行批評的經過。劉亞樓同志表示，他過去是受了羅瑞卿的騙，上了羅的當。關於這件事，劉亞樓同志的妻子霍雲英同志聽說過，楊成武、吳法憲同志也聽劉亞樓同志在臨死前說過。

一九六五年 X 月 X 日下午，羅瑞卿利用中央常委接見軍委 XX 會議人員的機會，給中央常委、特別是給林彪同志出難題，羅瑞卿事先沒有請示報告軍委常委，就佈置各小組選出代表和他一塊向中央常委提意見。他採取突然襲擊的辦法，帶頭提出要求大量增加部隊定額和合併軍委的意見。他發言以後就要求各軍區的同志發言，妄圖造成一種聲勢，逼著中央常委表示態度。羅瑞卿這一惡劣做法，當即受到林彪同志和中央其他常委的嚴厲批評。羅瑞卿合併軍區和大量增加部隊定額的主張，林彪同志多年來一直是不贊成的，並且向毛主席請示報告過，毛主席完全同意林彪同志的意見。這件事，羅是完全清楚的，羅瑞卿這裏耍了一個陰謀，他的如意算盤如果是中央常委同意了他的意見，他就在各軍區面前顯示他的功勞，又達到了打擊林彪同志的目的，如果中央常委不同意他的意見，他就可以挑動各軍區對黨中央和林彪同志的不滿。

羅瑞卿曾當著很多人說：“汪東興同志說，毛主席說四個第一中，人的因素第一這句話缺乏階級分析，人有好人、壞人，有這個階級的人，有那個階級的人。”

汪東興同志證明，毛主席根本沒講過這話。汪東興也沒有對羅講過這話。林彪同志所提出四個第一中人的因素第一是就人和武器的關係來說的，這正是毛主席一貫的軍事思想。毛主席對林彪同志提出的四個第一，幾年來曾多次稱讚。羅瑞卿還造謠說：羅榮桓同志臨死時想見一下林彪同志，但林彪同志託病不見。等到羅榮桓同志逝世以後，林彪同志又去向死人鞠躬，去送葬，這是補過。也是做給別人看的。羅榮桓的愛人林月琴同志和林彪同志的秘書都說明根本沒這麼回事，完全是捏造和誣蔑。

一九六五年五月 XX 日，即在 XX 會議期，林彪同志連續批評羅瑞卿之後，羅瑞卿還和梁必業私下密談，挑撥林彪同志和羅榮桓同志的關係，誣蔑和攻擊林彪同志。

羅瑞卿長期對林彪同志進行封鎖，受到林彪同志批評後，雖然表面上作一點假檢討，但實際上他不僅不改正錯誤，反而懷恨在心，變本加厲，對林彪同志進行攻擊，造謠誣蔑。他不但自己不報告、通氣、而且也不准別人報告通氣。誰若通氣，他就打擊排斥。有時他也搞一些假通氣，又常常假傳林彪同志的指示進行挑釁和誹謗。

羅瑞卿不但陰謀篡奪軍隊的大權，他還從中央到地方到處伸手。本來他是管軍事工作的，但是他越權越位，常常以個人名義，以命令口氣向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各中央局、大部分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批過大量檔，許多事情他不加調查研究，亂加批評指示和黑指揮，這種事例很多。

羅瑞卿為了實現他篡軍反黨的陰謀，還背著黨同一些和他氣味相投的人勾勾搭搭，吹吹拍拍。羅瑞卿和楊尚昆、楊獻珍、劉亞樓、肖向榮、梁必業的關係是極不正常的。

到會同志一致認為，羅瑞卿的錯誤不是一般性質的錯誤。他是用資產階級軍事路線來反對無產階級軍事路線，是用修正主義來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主席思想，反對林彪同志，反對黨中央，反對毛主席。他妄圖奪取兵權，達到篡軍反黨的罪惡目的。他是一個資產階級個人主義野心家、陰謀家、偽君子；他是打著紅旗反紅旗，是一顆埋在黨中央的“定時炸彈”。

這次小組會議，大家根據擺事實，講道理，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對羅瑞卿進行了耐心的教育和嚴肅的批判，竭力想把他挽救過來。但是，他不但毫無悔罪認錯之意，反而一再向黨進行欺騙，抗拒和威脅。他在三月十二日的檢討中，雖然也承認自己犯了一些錯誤，戴了幾頂空帽子，但是在根本問題上還是千方百計進行狡辯和抵賴，並且投下了許多“釘子”進行反撲和以後翻案。他的檢討引起到會同志的極大憤慨，當場受到許多批駁。之後，他又以來不及作好檢討為藉口，要求先散會，大家回去工作，待他準備好了之後再來開會，此計不成，三月十八日他竟以“跳樓自殺”向黨進行要脅，自絕於黨，自絕於人民，走上叛黨的道路。他在跳樓前寫的遺書是向黨進攻，向社會主義反撲的毒箭，在“遺書”中他連前幾天承認了的一點錯誤也全部推翻了。

會議認為，羅瑞卿的錯誤發展到這種嚴重地步，不是偶然的，是國內外階級鬥爭的反映，是有其深刻的階級、歷史和思想根源的，羅瑞卿出生於地主階級家庭，入黨三十多年來，他的剝削階級立場沒有得到改造，在民主革命時期……（脫落幾句），拒不改正錯誤，終於在近兩年惡性發作，來了個大暴露。羅瑞卿的世界觀，是資產階級極端個人主義的世界觀，為了追逐個人的名利地位，他不擇手段，作了各種壞事，直到公開向黨伸手。結果就全部剝落了自己的偽裝，暴露了自己的原形。

到會同志一致認為，黨中央、毛主席和軍委、林彪同志及時地覺察了羅瑞卿的篡軍反黨陰謀，斷然地採取處理這一問題的措施，是非常英明的。繼中央上海會議後，又召開了支持小組會議，徹底揭發和批判了羅瑞卿的錯誤，粉碎了他篡軍反黨陰謀，這是毛主席思想的偉大勝利，是黨的正確路線的偉大勝利。這又一次證明瞭我們的黨是偉大、光榮、正確的黨；證明瞭我們軍隊是黨的無比忠實可靠的武裝力量。幾年來在黨中央和毛主席和軍委、林彪同志的領導下，軍隊的工作成績是偉大的，對羅瑞卿的錯誤是有抵制的。出了一個反黨分子羅瑞卿，絲毫也無損于毛主席親手締造的我們人民解放軍的光輝。到會同志一致認為，在粉碎了羅瑞卿的篡軍反黨陰謀後，壞事將轉變為好事，我們黨的事業，我們的軍隊建設和國防建設，必將得到更大的發展，取得一個又一個的新的輝煌的勝利。

會議根據羅瑞卿的錯誤及其自絕於黨的事業，向黨中央提出如下建議：

- （一）撤銷羅瑞卿在軍事系統的各項職務；
- （二）撤銷羅瑞卿的國務院副總理職務；
- （三）撤銷羅瑞卿黨中央委員會書記處書記的職務；
- （四）對羅瑞卿的錯誤作出政治上和組織上的結論；
- （五）把中央工作小組的這一報告和小組會議上的幾個重要發言傳達到適當範圍，徹底肅清他在各方面的惡劣影響。

彭真在這次會議的過程中，在一系列重大政治問題上，對羅瑞卿的錯誤，採取了縮小、掩護、包庇、支持的態度，並且企圖給羅瑞卿等伺機翻案做好種種準備。彭真實際上是同羅瑞卿站在反對毛主席和反對黨中央、反對林彪同志的立場上。有關事實有葉劍英、肖華、楊成武、劉志堅四同志，另寫一信報毛主席和黨中央。

以上報告，是否有當，請指示。

中央工作組

一九六六年四月三十日

第三節 楊尚昆事件

1965年11月中央免去楊尚昆中辦主任的職務卻又很突然。11月5日，彭真通知楊尚昆：中央決定調他去廣東工作，任廣東省委書記處書記；汪東興任中辦主任。對此，楊尚昆後來回憶說：“我雖早有預感要被撤職，但來得這麼突然，確實茫茫然。”11月8日，楊尚昆向汪東興和當時在京的中辦副主任曾三、田家英、李質忠交代了工作。次日，楊尚昆寫信給毛澤東，說自己在中辦工作了20年，沒有把工作做好，辜負了毛主席和中央同志的期望，心情很沉重，也很慚愧，感謝毛主席和中央這次給他到實際工作中去鍛煉和改造的機會，今後一定盡自己的努力，全心全意地把黨分配的工作做好。在去廣州之前，如果毛主席有空，很希望見見主席，得到主席的批評、指示。第二天，毛澤東接見了楊尚昆。毛澤東說：“你辦公廳的工作做得不錯嘛！你有什麼錯誤？沒有錯誤。你下去工作一個時期鍛煉鍛煉好嘛。”毛澤東還給楊尚昆佈置了兩個調查研究的任務：一是，看中央和國務院有什麼不適合於當地情況的政策、措施，可以寫個報告，提點意見；二是，各條條下達了一些什麼東西，同中央和國務院相矛盾的幫助理順一下。毛澤東還對楊尚昆說，廣東那麼熱，你到那裏去幹什麼？現在既然已經決定了，你去兩年到三年，把這個任務完成。先在珠江流域，以後把你調到黃河流

域搞個兩三年，主要是瞭解黨政機關是不是按照中央精神結合本地實際來進行工作的，更主要的是條條下達的任務是不是互相打架。楊尚昆對毛澤東說，這個任務是一個很大的任務，可能完成不了，但會努力去做。從毛澤東處回來，田家英問楊尚昆和毛主席談了些什麼，楊尚昆如實告之，田家英聽後說糟糕。他對楊尚昆說，如果毛主席狠狠地罵你一頓就好了，就沒問題了。毛主席這樣敷衍你，問題就大了。那時，楊尚昆也已預感到要出事，但他萬萬沒有想到會很快在全國範圍內搞起“文化大革命”這麼一場政治風暴。所以，他對曾三說：“曾三同志呀，這一刀砍下來先砍到我，你們也要準備挨整就是了。”11月9日，楊尚昆去周總理處談話，對周總理說：“我在中央辦公廳20年，雖然工作沒有做好，但是沒有做過反黨的事情，也沒有做過有損中央威信的事情。你是最瞭解我的，將來有可能被開除黨籍，如果有一天真的開除我的黨籍，我也沒有辦法，但這是冤枉的，只要你瞭解我，我心裏就踏實了。”周總理要楊尚昆放心，說不會那樣，要他下去以後好好地工作，不要背什麼包袱。最後，周總理一直送楊尚昆走出西花廳，才依依惜別。但楊尚昆萬萬沒有想到，這是他最後一次同周總理會面。

12月10日晚，楊尚昆乘坐中央警衛局為他掛的一節公務車離京赴廣州。我和趙宇田作為楊尚昆身邊工作人員隨行。搭車去廣州的有中央調查部副部長劉志漢和周梅英、趙仲實，加上列車員王景仁、劉滿容共8人。當時，幾位中央政治局常委都到上海參加毛澤東在那裏召開的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楊尚昆離京時，到車站送行的只有中央組織部李楚離、喬明甫兩位副部長和警衛局副局長田疇。中辦的同志和其他好友由於楊尚昆事先打了招呼，不讓他們送行，所以當時的場面異常冷清。11日晚，火車到達長沙，由於前方列車發生事故，湖南省委書記李瑞山把楊尚昆等人接到省委蓉園招待所休息。12日，楊尚昆等人到韶山參觀

了毛澤東故居。當晚，正在瀏陽指導“四清”運動的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張平化趕回長沙和楊尚昆見了面。13日下午，楊尚昆等人到達廣州，暫住廣東省委小島招待所4號樓。楊尚昆到廣州三天以後，陶鑄從上海開完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回到廣州，從他那裏楊尚昆得知羅瑞卿出了問題。

楊尚昆後來回憶說：“毛澤東找我談話的那一天，正是上海《文匯報》發表姚文元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日子，文章實際上傳達了毛澤東準備發動一場‘文化大革命’的信號。也正是這一天，中央免去了我的中央辦公廳主任的職務。”“如此巧合！”對於被撤職的原因，楊尚昆說：“毛澤東認為我是教條主義者，又和彭德懷的關係密切，如果不撤掉我的中央辦公廳主任職務，我將成為他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絆腳石。所以，他首先拿我開刀。”

從廣州到太原

1965年12月楊尚昆到廣東後，沒有什麼工作可做。省委只是給他看一些檔，說先休息幾天，慢慢熟悉情況，並沒有進行分工，安排具體工作。楊尚昆按原來設想的到廣東後各縣都要跑一遍的計畫，於12月18日即從廣州出發，先後到了海口、瓊海、興隆、崖縣（三亞）、湛江、電白、陽江、新會、江門、佛山、中山、順德、寶安（深圳）等地，重點聽取各地“四清”運動的情況彙報。1966年1月17日，楊尚昆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參加省委會議，聽取區夢覺傳達中南局會議精神。1月26日，他還參加了王震召開的海南島發展橡膠問題的會議，在會上發言指出，要幫助少數民族發展經濟，適當發展橡膠，並對橡膠管理體制提出一些意見。春節後，楊尚昆身體日漸虛弱，病痛加重，經中央批准，於1月31日離開廣州到上海，住入華東醫院。3月8日，接中辦電話，中央同意衛生部的建議，楊尚昆休息三個月。4月18日，楊尚昆與廣東省委副秘書長馬甫

通電話，得知省委擬於 5 月 5 日召集地、縣委書記在從化學習毛澤東著作。他認為，這是一個好機會，不僅可以熟悉人，還可以從基層工作的同志那裏學到很多東西，當即決定提前回廣州。4 月 20 日，楊尚昆離開上海，經南昌，23 日到達井岡山，在那裏重讀了《井岡山的鬥爭》和《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兩篇毛澤東著作。27 日到達瑞金。5 月 5 日回到廣州，住小島招待所 10 號樓。隨後得陶鑄通知：“尚昆同志不必參加地、縣委書記會了。”19 日，陶鑄在中山紀念堂作“文化大革命”動員報告，也沒有通知楊尚昆到會。

5 月 22 日，陶鑄等人到小島招待所 10 號樓向楊尚昆口頭傳達 5 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精神和免去楊尚昆的廣東省委書記處書記、改任肇慶地委書記的決定。陶鑄等離開後，楊尚昆就把我和趙宇田叫去，如實傳達了中央對他的決定，並說他在中辦 20 年，工作沒有做好，還犯了錯誤，表示擁護中央的決定，接受中央的審查，問題總會弄清楚的。楊尚昆還說：“我想得通，做地委書記、縣委書記都可以，只是不當一把手。”還說：“現在我要下去工作，你們就回北京吧。回去以後，中辦會找你們揭發我的錯誤，你們認為我還有哪些錯誤，如實講，不要有顧慮。”在以後的一段時間裏，楊尚昆反復講，一切相信組織，相信中央。

從這時起楊尚昆的對外聯繫就被切斷了。同李伯釗和子女的電話也接不通了。馬甫倒是經常來看看楊尚昆，並要我和趙宇田照顧好楊尚昆的生活，叮囑我們不要同時外出，楊尚昆身邊要有人。

5 月 23 日，楊尚昆給鄧小平和周恩來打電話，要求調回北方工作，電話打了半天也沒打通。無法，只好把電話打給機要室，傳去了一段文字：“小平、總理並常委：昨日陶、趙與我談過，我擁護中央的決定。我懇請中央考慮，調換一個工作地區，無論東北、西北、華北的基層都可以。因廣東潮濕而酷熱，兩臂的

關節炎日益加劇，右手已抬不起來，治療也無效，20 天來每天中午發燒 37.4℃，食欲不振，體重還在下降，懇切要求，萬望考慮賜複。”

5 月 24 日，中央發出《關於陸定一同志和楊尚昆同志錯誤問題的說明》（中發[66]277 號文件）。關於楊尚昆的問題，文件說：“楊尚昆同志的主要錯誤如下：（一）他不顧中央多次關於禁止安裝竊聽器的決定，背著中央，私設竊聽器，私錄毛主席和常委同志的講話，盜竊黨的機密。（二）他把大量的機密的檔和檔案擅自提供給別人抄錄，嚴重地洩露黨的核心機密。（三）他同羅瑞卿等人的關係極不正常，積極參加了反黨活動。（四）他還有其他的嚴重錯誤。”

但楊尚昆的要求，還是得到鄧小平和周恩來的支援。5 月 28 日，陶鑄來到小島招待所 10 號樓告訴楊尚昆中央已決定讓他去山西，任臨汾地委書記處書記。5 月 30 日，由馬甫護送，楊尚昆乘火車經石家莊於 6 月 2 日到達太原，住太原飯店西樓。

在太原，楊尚昆感慨地說，人的一生有幾個 20 年？頂多四個吧，何況還不一定能活到 80 歲。第一個 20 年，糊裏糊塗過來了；第二個 20 年參加革命，變化很大；第三個 20 年，小心翼翼，不求名利，還是犯了錯誤；第四個 20 年，從頭開始，盡可能做點工作吧！楊尚昆在太原閑住了一個多月，多次要求早些下去工作，但都被婉言拒絕。後來實在無法，於 6 月 23 日安排了一次彙報來敷衍，由省農辦的同志介紹山西的農業情況。

7 月 3 日，楊尚昆上午去晉祠散步，忽傳來電話說省委領導要來談話，下午不要走開。中午 1 時許，我午睡正酣，突然被車聲驚醒，發現此時太原飯店院內已軍警林立，如臨大敵，楊尚昆不知去向。山西省委副秘書長歐陽景榮跑到我的屋裏，還有兩個不知什麼人，同我和趙宇田談話，說楊尚昆犯了錯誤，你們要和

他劃清界限等等。隨即把我們帶到一個地方，歐陽景榮走了，那兩個人留了下來，和我們形影不離，過了一夜，又一同登上火車，7月5日晨到達北京。第二天，我們就被安排到“學習班”參加運動揭批楊尚昆去了。後來才知道，7月3日那天，楊尚昆被轉移到另一個地方，從此開始了長達9年的“監護審查”。

1966年7月3日，楊尚昆開始被“監護審查”。起初，生活待遇尚可，配有服務員和廚師，只是失去了自由。12月25日，中央專案組派專機把他押回北京，從此，他開始被無休止地批鬥，受盡摧殘、折磨。就是在這樣的逆境中，楊尚昆還是堅信黨，充滿著樂觀主義精神。他認真研讀馬列和毛澤東著作，時刻關心國家大事。1967年楊尚昆在日記中記錄了他最困難的日子，也記下了一個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的風範。

“1月15日。茶葉、收音機都收走了。沒有收音機聽，起床後只好散步，因天不亮看不見東西。下午讀《人民日報》，周公宴會上歡迎卡博的致詞和卡博的講話。”

“1月26日。右手指麻木，寫東西不便。腰痛極了，坐臥不安。上、下午讀毛選。”

“2月4日。主席接見卡博、巴盧庫，身體甚健康。下午讀毛選。”

“2月9日。舊曆丁未年元旦。昨晚下了中雪，兆豐年!60周歲了!上、下午讀報、毛選，第一卷已完。”

“5月25日。以清茶一杯紀念聯合生日（楊尚昆歷來在每年的5月25日和他的次子楊紹明同時過生日，稱“聯合生日”——作者注）。小二你在做什麼?勇敢地奮鬥吧!努力做一個主席的好學生!”

“5月30日。上午外出與專案小組談話。頭疼不安，坐著讀書不方便，只好躺下讀毛選。”

“6月19日。今天是主席《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發表10周年，聽了全文廣播，《人民日報》全文發表。蚊子咬人，午夜2時才睡去。”

“7月8日。讀《論持久戰》，以紀念‘七·七’。未洗澡已兩星期，據說澡堂壞了，擦身換衣服。”

就這樣，楊尚昆經受了長達9年的“監護審查”，直到1975年2月9日被“解除監護”。

1978年11月23日，中央專案審查小組向楊尚昆宣佈了審查結論：“楊尚昆同志在中央辦公廳工作成績是主要的，曾受林彪、‘四人幫’的誣陷迫害。現已審查清楚，應恢復其黨的組織生活，補發在審查期間停發的工資。”但是，這個審查結論留了尾巴。兩天以後，11月25日，華國鋒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講話時說：“楊尚昆同志不顧毛主席的指示和批評，在私錄毛主席談話的問題上犯有錯誤。經過審查，過去把他定為陰謀反黨、裏通外國是不對的，應予平反。中央決定，恢復楊尚昆同志的黨組織生活，分配工作。”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對所謂“秘密錄音”問題再次進行審查，直到1980年10月中央才正式發文為原中央辦公廳和楊尚昆徹底平反。

“文化大革命”中，中央辦公廳的許多幹部也因楊尚昆的問題而受到株連。1966年5月《五一六通知》發出以後，中辦的一大批幹部一夜之間變成了“反黨罪人”，中辦的工作秩序被打亂。隨著運動的不斷升級，被誣為楊尚昆的“幫兇”、“爪牙”的人數越來越多，後來又有了一個新名字——“楊家死黨”。這些人整天挨批挨鬥。田家英更是在被宣佈為“反黨分子”的第二天含冤辭世。對

於這些情況，可以從 1966 年 7 月 22 日中辦給中央的報告中窺見一斑。報告指出：

“中央辦公廳為楊尚昆把持了 20 年，他一直幹著反對主席、反對中央的罪惡活動。已揭露的大量事實證明，不僅原辦公廳的領導核心爛掉了（楊和曾、田、龔三個副主任），而且下面幾個主要單位的絕大部分領導骨幹也爛掉了（如機要室、秘書室、辦公廳直屬各組、檔案局、檔案館、特會室等）。多年來，楊尚昆包庇壞人，招降納叛，培植了一批反黨幫兇和爪牙。到目前為止，辦公廳及所屬各單位已揪出反黨分子因受“竊聽”一案株連的，範圍之廣，人數之多，難以準確統計。不僅中央辦公廳的領導幹部和機要室的許多同志曾三、田家英、龔子榮、葉子龍、康一民、吳振英、何均、賴祖烈、裴桐、李欣、逢先知等 24 人。”還涉及中央和地方的同志如：如徐子榮、王諍、林海雲、李伍、黃赤波、任兆祥、王芳、呂展、郭向民、謝滋群、朱漢雄、蘇漢華、狄飛、丁兆甲等許多同志。

多年後，楊尚昆很少向人提及他被免去中辦主任後的這段不愉快的經歷。但對於那些因他而受牽連的同志，他並沒忘記，他說：“‘文化大革命’我是首當其衝，第一個被整就是了。十年中，很多同志受到我的株連，受盡摧殘、折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才得到平反，我要向他們表示歉意。幸喜，這些同志今天大多健在。”

“文化大革命”一開始，當時的中央辦公廳領導人派人在中央領導人的住地和中南海內各辦公室、會議室普遍搜查所謂竊聽設備，中央專案審查小組辦公室還將機要室進行錄音工作所使用的答錄機、受話器、電線等拍成照片，作為“秘密錄音”的“罪證”裝進了葉子龍、康一民、吳振英三人的檔案。但他們卻隱瞞了 1961 年毛澤東嚴厲批評錄音工作時，汪東興等五人和答錄機的四張照片。

查閱楊尚昆等人的歷史回憶，發現楊尚昆因安裝竊聽器竊取毛主席秘密隱私一事，被毛主席查辦批判，一點也不冤枉他。

1961年春4月，毛澤東乘坐專列到南下調查研究。毛澤東專列停在長沙車站，一名通信兵在月臺上見到毛澤東機要秘書張玉鳳，就模仿毛澤東口音開玩笑，而其所說正是毛澤東在車廂和張玉鳳說的話。毛澤東立即盤問該通信兵，得知是羅瑞卿佈置。而羅瑞卿則說是楊尚昆根據政治局會議決議要求他在車廂安裝竊聽器，以便政治局成員及時瞭解毛澤東的指示以便貫徹執行，羅瑞卿並出示了政治局的決議文件。

1961年4月26日晚，正在河北省保定市調查研究的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突然接到中辦副主任龔子榮的電話，要求楊尚昆務必於第二天下午趕回北京。當晚，楊尚昆在日記中寫道：“腦子中很亂，整夜未睡好。” 4月27日下午5時20分，楊尚昆回到北京。在永定門車站，他“當即向小平、彭真略談了一下情況”。回京後的第一件事就是向處於中央一線工作的最高領導人彙報，看來此事非同小可！此後幾天，楊尚昆又先後找到中央辦公廳機要室副主任、周恩來秘書康一民、毛澤東秘書、中共中央辦公廳機要室主任葉子龍等人多次談話。而這幾天來攪得楊尚昆吃睡不寧的，正是震動中央高層的所謂“竊聽器事件”（也稱“秘密錄音事件”）。從葉子龍回憶錄中獲知：1961年，毛澤東為在他的專列上安裝錄音線路的事發了一次大脾氣。毛澤東為何大發脾氣？根據毛澤東生前的一些警衛員、服務員的回憶文章，情況大致是這樣：1961年春，毛澤東乘坐專列到廣東、山東一帶調查研究。某日，毛澤東和一位服務員在專列辦公室談話。完後，服務員步出，恰遇另一專列工作人員。這位工作人員得意地告訴服務員，他知道剛才毛澤東與服務員的談話內容。服務員問他為何知道，那

位工作人員便展示了錄音裝置及設備。服務員轉身便向毛澤東作了彙報，毛澤東聞訊後，大發雷霆。“秘密錄音”的事情就這樣鬧大了。

從楊尚昆的日記的注釋和葉子龍的回憶錄中看，對毛澤東的錄音始於 1958 年 11 月。其目的，主要是為了更準確、更完全地保存黨中央會議和中央領導同志在會議上的講話的歷史文獻資料。令人不解的是，為什麼要在車廂安裝竊聽器？顯然是為了掌握毛主席的隱私。不知中央最終查實了多少次這樣的竊聽事件，多麼可怕！無怪乎文革開始，毛主席便首先開始開展了揭批“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陰謀反黨集團”運動。

楊尚昆聰明之處是，回到北京立即與小平、彭真、周恩來商討對策，將責任攬到自己身上，沒有追究到周恩來、鄧小平等人身上。這樣，文革中，周恩來也極力保護了楊尚昆，改革開放後，在鄧小平領導下官至國家主席。

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

(中發〔66〕277 號 1966 年 5 月 23 日)

(一) 停止彭真同志、陸定一同志、羅瑞卿同志的中央書記處書記的職務，停止楊尚昆同志的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的職務，以後提請中央全會追認和決定。

(二) 撤銷彭真同志的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和市長的職務；撤銷陸定一同志的中央宣傳部部長的職務。

(三) 調陶鑄同志擔任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並兼任中央宣傳部部長；調葉劍英同志擔任中央書記處書記，並兼任中央軍委秘書長。他們的中央書記處書記的職務，以後提請中央全會追認和決定。

(四) 李雪峰同志兼任北京市委第一書記。

(五) 上述決定，地方通知到縣委以上，軍隊通知到團級以上。

中共中央關於陸定一同志和楊尚昆同志錯誤問題的說明

(中發〔66〕278號 1966年5月24日)

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關於停止和撤銷彭真、陸定一、羅瑞卿和楊尚昆四同志職務問題的決定已經下達。會議決定，中央成立專案審查委員會，進一步審查彭、陸、羅、楊四同志的反黨活動和他們之間的不正常關係。彭真和羅瑞卿二同志錯誤問題的材料已經發給你們。在傳達這個決定時，關於陸定一和楊尚昆二同志錯誤的問題，可以先作如下說明：

(一) 關於陸定一同志的問題

陸定一同志的妻子嚴慰冰，是現行反革命分子，現已查明，嚴慰冰在一九六零年三月到一九六六年一月的六年期間，連續寫了幾十封反黨反革命的匿名信，其中百分之九十是集中攻擊和辱罵毛澤東同志最親密的戰友林彪同志和他的一家的。這些信中充滿了刻骨的反動階級仇恨。

大量的材料證明，陸定一同嚴慰冰的反革命案件是有密切牽連的。在嚴慰冰的臥室內書桌上放著一九六五年二月十五日寫的一封匿名信的四頁底稿和寄給葉群同志的信封，時間達一年零兩個月之久，陸定一不可能不知道。而且嚴慰冰寫反革命匿名信達六年之久，在寫的時候，陸定一幾乎全都在家。當陸定一被告知嚴慰冰犯了反革命罪行時，陸不僅不表示憤慨，還想誑說嚴患有神經偏執症為嚴開脫。陸定一在這個反革命案件中究竟扮演一個什麼角色，專案審查委員會將加以徹底查究。

這幾年來，陸定一——有機會就倡狂地反對毛澤東思想，把活學活用當代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頂峰毛澤東思想，罵成是“實用主義”、“庸俗化”、“簡單化”，這純粹是資產階級反動派的誣衊口吻。他還到處大反史達林，大反所謂“教條主義”，在許多問題上，同黨中央和毛主席唱對臺戲。陸定一大反黨中央和毛主席最放肆的時候，也就是嚴慰冰寫匿名信最多的時候。

反革命匿名信集中攻擊林彪同志，就是因為林彪同志把毛澤東思想紅旗舉得最高。他們第一封反革命匿名信，是在一九六零年初，即彭德懷反黨集團已被揭發批判的時候。一九六五年十二月黨中央揭發了羅瑞卿的反黨篡軍的陰謀不久，一封直接給林彪同志的及其惡毒的、令人憤慨的反革命匿名信就寄出了。

在文化革命的問題上，陸定一的立場和觀點是同彭真完全一致的。陸定一壟斷中央宣傳部的工作，打擊左派，包庇右派，替資本主義復辟製造輿論。

（二）關於楊尚昆同志的問題

楊尚昆同志的主要錯誤如下：

（1）他不顧中央多次關於禁止安設竊聽器的決定，背著中央，私設竊聽器，私錄毛主席和常委同志的講話，盜竊黨的機密。

（2）他把大量的機密的檔和檔案擅自提供給別人抄錄，嚴重地洩露黨的核心秘密。

（3）他同羅瑞卿等人的關係極不正常，積極參加了反黨活動。

（4）他還有其他的嚴重錯誤。

這個檔發到縣委和團級黨委。

第六章 橫掃一切牛鬼蛇神

第一節 《人民日報》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

《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

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

陳伯達授意撰寫並擬定標題。

一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正在占世界人口 1/4 的社會主義中國興起。

在短短的幾個月內，在黨中央和毛主席的戰鬥號召下，億萬工農兵群眾、廣大革命幹部和革命的知識份子，以毛澤東思想為武器，橫掃盤踞在思想文化陣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其勢如暴風驟雨，迅猛異常，打碎了多少年來剝削階級強加在他們身上的精神枷鎖，把所謂資產階級的“專家”、“學者”、“權威”、“祖師爺”打得落花流水，使他們威風掃地。

毛主席教導我們，在我國，在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階級鬥爭並沒有結束。“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階級鬥爭，是長時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無產階級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資產階級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在這一方面，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我國解放 16 年以來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在意識形態領域內的階級鬥爭，一直是十分激烈的。目前的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正是這個鬥爭的繼續發展。這場鬥爭是不可避免的。無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是根本對立的，是不能和平共處的。無產階級革命，是要消滅一切剝削階級、消滅一切剝

削制度的革命,是要逐步消滅工農之間、城鄉之間、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之間的差別的最徹底的革命,這不能不遇到剝削階級最頑強的反抗。

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政權問題。上層建築的各個領域,意識形態、宗教、藝術、法律、政權,最中心的是政權。有了政權,就有了一切。沒有政權,就喪失一切。因此,無產階級在奪取政權之後,無論有著怎樣千頭萬緒的事,都永遠不要忘記政權,不要忘記方向,不要失掉中心。忘記了政權,就是忘記了政治,忘記了馬克思主義的根本觀點。變成了經濟主義、無政府主義、空想主義,那就是糊塗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態領域內的階級鬥爭,歸根到底,就是爭奪領導權的鬥爭。剝削階級的槍桿子被繳械了,印把子被人民奪過來了,但是,他們腦袋裏的反動思想還存在著。我們推翻了他們的統治,沒收了他們的財產,並不等於沒收了他們腦袋裏的反動思想,剝削階級統治了勞動人民幾千年,他們壟斷了由勞動人民創造的文化,反過來用以欺騙、愚弄、麻醉勞動人民,鞏固他們的反動政權。幾千年來,他們的思想是統治的思想,在社會上不能不有廣泛的影響。他們的反動統治被推翻以後,他們是不死心的,總是企圖利用他們過去這類的影響,為資本主義在政治上、經濟上的復辟進行輿論準備。解放 16 年來思想文化戰線上的連續不斷地鬥爭,直到這次大大小小“三家村”反黨反社會主義黑線的被揭露,就是一場復辟和反復辟的鬥爭。

在資產階級革命時期,資產階級為了奪取政權,也是首先從意識形態上進行準備,搞資產階級的文化革命。資產階級革命是由一個剝削階級代替另一個剝削階級,尚且要經過多次反復,經過多少次的革命、復辟和反復辟的鬥爭。資產階級革命從思想準備到奪取政權,在歐洲的許多國家,都進行了幾百年之久。無產階級革命是徹底結束一切剝削制度的革命,更不能幻想剝削階級會乖乖地聽任無產階

級剝奪他們的一切特權，而不想恢復他們的統治。他們人還在，心不死，必然要象列寧所說的那樣，以十倍的瘋狂，來企圖恢復他們失去的天堂。赫魯雪夫修正主義集團在蘇聯篡黨，篡軍，篡政，這個事實，對全世界無產階級說來，是一個非常嚴重的教訓。目前中國那些資產階級代表人物，那些資產階級“學者權威”，他們所做的，就是資本主義復辟的夢。他們的政治統治被推翻了，但是他們還是要拼命維持所謂學術“權威”，製造復辟輿論，同我們爭奪群眾，爭奪年青一代和將來一代。

資產階級進行反封建的文化革命，到奪得政權的時候就結束了。無產階級的文化革命，是反對一切剝削階級意識形態的文化革命。這種文化革命的性質，同資產階級的文化革命是截然不同的。這種文化革命，只有在無產階級奪得政權以後，取得了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先決條件，才能為這種文化革命開闢最廣闊的道路。

無產階級文化革命，是要徹底破除幾千年來一切剝削階級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在廣大人民群眾中，創造和形成嶄新的無產階級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這是人類歷史上空前未有的移風易俗的偉大事業。對於封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一切遺產、風俗、習慣，都必須用無產階級的世界觀加以透徹的批判。在人民生活中清除舊社會的惡習，是需要時間的。但是，解放以來的經驗證明，如果充分發動了群眾，走群眾路線，使移風易俗成為真正廣大的群眾運動，那末，見效就可能快起來。

資產階級的文化革命，是為少數新剝削階級服務的，它只能由少數人參加，無產階級的文化革命，是為廣大勞動人民服務的，和最大多數勞動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所以，這能吸引和團結廣大勞動人民參加。資產階級啟蒙人物總是卑視群眾，把群眾當作愚民，把自己看成是人民的當然支配者。

無產階級思想革命家同他們根本相反，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目的是在喚起人民群眾的自覺，為最廣大的人民群眾的利益而奮鬥。

資產階級的卑鄙的自私自利，抑制不住自己對於人民群眾的仇恨心。馬克思說：“政治經濟學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質，會把人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惡劣的感情，代表私人利益的仇神，召喚到戰場上來反對它。”被推翻了的資產階級也還是這樣。

目前，我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規模和聲勢，在人類歷史上還不曾有過，它的威力之大，來勢之猛，在運動中所迸發出的勞動人民無限的智慧，遠遠超出了資產階級老爺們的想像。事實雄辯地證明，毛澤東思想一旦掌握了群眾，就成為威力無窮的精神原子彈。這一場文化大革命，正在大大推動中國人民社會主義事業的前進，也必將對世界的現在和未來，發生不可估量的深遠影響。

我國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引起了帝國主義、現代修正主義和各國反動派的驚慌和混亂。他們一會兒想入非非，說什麼我們的文化大革命，表明了中國下一代“和平演變”已經有了希望呀；他們一會兒又悲觀失望，說什麼一切消息表明，共產黨的統治還是十分鞏固呀；他們一會兒又表現出無限迷茫，說什麼要對中國所發生的事情隨時作出準確判斷的真正的“中國通”是永遠不可能有的呀。親愛的先生們，你們的胡思亂想總是同歷史的發展背道而馳的。人類歷史上空前的這一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開展和勝利，敲響了中國土地上殘存的資本主義勢力的喪鐘，也敲響了帝國主義、現代修正主義和一切反動派的喪鐘。你們的日子不會長久了。

讓我們在偉大的毛澤東思想的光輝照耀下，將無產階級文化革命進行到底。這一場文化革命的勝利，必將進一步鞏固我國無產階級專政，保證我們在各個戰

線上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保證我們將由社會主義勝利地過渡到偉大的共產主義！（《人民日報》1966年6月1日）

第二節 橫掃一切的“首都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

——“聯動”幕後的秘密

摘自互聯網 文革時期的聯動 發表於 2011-4-14 19:22

作者 沉默的麻雀

我們先從一份誓言看起：

“我們宣誓：誓死捍衛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徹底批判形形色色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堅決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保衛無產階級鐵打的江山永不變色！

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萬歲！

無產階級專政萬歲！

誓死保衛黨中央！

誓死保衛毛主席！

誓死保衛毛澤東思想！”

看看，夠革命吧，夠紅色吧！他們是文革中最早的一批紅衛兵，到過天安門，參加過破四舊，進行過大串聯，至於抄家打人更是家常便飯。他們鼓吹紅色恐怖，私設公堂，私設監獄，嚴刑拷打文化界名人甚至自己的同學老師，我們現在所瞭解的許多令人髮指的罪行其實大多出自於他們的瘋狂，他們的正式名稱叫“首都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講到這裏，相信不少人開始認為他們是文革的寵兒，是文革的依靠對象，甚至以為文革自始至終始終是他們在主導。錯！他們非但不

是什麼寵兒，更不是什麼依靠對象，他們是一股反文革的力量，從一開始就是文化大革命要清除的物件。

一、都是“對聯”惹的禍

“拿起紙筆做刀槍，集中火力掃黑幫”，文革初期，許多高幹子弟連誰是黑幫都搞不清楚就起來瞎折騰，就如同今天很多年青人連什麼是“牛棚”都搞不明白就妄加評論文革一樣。但時間會告訴人們一切。

1966年7月29日，北京航空學院附屬中學學生部的幹部子女，貼出一幅引人注目的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橫批：基本如此”。

我敢說，自中國有對聯史以來，沒有任何一幅對聯的影響力能與此聯相比。他不但將當時的社會搞得血雨腥風，甚至穿越歷史一直影響到我們今天，也許還會穿越時空影響未來。對於喜歡民主的朋友們來說，什麼時候能把這幅對聯的影響徹底消除掉，真正的民主才有可能到來。

二、一石激起千層浪

對聯一出現，就像滾燙的油鍋裏撒進了冷水，當即炸開了鍋，不同的人從不同角度站位對它發表不同解讀看法。於是，一場轟轟烈烈的大辯論圍繞對聯展開了。

1966年8月1日，創作對聯的北航附屬中學學生把對聯貼到北大、清華、人大等到北京主要高校，於是，以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為基礎的“血統論”對聯在北京迅速傳播開來。凡是對聯出現過的地方，無不發生激烈的辯論，這種辯論往往通宵達旦，有些人甚至累暈過去。但即使這樣，學生們的熱情絲毫不減，青春的燥動與傳統封建理念的浸潤促使著他們採取更加激烈的措施。8月6日，受對聯影響的北京學生在天橋劇場召開辯論大會，正式將對聯推向了社會。

現在讓我們來分析一下對聯：從因果關係來看，對聯雖是對子女高低貴賤出身的比較，但突出彰顯的是英雄子女。在當時，誰自詡為英雄？自然是共和國的功臣，昔日的老革命，今日的當權派。當時，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已經被打倒或即將被打倒。這些人的子女，眼看著世襲罔替的殊榮脫手而去，又不甘心像工農兵子弟一樣做個普通紅衛兵，於是十五、六歲的孩子們替他們境遇悲慘的老爹老媽喊出了壓抑已久的聲音：共和國應對功臣們封妻蔭子！這聲音如此強大，以至於社會上引起普遍共鳴，從中央到地方，從孩子到大人，牛棚裏的和牛棚外的，拿槍的、拿刀的、拿筆的、拿暗器的無不躍躍欲試，都想從這幅對聯中爭取到自己的未來。普通學生們管這幅對聯叫“鬼見愁”，確實是鬼見愁，因為對方的辯論根本不是嚴肅認真的討論問題，只是要你表明支持還是反對的態度，對反對者的處理也很簡單，一個字——打！

當年黃炎培曾在延安對毛主席談過中國歷史週期律的問題，他說：“大凡一黨一國乃至一家，其興也勃焉，其亡也乎焉。”意思是說要興旺就蓬勃而起，要滅亡也很快，一會兒的事，問主席中共如何能逃出這個週期律。毛主席當年說：“我們找到辦法了，就是讓群眾監督政府。”建國後，主席一直在孜孜不倦地實踐當年的諾言，無論是“三反五反”還是槍斃劉青山、張子善，主席一直在努力，直到最後找到文革這種模式。姑且不論文革的成敗，僅這種不懈的探索精神就足以讓毛澤東光照千秋！他老人家始終在為中國人民探索奮鬥，不像現在有些人，除了樂於探索女人的週期外，再也拿不出半點有價值的東西。

三、中央文革試圖將爭論納入正軌

由於文革的即定目標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但“鬼見愁”對聯宣揚的血統論無疑是幹擾了這一目標的繼續執行，它自然受到中央文革

的堅決反對。

1966年8月2日凌晨，中央文革的陳伯達接見了辯論雙方的代表，指出對聯“不全面”，“我們沒有必要再打已經倒在地上的死老虎”，“老子反動，只要兒子是革命的就要團結他”，他建議將對聯改為：“父母革命兒接班，父母反動兒背叛。橫批：理應如此。”

陳伯達講話不久，8月2日下午，北航附中學生組織了近千人到清華大學遊行，不停地高呼“鬼見愁”對聯，從而引起更大躁亂。他們還開始醞釀成立工農革幹子弟協會，後改稱“貧協”，清華、北大等校立即回應，以出身為標準將人群分成兩大派別。這就是我們後來熟悉的紅五類和黑五類，紅五類自來紅，黑五類自來黑，但請注意，兩者也並不是絕對對立，以後我們會提到。

陳伯達不管用，中央文革又請出兩尊更大的神。8月4日，江青在北大講話指出“我懷疑又有什麼人在叫你們上當了”，她要大家團結起來，把鬥爭目標鎖定期為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8月5日凌晨，周恩來在清華大學指出：“‘貧協’不是我們黨在學校的政策”。

8月6日，江青、康生在參加天橋劇場的辯論大會時，江青一再重複“父母革命兒接班，父母反動兒背叛，理應如此。”的新改對聯，結果卻催生出更多如下對聯：

父母革命兒接班——當然

父母反動兒背叛——很難

橫批：理應如此

老子槍桿打天下穩上穩

兒子皮帶保江山牢上牢

橫批：專政到底

老子闖江山革命革命再革命

兒子定乾坤造反造反再造反。

橫批：代代相傳

老子革命打江山

兒子造反為江山

橫批：代代紅

老前輩降群魔大殺大砍

後來人伏妖崽猛鎮猛斬。

橫批：誰敢翻天？

四、八旗子弟很瘋狂

溫和的勸導壓制不住極端的熱情，經過天橋劇場大辯論後，對聯思想在社會上氾濫成災，很多紅衛兵組織甚至將對聯思想做為一種指導思想。在這種大背景下，將老爹的舊軍裝與紅衛兵的紅袖章配在一起招搖過市蔚然成風，這不僅是一種服飾特徵，更是一種能彰顯紅色貴族高貴血統的標誌。這些稚氣未退的娃娃們穿著並不合體的大人衣服，腰束寬皮帶，腳登大皮靴，高挽袖口，滿嘴的“老子、小子、狗崽子、混蛋”等汙言穢語，一時間，竟成為青年們竞相模仿的偶像。

可紅色貴族並不好當，他們選擇成員的唯一標準就是“純”。什麼意思？當時中國行政級別共有 24 級，父母行政級別在 13 級以下的統統不要。他們認為，唯有如此顯赫的出身才能做到“自來紅”。與此相對應的是，在他們組織內部也

是按各自老爹的官職大小來安排職務，他們成了一群名符其實的“八旗子弟”。如此森嚴的等級不僅把大批工農子弟排除在外，甚至連一般基層幹部的子女都高攀不上。

一方面是高不可攀的准入門檻，另一方面是社會青年的盲目崇拜，再加上青年人特有的衝動與幼稚，於是悲劇發生了：一個 14 歲小女孩要求參加紅衛兵，結果紅五類們不要她，理由是以她的出身必定“革命不夠堅決。”小女孩聽後一言不發，抄起刀走進關押老師的“牛棚”，連續數刀將老師捅死，然後趾高氣揚地對紅五類們說：“我革命怎麼不堅決？現在該讓我參加紅衛兵了吧！”

我覺得這裏有必要解釋一下“牛棚”以正視聽。文革時所謂的“牛棚”並不是牛住的棚子，而是單位裏關押走資派的地方，它有可能是一座倉庫，一個教室，也有可能就是一間普通的辦公室。因為在陳伯達主筆的《人民日報》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中將走資派稱為“牛鬼蛇神”，所以群眾將關押走資派的地方稱為“牛棚”，它實際上是群眾專政的產物。被關押者並不是被判刑，而是根據所犯錯誤大小採取不同的強制措施。交待完問題，有的幾天就可回家。有的可天天回家，但要定期來交待問題，就像上班一樣。一般不許搞打罵，還有必要的生活費。周恩來總理更是在文革後期一再警告各單位嚴禁搞逼供信，同時允許被專政者有上訴控告權利。但文革初期持血統論的八旗子弟們可不管這套，他們自認為天生就是專政者，對“階級敵人”的仇恨是自娘胎裏帶出來的，老爹被整又將他們的仇恨更加猛烈地灼燒起來。於是，我們看到 60 年代法西斯主義在中國的復活：

他們將幾間教室打通，將抓來的俘虜關進去，用活人來練習摔跤、格鬥、擒拿、拳擊等，美其名曰集訓。這就是他們私設的監獄。再看看他們的公堂：像縣

太爺一樣高高坐在老師的講臺上，將昔日的同學老師挨個拷打。手段包括：跪玻璃、油漆洗臉、開水洗澡、上吊練習……手段之殘忍直追日本的 731 部隊，真是駭人聽聞。

五、一個並不可笑的笑話

小時候看過一部香港古裝戲，是描述清軍攻克揚州的。當大批清軍蜂擁著攻入城門時，旁邊一個孩子忽然提出一個令人捧腹不已的問題：“他們（守城者）為什麼不在城門口架幾挺機關槍？”

有些人，總以為自己比前人聰明，好像只要通過時空隧道把他們送入古代他們就一定能功成名就一樣。對於三十年前的文革，他們也是帶著這種有色眼鏡看的。一提起佩戴毛主席像章，他們就同愚昧、無知、高壓、個人崇拜聯繫起來。仿佛毛澤東是個封建暴君，“毛主席萬歲”等同於“皇帝萬歲”一樣。其實，透過歷史的迷霧，我們能清楚地看到，無論是崇拜者還是被崇拜者，雙方都清醒得很，誰的頭腦都沒有發昏。

早在文革初期，毛主席就對林彪的過分吹捧不滿，多次提出批評意見。但林彪出於不可告人的目的，非但沒有住手，反倒把個人崇拜這股風越刮越猛。對於人們普遍佩戴主席像章問題，毛主席不止一次提出這是“討嫌”的，甚至對於後期鋁制像章過多的現象發出“還我飛機”的呼籲。他的頭腦哪裡有一點發熱跡象！

對於佩戴像章的人，他們的頭腦更沒發熱，因為他們清楚地知道，這不僅僅是一種飾物，更是表明信仰的標誌，佩戴像章就擁有了對毛澤東思想的解釋權。所以，佩戴像章不是一種義務，而是一種權利。這才是當時主席像風行天下，人們都趨之若鶩的真正原因。

紅五類們對佩戴毛主席像章擁有得天獨厚的優勢，他們既然能夠最先在第一時間從老爹老媽及掌握大權的叔叔阿姨那裏獲得大批像章，自然也就有了特殊的“資源。”更讓人意想不到的，他們竟然用這種資源去行賄。別以這是危言聳聽，真有人憑藉這些東西疏通各處關節，甚至混入黨內。他們還高喊著“自來紅萬歲”的口號，大肆剝奪對立面的毛主席像章和紅寶書。這在當時，是一種嚴厲的打擊和折磨，比殺了對方還難受。普通紅衛兵多次被剝奪後，我們看到了今天常提起來的笑話：他們將毛主席像別在胸口的肉上，稱之為“一針（真）見血”。有的還哽咽著說：“毛主席，這下他們再不會搶走你了。”

這個笑話讓我怎麼也笑不起來。

與此相對應的是，許多出身“黑五類”的學生明明被罵為“混蛋、狗崽子”卻並沒有失去而是想方設法獲得像章的佩戴權。即使被紅五類們剛剛暴打後，他們仍然腆著臉去和人家套近乎。仗著心狠手辣，在討得紅五類的歡心後，他們都夾在紅衛兵中間作為專政非紅五類出身的人的打手。當年，北京第二醫學院曾有人貼出過一張題為《飛出一隻白烏鴉》的大字報，對這類不倫不類的紅衛兵進行了絕妙的諷刺。

六、出了個領軍人物

“馬克思主義的勝利，迫使他的敵人也不得不把自己打扮成馬克思主義者來從事各種破壞活動。”-----恩格斯

20世紀六、七十年代，面對舉國一片“萬歲”聲，右派先生們絕望了，他們認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其實這又高估毛澤東的能力了，他的敵人依然存在，只不過戴著紅帽子罷了。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做為馬列主義新階段的毛澤東思想在也未能擺脫這一歷史宿命。這不，一個自稱“只承認毛澤東思想”的人

出現了。

天橋劇場的一場大辯論，帶來了“血統論”在社會上的大傳播，引起一個小人物的強烈共鳴。相似的出身，共同的遭遇，無論是出於封妻蔭子的潛意識，還是即將由紅變黑的殘酷現實，他和同類們都不得不拼死一搏。請記住這個名字，當時全國有很多人被他的講話迷了心竅，紛紛改成他的名字，以至於開放改革後他不得不改頭換面，用另一個名字馳騁政壇。他就是當時北京工業大學三系三年級學生譚力夫。

1966年8月12日，譚力夫與別人聯名貼出了“從對聯談起……”的大字報，提出要把對聯當做“全面的、策略的黨的階級路線來推行，把他提煉為政策，上升為條條本本。”大字報一貼出，如同今天網上突然出現一個酷貼，立即有人響應。當日，北京各高校紛紛出現了隻字不差的大字報，傳播的速度是相當地快，新一輪大辯論又開始了。是日，僅到北京大學觀看大字報的人就達17.9萬人。當然他們也借了一股東風，那就是毛主席“八·一八”大規模接見紅衛兵的活動，在把紅衛兵運動推向全國的同時，對聯的思潮也迅速氾濫起來。

中央文革感覺到勢頭不對，他們組織力量到各高校張貼《江青在天橋劇場對紅衛兵的講話》，希望把勢頭壓下去。但剛剛在破四舊中取得輝煌戰果的紅五類們此時已不把任何人放在眼裏，北工大連續兩天發生了強撕江青大字報事件，並引致了校園內宣傳“血統論”的又一次高潮。8月20日，能言善辯的譚力夫在全校集會上口若懸河，一氣呵成了聞名全國的講話。這篇講話在大力宣揚“血統論”的同時，尖銳指出“批鬥各級幹部是難以容忍的事情。”

譚力夫的講話一出籠，不但很快風靡北京，同時被長途電話和航空信件傳遞到全國各地。這並不莊嚴的宣告，這並不雄偉的聲音，通過各種現代化工具，一

樣傳遍白山黑水，黃河長江。各省市負責人都認為講話好得很，應大力宣揚。個別省份在省委指使下，很快複製了幾十萬份“講話”，以新華書店等主管道迅速發行到機關工廠學校村莊。有些單位還規定每天學習討論四個半小時“講話”。但他們對同時期下發的、中央一再要求嚴格執行的“十六條”卻絲毫不感興趣。他們大力推廣譚力夫講話的直接效果是：譚力夫在群眾中獲得巨大聲望，僅在福州師範學院附屬中學就有 5 人更名為“力夫”。這還不算，在當時全國各大城市，先後刮起了一股“報出身”風。比方說加入紅衛兵組織要先報出身，你要上公共汽車，售票員就會讓你報一下出身：紅五類，您上座；黑五類，站著，有座也不許坐。

在特定的瞬間，歷史往往是由小人物創造的。如同今天有人將講《論語》的於丹視為“文化奶媽”一樣，當時的走資派也是將譚力夫視為救世主的。他們渴望“血統論”救他們一命，當然會不遺餘力地利用手中的權力幫他一把，他們明白：幫這個小人物也就是幫自己。

七、元帥的憤怒

一天，一封四川省紅衛兵串連接待站的公函寄到了一位共和國元帥家中。公函上端寫著一行“最高指示”：“要節約鬧革命。”正文中這般寫道：“陳毅同志，今有您的兒子陳小虎，某月某日在我處借款人民幣二百元整，望儘快歸還。”信的末尾，蓋有一枚大紅的紅衛兵接待站公章。

展讀此信，陳毅勃然大怒：“啥子陳小虎？我家根本沒有陳小虎嘛！二百元？二分錢我也不給他！”陳毅元帥有四個孩子。老大陳昊蘇，老二陳丹維，老三陳曉魯，老四陳姍姍。

被訛傳為“陳小虎”的陳曉魯的確是他的寶貝兒子，當時是北京市八中高中

學生。只是被文化大革命搞得焦頭爛額的元帥此時根本想像不到他家老三在社會上有多大能量。為了顯示紅色貴族的與眾不同，在譚力夫講話的影響下，他們相繼成立了西糾、東糾、海糾等組織。後來的“聯動”就是以這三個組織為核心組織起來的，筆者很想把這些組織的創始人一一列出，可惜慚愧得很，費了很大勁只能找到西糾的一些材料，除了那個陳曉魯外，還有個孔丹，原國務院外事辦主任。

首都紅衛兵糾察隊西城分隊（簡稱西糾）成立於 1966 年 8 月 25 日，他的成立和活動，受到陶鑄、王任重、廖承志等許多老革命的支持，就連周恩來都曾派國務院秘書長周榮鑫、副秘書長雍文濤、許明指導他們的活動。“西糾”成立後，陸續發佈了 13 道通令，內容龐雜，涉及中央黨政機關、革命幹部、國家機密、首都秩序、以至對資產階級政策和外賓接待政策等許多方面，但核心只有一條——保護老爹。8 月 27 日，“西糾”發出第三號通令規定：“任何和個人都無權隨便宣佈戒嚴，絕對不允許以任何理由攔截軍車，尤其不允許攔截和檢查首長的汽車！”“絕對不允許任何人擅自查抄國家機關、查抄國家負責幹部的家！我們要保衛國家機密！保衛革命老首長的安全！”

八、揭發的真相

回首文革，我們會發現許多難以理解的事情，比如說兒女揭發父母，這一奇怪現象常被改革者用來論證文革對人性的扭曲。在這方面，他們似乎很同意孔夫子的觀點：“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

筆者最近聽到一個當年在批鬥會上主動揭發母親的人坦露心聲：“那都是我媽讓我幹的，我們是黑五類，不這樣能把自己洗乾淨嗎？講幾句話，我參軍、找工作、以至將來提幹就不會受影響了。”

原來是苦肉計！這怎麼會是文革對人性的扭曲，翻開史書看看，類似的辦法數不勝數。這不但不是反封建的文革對人性的扭曲，恰恰相反，是它的敵人——封建主義遺毒在作怪。

那個全國最大走資派對這一手玩的更是得心應手。在工作組受到主席的批評後，原來強烈支援工作組的女兒不但迅速改變立場，還有聲有色地揭發起老爹來（見清華大學《井岡山》報第八期，1967年1月7日《劉濤寫給劉少奇的大字報》），大義滅親的立場得到大多數人的欣賞，她不但未受到清算，反倒成了學生領袖，組織起一夥人來反攻倒算。

1966年8月24日，就是西糾正式成立的前一天，劉濤（劉少奇女）、賀鵬飛（賀龍子）同清華附中一些人制訂行動計畫，趕制了西糾專用符號，組織北京12個學校保皇軍企圖武裝佔領清華園。真不愧是將門虎子，他們的行動還是像模像樣的：先在清華附中操場集結隊伍，賀鵬飛作戰前動員，指責對劉少奇的批判是“把矛頭指向黨中央和毛主席”。同時派人佔領校廣播台，控制了宣傳機構。下午4:00，這兩位當然的領袖帶領12校聯軍沖進清華園，立刻包圍了大字報區，先是宣讀最後通牒，然後毆打看大字報的群眾，不但撕去揭批劉、鄧、薄等的人大字報，還特別認真地用相機拍下了大字報的作者，準備進行秋後算帳。最後，他們搗毀了以批判劉鄧為己任的“第一紅岩”戰鬥組的家，並在校園遊行一周示蕪。

據悉，劉濤事後向王任重打電話彙報了情況，王任重表示：“‘八.二四’沒什麼問題。”

九、令人費解的死因

老舍之死的確是中國文學史上的悲劇。——本著對歷史認真負責的態度，應

該先把直接責任人揪出來示眾，然後深挖幕後黑手，甯管涉及到什麼人，該殺的殺，該關的關，該批判的批判，總要給死者一個公道，給人民一個交代。這樣做很難嗎？——毛澤東不在了，可當時老舍挨打的見證人都在；文革已遭到官方的徹底否定，開放了、自由了、可以暢所欲言了；紅衛兵已退出歷史舞臺，再也不用怕什麼皮帶鐵拳了。這種時候，正是為死者申冤的最佳時機，怎麼知情人都緘口不言，好像在怕得罪什麼人呢？

“老舍（一八九九年至一九六六年）現、當代作家。原名舒慶春，字舍予，另有筆名絮青，鴻來、非我等。滿族，北京人。出生於一個貧民家庭。”這是達成共識的老舍簡歷，看看，人家老舍可是根紅苗正，正宗的無產階級出身。他不但跟文革的鬥爭物件——走資派沾不上什麼邊，甚至連黑五類都算不上。60年代初，毛主席在同老舍的一次談話中特別提到清朝的幾個有作為皇帝，對清朝的歷史貢獻給予肯定。這在當時相當於一次政治摘帽。因為自辛亥革命以來人們對清王朝的印象就是腐敗透頂、喪權辱國，這使得相當多的滿族人抬不起頭來，他們不敢承認自己是滿族人，這中間當然也包括老舍。他在1950年前是不敢承認是滿族人的，但有了這次談話後，他不但勇敢承認，還根據自己的生活經歷創造了《正紅旗下》這部優秀作品。能夠得到領袖的如此垂青，這在當時絕對是一個口含天憲的人物，一般人誰敢到太歲頭上動土呢？令人費解！

老舍是個文人不假，可並不是所有文人都反文革。文化革命前老舍正在北京郊區體驗生活，文革開始後他任文聯的革委會主任，對文革他是以一種積極心態參加的，其思想的進步程度絕不在郭沫若之下，怎麼老郭沒事他卻一命嗚呼呢？令人費解！

在老舍出事前的1966年8月23日，他“像往常一樣，從容自若地坐在會議

室沙發上。他懷著滿腔熱情參加運動來了，懷著對黨的信賴來了。他對同志們說：‘我昨天剛剛出院，身體不成嘍，老愛鬧病。康生同志捎話讓我來參加運動，感受一下這次政治鬥爭的氣氛，所以我就來了。’ ” 這是目前流行的老舍投湖前發言，如果僅憑這點點回憶就認定是中央文革指使紅衛兵幹的，那就太小兒科了。人家老康打年青時起就搞中央特科，如果整人就這水準，那他早就甬混了。現在有些死因揭密總是含沙射影地把矛頭指向中央文革支持的紅衛兵，動機何在？令人費解！

在特殊時期，有些人對死人總比對活人的興趣大，因為一個死人是會說出真相的，所以我們只能採取排除法窺視一點真相。可以斷言，中央文革不會幹這類傻事。當時劉、鄧都沒正式倒臺呢，光走資派就鬥不過來，哪有功夫捅這婁子。除了這股勢力外，敢對老舍動手、能對老舍動手的就只有那些持血統論的紅色貴族們。據批鬥老舍的主力軍——北京女八中部分紅衛兵回憶，他們當時是在學校文革領導小組的帶領下沖進文聯的。請注意這個“校文革領導小組”，在 1966 年“八·一八”前後，這些公開組織基本被紅色貴族控制，否則劉濤、賀鵬飛也不可能短時間組織起 12 校聯軍。再有，從老舍後來在國子監挨打的慘烈程度看，手段與西糾極像。更重要的是，這批人文革後大都黃袍加身，掌管著各個要害部門，其威力足以讓任何人三緘其口。

十、“紅八月”大事記

流水帳：

1、1966 年 8 月 1 日，毛澤東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指責劉少奇派出的工作組幹盡了壞事，隨後致信清華附中紅衛兵表示支持；

當晚，“鬼見愁”對聯貼到北京各大高校。（反毛反文革）。

2、8月2日，八屆十一中全會繼續討論工作組問題，部分中央領導做檢討；

同時，對聯在北京引發大辯論，陳伯達改聯滅火。

3、8月3日，八屆十一中全會分組討論“十六條”，部分中央領導到北京建
工學院做學生工作。

4、8月4日，劉少奇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做檢討，毛澤東指出：“牛鬼蛇神，
在座的就有！”

江青反對成立“貧協”。

5、8月5日，毛澤東發表《我的一張大字報》：“炮打司令部”；

周恩來在清華大學指責“貧協”不是“我們黨在學校的政策。”

6、8月6日，天橋劇場辯論，江青、康生勸止不住持“血統論”的學生；林
彪回京出席八屆十一中全會，陳雲致信毛澤東並中央，表示“完全擁護毛主席和
中央採取的方針。”

7、8月8日，新華社播發“十六條”；

血統論在社會上大傳播，高校陸續成立學生組織。

8、8月9日，八屆十一中全會繼續揭發批判劉少奇、鄧小平；

賀鵬飛、劉濤等人成立清華大學“八九派”串連會，只批“黑幫”，不批工
作組。(反毛反文革)。

9、8月12日，劉少奇職務不再被提起，葉群組織人員整理劉少奇材料；

社會上，譚力夫主張將“血統論”作為黨的階級路線來推行，引發更大辯
論。(反毛反文革)

10、8月18日，毛澤東大規模接見紅衛兵；

王震等老幹部遭受批判，社會上打砸搶日漸增多(“西糾”有意製造混亂,破壞

文革)。

11、8月19日，新華社播發18日接見紅衛兵時，天安門城樓上領導人的排名順序，引起震動。

紅衛兵開始大規模抄家，毆打“有問題”的人員(“西糾”有意製造混亂，破壞文革)。

12、8月20日，譚力夫發表演講，認為批鬥各級幹部是難以容忍的事；同時北京30萬紅衛兵上街破四舊毀文物古跡(“西糾”有意製造混亂，破壞文革)。

13、8月23日，紅衛兵運動進入狂熱化程度，達到最高潮。

毛澤東及時提出“要文鬥，不要武鬥。”

14、8月24日，“西、東、海糾”成立，老舍投太平湖自盡。

15、8月28日，中央正組織紅衛兵大串聯，紅衛兵運動遍及全國。

16、8月31日，毛澤東第二次接見50萬紅衛兵，林彪提出“四個偉大”。

分析：中央存在兩種聲音，社會上存在兩股勢力。毛澤東憑藉高超的政治才幹把中央的反對派壓了下去，但社會上的反抗勢力卻日趨壯大起來。

十一、探討文革的派性問題

一問起文革中派別，有些人總會不假思索地脫口而出“造反派、保皇派”。每次聽到這樣的回答，心裏總會生出一種疑問：他們當初真這麼叫嗎？要知道，自稱“造反派”倒也罷了，因為畢竟有“造反有理”的理論支撐，可“保皇”一詞明明是帶有貶義的，就是在法國大革命中也不例外，這代表的是封建、落後，誰會用這樣的詞來標榜自己呢？

還有一些人一提起這兩派就聯想到紅衛兵，聯想到造反派的破四舊、毀文物、批鬥老幹部，可就是不肯想一想保皇派是什麼樣子的，他們當時是怎樣保皇

的？

事實上，造反派和保皇派絕不是紅衛兵的專有名詞，這兩頂帽子自始至終出現在文革史上，開始是學生們戴，後來是普通幹部群眾戴。他們的正式名稱是：一派自稱革命造反派，另一派自稱革命促進派。保皇派在名稱問題上有點像金庸小說中的明教，一聽有人管他們叫魔教就抄傢伙動手，因為對當時爭鬥的雙方來說，“保皇”是一個污辱性的稱謂。

之所以會出現保皇派，是因為文革前的官員們大多貪欲還不太重，老百姓出於傳統的慣性，還對他們保持著相當的尊敬。“革命無罪，造反有理”這個口號，實際上當時真正支持的並不多，因為中國人除非被逼得走投無路，一般不願意造反。“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每個人被迫著發出最後的吼聲。”這即是殘酷的現實，更是中國人處世哲學的寫照。這是個勤勞善良的民族，更是一個多災多難的民族，國歌中的這一句，其實寫出了國民的阿Q精神，難道不應對其發出含淚的鞭笞嗎？從這個意義上講，“造反有理”不但是在改造中國的國民性，更是埋下了一粒民主的種子。

文革初起，大批造反組織應運而生，其實這些毫無政治經驗的年輕娃娃哪鬥得過那些久經戰陣的老油條。他們一方面丟下手頭工作，指責紅衛兵們破壞生產，即“用生產壓革命、狂刮經濟主義妖風”，另一方面他們也組織自己的紅衛兵，即“拉一派打一派、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對立的雙方都戴紅衛兵標誌，都自稱造反派，指責對方是保皇派。比較典型的是江蘇的紅衛兵，他們被老百姓戲稱為“好派”和“屁派”，原因是在造省委的反時，一派表態說：“好得很！”，另一派說：“好個屁！”

保皇派由於有官方背景，自然勢力大些。文革從開始到結束，很多省份

其實一直是保皇派在把持，只有上海是造反派完全奪取了政權。

十四、秘密成立“聯動”

據小說家言，清朝乾隆皇帝繼位之初，有幾個王室成員不服氣，想把他搞下臺或者架空，於是他們精心謀劃了一場政變：先聯絡一些平日合得來的宗室子弟，憑著這些人天大的“面子”先向兵部借兵器，然後佔領大內，繼而控制京城九門，最後掌控全國……

每當我讀到這裏，總禁不住啞然失笑：這些只會提籠架鳥的公子哥搞這殺頭的玩意也這麼浪漫！不過話說回來了，在現實生活中，有面子確實很重要。比方說讓我花錢聯繫個小劇場搞個演出什麼的或許能搞定，可要搞到中南海政治局禮堂簡直是天方夜譚，非得有天大“面子”不可。

1966年10月1日，手眼通天的老紅衛兵們在中南海政治局禮堂正式成立“聯動”組織，這個組織當時並不叫“首都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它戴的是一頂更大的帽：中共中央、國務院、人大常委，人民解放軍各軍兵種、中央軍委、國防部革命幹部子弟聯合行動委員會。

他實際上是以“東、西、海糾”為核心，聯合北京各高校幹部子弟組織的一個聯合體，其核心任務是“保爹”，路線是中央和各省市幹部子弟大聯合。有了譚力夫講話的理論支持，有了各級幹部挨整挨批鬥的政治需求，還真別說，幾個毛娃娃過家家似的組織居然在全國有了大批支持者。

需要澄清的是，“聯動”成員實際上是以中學生為主，如譚力夫等大學生在裏面更多地是起到理論指導作用。不過，青春期燥動的少年更可怕，我們敘述過的北京六中就是一例。青春期萌動是生理現象，但讓青春萌動到犯罪狀態卻是社會現象。是什麼社會現象造成的呢？相信不少人想脫口而出是文革，我不同意這

種說法。事實上，文革只是提供了一個社會機會，也並不是所有處於青春期的的人在文革中都瘋狂，真相被掩蓋在迷霧中。在弄清真相前，先講一個小故事：

出生於 70 年代的人不知是否還記得小學課本裏有一篇題為《秘密學習》的文章，講的是幾個小學生在日偽不斷掃蕩的戰爭環境中堅持學習的事，敵人來了將課本埋起來，敵人走後在露天教室裏堅持上課。這是一個真實的學校，當時叫“榮臻小學”，原本是收留戰爭中烈士子弟的，後來進城後改為“八一學校”，六十年代，這裏成了一所著名的幹部子弟學校。各級幹部對自己孩子的愛是不言而喻的，他們不惜血本對這裏進行投入：統一的校服，漂亮的教學樓，校園內到處綠樹成蔭，鮮花遍地，的確是個讀書的好地方。可教育方針卻只限於教學生們溫文爾雅，追求名利。（投入就是蓋校舍，這路子好像有點熟）這樣做的結果是，一個小學生在描述未來理想時寫到：“職務：坦克兵元帥，工資：每月 700（當時超高）”

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的兒子打地洞。”長大後的八旗子弟們就是懷著這樣的理念沖向社會的，當他們優越感忽然被剝奪後，犯罪就成為順理成章的事。“養不教，父之過；徒不嚴，師之惰。”連私塾先生們都懂的道理卻有人裝做不懂。

十五、逮捕譚力夫

“聯動”成立後，更加瘋狂地抄家打人製造混亂，甚至有人晝伏夜出殺害對立面的人，引起了社會治安的嚴重動盪。本來抄家這一行徑是有嚴格組織程式的，一般說只抄書籍日記等文字性東西，而且還要打借條。這是基於“四清”運動中從地主家抄出“子孫萬代要報仇”等反動詩而採取的一種強制檢查措施。後來檢查擴展到“四舊”等生活實物，抄家者也還算守規矩，文革結束後有人從堆積如山的倉庫中揀出自家物品就是實例。可這些好的做法到了“聯動”這裏就統

統廢除了，他們不但把抄家當成赤裸裸的搶劫，還中飽私囊，盡一切可能搜集自己需要的東西。他們在向“黑五類”們勒索錢財的同時，發現這些人家裏有一些他們感興趣的書籍，不由分說拿了回去，可他們當時沒有時間看——都忙著奪權呢！

“聯動”的異常活動引起中央高層的密切關注，此時文革已全面展開的，運動的重點也已明確，幾個小屁孩“保爹”的舉動自然難逃他們法眼。擒賊先擒王，他們不約而同地將注意力集中到血統論驍將譚力夫身上。1966年10月9日，周恩來否定了譚力夫提出的“黑七類”的說法，說“譚力夫講話是典型的形‘左’實右得很”。10月16日，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發表長篇講話，對譚力夫的觀點大加撻伐。10月24日，毛主席親自出面了。他說：“學生有些出身不大好的，難道我們都出身好嗎？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選擇！”猶如三記重拳，一次比一次狠，紅五類們頂不住了。

1966年11月的一天晚上，一個電話打到譚力夫家，中央文革的關鋒、戚本禹約他中南海談一談。譚力夫又驚又喜：終於有了一個為血統論辯解的機會了。他要在中央領導面前“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系統闡述血統論的正確性。可當他那滔滔不絕的辯解沒進行幾分鐘，戚本禹就厲聲喝問他同劉少奇、鄧小平、賀龍的子女有無瓜葛，關鋒則在一旁敲邊鼓，不斷地追問他們家同林楓、李雪峰的關係。自己的老爹幹過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能同這些人無關嗎！譚力夫終於明白，對方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談話當然是不歡而散。事隔不久，譚力夫被逮捕投入監獄，中央文革成立了“譚力夫專案小組”，不斷追問譚力夫的後臺問題，想以此引起全國人民的公憤，藉以除掉政治對手。可譚力夫畢竟不是普通人，他在獄中清醒地認識到中央文革“打孩子是為整老子”的企圖，學著革命

先輩的樣，咬緊牙關硬是一句不話，非常投入地表演了一翻。為了證明“血統論”的正確，他還在獄中寫下了一首《鐵窗歌》：“鐵窗孤影對，深夜寒風吹。生當共產黨，死作革命鬼。縱死亦含笑，問心無大愧。敬愛毛主席，萬歲萬萬歲！”

詩有好壞之分，寫詩人的境遇卻各不相同。“清風不識字，何必亂翻書”讓作者“啣嚙”一聲人頭落地，可這首歌不像歌詩不像詩的東西卻為作者日後飛黃騰達埋下了伏筆。

十八、滅頂之災

在文革期間，各級黨政組織包括軍警等暴力專政機構，對紅衛兵都是相當地忌憚。這當然同毛澤東對紅衛兵運動的支持是分不開的，但毛澤東對紅衛兵的支持絕不僅是以新代舊那麼簡單。要知道，幾千年來，國家暴力機構同民眾的關係一直是尖銳對立的，它幾乎就是群眾頭頂的一層天。毛澤東領導的社會主義革命是改天換地的大事，這層天當然也在改革的範疇內，而且是至關重要的一環。毛澤東改革的辦法就是把對立關係倒過來，暴力機構的活動要始終置於群眾的監督下，為此他不惜讓“群眾運動具在天然合理性”的思潮氾濫。其實任何人都有可能犯錯誤，但毛澤東相信群眾會在運動中“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比較起歷史上暴力機構對民眾的壓迫來，他們在群眾運動中所受的委屈其實算不了什麼，當時中國社會出現的“老貓怕鼠”現象，其實正是我們曾經擁有的大民主。不過，對“聯動”這樣的組織來說，無產階級的大民主可沒他們的份。“別說大民主，小民主也不給。一點也不給，半點也不給！”

12月26日，就是“聯動”開大會的當天，兩名“聯動”分子在偷摩托車時被老對頭“北航紅旗”的人逮個正著，他們不但不認錯，還動手打人。可這時“聯動”成員都在開會呢，寡不敵眾下，被扭送公安部，這就是“聯動”一沖

公安部所要解救的“落難兄弟”。當晚，他們不但打傷了公安部的工作人員，連一位趕來調解的副部長都挨了打。無奈，公安部只好把鬧得最凶的幾個人抓起來，但學習過幾段語錄後立即就放了。可這幾個人出來後卻反咬一口，大罵公安部亂抓人——一沖。

12月28日到29日，“聯動”調來幾百名暴徒，強佔公安部接待室，不斷毆打工作人員，並高呼“打倒公安部！”“公安部權力下放”，不但成功地將兩名“落難兄弟”搶走，而且將三名公安人員綁到禮堂圍攻謾罵，直到周圍有群眾趕來聲援才撤退——二沖；

12月31日到1月1日，調集百人再次衝擊公安部，打傷二人——三沖；

1967年1月6日到7日，糾集100人公然從公安部大門沖入，撒傳單、貼標語，砸爛禮堂，鬧騰餓了，就跑進公安部食堂，將那裏的四五十斤粉腸和熟豬肉一掃而光，還恬不知恥地到處宣揚“公安部的豬肉真他媽好吃！”。但公安部此次將他們的暴行廣播了出去，大批群眾前來聲援，“聯動”一看形勢不好，奪路而逃——四沖；

一天以後，他們糾集五六百人帶著菜刀、匕首等兇器，一路高呼“打倒‘紅三司’！”“打倒江青！”再沖公安部，用裝上鐵釘的“二踢腳”攻擊負責守衛的解放軍，造成多人受傷——五沖；

1967年1月11日，“聯動”再次糾集五六百名暴徒第六次衝擊公安部。由於這次自動前來保衛公安部的群眾達十萬之眾，他們沒有沖成，只好氣勢洶洶地向公安部提出了所謂權力下放的“最後通牒”，並高喊“油煎江青！”、“打倒陳伯達！”“打倒謝富治！”，最後甚至喊出“打倒周恩來！”的口號。別人倒也罷了，周恩來可是一直在護著他們，只不過不滿意他們胡亂打人殺人最近沒有明

確表示支持而已。“上帝要使人滅亡，必先使人瘋狂”，“聯動”越瘋狂也就越接近死亡。

“六沖公安部”非但沒有改變他們即將滅亡的命運，反倒火上澆油，惹惱了文革中一位重量級人物——公安部部長謝富治，並由此引起了一系列連鎖反應。

1月17日，謝富治講話指出：“公安部要保護左派，反擊右派，鎮壓反革命。例如‘聯合行動委員會’、‘西安紅色恐怖隊’，這些組織是反動的，頭頭是反革命。”

1月31日，《紅旗》雜誌發表社論指出：“對於反革命組織，要堅決消滅。對於反革命分子，要毫不遲疑地實行法律制裁！”

同時，中央文革成員戚本禹給“三司”紅衛兵負責人打電話：“在‘聯動’問題上，你們是不是手太軟了？連個‘聯動’都對付不了，今後還想當左派？”

絞殺令一下，“聯動”的末日也就到了。

先是以首都中學紅衛兵為主，在北京召開了“徹底批判‘聯動’大會”，號召廣大中學生同“聯動”劃清界線，從內部瓦解“聯動”組織。接著，由公安局的人領隊，“紅三司”的人動手，幾萬人在全市進行了犁庭掃穴式的大圍剿。在中學裏，新的平民紅衛兵組織不斷湧現，對他們發動了“中心開花”式的進攻；在大學裏，“聯動”成了過街老鼠，人人喊打；在社會上，浪跡街頭的“聯動”小流氓更是無處藏身。一天之內，“聯動”各個據點紛紛被摧毀，大部分頭頭被抓。“聯動”心裏這個憋屈呀！想當年在“大興縣滅‘四類分子’”時是員警給他們帶隊，怎麼一轉眼全變過來了！他們想罵、想打、想鬧，可人家“紅三司”跟他們耍的根本就不是一路拳，三四個對一個，像拎小雞仔一樣抓過來丟進囚車。此時他們倒真有幾分“十二月黨人”的血性：在冰涼的囚車裏，稀稀落落地響起了

《國際歌》聲。

十九、將軍們“綁子上殿”

當大多數監牢裏的“聯動”還在做“十二月黨人”的美夢時，他們並不知道，此時在他們曾經的老巢裏正在舉行著揭發他們罪行的展覽。展覽地點雖各不相同，但主題卻是一樣的，都把“聯動”罪行同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聯繫在一起，主題是“讓我們奮起毛澤東思想的千鈞棒，把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徹底砸爛！”

之所以這樣聯繫，是因為從種種揭發材料來看，這些人之所以在文革初期帶頭造反，同他們老爹的特殊身份是分不開的，正所謂“春江水暖鴨先知”。他們依靠近水樓臺的優勢，較早摸清了中央高層的意圖，於是這些毫無造反動機的人率先造起反來，他們是希望儘早獲得“左派”頭銜，以便從中漁利。他們成功了。他們中最早的紅衛兵組織幾乎是與清華附中的紅衛兵組織前後腳成立的，巨大的歷史慣性迅速把他們推向風口浪尖，著實風光了一把，但渣滓終究是渣滓，還不到一年，一個個就原形畢露了。

北京六中森嚴恐怖的“勞教所”；

慘無人道的各種法西斯刑法；

殺人滅跡，血債累累的暴行；

敲詐勒索，無所不為的流氓行徑；

一樁樁一件件，讓參觀者不由自主地回想起黑暗的舊社會。人們很難理解，怎麼解放翻身這麼多年，在中國的土地上還會出現這種罪惡。無產階級既然已經取得了政權，按照某些人的說法，剝削階級已經被消滅了，階級鬥爭不存在了，國內的主要矛盾也變了，按說該太平了吧，可怎麼一轉眼舊中國的東西又回潮

了？看來他們的生命力還很頑強，頑強到超乎我們的想像。

展覽獲得空前的成功，每天都有絡繹不絕的人參觀，這中間包括共和國的一些開國功臣們。當他們看到自己家寶貝在外面幹的這些事後，從心底生出陣陣涼氣：這不就是國民黨嗎！這不就是法西斯嗎！自己把腦袋別在褲腳帶上幹了大半輩子革命，不就是為了推翻這些嗎？怎麼這些東西又從自己兒子身上出現了？大半輩子的辛苦，無數戰友流血犧牲換來的紅色江山，難道要由這群小兔崽子來執掌？過去是國民黨禍害老百姓，難道以後要換成他們來禍害？那自己革命還有什麼意義！並不是每個功臣都沒有覺悟，更不是誰都護犢子。“愛孩子，是老母雞都會做的事，可要懂得教育他們，那就是國家大事了。”經過深思熟慮，他們終於做出了正確的決策。在陳士榘將軍的帶動下，一些將軍們紛紛帶著自己孩子去自首。

毛主席聽說這件事後，當即下令：把被抓的“聯動”全放了。

二十、政治上徹底清醒了

1967年4月22日，關押“聯動”的紅衛兵監獄中湧動起一陣小小的騷動。幾輛大轎車開過來了，一百多名“小政治犯”排隊上車，在車上，他們仍在心裏猜測未蔔的前程。“不會拉出去槍斃吧？”“不會，最多是開批判會！”他們這樣互相打著氣。

沒想到汽車卻直開人民大會堂，在東大廳的會議室裏，周恩來、江青、康生、陳伯達魚貫走出。“聯動”們一下子愣住了，悔恨、憤怒、恐慌、內疚各種感情交織在一起，他們不知如何是好。他們曾經天天盼望同中央首長見面，可萬沒想到是在這種情形下，更沒想到一下子見這麼多。“你們受委屈了”，江青一語出口，下麵立起波瀾。先是小聲抽泣，接著是放聲大哭，會場亂成一團。接下來的

談話就不那麼順利了。只要江青一開口，他們就齊聲高誦“我失驕楊君失柳……”

五十年代，毛主席前妻楊開慧閨中密友李淑一來信索取主席年青時贈送楊開慧的一首詞，毛主席說當年那首寫得不好，提筆揮就這首《蝶戀花·答李淑一》：我失驕楊君失柳，楊柳輕揚直上重宵九。問訊吳剛何所有，吳剛捧出桂花酒。寂寞嫦娥舒廣袖，萬裏長空且為忠魂舞。忽報人間曾服虎，淚飛頓作傾盆雨。

這裏的“驕楊”指楊開慧，“柳”指李淑一愛人柳直荀，革命烈士。在這首詞裏，毛主席對前妻的懷念是無疑的，可並沒有對江青否定的內容。有些人總拿這個說事，用意純在詩詞之外，否則的話，為什麼他們不編排賀子珍呢？還不是因為當時賀子珍健在，有些謊話容易被戳穿。事實上，毛主席也給江青寫過一道：暮色蒼茫看勁松，亂雲飛渡仍從容。天生一個仙人洞，無限風光在險峰。（題為“為李進同志題廬山仙人洞”，“李進”是江青曾用名，“李”指江青原名李雲鶴，“進”是進步的意思，加起來表示“李雲鶴進步了”）

“聯動”們人小鬼大，當眾這麼做無疑是在指著江青鼻子罵：“你是小老婆！”這簡直就是面對面的人身攻擊。

當中央文革其他人講話時，他們就高唱：“抬頭望見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澤東……”想毛澤東幹嗎？直到此時，他們每個人還在做著這樣的政治夢：自己遭受的種種“迫害”都是中央文革背著毛主席幹的，毛主席早晚有一天會翻然醒悟，將他們和他們老爹的罪行一起赦免……

被放出來的“聯動”非但沒有絲毫悔改，反倒變本加厲起來。此時他們在政治上徹底清醒了。他們成群結隊地騎著自行車在天 an 門狂奔，並高呼“油煎江青！”“劉少奇萬歲！”“毛主席正確不正確，十年後再見！”鑒於沒有槍桿就

沒有一切的教訓，他們不但四處搜羅槍枝彈藥，還利用大串聯時在全國各地撒下的“火種”號召成立“鐵血隊”“紅旗隊”“紅旗軍”等武裝力量做他們的保皇派。他們尚未被打倒的叔叔阿姨們更是別有用心地提出“打倒一切，全面內戰”的口號。

可歷史規律決定了，這一切不過是螳臂擋車。經過新一輪的抓、關、放後，他們殘存的力量也被消滅殫盡，“聯動”做為一個組織正式滅亡了。

二十一、照片的秘密

這是網上流行的一幅控訴文革血淚的照片，它給我們的直觀印象是什麼？愚昧、狂熱、武鬥？可是又有誰真正看懂了它。

請大家注意看牆上的標語：“歡呼毛主席關於派軍隊支持革命左派的偉大號召！”“‘紅旗’《鐵血隊》死保‘聯動’反動透頂！”

“聯動”做為一個組織已經被消滅了，但他的指導思想還在，在黨內、軍內仍有大批支持者。在“二月逆流”時就有某位黨內大佬叫囂：“‘聯動’怎麼會是反動組織，十五、六的孩子，能惹什麼事！”與此相呼應，全國各地紛紛成立各式各樣的保皇組織，名稱五花八門，以“鐵血隊”“紅旗軍”等最為著名，這當然不是完全響應“聯動”的號召，更多的是受衝擊的各級黨政負責人組織的憲兵隊。於是，1967年成為文革史上最為混亂的一年，全國武鬥成風。我們今天見到的“紅衛兵公墓群”大半形成於那個時期。然而當我細細考證這些公墓群時就會發現：他們大多數是當年的保皇派。懷著對黨的忠誠，他們把青春奉獻給了他們心目中的“黨代表”。可這些人有朝一日翻過身後，卻異口同聲地指責起兩派的無知與狂熱，躺在冰涼墓穴中的逝者喲，倘使有來生，你們還是否願意為他們流盡最後一滴血！

一顆嫩芽破土而出，只有雄才大略的人才能及早分清它是鮮花還是毒草，大多數人還只是盲從。毛澤東——文革——動亂，用武斷的木樁將似是而非的邏輯串聯在一起，把毛澤東敵人的罪惡硬安在他頭上，多年來，中國人民就這樣被誘騙著一步步走上資本主義這條賊船。

後記

進入 1968 年以後，文革越來越是大人們的事了，“聯動”的老紅衛兵們一下子由“革命小將”又變成了半大孩子。這時期他們自稱“頑主”，意思是頑劣之主，我們後來熟悉的那句“大錯不犯，小錯不斷，氣死公安，難死法院”就是從這時開始流行。其實讓我看，他們更像“玩兒主”，玩樂之主。

首先是他們學會了“玩情調”。政治上的受壓，使他們當中大部分人過起了“逍遙派”“頹廢派”的生活。他們常常聚在一起遊山玩水、聚餐、交流書籍、傳唱外國歌曲，並且學寫新舊體詩，這就成了文藝沙龍的雛形。這裏就發生了一個問題：他們錢從哪來？實事求是地講，還真不都是非法所得。當時國家有一項救濟制度，什麼意思？簡單說，當時小青年剛上班一般是從 18 元工資拿起，以後逐步提高。假如有一老工人月工資 40 元，這在當時算相當高了。可他家裏養六口人，一平均，他又成了困難戶。這時他就可以享受國家的救濟：從他年齡最大的子女中選一人，根據具體情況不同從 15、16、17 三個工資檔中選一，當子女成年參加工作後再按 24 級工資制走。“聯動”老紅衛兵的父母此時大部分被打倒，家裏是指望不上了，但國家對他們也按救濟制度走。每月 15 元的工資吃飯倒沒問題，可這些少爺們沒事愛去趟“老莫”（莫斯科餐廳），這區區救濟就顯得微不足道了。不過好在有以前抄家的存貨，倒也勉強過日子。他們當年抄家還抄來了不少“資產階級腐朽的、沒落的精神垃圾”，此時倒成了他們寶貴的

精神食糧。看黃書、聽黃色歌曲成了他們的主要娛樂活動，80年代開放初期國內就黃書氾濫，那主要不是外來的精神污染，更多的是老紅衛兵手裏“存貨”的傳播。

其次他們學會了“玩浪漫”。俄國的“十二月黨人”被流放後有美麗嬌妻陪著，這讓中國的“十二月黨人”心裏多少有些酸楚的感覺，儘管他們的“流放”環境比對方不知強多少倍。沒人跟，自己主動出擊總成了吧！於是北京城大街小巷總能見到不三不四的人圍著年輕姑娘們轉，員警問就說學雷鋒做好事，送姑娘回家。可人家雷鋒同志是幫助老大娘，可他們卻只愛幫助大姑娘。不過那時年輕姑娘們的防禦手段要比現在強，逼急了罵一句“臭流氓”對方一般會落荒而逃，否則就會被革命群眾扭送公安局接受員警叔叔的問話。

但他們最主要的社會活動是打群架。“聯動”的組織機構沒了，但老紅衛兵們的架子可沒放下。此時他們的扮相更進一步，和“紅八月”時大不相同：一身將校呢軍裝，腳蹬將官靴，頭戴呢子軍帽，只是臂上沒有了“聯動”的紅袖章。

（參見《血色浪漫》鐘躍民的扮相）這些都是老爹當年的軍禮服，穿在身上仍能顯示血統的高貴。可他們這身綠軍裝再也鎮唬不住“黑五類”的狗崽子們了。最讓他們鬱悶的是，連一直貼在身邊的“白烏鴉”們也造反，紛紛飛回自己的陣營中去了。他們想不明白：想當年“紅八月”時，自己一頓大嘴巴抽過去，對方連眼都不敢瞪，怎麼現如今就敢菜刀、板磚地跟自己幹！挨了幾頓暴打後，他們終於明白：當年自己之所以能橫掃街頭，完全是狐假虎威！離開毛主席，自己連同自己老爹媽一塊算上，在老百姓眼裏連條寵物狗都算不上。

“上山下鄉”運動開展以後，他們被歷史的洪流挾裹著，各自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令人奇怪的是，這些自詡為“老子英雄兒好漢”的人大多數並沒有

接老爹的班走從政之路。80 年代，當他們一把鼻涕一把淚的控訴完文革的“血腥”與“罪惡”後，這些當年打、砸、搶的闖將幾乎清一色地投身商海。從此，“官倒”成為中國政治辭海裏特有的名詞。

第三節 破四舊

破四舊按官方解釋破除破除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毛澤東提出“破字當頭立也就在其中了”。1966 年 6 月 1 日，由陳伯達領導的《人民日報》（陳伯達于 5 月 31 日接管人民日報社）發表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社論指出：在短短的幾個月內，在黨中央和毛主席的戰鬥號召下，億萬工農兵群眾，廣大革命幹部和革命的知識份子，以毛澤東思想為武器，橫掃盤踞在思想文化陣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其勢如暴風驟雨，迅猛異常，打碎了多少年來剝削階級強加在他們身上的精神枷鎖，把所謂資產階級的“專家”、“學者”、“權威”、“祖師爺”打得落花流水，使他們威風掃地。這時“紅衛兵”這個組織剛出世，是由清華附中十幾個學生聚在圓明園廢墟上組織起來的。但不知什麼時候再街上開始掃“四舊”了，雖然還沒有停課的通知，但幾乎所有學校已經不上課了。

1966-6-13，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教育部黨組《關於改革高等學校招生辦法的請示報告》中，就明白無誤地說，“廢除現行現行高等學校招生考試辦法，實行推薦與選拔相結合的辦法招生”，“推薦與選拔必須突出政治，貫徹黨的階級路線”。同一天，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於改革高等學校招生考試辦法的通知》。通知說：“鑒於目前大專學校和高中的文化大革命正在興起，要把這一運動搞深搞透，沒有一定的時間是不行的。”而且，高等學校招生考試辦法“基本上

沒有跳出資產階級考試制度的框框，不利於貫徹執行黨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教育方針，不利於更多地吸收工農兵革命青年進入高等學校。這種考試制度，必須徹底改革。”《通知》說，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決定 1966 年高等學校招收新生的工作推遲半年進行”。1966 年 8 月 5 日中共上海市委正式宣佈，全市大中學生一律停課鬧革命，徹底放假了。

1966-6-18，人民日報全文發表了這個決定，並發表社論《徹底搞好文化革命 徹底改革教育制度》。社論說，改革招生考試制度是“徹底搞掉資產階級教育路線的一個突破口。我們將從這裏著手，對整個舊教育制度實行徹底的革命。”號召“初小可以學些毛主席語錄，高小可以學更多的毛主席語錄和“老三篇”等文章。中學可以學《毛澤東著作選讀》和有關文章。大學可以學《毛澤東選集》。”又說：“廣大工農兵、革命幹部和革命知識份子，已經下定決心，要把‘夥同和慫恿那些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專家”、“教授”，大量散佈資產階級、修正主義毒素的’牛鬼蛇神統統揭出來，把你們的老根統統挖出來，把你們的“威風”統統打掉，把你們的資產階級的傳家寶統統砸碎。”

一、街頭行動

學校裏有部分學生不學習，不上課，自發組織幾十個人或十幾個人到街上拿著剪子，看到“三包一夾”（包頭，燙髮，小褲管，緊身褲，尖頭高跟鞋）無論男女一律剪掉。女同胞手裏拿著脫下的鞋或乾脆光腳穿著被剪掉剪破的褲子路上走；有的被剪掉東一塊西一塊的頭髮，沒有人敢吭聲。只要是學生看的不順眼，隨時可以勒令停下，任憑學生折騰。在大街上隨處可以看到東一堆西一堆被學生圍成一團的人群，形成一道獨特的風景，十來天以後，這類“三包一尖”的人馬路上已經看不見了。

商店的名稱，馬路的路名也成了革命物件。幾乎所有的店名、路名都被革命了。上海南京路改為“五卅大道”，西藏路改為“毛澤東大道”，和平電影院改為戰鬥電影院。舉此一系列就可以看到當年的情形。進入6月中旬各學校基本上都有紅衛兵組織了。只有紅五類的子弟才可以加入。（紅五類：工人子弟、革命軍人子弟、貧農子弟、下中農子弟）

這時開始基本上都是帶著紅衛兵袖章掃四舊了。在破四舊中更有甚者指出：各家的門牌號是青天白日為國民黨招魂（因為門牌號是藍底白字）交通指揮的紅燈停、綠燈行應改為紅燈行、綠燈停。紅的怎麼可以停。這是反對毛主席的反革命行為。當年周恩來不得不說這個是國際間的通行慣例。是有科學依據的，紅光穿透力強，無論雨天霧天，駕駛人員都能遠遠地看見紅燈。否則外國人到中國無法開車這才作罷。店名、路名改了以後破四舊中最舊的文物古跡當然也在劫難逃。被毀文物古跡字畫典籍數不勝數，無法統計。這些轟轟烈烈完成後，更大的浩劫抄家開始了。任何人任何組織只要是紅衛兵就可以去抄家，趁機打家劫舍。紅衛兵造反隊配合了中央保衛首都工作部署，波及了全國。

二、破四舊是毛澤東文革前調兵遣將，防止政變的延續

作者按：《心路——透視共和國同齡人》於2011年8月由中央文獻出版社在中國大陸發行。

破四舊是文革歷史上極不光彩的一頁。然而將這種震撼社會、慘無人道的“運動”僅僅聚焦於當年13-19歲的中學生，對於我們深入反思這段歷史顯然是膚淺的，甚至是一種偏差。

破四舊需要分析一下其為何成為紅衛兵運動乃至文革初期的爆發點？以及在一個成年人主導的社會中，它怎麼會成為一種現實？

破四舊的物件，大致可以分為兩方面：一是“十六條”中所說的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一是所謂四舊的載體——“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分子”。或者說，破四舊的開端主要是針對前一對象，以砸招牌、剪髮型、改路名等為主；但是馬上就轉向了後者，以抄家、打人、遣返為主要內容。這兩者之間其實沒有太多的內在聯繫和共性，但為何在如此短的時間內轉換物件、並以如此之猛烈的程度展開呢？



破四舊是保衛毛主席和淨化北京城的延續

文革之前，毛澤東自 1965 年 10 月即離開北京，一直以杭州為基地巡視流連，流連於江南而拒絕返回北京。甚至 5 月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他也並未出席。從表面看，這很不正常，政治局討論發動文化大革命如此重大的問題，主席居然不參加會議。他更多是從安全角度考慮的。毛澤東後來對外國友人說：公開發表改組北京市委的時候，我們增加了兩個衛戍師。林彪講話則談到：這次彭真的問題出來後，毛主席調兵遣將，防止反革命政變，軍隊和公安系統都做了部署。毛主席這幾個月就是做這個文章，多少天沒有睡好覺。

可以這樣說，“無文革”發動前夕，毛澤東為確保安全，他進行了縝密的佈置。在毛澤東授意下，周恩來成立並親自主持了密級甚高的“首都工作組”，甚

至林彪、江青都未能參予。這個機構的宗旨是“保衛毛主席、保衛黨中央、保衛文化大革命、保衛首都”，下設七個小組：其任務分別是：一除了調動前面提到的兩個步兵師作為北京衛戍部隊外，負責其他警衛部隊的配置和調動；二負責社會治安；三清查民間的槍支彈藥；四清查敵特和私人電臺；五清查清理社會人口；六加強看守和監督監獄服刑人員和勞教人員；七外事保衛和清查華僑。[1]可以看出，這個工作組的重點是將北京市過濾成一個“純淨”的城市，以保衛毛澤東和文革指揮中心的安全。除第一項外，這個組織的工作載體主要是與各級公安機構和街道委員會相結合。

在這種佈局下，文革中北京的第一批遣返是在 1966 年 5 月，而非始自於破四舊。首都工作組成立的當月，就立即“動員”了一批“四類分子”去新疆等地。周恩來是這樣講的：“文化大革命初期，總要把地富反壞弄走。”[2]天津市公安局也曾在 1966 年 7 月，計畫將原籍河北的四類分子 4500 多人遣返回鄉，監督改造。[3]北京破四舊中的遣返，現在無從考證最早出現的具體事例及其背景。但目前可以確定的是，在紅衛兵成立之前，北京的遣返已經啟動。遣返的做法並非是紅衛兵們想出來的點子，它是與“保衛毛主席、保衛黨中央、保衛文化大革命、保衛首都”的方針密切相關的。毛澤東對此曾提出意見，於是這一工作在 6 月中旬告一段落。周恩來也承認“當時將一些壞人向新疆送了些，可能送的多了些。”但是這項工作並未終止。也就是說，北京對“四類分子”的遣返是文革前就已經確定並正在執行的政策。

根據一位元當事人回憶：“對社會人口的清查、清理工作，……按當時規定的政策，第一步是清查，第二步是通過公安派出所和街道居民委員會，說服、動員其遷出北京。但是，這項工作很快就被‘紅衛兵’沖亂了，他們根本不講什麼

政策，統統先揪出來批鬥，然後趕出北京。” [4]

可以說，紅衛兵興起後，自然而然地將破四舊與首都工作組的任務銜接起來。這是因為，上述的七項工作，其中的第 3、4、7 項是屬於內部掌控的，在當時法律框架尚未被完全破壞的情況下，政府機構無權隨意搜查嫌疑者的住所。而紅衛兵們的身份卻可以讓這三項任務堂而皇之地公開進行了。第 2、6 項任務實際上也轉交給了紅衛兵去執行，所以出現後來的“打流氓”。而第 5 項任務更成為了抄家、打人、遣返的依據。

從這個歷史邏輯出發來認識破四舊，就接近了歷史的真實。實際上，紅衛兵們的抄家除了一少部分是紅衛兵們自發地尋找物件外，多數是在當地派出所和街道委員會的引導下發生的。

二、國家機器的慫恿和縱容

在階級鬥爭為綱的旗號下，公安幹警特別是那些“片警”，衡量其工作的第一標準顯然是對保衛毛主席的赤膽忠心和高度責任感。他們也巴不得使自己的轄區“純之又純”。謝富治等公安系統領導人也很快指示他們，要積極配合紅衛兵的革命行動。因此，多數幹警對破四舊持歡迎態度是毋庸置疑的，甚至可以說紅衛兵在很大程度上幫助了他們的工作。於是，很多幹警開始主動地引導著紅衛兵們的行動，抄家就大規模地出現于天子腳下的京城了。

一些紅衛兵當事人對破四舊的回憶中，大多數人都提到了公安派出所和街道居委會的惡劣作用。舉幾個事例說明：

一位訪談者說：我很熟悉的一個北京的紅衛兵，他們到上海串連時，抄家並打死了一個老華僑。這件事當時在上海很轟動。實際上這是當地的一個派出所所長，還有一個里弄的居委會主任，老想整一個老華僑。但華僑身份特殊，他們整

不了，就利用北京紅衛兵不瞭解當地情況，介紹說這個人是老資本家，還死不承認。結果，這些北京的紅衛兵不分青紅皂白，就抄家打人。老華僑是在東南亞割橡膠的工人，回國用畢生的積蓄買了一個房子，養老來了。他很硬，死不承認自己是資本家，當然他根本就不是。最後，就這麼被打死了。後來在江灣體育場鬥爭了打死人的紅衛兵。不過在當時政策下，後來還是把他放出來了。[5]

另一位訪談者回憶：大概是9月份，抄家風已經過去了，可當地的派出所找上門來說，有一個很有特務嫌疑的人，你們能否把他家給抄了？那時，我們也成立了紅衛兵糾察隊，就去抄人家。結果發現這家人好像是華僑，而且和總理的關係非常密切。[6]

指揮過多次溫和抄家的一位訪談者說：當年抄家這些事情全是街道居委會和派出所搞的，那幫孫子到處給提供名單，說，我們胡同有一個什麼什麼人，你們去抄啊。這幫人就去抄去了。那時候抄家全是壞人引道，這些學生知道什麼呀？[7]

即使在老幹部層面，對破四舊的態度也是欣賞的。葉劍英曾講到：“在這次文化大革命中，紅衛兵樹立了不朽的功勳。例如，北京市有一萬多黑戶，深宅大院，解放16年，誰都沒有進去過，一些壞人就是在裏頭搗鬼。公安局、司法人員沒有足夠的證據也不能抓。有個聖修小學，是外國鬼子在我們中國搞了多少年的，誰也不敢動它。紅衛兵小將管你什麼法律不法律，一掃而光。多少年的老大難問題，紅衛兵解決了。有些極反動的傢夥，十多年來天天罵我們的黨和毛主席，左鄰右舍都知道，恨死他們了。但誰也不敢動他，這一回小將們就把他揍死了。可能違反一點政策，可更大的利益是掃除了壞人，掃除了我們社會上的垃圾。”[8]這表現出黨內高層對這一問題的基本認識。

另一方面，文革發動後，大多數老幹部很不理解、很不得力。把鬥爭矛頭指

向那些“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不僅政治上安全，甚至也是一段時間內，動盪中的各地黨政負責幹部轉移視線、尋求自保的一種做法。他們顯然樂於看到紅衛兵這股禍水沖向“傳統”的階級敵人，而非《五一六通知》中提出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三、背後的經濟動因

在以往對破四舊的研究中，往往還忽略了另一因素，即隱藏很深的經濟動因。

1966 底起，大量破四舊中被遣返的人員開始要求返回北京。於是，中共中央在 1967 年 3 月 18 日轉發了北京市公安局軍管會頒佈的《關於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遣返後返京人員的處理辦法》。該《辦法》共 10 條，規定了 10 類不准返回北京、就地接受改造的人員。其中特別需要注意的是第 6 條中的“堅持反動立場的資本家、房產主”。資本家在文革中被擴大化為階級敵人，還多少可以理解。但把“房產主”列入為階級敵人的概念，也許是首次出現於中共中央檔。按照常理，解放初期大房產主被視為資本家對待，公私合營時其房產早已被改造過了。因此，這裏的概念理應是指小房產主、小房產出租者。但是，這批人在建國初確定階級成分時應當被定為小業主，並不屬於階級敵人的範疇。中共的階級路線，從來沒有將小房產主、小業主作為敵對勢力的政策。但是，在這個《辦法》中卻將其與“地富反壞右”同等待遇。當然，可能為了避免被誤解、引申，前面加上了“堅持反動立場”的首碼。不過這當中有一個奇怪的邏輯現象。“堅持”意味著以前就“具有”，否則怎麼堅持？但是如果他們以前不是階級敵人，何來的“反動立場”呢？

根據這樣一個邏輯，這些房產主如果以前不是階級敵人，那麼其反動立場只能是來自于文化革命之中了，準確地說，就是對待破四舊、抄家和遣返的態度了。

第一個問題是，這批人如果不是“黑五類”，為何又會被抄家遣返？合乎情理的看法，顯然是與當年的住房緊張有關，從而導致對於收取房租、有剝削行為的房產主強行剝奪。第二個問題是，這批人如果不屬於“黑五類”，怎樣才能讓紅衛兵抄他們的家並遣返他們呢？這恐怕就應當歸功於北京眾多的派出所民警、居民委員會以及街道積極分子了。依據當年的理論，出租房屋的小房產主儘管屬於輕微的、但依然是一種剝削行為。也就是說，你不能說你沒“渣兒”。其餘的一切，都是可以依靠三寸不爛之舌解決的了。什麼政治態度了、反動言行了、生活腐敗了、攻擊紅五類了……那個時代這些可以信手拈來的理由，也就構成了所謂的“反動立場”了。

另外，《辦法》之所以強調了房產主，就說明它不是個別現象，而是涉及一個批量級的群體。而他們即使在紅衛兵的破四舊名單上，也應當屬於錯劃、錯抄更是錯誤遣返的一部分人。而他們卻真實地成為了抄家遣返的對象。至於怎樣形成了這一現象，就和它自身的可操作性有關了。關鍵的一點在於：當年的抄家、遣返是沒有組織程式的，也不需要審批的，也不是某一中學的某一個組織可以做、別人不能做的，而是所有學校的所有紅衛兵組織都可以做的。說得極端點，甚至是三兩個有紅衛兵袖章的一吆喝，跟上五六個人，就可以完成從打人、刑訊、批鬥、抄家及遣返這樣一個過程。說明這一點，也就說明瞭在當時的政治旗號之下實現經濟利益，完全具有可行性。小房產主們遭到這樣的打擊，“黑五類”們的命運更可想而知。於是，打擊面越寬，某些人的既得利益就越大，這似乎是一種正比關係。當年土改分房、分地、分浮財的經歷，對於很多人來說依然記憶猶新。因此，破四舊時對抄家和遣返熱情最高的社會群體，恐怕倒並不一定是那些紅衛兵了。

這一中央文件的關鍵還在於強調了這批人遭到遣返並不准返回。但是不讓他們回來在道理上又說不過去，於是給他們加了個“堅持反動立場”的帽子。這純粹是錯了也不認賬。為何會這樣，不難發現其背後有著強大的既得利益的支撐。熟悉那段歷史的人都知道，在“紅八月”之後不久，那些被遣返的住戶的房子，都優先分配給了紅五類的積極分子，改善了他們的居住條件。而北京城區的所謂紅五類，其中的革命幹部、革命軍人和革命烈士基本不會參與到這種分配之中，市區也沒有貧下中農，真正得益的是工人家庭和出身於貧下中農家庭的其他職業者。眾所周知，北京從來不是一個工業城市，解放初期產業工人少得可憐。被劃入革命依靠力量的“工人”大多是原來的城市貧民，即馬克思階級分析中的流氓無產階級階層。這個階層是產生街道積極分子的主體，也可以說是從“破四舊”中獲取經濟利益的最大受益群體。另一部分得益者則是陸續改造公檢法而調入的大批外地的複轉軍人和基層幹警。在鵲巢鳩佔之後，那些被遣返的家庭就無形增加了返回北京的困難。《辦法》的政策取向和表現出的經濟背景就不言自明瞭。

甚至在破四舊中被抄來的傢俱、衣物等生活用品也均在 1967 年初前後，以極低的價格、以“抓鬮”的形式賣給了出身紅五類的市民。可以說，抄家、遣返除了所謂的階級鬥爭的政治原因外，內在的利益驅動也是構成破四舊迅速擴大成勢不應被忽略的因素。但是，紅衛兵們的瘋狂、愚蠢，則成為實現他人目的的棍子和日後承擔責任的債主。

輿論導向是破四舊迅速發展擴大的重要因素。

從《十六條》提出破四舊，宣導“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捧殺中學生們的“革命大方向始終是正確的”。這些，顯而易見是要把這些多數未成年的孩子推向邪惡。

到了破四舊、打人以至打死人最為猖獗的 8 月底，《人民日報》8 月 29 日發表了由中央文革小組起草的題為《向我們的紅衛兵致敬》的社論，其煽動性極大。其中說到：“紅衛兵上陣以來時間並不久，但是，他們真正地把整個社會震動了，把舊世界震動了。他們的鬥爭鋒芒，所向披靡。一切剝削階級的舊風俗、舊習慣，都像垃圾一樣，被他們掃地出門。一切藏在暗角裏的老寄生蟲，都逃不出紅衛兵銳利的眼睛。這些吸血蟲，這些人民的仇敵，正在一個一個地被紅衛兵揪了出來。他們隱藏的金銀財寶，被紅衛兵拿出來展覽了。他們隱藏的各種變天賬，各種殺人武器，也被紅衛兵拿出來示眾了。這是我們紅衛兵的功勳。” [9]

那一時期，這樣的文章、講話、廣播稿比比皆是。直到 1966 年 9 月 17 日，《紅旗》雜誌發表了題為《紅衛兵贊》的評論員文章，從中我們就可以知道輿論對紅衛兵那種吹捧和狂熱達到了何種地步，主導社會的成年人要把紅衛兵們引向何處。其中寫道：

“千百萬紅衛兵由學校走上街頭，形成了一股不可抗拒的革命洪流。他們高舉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紅旗，發揚了敢想、敢說、敢幹、敢闖、敢革命的無產階級革命精神，蕩滌著舊社會遺留下來的一切污泥濁水，……在破除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樹立無產階級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的鬥爭中，取得了輝煌的戰果。” [10]

此外，這篇文章還學著當年毛澤東寫《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的口吻，駁斥了那種認為紅衛兵運動、“破四舊”糟得很的論調，實際把這作為了劃分革命與否的態度。當年的《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的評論員文章，不僅代表著中央高層對破四舊的基本立場，同時也是指導人們行動的準則和號令。

[1]張民：《周恩來與“首都工作組”》，第96-100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

[2]周恩來接見科學院京區各單位代表談話機要，1967年1月21日，《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3]《中國共產黨天津歷史大事記》，中央黨史出版社，2001年，第276頁。

[4]張民：《周恩來與“首都工作組”》，第96-100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

[5]劉景航，2008年10月30日訪談錄音整理稿。

[6]劉龍江，2008年6月27日，7月6日、13日訪談錄音整理稿。

[7]王宇、侯瑛，2008年11月22、23日訪談錄音整理稿。

[8]葉劍英、戚本禹等接見藝術院校團體部分師生代表時的講話，1966年9月25日，《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又見葛偉華：《砸爛舊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動亂與浩劫》，第251頁，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8年。

[9]1966年8月29日《人民日報》社論：《向我們的紅衛兵致敬！》

[10]《紅旗》第12期，1966年9月17日。

來源：“中國

選舉與治理網”

作者：米鶴都

第四節 文革紅衛兵抄家戰果

四百億人民幣 一百萬兩黃金

1966年10月的一天下午，我和幾位部隊政工幹部突然接到緊急命令，連夜乘專車從天津奔赴北京軍區大院，第二天又馬不停蹄趕到北京展覽館“首都紅衛

兵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抄家戰果展覽會”（以下簡稱“紅衛兵抄家戰果展覽會”）籌備處報到。

“林辦”指示

據籌備組領導傳達：林彪聽到關於“紅衛兵”抄家“輝煌戰果”的彙報，感到非常滿意，辦好“紅衛兵抄家戰果展覽會”是按“林辦”指示，由中央文革領導小組直接指導的一項重要工作。根據指示，展覽會由“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革命造反聯合司令部”（包括各中學）、北京軍區、公安部共同牽頭，組織各院校紅衛兵、解放軍、公安部及北京市公安局、中國革命博物館、中國歷史博物館等單位的 200 餘名骨幹參加籌備工作。

舉辦這個展覽會，就是要借展示所謂“紅衛兵破四舊運動”，特別是抄家的“輝煌戰果”，把“文化大革命”運動引向深入。

在文革初始階段，由首都紅衛兵掀起的所謂破除“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的“破四舊運動”立即風起雲湧。席捲全國。所謂“破四舊”這個詞語，最早出現於 1966 年 7 月 4 日清華附中《再論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的大字報中。大字報把“四舊”視為修正主義的東西。首都各大中院校“紅衛兵”聞風而動，走上街頭，到處張貼傳單和大字報，支持和擁護“破四舊”運動。8 月 22 日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出了“紅衛兵”大破“四舊”的消息後，全國各大報紙均以“新華社 22 日訊”的形式在頭版刊登了題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席捲首都街道，紅衛兵猛烈衝擊資產階級的風俗習慣》的文章。《人民日報》還在第一版發表《好得很》、《工農兵要堅決支持革命學生》兩篇社論，對紅衛兵極為荒唐的行動給予高度評價。由此，“破四舊”運動很快蔓延到上海、天津及全國城鄉。

破除“四舊”首先是從道路、街道、店鋪、城市設施易名開始的，繼改名之後，這種“破四舊”的範圍進一步擴大，對人們的正常生活習慣也橫加指責，對所謂不合“無產階級口味”的髮式、服飾、裝飾等發起攻擊。“破四舊”發展到極致是“抄家”狂風的刮起和肆虐。

據統計，僅 1966 年 8 月 18 日後的一個月內，北京市被抄家的達 11.4 萬多戶，被趕回原籍的有 85198 人；上海市從 8 月 23 日至 9 月 8 日，紅衛兵共抄家 84222 戶。到 9 月下旬，天津市紅衛兵抄家 1.2 萬戶。

所謂抄家“戰果”確實十分驚人，無比“輝煌”：據不完全統計，從 6 月至 10 月初，全國紅衛兵收繳的現金、存款和公債券就達 428 億元，黃金 118.8 萬餘兩、古董 1000 多萬件，挖出所謂的“階級敵人” 1.66 萬餘人，破獲“反革命”案犯 1700 余宗，從城區趕走的“牛鬼蛇神”達 3900 多萬人。紅衛兵在抄家過程中，還私自批鬥、抓人。一些紅衛兵甚至私設公堂，濫施酷刑，打人致死。

頭頂“內戰”壓力猜政治“謎語”

舉辦如此大型政治性展覽，是一項政策性極強、涉及面極其廣泛的政治任務，需要做大量艱苦細緻的籌備工作。但是，按照“林辦”指示和一些雖然擔任展覽會領導要職、卻從未接觸過展覽業務的年輕人的想像，這個展覽會似乎只要集中精力突擊，拼上兩三個月，湊齊材料，碼放好展品，便可望在 1967 年元旦前後對外展出。但事實上在當時極其複雜的政治鬥爭條件下，要想籌辦這樣大型的、“高精尖”的展覽會，其困難程度和潛在的政治風險遠遠超出人們的想像。這裏的核心問題就是如何頂住愈來愈瘋狂的“內戰”壓力，走出猜“政治謎語”的怪圈，隨時掌握瞬息萬變的鬥爭“風向”，吃透和準確把握當時一天三變的所

謂“中央精神”，使展覽會不會偏離“大方向”，不致犯“政治路線錯誤”。但既然“一天三變”，又有誰能“吃透和準確把握”？

鑒於當時正處於“文化大革命”初期，各派政治力量鬥爭有如暴風驟雨，空前激烈。參與展覽會籌備工作的北京軍區和公安部門的領導，本來就心驚膽戰，人人自危，“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除手持毛主席語錄，隨時準備高呼“高舉”，“三忠於、四無限”和“向紅衛兵小將學習”的口號之外，誰也不敢輕易公開表態。“上邊”更是三緘其口，雖然作出一定要辦好“紅衛兵抄家戰果展覽會”的原則指示，在經費物資極端緊缺的情況下破例“保證供給”外，對籌辦工作的具體方針政策要求往往顧左右而言他。實在躲不開的“請示”，便泛泛傳達一些“無產階級司令部”堅決支持紅衛兵、“要相信紅衛兵”會“自己解放自己”、“不要帶框框”、要“放手讓紅衛兵小將們自己大膽去幹”、“不要擔心出問題，天塌不下來”、“要讓紅衛兵抄家展覽會震動全世界”等官話、空話、套話，根本拿不出具體意見。

聽到這些空洞無物、“指南針朝上”的豪言壯語，缺乏政治鬥爭經驗的參展紅衛兵小將們竟然盲目樂觀，忘乎所以，無不歡呼雀躍，感激涕零，盛讚“黨中央、中央文革、林辦”對紅衛兵“無限關懷”、“高度支持和信任”，感到似乎轉瞬之間便可辦出個“震動全世界的抄家展覽”，就如同“打砸搶”一樣，只要一窩蜂地上，彈指一揮間便可大功告成。令世界各國目瞪口呆。但實際擔任展覽會具體籌備任務的北京軍區、公安部以及北京市公安局的領導幹部和工作人員，多數人有一定的政治鬥爭經驗和較為豐富的閱歷，對此心知肚明。“上面”調子唱得越高，大家心裏越撲通，眼前一片迷茫，政治壓力也愈來愈大，大有“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之感。不少參展工作人員甚至私底下歎息：這哪裡是辦展

覽、幹革命工作。分明掉進“迷宮”，在使勁猜“政治謎語”。此外，大家更為擔心的是參加籌備工作的紅衛兵小將大多是“尖子”人物，在“大風大浪”中都是衝鋒陷陣的“頭頭”，不但個個“初生牛犢不怕虎”，一個比一個“政治敏感”強，還都是屬炮仗的，點火就著，搞不好哪天就會“窩裏反”。不用問，只要一打起“內戰”，其矛頭首先對準我們，非把我們整個死去活來不可。

這種擔心並不是多餘的，一方面，多數參展紅衛兵無不以“造反”大出風頭為樂事，只要看到什麼不順眼的事，動輒“揪出”、“打倒”、坐“噴氣式”、“批倒批臭”，決不賒賬；連當時參展的、看似“金剛不壞之身”的“全國人民學習的榜樣”解放軍也未能倖免其難。以致連當時一位平時少言寡語不苟言笑的部隊年長政工幹部。也硬被沒頭沒腦地扣上“嚴重脫離群眾”和“藐視造反派”的帽子，在小範圍內挨了批鬥。就連我這個平時被紅衛兵稱道“群眾觀念好”的“展覽通”，也因“莫須有”的吃飯中的民族習慣問題，突然遭到紅衛兵圍攻。雖然由於我平時群眾關係好，圍攻只是一場似是而非的鬧劇，但幾個紅衛兵有的突然翻臉，有的嘻嘻哈哈，其又揪又拽的陣勢著實把我嚇出一身冷汗。

果然不出所料，由於“高層”政治鬥爭波譎雲詭，變幻莫測，政治風向說變就變，派性作怪，社會動亂此起彼伏，“紅衛兵抄家戰果展覽會”籌備工作內部人員常常爭論不休，很多意見根本對立。分歧愈來愈大，遲遲沒有進展，半年多仍弄不出個眉目來，無法向“上級”“交賬”。一些紅衛兵急躁情緒點火就著，便想撒撒氣，毫不客氣地把“鬥爭矛頭”直接指向擔任實際領導工作的北京軍區政治部一位副主任和公安部一位元局長，立即組織群眾批鬥大會，坐起“噴氣式”，對他們橫加指責，吼聲震天動地。幸虧這些領導早就做好思想準備，並不感到意外。好在批鬥會雖無限上綱，大吼大叫，其實他們心裏也明白這裏面也有

他們自己的責任。而且談不上什麼原則路線問題，而下一步具體領導工作還得依靠這些領導。也就走走過場，草草收兵了。但參展紅衛兵內部的你爭我鬥、大大小小的、雞爭鴨吵的辯論會、批判會幾乎一個接一個，一天也沒消停過。

我們就是這樣頭頂內戰壓力，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像猜測謎語一樣投入展覽籌備工作，每天戰戰兢兢，時刻繃緊政治神經，上班後第一項任務就是儘快收集和交換全國最新政治路線鬥爭動向和小道消息，抓緊流覽剛剛收集到一尺多厚的大、小字報，各種紅衛兵小報，悄悄用電話打探“動態”，在小範圍內分析(多數情況下是揣測)政治風向。如中央領導成員中究竟哪個是“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哪個剛剛“靠邊站”了，哪個又“懸大乎”了，等等。生怕由於耳目閉塞展出了不該展出的內容，會吃不了兜著走。一次。一位神情嚴肅的觀眾指著展板上集體照片中一個白髮蒼蒼的人像怒氣衝天地指責我們：“你們好大膽子，膽敢把劉少奇的照片展出！”幸虧我們事先“過完粗羅過細羅”，對包含上百人甚至幾百人的集體照片都逐個反復審核，心平氣和地告訴他，那張照片中的白髮長者是劉甯一同志而不是劉少奇，才避免了一場重大“政治事件”。

此外，我們還要竭力防止在北京展覽館出現的武鬥和各種不測事件。如由戰友文工團等單位“造反派”參加的、轟動一時的“北展劇場武鬥”事件。就發生在我們展覽會展出期間。

大飽“眼福”

為加深對“紅衛兵破四舊”運動的理解，特別是抄家的實際情況，我們開始了大規模的調查研究。由於頭戴“林辦”“光環”，身穿解放軍軍裝，有紅衛兵保駕，又配有部隊汽車，我們可以自由自在地四處活動，出入各抄家倉庫，如入無人之境。隨意觀看抄家實物，毫無顧忌地瞭解抄家情況，收集一切可供展出的

資料和展品。那個時期，我們在數以百計的大專院校和基層單位看到了不少堆集如山的抄家“戰果”。如在北京大學、人民大學看到被查抄的馮友蘭、翦伯贊、尚鉞等人的書籍(其中大量是古籍線裝書和文物古董)、帶有所謂“封資修”性質的私人用品；著名歷史學家尚鉞收藏和使用的幾十把扇子也成了修正主義“罪證”。在文聯看到從著名作家田漢、老舍、蕭軍、駱賓基、端木蕻良以及從著名京劇演員馬連良、荀慧生、白芸生家中抄出的字畫和藝術品等等。

當時，一些重大抄家事件大都能反映到展覽會中來了。在接下去的調查中，我們逐漸發現，許多所謂“抄家”大案要案，要麼是誇張事實，要麼就是捕風捉影。一次，聽到當年參與殺害李大釗的一名兇手被群眾揭發並抄了家，我便立即找到居委會“造反派”深入瞭解情況，結果發現這些群情激昂的“造反派”只是聽說院內一戶主人解放前曾在第一監獄當過偽員警，現正被群眾揪鬥。就穿鑿附會、添枝加葉地認為他曾參與殺害了李大釗。但我粗略估算，李大釗遇難時此人只有七八歲。“造反派”連他當獄警的具體時間職務都沒有搞清楚，所謂參加殺害李大釗的罪行，純粹是無中生有的揣測。還有個“造反派”揭發的綽號“小臺灣”的“反革命”大院，據說裏面還曾有國民黨“黨支部”和特務活動。結果一瞭解，“造反派”只聽說這院一戶人家有本解放前的舊畫冊，其中有光復臺灣的畫頁而已。像這種捕風捉影、令人啼笑皆非的事件屢有發生。

在籌備工作中的一大收穫是觀看了大量“紅衛兵”抄家、批鬥的原始記錄片。記得前後大約連續看了一個星期，每天上下午都連續觀看好幾個小時，由於畫面內容千篇一律，到後來也見怪不怪了，一天下來，看得人頭昏腦漲的。

記錄片中印象最深的是紅衛兵查抄位於東城區的原“聖瑪麗婭·方濟格修女院”的全過程。這座修道院是當時外國人在華僅存的一座基督教修道院，實際上

是供駐華大使館子女上學的一座教會學校。因為在抄家中查抄出所使用的外語課文中有有損我國國家政治聲譽的文字，並查出“間諜”證據，這家修道院的多位外國修女被勒令站在院子裏接受批鬥。後經有關部門確認，以“間諜”罪行驅逐出境。時任外交部副部長的韓念龍在審查這一展覽內容時，明確地告知我們：對像這種涉及“間諜”行為的人，在掌握了真憑實據之後驅逐出境。在法理上是站得住腳的。有關國家及其駐華使館也未提出任何抗議。只是請求我們以人道主義精神，對這些人予以適當照顧。當時的外國報紙也公開承認，“紅衛兵對她們沒有過激行為”。

“耀眼”的歷史縮影

“首都紅衛兵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抄家戰果展覽會”成了這一時期最為耀眼的歷史縮影。

這個幾乎佔據了北京展覽館全部展廳的大型展覽會共分為 4 個展館：第一館，“紅衛兵運動的蓬勃興起”；第二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第三館，“紅衛兵抄家戰果”；第四館，“紅衛兵運動震動了全世界”。其中，第一館和第二館分別展出了紅衛兵運動的發生、發展和所謂“破四舊”運動的“輝煌成績”。在展廳的顯著位置展出了聶元梓等人所寫的那張大字報和毛主席的《我的第一張大字報》，以及批判鄧拓、吳晗、廖沫沙“三家村”和《海端罷官》等材料，並展出了清華附中等大中院校紅衛兵運動的興起和發展的過程，對紅衛兵“破四舊”的行為極力美化。但這些司空見慣的泛泛宣傳並沒有什麼新鮮內容，也引不起觀眾多大興趣。

展覽會最為引人注目的是第三館“紅衛兵抄家戰果”，那裏展出了大量珍貴的抄家物品，如珠寶珍玩、古董文物、玉石翡翠，各式各樣的鑽石、寶石飾品以

及其他奇珍異寶。我父親在解放前曾從事過珠寶古董業，他 3 次來“紅衛兵抄家戰果館”參觀，曾不無感慨地說：可不得了！都是些貨真價實的一流珠寶啊。有好多寶貝只聽說過，沒見到過實物，這回可算大開眼界了。其實，當時在這個館裏，可以說一般金銀珠寶已經不足為奇了，不少展品的價值是無法估量的，有的金銀珠寶背後則隱藏著十分驚人的內幕和故事。

如該館展出了 1958 年成立的北京原“私立志仁博物館”的照片和部分文物，這家博物館在當時的中國可以說是絕無僅有的，而且是藏品水準相當高的一家私人博物館。據該館主人稱，其館內曾收藏各類古陶瓷文物 300 餘件，其中相當於國寶級的一級文物 30 餘件，二級文物 50 餘件，其他文物也均有較高收藏價值，可以說是文革抄家物品中古董文物的“超級大戶”。

抄家展品中，有 4 件一套宋代鈞窯“洗子”。每只直徑 30 公分左右，由外貿部派專人每天專車送展，當晚撤回。我假裝外行說這幾隻破“碗”連吃飯都不方便，幹嘛看得這麼緊。負責看護寸步不離的一位長者驚得目瞪口呆，反問我，你猜猜這 4 件“鈞窯”能值多少錢。我說撐死了也就兩三千塊吧。他把嘴一撇，指著洗子底部尚未完全消除的“東”字一角，神秘地說：我告訴你吧，這原本是清宮東宮的珍藏，是國家一級國寶，現在到香港市場至少能賣人民幣 100 萬！能買 88 輛“解放牌”大卡車（多年後在香港拍出 4000 萬港元的一串翡翠項鍊，在當時出口售價僅 40 萬元）。

宣武區“丞相胡同”原來住有 6 家“丞相”級的人物，他們在抄家中無一倖免。其中僅在抄出物品最多的一家“丞相府”中，“紅衛兵”抄走的文物古董、明清傢俱等各類物品就裝滿 17 輛解放牌卡車，僅古籍就足足裝滿 3 卡車。據說，這家人是歷史罕見的京城顯族，其祖上僅在明、清兩代就均有人做過兵部尚書，

還有人當過駐俄羅斯大使等高官。遠的不說，八國聯軍侵入北京時，其家門口因懸掛德國國旗而未遭劫掠。日本侵佔北平，因駐華司令官久聞其名，千方百計進行拉攏，而未受騷擾。解放後，其家庭要員又是彭真市長的座上客，曾應邀登上天安門參加國慶日（這也成了彭真文革中一大罪狀）。在其家中曾抄出三眼頂戴花翎和本應由清朝政府保存的中印邊界走向定位重要地圖（這張地圖上清楚地標明根本沒有英國殖民者強加的所謂“麥克馬洪線”）副本。據說當年中央檔案館只有記錄，但未找到原件。周總理 1958 年號召民主人士捐獻文物古董以支持國家博物館事業，還特別提到有關中印邊界地圖等資料。事後多年，當我和著名文物專家史樹青提及此事時，他十分惋惜地說：這家人我知道，在京城。像這樣一個能一直延續 600 年而未遭破壞的大家庭，本身就是奇跡，它的每件歷史遺物都有十分可貴的歷史價值，可惜這個系統的家族史料遺存在文革中被破壞了，實在太可惜了，否則我們可以從中找到許多重要歷史資料和有價值的文物。

與中央文革領導小組成員意外會面

經過半年多艱苦奮戰，到 1967 年春末夏初，籌備工作總算有了點模樣。但展覽中有些重大問題卻久久爭執不下，仍然難以定論。況且。這個觸動文革政治神經的大型展覽，畢竟觸及到國內外特別是兄弟黨之間方方面面的尖端問題，其中有些問題會牽一髮而動全身，是非同小可的大事情，要想公開展出，非要請“最高權威”過目並拍板定案不可。在紅衛兵小將和其他領導同志一再請求下，突然傳來一個驚天動地的特大“喜訊”：中央文革領導小組成員將要集體接見“紅衛兵抄家戰果展覽會”的主要領導成員，幫助解答有關問題。

那天下午，我們按要求提前吃過晚飯就在展覽大廳整齊列隊集合，耐心等待。晚上 7 點多鐘，終於把中央文革領導小組成員等來了，只見陳伯達帶隊。江

青、張春橋、康生、姚文元、王力、關鋒、戚本禹等一齊走進會客大廳。與此同時。聞名全國的聶元梓、蒯大富、譚厚蘭等一批首都紅衛兵領軍人物也一齊到達，等待接見。

但當時領導宣佈：中央文革領導小組成員只能在此逗留一個小時，並宣佈規定：首長只在會客廳內直接接見展覽會主要領導成員(各館只能有兩名“館長”參加)和上述幾個紅衛兵“頭頭”，其他人員一律在大廳原地“迎候首長檢閱”。在我認為無權進入主會客廳的時候，館領導突然叫到我的名字，讓我做好直接與中央文革領導小組成員見面的準備。這使我頗感意外，我連忙擠到前列，進入了警衛森嚴的會客大廳。

原來，我所在的第四館“紅衛兵運動震動了全世界”館，在布展中是遇到“尖端”問題最多的一個館，而且許多問題都涉及到我黨與兄弟黨之間對“文化大革命”的不同看法。這在當時許多重要領導都“靠邊站”、很難找到主要領導敢於正面解答且保密性極強的情況下。是極難得的一次“請示”機會。恰巧那天晚上，我們第四館主管業務的紅衛兵小將因從未接觸過如此重大場面，高度緊張，轉瞬之間竟把該問的問題全都忘得一乾二淨，急得直跺腳，還掉下了眼淚，這才給我創造了一個難得的見面“機會”。

進入會客大廳，只見一片燈火輝煌，在新聞電影製片人員耀眼的強光燈照耀下，中央文革領導小組成員們個個臉上泛著罕見的紅光，一副春風得意的神態，頤指氣使，與到場紅衛兵小將和其他館領導侃侃而談。給我印象最深的是“首長們”保健極為出色，個個容光煥發，面色紅潤，神采奕奕，除康生之外，幾乎每位“首長”臉上連一條皺紋都見不到。即使是康生也是一副“童顏鶴髮”的神態。特別是最後進來的江青，時年已近 60 歲，但紅光滿面，臉上找不到一條皺

紋。為驗證我的視力，我當時特地把到場的、血氣方剛的、經常游泳的紅衛兵小將與“首長”面色作了近距離對比，可以說沒有一個紅衛兵的臉色能與“首長們”相比的。

我趕緊主動向江青提出有關展覽中十分敏感的涉外問題：一是如何處理兄弟黨對“文化大革命”的不同看法問題。據有關方面提供的“內部消息”，當時在報紙宣傳與我黨關係親密無間如越南等“同志加兄弟”國家的共產黨，就對文革始終不公開表態。如果展覽一點不反映。與報紙宣傳反差太大，擔心觀眾會引起疑問；其次是當時《參考消息》上刊登過一些照片，反映一些國家如澳大利亞、荷蘭等西方國家也出現了少數“紅衛兵”，他們也手拿“小紅書”，戴著與我們相同的紅色臂章，有的還聲稱要“造反”。對這方面問題不知如何處理。

江青雖然身居高位，但顯然也不敢對此隨意表態，只哼哼哈哈地吹了幾句牛，說：“是啊，我們的紅衛兵運動是了不起啊，各國反動派都害怕呀……”並說了些文不對題的原則話，最後見實在推脫不了，只好推說：“你們去找康生同志吧，康老是這方面的專家。”康生也沒有當場回答我的具體問題，只原則地說：“你們可以找中聯部的同志嘛，請他們幫助解答。他們有責任解答這方面的問題。”儘管有關隨行人員一再催促，中央文革領導小組成員的接見用了將近兩個小時，大大超出了原來的安排。

深夜，當我們將上述情況和康生的“指示”電話通知中聯部有關同志後，他們立即回電話，讓我們立即再次把中央文革領導小組成員的指示逐字逐句轉達給他們，並立即召開了部長聯席會議。一再囑咐我們，第二天一早一定帶著中央文革領導小組成員接見時的所作指示的原始記錄文字材料去中聯部，共同研究如何落實首長指示。我只好又熬了好幾個小時，整理記錄文字。

“紅衛兵抄家戰果展覽會”展出了將近兩年，於1969年初宣告結束，我是從始至終的參加者之一。這是迄今為止，我所參加的一次極為特殊的展覽會。從世界範圍來說，也是極為罕見的。

錄自《文史精華》2008 第一期，作者：丁大華，原題為《世所罕見的紅衛兵抄家成果展覽會》

附：全國著名文物

1. 炎帝陵主殿被焚，陵墓被挖，焚骨揚灰。
2. 造字者倉頡的墓園被毀，改造成了“烈士陵園”。
3. 山西舜帝陵被毀，墓塚掛上了大喇叭。
4. 浙江紹興會稽山的大禹廟被拆毀，高大的大禹塑像被砸爛，頭顱齊頸部截斷，放在平板車上遊街示眾。
5. 世界佛教第一至寶，佛祖釋尊在世時親自開光的三聖像之一八歲等身像被搗毀面目。
6. 孔子的墳墓被鏟平，挖掘，“大成至聖先師文宣王”的大碑被砸得粉碎！廟碑被砸碎了，孔廟中的泥胎塑像被搗毀。孔老二的七十六代孫令貽的墳墓被掘開。
7. 和縣烏江畔項羽的霸王廟、虞姬廟和虞姬墓。香火延續兩千年至今日，“橫掃”之後，廟、墓皆被砸成一片廢墟。文革後去霸王廟的憑弔者，見到的只是半埋在二裏半露在地上的石獅子。
8. 在橫掃一切的風暴中，霍去病的霍陵也遭了殃。香燭、籤筒被打爛之外，

霍去病的塑像也毀於一旦。

9· 頤和園佛香閣被砸，大佛被毀。

10· 王陽明文廟和王文成公祠兩組建築包括王陽明的塑像，全部在文革被平毀無遺。

11· 古城太原的新任市委書記三把火，第一把是砸廟宇。全市一百九十處廟宇古跡，除十幾處可保留外，通通毀掉。他一聲令下，一百多處古跡在一天之內全部毀掉。山西省博物館館長聞訊趕到芳林寺，只撿回一包泥塑人頭。

12· 醫聖張仲景的塑像被搗毀，墓亭、石碑被砸爛，“張仲景紀念館”的展覽品也被洗劫一空。“醫聖祠”已不復存在。

13· 河南南陽諸葛亮的“諸葛草廬”（又名武侯祠）。的“千古人龍”、“漢昭烈皇帝三顧處”、“文韜武略”三道石坊及人物塑像、祠存明成化年間塑造的十八尊琉璃羅漢全部搗毀，殿宇飾物砸掉，珍藏的清康熙《龍崗志》、《忠武志》木刻文版焚燒。

14· 漢中勉縣“古定軍山”石碑，也因諸葛亮是個“地主份子”而被砸毀。

15· 書聖王羲之的陵墓及占地二十畝的金庭觀幾乎全部平毀，祇剩下右軍祠前幾株千年古柏陪伴書聖失去了居所的亡魂。

16· 文成公主當年親自主持塑造松贊幹布和文成公主二人的塑像，安放覺拉寺。被搗毀。

17· 合肥人代代保護、年年祭掃的“包青天”墓，也毀於一旦。

18· 河南湯陰縣中學生將嶽飛等人的塑像、銅像，秦檜等“五奸黨”的鐵跪像，連同歷代傳下的碑刻“橫掃”殆盡。

19 · 杭州革命青年砸了岳廟，連嶽飛的墳也刨了個底朝天。岳武穆被焚骨揚灰。

20 · 阿拉騰甘得利草原上的成吉思汗陵園被砸了個稀爛。

21 · 朱元璋巨大的皇陵石碑被拉倒；石人石馬被炸藥炸得缺胳膊少腿；皇城也拆得一乾二淨。

22 · 海南島的天涯海角，明代名臣海瑞的墳被砸掉，一代清官的遺骨被挖出遊街示眾。

23 · 湖北江陵名相張居正的墓被紅衛兵砸毀。焚骨。

24 · 北京城內的袁崇煥的墳被夷成了平地。

25 · 黎平故里安葬的是明末名臣何騰蛟，他的祠堂中的佛像被掃了個一乾二淨，而且把黎平人最引以為榮的何騰蛟的墓給挖了。

26 · 吳承恩的故居在江蘇淮安縣河下鎮打銅巷。他的故居不大，三進院落，南為客廳，中為書齋，北為臥室。幾百年來，曾有無數景仰他的人來此憑弔此故居和他的墓。可是現在《西遊記》成為“封、資、修”（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修正主義）裏的“封”，吳氏故居也就“被毀為一片廢墟”。

27 · 紅衛兵掘開蒲松齡的墳，教書匠蒲松齡真窮，墓裏除了手中一管旱煙筒、頭下一迭書外，只有四枚私章。他們對蒲氏私章不屑一顧，棄之於野。屍體被搗毀。

28 · 建於一九五九年的吳敬梓紀念館在文革中被鏟平。

29 · 山東冠縣中學紅衛兵在老師帶領下，砸開千古義丐武訓的墓，掘出其遺骨，抬去遊街，當眾批判後焚燒成灰

30· 張之洞的墳被刨開。張是個清官，墓裏沒一點珍寶，紅衛兵將張氏夫婦尚未腐爛的屍體吊在樹上。張氏後人不敢收屍，任屍體吊在樹上月餘，直到被狗吃掉。

31· 北京郊區的恩濟莊埋有同治、光緒兩朝的宮廷大總管李蓮英的墓，鑿開的墓穴裏，只有頭骨，不見屍骸，衣袍內滿是珠寶，後不知所蹤。

32· 河南安陽縣明趙簡王朱高燧的墓被挖毀。

33· 黑龍江黑河縣有座“將軍墳”，“因為屬於“帝王將相”，也遭到嚴重的破壞。

34· 宋代詩人林和靖(967—1028)的墓也在被毀之列。

35· 清末章太炎、徐錫麟、秋瑾，乃至“楊乃武與小白菜”冤案中的楊乃武的墓，都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口號聲中作了犧牲。

36· 一位年輕的中學老師領著一幫初中生以“讓保皇派頭子出來示眾”為由，刨開康氏墓，將他的遺骨拴上繩子拖著遊街示眾。革命小將們一邊拖著骨頭遊街一邊還鞭撻那骨頭，好象相信康氏靈魂附著在骨頭上似的。游完街，康氏的頭顱被送進“青島市造反有理展覽會”，標籤上寫道：“中國最大的保皇派康有為的狗頭”。

37· 浙江奉化縣溪口鎮蔣介石舊居，蔣氏生母的墓被上海的大學生領導的寧波中學生掘開，其遺骸和墓碑都被丟進了樹林。

38· 南漳縣為抗日名將張自忠建造的張公祠、張氏衣冠塚和三個紀念亭均被破壞。

39· 楊虎城將軍，雖被國民黨處決，仍是紅衛兵眼中的“國民黨反動派”，墓及墓碑都砸毀。

40· 新疆吐魯番附近火焰山上的千佛洞的壁畫，曾被俄、英、德等貪婪商人盜割，賣到西方。但那運到國外的壁畫畢竟被博物館珍藏，並未毀掉。而中國人自己幹的“破四舊”卻重在一個“破”字：將剩下的壁畫中的人物的眼睛挖空，或乾脆將壁畫用黃泥水塗抹，存心讓那些壁畫成為廢物。

41· 山西運城博物館原是關帝廟。因運城是關羽的出生地，歷代修葺保養得特別完好。門前那對高達六米的石獅子可能是全國最大的。如今，那對獅子被砸得肢體斷裂，面目全非；母獅身上的五隻幼獅都砸成了碎石塊。

42· 安徽霍邱縣文廟，雕樑畫棟、飛簷翹角，龍、虎、獅、象、鼉等粉彩浮雕皆為精美的工藝美術品。“房飾浮雕在文化大革命中統被砸毀。”文革後省、縣撥款數萬修葺，“尚未完全復原。”山東萊陽文廟，“大成殿雕樑畫棟、飛簷斗拱，氣勢雄偉……文化大革命期間，大成殿被拆除。”全國四大孔廟之一的吉林市文廟，“破四舊”中嚴重受損，荒廢多年，文革後歷時五年方修復。

43· 唐代高僧褒禪結廬安徽含山縣花山，死後弟子改山名為褒禪山。宋王安石遊覽此山，作《遊褒禪山記》後，褒禪山遂名揚四海。因是“四舊”，褒禪山大小二塔被炸毀。

44· 全國最大的道教聖地老子講經台及周圍近百座道館被毀。

45· 宋代大文豪歐陽修的《醉翁亭記》經另一宋代大家蘇東坡手書，刻石立碑於安徽滁縣琅琊山腳當初歐陽修作文的醉翁亭，至今已近千年。前去革命的小將不僅將碑砸倒，還認真地將碑上的蘇氏字跡鑿去了近一半。醉翁亭旁堂內珍藏的歷代名家字畫更被搜劫一空，從此無人知其下落。

第五節 紅衛兵怎樣破“四舊”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百萬群眾慶祝大會在北京天安門廣場隆重舉行。毛澤東第一次接見紅衛兵。“八·一八”大會是文化大革命運動發展的一個重要轉捩點。會後，出現了兩個重大變化：一個重大變化是：紅衛兵開始沖出校園，走上街頭，聲勢浩大地開展所謂“向一切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發動了猛烈攻擊”的“破四舊”活動，把“革命造反”迅速擴展到全社會。這些紅衛兵中的大多數人，充滿熱情，認為自己所做的都是正當的“革命行動”。但他們政治上很幼稚，處於狂熱狀態，政策和法制觀念十分淡薄，參加行動的人員又比較複雜，無政府主義思潮在他們中間迅速氾濫起來，做出許多荒唐的舉動。他們到處發佈通令，把許多傳統的有影響的路名、商店名、醫院名等斥為“封、資、修”而改換成有著濃厚政治色彩的新名稱，在街上強行剪發，剪破他們認為的“奇裝異服”，在“破四舊”的名義下沖入居民住處抄家。更令人痛心的是很多處發生嚴重破壞法制、任意打人致死事件。一些著名知識份子如老舍、傅雷因受到人格侮辱而自殺。不少人被強行遣送回鄉。黨政機關的各部門幾乎都因派出過工作組而遭到紅衛兵的猛烈衝擊，許多負責人被野蠻地揪鬥和毒打。

下面選錄了部分新華社當年的通訊報導及部分紅衛兵的“破四舊”的宣言、通告，可以讓你想像出當年社會的亂象。

一、上海天津革命小將和商業職工向剝削階級

“四舊”發動總攻揮起革命鐵掃帚 橫掃一切舊習俗

新華社訊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五日

新華社訊：許多帶有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修正主義腐朽氣息的商店字型大小和服務行業的陳規陋習全被掃除，革命群眾熱烈歡呼：毛主席萬歲！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

新華社上海二十四日電 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激流中勇猛前進的上海，又掀起了新的革命熱潮。二十三日從清晨到深夜，成千上萬支紅衛兵和革命師生組成的宣傳小隊，抬著毛主席巨幅畫像，高舉“我們是舊世界的批判者”、“我們是新世界的創造者”的大型橫幅，走上街頭，擂戰鼓，唱戰歌，到處演出宣傳，散發革命傳單，張貼革命大字報，向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發動總攻擊，為創立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開闢廣闊的道路。

廣大商業職工，熱烈支持革命小將這一革命行動，他們互相鼓舞，共同戰鬥，一起改革帶有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修正主義腐朽氣息的商店字型大小和服務行業殘存的陳規陋習。職工們堅決表示，絕不再讓這些腐朽的東西繼續毒化人們的靈魂，一定要把上海改造成為非常無產階級化、非常革命化的城市。

上海是資產階級最集中的城市，又長期遭受帝國主義和國內反動派的統治。解放以來，上海人民在黨的領導下，一次又一次向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意識形態猛烈進攻，經過多次移風易俗的群眾運動，改革許多帶有買辦氣味和資本主義、封建主義色彩的街道、里弄、商店、建築物等的名稱。今天，無數紅衛兵戰士和廣大革命職工又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激流中，向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意識形態發動了總攻擊。

著名的南京路，是無數革命先輩曾經流血鬥爭過的地方，今天，革命小將和廣大職工接過先輩的革命大旗，在這裏匯成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他們說：今天我們要在這裏徹底鬧革命，用我們的鐵掃帚徹底掃除資產階級的“香

風”、臭氣！在上海最大的百貨商店之一的永安公司的櫥窗上，張貼了許多由紅衛兵和這個商店的職工寫的大字報，建議改名為“永紅”、“永鬥”、“紅衛”等。他們指出：“永安”是舊社會大老闆企圖永遠安安穩穩剝削勞動人民而定的名。有了資產階級的“永安”，就沒有我們無產階級的鐵打江山！這個商店早已成了人民的商店，今天我們決不允許“永安”這個臭招牌繼續掛下去！

在具有五十年歷史的上海最大的遊樂場所——大世界，職工們和紅衛兵一起，在人們的歡呼聲中，拉下了幾米高的“大世界”這塊舊招牌。解放前，在“大世界”這塊罪惡的招牌下麵，上海的大資本家大流氓不知搜刮了多少民脂民膏，不知腐蝕了多少人的靈魂。今天，當職工們把最後一個“界”字拉下地的時候，在馬路上，在附近大樓的視窗裏，在路過的公共汽車中，數千革命群眾立即爆發出雷鳴般的歡呼聲：“毛主席萬歲！”“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

那些以資本家個人名字命名的商店字型大小，什麼“徐重道”、“雷允上”、“邵萬生”、“吳良材”等等，也受到了革命小將和職工們的猛烈衝擊，換上了有著革命意義的店名。

上海《新民晚報》接受廣大革命群眾的建議，從二十三日起改名為《上海晚報》。報社的革命職工一致表示：要更高地舉起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為辦好社會主義報紙而奮鬥。

瀕臨黃浦江的外灘，解放前是帝國主義掠奪中國人民的罪惡活動中心。這裏的一些高樓大廈上，還遺留著一些帶有帝國主義色彩的殘跡。紅衛兵和革命職工在這裏大鬧革命，他們搬掉了帝國主義者安置在大廈門前的銅獅子，剷除了牆壁上的洋標誌。

紅衛兵和廣大革命職工匯成的革命洪流，猛烈地衝擊著一切資本主義、封建主義的陳規陋習。理髮店的革命職工提出了革命性的措施：徹底消滅一切“阿飛式”、港式的頭髮式樣，立即取消專門為資產階級服務的專案，如剪指甲、美容、摩面等。在一些原來只供應少數人需要的商品的商店，職工們也作出了革命性的決議：從二十四日開始供應價廉物美的大眾化商品，更好地為工農兵群眾服務。他們表示，要大破資本主義經營思想，大立社會主義經營思想，決不把自己的商店辦成為資產階級服務的“名店”，一定要把商業和服務行業辦成毛澤東思想的大學校。

二、新華社天津二十四日電 天津市紅衛兵，在首都紅衛兵小將們的革命造反精神鼓舞下，掄起千鈞棒，舉起鐵掃帚，鬥志昂揚地走上街頭，橫掃一切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的灰塵。

二十三日，在天津市的許多街道上充滿了革命的氣氛。紅衛兵們敲鑼打鼓，到處張貼大字報、標語，集會演說，熱情地向職工、居民提出更改舊商店字型大小和街道里弄名稱的革命倡議。他們說，在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一定要徹底破“四舊”，堅決地用無產階級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來改變天津市的面貌，讓天津市換上嶄新的社會主義新裝。

紅衛兵的大無畏的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得到了全市革命職工最熱烈、最堅決的支持。在天津市商業中心區——濱江道一帶，整日鑼鼓喧天，鞭炮齊鳴，許許多多商店拔去了舊字型大小，換上了具有革命意義的新名稱。中原公司的革命職工熱情地貼出決心書，設立接待站，徵求紅衛兵和廣大革命群眾對更改名稱的意見，最後在革命群眾的建議下，決定改名為“工農兵商場”。天津市最大的商場——勸業場的革命職工，在紅衛兵革命精神的鼓舞下，掄起鐵榔頭，砸碎

了嵌在牆上達三十八年之久的“勸業場”三個字，換上了“人民商場”的新名稱。全場革命職工舉行慶祝集會，熱烈歡呼“人民商場”的誕生。他們說，“勸業場”是惡霸豪紳在帝國主義和封建官僚買辦資產階級的扶助下開辦的，解放前，它是遠近聞名的剝削勞動人民的“老虎攤”，今天，我們把它改為“人民商場”，這是天大的喜事，我們一定要更好地為人民服務，把“人民商場”辦得好上加好。這時聚集在商場周圍數以千計的人民群眾，齊聲高呼：毛主席萬歲！萬萬歲！具有四十五年歷史的北洋紗廠革命職工二十三日晚集會，一致決議把在北洋軍閥時代建立的北洋紗廠，改名為“四新”紗廠，以表達全廠革命職工破舊立新的革命決心。他們還把工廠原來的“金三鼎”棉紗商標，改為“工農”牌商標。

三 支持“紅衛兵”小將的革命造反精神

人民日報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

新華社電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浪潮席捲首都街道，紅衛兵猛烈衝擊資產階級的風俗習慣，廣大革命群眾最熱烈最堅決地支持“紅衛兵”小將的革命造反精神

新華社二十二日訊，八月二十日以來，首都“紅衛兵”紛紛走上街頭，到處張貼革命傳單和大字報，到處集會演說，向一切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發動了猛烈攻擊。一些帶有封建主義、資本主義和修正主義思想色彩的商店字型大小，在他們的宣傳、幫助下，已經更換為具有革命意義的名稱。他們向各學校革命師生倡議，迅速改掉一些毫無政治意義的學校名稱。他們還向廣大服務行業的革命職工倡議，決不再給某些顧客理怪發、做奇裝異服、出售和出租黃色書

刊。他們要把北京徹底改造成為一個非常無產階級化、非常革命化的北京。“紅衛兵”的造反精神和革命行動，得到了廣大革命師生、革命職工和街道居民的最熱烈、最堅決的支持。

北京第二中學的“紅衛兵”在市內主要街道的牆頭上，貼出充滿革命豪情的向舊世界的宣戰書。宣戰書說：現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洪流，正在衝擊著資產階級的各個陣地。資產階級的溫床保不住了。“飛機頭”、“螺旋寶塔式”等稀奇古怪的髮型、“牛仔褲”、“牛仔衫”和各式各樣的港式衣裙，以及黃色照片書刊，正在受到嚴重的譴責。我們不要小看這些問題，資產階級的復辟的大門，正是從這些地方打開的。過去十七年來，前北京市委對這些事情聽而不聞，視而不見，甚至禁止改革。他們走的是修正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路。我們和他們是兩條路上的人。他們不管，我們要管，還要管到底。我們一定要堵住一切鑽向資本主義的孔道，砸碎一切培育修正主義的溫床，決不留情。

“紅衛兵”們指出，北京是社會主義中國的首都，是無產階級革命的中心，大街上怎能容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資產階級留下的臭名字！他們在廣大市民的熱烈支持下，倡議把“長安街”改為“東方紅大路”，把解放前禁止勞動人民通行的使館區“東交民巷”改為“反帝路”，把“西交民巷”改為“反修路”，把王府井大街改為“防修路”，把越南民主共和國大使館所在地“光華路”改為“援越路”。在“紅衛兵”革命精神的鼓舞下，王府井百貨大樓的革命職工，搬掉了門上“王府井”三個大字，改名為“北京市百貨商店”。“東安市場”被改為“東風市場”。美帝國主義侵略者命名的“協和醫院”被改為“反帝醫院”。“同仁醫院”被改為“工農兵醫院”。

“全聚德”烤鴨店的革命職工在北京二中、十五中、六十三中“紅衛兵”的鼓舞下起來鬧革命，砸掉掛了七十多年的“全聚德”三個字，正式換上了“北京烤鴨店”的新招牌。在“全聚德”工作多年的老工人們激動地說，“全聚德”三個字是資本家剝削勞動人民的血汗鑄成的。我們砸毀它，是決心徹底搗爛資本主義剝削制度的殘餘，是徹底掃除資產階級遺留下來的陋規習俗。

“亨得利鐘錶店”的革命職工們，在一九六四年以來曾經兩次提出改掉老字型大小的要求，但由於前北京市委阻撓，一直沒有實現。現在，職工們在“紅衛兵”的鼓舞下，經過集體討論，已改名為“首都鐘錶店”。

二十日晚上，當“紅衛兵”把沿用資本家命名的“徐順昌服裝店”改名為“東風服裝店”時，街道上頓時響起一片掌聲，人們齊聲高呼：“毛主席萬歲！”
“東風壓倒西風！”

在“榮寶齋”的玻璃廚窗裏，掛著中央美術學院附中“紅衛兵”送的一張大字報。這張大字報說：“榮寶齋是個黑畫店，幾十年來盤剝勞動人民的血汗，為資產階級小姐少爺太太老爺服務，為封建地主闊老闆少服務，為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服務。（(1)(2)）一句話，就是不為社會主義服務，不為工農兵服務。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黑幫頭子鄧拓就是你們的大老闆，老主顧！黑畫家‘驢販子’黃胄也是你們的後臺，你們這裏已經成了黑幫畫家的交易所了。我們就是要將榮寶齋打個身敗名裂！！”

“紅衛兵”的革命行動，幾天來得到了理髮館、成衣店、浴室等服務行業革命職工的熱烈響應。他們紛紛開座談會，寫決心書，發表聲明。東城區百貨管理處的一位幹部說：早在一年半前，我們許多商店的革命職工就提出要剷除掉過去

遺留下來的資本家的舊字型大小，但是前北京市委不讓我們改換。這次首都的“紅衛兵”們幹得好，我們表示熱烈支持。

“衛東服裝店”（原“藍天時裝店”）全體革命職工在給“紅衛兵”的一封信上說：我們堅決回應你們的革命的倡議，我們完全同意北京二中等“紅衛兵”關於反對做港式服裝和奇裝異服的革命行動，保證以後不加工不出售港式服裝和奇裝異服。讓我們攜起手來，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推進到一個更廣泛、更深入的新階段。有些服裝店的門上，還貼上了充滿革命激情的對聯：

“革命服裝大做特做快做，奇裝異服大滅特滅快滅。”

橫額是：“興無滅資”。

四、新華社八月二十五日訊 首都紅衛兵小將的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強烈地鼓舞著各地紅衛兵和廣大革命群眾，他們燃起了橫掃資產階級、封建階級等反動腐朽勢力和一切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的燎原烈火。“讓毛澤東思想佔領一切陣地，用毛澤東思想改變整個社會的精神面貌，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搬掉一切絆腳石，堅決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這就是革命小將和廣大革命群眾的戰鬥目標。

據來自各地的消息，連日來，許多城市的紅衛兵和革命師生，高舉著毛主席巨幅畫像、毛主席語錄和“我們是舊世界的批判者，我們是新世界的建設者”的大幅標語，紛紛走上街頭，敲鑼打鼓，集會演講，貼革命大字報，散發革命傳單，向資產階級反動勢力，向一切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發動了總攻擊。

“金猴奮起千鈞棒，玉宇澄清萬裏埃。”在這個史無前例的群眾性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浪潮的衝擊下，短短幾天之內，各地許多帶有封建主義、資本主義、

修正主義思想色彩的舊店名、舊街名就被迅速扔進垃圾堆，資產階級腐朽的生活方式和許多陳規陋習被打得落花流水。一批批閃爍著毛澤東思想光輝和革命精神的新店名、新街名、新校名誕生了，許多符合廣大工農兵利益的革命措施開始實行。資產階級威風掃地，革命群眾揚眉吐氣。到處是熱氣騰騰的革命景象，到處是不可阻擋的革命洪流。“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萬歲！”“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戰無不勝的偉大的毛澤東思想萬歲！”“偉大導師、偉大領袖、偉大統帥、偉大舵手毛主席萬歲！萬萬歲！”的歡呼聲響徹祖國各地。

杭州、廣州、武漢、長沙、濟南、南昌、鄭州、合肥、南京、福州等地大、中學校的紅衛兵，在首都紅衛兵革命造反精神的鼓舞下，廣泛開展宣傳活動。在他們的倡議下，杭州市以宋代封建文人蘇東坡的名字命名的東坡劇院、東坡路、西湖蘇堤，都換上了具有革命意義的名稱。六家以“張小泉”這個舊店主的名字作為招牌、並且一直沿用了三百多年的剪刀店，都換上了“杭州剪刀店”新店名。廣州的革命小將們在街道和商店貼出許多大字報和宣戰書。廣州三大酒家之一的“陶陶居”的革命職工，把康有為手書的“陶陶居”三個招牌字鏟掉，換上了自己書寫的新招牌“東風樓”。

在東北地區的哈爾濱、長春、瀋陽，佩戴著紅衛兵袖章的廣大革命師生，到處倡議把帝國主義、資本主義和修正主義強加在我們頭上的舊街名、舊店名統統廢除。隨著帝國主義在我國鋪設中東路而設立的哈爾濱“秋林商店”，已經改名。

在成都、南寧、貴陽等地，革命學生們抬著毛主席的巨幅畫像，敲鑼打鼓，沿途張貼“向舊世界開火的檄文”，倡議革命群眾向一切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宣戰。四川大學革命學生宣傳隊表示要堅決砸碎黑招牌，踢開絆腳石，讓古老的成都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中煥然一新！昆明市近日公園百貨商

店的革命職工聽到首都紅衛兵革命精神的廣播以後，紛紛議論：“近日公園”這個名稱來源於封建朝代的“近日樓”，應立即改革。這個商店的團總支書記、曾經和匪徒搏鬥而失去雙手的女英雄徐學惠說：我們不但要改革帶有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修正主義色彩的商店名稱，而且要把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修正主義的思想連根挖掉。

河北省、山西省革命小將和廣大職工破“四舊”、立“四新”的活動正在繼續擴展。開灤煤礦的廣大革命職工提出堅決砸爛帝國主義遺留下的“開灤”煤礦的舊牌匾，更換官僚資產階級用來統治工人的舊“工牌”。工人堅決主張改“工牌”為“工作證”。

在呼和浩特、烏魯木齊、銀川、西寧，革命小將在大字報裏寫出了他們徹底革命的決心：“不破舊誓不甘休，不立新死不瞑目，造反有理！”

目前，這個革命浪潮正以洶湧澎湃之勢，滌蕩著一切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的灰塵。廣大革命小將和革命群眾表示：一定要乘勝前進，擴大戰果。一定要打得一切牛鬼蛇神永世不得翻身，一定要剷除資產階級、封建階級的根子和修正主義的溫床，一定要使每條街道、每個行業、每個工廠、人民公社、商店都成為毛澤東思想的大學校，成為宣傳、執行和捍衛毛澤東思想的陣地，保證無產階級的鐵打江山萬代紅！

五、新華社八月二十五日訊 首都和各地紅衛兵的革命造反精神和革命行動，受到廣大工人和貧農、下中農群眾最熱烈最堅決的支持。連日來，許多地方的革命職工和紅衛兵小將一起，並肩戰鬥，以摧枯拉朽之勢，掃蕩著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腐朽遺跡和舊習，共同歡慶破“四舊”立“四新”的重大勝利。

他們互送毛主席語錄、賀信和喜報，相互鼓舞，相互激勵。許多革命職工和貧農、下中農還舉行集會和遊行，熱烈歡呼紅衛兵小將的革命造反，反得對，反得好！

在上海黃埔江兩岸的許多工廠，工人們在工廠的大門口、過道上、車間裏貼出了支持紅衛兵革命行動的大字報，有些工廠還派出代表，上街和革命師生一起橫掃“四舊”。((1)(3))上海工人階級的代表人物楊富珍、姜林根、王林鶴、孟德和、祁志超、程德旺、陳阿發等，一致指出，革命小將們向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發起猛烈的衝擊，大快人心，幹得好！一千個應該！一萬個應該！是一次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滅資興無“大會戰”。

天津市廣大革命職工紛紛貼大字報，寫支援信，決心同紅衛兵小將們一起砸碎舊世界，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天津鐵路工人文化宮的革命職工們，根據革命學生的建議，摘掉了“寧園”的舊牌子，改名“二七”公園，受到革命學生和職工的歡迎。已經改了新名的“正陽春”飯莊革命職工，在紅衛兵的建議和鼓舞下，擴大了受勞動人民歡迎的速食部。

在武漢，廣大革命職工和革命幹部，最熱烈最堅決地支持紅衛兵橫掃“四舊”的革命行動，紛紛起來鬧革命。八十高齡的“二七”老工人、“二七”大罷工的敢死隊隊長張士漢，看到紅衛兵的革命行動，興奮地說：我們當年參加“二七”大罷工，赤手空拳地同反動派鬥爭，什麼都不怕。今天我看到紅衛兵敢闖、敢幹、敢革命、敢造反，非常欽佩。我對我們的後一代完全放心。

重慶鋼鐵公司今天舉行了有一萬多職工參加的廣播大會，熱烈歡呼革命學生敢闖、敢幹、敢革命、敢造反的無產階級革命精神，表示堅決做革命學生的強大後盾。重慶鋼鐵公司副總工程師黃榮昌說：革命學生們響應毛主席的偉大號召，大造資產階級的反，大造帝國主義的反，大造修正主義的反，大造一切牛鬼蛇神

的反，大造一切剝削階級意識形態的反，完全代表了我們工人階級的心願，我們決心大力支持革命學生的革命行動。

在鄭州市，鄭州國棉四廠革命職工一千多人湧向街頭，和紅衛兵們並肩戰鬥，打掉了本廠具有封建主義修正主義色彩的“龍頭鶴舞”大門和露天舞臺上的“嫦娥奔月”。這個廠原來生產的“鳳凰台牌”棉布，已決定改為“工農兵牌”。鄭州紡織機械廠職工還和紅衛兵小將們一起動手搗毀了廠區封建主義的遺物，洗新了廠區和各車間的標語牌，寫上了毛主席語錄和文化大革命的口號。

各地廣大農村的貧下中農，也對紅衛兵們的革命造反行動表示了最熱烈、最堅決的支持。他們說，我們貧下中農受盡了封建主義、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長期欺壓，我們最懂得紅衛兵小將們的革命行動的偉大意義。他們的所作所為，正合我們的心意。英雄劉英俊的母親、貧農社員朱秀蘭說：“革命小將們，你們幹得好！我們貧下中農都支持你們。劉英俊活著的時候，最聽毛主席的話，最痛恨舊社會，他是向‘四舊’開火的衝鋒猛將。舊世界必須打破，新世界一定會建立起來。

連日來，烏魯木齊郊區農村人民公社廣大貧下中農紛紛走上街頭，敲鑼打鼓，高舉標語牌，高呼“毛主席萬歲！萬萬歲！”表示堅決支持小將們的革命行動，破舊立新，徹底打爛舊世界，創造新世界。

昆明郊區官渡區聯盟公社桃源大隊小菜園生產隊的貧下中農社員把“小菜園”的村名改為“革命新村”。全隊六十四戶社員的家裏都貼了嶄新的毛主席像和毛主席語錄。

貴陽市郊區朝陽人民公社的苗族、布依族和漢族的貧下中農社員，紛紛舉行集會，熱烈讚揚紅衛兵破舊立新的革命行動。

拉薩市郊拉魯鄉的翻身農奴，聽到首都紅衛兵小將的革命行動以後，決定改換新鄉名。他們說：西藏是我們翻身農牧民的天下，絕不能再讓叛國頭子拉魯的名字繼續玷污我們的鄉村。

（《人民日報》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八日，人民日報刊登新華社報導：毛主席是我們的最高統帥十六條是我們的行動綱領：紅衛兵和革命群眾認真活學活用黨中央決定

六、新華社八月二十七日訊，全國各地的紅衛兵和廣大工農兵群眾、革命幹部、革命知識份子，正繼續以雷霆萬鈞之勢向一切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展開猛烈攻擊。他們在這場史無前例的革命鬥爭中，決心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以毛主席親自主持制定的黨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武裝自己，認真地學習十六條、熟悉十六條、掌握十六條、運用十六條，在鬥爭中鍛煉得更加堅強。

自從首都紅衛兵們帶頭走上街頭橫掃“四舊”以來，短短幾天之內，這一革命風暴就席捲了全國各城市。廣大工農兵群眾、革命幹部和革命知識份子迅速地同各地紅衛兵和革命師生們結合起來，匯成了一股巨大的洪流，滌蕩著一切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使各地都出現了一派振奮人心的革命景象。妄圖阻擋這一革命風暴的一切牛鬼蛇神和舊勢力，受到了迎頭痛擊。在當前橫掃“四舊”的鬥爭正在進一步廣泛深入發展的時候，各地紅衛兵和革命群眾鬥志更加昂揚。他們表示，在鬥爭中一定要活學活用十六條，積極地宣傳十六條，一切行動都以十六條為綱。各地紅衛兵還紛紛強調指出，在鬥爭中一定要進一步發揚

“敢”字當頭的革命精神，敢於衝破來自任何方面的一切阻力，最大限度地孤立

那些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和一切牛鬼蛇神，給予它們以毀滅性的打擊，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天津市一些學校的紅衛兵們，每天上街橫掃“四舊”時，都隨身帶著十六條，隨時隨地進行學習和宣傳。他們說，十六條是我們的偉大革命舵手毛主席親自主持制定的，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經驗結晶。我們一定要好好掌握這個偉大的精神武器，把資產階級的頑固堡壘打它個落花流水，把資產階級的舊章法、舊規矩、舊秩序統統打亂。他們還說，凡是抵制十六條的，我們就要反對，就要打倒，就要揭發，就要批判，就要鬥爭。我們決心跟著毛主席鬧革命，造資產階級的反，造帝國主義的反，造修正主義的反，造一切牛鬼蛇神的反，造一切剝削階級意識形態的反，反出一個嶄新的無產階級的新世界來。目前天津市橫掃“四舊”的鬥爭正在繼續廣泛深入發展，全市四千多個百貨副食品商店門市部，其中需要改換的舊名稱已全部改為富有革命意義的新店名。塘沽海關的革命職工，在紅衛兵革命造反精神鼓舞下，砸爛了帝國主義舊海關的大沿帽，把帶有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修正主義色彩的圖案的關徽、臂章和銅鈕扣砸得稀爛。

上海市破“四舊”、立“四新”的革命風暴，也正在繼續向縱深發展。許多街道的面貌已經煥然一新，許多商店換上了具有革命意義的新招牌，櫥窗都做了全新佈置，掛上了毛主席畫像和毛主席語錄。來自大中學校的紅衛兵們，這兩天繼續播戰鼓，唱戰歌，湧上街頭大張旗鼓地宣傳破“四舊”立“四新”的偉大意義，大張旗鼓地宣傳十六條。在有些劇場裏，紅衛兵們在征得劇團同意後，登上舞臺宣傳十六條，博得觀眾、演員和革命職工的熱烈讚揚。

英雄城市南昌的紅衛兵們，這幾天在全市各處張貼革命傳單、大字報和發表演說，向“四舊”宣戰。他們指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我國社會主義革命發

展的一個更深入更廣闊的新階段，這一場革命是要滅資產階級思想，興無產階級思想，改造人的靈魂，實現人的思想革命化，挖掉修正主義根子，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就是要大立毛澤東思想。我們要讓毛澤東思想佔領一切思想陣地，用毛澤東思想改變整個社會的精神面貌。他們的宣言受到了革命群眾的熱烈擁護，現在南昌的街道上已經面目一新，許多帶有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修正主義色彩的路名、店名都已改成革命化的新名稱。

南京市的紅衛兵戰士們，這幾天紛紛走上街頭，以“橫掃千軍如卷席”的革命氣魄，向“四舊”發動了強大的革命攻勢。在市內主要街道的牆頭上，到處貼滿了紅衛兵們革命的宣戰書，他們寫道：南京是個古老的城市，解放前是蔣介石匪幫反動統治的政治中心，幾千年遺留下來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和那些亂七八糟的東西，是根深蒂固的。解放後，剝削階級被打倒了，但是他們的陰魂不散，許多街名、路名、店名以及商場、劇場、旅館等等的名稱還帶有濃厚的封建主義、資本主義色彩，我們一看到就怒火沖天！我們再也不能容忍了！我們要發揚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橫掃一切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粉舊世界，建立新世界。紅衛兵們在廣大職工的熱情支持下，已經把那些散發著封建主義、資本主義和修正主義臭氣的舊路名、舊店名、舊校名改掉，換上了宣傳毛澤東思想和能夠反映社會主義時代精神的新名字。

在內蒙古自治區首府呼和浩特市，各民族革命職工熱烈支持紅衛兵和革命學生橫掃“四舊”的革命行動。許多紅衛兵充滿革命豪情地說：我們的最高統帥是毛主席，我們的戰歌是《革命造反歌》，我們的戰鬥作風是三八作風，我們的戰鬥任務是一鬥二批三改。我們要發揚無產階級的大無畏革命精神，敢於革命，敢

於鬥爭，敢於勝利。十六條是我們行動的綱領。我們要認真學習十六條，熟悉十六條，掌握十六條，運用十六條，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在貴州省的貴陽、遵義等城市，這幾天也有成千上萬的紅衛兵走上街頭，以毛澤東思想為武器，橫掃“四舊”。貴陽市許多學校紅衛兵在市內大街小巷貼出無數向舊世界挑戰的宣言書指出，幾千年剝削階級遺留下來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的影響是很深的。我們要徹底破除這些東西，就必須按照毛主席的教導，拿起革命的大掃把，大掃特掃。我們要奮起革命的千鈞棒，把舊世界的殘餘打個落花流水，讓毛澤東思想佔領一切陣地，用毛澤東思想改變整個社會的精神面貌。紅衛兵們的革命行動，受到廣大革命群眾的熱烈支持。他們的行動使資產階級威風掃地，使革命的人們精神大為振奮。

（《人民日報》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八日）

七 紅衛兵在“全聚德”點起了革命烈火

《人民日報》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

八月十九日晚，敢闖、敢幹、敢革命、敢造反的紅衛兵闖進了全聚德烤鴨店，點起了熊熊的革命烈火。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臭味十足的“全聚德”招牌，被革命職工砸了個稀巴爛，換上了新招牌“北京烤鴨店”。

紅衛兵點起的這把火，燒毀的不僅是一塊招牌，而是整個全聚德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

這些天不怕、地不怕的小闖將，走遍了全聚德的餐廳、廚房、宿舍。在前北京市委修正主義的影響下，全聚德的大小餐廳，掛的都是山水草木之類的畫，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的舊思想、舊風俗束縛著全聚德。

紅衛兵痛恨前北京市委的修正主義領導，痛恨資產階級，也痛恨全聚德舊的一套。

北京第十五中、六十三中的十名紅衛兵在全聚德住下了。他們是烤鴨店的治安員、服務員，也是毛澤東思想的宣傳員。他們說：“我們要在‘全聚德’造資產階級的反，插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革命的職工熱烈地歡迎紅衛兵，他們說：“毛主席是偉大的統帥，紅衛兵送來了毛澤東思想的東風。”共同的目標，使他們團結在一起，戰鬥在一起。

紅衛兵到新華書店給北京烤鴨店訂購了一百幅毛主席畫像。北京烤鴨店的職工買回了第一批。一夜之間，從櫥窗到餐廳，從廚房到宿舍，通通掛上了毛主席畫像和數以百計的毛主席語錄。外國餐廳的樓梯口上，原來掛的是一幅畫著北京鴨的大畫，現在是一條金色大字的毛主席語錄：“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國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全世界人民要有勇氣，敢於戰鬥，不怕困難，前赴後繼，那末，全世界就一定是人民的。一切魔鬼通通都會被消滅。”外國朋友來北京烤鴨店進餐，首先看到的，就是毛澤東思想的燈塔。

紅衛兵和革命職工在商談如何改進經營。紅衛兵提出，北京烤鴨店首先要解決為誰服務的問題，就是面向工農兵的問題。

同志們帶著問題學習毛主席語錄。毛主席的話使老職工回憶起全聚德的歷史。全聚德的階級剝削史，是活生生的教材，教育了職工，也教育了紅衛兵。革命的職工說：“全聚德是勞動人民的血汗鑄成的。烤鴨店要為工農兵服務。”

一張醒目的標語貼在北京烤鴨店的門前：“歡迎工農兵進餐”。

北京烤鴨店的菜牌上，增加了五種菜，最貴的二角五，最便宜的八分。

許多工農兵群眾被迎進了北京烤鴨店。

紅衛兵把文化大革命的風暴帶進了北京烤鴨店，革命的職工要造反，要批判資產階級，要橫掃一切舊規矩、舊習俗。他們說幹就幹，紅衛兵們深受感動地說：“革命職工階級仇恨深，行動堅決，幹得乾脆。”

八 北京十四中紅衛軍告全國同胞書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

群山沸騰，流水歡歌，由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領導的文化大革命，正以雷霆萬鈞之勢，在全國個地轟轟烈烈地展開。我們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紅衛兵，要在這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經風雨，見世面，爭當革命闖將，為完成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貢獻我們的力量。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紅衛兵，天不怕，地不怕，為了革命利益，刀山火海也敢闖！我們現在要起來為革命造反！造資產階級的反，造修正主義的反，造反動派的反，造一切剝削制度的反，造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的反，造阻擋通向共產主義的一切牛鬼蛇神的反！反！反！反了這些，無產階級革命事業就會飛速向前發展，共產主義的康莊大道就在我們眼前！

我們向全國各大城市莊重宣告：

一、徹底剷除修正主義苗子

(1) 理髮館、裁縫鋪、服裝廠的同志們，你們今後一律不許給那些資產階級狗崽子、流氓、阿飛、小癩三們理怪模樣、妖裏妖氣的頭髮，什麼無縫青年式、青年波浪式、螺旋寶塔式、鴨子屁股式……這些洋頭，我們社會主義的中國不許

流行。不許給資產階級的孝子賢孫、外國洋人的乾兒子幹孫子們做牛仔褲、牛仔衫、牛仔裙、什麼雞腿褲、蹲下撕毀式……服裝，在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新中國，這些東西絕不允許生存。

工農同志，你們不要再為這些社會渣滓服務了。我們深信，你們要革命，要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貢獻力量，你們決不願做資產階級、修正主義的奴才和保母。舊社會，你們受盡資產階級的百般虐待和殘酷剝削，今天是人民的天下，社會的主人是我們廣大工農兵！你們應該造那些資產階級老兒和狗崽子及其孝子賢孫們的反！

(2) 商店、制鞋廠、委託商行的工人同志：我們是社會主義的中國，可是現在仍然存在資產階級的流毒。你們絕不願意讓舊中國的悲劇重演，絕不願意資產階級重新騎在人民頭上。但是，解放十七年來，這些廠行自覺、不自覺地為那些資產階級的寵兒、流氓、阿飛服務著，出售什麼夜來香、香水、口紅、這粉那粉、火箭鞋、牛仔鞋、高跟鞋、大蓋鞋……，收購、出售資產階級的破衣破罐、家財什物、外加封建老兒們的長袍、馬褂……給社會主義放了不少毒。這些，在中國再也不能出現了！再也不能存在了！你們必須停止出售類似商品，不許收售對社會主義有毒的商品。

資產階級老兒們，頑固不化的狗崽子、孝子賢孫們，你們橫行霸道、不可一世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在我們偉大的毛澤東思想時代，在新中國，絕不允許你們梳大背頭，穿著牛仔衫、雞腿褲、火箭鞋到處放毒，絕不允許你們梳著鴨屁股頭髮，抹著夜來香，擦著香粉，穿著牛仔裙、港式衫、高跟鞋到處亂竄。只許你們老老實實，不許你們亂說亂動。你們必須在張貼此告示十天內，徹底改裝。如若不然，廣大的紅衛兵將制裁你們！

二、徹底剷除一切剝削現象

(1) 所有房主們，你們聽著：解放前你們用剝削勞動人民的血汗錢，置辦了房產，而今你們還收房租，繼續剝削勞動人民。你們這些吮吸勞動人民血汗的臭蟲，必須停止吸血，房產一律歸公。住戶們一律不向房主交租子！各地房管局的革命同志們，望你們辦理好房產歸公手續，馬上把房產接收下來。

(2) 中國人民銀行各分行的革命同志，我們向你們發出通令：立即沒收資產階級的股息和取消存款給利息的作法。這些資本家的錢就是勞動人民的血淚。現在是歸還給人民的時分了！今後那個剝削分子敢領定息，絕不許可！

(3) 舊社會的文人秀才老朽們、演員作家們，你們終日坐在書閣暖室內，不但寫黑書、演黑戲，還利用“特長”，向國家、向人民索取高薪，過你們奢侈的生活。勞動人民辛辛苦苦勞動一個月，工資幾十元，你們坐在辦公室、排練場一月，工資幾百上千元，這二者有多大懸殊！這不合理的現象要徹底根除！你們必須主動向國家申請，請求降低工資。如若不然，我們將採取必要的行動！

三、雜 項

(1) 醫院的某些少爺、小姐們，你們穿著白大褂、高跟鞋，或留著螺旋寶塔式的發樣，在醫院對資產階級狗崽子們和和氣氣、關懷備至，對工農兵們，你們態度生硬、麻木不仁。如今是無產階級的天下，你們在醫院對勞動人民的態度是什麼？作風是什麼？你們明白！你們訂的各項制度，對誰有利？你們也明白！你們必須改掉舊習氣，改掉舊制度，置身於工農兵之中，徹底為工農兵服務。

(2) 各地的商店、街道的名稱，凡是帶有封建意識、資本主義企圖的都應一律撤換，換上有社會主義色彩、共產主義理想的名稱。

上述條令，自張貼日起，即時生效！若有違犯上述條令者，我們將採取必要的革命行動！

各地的紅衛兵和廣大革命師生、革命職工們：不除掉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就不能夠建立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面對我們職工還存在的舊社會殘餘勢力，我們一定要敢想、敢說、敢幹、敢闖、敢革命、敢造反！我們是舊世界的批判者，我們要砸爛舊世界，創建新世界！我們有偉大的毛澤東思想的指引，有堅強團結高度自覺的七億中國人民，一定能夠取得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

同志們：我們的革命行動，一定能得到你們的支援！希望你們在各地協助我們做好上述條令的監督工作，誓把資產階級歪風邪氣全掃光，剝削階級思想全鏟光，修正主義苗子全拔光！北京對違犯類似條令的處理方法是：格剃勿論、格剪勿論、格砸勿論！

同志們，讓我們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向舊世界猛烈開火！

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

無產階級專政萬歲！

九 北京二中紅衛兵向舊世界宣戰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

我們是舊世界的批判者。我們要批判、要砸爛一切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所有為資產階級服務的理髮館、裁縫鋪、照像館、舊書攤……等等，統統都不例外。我們就是要造舊世界的反！

我們國家解放十七年了，但舊社會遺留下來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仍然存在。被推翻的反動階級不甘心他們的死亡，他們總是要頑強地表現自己，和我們爭奪意識形態領域裏的陣地，企圖用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來腐蝕群眾，征服人心，力求達到他們復辟的目的。毛主席說：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實踐證明，毛主席的論斷是英明、偉大、正確的。

資產階級的老爺們懂得，要想復辟，必須在生活上打開缺口，使資本主義大氾濫。而理髮館、裁縫鋪、照像館、舊書攤……當中一些要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所謂的技術權威們，為了博得這些資產階級老爺們的歡心，滿足他們的奢望，就挖空心思，為他們服務，給他們大開方便之門。你們是金錢掛帥，金錢第一，你們對人民是有罪的！

首先，我們對你們——為資產階級服務的理髮館、裁縫鋪、照像館、舊書攤……要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所謂的技術權威們提出最最強烈的抗議！

為了資本主義復辟，你們理出了大量的港式頭。什麼“飛機頭”“無縫青年式”“螺旋寶塔式”“青年波浪式”等等稀奇古怪的髮型，還噴上香水，抹上油，使那些流氓們搖頭晃腦，得意忘形。

為了資本主義復辟，你們做出了大量的港式衣裙。什麼“牛仔褲”“牛仔衫”以及各式各樣花花綠綠令人作嘔的港式衣裙，使那些流氓們飄飄然，神氣十足。

為了資本主義復辟，你們照出了許多下流低級的照片，把那些資產階級少爺小姐電影明星們捧上了天，使他們神魂顛倒，眉飛色舞。你們照出來的像，可惡，可憎，可氣！

為了資本主義復辟，你們販賣了大量古今中外低級黃色冒險的小說，使那些狗崽子們從你們那裏得到了滿足。大批資產階級的陰魂從你們那裏飄了出來，毒害了許多青少年，滋育了他們犯罪的苗頭。

還有那些商店，你們擺了那麼多香水、雪花膏、口紅、項鍊……等奢侈品，及港式衣裙、火箭鞋等等是給誰預備的？難道工農兵還抹香水，穿尖皮鞋嗎？

你們從心靈深處不喜歡廣大的工農兵那種淳樸憨厚自然的美。你們服務的物件是那些油頭粉面、衣著華麗的老爺太太們，你們的靈魂深處是骯髒的，反動的。你們口頭上也說為工農兵服務，你們是掛羊頭賣狗肉。現在是你們徹底改造的時候了！

你們想過沒有，如果再這樣下去，那麼不出幾年，幾十年，資本主義就會在中國復辟，整個中國就會改變顏色了。

現在，文化大革命的洪流正在衝擊著資產階級老爺們盤踞的各個陣地。資產階級的溫床，保不住了！解放十七年來，前北京市委對這些事情不聞不問，聽而不聞，視而不見，對流氓作風、流氓行為放縱不管。他們走的是修正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路，我們和他們是兩條路上的人。現在，我們站起來了，當家做主人了。有黨中央和毛主席給我們撐腰，對於這樣的事情，他們不管，我們要管，而且要管到底。我們要徹底剷除修正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溫床和苗子，造這些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的反。

毛主席說：“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幾千年來總是說：壓迫有理，剝削有理，造反無理。自從馬克思主義出來，就把這個舊案翻過來了，這是一個大功勞。這個道理是無產階級從鬥爭中得來的，而馬克思作了結論。根據這個道理，於是就反抗，就鬥爭，就幹社會主義。”

我們就是要造舊世界的反，我們就是造反有理！

現在，“飛機頭”、“牛仔褲”、下流照片和黃色書籍統治一些理髮館、裁縫鋪、照相館和舊書攤……的現象，再也不能讓它繼續下去了！我們向理髮、裁縫、照像等行業的革命職工倡議：

港式的髮型不理！港式的衣裙不做！下流的像不照！黃色的書不賣！

我們要求在最短時間內改掉港式衣裙、剃去怪式發樣、燒毀黃色書籍和下流照片。“牛仔褲”可以改為短褲，餘下的部分，可做補釘。“火箭鞋”可以削平，改為涼鞋。高跟鞋改為平底鞋。壞書、壞照片做廢品處理。

我們向全市紅衛兵和一切革命的同志呼籲，這場鬥爭是關係到中國的前途和世界革命的大事。不要小看這些問題，資產階級復辟的大門正是從這些地方打開的，蘇聯不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嗎？所以我們一定要堵住一切鑽向資本主義的孔道，砸碎一切培育修正主義的溫床，決不留情！

我們也向全國無產階級革命派呼籲：向殘存的一切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開火，砸爛它，建立起無產階級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

革命造反精神萬歲！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

中國共產黨萬歲！

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

偉大的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

十 東方紅二中紅衛兵緊急呼籲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

毛主席教導我們：“中國的反動分子，靠我們組織起人民去把他打倒。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這也和掃地一樣，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

目前，有不少散居在街道上的地、富、反、壞、右分子，勞改釋放犯，勞動教養解除犯，少年管教釋放犯，流氓盜竊分子，投機倒把分子，資本家，偽兵痞，偽警棍，機關、工廠、企業、學校等單位開除除名的這些混蛋們，長期以來厭惡勞動，貪圖安逸，成群結隊，打架鬥毆。經常泡酒館、茶館，說壞話，做壞事腐蝕青年，或挑撥離間，造謠生事，或漫罵攻擊政府，散佈反動言論，嚴重地危害著首都治安。

嚴厲警告你們這些社會渣子們，絕不允許你們這些狗崽子繼續為非作歹，擾亂社會治安，現在是你們進入垃圾箱的時候了。

為了保衛黨中央，保衛毛主席，我們緊急呼籲：

中共北京新市委、市人委、勞動局、公安局、辦事處、派出所和一切有關單位，立即採取措施：

家在農村的，限期還鄉生產！

農村沒家的，有關單位立即組織這群混蛋勞動，讓他們趕快滾出首都去！

在這群混蛋沒離開北京之前，不管是閑在家裏的還是作臨時工的，只許規規矩矩，不准亂說亂動，如果亂說亂動，立即予以制裁！

革命造反精神萬歲！

“掃除一切害人蟲，全無敵”！

無產階級專政萬歲！

中國共產黨萬歲！

我們最最敬愛的偉大領袖毛主席萬歲！萬萬歲！

東方紅二中紅衛兵

1966年8月26日

十一 北京師大女附中毛澤東主義紅衛兵最後通牒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

社會青年們：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正以雷霆萬鈞之勢迅猛發展，現在我們紅衛兵已經向四舊發起猛攻了，革命已經革到你們頭上了。

過去，在舊市委的縱容下，你們這群白吃人民飯、遊手好閒的寄生蟲們。貪圖安逸、享受，到處為非作歹，擾亂治安，幹盡了壞事，為資本主義復辟大開方便之門，這是我們毛澤東主義紅衛兵絕不能容忍的，我們既然要造反，就由不得你們了，我們就是要把火藥味搞得濃濃的，爆破筒、手榴彈一齊向你們投過去，把你們的舊思想、舊習慣打個落花流水，打個稀巴爛，絕不留情。

老子革命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就是基本如此，你們的老子今天被人民專政了，跟他們一樣作威作福當老爺是辦不到了！要革命的站過來，不革命的滾蛋，反革命的就叫你徹底完蛋。

現在你們唯一的出路就是上山下鄉，到廣大的工農兵中去，徹底改造，徹底脫胎換骨，重新作人。否則，下一步棋怎麼走，就由不得你們了。

最後，勒令你們在 72 小時之內到勞動局報到，上山下鄉不得違令。

你們不革命，我們就堅決革你們的命！

把你們堅決、徹底、乾淨消滅掉！

不獲全勝，絕不收兵！

十二 北京抗大一附中紅纓槍革命造反隊（原一中）

十萬火急通令

（關於本屆北京國際乒乓邀請賽）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五日

本屆北京國際乒乓邀請賽馬上就要開始，這次比賽是我國主辦的，是一次和美帝蘇修的混蛋“奧運會”相對抗的一次反帝反修的比賽。使這次邀請賽獲得圓滿成功，保證比賽的正常進行，是首都正在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革命群眾的光榮責任。

一些被人民專了政的混蛋狗崽子們，不許你們參加革命觀眾的行列，不許你們看比賽，一些流氓狗崽子，二流子，無業或不務正業的混蛋，及崇洋的奴才，不許你們看比賽！

為了使比賽獲得成功首先是獲得政治上的成功，我們現在通令：

（1）無論個人或團體購票，必須憑本單位革委會介紹信，革委會開介紹信，要採取負責態度。

(2) 退票或通過革委退或退給原售票亭。(售票亭不得拒絕不收，應首先從政治上考慮) 如有私自退票者，其票格撕勿論！由退票發生的惡果自己負責！

(3) 看比賽者自覺遵守秩序，協助維持秩序，並應以共產主義的無產階級的態度對待比賽。凡事從革命利益出發，以毛主席身邊的人民的榮譽為主。我們的榮譽是祖國的榮譽，尊嚴是革命的尊嚴。

(4) 一切資產階級狗崽子，流氓狗崽子們！在場外搗亂，格揍勿論！進場內或奇裝異服進場者，揪出來，格揍勿論！有言在先，臨事無謂言之不預！

(5) 以上規定，適用於一切國際國內的比賽和演出等場合。偉大的統帥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舵手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

只許左派造反！不許右派翻天！

十三 《破舊立新一百例》

毛澤東主義學校（原二十六中）紅衛兵（衛旗）

一九六六年八月

語錄

……我們不但善於破壞一個舊世界，我們還將善於建設一個新世界。

前言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浪潮洶湧澎湃，正以雷霆萬鈞之勢衝擊著資產階級的殘餘勢力，把資產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打的落花流水。毛主席告訴我們：“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當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要革一切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的命，要大造資產階級的反，就是要大破大滅資產階級，大立大興無產階級，讓偉大的毛澤東主義光輝照亮整個首都，整個中國，整個世界。我們是用偉大的

毛澤東主義武裝起來的，最有戰鬥力的隊伍，我們是“四舊”的死對頭，我們是舊世界的破壞者，我們是新世界的創造者。我們要高舉毛澤東主義偉大紅旗，向“四舊”猛烈開火，把帝國主義，修正主義，資產階級的東西，把一切不符合毛主席思想的東西徹底砸爛，我們要清算資本主義的一切不合理制度。我們要讓偉大的毛澤東主義普照全世界，我們要讓我們偉大的祖國革命化，戰鬥化，毛澤東主義化，讓一個嶄新的中國出現在世界上。

破舊立新一百例

1. 由居民委員會負責，每條街道都要設立語錄板，家家戶戶都要掛主席像和毛主席語錄。

2. 公園裏要多設立主席語錄，汽車售票員。火車列車員應把宣傳毛澤東主義，讓毛主席語錄當做自己的首要任務。

3. 出版事業管理局，要大量出版毛主席著作，在新華書店大量出售，讓毛澤東主義的光輝照射到全國各個角落。

4. 印刷社大量出版主席語錄。並在各書店出售，做到全國人手一冊。

5. 毛主席語錄要人手一冊，隨身攜帶，時時學習，事事照辦。

6. 美術出版社，要印刷大批主席現成語錄，尤其逢年過節，要大量出售語錄和革命對聯，滿足人民需要。

7. 現有自行車，三輪車，要掛主席語錄牌，汽車，火車要掛主席像和漆上毛主席語錄。

8. 有關部門，要大量制做自行車，三輪車上的語錄牌，滿足人民的需要。

9. 自行車，汽車，火車，飛機等出廠新產品一律帶上語錄牌，必須增加選一道工序，必不可少。

10. 街道工作必須突出毛澤東主義，成立毛著學習小組，使家庭婦女革命化。
11. 各校，各單位必須成立最高指示宣傳隊，使每個人隨時能聽到主席的諄諄教導。
12. 各公園，各主要街道，要成立廣播站，由紅衛兵之類組織負責，宣傳毛澤東主義，國際、國內時事。
13. 舊國歌一定要由工農兵改成歌頌黨和毛主席的內容，剷除田漢的這株大毒草。
14. 街道居民委員會要成立幾個報欄，使每人關心國家大事、世界大事。
15. 今後各報紙，要突出毛澤東主義。社論少而精，要多登工農兵活學活用主席著作的好文章。
16. 信封，郵票一律不許印資產階級的東西，如（貓，狗，美術等之類的東西），一定要突出政治，每個信封要印上毛主席語錄或英雄人物的豪言壯語。
17. 隊員過隊日，團員過團日，一律不許逛公園，要加強階級教育和毛澤東主義教育。
18. 以後國慶日，每人都要帶主席語錄和花束，花束排成標語。
19. 商店櫥窗不能被那些亂七八糟的香水香精所統治，要佈置樸素大方，突出毛澤東主義。
20. 影劇院要把政治空氣搞的濃濃的，放影前必須播主席語錄，不讓資產階級統治我們的舞臺，把那些不必要的流氓鏡頭除去。影劇院票價必須降低，為工農兵服務。
21. 文藝工作者，要大力塑造工農兵活學活用主席著作的英雄形象，作品要貫穿著一條毛澤東主義的紅線。

22. 各專業文藝隊伍，要逐步改成像“烏蘭木齊”，“海上文化工作隊”之類毛澤東主義宣傳隊，要非常無產階級化，非常戰鬥化，非常毛澤東主義化。

23. 我國建國已經十七年了，但是那些解放前喝人民鮮血的壓迫人民的，資產階級老王八蛋們，仍然拿著定息股息過寄生蟲生活，我們警告你們，立即停業拿定息股息。只許老實改造你們的混蛋思想，不許你們剝削人民。

24. 解放後還騎在人民頭上，喝人民鮮血的房產主們，我們命令你們，你們這些王八蛋們趕快把私房全部交給國家，社會主義社會中決不許可你們這些吸血鬼存在。

25. 在無產階級社會中，根本不准私營存在，我們建議把大街上一切公私合營字樣都改成國營，把公私合營企業改成國營企業。

26. 我們社會主義社會決不允許任何流氓，阿飛存在，我們命令你們馬上剪斷牛仔褲、剃去阿飛頭，脫去火箭鞋，退出黑組織。北京是世界革命的中心，不是在你們解放前所盤踞的大世界，警告你們，不許你們胡作非為，不然一切後果由你們自己負責。

27. 一切服務行業不許你們為資產階級服務，服裝店堅決不許做瘦腿褲，港式服裝，怪衣裙，怪服裝，一切服務行業的革命同志要嚴格遵守。

28. 凡是不為廣大工農兵服務的日用品（香水、雪花膏）等，立即停止出售，商品商標圖案必須改革。

29. 照像館要為廣大工農兵服務，取消照歪脖子像，各種怪像，櫥窗應擺出工農兵樸素大方的相片。

30. 停止生產撲克牌，軍棋等宣揚資產階級思想的一切東西。

31. 信託商店不許賣古衣，西服等雜七雜八的資產階級喜聞愛見的東西。

32. 洗衣店必須停止給那些資產階級太太，小姐少爺洗褲衩、襪子、手絹，徹底打碎他們的妖氣，不答應他們的無理要求。應大長無產階級銳氣，大滅資產階級威風。

33. 浴池一律停止給那些資產階級狗崽子服務，不給他們搓澡、捏腳、捶背、不讓他們再壓在我們頭上，作威作福。

34. 古書店必須馬上停止營業，小人書店要立即銷毀一切黃色小人書，一切書店，圖書館必須清理內部，清除一切毒草，不許這些東西再向青年灌輸資產階級思想。

35. 一切地富反壞右資產階級人物不許收藏黃色書籍，黃色唱片，如有違者，一經清查出來，按企圖復辟的罪名對待，進行銷毀。

36. 兒童要唱革命歌曲，那些貓狗之類的壞歌謠再也不能繚繞在社會主義國家的上空，在我們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裏決不許任何人玩賭博遊戲。

37. 一律不許資產階級王八蛋雇用保姆，誰膽敢違抗，再騎在勞動人民頭上，要嚴加懲辦。

38. 一切服務行業必須面向工農兵。要為工農兵服務，要帶階級性。決不生產為資產階級服務的一切東西。

39. 各醫院要面向工農兵，必須改革原先的舊制度、取消掛號制度。

40. 自己做小玩意欺騙兒童，變相毒害兒童的小販們，命令你們馬上停止營業，如有違者，毫不客氣，另外命令玩具商店，馬上停止出售小手錶之類的宣揚資產階級思想的玩具。

41. 各工廠企業一律廢除資產階級的獎金制度，我們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裏，廣大工農兵群眾都是用偉大的毛澤東思想而武裝起來的。用不著物質刺激。

42. 家長一律不許用資產階級思想教育孩子、廢除封建家長制，不許打罵孩子，如不是親生子不許虐待，一律用毛澤東思想教育孩子。

43. 一律不許養蝨鬥蝨，養魚、養貓、養狗。這些資產階級的習慣不能在中國人民中間存在，如有違者，後果完全自己負責。

44. 拿著高薪的資產階級的老王八蛋們，你們聽著，解放前你們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現在你們仍舊拿著比工人高幾倍甚至高十幾倍的高薪，你們這是喝人民的血，你們有罪，從九月份命你們把高薪降低于人民的水準，銀行有存款的地、富、反、壞、右、資本家，不許取走一厘一毫，如違此令，自己負責，毫不客氣。

45. 不許資產階級混蛋隨便逛東溜西，逛公園，如有買月票以供逛公園坐汽車為消遣者，一律把月票銷毀，不許他們想入非非。

46. 除老弱病殘者可坐三輪車外，資產階級王八蛋一律不許坐，如有違者嚴加處理；三輪工人要減少，適當安排好工作。

47. 地富反壞右和資本家們，出門必須帶牛鬼蛇神牌，由群眾監督，如有違者，嚴加處理。

48. 一切牛鬼蛇神，黑幫狗崽子們不經群眾通過，不許領薪，我們要降老王八蛋們的薪，只給混蛋們活命錢！

49. 飯館再也不能成為資產階級王八蛋們吃喝玩樂的地方了，服務員不許答應他們的無理要求，不給他們做山珍海味、辦酒席，不許在飯館劃拳，不能為這些王八蛋們服務。

50. 工廠裏，一律不給地富反壞右分子退休金，取消一切待遇，要監督他們勞動。

51. 不許資產階級王八蛋佔有大量房屋，以三人一間為限，多餘房間一律交房管局處理，免得我們動手。

52. 地富反壞右五類分子沒有工作者一律回鄉生產。

53. 遊手好閒的社會青年們：命令你們馬上到辦事處去登記，到邊疆去參加勞動生產！

54. 今後凡不服從國家分配者，派出所一律不許給在市內找工作，讓他們去邊疆。

55. 資產階級老王八蛋們，命令你們趕快把在解放前剝削來的錢交給政府，不許你們這些喝血鬼再任意揮霍。

56. 全國各地摔跤場一律解散，到派出所去登記參加勞動，不許你們再毒害人民。

57. 命令全國各地靠欺騙人生活的變戲法的馬上停止你們的勾當，去派出所登記！

58. 各雜技團，戲劇院的節目一定要改革，要演有意義的。演員一律不許打扮得妖裏妖氣，因為我們不需要這些骯髒的東西。

59. 命令那些沒參加三輪車社登黑車的（即晚上到車站，大街小巷拉旅客、多要錢，本來只有二裏，他給你大街小巷竄拉五裏，再向你加倍要錢）兔羔子們，馬上停止幹這種罪惡勾當，到公安局去自首！

60. 把一些不符合實戰意義的體育專案適當削減，大力開展國防體育，如游泳、登山，射擊等。逐步做到十五歲以上青壯年每人有一套殺敵本領，全民皆兵，時刻準備消滅來犯敵人。

61. 大街小巷修鞋的，命令你們馬上停止營業，由有關部門組織修鞋社，修鞋價錢必須減少。
62. 寫信一律不許寫 XXX 大人收等，要破除封建一套，提倡新習慣。
63. 五類分子，黑幫分子家中的小汽車，電視，摩托車一律沒收，電視交居委會給工農兵家屬看。
64. 各報紙今後一律不許給過多的稿費，堵住這個黑風口。
65. 破除家長制，孩子可以給大人提意見。
66. 醫院住院、急診一律不許先收費（五類分子除外），煩瑣制度要廢除，具體的由醫務工作者自己起來命革，打破舊框框，洋框框，一切為人民服務。
67. 禁止一切牛鬼蛇紳（舊官僚，地主，資本家，壞分子等）在公園及一切地方教武術，教拳，教氣功。
68. 任何演出或文藝廣播、電影立即取消作者，演員，指揮等姓名；堵上個人名利這條路。
69. 命令 36 歲以下者立即戒酒戒煙，絕不能培養這種壞習氣。
70. 嚴禁開庸俗玩笑，講下流話，幹下流事，違者嚴加處理；嚴禁叫外號，職務等惡習，一律稱同志（黑五類除外）。
71. 街道積極分子一律由工農成分先進同志擔任，不能讓資產階級分子篡奪。
72. 郵遞員今後一律不管往樓上、大院裏送信，樓裏自備信箱，大院裏找專人負責。減少郵遞員同志的勞動。
73. 結婚不許要彩禮，不得鋪張浪費，要提倡新風俗，新習慣。
74. 禁止戴手鐲，耳環、長命鎖等封建的東西。

75. 建議有關部門考慮，廢除銀行的利息制度，讓人們自覺本著節約愛國精神儲蓄，支援社會主義建設。

76. 建議以後凡是批判電影一律不收費，由集體組織看，個人不賣票，凡是黑五類分子不許看。

77. 走親戚，串門、買點心、水果的舊社會遺留下來的東西，一律廢除，希望工農兵群眾支持這一行動。

78. 除有急事要事外，計程車一律不出租，不讓資產階級王八蛋坐。

79. 有關部門要盡力想方設法在各胡同建立公廁，減少清潔工人的繁重勞動。

80. 國家要大力發展汽車運輸事業，減少平板車工人的繁重勞動。

81. 春節廠甸今後一律不開，我們既要算經濟帳，也要算政治帳。

82. 今後各大學，中學、專業學校都要辦成半工半讀，半農半讀的共產主義學校。

83. 我們學生要響應毛主席的號召，學生也要學工、學農、學軍、每年假期要到工廠、農村、軍隊去鍛煉。

84. 我們堅決要求改革放假制度，在農忙時放假去農村支援農業生產。

85. 沙發，躺椅等不能大量生產。

86. 金筆等一些太貴的用品不要大量生產（出口除外），因為這不是為廣大工農兵服務的。

87. 商店一切產品不能叫洋名，要用中國有意義的名。

88. 號召所有團員摘掉團徽，去掉達株毒草。

89. 醫生開藥方一定要廢除用英文字寫的洋框框，開什麼藥要講清楚，簽名要工整。

90. 我們堅決抗議不許把少先隊改成全民隊，這就沒有它的先鋒意義了。
91. 學校要把毛著當成教科書，用毛澤東主義教育青年。
92. 各學校也要把鍛煉身體、參加勞動放在主要地位，加強軍事訓練。
93. 學校要廢除封建的師生禮節，建立平等師生關係。
94. 師範大學、師範學校、幼兒師範自今年起要吸收紅五類子女進學。
95. 凡帶有封建色彩、資產階級色彩的名字主動去派出所改名。
96. 各個院落內外一律不許修籬笆，修小房，不能助長這種自私自利思想。
97. 廢除公園賣年票的制度，如工農兵需要修養一律由工廠機關發。
98. 建議國家考慮工人普遍長工資、資產階級權威降工資。
99. 黑幫分子一律根據罪行罰款。
100. 提倡簡化字，以後各報紙刊物標題一律用簡化字。

十四 《告全國理髮行業革命職工書》

北京市紅衛區東方紅理髮基層商店

（原西城區宣內理髮基層商店）全體革命職工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二日

全國理髮業革命的職工同志們：

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波瀾壯闊，正向更深入地地方發展。當前革命形勢大好，革命的洪流勢不可擋，猛烈地向資產階級的一切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進行衝擊。我們理髮行業也不例外。多少年來，封建地主官僚資產階級統治著理髮行業，那些資產階級老爺們，少爺們騎在理髮工人頭上，任意胡來，作威作福，使理髮行業成為他們統治的工具。理髮工人成為為他們梳妝打扮的奴隸。

解放以後，修正主義集團的前市委，又繼續統治我們，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他們對舊社會封建主義的、資本主義的那種油頭粉面，吃喝玩樂的糜爛生活方式，是臭味相投，很感興趣。他們不但不反對、不取消，反而變本加厲的推行修正主義路線，提倡妖頭怪發的資產階級生活內容、生活方式。那些資產階級老爺，太太，少爺，小姐和那些有嚴重資產階級思想的人，對這種生活方式不以為恥，反以為榮，氾濫成災，在全市、全國進行流毒，使不少人受到毒害，受到腐蝕，這就打開了復辟資本主義的缺口，使理髮行業變成資本主義復辟根苗的溫室，嚴重的威脅著我們無產階級鬧革命的事業。

在這場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我們學習了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的公報，學習了中共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提高了我們的階級覺悟，觸及了我們鬧革命的政治靈魂，理髮行業的職工站起來了，要當革命的促進派，要當文化革命的尖兵、闖將大鬧革命、徹底革命，堅決拔掉那些修正主義根苗，堅決鬥倒、鬥垮、鬥臭那些販賣修正主義的禍手，堅決把無產階級思想陣地奪回來！

我們要聽毛主席的話，聽黨的話，敢字當頭，打破一切框框，大破大立，先破後立，立在其中，剷除資產階級一切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建立無產階級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一句話，就是要打碎舊世界，建立起一個嶄新的世界！

我們鄭重的向全國理髮行業革命的職工發出革命倡議，立即廢除統治我們多少年來舊服務專案、舊服務方式、舊規章制度。

一、堅決不理妖頭怪發：

1. 取締男式怪發：

1) 青年無縫式，2) 青年有縫式，3) 大背頭留鬚角，4) 吹波浪，5) 吹捲曲，6) 染發，7) 高平方頭，8) 扒克頭，9) 青年胡，10) 日本胡。

2. 取締女式妖發：

1) 有縫青年波浪式，2) 無縫青年波浪式，3) 長波浪，4) 斜波浪，5) 普通波浪，6) 前額蟹爪式，7) 前額蔥須式，8) 螺旋式和一切帶有捲曲的波浪等等，9) 電燙，10) 冷燙，11) 染發，12) 正反荷葉頭，13) 資產階級如意頭，14) 傷寒頭，15) 僑式頭，16) 梳吊辮等等怪髮型。

二、取銷高級化妝品：

1) 發臘，2) 發漿，3) 香水，4) 止癢水，5) 粘油，6) 杏仁蜜等。

三、廢除舊的服務方式：

1) 給顧客拉門，2) 向顧客點頭哈腰，3) 提衣穿衣，4) 不明身分亂稱呼大爺大娘，5) 對五類分子和資產階級分子稱呼同志，6) 理完發打閃鏡，7) 電話預約，8) 門市登記，9) 給熟人留號，10) 找專人理髮，11) 顧客進門遞面巾，12) 給顧客摘鏡子，13) 女顧客沖頭蒙臉。

四、破除舊制度：

1) 登門下戶（對工農兵有病照顧），2) 包月外活，3) 女顧客躺著洗頭，4) 操作規程中部分不符合實際的消毒項目，如手消毒，剪子滑毒，5) 品質標準，6) 舊的師徒合同，7) 技師稱號，8) 舊門面字型大小，9) 持火車票優先理髮，10) 先理髮後收款，11) 提成工資制度，12) 物質獎勵制度，13) 調整不合理的價格。

五、砍掉舊技術，

1) 刀削髮，2) 取耳，3) 打眼，4) 按摩，5) 推拿洗頭，6) 刮邊齊鬢角，7) 剪鼻毛，8) 挖耳窩，9) 絞臉，10) 女顧客刮臉剃眉，11) 摘眉毛，12) 修指甲，13) 剃滿月頭，14) 剃死人頭。

六、摧毀舊的習慣勢力：

1) 職工之間稱呼哥們爺們等，2) 講行話，3) 請客辦酒席，4) 年節送禮，5) 給死人辦周年，6) 小孩辦滿月，7) 過百歲，8) 話神論鬼宣揚封建迷信等等。9) 師徒如父子之稱，10) 男女活技術界線，11) 春節延長營業時間等等。

堅決響應毛主席關於“工人以工為主，也要兼學軍事，政治，文化。也要搞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也要批判資產階級”的偉大號召，把我們理髮行業，辦成一個社會主義的大學校。更好的為階級鬥爭，生產鬥爭，科學試驗三項偉大革命運動服務，全心全意為工農兵服務。為此提出以下新措施：

一、廣泛宣傳最高指示：

1· 營業室、宿舍必須懸掛毛主席象，根據各個時期的政治形勢和政治任務，懸掛毛主席語錄。

2· 營業室大力增添毛主席著作單行本。

3· 會前、班後讀毛主席語錄，少而精，針對性要強，不斷解決活思想。

4· 經常宣傳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先進思想和模範行動。

二、堅持毛澤東思想掛帥：

1· 樹新思想：1) 理髮員和廣大工農兵要建立革命式的新型關係，以革命為共同目的，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2) 職工之間建立同志式的關係，互相學習，互相幫助，達到政治上的團結，政治上的進步。3) 建立新型的師徒關係，制定突出政治的師徒教、學協議書，造就無產階級革命接班人。

2·立新制度：1) 理髮實行賣票制度。2) 提成工資改為固定工資制度（九月分實行），3) 理出樸素、大方，適合工農兵要求的髮型。

三、永當革命促進派，

1·認真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不斷改造思想，清除私心雜念，樹立革命人生觀。

2·站穩無產階級立場，堅持革命原則，提高階級覺悟，隨時準備批判資產階級，向一切資產階級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作不調合的鬥爭。

在此我們向全國理髮業革命的職工，緊急呼籲，希望對我們這一行動，給予革命的支持。讓我們：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乘勝前進，堅決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不獲全勝誓不甘休。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

偉大的中國共產黨萬歲！

偉大的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

偉大領袖毛主席萬歲！



1966年8月19日起，北京發起了一場規模空前的“破四舊”運動，並迅速傳遍全國。北京中學生紅衛兵上街演講、張貼大字報、撒傳單，宣傳“造反有理”。北京二十八中（時改為東方紅中學）紅衛兵在前門街頭宣讀文革傳單。

（照片均為 許林 攝影）

劉衛兵（以下圖片說明中加重的字體為作者的話）：照片上的破四舊發生在我出生的前一年，那時候的孩子在娘胎裏似乎都感受到“文革”的氣息。破四舊把北京原本剩下不多文物古跡基本砸爛，最後總算留下故宮、天壇，否則真不知道今天的中外遊客去哪兒旅遊，去哪兒看古都風情。如今時常散步到前門，看看現在，再想想當初，感覺經歷了“兩重天”。



紅衛兵們還發起了“改名運動”，北京許多商店、街道，都被改了名。北京王府井大街“四聯理髮館”被改名為“北京理髮館”，門前貼著“剪刀不留情專截牛仔褲，推子要革命去你阿飛頭”的對聯，橫批是“興無減資”

——攝影：許林



北京東安市場被改名為“東風市場”。8月底的一天下午，我與攝影師蔣鐸一起到改名後的東風市場拍照，看到幾個穿著綠軍裝戴著紅袖標的紅衛兵，手持新的寬大軍用皮帶，扭著一個男子進到商場裏，說是黑五類，用皮帶抽打他。攝影：許林



北京“東交民巷”被改名為“反帝路”，8月，群眾在東交民巷觀

看“中國人民銀行革命造反者”張貼的《“反帝路”革命宣言》大字報。攝影：

許林



紅衛兵搗毀寺廟鬥爭和尚



孔廟大成殿明代彩塑孔子身上貼滿標語



1966年8月28日，北京市瑪麗亞方濟修女會被取締，修女遭到批鬥。



文革中的西藏



給戴上新式高帽子七鬥八鬥



第六節 毀滅文物

一、自己關門焚毀資料

因怕惹禍而自己關門燒掉、毀棄的珍貴物品不知凡幾。畫家李可染藏有一幅齊白石所贈的畫，上有齊題的幾個字：“可染弟子書畫可以橫行天下。”李氏無處藏畫，又怕“橫行天下”惹禍，只好採取笨法，用剪子剪去了這幾個字。

同任何外國人聯絡都可能引來殺身之禍，曾經到過外國的學者無不膽顫心驚。

著名的物理學家黃昆是美籍華人、諾貝爾物理獎獲得者楊振寧的老同學、老朋友。

幾年前，他曾收到楊輾轉托人送的一本《基本粒子——原子物理上一些發現的簡史》。楊振寧在扉頁上題了詞：“給黃昆：紀念我們共同瞭解現代物理秘奧的時日。”

當時形成的熱情的友誼沒有隨時空的隔離而消失。“現在，黃昆捨不得毀掉這本老朋友的著作，又怕楊的名字惹來橫禍，思量再三，不得不撕去毀掉了楊振寧題字的那一頁。(74)

曾經是名記者的蕭乾，四十年代為研究英國二十世紀偉大作家摩根·福斯特「《印度之旅》的作者」，曾同福斯特頻繁通信，存有福斯特給他的八十多封信，其中有四十多封從沒複製過。在“紅八月”的恐怖中，他的妻子文潔若被扣上一頂寫著“現行反革命分子”的高帽，跪在機關大院的一輛平板三輪車上示眾。蕭乾身為“右派分子”，知道若一旦讓紅衛兵抄出那些“外國人”的信，他們斷無生路。他無計可施，當晚看著姐姐將愛·摩·福斯特的八十多封信一一送進了火堆。一代大作家福斯特的珍貴史料就這樣消失在了北京城的火堆之中。(75)

原北京大學校長馬寅初雖已八十五歲，其子女仍耽心抄家者會從馬的文稿中找出毛病鬥他，於是將馬的書信、手稿，包括他多年撰寫的《農業經濟學》手稿，全部連夜燒毀。而由於周恩來指示過保護馬氏，他的家後來並沒有被抄。

自從一九五四年起就擔任毛澤東專職醫生的李志綏有寫日記的習慣，為毛工作十幾年，積累了十幾本日記。因恐懼紅衛兵抄家，他在一個晚上將日記全部付之一炬。(76)

沈從文保存了四十年的書信存放在他大哥處，全部被燒；幾十年間康濯給孫犁的信，一直一捆捆地放在書櫥中，如今也交給了一把火。(77)作家巴金存有其大哥給他的信，珍藏保存了幾十年，如今巴金知道自己是革命物件，“不得不偷偷地燒掉”了。(78)

上海女昆曲演員嶽美緹保存有上海戲劇學校校長、恩師俞振飛的一百五十多封信。文革一開始，上海市文化局派人找到嶽，說：“X X 已上交了俞振飛給他的五十多封信，你也和他通信，馬上回去拿。明天一早交到文化局來！”岳不得不從俞的信中挑出十余封不會給俞惹出麻煩的信上交，將其餘的信燒掉。她記述道：“我一個人躲在二樓曬臺的角落裏，劃著一根火柴，一邊流著淚，一邊把那一封封彌足珍貴的信件扔進火苗中……”(79)

曾經參與組建中國共產黨、出席中共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包惠僧，二十年代末脫離共產黨後，在國民黨政府裏作過官。一九四九年底，他從澳門到北京，重回中共懷抱。周恩來給了他一個國務院參事室參事的職位。他與中共創始人、第一任總書記陳獨秀（號仲甫）關係密切，他出席中共第一次代表大會，就是陳指定的。他收存有陳獨秀自一九二〇年起先後給他的一百多封信。幾十年間他走南闖北，一直帶在身邊，精心保存。後又一一裱糊裝訂成冊，寫了前言，題以《陳仲

甫先生遺墨》，以圖永久收藏。可是“紅八月”的抄家風刮來，他挨了一頓棍棒後，嚇呆了，竟讓子女將那一百多封信全送進了火堆！（80）

當時在上海居住的的畫家林風眠家被抄家、畫被焚燒，又在風聲鶴唳中自己將留存的作品浸入浴缸、倒進馬桶、沉入糞池。

中央文史館副館長沈尹默是名滿天下的上海書法名家。年屆八十四歲的沈老怕“反動書畫”累及家人，又擔心焚燒時讓外人看見告發，罪加一等，老淚縱橫地將畢生積累自己的作品，以及一批明、清大書法家的真跡一一撕成碎片，在洗腳盆裏泡成紙漿，再捏成紙團，放進菜籃，讓兒子在夜深人靜時拎出家門，倒進了蘇州河。

著名的木刻家劉岷（中央美術館館長）被勒令將全部“四舊”交到機關後，默默地把他多年來的木刻原版擦在冬季取暖的大爐子旁，然後點著火爐，任兒子在一旁放聲大哭，默默地將木刻版一塊塊地投進火爐，全部燒光！

前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周小舟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被定為反黨集團成員後，於一九六二年到中國科學院中南分院任副院長。文革一來，他是當然的牛鬼蛇神，日夜批鬥。他在十二月間自殺身亡之前，將自己畢生珍藏的歷史文物全部燒掉。他一邊燒，一邊放聲大哭：“這才是真正的有罪啊！”（81）

二、想盡方法丟掉金子

當時中共領導人康生說：“天津呀、北京呀、上海呀、武漢呀，抄了資本家的家，光抄出黃金就是一百二十萬兩，就是六十噸；白銀十二萬噸，這還不包括銀元。……據說有些紅衛兵拿過來一看，不知道這個是美元，就燒掉了一些……成績是偉大的。”（82）

因為多年兵荒馬亂，中國人凡家中有點積蓄的都存些金子，防備動亂年月衣食無著。但在革命小將看來，金子是資本家或地主或任何反動派的象徵。許多人在抄家被抄出金銀首飾，因而被活活打死。

北京有位叫何敏的女子，自己沒有金子，可是她母親有一些金子，母親誤以為子女沒有問題，偷偷地將金子藏在了女兒女婿的箱子裏，沒有告訴他們。何敏不知道箱子裏有母親偷放的金子。紅衛兵抄家時發現了金子，當場將何敏的丈夫打死，就地挖個坑埋了。何敏則被送進監獄，判了十年徒刑。在關押了九年半之後，她在獄中懸樑自盡。(83)

命都沒有了，要金子何用。一時間人們都聞金喪膽，唯恐因被抄出金銀而送命。凡家中有金銀首飾的，想盡一切不顯眼的方法丟掉了事。最多使用的方法是扔進公共廁所的糞坑裏，因為這樣做最安全。只有一個例外：天津一對劉姓夫婦乘抄家者還沒光顧他們家時，先將金錠、金鐲子和金戒指裝進一隻信封，沒封口也沒署名，乘夜色投進了郵筒。紅衛兵在他們家抄家時沒什麼收穫，他們也慶倖沒因黃金惹禍。但十六年後家庭經濟拮据，他們想到了當年扔掉的黃金。懷著問無害的心情去郵局一問，竟發現當年的郵遞員張大同取到那個信封後，在郵局的《拾物登記簿》上作了詳細記錄。該夫婦領回了一筆現款，比將金銀扔進公共廁所的糞坑的人不知幸運了多少。

有些四出抄家的紅衛兵，特別是仗著老子是高幹的幹部子弟，借“破四舊”的名義中飽私囊，所以，當時的江蘇省公安廳長洪沛霖認為紅衛兵“破四舊”就是搶劫。他對副廳長顧亭說：“現在還要偷嗎？只要有個紅袖套，到人家拿就是了。”公安部要各省公安廳彙報紅衛兵的戰果，他卻指示說：“趁這個機會，把紅衛兵抄家中的問題報上去，叫中央也知道知道。”(84)

其實，下面不報告，中央也知道。當年八月十八日在天安門城樓上受到毛澤東接見的高幹子弟紅衛兵，有的褲袋裏就裝著抄家得來的金條。正如葉劍英元帥所說：“有些青年，特別是中學生，對於經濟很有興趣，這是極端危險的事情啊！在抄家時，有的把金條裝起來了，半導體收音機在他屁股後頭掛起來了。那次在天安門開大會時，就（在城樓上）拾到一些金條。”（85）當時他們祇是貪點小便宜，並沒有想借此發財。十幾年後中共對外開放，港、台商人進入大陸收購文物，他們才發現國寶級文物可以使他們終生享用不盡。中國的國寶大量流失海外，禍始於一九六六年“紅八月”的抄家運動。

三、“消滅伊斯蘭教！”

宗教界的“破四舊”，不是從一九六六年開始的。中共一九四九年控制政權以後，到處拆廟庵、趕僧尼。譬如，浙江建德縣“一九四九年有寺五十五座，庵五十一座……建國初期，寺庵大部份被拆除或改作他用，僧尼相繼還俗。”（86）遼寧台安縣，“各寺廟在解放後均被徵用或分給群眾用，現廟宇已無存。”（87）

五十年代有部電影《古剎鐘聲》，編造了一個故事，說國民黨特務隱藏在一座古剎裏伺機搞破壞。四川丹棱縣委書記看了電影，連想到該縣有個千年古剎竹林寺（五代時詩僧可朋在此住過，又稱可朋祠），懷疑它會成為特務潛伏的據點，下令拆除，並強迫寺僧全體還俗。那個千年古寺由是平毀無遺。

到文革前夕，全國的宗教場所已殘存無幾。

一九六六年八月，紅色風暴從天而降。台安縣回民作禮拜的清真寺完全被毀，阿訇被批鬥，家產被抄沒。（88）寧夏回族自治區在全區範圍內大拆清真寺。譬如海原縣，僅三四天時間內就拆除清真寺六十七座、廟宇十七座。（89）

可幸的是，寧夏最大的清真寺一九三六年曾被中共紅軍徵用，紅衛兵看到門前寫著“陝甘寧省豫旺縣回族自治政府舊址”的牌子，知道那是黨的“革命聖地”，因而未在該寺搞破壞。

周恩來剎住滅回運動

歷來漢、回就有民族糾紛，但從未弄到漢人強迫回民吃豬肉的程度。如今共產黨不信邪，硬指回族不吃豬肉是“四舊”。中共青海省委強行規定回民每戶每年上交兩頭豬，命令回民農家和清真寺養豬，連清真寺的阿訇也有交購指標、不得例外。清真寺成了養豬場，回民農家蓋起了豬圈。穆斯林們忍氣吞聲，有的不得不買來豬上交。

九月十二日，外交部長陳毅見到一張《行動起來，消滅伊斯蘭教！》的傳單，覺得非同小可，立即交給了周恩來。周發現“破四舊”出了格，召集國務院宗教事務局和中共中央統戰部負責人開會，要查出是哪個地方發的傳單，可是傳單已經傳遍全國。(90)他不得不再三對紅衛兵表明立場說：“北京大字報貼了很多，有的我們是不同意的，例如《為徹底消滅伊斯蘭教而鬥爭》的大字報……”(91)滅回運動這才告一段落。

到了一九六六年“破四舊”，西藏的喇嘛教文物便遭到了滅頂之災。僅以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貴德縣為例，八月間，“摧毀了建築藝術水準較高的文昌廟、南海殿、貢巴寺等四十五座寺廟。燒毀宗教用品及經卷六十八萬部（件）……”(93)

八月下旬，班禪喇嘛西藏日喀則的家和青海的舊居被抄光。「文革後，西藏自治區擬折價五十萬元賠償他在日喀則的家被抄的損失，他未接受。」中央民族

學院借用外語學院的操場召開萬人大會鬥爭班禪。會中曾強迫他吃屎，因為據說有人曾用班禪的糞便做成藥丸，給人治病。

出於國際關係的需要，周恩來煞住了那場滅回運動。可是西藏事務屬中國“內政”，中共自可以關起門來革命。周恩來對西藏學生說：“達賴叛國……班禪其實和達賴一樣，但有區別，（當時）要反達賴就得利用班禪。現在農奴的逐步解放，不能不觸及到他們的利益。他就不幹了，寫出了萬言書，反黨。”（94）“最近你們對他進行了三次鬥爭，很好。”“這次文化大革命是思想大革命，就是把喇嘛制度徹底打碎，解放喇嘛。……現在，西藏正在破四舊，打廟宇，破喇嘛制度，這都很好。”（95）

雖然他說“廟宇是否可以不打爛，作為學校、倉庫利用起來。佛像，群眾要毀可以毀一些，但也要考慮保留幾所大廟，否則，老年人會對我們不滿意。”（96）實際上西藏眾多廟宇都是在打爛毀壞後才作為學校、倉庫利用的。只不過紅衛兵為圖省事，對大部份佛像僅斬首了事，胸部以下部份皆留下未砸。

西藏覺拉寺有個藏王松贊幹布（西元 617-650）死後由文成公主親自主持塑造的他們二人的塑像，一九五六年四月西藏自治區籌委會成立，陳毅副總理率中央代表團前往祝賀時，曾參觀該寺並囑咐寺內喇嘛好好守護。但現在松贊幹布成了“大農奴主”，文成公主是唐朝皇帝的女兒，都是牛鬼蛇神。於是那對已有一千二百年歷史的塑像就被砸了。

四、全國佛寺大清掃

一百年前信了“天主”的洪秀全，見到孔子牌位就砸。四十年前的民國將軍馮玉祥歸皈基督後，把開封的千年古跡相國寺和城內城外的廟庵、道觀全都拆

除，連中華民族的老祖宗大禹的銅像也毀了去造銅元。如今信仰了馬列洋教的青年，對佛教的仇視與教徒之排斥異端毫無二致。

相傳中國第一個佛教寺院是坐落在古都洛陽城東的白馬寺，建於整整一千九百年前。有白馬馱梵文佛經。現存白馬寺為明代重修，迄今也有近五百年的歷史。

“破四舊”時它自然也是洗劫物件。寺院旁邊有個白馬寺生產大隊，黨支部書記率領農民去革命，亂砸一通，一千多年的遼代泥塑十八羅漢被毀，兩千年前一位印度高僧帶來的貝葉經被焚。稀世之寶玉馬被砸爛。幾年後，柬埔寨流亡君主諾羅敦·西哈努克指名要朝拜白馬寺，周恩來趕緊下令將北京故宮裏的貝葉經和京郊香山碧雲寺的清代十八羅漢運到洛陽，來個冒名頂替，才解決了外交難題。(97)

山西代縣有個天臺寺，建於一千六百年前的北魏太延年間，塑像、壁畫甚為珍貴。雖然地處遠離縣城的山溝，“破四舊”者不畏艱險，前去將塑像、壁畫一掃而空。(98)

山西絳縣華山腳下，始建於唐、元代重修的太陰寺的壁畫，“其繪畫藝術之高超可與永樂宮壁畫相媲美，可惜毀於十年內亂。”(99)

湖北新洲縣始建於唐代初年的報恩寺，規模宏大，占地百畝，毀於“破四舊”。湖南甯鄉縣密印寺，有唐宣宗禦題寺額“密印禪寺”。一九三四年重修時以“鑲金佛像磚一萬二千一百八十二塊嵌諸四壁。”“破四舊”時“遭到嚴重破壞”。文革後，日本佛教史跡參觀團欲前往訪問，湖南省政府趕緊斥資維修，方為中國挽回了一點顏面。(100)

陝西省鎮巴縣建於宋代的篙坪寺，經歷代屢次修建，保存至今，毀於一九六六年。惟寺內的大鐘重達六噸，紅衛兵欲破不成，得以倖存，是迄今中國現有的最大的古鐘之一。

唐朝名僧鑿真東渡日本前，曾往浙江湖州一寺院講經，並囑咐該寺主持鑄一尊鐵觀音。宋天聖三年，鐵觀音鑄成。九百多年來，因天災、兵禍，有一半的時間立在風雨之中。可是它不蝕、不鏽、不裂，完好如新。近代化驗，含有鈦、錳、鉻等元素，堪稱不銹鋼。這是中國古代科技文明一大實證，其製作遠在西方不銹鋼誕生之前。紅衛兵欲打倒這尊鐵觀音，用鐵錘敲、石塊砸、大火燒、鋼鋸鋸，都不成功，小將們祇好作罷。事後，幾位工人將它藏進煤堆，度過這場浩劫。不幸八年後“批孔”，一個六六年時的小學生發現鐵觀音的雙手是另鑄成後裝上去的。那個愚昧的青年將雙手搞下，送到廢品收購站，換了幾塊錢。那鐵觀音就從此成了無臂殘廢。

位於陝西乾縣的唐高宗與武則天合葬的乾陵，陵園前六十一尊雙手合十的石像的頭顱均被敲壞。

四川樂山背靠烏尤山面對青衣江的大佛，高近七十米，無人砸得了。大佛背後烏尤寺的五百羅漢卻是泥塑的。紅衛兵一一砸去，堪稱雕塑精品的五百羅漢全變成了無頭佛。

新津縣在成都去的紅衛兵的幫助下，“將川西名勝”純陽觀“的所有塑像搗毀。全縣……絕大多數廟宇的塑像、壁畫被搗毀。”(101)什邡縣始建于唐代的龍居寺，山口至寺前的山道，本來古柏參天，一九五一年中共為修鐵路徵集枕木時，已將道旁古柏悉數砍去。如今“破四舊”，目標只在寺內。“寺內神像全被搗毀，門前大獅子被掀入溪澗中，所藏經書全部收繳，殿內器具無存，寺宅為之一空。”(102)

宋朝末年，蒙古侵略軍打到四川，宋人在今合川縣嘉陵江、涪江、渠江三江會合處構築釣魚城，作為全川防禦中心。十萬軍民同仇敵愾，抗擊侵略軍，堅守

了三十餘年。西元一二五八年，蒙古大汗蒙哥（元憲宗）中矢死於釣魚城下。釣魚城遂成一歷史名城。七百年來，積有不少文物。千佛岩上有兩千七百多尊三寸高的佛像，“紅八月”中全部被毀。(103)山東濟南市南郊玉函山佛峪有九十五尊隋代石窟佛像，除佛身尚完好外，面部全都在文革中破壞。(104)

九月，山西大學的學生到山西五台縣佛教勝地五臺山去掃蕩四舊，除了砸廟宇外，將大多數和尚、尼姑鬥爭了一通。學生走後，當地黨組織下令，將二百八十九名僧、尼、喇嘛逐出山門，強制遣送回了原籍。(105)老尼姑白銀珍（蒙族）已九十六歲，被趕出五臺山後，無處落腳，不得不回到內蒙古草原，與幾個親人相依為命。她大難不死，過了二十年，竟成了內蒙古自治區第一號老壽星。

五臺山曾有一位和尚刺指咬舌，以毛筆蘸血，化了四年時間寫下了一部七十五萬字的《華嚴經》。抗日戰爭期間日本人曾借到東京展覽過半年，並按期原物歸還。而今開到五臺山的紅衛兵將它劫走，這部人間難得的血寫的經書就從此消失，再也無人知其下落。

八月十三日，安徽休甯縣的齊雲山的眾多廟宇被本縣學生搗毀神像兩千餘尊。

九月初，由屯溪縣開來數百紅衛兵，將剩下的神像搗毀殆盡。(106)佛教聖地皖南九華山，僧、尼全被勒令還俗，成為當地公社佛教大隊的社員。香火既絕，謀生不易，政府補助還俗僧、尼每人每月五元生活費。一些僧、尼則配對成了家。

陝西周至縣境內，有兩千五百年前老子（哲學家李耳）講經授學並留下傳世之作《道德經》的樓觀台。這道教聖地是中國最古老的道教宮觀。兩千年來，道家一直尊老子為“太上老君”。以他當年講經的“說經台”為中心，方圓十裏之內，散佈著五十多處古跡，包括唐太祖李淵為他修的、迄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歷

史的“宗聖宮”。如今樓觀台等古跡被破壞，道士們則全都被迫離開。按教規，道士出家後永不得刮鬍子、剃頭。現在則被迫剃頭、脫下道服，成了人民公社社員，有的還成了當地農家的上門女婿。

福建省南平市郊佛教寺院明翠閣，始建於南宋。四十年代，自空和尚到東南亞各國，一邊募緣，一邊博覽各國寺廟建築，歸來後將該閣修得獨具一格。時隔僅二十年，這座名閣就被毀殆盡了。「八十年代按原設計重修。」福建德化縣的千年古剎靈鷲岩寺，十六世紀重修後成福建的佛教中心，“破四舊”中被毀。「一九八八年海外華人佛教徒捐鉅款修復該寺」（107）

哈爾濱市最大的佛寺極樂寺，全部銅制、木制、泥塑佛像，還有漢白玉石獅子和古文物鐵鼎，通通被毀。極樂寺塔本是哈爾濱一景，被“紅衛兵搗毀塔身羅漢浮雕八尊，塔內壁畫二十四幅，佛像七尊。”該市尼古拉大教堂，是世界上僅有的兩座同樣的俄國東正教大教堂之一，教堂建築連同經卷、器皿，全部毀之一旦。（108）

山東嶗山道家聖地，太平宮、上清宮、下清宮、鬥姆宮、華嚴庵、凝真觀、關帝廟等，“神像、供器、經卷、文物、廟碑全被搗毀焚燒。”（109）

五、周恩來保護了一批文物

杭州靈隱寺是中國一大國寶。當中學紅衛兵要去革命前，浙江大學學生急電周恩來要求保護。周緊急指示杭州駐軍與浙江大學的紅衛兵合作，圍住靈隱寺，使之安然渡過“破四舊”狂潮。不過，周恩來派往浙江奉化蔣介石老家的部隊晚了一步。隊伍開到時，從寧波去的中學生已經用炸藥完成了他們的革命。蔣母墓地被炸平不說，早年蔣介石常去遊玩的古剎也被平毀，廟裏的和尚則都被勒令還俗去種田，成了人民公社社員。

被稱為中華民族“文化長城”的“四庫全書”，其中一庫即杭州文瀾閣。抗戰期間，為免落入日本人之手，庫書曾先後搶運至浙南、貴陽、重慶，勝利後才運回杭州。六六年以前，每年翻曬並重點整修。“破四舊”風一起，杭州大學教授宋雲彬、王駕吾等與校長陳建功聯名電請周恩來總理下令保護。周即刻命令封閉文瀾閣，全部庫書躲過一劫。可惜的是，十年後開封時，庫內黴氣撲鼻，許多藏書結成了餅塊。全杭州的裝裱工人加以搶救，協力工作了一年多，方得恢復舊觀。(110)

周恩來還派兵保護了敦煌莫高窟。但就全國而言，能保護下來的文物相當有限。大多數政府官員怕被攻擊為“反對文化革命”，不敢出面制止“破四舊”中的瘋狂行徑。少數有心保護文物的官員也權威不靈。湖南衡山縣縣長得知紅衛兵要上南嶽衡山去“破四舊”時，搶先趕到，跪在山下，苦苦哀求青年們不要破壞那些千年的文物古跡。但沒人聽他的。衡山大小一百多座寺廟裏的各種珍貴的雕塑品，除了劉備、關羽、張飛三尊恰在部隊施工範圍內，被苫布遮蓋而倖免外，全部被砸毀。

那位縣長因而活活氣死。

六、附：破“四舊”軼聞

毛澤東“文化專政”的物件是“封、資、修”。

不過，“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修正主義”，畢竟有點深奧，所以八月初中共中央公佈《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時，用一個“舊”字替代了“封、資、修”：“資產階級雖然已經被推翻，但是，他們企圖用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來腐蝕群眾，征服人心，力求達到他們復

辟的目的。”那“四舊”真是通俗易懂：“封、資、修”都屬“四舊”，凡是“舊”的就是“封、資、修”，就要對它“專政”。

其實，共產黨裏嗅覺靈敏的人已經搶先行動起來了。譬如山西省會太原，四月間中共新派去一個市委書記。他從北京刮來的風裏嗅出味道，新官上任第一把火就是砸古跡：“決定把一百九十處廟宇古跡，祇保留十幾處，其餘通通毀掉。”據作家慕湘記述：“芳林寺，一個上午全砸毀了。省文物館的高館長聞訊趕去，拾回一包泥塑人頭，含著眼淚送給我看。晉祠本來是國務院重點保護單位……幾座殿堂的塑像也砸掉了。當初為了陳列東方藝術而集中起來的大批木雕像，也都劈成廚房的柴薪。我見了急忙跑回住處，拉來同住的山西省副省長鄭林同志，才把一個明代雕刻的全身貼金的台駘（流經山西的主要河流汾水之神）像從斧頭下搶救出來。”（1）

◇中學生髮起“破四舊”運動

共產黨領導的學校，目的是“培養革命接班人”。一九六四年八月毛澤東與在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讀書的侄子毛遠新的談話紀要，作為檔傳到各地後，毛的指示“階級鬥爭是你們的一門主課”（2）廣為流傳。中學生裏對政治最敏感的一批人，特別是以“革命接班人”自居的中共幹部子弟們，從小喝黨的奶水長大，不曾受過中國文化的薰陶。自一九六六年春起，他們便用“階級鬥爭”的眼光觀察四周，尋找革命對象。從六月開始，學校停課，中學生們先在校園裏革老師的命。老師打膩了，便殺出校園去革“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右（派）”的命。毛澤東的“破字當頭，立也就在其中了”更為他們提供

了行動的靈感：“破四舊，立四新。”一九六六年八月的“紅衛兵破四舊”，不過毛澤東“文化專政”的一次實踐而已。

八月十七日夜，北京第二中學的紅衛兵擬就《最後通牒——向舊世界宣戰》，宣佈要“砸爛一切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理髮館、裁縫鋪、照相館、舊書攤……等等，統統都不例外。”(3)

次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首次接見百萬來自全國各地、以中學生為主體的紅衛兵。共產黨的幹部子弟們榮登天安門。集會到下午才散，除幹部子弟雲集的北京第一〇一中學將美術教師陳寶坤圍毆至死外，當天紅衛兵們沒做什麼大事。驚天動地的“砸爛舊世界”的行動是第二天清晨開始的。

一切外來的和古代的文化，都是掃蕩目標。中學紅衛兵（加上少數大學生）殺向街頭，以打爛一切“四舊”物品為宗旨，把北京城內外砸了個遍。八月二十二日，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向全國報導北京紅衛兵的偉大功勳。次日，全國各大報均以頭版頭條報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席捲首都街道”，人民日報更以社論《好得很！》大肆煽風點火。於是，史無前例的“破四舊”運動迅速燃遍了全國城鄉。

◇慘過八國聯軍的洗劫

一九〇〇年八國聯軍洗劫頤和園時，曾槍擊萬壽山頂的那千尊琉璃浮雕佛像。遊人行至山頂，每見缺鼻子少眼、五官不全甚至沒頭沒腦的佛像，無不痛惜萬分。而今北京的紅衛兵小將前去“破四舊”，似乎是為了替八國聯軍完成未竟的任務。凡是在戰火中倖存未毀而他們又夠得著的佛像，沒有一個倖免。

當年英、法侵略軍焚毀圓明園是為了洗滅其搶劫中華國寶的罪證。八國聯軍的兵痞槍擊萬壽山琉璃佛像純為取樂，並不存心毀滅中華文化。而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紅衛兵則有著崇高的革命理想。他們砸佛像，目的是剷除“舊文化”，園內佛香閣中的大佛塑像就這樣被摧毀了。

◇ “帝王將相、才子佳人” 皆反動派

北京體育學院就在頤和園附近。兩派學生中的一派因保工作組而弄得灰頭土臉，決計到頤和園去顯示其革命決心。頤和園內的三百米長廊及無數亭臺樓閣，幾乎每一個雕樑畫棟都有精細的畫，不是人物、故事，就是山水、花草、蟲鳥。人物畫都有典故出處，譬如“劉、關、張三英戰呂布”。四個人皆屬反動派，必須消滅。

他們在頤和園內仔細搜索，凡是畫了人物的，一律用白漆塗刷覆蓋，僅留下花草不予革命。“紅八月”過後，筆者到頤和園試圖尋找倖存的人物畫，發現一個不剩，連昆明湖西邊遊人鮮至的亭台都沒逃脫一“破”。

用油漆或者黃泥漿塗抹壁畫，是“破四舊”一大特色。譬如四川什邡縣建于唐代的慧劍寺，寺內有宋代畫像和明代高手畫的五百羅漢像。在“紅八月”中，那些珍貴的古代壁畫均被灰漿塗抹而徹底毀掉。

新疆吐魯番附近火焰山，有個千佛洞，洞內壁畫是珍貴的藝術品。二十世紀初，俄、英、德國等貪婪的商人曾盜割洞內壁畫，賣到西方。他們是強盜，重的是一個“錢”字。那壁畫流失到國外，是中國的重大損失。但畢竟還珍藏在博物館裏，並未毀掉。而中國人自己幹的“破四舊”卻重在一個“破”字：他們將剩下的壁畫中的人物的眼睛挖空，或乾脆將壁畫用黃泥水塗抹得一塌糊塗。存心讓

那些壁畫成為廢物。所以文學家阿英（錢杏村）說：“過去帝國主義劫奪我們的文物，我曾痛心疾首，夢想有朝一日全收回來。現在我倒想通了，如果讓這些不肖子孫毀滅了，倒不如讓外國人保存起來，總不至於毀滅，還能留存在人間。”

(4)

◇一千萬戶被抄家

北京市有十一萬四千多戶被抄家(5)。上海市，按周恩來的說法，“抄了十萬戶資本家。”(6)全國各地城鄉從無如此多的人家被抄！例如上海川沙縣五十多萬人，七千八百多戶人家被抄。(7)浙江嵊縣，八千餘戶被抄(8)。連僻遠的人口不多的雲南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縣，也有五百六十五戶被抄。山東威海市僅工商界、文化界人士就有二百七十五戶被抄家(9)。以農村人民公社為單位計，江蘇江寧縣僅一個祿口公社就有三百〇八戶被抄，抄走金銀器皿、飾物及日用品七千五百件，毀壞書籍無數(10)。上海奉賢縣青村公社三百一十五戶被抄，毀字畫二百二十七幅，書刊六千餘冊(11)。

全國上下總共約有一千萬戶人家被抄，散存在各地民間的珍貴字畫、書刊、器皿、飾物、古籍不知有多少在火堆中消失！

上海首富、永安百貨公司（後改名為上海第十百貨公司）原老闆郭琳爽，是上海“愛國資本家”的代表人物。屆時他正在香港為父親做九十大壽，接到上海市委統戰部回滬參加文化大革命的電話通知，匆匆趕回，卻被中學生抄了家。郭氏愛好玉器，珍藏百餘件名貴玉器。在紅衛兵眼裏那是“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玉器被砸毀無遺。郭氏夫婦在家門張貼署名大字報，表示“願將本人家私全部獻出”，但還是被鬥了無數次。

毛澤東在中南海的居所收藏有中國畫院畫家惠孝同作的畫。但此時國畫家幾乎全部是“牛鬼蛇神”，惠孝同也不例外。紅衛兵抄他的家時發現一隻木雕小象，全身通黑、唯象牙是用真象牙雕刻的。那是作家老舍訪問印度時印度友人的贈品，老舍轉贈給惠孝同的。“看你們這些反動文人還張牙舞爪的！”抄家者舉起小象就朝地上砸，將象牙砸得粉碎。他們將畫室砸得一塌糊塗，勒令惠孝同自書一幅大字“橫掃一切牛鬼蛇神”，貼於門窗，才揚長而去。

當時，中國特有的刻瓷藝術家僅剩北京朱友麟一人。周恩來曾規定朱的作品是國寶，不得出口。可是前去抄他家的紅衛兵卻認為刻瓷藝術品也是“四舊”，把他的作品摔了個稀爛。不久，朱淒慘地死去，國寶不復再現。

抄家高潮中，人民日報又發表社論《不准抹殺紅衛兵的功勳》，號召紅衛兵對“那些吸血鬼、寄生蟲”動手，“把他們的金銀財寶、殺人武器、變天帳拿出來展覽……”（12）於是，全國大抄家之餘，又有了個“大展覽”。

中央民族學院教授吳文藻是“大右派”，自然是抄家對象。他與妻子、女作家謝冰心夫婦的家被抄後，中央民族學院辦了個“修正主義生活展覽”，將從他們家抄出的物件，以及從別人家抄出的東西，一併算在他們二人的名下，對全校開放展覽。他們家既無金銀財寶，又無殺人武器、變天帳，只好拿皮鞋、料子衣服、進口手錶，各種“封、資、修”的書籍等，湊足了一個展覽廳。（13）

◇焚書燒畫

二十世紀初，商務印書館費時十餘年在全國搜購，曾征得四十六萬冊珍貴書籍。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本侵略軍進犯上海閘北，日機炸毀商務印書館，並縱火焚燒其東方圖書館，該館珍藏的那四十六萬冊書籍毀於一旦。該館董事

長、名學者張元濟痛心疾首，說：“工廠及其設備都可重建，唯獨我數十年辛勤收集所得的幾十萬冊書籍，今日毀於敵人炮火，無從複得，從此在地球上消失了。” “這也可算是我的罪過。如果我不將這幾十萬冊搜購起來、集中保存在圖書館中，讓它仍散存在全國各地，豈不避免了這場浩劫！”（14）

被日寇焚毀的是無法挽回的損失。可是張元濟哪裡會知道，倘若那幾十萬冊書當年不曾被他搜購起來中，仍散存在全國各地，能避過一九六六年八月那場浩劫的恐怕不會很多！“破四舊”遠甚於日本人製造的那場浩劫百倍！

北京名學者梁漱溟家被抄光燒光。文革過後，他回憶道：“他們撕字畫、砸古玩，還一面撕一面唾罵是‘封建主義的玩藝兒’。最後是一聲號令，把我曾祖、祖父和我父親在清朝三代為官購置的書籍和字畫，還有我自己保存的……統統堆到院裏付之一炬。……紅衛兵自搬自燒，還圍著火堆呼口號。……當紅衛兵們抱出兩本大部頭洋裝書《辭源》和《辭海》時，我出來阻止了。我說，這是兩部誰都用得著的工具書，而且是一位外地的學生借給我的，如燒了我就無法物歸原主了。紅衛兵不理我，還是把這兩部書扔進了火海，還一邊說：‘我們革命的紅衛兵小將，有《新華字典》就夠了。’”（15）

南京著名的書法家林散之珍藏多年的字畫，以及他自己的作品全部被毀之一炬後，被趕回到了安徽老家。

杭州名學者馬一浮是中央文史館副館長，他的家被搜羅一空。抄家者席捲而去之前，他懇求道：“留下一方硯臺給我寫寫字，好不好？”誰知得到的卻是一記耳光。八十四歲的馬老悲憤交集，不久即死去。

著名作家沈從文在中國歷史博物館工作。軍管會的軍代表指著他工作室裏的圖書資料說：“我幫你消毒，燒掉，你服不服？”“沒有什麼不服，”沈從文回

答，“要燒就燒。”於是，包括明代刊本《古今小說》在內的幾書架珍貴書籍被搬到院子裏，一把火全都燒成了灰。(16)

字畫裱褙專家洪秋聲老人，人稱古字畫的“神醫”，裝裱過無數絕世佳作，如宋徽宗的山水、蘇東坡的竹子、文徵明和唐伯虎的畫。幾十年間，經他搶救的數百件古代字畫，大多屬國家一級收藏品。他費盡心血收藏的名字畫，如今祇落得“四舊”二字，被付之一炬。事後，洪老先生含著眼淚對人說：“一百多斤字畫，燒了好長時間啊！”(17)

紅學家俞平伯自五十年代被毛澤東批判後，便是欽定的“資產階級反動學者”。抄家者用骯髒的麻袋抄走了俞家幾世積存的藏書，一把火燒了俞氏收藏的有關《紅樓夢》的研究資料。

前國務院交通部長章伯鈞是大右派。他一生喜歡藏書，曾對周恩來說：“一生別無所好，就是喜歡買書藏書。我死後，這些書就歸國家。”到六六年時，他的藏書與已逾萬冊。附近一個中學徵用他的家作紅衛兵總部，他的書便成了紅衛兵頭頭夜裏烤火取暖的燃料。後來，除少數善本書被北京圖書館收去之外，他的藏書全被送到造紙廠打成了紙漿。(18)

蘇州桃花塢木刻年畫社的畫家凌虛，五十年代曾手繪一幅長達五十尺的《魚樂畫冊》，由中國政府拿去，作為國寶贈送印尼總統蘇加諾。他化了幾十年的工夫，收集到上千張中國各地的古版畫，如今被燒了個一乾二淨。

中國畫院副院長陳半丁年已九十，批鬥之餘，作品被焚燒。陝西畫家石魯被拉到西安鐘樓大街的鐘樓外，當街吊起來，在人群的圍觀中接受批判。

他的“黑畫”

被一幅幅拿出，要他供認那些山水花鳥的“反動內容”。批鬥一幅即撕毀一幅或在畫面上用紅筆打個叉。上海畫家劉海粟珍藏的書畫被抄後，堆在當街焚燒。幸虧一位過路人以“工人”的名義鎮住革命小將，打電話給普陀區委、上海市委，要求派人制止。在焚燒被止住前已燒了五個多小時，焚毀的字畫、器皿不計其數。

江青點名咒罵名畫家齊白石後，北京紅衛兵砸了齊白石的墓和“白石畫屋”，又逼著齊的兒子齊良遲刨平齊白石自題的匾上的字跡。上海畫院畫家朱屺瞻收藏的名人字畫被搜羅一空，他保存的七十餘方齊白石為他刻的印章被抄得一個不剩。朱屺瞻進“牛棚”時已七十五歲，能活下來已屬萬幸。其他上海畫院畫家，如白蕉、錢瘦鐵、陳小翠、吳湖帆則不如他幸運，都做了文革的屈死鬼。(19)

一九五二年，國畫大師張大千的前妻楊宛君將張在甘肅敦煌石窟現場臨摹的二百六十幅唐代壁畫全部獻給了國家，自己僅保留十四幅張氏為她作的畫。如今抄家者光顧楊宅，那十四幅畫被搜走，從此全都沒有了下落。

紅衛兵焚書，無遠弗屆。當年諸葛亮病死葬身的陝西勉縣，“珍藏於人民群眾中數以萬計的古字、古畫和玉石珍品，大部丟失或毀壞。”(20)四川蒲山縣鶴山鎮僅五千人，抄家銷毀的古書也多達兩千多本，古畫二百餘張。(21)廣西防城縣，“文物館幾千部古典書籍、文物、資料和檔案全部被燒毀。”(22)

邊疆也不例外。遠在天邊的雲南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縣，和老撾為鄰，離北京足有三千公里，可革命不落人後：“除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毛澤東的著作外，其他書籍都被列為”四舊“，大量焚燒。”(23)新疆首府烏魯木齊新華書店的存書，被搬到大街上一把火通通燒掉。黑龍江省中蘇邊境上的嘉蔭縣，中學生沖進縣文化館，將戲裝、圖書搬到街上，全都燒成了灰。

燒書污染空氣，送到造紙廠打成紙漿才是好辦法。江浙一帶人文薈萃，明清兩代五百年，著名書畫家大部份出在那裏，留存至今的古籍特別多，“破四舊”的成果也就特別大。僅寧波地區被打成紙漿的明清版的線裝古書就有八十噸！
(24)

◇改名字比賽席捲全國

商店字型大小不是“封”，就是“資”：“王府井”百貨大樓，“東來順”涮羊肉，“全聚德”烤鴨，“瑞蚨祥”綢布，店名都屬“封”。還有前門外小飯館“都一處”，那門匾是前清乾隆皇帝微服光顧後，題制遣人送去的，當然也是“四舊”。

卸下門匾，送進柴火堆，革命便告成功。“亨得利”眼鏡店是“資”，上海遷京的“波緯服裝店”也是“資”。紅衛兵不知道除不穿西服的毛澤東以外的幾乎所有的中共領導人都在那裏裁制過西服，僅周恩來一人就做過七套。他們砸爛商店的招牌，將店名改成“紅都”，抄了服裝大師餘元芳的家，將他押送回了浙江老家。(25)

八月十八日毛澤東接見百萬紅衛兵時，有幸給毛佩戴紅衛兵袖章的紅衛兵代表是中共中央東北局第一書記宋任窮的女兒宋彬彬。毛聽到她的名字後說道：

“要武嘛！”自此宋彬彬就變成了“宋要武”。一時間，改名字比賽立即席捲全國。

上海某工廠有個人，早先是資本家，名字叫“養民”。說資本家養活了人民，反動透頂。全廠日批夜鬥他，並勒令他將名字改成了“民養”。有位中學教師名“念修”，“想念修正主義！”全校大會批鬥後，學生把他押到派出所，改成了

“仰東”。本意是“敬仰毛澤東”，但其實念起來是“養東”，“養活毛澤東”。幸虧無人追究，否則死路一條。

街道名字中的四舊更是多得數不清。“仁、義、禮、智、信”是國民黨的信條，所以哈爾濱市的五條街光仁、光義、光禮、光智、光信改成了光明、光輝、光芒、光耀、光華。

中性的、不屬封資修卻不夠革命的，也在剷除之列。北京蘇州胡同小學的“革命師生”張貼《緊急通知》：“我們學校過去的校名蘇州胡同小學沒有革命的含義，我們堅決要求……改名為”長征小學“……”（26）四川宣漢縣第一中學被改成了“天兵戰校”。校長龐偉烈被天兵們打成重傷後，自戕而死。（27）

朱元璋時代避諱不得說“豬”，這“避諱”本是不折不扣的“四舊”。如今江青卻拾起“避諱”，把它變成了“四新”。她替出身“黑五類”的鋼琴家殷承宗改名為殷誠忠，從“繼承祖宗”改成“對黨忠誠”。京劇演員錢浩梁，姓氏上粘了銅臭的“錢”字，江青乾脆把它改成了沒有姓氏的浩亮。革命樣板戲京劇《智取威虎山》中有個土匪，因臉上有撮毛，人皆稱他“一撮毛”。江青從那個“毛”字聯想到夫家毛澤東，一聲令下，“一撮毛”便改成了不倫不類的“野狼嚎”。

◇抄收少數民族服飾

這“文化領域的專政”，是漢人的特權。少數民族的“文化”是否反動、是否需革命，以漢人的文化為唯一的判定標準。所以少數民族的文化整個成了革命物件。譬如雲南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縣，“金銀首飾、銀幣也被列為”四舊“沒收。凡是花紋、圖案、繪畫沒有革命內容的器皿、刺繡、服飾、傢俱等等，都算

為”四舊“，一概搗毀。” “強迫少數民族婦女改變民族服裝，交出首飾和服裝上的銀飾佩物，僅哈播一個鄉就收交了首飾、銀元八十多斤。” (28)

◇革命從頭革到腳

馬、恩、列、斯、毛，鬍鬚一個比一個少。所以蓄鬍子的人也遭了殃。寧夏自治區政府副主席、黨外人士黃治中的一尺餘長的銀須已蓄留了幾十年，現在突然發現那是“四舊”，祇得忍痛割愛。

女人的長辮也是革命物件。寧夏固原縣設了一個剪辮子站，趕集路過的姑娘凡留有長辮的一律強行剪掉。(29)

一些頭髮留得稍長的海外華人、港澳同胞歸國訪問，一到廣州就挨了一剪子。

副總理兼外交部長陳毅在北京接見他們時說：“不要見怪，你們看到我們這樣好的後代應當高興”。(30)曾三次蟬聯世界冠軍的乒乓球運動員莊則棟說了一句“紅衛兵剪人家頭髮，怎麼不去剪毛主席的？”算是攻擊偉大領袖，被掛上“現行反革命”的牌子鬥爭。(31)

香水、尖頭皮鞋、窄腿褲均屬“資本主義的東西”，一經查出，立即實施革命制裁。人民日報聲援紅衛兵，引用紅衛兵的話說：“難道工農兵還抹香水、穿尖皮鞋嗎？”(32)尖頭皮鞋並不多見，於是凡頭部略呈尖型的皮鞋都遭了殃。高跟鞋早在市面消聲匿跡。一般人也沒有。曾經出國演出的女演員、歌手、鋼琴家演出時穿的高跟鞋，如今都扔進了垃圾堆。駐外使領館的青年革命意氣風發，幹得一點不比國內差：“他們不准穿西裝、旗袍，不准坐進口小汽車，不准掛宮燈……”(33)

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曾在回憶錄裏記載了在天津見到的“破四舊”的場面：“我們遇到了紅衛兵設的路卡，正在檢查過往行人的著裝。……只見那些紅衛兵的手裏拿著剪子、榔頭等工具，對那些著裝打扮不”革命“的人，採取著非常”革命“的行動：有的長辮子被剪沒了，有的”怪發形“被推完了，有的”高跟鞋“被鋸掉了，有的”火箭鞋“被砸扁了……儘管這些人在和紅衛兵講理、央求，反抗，可是在”這是革命行動“一詞的壓力下，無一倖免。”（34）

◇龍、鳳皆屬“四舊”

共產黨是馬克思的傳人，自從共產黨上臺，“龍的傳人”的說法就在中國消聲匿跡。吉林省延吉縣龍井鎮，真有一眼“龍井”。那塊寫著“龍井地名起源之井泉”的碑石被學生砸毀。河南安陽縣自明代完好保存至今的九龍壁，被砸成了一堵頹壁。（35）

龍是“四舊”，鳳亦受累。廣西南寧市邕江大橋的欄杆有鳳凰浮雕，皆被砸毀。浙江建德縣審查各類商品，凡商標上印有龍和鳳圖樣的，一概沒收。大批商品因而被堆放焚燒，恰如當年林則徐焚燒鴉片。

當年十月，毛澤東表弟賀曉秋的儿子賀鳳生從湖南到北京向毛澤東告禦狀，告訴他湖南農村怎樣砸“老祖宗積攢下來的古董”：“毀了好多值錢的東西。接新娘子的花轎砸爛了，淩波床也打爛了，龍鳳朝陽、百鳥朝鳳的圖案打爛了，嶄新的雙鳳朝陽的絲綢被面放火燒掉……繡花鞋裏腳布也當四舊之物展覽。注滋口還把花露水、雪花膏當資產階級用品倒在河裏……”“打爛了人家的神龕，撕下天地君師父母的神位……換上毛主席像，供上毛澤東選集……”（36）

北京戲曲學校的學生把舞臺上半鬼蛇神穿的龍袍戲衣、鳳冠、玉帶、朝靴等戲裝和各式道具集中到孔廟大院中，堆成一座大山，點起大火，燒了個一乾二淨。

焚燒戲裝道具之風刮遍全國。各地方劇團的戲裝道具均在被“破”之列，如湖南寧鄉縣花鼓戲劇團的戲裝道具，“絕大部份被毀。”（37）連僻遠的黑龍江省中蘇邊境上的嘉蔭縣文化館的戲裝也中學生搬到街上，一一焚燒了事。

◇全國的獅子都遭殃

周恩來領導的國務院對保護文物出過不少力，一九六〇、六一年間曾發佈一系列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名單，各省、市、縣亦循例將當地主要歷史文物納入重點保護的名單。但如今周恩來卻也趕起革命時髦來。他對北京“革命師生”說：“獅子非搬掉不可，對獅子來一個最後通牒，連我們這個（包括新華門在內）獅子統統搬掉了。對獅子下最後通牒，我是同意的，因為那獅子是封建產物。”（38）

這一來，全國的獅子都遭了殃。大連星海公園一對漢白玉獅子被砸得腿斷身殘。瀋陽遼寧省博物館門前的一對彩陶獅子被砸爛。湖南寧鄉縣鄉間，橋頭多有石獅子為飾物。那些石獅子“在破四舊中絕大部份被毀。”（39）江西安遠縣宗祠，門前多立石獅，屋脊正中安放小石獅，門樓鑲嵌石雕門額。“紅衛兵掃四舊，視石刻為封、資、修的產物，肆意毀壞，今存甚少。”（40）

山西運城博物館原是關帝廟。因運城是關羽的出生地，歷代修葺保存得特別完好。門前那對高達六米的石獅子可能是全國最大的。母獅身上還有五隻幼獅，是一件藝術珍品。如今，那對獅子成了周恩來所說的“封建產物”，被砸得肢體斷裂，面目全非；母獅身上的五隻幼獅都砸成了碎石塊。當夜，省城太原發去電

報，說是要執行周總理的指示保護文物古跡。但是太遲了，殘破的獅子已被拉走，扔進了臭水坑。(41)

◇ “盆花是舊社會留下來的”

早在一九六四年，毛澤東就說過：“擺設盆花是舊社會留下來的，是封建士大夫階級、資產階級公子哥兒提籠架鳥的人玩的。那些吃飽了飯沒有事情做的人，才有閒工夫養花擺花。”(42)據周恩來身邊的工作人員張文才回憶：一九六六年上半年某日，周恩來到毛澤東住處，詫異室內室外都見不到花，毛回答周，他不喜歡養花，叫花工都搬走了。頭腦機靈的周恩來馬上表示贊成毛的意見，回家後立即通知下屬，將兩間花房的花全部送到了植物園。

中共打天下時的總司令朱德不認為有必要像周恩來那樣迎合毛澤東。他照樣伺弄他的蘭花。可是“紅八月”中的一天，他從外面回到家裏，發現他心愛的幾盆蘭花被孫子砸了，氣得舉起拐杖打去：“你們這些不肖子孫！”但這時舉國都在“破四舊”，他沒有辦法保住他的蘭花，便將剩下的蘭花悉數送給了北京花木公司。(43)

成都唐代古寺文殊院，栽有名貴蘭草。該寺的蘭草全被毀掉，包括幾年前朱德訪問故鄉時贈送的蘭草。與朱交流過蘭草栽培技藝的和尚僅從紅衛兵手中奪回一隻花鉢。(44)

長春不少人養植君子蘭，全城的君子蘭都被拔，毀成泥。僅少數人養植能手將君子蘭藏於下水道、廢品庫，甚至藏進動物園的老虎圈中，方使君子蘭未得絕種。

北京釣魚臺國賓館每座樓前都有個花圃。江青、陳伯達、康生、姚文元等人各占了一個樓的南區，花草還得為這些無產階級新貴服務。而北區的花草就都成了“資產階級的玩意兒”，被革了命。兩年後北區要重新接待外賓時，兩座樓前的花圃裏卻分別是無產階級的菠菜和玉米。緊急調動一個班的戰士一一鏟掉，然後再到處找花。偌大的北京城竟然無一處能找得到花。幸虧天壇公園一位老花匠藏了一些盆花，方才救了急。

花草是資產階級，樹木也不夠革命。杭州郊區望江山療養院院長熱心種樹，全院都是濃密的樹蔭。他不愛革命，就愛種樹，被指為“種樹院長”，關押批鬥。不久屍體從富春江裏撈起，無人知道他被打死還是自殺。

◇各地孔廟無不遭殃

還在文革之前，“四舊”已屬被破之列。王陽明（西元 1472—1528）在世時，曾委託江西崇義縣縣丞建了一所文廟。一五一八年建成後，屢經修建，成一組古建築群，占地闊二十九丈，長四十丈。王死後，後人為紀念他在文廟東側建的王文成公祠也已有了四百年的歷史。幾百年來，王陽明一直是當地人的驕傲。但他巡撫江南時曾鎮壓過福建、江西的農民起義，是為“反動派”，文廟和王文成公祠兩組建築包括王陽明的塑像，全部在一九六四年被當局平毀無遺。安徽霍邱縣文廟，雕樑畫棟、飛簷翹角，龍、虎、獅、象、鼉等粉彩浮雕皆為精美的工藝美術品。“房飾浮雕在文化大革命中統被砸毀。”文革後省、縣撥款數萬修葺，“尚未完全復原。”（46）山東萊陽縣文廟，“大成殿雕樑畫棟，飛簷斗拱，氣勢雄偉。……文化大革命期間，大成殿被拆除。”（47）吉林市文廟是全國四大孔廟之一，“破四舊”中嚴重受損，文革後歷時五年方修復。

◇大小寶塔被炸毀

唐代高僧袞禪結廬安徽含山縣花山，死後弟子改山名為袞禪山。宋王安石遊覽此山，作《遊袞禪山記》後，袞禪山遂名揚四海。因是“四舊”，袞禪山大小二塔被炸毀。(48)

浙江三門縣文峰塔被炸毀。(49)山東萊陽縣文筆峰塔，“塔身總高約二十五米左右，文化大革命中毀沒。”(50)江西崇義縣文峰塔，當地《縣誌》形容為“高聳插天”，如今被指為“四舊”而拆毀。(51)

義大利有個“比薩斜塔”，湖南武岡縣也有個斜塔。該塔由磚砌成，七級呈八面角錐狀，各級簷下均畫有精細的飛禽走獸、亭臺樓閣、樹木花草。古《武岡州志》記載：“泗洲塔……在東門外，宋元豐元年建。”算來已有九百年歷史。該塔不僅歷史比比薩斜塔更古老，塔身傾斜度也大於比薩斜塔。如今人們祇用了一百公斤烈性炸藥，就一下子轟倒了它。從此再也沒人為武岡斜塔為什麼斜而不倒而費腦筋。(52)

◇被毀的文物古跡數不清

全國人民一起來革命，毀壞的古跡多得如蘆溝橋的獅子——數不清！

浙江人砸了徐文長的故居。明代文學家、畫家兼書法家徐文長（徐渭）在紹興的故居“青藤書屋”四百年來不廢修繕，完好如初。一九五五年，陳姓書屋主人將它捐給國家，以求永遠保存此一重要文化古跡。徐氏一生除做過一陣浙閩總督的幕僚，為蕩平倭寇出謀劃策外，不曾當過官。如今也被指為“反動封建文

人”，“青藤書屋”被砸。青藤砍去，“天池”用土填平，石欄則被砸碎。只因文物工作者聞訊先轉移了一批文物，日後方得以修復。

紹興還有個蘭亭。“永和九年，歲在癸醜，暮春之初，會於會稽山陰之蘭亭…
…“因東晉書聖王羲之這篇《蘭亭集序》，蘭亭成為文化人心中的聖地，也是國家重要的文化古跡。景仰者去蘭亭流連憑弔，一千六百年間從未斷絕。如今因王生時曾任右軍將軍，名列”帝王將相“，王墓被砸不說，蘭亭亦被殃及而毀壞。

江蘇人砸了文學巨著《西遊記》的作者吳承恩的故居。吳氏誕生在江蘇淮安縣河下鎮打銅巷，故居不大，三進院落，南為客廳，中為書齋，北為臥室。幾百年來，曾有無數景仰他的人來此憑弔此故居和他的墓。可是現在《西遊記》是“四舊”，因此吳氏故居“被毀為一片廢墟”。(53)

安徽人砸了《儒林外史》作者吳敬梓的故居。吳是全椒縣人，一九五九年，當地政府建立了吳敬梓紀念館。如今文化要革命，吳敬梓故居也沒逃得脫。(54)後來有人到全椒，向縣委書記打聽吳敬梓故居訪問，縣委書記竟然問：“吳敬梓？哪個公社的？”

安徽滁縣琅琊山腳有個醉翁亭。“環滁皆山也。”這是宋代大文豪歐陽修的《醉翁亭記》的首句。這篇文章經另蘇東坡手書，刻石立碑於琅琊山腳歐陽修作文的醉翁亭，至今已近千年。紅衛兵認定歐、蘇都是封建文人，前去革命。他們不僅將碑砸倒，還認真地將碑上的蘇氏字跡鑿去了近一半。醉翁亭旁堂內珍藏的歷代名家字畫更被搜劫一空，從此無人知其下落。

山東人革了《儒林外史》作者蒲松齡的命。蒲氏神鬼狐仙五百篇，篇篇不講毛澤東思想，可知是個反動權威。紅衛兵找不到什麼“四舊”來破，只好鞭他的屍。

可是掘開蒲氏古墓，除了一管旱煙筒、一迭書外，只發現四枚私章，白忙了一場。(55)

◇古建築慘遭扒拆

唐詩“漁陽鼙鼓動地來”中的“漁陽”即今河北薊縣。縣城中心鼓樓有個“古漁陽”匾。地名本無新舊，但該匾是清代官員書寫的，因而被卸下焚燒。廣州越秀山頂的五羊石雕，出自五位仙人駕祥雲到廣州下凡的古老傳說，當然是宣傳迷信，也該砸。只因石頭太硬，紅衛兵砸斷幾根羊角後就沒再砸下去。

清高宗乾隆下江南時，對無錫惠山寄暢園喜愛有加，命在清漪園即今頤和園內仿建，這就是今頤和園內的諧趣園。寄暢園內乾隆手書“雨中游惠山園”碑被砸毀。(文革後依舊拓片重刻此碑)

上海寶山縣城內，宋抗金大將韓世忠駐節之參將署門前的“江南重鎮坊”，在“破四舊”聲中被拆除。(56)浙江臨海縣，縣城六座牌坊全部被拆毀。

河南省延津縣城南街的明代牌坊，四柱三孔，高大莊嚴。殿閣式屋頂，脊上蹲獸造型生動。樑柱板壁，浮雕花紋通體皆畫，或為飛天仙女、誦經立僧、演奏樂伎，或為鬧梅喜鵲、報曉晨雞、待露荷花。老百姓俗稱為花牌坊。這個被公認為“河朔諸縣石坊之冠”的牌坊，於一九六六年“毀於紅衛兵之手。”(57)山東肥城縣，“破四舊”中“近千件文物丟失；十一處古墓、二十二處古建築、十處古遺址、三十多塊重要石刻遭到破壞。”(58)

任何一個大城小鎮都有販夫走卒會唱“蘇三離了洪洞縣，將身來在大街前。未曾開言心頭慘，過往君子聽我言……”京劇《玉堂春》流傳百年，“蘇三起解”也被唱了百年。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當年關押蘇三的監獄是全國保存得最好的明代監獄。蘇三案情的檔案也一直保存著，按周恩來的說法，“解放洪洞縣時，蘇三的檔案還在呢！”(59)國務院曾將關押蘇三的監獄定為應當保護的文物。但根據“衙門八字向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的說法，洪洞縣政府大門向南開，屬“封”，必須向西開。西牆外正是當年關押蘇三的那座明代監獄。“一個婊子有什麼可紀念的？拆！”保護文物和保護自己不能兩全，洪洞縣政府的書記大人祇好保護自己，拆掉蘇三監獄，將縣政府大門改向了西。雖然八十年代重新修復，卻已不是明代建築。

◇焚燒家族宗譜

家族宗譜也是“四舊”。湖北通城縣焚毀的十萬餘冊古書中，有一萬四千五百八十本是民間家族宗譜。(60)

京劇名演員梅蘭芳的祖先在太平天國年間避亂北上，定居北京已四代。一九五六年他曾率梅氏劇團到江蘇泰州演出並尋根。北上梅氏與老家早無聯繫，但根據泰州梅氏族保存的家譜中對北上支系失散一事的記載，梅蘭芳尋根成功，拜了祖墳。文革時梅蘭芳去世已五年，卻仍被指為“反動學術權威”，那本梅氏家譜也被紅衛兵燒成了灰。(61)

二十世紀初著名的文學家、語言學家劉半農的長女劉小蕙是上海外語學院教師，也是“抄家物件”。抄家時，她家中保藏的資料被扔出窗戶，在弄堂裏燒了四五個小時，《劉氏家譜》就此永遠消失。(62)

浙江紹興的范家是宋代名臣范仲淹的後裔。在眼看家族宗譜要被燒毀的時候，其族人想到了本族的名人、歷史學家範文瀾。他是中共中央候補委員，或許他那裏是安全的。他們將一套《范氏宗譜》郵寄到北京範文瀾處，他在文革中安然無恙，這套《范氏宗譜》總算保存了下來。(63)

◇ “橫掃” 民間文學

湖南江永縣有一種僅為婦女懂得的文字，人稱“女書”。雖流傳已近千年，因為不入男子的社會，流傳並不廣，許多用女書寫成的詩歌被婦女珍藏，代代相傳，從未與世人見面。江永縣地雖偏僻，“破四舊”卻逃不脫，許多本應成為社會學、文字學乃至民族學研究資料的女書手稿被焚毀。

新疆說唱文學《江格爾傳》是民族文學的奇葩，德國近二百年前就翻譯出版，俄文版問世也有一百多年。如今中國的《江格爾傳》卻被抄盡燒光。說唱《江格爾傳》藝人“江格爾齊”無一不被鬥爭，有的甚至被拔了牙，無法再唱！

西藏民間故事《格薩爾》，是世界少有的長篇巨制，一百五十萬行，一千二百萬字，以藝人說唱和手抄本的形式流傳了一千多年。文革後，藏族民間說唱《格薩爾王傳》的藝人都被鬥爭、禁止說唱。他們收藏的手抄本則一律沒收銷毀。座落在青海省玉樹藏族自治州囊謙縣的嶺國寺裏當年格薩爾王用過的寶劍、長矛、弓箭、盔甲等兵器，以及幾十部用金字書寫的有關嶺國（今玉樹藏族自治州一帶）歷史人物的傳記，全都沒有逃過這場災劫。(64)

“無文革”前，青海省文聯收集整理《格薩爾》，已編譯了八百萬字。現在，這成了青海文聯“文藝黑線”的罪證。在“破四舊”中，“焚燒了已編印和從老藝人口中記錄的大量資料，三十四本漢譯紙型全部被送入造紙廠。”幸虧青海文

聯“一位同志倉促搶救出《格薩爾》手抄本珍貴資料，藏入地洞。一部份珍貴資料才被保存下來。”(65)「漢譯本於一九八一年出版」

“無文革”前貴州文聯“已編印的貴州二十多個民族的三十四本民間文學資料，幾乎蕩然無存。”一九五〇年成立的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十七年中經廣大群眾搜集的大量民間文學原稿，大都被送進造紙廠，倖存者很少。”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屬“砸爛單位”。“一九七二年，在處理所謂‘砸爛單位’中，民研會所有庫存的自建會以來編印的各種民間文藝書籍、刊物、內部資料，全部被當作廢紙送進造紙廠。”(66)

民間音樂屬“封”。福建省文聯“花了三年多時間採集的可連續播放一百五十多小時的一式兩套民間音樂和地方戲曲唱段，全部被毀。”(67)

◇文稿史料大災劫

許多珍貴書稿、史料未及出版就被焚毀，損失無法計量。

河南修武縣有個出生於祖傳世家的老獸醫李蔭香，年近七旬了。從醫五十年，救治牲畜無數，有“活馬王爺”之稱。他積幾十年心血總結、創制的驗方及親手抄錄的藥書全被付之一炬，氣得他當場暈倒在地，一病不起，不久辭世。(68)

《人民文學》主編秦兆陽在戰爭年代作了十幾年筆記，約一百萬字，在行軍打仗最艱苦的日子裏，曾托老鄉埋在地下，保存下來。而今他是“大右派”，文稿全被抄走，一把火成了灰燼。

法學教授徐恭典退休後，在家鄉浙江常山縣潛心著書，十年間寫的文稿全被燒毀。小說《紅旗譜》的作者梁斌被關進了“牛棚”，其小說《戰寇圖》的手稿

從此下落不明。人民出版社編輯牛汀曾被打成“胡風分子”，是當然的抄家對象。他的一部長篇小說、一部中篇小說的書稿被抄走，就此失蹤。

中國科學史專家胡道靜專攻中國古代最重要的科學著作、宋人沈括的《夢溪筆談》。日本同行推他為“當今中國研究《夢溪筆談》的第一人”。日人翻譯此書時就以他的《夢溪筆談校證》和《新校證夢溪筆談》為參考依據。六六年春，他的新作《夢溪筆談補證》已寫成四十多萬字，科學院副院長竺可楨為之題了封面、寫了序。可是未及出版，那本書稿就被燒成了灰燼。(69)

法學教授徐恭典退休後，在家鄉浙江常山縣潛心著書，十年間寫的文稿全被焚毀。小說《紅旗譜》的作者梁斌被關進了“牛棚”，其小說《戰寇圖》的手稿從此下落不明。人民出版社編輯牛汀曾被打成“胡風分子”，是當然的抄家對象。他的一部長篇小說、一部中篇小說的書稿被抄走，就此失蹤。

中國科學史專家胡道靜專攻中國古代最重要的科學著作、宋人沈括的《夢溪筆談》。日本同行推他為“當今中國研究《夢溪筆談》第一人”。日人翻譯此書時就以他的《夢溪筆談校正》和《新校正夢溪筆談》為參考依據。六六年春，他的新作《夢溪筆談補正》已寫成四十多萬字，科學院副院長竺可楨為之題寫了封面、寫了序。可是未及出版，那本書稿就被燒成了灰燼。

中國新聞事業的先驅邵飄萍一九一八年創辦《京報》時，是北京大學新聞研究會的導師。青年毛澤東曾數次登門拜訪，並接受過邵氏金錢上的接濟。因《京報》言論開罪軍閥，邵於一九二六年被奉系軍閥殺害。如今革命革到邵飄萍，《京報》館舊址和邵氏住宅內的藏書、手稿、資料圖片，全部被抄走。邵的髮妻湯修慧則按當時“地、富、反、壞、右”遣送回籍的原則，被趕回浙江金華。直到第二年湯女士致書毛澤東、毛批示同意後，她才獲准回到北京。

一九二一年加入中共，二六年退出後長期在國民黨政府擔任要職、包括駐蘇聯大使的邵力子，家中古董字畫被燒毀砸爛不說，他的尚未出版的《使蘇日記》的文稿也抄走。該書稿記錄了當年國民政府與史達林、蘇外交部長莫洛托夫等在外事交涉中的秘辛，佚失後再也無處尋覓。(70)

江蘇省如皋縣中學的學生從老師俞竹筠的家中抄出四封作家老舍給俞竹筠的信。那是十年前俞在揚州中學讀書時將自己的習作寄給老舍請教後老舍的回信。那四封他一直珍藏著的老舍信笺，如今成了學生的戰利品，被一一撕得粉碎。(71)

中山大學老教授梁宗岱二三十年代在詩壇風雲一時，曾被法國文學家羅曼·羅蘭稱為“天才的中國青年詩人”。他珍藏了二十多封羅曼·羅蘭和瓦來裏寫給他的信，如今被抄家者發現，全部被毀。(72)

一九五五年入獄的潘漢年是中共歷史上一個不尋常的人物。一九三〇年三月，他主持成立左翼作家同盟。一九三三年底，他作為中共的代表與在福建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的第十九路軍談判。紅軍長征時他是紅軍總政治部的宣傳部長。

一九三五年一月遵義會議後，他到蘇聯向共產國際彙報。一九三七年初，他陪周恩來到杭州，與蔣介石秘密談判。抗日戰爭後期，他奉命與日本、汪偽集團秘密談判反蔣事宜。一九四九年，他在香港主持工作，將大批文化界人士和“民主人士”秘密送到中共控制的地區。他腦子裏存有大量中共的史料。文革開始時，他已寫了幾十萬字的自傳。可是審訊者說他寫的自傳是“變天帳”，當著他的面下令燒毀。他被兩條大漢鉗住，祇能絕望地喊道：“你們不能燒啊，要燒，燒死我吧！”文稿被燒光後，潘漢年至死沒再動筆，他腦子裏的無數史料便與他的軀體一道火化，永遠埋沒了。

◇保護文物的無名英雄

紅衛兵“破四舊”時，普通中國人不敢公開反對，稀世文物能否保存下來，端視當事人聰明與否。安徽安慶市迎江寺有一部明代一個皇帝賜給的全部經文用金水寫成的經書，五百年來為寺內的傳世之寶。在那“毛主席著作字字閃金光”的時代，如被抄出，絕無可能倖免。因當家和尚及早佈置密藏，金書安然度過劫波。

山西平遙縣城，保存有中國最完好的古城牆，城內成片的保留有明清風貌與格局的古民居，也屬中國絕無僅有。紅衛兵破壞前，全城居民發動起來，用黃泥將古城與老屋上的木雕、彩畫、裝飾全部封塗，使紅衛兵無舊可破，古跡遂完整保留。

三十年後，平遙縣城被聯合國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江西銅鼓縣，有一銅鼓石，“屹立數丈，形如銅鼓……宛如劍劈”，石壁上刻有古人題詞多幅，該縣亦以此命名。紅衛兵開到前，有心人將晉代保存至今的石刻仔細用水泥塗蓋，文革後鏟去水泥，刻字完好如初。(112)

在孔子故鄉曲阜，鄉親們把孔府、孔廟裏檔案、文書，以及元、明、清代的服裝、出土文物、稀世碑碣等等搶救出來，藏匿在各處。孔府前的那對大石獅子四面圍上木板，外面貼上“毛主席語錄”。紅衛兵們不敢承擔撕毀毛語錄的罪責，大石獅子因此未被砸壞。

上海玉佛寺的兩尊巨大的玉佛，一坐一臥，都是無價國寶。為免遭砸毀，和尚及工作人員將玉佛用紅紙封住，再將毛澤東的像片貼滿佛身。這樣，玉佛就因

為革命小將不敢碰毛像而得倖存。該寺所藏的唐代以降的經書也預先轉移至倉庫而被保存。

甘肅治郡已兩千多年的漢代重鎮武威，即古涼州所在，為重要文物出土之地。

城內博物館存有精美的道教壁畫。當局在得知革命小將可能動手時立即行動，用巨型木板將壁畫覆蓋，再貼上“毛主席語錄”，珍貴文物遂得保存。

湖北黃梅縣有個聞名於世的五祖寺。該縣其他寺廟、道觀全被砸爛之際，縣歷史博物館和文物保管會為保護五祖寺，用蓋有“黃梅縣文物保管會”印章的封條將各殿封住：“正法眼藏”匾用寫有“破除迷信”的紙蓋住；樑柱上的“阿彌陀佛”

覆蓋上“革命到底”。牆上的花窗、雕磚均糊上白紙，寫上革命標語。在附近農村生產大隊的協助下，廟裏的住持法師將寺院幾十箱重要文物用拖拉機運走，無法搬運的玻璃櫃中的弘忍禪師（即五祖）的真身佛像則用毛澤東畫覆蓋，兩旁的玻璃則配以“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和“緊跟毛主席永遠革命”。寺門緊閉，和尚們打扮成紅衛兵模樣，又在牆頭打出工廠和學校紅衛兵的旗幟，嚇退了前去“破四舊”的紅衛兵，方將這已有一千三百年歷史的佛教禪宗的發源地完好地保護下來。(113)

陝西扶風縣已有一千七百餘年歷史的法門寺，寺內寶塔內珍藏著印度佛祖釋伽牟尼的手指骨（佛舍利）。唐僖宗登基後，將佛骨連同上千件各種稀世珍寶深埋塔下地宮石室。明萬曆年間修塔時曾開啟地宮，善男信女恭覽而未指染。一九三九年，篤信佛教的國民黨退休將軍朱子橋集資修繕法門寺寶塔時曾發現地宮的石門。他怕寶藏出土後將落到已佔領華北的日本侵略軍手中，便對人謊稱內裏青蛇盤繞，不可闖入。他將甬道封土復原，此後地宮寶藏果然無恙。六六年九月，

紅衛兵開到法門寺“破四舊”，將地上文物搗爛之後猶嫌不足，又動手挖掘“美蔣特務”的“電臺”。當挖到接近地宮夯土層時，該寺住持梁新法師引火自焚以示抗議，紅衛兵們方才甘休。一九八七年重修法門寺，在考古學家指導下發掘地宮，埋沒一千一百年的寶藏全部出土，完成中國近代收穫最大的一次考古發掘。(114)

◇當朝權貴無意間保存了部份文物

說來可笑的是，由於當朝權貴從抄家風中撈了一票，許多珍貴文物竟得以保存。

中共領導人康生是抄家物資的搜羅者。他曾在鄧拓家做客，賞玩過鄧拓收藏的善本書和字畫。當“紅八月”的抄家高潮尚未波及鄧拓、前副總理龍雲、名畫家齊白石等上層人士家中時，他就先下手了。他將一個心腹召去，指示他帶領人把上述名人的家“抄一遍”。當十幾卡車抄出的文物送到文物管理委員會之後，他就成了那裏的常客。開始是白拿，後來象徵性地付點錢，比如漢朝蔡邕書寫的石經的宋代拓本，他付十元，宋代詩人黃庭堅的真跡付五元。另一幅宋畫，他看了愛不釋手，於是掏出一毛錢，說“這幅畫我買了”，就拿走了。

陳伯達也是個趁火打劫的高手。作家阿英（錢杏村）藏書甚豐，五十年代曾捐了八十多本明、清兩代的書給文化部文物管理局。他的書房，副總理陳毅、科學院院長郭沫若去看過，陳伯達、康生也去看過、借過書。抄家風一起，中央文革小組的戚本禹就宣佈陳、康二位的“指示”：“封存阿英的書房，

任何人不准動。”這樣，阿英的藏書未被毀掉。但到了六八年，阿英全家被掃地出門，“緊接著，陳伯達以”審查“為名，親筆手諭，搶掠了阿英的全部圖書收藏。”（115）

當朝權貴從抄家中撈了一票。一天正要下班時，文管會整理文物者奉命將所有東西攤開陳列後，被關進一間屋子，直到半夜才解禁。他們聞聲辨人，得知是江青、林彪、康生等人在挑東西。

一九七〇年秋，江青還約了康生去文物管理處挑選珍品。她選了一隻十八開金的法國懷錶，表上鑲有近百顆珍珠、寶石，並配有四條金鏈，僅付了七元錢。（116）

文革後中央美術學院畫家葉淺予獲平反，文化部決定將當初抄家物資歸還給他。但不少珍貴字畫、墨、硯、石章早被當時的“中央首長”拿走，文管會只給他開了一張清單，說明“去向”：陳伯達（九件）、林彪（十一件）、康生夫婦（八件）、江青（三件）、汪東興（一件）、李作鵬（一件）。（117）

一九九〇年，康生搜刮的文物被移到故宮作“內部展覽”，人們才知道康生將大批國寶據為私有，他得到一冊《大唐三藏聖教序》後，竟蓋上了自己的印章。從三千年前的青銅器到兩千多年前西漢大將韓信的圖章，從《紅樓夢》最早的刻本到到人稱“詩、書、畫三絕”的鄭板橋的印章，被康生掠入私囊的無價之寶竟多至上千件。（118）

其實，只要還留存在人間，總還有完璧歸趙的一天。康生搜羅國寶，祇是在他那個大得“足可以辦一所大學”的公館（康生語）裏把玩，畢竟沒毀掉它們。曾被他掠入私囊的寶物現在又都回到了國家博物館。而被一九六六年“紅八月”的烈火吞噬的珍貴文物，則永遠消失，再也不會回到人世間了！

注釋：

- (1) 慕湘《阿英的晚年》，見《鐘山》一九八六年第六期第 77 頁。
- (2) 《學習資料（1962~1967）》（北京：清華大學，1967）第 149、151 頁。
- (3) 於輝編《紅衛兵秘錄》第 294 頁。
- (4) 《鐘山》（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第六期第 81 頁。
- (5) 《當代中國的北京》一九八九年版第一卷第 168 頁。
- (6)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五日周恩來接見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主要負責人時的講話，一九六六年北京化工學院、北京經濟學院等聯合彙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參考資料》第二冊第 9-79 頁。
- (7) 一九八六年版《川沙縣誌》第 38 頁。
- (8) 一九八九年版《嵯縣誌》第 29 頁。
- (9) 一九八六年版《威海市志》第 20 頁。
- (10) 一九八九年版《江寧縣誌》第 38 頁。
- (11) 一九八四年版《青村志》第 11 頁。
- (12)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九日人民日報。
- (13) 一九八六年第一期《文匯》月刊。
- (14) 《人物》雜誌一九九五年第五期第 133 頁。
- (15) 丁力編《風起雨落幾鴻儒》第 309 頁。
- (16) 陸健東《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6）第 41 頁。
- (17) 《瞭望》週刊一九八七年第十四期第 42 頁。
- (18) 《瞭望》週刊一九八六年第二十五期第 39 頁。

- (19) 《海上文壇》一九九二年二月號第 91 頁，《世紀丹青朱屺瞻》。
- (20) 一九八九年版《勉縣誌》第 454 頁。
- (21) 一九八二年版蒲山縣《鶴山鎮志》第 93 頁。
- (22) 《廣西文革大事年表》第 7 頁。
- (23) 一九八九年版《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縣志》第 265 頁。
- (24) 《鐘山》（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第六期第 80 頁。
- (25) 香港《明報》月刊一九九一年二月號第 44 頁。
- (26) 引自本文作者保存的該文影印件。
- (27) 一九九四年版《宣漢縣誌》第 968 頁。
- (28) 一九八九年版《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縣志》第 265 頁。
- (29) 一九九〇年版《當代中國的寧夏》第 154 頁。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日，周恩來在北京紅衛兵座談會上的講話，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五日教育部毛澤東思想紅衛兵總部編印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央負責同志講話選集》第 42 頁。

(30) 一九六六年十月五日陳毅在全軍軍隊院校文化大革命動員會上的形勢報告，同(6)，第二冊第 10-15 頁。

(31) 《歷史在這裏沉思》（太原：北嶽文藝出版社，1989）第六卷第 186 頁。

(32)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人民日報。

(33) 《人物》雜誌一九九四年第四期第 71 頁。

(34) 陳再道《浩劫中的一幕：武漢七二〇事件親歷記》第 19 頁。

(35) 一九九〇年版《安陽縣誌》第 89 頁。

- (36) 《新華文摘》一九八六年九月號，艾湘濤《通天人物》。
- (37) 一九九五年版《寧鄉縣誌》第 129 頁。
- (38)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一日周恩來接見半工半讀學校部份革命師生時的講話，同(6)，第 10-44 頁。
- (39) 一九九五年版《寧鄉縣誌》第 129 頁。
- (40) 一九九三年版《安遠縣誌》第 587 頁。
- (41) 《當代》一九八六年第四期第 17 頁。
- (42) 蕭延中編《晚年毛澤東》（北京：春秋出版社，1989）第 229 頁。
- (43) 《瞭望》週刊一九八五年第三十五期第 45 頁。
- (44) 《瞭望》週刊一九八五年第 27 期。
- (45) 一九八九年版《崇義縣誌》第 511 頁。
- (46) 一九九二年版《霍邱縣誌》第 676 頁。
- (47) 一九九五年版《萊陽縣誌》第 597 頁。
- (48) 《含山縣誌》（合肥：黃山書社，1995）第 20 頁。
- (49) 一九九五年版《台州地區志》第 877 頁。
- (50) 一九九五年版《萊陽縣誌》第 597 頁。
- (51) 一九八九年版《崇義縣誌》第 513 頁。
- (52)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人民日報》海外版。
- (53) 一九八六年八月十七日《人民日報》海外版。
- (54) 《文匯》月刊一九八六年第十二期第 60 頁。
- (55) 《人民文學》一九八八年第三期第 166 頁。
- (56) 一九九二年版《寶山縣誌》第 920 頁。

- (57)一九九一年版《延津縣誌》第 577 頁。
- (58)一九九二年版《肥城縣誌》第 30 頁。
- (59)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周恩來接見大連鐵道學院代表時的講話，同
- (6)，第四冊第 12-85 頁。
- (60)一九八五年版《通城縣誌》。
- (61)《人物》雜誌一九九四年第五期第 118 頁。
- (62)《新文學史料》（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第一期第 41 頁。
- (63)《文史資料選輯》第 92 輯第 38 頁。
- (64)新華社一九九二年一月五日電。
- (65)一九七八年五月中國文聯全委會擴大會議發言簡報，賈芝發言第 5 頁。
- (66)同上，第 6 頁。
- (67)同(65)，萬裏雲發言第 3 頁。
- (68)一九八六年版《修武縣誌》第 730-731 頁。
- (69)《新華文摘》一九八七年第三期。
- (70)香港《百姓》雜誌第六十六期陸鏗的文章。
- (71)《三月風》（北京：中國殘疾人雜誌社）一九九五年第十一期第 23 頁。
- (72)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五日《人民日報》。
- (73)張重天《共和國第一冤案》（華藝出版社，1989）第 52、230 頁。
- (74)香港《明報》月刊一九九一年八月號第 62 頁。
- (75)《人物》雜誌一九九〇年第二期。
- (76)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4）第 205 頁。

- (77)《新文學史料》(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第一期第 57 頁。
- (78)《新文學史料》(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第三期第 15 頁。
- (79)《人物》雜誌一九九四年第五期第 33 頁。
- (80)葉永烈《名人沉浮錄》(桂林：灕江出版社，1992)第 39 頁。
- (81)南光編《毛澤東和他的四大秘書》(貴陽：貴州民族出版社，1993)第 207 頁。
- (82)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康生在烏魯木齊市對新疆革命少數派的講話，同(6)，第三冊第 11-108 頁。
- (83)《鐘山》一九八八年第二期，戴晴、洛格《女政治犯》。
- (84)《打倒洪沛霖！打倒洪家店！》(南京：江蘇省公安廳革命造反聯合總部，1967)第 8 頁。
- (85)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五日葉劍英接見首都十三個藝術院校師生時的講話，同(6)，第二冊第 9-91 頁。
- (86)一九八六年版《建德縣誌》第 502 頁。
- (87)一九八一年版《台安縣誌》第 389 頁。
- (88)同上，第 133 頁。
- (89)一九九〇年版《當代中國的寧夏》第 154 頁。
- (90)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四日陳毅在外文出版局全體職工大會上講話，同(6)，第二冊第 9-56 頁。
- (91)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五日周恩來接見西安同學時的講話，同上，第 9-61 頁。

- (9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件彙編(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第 960 頁。
- (93) 一九九五年版《貴德縣誌》第 27 頁。
- (94) 一九六六年十月三日周恩來在中南海對全國紅衛兵代表的講話，同(6)，第二冊第 10-5 頁。
- (95)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五日接見中央民族學院幹訓班的西藏學生時的講話，同(6)，第二冊第 10-82 頁。
- (96) 同上。
- (97) 美洲《民主中國》一九九三年七月月號第 22 頁。
- (98) 一九八八年版《代縣誌》第 378 頁。
- (99) 一九八六年版《運城地區簡志》第 512 頁。
- (100) 一九九五年版《寧鄉縣誌》第 486 頁。
- (101) 一九八九年版《新津縣誌》第 735 頁。
- (102) 一九八八年版《什邡縣誌》第 21-31 頁。
- (103) 美洲《世界日報》一九九三年四月二十一日。
- (104) 一九九〇年版《曆城縣誌》第 394 頁。
- (105) 一九八八年版《五台縣誌》第 711 頁。
- (106) 一九九〇年版《休寧縣誌》第 31 頁。
- (107) 一九九〇年十一月六日美洲《世界日報》。
- (108) 《黑龍江四十年》第 375-376 頁。
- (109) 一九九〇年版《嶗山縣誌》第 735 頁。
- (110)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美洲《世界日報》。

- (111)《開放》月刊（香港：沖天有限公司）一九九二年一月號第 67 頁。
- (112)一九八九年版《銅鼓縣誌》第 578 頁。
- (113)一九九八年四月二十六至四月三十日美洲《世界日報》。
- (114)一九八七年八月七日《人民日報》海外版。
- (115)《歷史在這裏沉思》（太原：北嶽文藝出版社，1989）第六卷第 140 頁。
- (116)《百年潮》（北京：中國中共黨史學會）一九九九年第二期第 67 頁。
- (117)葉淺予《十年荒唐夢》。
- (118)同(115)，第四卷，林青山《文物大盜竊寶記》。

第六節 似曾相識

誰能否認這不是熟悉的納粹法西斯黨衛軍或衝鋒隊押解猶太人去奧斯維辛集中營時火車站上的情景？

當我反復念叨著文章中的這句話：“文革史學家關心的只是某些大人物與知名人士在文革時的遭遇，對於成千上萬普通“黑五類”的苦難，他們是不屑一顧的。其實普通百姓的淒慘苦難，才是文化大革命最大、最深廣的不幸。”

革命無罪



造反有理



1966年8.18紅衛兵運動被推向高峰，打人和濫殺無辜之後總要有新的花樣才叫不斷革命。於是發起一場把所謂有問題的人趕出北京，當時稱為“遣返運動”。“遣返運動”受到了當時傳播媒介的狂熱吹捧。1966年8月29日，《人民日報》發表重要社論《向我們的紅衛兵致敬！》社論說：“紅衛兵上陣以來，時間並不久，但是，他們真正地把整個社會震動了，把舊世界震動了。他們的鬥

爭鋒芒，所向披靡。一切剝削階級的舊風俗、舊習慣，都象垃圾一樣，被他們掃地出門。一切藏在暗角裏的老寄生蟲，都逃不出紅衛兵銳利的眼睛。這些吸血蟲，這些人民的仇敵，正在一個一個地被紅衛兵揪了出來。他們隱藏的金銀財寶，被紅衛兵拿出來展覽了。他們隱藏的各種變天帳，各種殺人武器，也被紅衛兵拿出來示眾了。這是我們紅衛兵的功勳。”

8月31日，毛澤東攜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再次公開接見了來自全國的紅衛兵和革命師生代表。林彪在大會上重申了中央和毛澤東支持紅衛兵小將的堅定立場。

黨報和中央領導的公開表態，使紅衛兵和造反群眾的革命熱情更為高漲。9月上旬，北京遣返運動進入了高潮，僅幾天時間，就有近10萬人被趕出京城。當時，北京站每天開出幾十次列車，每次列車上都載有成群結隊的被轟回原籍的“黑五類”分子。而在車站廣場上等候遣返的“黑五類”黑壓壓望不到邊。

有一位當時出自崇文區的遣返物件的子女白玉福回憶說：8月18日，毛主席接見紅衛兵以後，新華印刷廠也成立了紅衛兵組織。我父親由於歷史上有汗點——他參加過張學良領導的東北軍，任少校教官。——遭到紅衛兵的批鬥。他在工廠被關了近一個月。9月的一天，父親突然在三個年輕紅衛兵的押送下，回到家裏。紅衛兵向我們全家宣佈：三天之內，全家滾出北京！

三天？我們全家都呆住了。我哥哥問：“怎麼，我們子弟也走嗎？”“對，”紅衛兵厲聲對哥哥喝道：“全家都滾蛋！一個不剩！”我哥哥不服，他和我姐姐一塊去新市委群眾接待站上訪。新市委接待站聚集著一大批遣返對象的子女，他們中有些人還佩戴著紅衛兵的袖章。這些子女異口同聲說他們已同反動家庭劃清了界限，正在積極投身文化大革命。若把他們一塊遣返，不是把他們往反動陣營推

嗎?接待站的同志一聽有道理，立即向市委做了彙報。第二天接待站就告訴我哥哥他們：政治表現好並且經濟上能夠獨立的“黑五類”子女可以留京。

我由於年齡小，經濟上不能獨立，只好隨父親一塊離開京城。讓人不解的是紅衛兵也不知道把我們家送往何方，他們只是見別的工廠開始遣送“黑五類”，他們怕落後於形勢，便匆匆地訂下了驅趕“黑五類”的時間表。不過紅衛兵有一點是明確的，那就是要把我們送到鄉下去。因而他們命令我們少帶東西，幾個鋪蓋卷、幾雙碗筷就足够了。他們還讓我們一律要穿黑外衣、黑褲子，棉襖棉褲也必須是黑色的。說這是統一規定，若不執行規定北京站革命群眾根本不讓上火車，還可能被革命群眾痛打。

我們按照紅衛兵的要求，處理了所有的東西，每人做了一身黑棉衣。9月17日，一輛吉普車開到了我們家門口。在一陣“四類分子滾蛋了!”的喊聲中，我們一家在紅衛兵的監督下，戰戰兢兢地爬上了吉普車。吉普車很快駛離了我們住了十幾年的緊挨著元大都土城牆的小院，我的心一陣發冷。北京，別了，我再也回不到你身邊了!再也看不見你了!

吉普車開到了北京火車站，我下車一看，嚇了一跳：滿廣場都是穿著舊軍服、腰繫武裝帶、手裏拿著皮帶、木棍的紅衛兵，足有幾萬人。廣場中間有一條窄窄的通道，跟我們一樣穿著黑棉襖、黑棉褲的“黑五類”扶老攜幼在這條通道裏慢慢蠕動著。紅衛兵們不時舉起皮帶、拳頭朝“黑五類”砸去，“黑五類”躲得了這邊，躲不了那邊，一副悲慘相。

看到這情景，我父母想往後退，但押送我們的新華印刷廠紅衛兵不答應。說早晚得過這一關，而且火車很快就要進站了。沒辦法，我們三口人只好硬著頭皮往前走。還好，連走30多米都沒挨著皮帶，紅衛兵站在兩旁只是譏笑我們三口

人穿的又肥又大的黑棉襖。由於時間緊，我母親只用大針縫縫就給我們爺倆穿上了，所以棉襖很不合體。我父親的棉襖一邊長一邊短，袖子還掉了下來；我的棉襖又肥又大，後邊還撅著。引得紅衛兵們一陣大笑。

但快到進站口時，情況有點不妙。我們前邊的一對老夫妻被紅衛兵截住了。紅衛兵開始搜他們的身，當搜到那老婦人時，老婦人有些慌亂。紅衛兵立刻警覺起來，挨個口袋翻查老婦人的衣服。突然，一個女學生翻出了一疊鈔票，她立刻變了臉，吼道：“誰讓你藏現金的？沒看見我們的佈告嗎？‘黑五類’不能帶任何貴重物品上車。你為什麼違反規定？”這時那“黑五類”老頭扭過臉說：“這都是我們近幾個月的工資，到鄉下要花錢的。”“好啊，你敢頂撞我們？！”那女學生立刻朝老頭舉起了皮帶，只聽“啪”的一聲響，金屬皮帶環打在老頭眼眶上，頓時鮮血如注。老婦人想去扶老伴，但被幾個紅衛兵死死拉住。“打——！”只聽一聲喊叫，十幾個紅衛兵一齊朝老頭撲來，棍棒、皮帶兩點似地落下。老頭很快就倒下了，血染紅了他的衣服，連地上也汪了一灘血。他的臉腫得嚇人，紅衛兵停下手後，把他像拖死豬似地沿著通道拖了出去。

那老太婆已經嚇傻了，呆呆地不知該怎麼辦。一個女學生大喝一聲：“滾！”這老太婆才一拐一拐地朝前挪動。但沒走幾步，不知哪個學生喊了一聲：“這是地主婆！”於是老婦人遭到了四面八方唾沫的襲擊，學生們爭先恐後朝老婦人身上啐。老婦人身上臉上頭髮上全都是粘乎乎的唾液，她躲不能躲，跑不能跑，只是嘴裏一個勁兒地喊：“饒命！饒命！”

厄運終於也落到我們家頭上。我父親由於走在前面，腳步快了一些，學生們立即截住了他，一陣拳打腳踢。只是由於我父親嘴裏不停地喊：“我有罪！我有罪！”紅衛兵才放過了他。接著是我母親，由於紅衛兵從她身上搜出了 100 元錢，

幾個女紅衛兵揪著她頭髮往地上撞。要不是後來廣場上突然響起了紅衛兵指揮部的緊急廣播，我母親必死無疑。就這樣她的眼睛都睜不開了。上月臺時得我牽著她。】

上面這個人的回憶，真切地描繪了當時遣返運動的情景。由於遣返物件大都是下層人士，所以在有關“文化大革命”的書籍中很少介紹，文革史學家關心的只是某些大人物與知名人士在文革時的遭遇，對於成千上萬普通“黑五類”的苦難，他們是不屑一顧的。其實普通百姓的淒慘苦難，才是文化大革命最大最深廣的不幸。

（本文摘自 1996 年中國社會出版社出版的《青春的浩劫》，共 50 萬字，由金汕與方正、孟固、陳義風合作完成）

第八節 停課鬧革命

1966 年 6 月 18 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發表消息——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決定改革高等學校招考辦法，其內容是：

鑒於目前大專學校和高中的文化大革命正在興起，要把這一運動搞深搞透，沒有一定的時間是不行的。有不少大專學校和中學，資產階級的統治還根深蒂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鬥爭十分尖銳激烈。在大專學校和高中，把文化革命運動搞深搞透，將對今後學校教育產生極為深遠的影響。同時，高等學校招生考試辦法，解放以來雖然不斷地有所改進，但是基本上沒有跳出资產階級考試制度的框框，不利於貫徹執行黨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教育方針，不利於更多地吸收工農兵革命青年進入高等學校。這種考試制度，必須徹底改革。這樣也需要有一定的時間來研究和制定新的招生辦法。

中共中央和國務院考慮到上述情況，決定 1966 年高等學校招收新生的工作推遲半年進行，一方面，使高等學校和高中有足夠的時間徹底搞好文化革命，另一方面使實行新的招生辦法有充分的時間作好一切準備。

為了不影響高級中學接收新生和新學年開學，高中的應屆畢業生，凡本校的文化革命運動尚未結束的，可以由學校妥善安排時間和住地，繼續把文化革命運動搞深搞透；在本校文化革命運動已結束，而高等學校尚未招生時，可以由學校組織他們下鄉下廠參加生產勞動。

全國百姓從報紙廣播裏知道的是，中央決定改革高等學校招生考試辦法。當天，人民日報還配發了社論《徹底搞好文化革命徹底改革教育制度》，其中還特別提到——今天，本報發表的北京女一中高三（四）班和北京四中高三（五）班學生給黨中央和毛主席的兩封信，以及沒有發表的大量群眾來信，提出了廢除舊的升學制度的強烈要求。這兩封信，充滿著對黨對人民的無限忠誠，洋溢著高度的革命豪情，表現了毛澤東時代的革命青年敢想、敢說、敢做、敢闖、敢革命的精神。這兩封信，反映了廣大革命師生的心願，代表了廣大革命群眾的呼聲。這是當年的習慣做法，凡重大決定大多來自革命群眾，因為都有“反映××心願、代表××呼聲”的來信稿件之類作為言之鑿鑿的有力證據。

如今在網路上查找當年的人民日報等兩報一刊社論已經不難，要尋找當年革命群眾來信乃至尋覓當年新華社後繼報導的原文內容也有可能。如果僅僅拜讀那兩份高中生來信這樣的“歷史文獻”，的確會覺得這兩個學校的高中學生真是先知先覺、衝鋒在前啊！

然而，在我重新見到那兩封“來信”全文之前，在網上搜索有關資訊時就發現，這樣的感覺真是太幼稚太天真了。一如近些年來已經有越來越多的內幕被曝

光一樣，這兩封“革命學生來信”也不例外！首先，曾經在那個時代叱吒一時的北京女一中和北京四中，其實都不是等閒之輩。有一種說法——北京四中因為是男校，就又名“男四中”，是當時北京十所重點中學中男校的第一。女一中也是十所重點中學之一，但不是第一。——是否確實如此，一時無法考證。留作備考罷。但是北京四中就非同小可。在網上有關該校的搜索結果汗牛充棟，與 1966-6 廢除高考的“學生來信”的內幕可謂俯拾皆是。選擇其中最近上網的一例罷。

1966 年文革當時為什麼取消高考（全文）

2010 年 02 月 02 日 人民網

革命也要講水準，四中作為北京市的頂級名校自然在革命上也有其“高人之處”。在從內部得知中央高層的意向後，四中的青年人們頗具創造性地完成了一項壯舉——廢除高考，誰也不曾料想在中國延續了千年的考試制度竟會在一群年輕人的躁動下土崩瓦解。一群高考中的佼佼者站起來砸爛了他們曾經為之寒窗苦讀的高考制度，這怎能不令人深思？

1966 年 6 月，當時在四中高三（五）班就讀的幾個高幹子弟從他們的父輩那裏打探來了中央有意廢除高考的消息，與生俱來的政治敏感使他們決定搶先立下這一革命新功。於是一篇洋洋灑灑的“革命宏文”炮製出爐，這就是《北京市第四中學全體革命師生為廢除舊的升學制度給全市師生的倡議書》。此時，同在西城的女一中（現 161 中學）有如與男四中相呼應一般也推出了《北京市第一女子中學高三（四）班學生為廢除舊的升學制度給黨中央、毛主席的一封信》。於是，男女兩所高幹子弟雲集的中學聯手將高考制度推向了終點。被公認革命形象好的四中高二學生王倩倩與另一名女一中的同學被選派來到北京電視臺宣讀了

信與倡議書的全文，在一個電視有如熊貓般珍惜的年代裏，四中的學生想盡辦法觀都看了這次直播，與之說去真切地感受一下高考制度廢除的喜悅，倒不如說是去享受那“革命成功”的精神快感。

“就在這個月的一天，北京四中初二學生劉源，把一封輕飄飄的信件，悄悄擱在了時任國家主席的父親劉少奇的案頭。把信交給劉源的時候，高三（五）班的兩位同學很鄭重地告訴劉源，說是要造反，要造資產階級教育制度的反，說當時的教育考試制度讓白專的留下來了，把鬧革命的、工農兵都擋在學校外面了。劉家有規矩，不允許捎信。劉源不敢把信直接交給父親，只擱在桌上。而這封信就刊載在 1966 年 6 月 18 日的人民日報上。信的結尾，是‘現在北京四中全體革命師生向全市革命的同志倡議：立即廢除高等學校入學考試制度’。和這封信同時刊載的，還有來自北京女一中的另一封抨擊高考制度的信件，和《人民日報》社論《徹底搞好文化革命，徹底改革教育制度》。信中，熱血沸騰的紅小將們這樣寫到：‘現行的升學制度就是中國封建社會幾千年來的舊科舉制度的延續，是一種很落後的、很反動的教育制度。現行的升學制度是和毛主席給我們制定的教育方針相違抗……其具體罪狀如下：（一）使許多青年不是為革命而學，是為考大學而鑽書堆，不問政治。不少同學有嚴重的‘唯有讀書高’、‘成名’、‘成家’、‘個人奮鬥’、‘走白專道路’等剝削階級的反動思想。現行的高考制度助長了這種思想。（二）使許多學校片面追求升學率，而造成許多“特殊”、“重點學校”、專收高材生，這種學校為一些隻鑽書本，不問政治的人大開方便之門，把大批優秀的工農、革命幹部子女排斥在外。（三）對學生德智體的全面發展起到嚴重的阻礙作用……我們具體建議如下：從今年起就廢除舊的升學制度。”（1）

隨著《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高等學校招生工作推遲半年進行的通知》發出，

新中國在 1952 年建立起來的統一高考制度由此而廢。而 11 年後，同樣還是劉源，寫信給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鄧小平要求恢復高考。歷史像是跟劉源開了一個不大不小的玩笑，讓他用兩封信兩次影響了中國的考試史。是的，歷史就是這麼讓人摸不清頭腦，因為這次“偉大”的考試改革其實只是四中 1966 年紅色樂章由緩轉急的一首變奏曲，而真正的高潮還在編排著它的音符。

(1) 劉源《鄧小平批准我參加高考》

其實，這篇文章及其引用的劉源文章寫得還不完全準確，當年的“兩封信”並不是“平起平坐”的，而是有先、有後，有“首倡”、有“附議”的區別。

最近看到 2009 年網路上就披露

北京四中：皇城根裏“第一牛中學”【摘錄】

2009-05-19 09:12:03 來源：e 度教育社區

時光荏苒，文革爆發前夕的 1966 年 4、5 月間，北京四中高三·五班同學，在團支部書記、中共(預備)黨員孔丹帶領下，卻做了一件“錯事”：聯名給毛主席寫了信，情緒激昂地要求廢除“封建高考制度的桎梏”。

四中的許多校友都知道，孔丹之父孔原，文革前任中央調查部(國家安全部前身)部長，其母許明，文革前任國務院副秘書長、總理辦公室主任。

有消息說，孔丹帶動全班寫信，就是因為北京女一中的同學，已經先一步寫了主張廢除高考的《致毛主席的信》，於是，組織上要求四中的同學“把認識寫得更深刻些”，“也應該寫給毛主席”。

後來，《人民日報》把北京女一中和北京四中的兩封《致毛主席的信》全部發表，兩信發佈之後，1966 年夏天的高考，即被“廢止”，且一“廢”就是十一年。

作為四中高三優秀學生的孔丹，也因此喪失了接受高等教育之機會。

1977 年恢復高考後，在陝北插隊多年的孔丹，並未參加全國高考，而是在 1978 年，直接參加了文革後第一批研究生考試，憑藉在四中打下的紮實基本功和不斷自修，跨越本科，一舉考入中國社科院，師從吳敬璉。今日孔丹，已成為繼榮毅仁、王軍之後，中信集團的第三位董事長。

而 2007 年的網路上則披露“學生來信”不是無緣無故的

在高考風雲中沉浮的學子細述當年【摘錄】

1966 年 6 月 18 日，《人民日報》在頭版位置發表了北京女一中高三（四）班和北京四中高三（五）班全體同學寫給毛主席的信，強烈要求廢除高考。“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槍，就這樣在教育戰線打響。1976 年，“四人幫”倒臺，鄧小平復出後首先做的第一件事，正是恢復高考。這不能簡單地理解為歷史的巧合。

41 年彈指一揮間，當年攪動歷史風雲的紅衛兵怎樣了？本報記者尋訪到他們中的一員——當年北京四中高三（五）班的學生周孝正。即將進入花甲之年的周孝正，現在是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社會學研究所所長，央視特約評論員。回首往事，他無限感慨。

全班寫信倡議廢除高考

記者（以下簡稱“記”）：如果不介意的話，談談你們班在 1966 年寫的廢除高考那封信吧。

周孝正（以下簡稱“周”）：可以。我們班 47 個同學，當時以全班同學的名義給毛主席寫信，倡議廢除高考。當時社會上很少電視呢，我們四中有一台黑白

的，我記得我們班的王倩倩和北京女一中高三（四）班的一個女同學，他們兩人在中央電視臺宣講廢除高考倡議書，後來就登在《人民日報》上了。

記：你們給毛主席寫信要求廢除高考，難道你們不想上大學？北京四中可是有名的高中，我查了一下，陳景潤、薄熙來、李敖、王蒙、叢維熙、北島、陳凱歌.....包括中信董事長孔丹，很多名人都是你們的校友。

周：孔丹就是我們班的，當時他是團支部書記，就是他領頭寫了廢除高考的信。包括他，凡是上北京四中的，毫無疑問都想上北大、清華。我們高三（五）班是理科班，大家自然想考工程物理、工程化學這些專業，想去造原子彈。但是，“文化大革命”開始了，在“以階級鬥爭為綱”和“打倒走資派”的氛圍之下，我們提出廢除高考倡議後，當年大學暫停招生，而且一停就是 6 年。那時，反正沒有書讀了，我們就跑去串聯了。

記：聽說你們這兩間學校有很多高幹子弟，來自上面的資訊很靈通？

周：是的，林彪的孩子林立果，劉少奇的孩子都是我們學校的。孔丹是孔原的孩子，孔原當時是中央調查部部長，1925 年入黨的老革命，在周恩來身邊工作。實際上我們班有的高幹子弟知道“上面”有這個意思，他們就來一個倡議，況且“上面”也要利用我們學生。

記：是有人授意？

周：不是，學生就是知道一點資訊，就自己去做了。那是一種“左”的氛圍，你四中不提，別的中學也會提，是這麼回事。

再進一步搜尋，還可以看到，早在 2002 年就有更詳盡的披露——

域外懷舊錄 廢除高考制度的舊事重提 ·維一·（摘錄）

一九六六年的初夏，文化革命行將掀起高潮的時候，我正在北京四中讀書，初中還沒有畢業。……

六月十八號，《人民日報》終於發表了北京女一中高三四班的學生要求廢除高考制度的文章。緊接著就是四中高三五班的附議。在這些緊鑼密鼓的群情高昂之下，政府終於作出回應民心的決定：廢除高考制度，這倒是一貫上下呼應的手段。因此舉而獲得政治資本的造反之輩，早已熟知政治運作，風光十足自不必說，……

其後，亦如當年所有的政治活動一樣，人如海，歌如潮，將個天安門廣場擠得水泄不通。我當年所在中學的高三五班造反派雖然不是廢除考試制度的“首倡”者，但總也屬“附議”者，所以面子十足，全校上下似乎也都與有榮焉。

不過，就在這種“皆大歡喜”的氣氛之中，當初有件小事讓我又多少見識了此類政治運作的手法，值得一提，就在政府正式宣佈廢除高考制度的前幾日，儘管風聲日緊，大勢已是漸趨明朗，但畢竟尚無結論。這天我正好糊裏糊塗逃了課，扯謊說去寫批判三家村的大字報，便隨了幾個同學到外面去踢球。在門口傳達室等人時，正好有個高三五班的政治活躍份子在打電話，我在一邊不免佇足好奇凝聽。他正與對方說到，如今高考制度是願意也要廢除，不願意其實也要廢除，他們已經得到內部消息，現在上面已經有了正式決定，其實三兩天之間就要發表，只是現在需要自下而上的首倡一下，上面的文章政府自然去作。大勢既已如此，我們何不搶先，正可撈些資本。聽來對方覺得茲事體大，有所顧慮，他便把底牌和盤托出，鼓勵說，四中幹部子弟太多，容易給人以口實，所以由你們“首倡”，我們再來“附議”，頭功你們儘管拿去。聽到這裏，儘管我也正在翹盼廢除考試制度，但沒有想到的是，關係千萬人一代前途命運的舉措竟然可以是如此決定的兒

戲。但我又想到，這樣的政治手段竟讓一個毛頭小子在中學傳達室裏的電話上運作，又不能不說是百密一疏，千慮一失。果然不出所料，其後《人民日報》終於發表了北京女一中高三四班的學生要求廢除高考制度的文章，緊接著就是四中高三五班的附議，印證了我的消息。時過多少年之後，一個偶然的機會讓我從旁得知，女一中的這個高三四還真是個工農子弟占多數的班級。於是教我不得不佩服當初我們學校的革命小將政治意識與手段竟如此老道與嫺熟。再回過頭去看看 1966-6 新華社的後續報導，可以看到以上有關“首倡”與“附議”的說法並不是毫無根據的胡謔。

北京市女一中和四中革命師生熱烈歡呼中共中央和國務院關於改革高考辦法的決定(摘錄)

1966 年 06 月 20 日 新華社

新華社北京十八日電 倡議廢除舊的升學考試制度的北京市第一女子中學和最早回應這個倡議的北京市第四中學的革命學生們，懷著特別激動的心情，歡呼中共中央和國務院關於改革高等學校招生考試辦法的決定。他們決心更高地舉起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衝鋒陷陣，做毛澤東時代的革命闖將，徹底鬧革命。

那年我們這些才十四五歲的初中生，不能不關心高考招生的改革。因為自己面前也有中考關，以後也會遇到高考關。看到報紙、聽到廣播後，只知道“要有一定的時間來研究和制定新的招生辦法”。

實際上，公開宣佈與“內部掌握”的，從來就是“內外有別”的！如今從一些公開了的內部文件中知道，早在 1966-6-13，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教育部黨組

《關於改革高級中學招生辦法的請示報告》中，就明白無誤地說，“廢除現行現行高級中學招生考試辦法，實行推薦與選拔相結合的辦法招生”，“推薦與選拔必須突出政治，貫徹黨的階級路線”。

時隔數十年，陸陸續續暴露的內幕居然是這樣的不可思議，那場“廢除”居然還有如此曾經秘而不宣的的內幕。梳理這些逐步曝光的歷史，只能讓我們這些過來人中的平民百姓感到，當年能夠從報紙廣播得到的唯一的“來自中央的聲音”是極其不對稱的資訊。

第九節 文革初期毛澤東的部分講話和批語

選自《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

1966. 03. 13

打倒閻王，解放小鬼。〔 1 〕

注釋

〔 1 〕 這是毛澤東一九六六年三月三十日在上海市西郊談到學術批判問題時說的一句話。在這次談話中他講到：學術批判文章不要送審。你是閻王殿，小鬼不上門。打倒閻王，解放小鬼！我歷來主張，中央不對時，地方攻中央。去年九月工作會議，專門講了這個問題，如果中央出修正主義，地方要造反。其中的“打倒閻王，解放小鬼”一句後作為“毛主席語錄”，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三日《人民日報》發表。

1966. 04.

對中央關於撤銷《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彙報提綱》的批語

—

江青：

送上北京來件〔3〕二份，請你們研究一下，有何修改？我已請康生、伯達諸同志於今日或明日去上海同你們共同討論一次，然後由康生、伯達二同志于十六日夜間來此地作報告，最後定案。

毛澤東

四月十四日上午

八時半

二

恩來、小平〔4〕、彭真同志：

四月十二日的信及附件，收到閱悉。

請康生、伯達同志和其他可能去上海的起草小組同志于今天（十四日）或明天去上海，同上海同志商量一下檔問題，然後請康生、伯達二同志于十六日夜間或十七日上午來此地。

你們可於十六日來此。

各中央局是否要來人，請你們酌定。

毛澤東

一九六六年四

月十四日上午九時

三

有一些修改，請斟酌。送恩來、小平、彭真、康生同志。〔5〕

毛澤東

四月十四日上午

四

已閱。

退康生辦。〔 6 〕

五

中央決定撤銷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批轉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彙報提綱》，撤銷原來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及其辦事機構，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 7 〕，隸屬於政治局常委之下。

六

這個提綱用混亂的、自相矛盾的、虛偽的詞句，模糊了當前文化思想戰線上的尖銳的階級鬥爭，特別是模糊了這場大鬥爭的目的是對吳晗〔 8 〕及其他一大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中央和中央各機關，各省、市、自治區，都有這樣一批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的批判。這個提綱不提毛主席一再指出的吳晗《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問題，掩蓋這場鬥爭的嚴重的政治性質。

七

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鬥爭，馬克思主義的真理同資產階級以及一切剝削階級的謬論的鬥爭，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根本談不上什麼平等。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在上層建築其中包括在各個文化領域的專政，無產階級繼續清除資產階級鑽在共產黨內打著紅旗反紅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這些基本問題上，難道能夠允許有什麼平等嗎？幾十年以來的老的社會民主黨和十幾年以來的現代修正主義，從來就不允許無產階級

同資產階級有什麼平等。他們根本否認幾千年的人類歷史是階級鬥爭史，根本否認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根本否認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革命和對資產階級的專政。相反，他們是資產階級、帝國主義的忠實走狗，同資產階級、帝國主義一道，堅持資產階級壓迫、剝削無產階級的思想體系和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體系和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他們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們同我們的鬥爭是你死我活的鬥爭，絲毫談不到什麼平等。因此，我們對他們的鬥爭也只能是一場你死我活的鬥爭，我們對他們的關係絕對不是什麼平等的關係，而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關係，即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實行獨裁或專政的關係，而不能是什麼別的關係，例如所謂平等關係、被剝削階級同剝削階級的和平共處關係、仁義道德關係等等。

八

毛主席經常說，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

破，就要講道理，講道理就是立，破字當頭，立也就在其中了。

九

提綱反對的鋒芒是指向無產階級左派，顯然是要給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戴上“學閥”這頂帽子，倒過來支持真正的資產階級的學閥，維持他們在學術界的搖搖欲墜的壟斷地位。其實，那些支持資產階級學閥的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那些鑽進黨內保護資產階級學閥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才是不讀書、不看報、不接觸群眾、什麼學問也沒有、專靠“武斷和以勢壓人”、竊取黨的名義的大黨閥。

十

正當無產階級在思想戰線上對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發動一場新的激烈鬥爭剛

剛開始，而且許多方面、許多地方還沒有開始參加鬥爭，或者雖然已經開始了鬥爭，但是絕大多數黨委對於這場偉大鬥爭的領導還很不理解，很不認真，很不得力的時候，提綱卻反復強調鬥爭中要所謂“有領導”、要“謹慎”、要“慎重”、要“經過有關領導機構批准”，這些都是要給無產階級左派劃許多框框，提出許多清規戒律，束縛無產階級左派的手腳，要給無產階級的文化革命設置重重障礙。一句話，迫不及待地要剎車，來一個反攻倒算。提綱的作者們對於無產階級左派反擊資產階級反動“權威”的文章，已經發表的，他們極端懷恨，還沒有發表的，他們加以扣壓。他們對於一切牛鬼蛇神卻放手讓其出籠，多年來塞滿了我們的報紙、廣播、刊物、書籍、教科書、講演、文藝作品、電影、戲劇、曲藝、美術、音樂、舞蹈等等，從不提倡要受無產階級的領導，從來也不要批准。這一對比，就可以看出，提綱的作者們究竟處在一種什麼地位了。

十一

各級黨委要立即停止執行《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彙報提綱》。全黨必須遵照毛澤東同志的指示，高舉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大旗，徹底揭露那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術權威”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而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同時批判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文化領域的各界裏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清洗這些人，有些則要調動他們的職務。尤其不能信用這些人去做領導文化革命的工作，而過去和現在確有很多人是在做這種工作，這是異常危險的。

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

資產階級專政。

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雪夫〔9〕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

這個通知，可以連同中央今年二月十二日發出的錯誤檔，發到縣委、文化機關黨委和軍隊團級黨委，請他們展開討論，究竟哪一個檔是錯誤的，哪一個檔是正確的，他們自己的認識如何，有哪些成績，有哪些錯誤。

根據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七日《人民日報》刊印。（有毛澤東修改件）

注釋

〔1〕 文化革命五人小組，是根據毛澤東的提議，於一九六四年七月設立的，由當時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彭真，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宣傳部部長陸定一，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康生，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周揚，新華通訊社社長、《人民日報》總編輯吳冷西五人組成。一九六六年二月三日，文化革命五人小組舉行擴大會議，討論當時學術批判中出現的問題，會後整理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彙報提綱》，又稱“二月提綱”，上報毛澤東和中共中央。二月十二日，中共中央批轉了這個彙報提綱。

〔2〕 這個通知稿即後來由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於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又稱“五·一六通知”，發表在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七日《人民日報》。本篇五至十一中用宋體字排印的是毛澤東加寫和改寫的文字。

〔 3 〕 指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陳伯達為首的起草小組起草的中央關於撤銷《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彙報提綱》的通知（一九六六年四月十二日稿），由周恩來等於一九六六年四月十二日從北京報送當時在杭州的毛澤東。

〔 4 〕 恩來，即周恩來。小平，即鄧小平，當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

〔 5 〕 這個批語寫在一九六六年四月十二日報送的中共中央通知稿上。對這個通知稿，毛澤東後來又作過多次修改，見本篇五至十一。

〔 6 〕 這是對康生一九六六年四月十八日報送的通知修改稿的批語。康生在給毛澤東的報告中說：“《通知》第四頁第七條末句，按主席指示，作了修改，請審閱。”第七條末句，最後改定為本篇九中用宋體字排印的部分。

〔 7 〕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公佈了重新設立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名單，陳伯達任組長，康生任顧問，江青、王任重、劉志堅、張春橋任副組長，組員有謝鐘忠、尹達、王力、關鋒、戚本禹、穆欣、姚文元。這個名單，後來在“文化大革命”中有過多次變動。

〔 8 〕 吳晗，北京市副市長、民盟中央副主席。因寫作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等，受到錯誤批判。一九六九年被迫害致死。一九七九年三月，經中共中央批准，北京市委為這一冤案徹底平反。

〔 9 〕 赫魯雪夫，原任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蘇聯部長會議主席。一九六四年十月被解除領導職務。

1966. 04. 23.

對高教部黨委部署深入開展學術批判情況簡報的批語

此件〔 1 〕好，發各同志看。各地區大學師生，中學教員和高中學生，都

應參加到文化革命運動中去。

毛澤東

四月二十三日

注釋

〔1〕 指中共中央辦公廳教育辦公室一九六六年四月十九日關於高教部黨委召開座談會部署深入開展學術批判運動的情況簡報。

簡報說，高教部黨委於四月十七日召開北京、天津十所高校黨委書記、宣傳部長會議，討論和部署了深入開展學術批判運動的問題。會上，北大等學校彙報了前一時期學術批判情況，提出目前在批判方面存在的主要問題是領導思想落後於實際，從學術觀點上批判得多，從政治觀點上批判得少，沒有自覺地認識到這是一場政治思想戰線上的階級鬥爭。會上對今後深入開展這一運動作了如下部署：

（1）各院校領導必須明確，這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在文藝教育戰線上的兩條道路的鬥爭，也是教育戰線徹底清除資產階級專家壟斷教育的鬥爭，是奪教育領導權的鬥爭。

（2）目前高校的所有工作都要和當前學術批判結合起來，通過學術批判來推動教育革命和教學改革。

（3）放手發動群眾，組織師生和教職員工積極參加這場戰鬥。

1966.05.07

對總後勤部關於進一步搞好部隊農副業生產報告的批語

一

林彪〔1〕同志：

你在五月六日寄來總後勤部的報告〔2〕，收到了，我看這個計畫是很好的。是否可以將這個報告發到各軍區，請他們召集軍、師兩級幹部在一起討論一下，以其意見上告軍委，然後報告中央取得同意，再向全軍作出適當的指示。請你酌定。只要在沒有發生世界大戰的條件下，軍隊應該是一個大學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條件下，很可能也成為一個這樣的大學校，除打仗以外，還可做各種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八年中，各個抗日根據地，我們不是這樣做了嗎？這個大學校，學政治、學軍事、學文化。又能從事農副業生產。又能辦一些中小工廠，生產自己需要的若干產品和與國家等價交換的產品。又能從事群眾工作，參加工廠農村的社教四清運動〔3〕；四清完了，隨時都有群眾工作可做，使軍民永遠打成一片。又要隨時參加批判資產階級的文化革命鬥爭。這樣，軍學、軍農、軍工、軍民這幾項都可以兼起來。但要調配適當，要有主有從，農、工、民三項，一個部隊只能兼一項或兩項，不能同時都兼起來。這樣，幾百萬軍隊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樣，工人也是這樣，以工為主，也要兼學軍事、政治、文化。

也要搞四清，也要參加批判資產階級。在有條件的地方，也要從事農副業生產，例如大慶油田那樣。

農民以農為主（包括林、牧、副、漁），也要兼學軍事、政治、文化，在有條件的時候也要由集體辦些小工廠，也要批判資產階級。

學生也是這樣，以學為主，兼學別樣，即不但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批判資產階級。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

商業、服務行業、黨政機關工作人員，凡有條件的，也要這樣做。

以上所說，已經不是什麼新鮮意見、創造發明，多年以來，很多人已經是這樣做了，不過還沒有普及。至於軍隊，已經這樣做了幾十年，不過現在更要有所發展罷了。

毛澤東

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

二

林彪同志：

此件〔4〕如你同意，即可印發中央軍委以及此次會議〔5〕，讓他們帶回去，加以討論，如無意見，即可執行。印時，要請中央加個批語〔6〕。請你酌辦。

毛澤東

五月十四日

注釋

〔1〕 林彪，當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兼國防部部長。

〔2〕 指中共中央軍委總後勤部一九六六年五月二日關於進一步搞好部隊農副業生產給中央軍委的報告。報告說，從幾年的情況來看，軍隊搞生產確實是一件大好事，具有重大的政治意義和經濟意義：

（一）恢復了我軍的老傳統；

（二）可以為國家開墾一批農田；

(三) 可以為國家提供一批糧食；

(四) 全生產的部隊仍可進行一定的政治教育和軍事訓練；

(五) 邊疆部隊搞生產，可以同發展邊疆經濟、建設國防結合起來，具有特殊意義。我們總的想法是：假如軍隊在戰備時期多搞點生產，在三五年內為國家提供四五十億斤糧食，這就等於準備好了大約七八百萬人一年的軍糧。這是戰備的物資條件之一。

〔 3 〕 指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六年先後在部分農村和少數城市工礦企業、學校等單位開展的以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為主要內容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 4 〕 即本篇一。因寫於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後來通稱為《五·七指示》。

〔 5 〕 指一九六六年五月四日至二十六日在北京舉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

〔 6 〕 中共中央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五日轉發了毛澤東的批語和軍委總後勤部的報告，並加批語指出：“中央認為，毛澤東同志給林彪同志的信，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具有歷史意義的文獻。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劃時代的新發展。這一思想，不僅對促進我國的社會主義革命、社會主義建設具有偉大的歷史意義，而且對於反對帝國主義、現代修正主義、各國反動派可能的進攻，加強國防、貫徹人民戰爭思想方面，具有偉大的戰略意義。”

1966. 06. 01

關於播發《宋碩、陸平、彭佩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麼？》大字的批語〔 1 〕

康生、伯達〔 2 〕同志：

此文可以由新華社全文廣播，在全國各報刊發表，十分必要。

北京大學這個反動堡壘，從此可以開始打破。請酌辦。

毛澤東

六月一日

注釋

〔 1 〕 這個批語寫在《紅旗》雜誌、《光明日報》總編室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七日編印的《文化革命簡報》第十三期上。該期簡報登載了北京大學哲學系聶元梓、宋一秀、夏劍豸、楊克明、趙正義、高雲鵬、李醒塵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寫的一張大字報，題為《宋碩、陸平、彭佩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麼？》。這張大字報，新華社六月一日全文播發，《人民日報》等報刊六月二日刊載。宋碩，當時任中共北京市委大學部副部長。陸平，當時任北京大學校長、黨委書記。

彭佩雲，當時任北京市委大學部幹部、北京大學黨委副書記。此後不久，他們均被錯誤地撤銷領導職務。聶元梓，當時任中共北京大學哲學系總支書記。後因反革命罪於一九七八年被依法逮捕，一九八三年被判處有期徒刑十七年，剝奪政治權利四年。

〔 2 〕 康生，當時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組顧問。伯達，即陳伯達，當時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長。

1966 年

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必須組織、發展無產階級左派隊伍，並且依靠他們發動群眾，團結群眾，教育群眾。〔 1 〕

注釋

〔 1 〕 一九六六年七月一日出版的《紅旗》雜誌第九期發表的社論《信任群眾，依靠群眾》中，在“毛主席教導我們”後面引用了這句話。《人民日報》七月三日轉載了這篇社論。

1966 年

要保護左派，支持左派，建立和擴大左派隊伍。〔 1 〕

注釋

〔 1 〕 《人民日報》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一日發表《〈二月提綱〉是資產階級專政的黑綱領》（署名任立新）的文章中，用黑體字引用了毛澤東的這句話。文中說：“毛主席在開始發動這場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就多次指出：要保護左派，支持左派，建立和擴大左派隊伍。”

1966. 07. 25 08. 04

關於不要用“頂峰”、“最高指示”一類詞語的批語

一

陶鑄〔 1 〕同志閱後，退張平化〔 2 〕同志：

此件〔 3 〕看過，可用。在第五頁上將“最高指示”改為“指導方向”。以後請注意不要用“最高最活……”，“頂峰”，“最高指示”一類的語言。

毛澤東

七月廿五日

二

可發各省、市、區黨委注意掌握。〔 4 〕

毛澤東

八月四日

注釋

〔 1 〕 陶鑄，當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中央宣傳部部長。

〔 2 〕 張平化，當時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常務副部長。

〔 3 〕 指題為《中共中央宣傳部舉行會議憤怒聲討文藝界黑線總頭目周揚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滔天罪行》的新華社電訊稿。毛澤東將此稿第五頁“他竭力反對以毛澤東思想作為文藝創作的最高指示”一句中的“最高指示”，改為“指導方向”。這篇電訊稿發表在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九日《人民日報》。周揚，原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全國文聯副主席、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錯誤地指控為所謂“文藝黑線”的代表。一九七九年，中共中央宣傳部批准文化部黨組的決定，指出解放後十七年根本不存在什麼“文藝黑線”和以周揚等為代表的“黑線代表人物”問題，凡因所謂“文藝黑線”等錯案受到打擊和誣陷者，一律予以徹底平反。

〔 4 〕 這個批語寫在陶鑄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九日給中共中央、毛澤東的報告上。報告中說，七月二十八日上午，中宣部召集首都各報負責人，傳達了主席七月二十五日的指示，作了討論。大家建議採取如下步驟：一、在代表黨政領導機關的發言和檔中，在報紙的社論、標題、按語和新聞導語中，都不用這類語言；在群眾稿件中有這類語言的，還應當保留一個時期。二、外國朋友讚揚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應按照他們的原話報導，不要用推論的方法去“加碼”。有些

不符合主席此次指示精神的話，仍可報導，但不要用在標題上。三、“反黨黑幫”必然會利用我們改變提法的機會向黨反攻，從根本上反對毛澤東思想，我們應當揭露他們的陰謀。以上意見是否可行，請中央指示。如認為可行，目前應傳達到什麼範圍，亦請中央考慮決定。

八月四日，中共中央將陶鑄的報告發至省軍級。

給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的信

一 各同志〔1〕：

請考慮此件〔2〕及附件〔3〕是否正確。有錯誤，請指正。

毛澤東

七月卅一日

二

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同志們：

你們在七月二十八日寄給我的兩張大字報以及轉給我要我回答的信，都收到了。你們在六月二十四日和七月四日的兩張大字報，說明對一切剝削壓迫工人、農民、革命知識份子和革命黨派的地主階級、資產階級、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他們的走狗，表示憤怒和申討，說明對反動派造反有理，我向你們表示熱烈的支持。同時我對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紅旗戰鬥小組說明對反動派造反有理的大字報和由彭小蒙同志于七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大學全體師生員工大會上，代表她們紅旗戰鬥小組所作的很好的革命演說，表示熱烈的支持。在這裏，我要說，我和我的革命戰友，都是採取同樣態度的。不論在北京，在全國，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凡是同你們採取同樣革命態度的人們，我們一律給予熱烈的支持。還有，我們支持

你們，我們又要求你們注意爭取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們。對於犯有嚴重錯誤的人們，在指出他們的錯誤以後，也要給以工作和改正錯誤重新做人的出路。馬克思說，無產階級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類。如果不能解放全人類，無產階級自己就不能最後地得到解放。這個道理，也請同志們予以注意。

毛澤東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

注釋

〔1〕 指劉少奇，周恩來，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中共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陶鑄和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長陳伯達，顧問康生，副組長江青、王任重、張春橋，組員王力、姚文元、關鋒、戚本禹，中共中央華北局第一書記、北京市委第一書記李雪峰，中共北京市委第二書記吳德等十五人。

〔2〕 即本篇二。這封信沒有發出。

〔3〕 指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四日寫的大字報《革命的造反精神萬歲》和七月四日寫的大字報《再論革命的造反精神萬歲》。七月二十八日，他們將這兩張大字報送江青審閱，並請江青轉送毛澤東，請求批示。

這兩張大字報後來載於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一日出版的《紅旗》雜誌第十一期，題目分別改為《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和《再論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

《人民日報》八月二十四日予以轉載。

炮打司令部〔1〕——我的一張大字報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

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2〕和人民日報評論員的評論〔3〕，寫得何等好啊！請同志們重讀這一篇大字報和這篇評論。可是在五十多天裏，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志氣，又何其毒也！聯繫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省的嗎？〔4〕

毛澤東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

注釋

〔1〕毛澤東這張大字報中所說的“司令部”，實際上是指“文化大革命”中被錯誤定性的所謂以劉少奇為“總頭目”的“資產階級司令部”。大字報中所說的“在五十多天裏”“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和“實行白色恐怖”，是指“文化大革命”初期向一些單位派工作組這件事，後來被錯誤地指責為所謂“以劉少奇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文化大革命”中，由於當時對黨內和國內形勢作了違反實際的估計，認定黨內存在一條與中央路線相對立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存在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把劉少奇當作黨內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的總頭目和全國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並且離開民主集中制的原則，採取錯誤的方針和方法，在全國範圍內，對劉少奇進行了公開的、錯誤的批判和鬥爭。林彪、江青、康生、陳伯達等人，出於他們篡奪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顛覆無產階級專

政的反革命目的，利用這個錯誤，憑藉其所竊取的權力，蓄意對劉少奇進行政治陷害和人身迫害，並把一大批黨政軍領導幹部誣陷為“劉少奇的代理人”，統統打倒。在江青、康生、謝富治等人的直接控制和指揮下，採取弄虛作假、斷章取義、逼供信等惡劣手段，拼湊虛構的、牽強附會的材料，偽造證據，在一九六八年九月向中央報送了一份所謂《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這份《報告》和附件《罪證》，在當時黨中央工作和黨內生活處於極不正常的狀況之下，於十月由黨的八屆十二中全會通過。這次全會公報，還宣佈了中央“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撤銷其黨內外的一切職務”的決議。一九六九年十月，劉少奇在重病中被強行從北京押送到開封“監護”，同年十一月十二日被迫害含冤逝世。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一九七九年二月中央決定，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和中央組織部對劉少奇一案進行復查。一九八〇年二月二十九日，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通過《關於為劉少奇同志平反的決議》。決議指出：根據復查結果，根本不存在一條以劉少奇為代表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不存在一個以劉少奇為“總頭目”的“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不存在一個以劉少奇為最大的“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文化大革命”初期，派工作組到一些單位指導運動，是我們黨多年來解決基層問題的一種做法，不存在一條由劉少奇制定和推行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決議認為原審查報告給劉少奇強加的“叛徒、內奸、工賊”三大罪狀。以及其他各種罪名，完全是林彪、江青、康生、陳伯達一夥的蓄意陷害。八屆十二中全會據此作出“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撤銷其黨內外的一切職務”的決議是錯誤的。過去對於劉少奇的污蔑、誣陷、偽造的材料以及一切不實之詞都應完全推倒。為此，全會決定撤銷八屆十二中全會公報中加給劉少奇的罪名和對他的處理決議，相應地撤銷原審查報告，恢復劉少奇作為偉大的馬

克思主義者和無產階級革命家、黨和國家的主要領導人之一的名譽。

〔 2 〕 指北京大學哲學系聶元梓、宋一秀、夏劍彜、楊克明、趙正義、高雲鵬、李醒塵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寫的題為《宋碩、陸平、彭佩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麼？》的大字報。

〔 3 〕 指《人民日報》一九六六年六月二日發表的本報評論員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

〔 4 〕 本篇原寫在一份一九六六年六月二日的《北京日報》上。

這一天的《北京日報》轉載了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毛澤東後來作過兩次修改，並加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的標題。《炮打司令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作為會議檔印發，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七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到縣團級，一九六七年八月五日《人民日報》公開發表。

1966.08.05

在《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一文中加寫的批註〔 1 〕

危害革命的錯誤領導，不應當無條件接受，而應當堅決抵制，在這次文化大革命中廣大革命師生及革命幹部對於錯誤的領導，就廣泛地進行過抵制。

注釋

〔 1 〕 《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是《人民日報》為發表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而寫的一篇本報評論員文章。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印發此文時，毛澤東在其中的“對於無產階級革命派來說，我們遵守的是中國共產黨的紀律，我們無條件接受的，是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領導”一句後面，加括弧寫了這個批註。這篇文章及毛澤東的批註後來由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到縣團級。

1966. 08. 10

在中央接待站會見首都群眾時的講話

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1〕

注釋

〔1〕 據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人民日報》發表的新華社十一日電訊稿報導，毛澤東於十日下午七時十五分來到中共中央所在地的群眾接待站，會見前來慶賀中共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決定的首都群眾，向大家說了這句話。

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閉幕會上的講話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

關於第九次大會的問題，恐怕要準備一下。第九次大會什麼時候召集的問題，要準備一下。〔1〕已經多年了，八大二次會議〔2〕到後年就十年了。現在要開九次大會大概是在明年一個適當的時候再開，現在要準備，建議委託中央政治局同它的常委會來籌備這件事，好不好？

至於這次全會所決定的問題〔3〕，究竟是正確的還是不正確的，要看以後的實踐。我們所決定的那些東西，看來群眾是歡迎的。比如中央主要的一個決定就是關於文化大革命，廣大的學生和革命教師是支持我們的，而過去那些方針，廣大的革命學生跟革命教師是抵抗的，我們是根據這些抵抗來制定這個決定的。但是，究竟這個決定能不能實行，還是要靠我們在座的與不在座的各級領導去做。比如講依靠群眾吧，群眾路線，還是有兩種可能性：一種是依靠，一種是不依靠；一種是實行群眾路線，一種是不實行群眾路線。決不要以為，決定上寫了，

所有的黨委，所有的同志就都會實行，總有一小部分人不願意實行。可能比過去好一些，因為過去沒有這樣公開的決定，並且這次有組織的保證。這回組織有些改變，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候補委員、書記處書記、常委的調整，就保證了中央這個決議以及公報的實行。

對犯錯誤的同志總是要給他出路，要准許改正錯誤。不要認為別人犯了錯誤，就不許他改正錯誤。我們的政策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一看二幫，團結——批評——團結。

我們這個黨不是黨外無黨，我看是黨外有黨，黨內也有派，從來都是如此，這是正常現象。我們過去批評國民黨，國民黨說黨外無黨，黨內無派，有人就說，“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我們共產黨也是這樣，你說黨內無派？它就是有，比如說對群眾運動就有兩派，不過是占多占少的問題。如果不開這次全會，再搞幾個月，我看事情就要壞得多。所以，我看這次會是開得好的，是有結果的。

根據中共中央檔刊印。（有毛澤東修改件）

注釋

〔 1 〕 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後來於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至二十四日在北京舉行。

〔 2 〕 指一九五八年五月五日至二十三日在北京舉行的中共八大二次會議。

〔 3 〕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至十二日在北京舉行的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主要議題是討論和批准一九六二年九月八屆十中全會以來中央政治局關於國際

國內問題的重大決策和措施，討論和通過《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調整中央領導機構。

1966. 08. 10

在首都慶祝文化大革命大會上同林彪的談話〔 1 〕

這個運動規模很大，確實把群眾發動起來了，對全國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義。

根據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九日《人民日報》刊印。

注釋

〔 1 〕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首都北京和來自全國各地的百萬群眾在天安門廣場舉行慶祝文化大革命的大會。本篇是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檢閱慶祝遊行隊伍時同林彪的談話。林彪，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繼續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稱中央副主席。

1966 年

革命靠自己。〔 1 〕

根據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九日《人民日報》刊印。

注釋

〔 1 〕 這是周恩來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在首都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群眾大會上講話中引用的毛澤東的話。周恩來的講話發表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九日《人民日報》。

1966年8月

要用文鬥，不用武鬥〔1〕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一場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

實現這一場大革命，要用文鬥，不用武鬥。

根據一九六六年九月五日《人民日報》刊印。

注 釋

〔1〕 這是《人民日報》一九六六年九月五日社論《用文鬥，不用武鬥》中引用的毛澤東的兩句話。此前的八月二十九日，毛澤東曾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講過：文化大革命，發展到社會上鬥批改。要文鬥，不要武鬥。

1966.08.30

在章士釗反映被抄家情況來信上的批語〔1〕

送總理酌處〔2〕。應當予以保護。

毛 澤 東

八月卅日

注 釋

〔1〕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中央文獻研究館館長章士釗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日給毛澤東寫信，反映八月二十九日晚被抄家的情況，請求毛澤東幫助，“在可能範圍內稍稍轉圜一下”，“最要緊在不發生重複搜索”。毛澤東閱信後即在上面寫了這個批語。據章士釗的女兒章含之寫的《我與父親章士釗》一文記載，

九月一日，毛澤東還給章士釗寫了一封回信，信中說：“來信收到，甚為繫念。已請總理予以佈置，勿念為盼！”

〔2〕 國務院總理周恩來接到毛澤東轉來的信件和批語後，當即辦理，並於八月三十日下午二時在信封上批註：“已辦。周注”。同時，他還親筆寫了一份應予保護的領導幹部和著名民主人士的名單，包括宋慶齡、郭沫若、章士釗、程潛、何香凝、傅作義、張治中、蔡廷鍇、邵力子、蔣光鼐、沙千里、張奚若、李宗仁等，和國家副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人大常委，政協全國委員會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部長、副部長，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兩高（指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負責人等。

1966. 08. 31

對林彪在接見全國各地來京師生大會上的講話稿的批語〔1〕

退林彪同志：

這樣修改〔2〕很好。

毛澤東

八月卅一日上午十一時

注 釋

〔1〕 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一日下午，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其他領導人一起在天安門廣場接見了來自北京及全國各地的五十萬師生和紅衛兵。林彪和周恩來分別發表講話。本篇是毛澤東對林彪八月三十一日送審的講話稿的批語。

〔2〕 指林彪在送審的講話稿中加寫的兩句話，即在講話稿中“革命的小將們，毛主席和黨中央熱烈讚揚你們敢想，敢說，敢幹，敢闖，敢革命的無產階級

革命精神。你們幹了大量的好事，你們提出了大量的好倡議。我們十分高興，我們熱烈支持你們” 這段話後面，加寫了“堅決反對壓制你們！你們的革命行動好得很！”

1966. 09. 07

關於不准調動工農幹預學生運動的批語〔 1 〕

林彪、恩來、陶鑄、伯達、康生、富春、任重、江青〔 2 〕各同志：

此件請一看。青島、長沙、西安等地的情況是一樣的，都是組織工農反學生。這樣下去，是不能解決問題的。似宜由中央發一指示〔 3 〕，不准各地這樣做，然後再寫一篇社論〔 4 〕，勸工農不要幹預學生運動，北京就沒有調動工農整學生，除人民大學曾調六百農民入城保郭影秋〔 5 〕，其他都沒有，以北京的經驗告地方照辦。

譚啟龍〔 6 〕和這個副市長的意見，我看是正確的。

請你們商議一下，酌定政策。

毛 澤 東

九月七日

注 釋

〔 1 〕 這個批語寫在中共青島市委嶗山縣“四清”工作團副團長、青島市副市長王效禹一九六六年九月四日給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報告上。報告中說：青島市委嶗山縣“四清”工作團黨委，“不是號召工農兵堅決支持學生的革命行動”，而是“要工人農民對學生進行教育，說吃著農民的飯，穿著工人做的衣服，不能去胡鬧”。“對學生不是叫他們游泳中去學游泳”，而“是說服教育不准進城”。“這是和中央對立的”。報告認為學生批判的方向是對的，“組織工人農

民支援”批判物件，“這是方向的錯誤”。

〔 2 〕 林彪，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繼續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稱中央副主席。恩來，即周恩來。陶鑄，當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中央文化革命小組顧問。伯達，即陳伯達，當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長。康生，當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組顧問。富春，即李富春，當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任重，即王任重，當時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副組長、中南局第一書記。江青，當時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副組長。

〔 3 〕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把毛澤東的批語和王效禹的報告轉發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等，並對不准調動工農幹預學生運動作了四條具體決定。

〔 4 〕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一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工農群眾和革命學生在毛澤東思想旗幟下團結起來》的社論。

〔 5 〕 郭影秋，當時任中共北京市委書記處書記、中國人民大學校長。

〔 6 〕 譚啟龍，當時任中共山東省委第一書記。

1966. 09. 15

對林彪在接見全國各地來京師生大會上的講話稿的批語和修改

一

很好。改了一點，請林酌定。

二

毛主席教導我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所要解決的根本矛盾，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個階級，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矛盾。這次運動的重點，是

鬥爭那些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炮打司令部，就是炮打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我們的國家，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我們國家的領導權，是掌握在無產階級手裏。鬥倒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正是為了鞏固和加強我們的無產階級專政。很明顯，一小撮反動資產階級分子，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五類分子和我們不同，他們反對無產階級為首的廣大革命人民群眾對他們的專政，他們企圖炮打我們無產階級革命的司令部，我們能容許他們這樣幹嗎？不能，我們要粉碎這些牛鬼蛇神的陰謀詭計，識破他們，不要讓他們的陰謀得逞。他們只是一小撮人，但是他們有時能夠欺騙一些好人。我們一定要緊緊掌握鬥爭的大方向。離開了這個大方向，就會走到邪路上去。

根據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六日《人民日報》刊印。（有毛澤東修改件）

注 釋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五日下午，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其他領導人一起在天安門廣場接見了首都北京和來自全國各地的百萬師生和紅衛兵。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和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分別發表講話。本篇一是毛澤東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陶鑄九月十五日晨送審的林彪講話稿的批語；本篇二是毛澤東對這個講話稿中一段話的修改，其中用宋體字排印的是他加寫和改寫的文字。

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

我講幾句，講兩件事。

十七年來，有些事情，我看是做得不好，比如文化意識方面的事情。

想要使國家安全，鑒於史達林一死，馬林科夫〔2〕擋不住，發生了問題，出了修正主義，就搞了一個一線、二線。現在看起來，不那麼好。我處在第二線，別的同志處在第一線，結果很分散。一進城就不那麼集中了。搞了一線、二線，出了相當多的獨立王國。所以，十一中全會〔3〕對一線、二線的問題，就做了改變。

十一中全會以前，我處在第二線，不主持日常工作，有許多事情讓別人去做，想讓他們在群眾中樹立威信，以便我見馬克思的時候，國家不那麼震動。以前的意思是那樣。大家也贊成這個意見。但處在第一線的同志處理得不那麼好。現在，這個一線、二線的制度已經改變了。但紅衛兵還不知道已經改變了。

我也有責任。為什麼說我也有責任呢？第一是我提議搞書記處，政治局常委裏頭有一線、二線。再，就是過於信任別人。

引起警覺，還是“二十三條”〔4〕那個時候。

從許多問題看來，這個北京就沒有辦法實行解決，中央的第一線中存在的問題就是這樣。所以，我就發出警告說，北京出了修正主義怎麼辦？這是去年九十月間說的。我感覺到，在北京我的意見不能實行，推行不了。為什麼批判吳晗〔5〕不在北京發起呢？

北京沒有人幹這件事，就在上海發起。姚文元同志的文章〔6〕，就是上海發表的。

北京的問題，到現在可以說基本上解決了。

我要說的再一件事，就是這次文化大革命運動。

我闖了一個禍，就是批發了一張大字報〔7〕；再就是，給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寫了一封信〔8〕；再，我自己寫了一張大字報〔9〕。

給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的信，並沒有送出，但是他們已經知道了，傳出去了。

文化革命運動時間還很短。六月、七月、八月、九月，現在十月，五個月不到。所以，同志們不那麼理解。

時間很短，來勢很猛。我也沒有料到，一張大字報（北大的大字報）一廣播，就全國轟動了。給紅衛兵這封信，我還沒有發出，全國就搞起紅衛兵來了。各種各派的紅衛兵都有，北京就有三四個司令部。

紅衛兵一沖，把你們沖得不亦樂乎。

上次會議，我說，會議的決定，有些人不一定執行。〔10〕果然好多同志還不理解。經過兩個月以後，碰了釘子，有了一些經驗，這次會議就比較好了。

這次會議有兩個階段，頭一個階段的發言不那麼正常，後一個階段就比較順了。你們自己的思想有了變化。

總而言之，這個運動才五個月。可能要搞兩個五個月，或者還要多一點時間。那個時候還會有新的經驗，還要總結。

我們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搞了二十八年才勝利，開始原也不知道怎麼革法，包括我自己在內。從一九二一年起到一九四九年，二一、三一、四一到一九四九年，二十八年。我們自己也是逐步地在實踐中間總結經驗，找出道路來的。民主革命搞了二十八年，社會主義革命也搞了十七年了。這個文化革命只有五個月，所以，不能要求同志們現在就那麼理解了。

自從去年十一月批判吳晗開始，許多同志也沒有看文章，也不大去管。京戲改革，批判《武訓傳》〔11〕，批判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12〕，批判胡適〔13〕，等等，更不用講了。

過去，沒有全盤抓起來。我說這個責任在我。誰讓你沒有系統地抓起來呀？個別的抓了，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不行，問題不能解決。

這一次文化大革命運動的以前幾個月，去年十一月、十二月，今年一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雖然有那麼多文章，中間，五月十六，又發了一個“通知”〔14〕，可是，並沒有引起多大的注意。我看，還是大字報、紅衛兵一沖，你們不注意也不行。拿同志們的話來講，叫“革命革到自己頭上來了”。那末，趕快總結經驗吧。

為什麼兩個月以後，現在又來開這次工作會議呢？就是要總結一下經驗，做政治思想工作。林彪〔15〕同志講，要做政治思想工作。很對。你們回去有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要做。中央局、省一級、地一級、縣一級，至少這四級要開一個十幾天的會，真正把問題講清楚。也不要企圖所有的幹部統統弄得清楚，不可能，總有一些人不那麼清楚，思想不通。

好幾個同志對我講，“原則上我是贊成的，到了具體問題上又糊塗了”。這種話我就不那麼相信。原則上你又理解，具體問題又不得解決，是什麼道理？現在我看，恐怕也有一點道理。不然為什麼老這麼講？原則上是贊成的，碰到具體問題又處理不好，恐怕還是政治思想工作沒有做好。比如上次開會回去以後，就沒有開好會，有些地方就根本沒有開，有些地方開了，也不是那麼充分，被紅衛兵一沖就亂了。假如有十個書記，就要有七個或者八個去接見紅衛兵。接見慢了要衝進來。學生們生了氣，自己還不知道，又沒有準備回答什麼問題，以為表面上一應付，表示歡迎，就解決問題了。人家有一肚子氣，幾個問題一問，不能回答，就處於被動。這個被動也可以改變的，可以改變為主動的。

我對這次會議以後的情況，信心增加了。我就不講上次會議講過的話了，說

這一次會等於不開，回去還是老章程，維持現狀，跟紅衛兵對立，跟一派紅衛兵對立，利用另一派紅衛兵保駕。這種狀況，我看會改變，情況開始好轉了。當然，不能過高要求。中央局、省、地、縣這幾級，還不講縣以下廣大的幹部，全部都那麼快地就通了，不一定。總有一些人想不通，有一小部分，還是會要對立的。但是，我們相信大多數會講得通的。

我講這麼兩件事。一件事是歷史，講一線、二線的問題。

第二件事，是文化大革命的問題。

文化大革命這個火是我放起來的。時間很倉促，只幾個月。跟二十八年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十七年的社會主義革命比較起來，這個文化革命只不到半年。不那麼通，有抵觸，這是可以理解的，是自然的。很多同志，過去盡搞經濟工作，工業、農業、交通運輸，或者做一些別的政治工作、行政工作，就沒有設想到搞這場文化大革命。現在學生不是沖得厲害嗎，沒有設想到的事情來了。來了就來了。這一沖，我看有好處。過去多少年我們沒有想的事情，這一沖就要想一下了。無非是犯一些錯誤，那有什麼了不起的呀？路線錯誤，改了就是了。誰人要打倒你們呀？我是不要打倒你們的，我看紅衛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們。有兩個紅衛兵說，他們到全國跑了一趟，他們沒有料到有些老前輩這麼害怕紅衛兵。他們說，紅衛兵有什麼可怕的？有一位同志，他家裏有四個紅衛兵，就是他的兒女，分成四派，還有他們的同學，有很多人到他家來，大概有十幾個二十個吧！他接觸了那麼一點人。另外也有接觸幾十個人的，也有接觸一二百人的。我看小接觸很有益處。大的接觸，一百五十萬人，我們一個鐘頭就搞完了。這也是一種形式，一種方式。各有各的作用。

這一次會議的簡報，差不多我全都看了。你們過不了關，我也著急呀。時間

太短，可以原諒，不是存心要犯路線錯誤，有的人講，是糊裏糊塗犯的。也不能完全怪劉少奇同志、鄧小平同志〔16〕。他們兩個同志犯錯誤也有原因。

過去中央第一線沒有領導好。時間太短，對新問題沒有精神準備，政治思想工作沒有做好。所以，這一次又做了十七天。我看，以後會好一些。

根據毛澤東修改件刊印。

注 釋

〔1〕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一日，毛澤東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長陳伯達送審的這個講話記錄稿作了一些文字的修改，並批示：“退陳伯達同志。就照這樣吧，我改了幾個字。暫不發出。”

〔2〕 馬林科夫，一九五三年史達林逝世後，任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蘇聯部長會議主席。一九五五年二月，改任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兼電站部部長。一九五七年六月被撤職。

〔3〕 指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至十二日在北京舉行的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

〔4〕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五日至二十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開全國工作會議，主要討論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問題。一九六五年一月十四日，中共中央發佈了這次會議討論的紀要《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紀要內容共二十三條，因此簡稱“二十三條”。

〔5〕 吳晗，見本冊第45頁注〔8〕。

〔6〕 指《文匯報》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發表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這篇文章是由江青與張春橋在上海密謀策劃，由姚文元執筆起草的。

〔7〕 指北京大學哲學系聶元梓、宋一秀、夏劍豸、楊克明、趙正義、高

雲鵬、李醒塵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寫的題為《宋碩、陸平、彭佩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麼？》的大字報。

〔 8 〕 指毛澤東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給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的一封信，見本冊第 87—88 頁。

〔 9 〕 指毛澤東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寫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見本冊第 90 頁。

〔 10 〕 這句話是毛澤東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閉幕會上的講話中說的。見本冊第 100 頁。

〔 11 〕 指一九五一年在思想文化戰線上開展的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運動。

〔 12 〕 指一九五四年在思想文化戰線上開展的對紅學家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一書的批判運動。

〔 13 〕 指一九五四年在思想文化戰線上開展的對胡適思想的批判運動。

〔 14 〕 指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又稱《五·一六通知》。

〔 15 〕 林彪，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繼續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稱中央副主席。

〔 16 〕 鄧小平，原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總書記。“文化大革命”初期，因同劉少奇一起向一些單位派工作組，被指責為制訂和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受到錯誤的批判。後來被錯誤地當作另一個“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劉少奇資產階級司令部”的第二號人物，受到批判和迫害。一九八〇年二月，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決議指出，“文化大革命”初期，派工作

組到一些單位指導運動，是我們黨多年來解決基層問題的一種做法，不存在一條由劉少奇制定和推行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不存在所謂以劉少奇“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不存在一批以劉少奇為“最大的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1966. 11. 10

對參加接見全國各地師生、紅衛兵的一些負責人的談話

你們要政治掛帥，到群眾裏面去，和群眾在一起，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 1 〕

根據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人民日報》刊印。

注 釋

〔 1 〕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日和十一日，毛澤東在北京接見了來自全國各地的二百多萬師生和紅衛兵。這是他十一月十日在天安門城樓上對參加接見的一些中央和其他方面負責人說的一句話。

1966. 11.

對江青在文藝界大會上的講話稿的批語和修改〔 1 〕

一

改了一點〔 2 〕，供小組〔 3 〕同志們參考。

二

退江青：

又有點修改〔 4 〕，似較妥當些。

毛 澤 東

十一月廿八日一時

三

事實上，多少年以來，隨著社會政治經濟方面新舊鬥爭的變化，在文學藝術方面，也出現了新的文學藝術，以與舊的文學藝術相對抗。就是號稱最難改革的京劇，也出現了新的作品。大家知道，在三十多年前，魯迅曾經是領導文化革命的偉大旗手。毛主席則在二十多年前，提出了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方向，提出了推陳出新的問題。推陳出新，就是要有新的、人民大眾的內容，喜聞樂見的民族形式。

四

這時，我才充分地認識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派工作隊這個形式是錯誤的，他們的工作內容尤其是錯誤的！

他們不是把鋒芒對準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以及反動的學術權威，而是對準革命的學生。同志們，朋友們，鬥爭的鋒芒對準什麼，這是一個大是大非的問題，這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原則問題！據說我們的毛主席早在今年六月間，就提出過不要急急忙忙派工作隊的問題，可是有的同志沒有請示毛主席，就急急忙忙地派出去了。但要指出，問題不在工作組的形式，而在它的方針、政策。有些單位並沒有派工作組，依靠原來的領導人進行工作，也同樣犯了錯誤。也有一部分工作組採取了正確的方針、政策，並沒有犯錯誤的。這就可以說明，問題究竟在哪裡。

注 釋

〔 1 〕 毛澤東對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副組長江青的這個講話稿有過多次批語和修改。本篇一是他對江青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送審的講話稿的批語；本篇二是對江青十一月二十七日送審的講話稿的批語；本篇三是對二十四日送審稿中一段話的修改；本篇四是對二十七日送審稿中一段話的修改。本篇三、四中用宋體字排印的是毛澤東加寫和改寫的文字。十一月二十八日，江青在北京舉行的“文藝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會”上發表了這個講話。

〔 2 〕 除本篇三外，毛澤東對江青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送審稿還作了一些修改。此稿第六至七頁寫道：“北京京劇一團的同志們，朋友們，你們給我的信，我倒是都看了。只是因為工作太忙，身體也不太好，沒有能夠親自到你們團去，但是，你們團裏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我始終是關心的，重視的。”毛澤東審閱時，將其中的後一句話改為：“只是因為工作忙一些，身體也不太好，沒有能夠到你們團去，但是，你們團裏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我是關心的。”第七頁寫道：“北京京劇一團是首先接受我提出的京劇改革光榮任務的一個單位。這是你們團裏一批想革命的演員和其他工作人員和我一塊努力的結果。”毛澤東審閱時，在其中的“和我一塊努力”後面，加上“在別人首創的基礎上加工或改制”十四個字。此外，毛澤東對這個送審稿還作了一些其他文字方面的修改。

（ 3 ） 指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組。

〔 4 〕 除本篇四外，毛澤東對江青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送審稿還作了一些修改。在第一頁，將“我比較系統地接觸了文學藝術”改為“我比較系統地接觸了一部分文學藝術”；在第三頁，刪去了“忠於毛主席”五個字；在第七頁，將“北京京劇一團是首先接受我提出的京劇改革光榮任務的一個單位”改為“北京京劇一團是北京首先接受京劇改革光榮任務的一個單位”；在第十頁，將

“對於我們黨內的反對毛主席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改為“對於我們黨內以反對毛主席為首黨中央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為目標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此外，毛澤東還作了一些其他文字方面的修改。

1966. 12. 25

關於不要公開引用《炮打司令部》等的批語〔1〕

關鋒同志：

都不要引用。

毛澤東

十二月廿五日

注 釋

〔1〕 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員、《紅旗》雜誌副總編輯關鋒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給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副組長江青寫信說，“紅旗雜誌元旦社論稿，引用了主席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

還引用了主席對人民日報評論員《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的批註”。

“請您考慮引用主席這些話，公開發表出來，是否妥當”。毛澤東的批語，就寫在關鋒的這封信上。《紅旗》雜誌一九六七年第一期發表了《人民日報》、《紅旗》雜誌元旦社論《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其中沒有引用毛澤東的大字報和批註。

1966 年

關於派軍隊幹部訓練學校師生的談話〔1〕

派軍隊幹部訓練革命師生的方法很好。訓練一下和不訓練大不一樣。這樣做，可以向解放軍學政治，學軍事，學四個第一〔2〕，學三八作風〔3〕，學三大紀律八項注意〔4〕，加強組織紀律性。駐京部隊派幹部訓練革命師生的經驗很好，很有成效，應當在全國推廣。

注 釋

〔1〕 中共中央、國務院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關於對大中學校革命師生進行短期軍政訓練的通知中，在“毛主席最近接見全國各地來京革命師生時，向林彪同志多次提出”之後，引用了這段話。

〔2〕 四個第一，指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

〔3〕 三八作風，指“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三句話和“團結、緊張、嚴肅、活潑”八個字。

〔4〕 三大紀律，指一切行動聽指揮，不拿群眾一針一線，一切繳獲要歸公。八項注意，指說話和氣，買賣公平，借東西要還，損壞東西要賠，不打人罵人，不損壞莊稼，不調戲婦女，不虐待俘虜。

第七章 社會各界造反

北京紅衛兵向全國各地市駐當地紅衛兵及社會各界的配合下迅速掀起了批鬥當地黨政領導的熱潮。上海大約 9 月份左右開始，北京紅衛兵高喊“造反有理，革命到底”的口號。在毛澤東語錄等等的配音下沖進上海市委（在延安路），

然後還有上海的紅衛兵加入，以衝擊上海市委開始，社會各界的造反派組織成立。一統天下的上海造反派——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就是在這背景下脫穎而出的。1966年12月26日，毛澤東過生日與各位在座的舉杯祝賀開展“全國全面階級鬥爭”。然後中央發出了全國春節不放假，按照毛澤東的步驟整個1967年就是奪權年。按照文革十幾年的規定鬥、批、改三大任務，進入全面鬥、批、改階段。

第一節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成立

文革中全國工人造反派組織中最典型最具代表性的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即上海工總司。工總司是全國第一個工人造反派組織，而且在全國造反派組織中規模最大、影響最大和持續時間最長。它控制上海局面達10年左右，代表人物王洪文在中共十大曾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毛澤東也在相當長的時間裏對上海工人造反派寄予厚望。上海工人造反派的每一個動作對上海乃至全國的文化大革命進程都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

1966年11月6日下午，在北京和上海紅衛兵的協助下魚愚園路311號召開了“上海工人串聯交流經驗會”，準備成立全市的統一組織。

參加這次會議的總計有十多個單位30多人。他們是上海國棉十七廠保衛科幹事王洪文、上海良工閥門廠鉗工陳阿大、上海國棉三十廠技術員王秀珍、上海合成纖維研究所化驗工葉昌明、上海玻璃機械廠工人潘國平、上海第三十一棉紡廠車工黃金海……

接著，這些人便商量辦公地點、做旗幟、印製紅袖章和召開成立大會。7日上午，王洪文帶領一些人，在金陵路和四川南路的交叉口敲開了上海紡織品公司

第一批發部的大門，控制了大門和電話，從中搶走了十二批紅布。

“工總司”提出“三項嚴正要求”：

- 一、上海市委必須承認“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
- 二、曹荻秋必須參加九日的大會，接受批判；
- 三、提供宣傳工具。

上海市委第一書記陳丕顯因病休息，主持工作的曹荻秋就立刻召開相關的市委領導同志開會，商量對策，並給剛上任的*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陶鑄打電話。陶鑄在電話中很明確地表示，必須嚴格按照中央文件辦。

在會上，曹荻秋針對王洪文等人的“三項嚴正要求”，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並表示作為中國共產黨的上海市委，對於這種違背中央文件精神的做法“不參加，不承認，不支持”。

曹荻秋的看法得到了與會者支援，形成了市委的統一認識。曹荻秋提出的“三不”與王洪文等人的“三項嚴正要求”針鋒相對。曹荻秋和魏文伯晚上到西郊賓館去看望陳丕顯，並向他彙報了會議上的決定。

曹荻秋表示：“工總司”這些為首的分子，都是一些有嚴重問題的”社會渣滓”，我們不能去參加大會，參加了就要犯錯誤。陳丕顯表示堅決支持市委的決定，堅決支援曹荻秋、魏文伯同志的工作。

“工總司”在沒有得到上海市委的支持、承認，在 11 月 9 日文化廣場召開大會。王洪文等人胸前戴著主席團字樣的紅色布條，發佈了成立宣言。會後組織遊行，遊行隊伍進入市委大樓尋找市委領導。11 月 10 日凌晨 1 時許，“工總司”一輛滿載造反隊員的卡車開到上海火車站，聲稱“有 2 萬多人要乘火車到北京去控告”。2 時許，萬餘名造反隊員扛著紅旗沖進車站，佔領了月臺和停站的列車。

登上運送紅衛兵乘坐的 602 次、46 次赴京列車，逼迫車站 602 次列車於 6 時 35 分發車北上。發車不久，運行至安亭車站時，王效斌來電傳達中共中央和國務院作出的“不要來京、就地解決問題”的指示。上午 8 時 17 分，經鐵路局領導研究，由鐵路分局局長紀玉文通知調度所，將 602 次列車停在安亭車站的專用線上。由“工總司”另一頭頭潘國平糾集的一批人所乘的列車也被扣停於南京車站。

王洪文等為了向中央施加壓力，“造反隊員”在安亭車站臥軌攔截了一列由上海開往北京的 14 次特快列車，數萬人到安亭站聲援鬧事，鐵路江灣工廠的工人謝鵬飛、傅世爾、周國庭、蔣周法等也一起參與，造成滬寧線鐵路交通中斷 30 多小時，上海站 36 趟客貨列車不能發出，從安亭到蚌埠五百餘公里沿線，停滿近百趟客貨列車，造成了全國影響的“安亭事件”。

11 月 12 日，張春橋從北京直接來到安亭車站，代表中央文革與“工總司”進行談判、簽字，同意了工總司的要求。當日，造反隊員陸續返回上海。

1967 年 1 月 6 日，“工總司”、“機聯站”等造反組織在人民廣場召開了“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徹底打倒陳丕顯、曹荻秋為首的上海市委大會”。1 月 11 日，工總司和紅革令在人民廣場聯合召開“迎頭痛擊市委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新反批大會”。1 月 16 日，毛主席批准了上海市的奪權，同時，《紅旗》雜誌發表了評論員文章《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文章高度讚揚上海的奪權，號召“堅決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奪權”。2 月 5 日，“上海人民公社”成立，這也是全國範圍內全面奪權的開始。

“打倒曹狄秋！”

“曹狄秋必須老實交代！”

“曹荻秋必須低頭認罪！”

曹荻秋又一次被拉上臺來，被兩個造反隊員用繩子牽著，十分狼狽地走到鬥爭台前，他的胸口還掛著一塊牌子，上面寫著五個黑色的大字——打倒曹荻秋，在曹荻秋三個字的上面，還打著一個鮮紅色的大叉。

“安亭事件”後，上海的煤炭告急。上海影響全國。鑒於上海市委已不能工作，為解決上海問題，中央決定讓毛澤東在一個批示上讚揚過的譚震林去主持上海市委工作。但是，江青卻要張春橋、姚文元先走。1月4日，張春橋、姚文元以“中央文革小組調查員”的名義飛抵上海。

張春橋、姚文元一下飛機就到康平路招待所，找“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的徐景賢、朱永嘉等人，指示他們馬上組織一個班子，以聯絡、控制各造反派組織。張春橋向他們交底說：“我們這次來，是聽說上海要進行奪權。我和姚文元聽到這個消息都坐不住了，所以特地趕來上海想同你們談談。”

1月4日，《文匯報》被造反派奪權。這是安亭事件後的又一個重要事件。

1月5日，上海市委機關報《解放日報》也被奪權。

這天，張春橋對“工總司”造反派頭頭說：“當前的基本問題是把領導權從走資派手裏奪回來，希望革命造反派把要害部門控制起來。”

1月6日，天空飄著雪花。“徹底打倒陳丕顯、曹荻秋為首的上海市委大會”開始了。幾萬人在刺骨寒風裏，目睹陳丕顯站在木箱上，曹荻秋被押上主席臺批鬥的情景。幾百名局級以上幹部也被揪來陪鬥。

大會宣佈了三個《緊急通告》，不再承認曹荻秋同志為市委書記和市長，對他監督改造，勒令陳丕顯“在七天內交代反革命罪行”，“請求中央對上海市委

進行徹底改組”。

上海，一時擁出 32 個造反派組織，他們把成千上萬的老幹部、學者、專家，戴上高帽子，揪鬥遊行，逼迫許多機關企業的“走資派”，在“補充工資”的經濟要求上簽字，這就是經濟主義的妖風。

毛澤東對上海的奪權，給予高度評價。1967 年 1 月 8 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說：《文匯報》現在左派奪了權，四日造了反，《解放日報》六日也造了反，這個方向是好的。……這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這是一場大革命。奪權是全國性的問題，要支持他們造反……上海革命力量起來，全國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響整個華東，影響全國各省市……你們不要相信，死了張屠夫，就吃混毛豬。以為沒有他們就不行，不要相信那一套。

1 月 9 日，《人民日報》頭版轉載了《文匯報》發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書》並且發表了編者按語：“隨著上海市革命力量的發展，嶄新面貌的、革命的《文匯報》和《解放日報》出現了。這是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反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勝利產物……”

1967 年 1 月 11 日，按毛澤東的批示，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給“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等 32 個革命群眾組織發出賀電。由毛澤東親自加上“中央文革小組”的這次賀電，第一次把“中央文革小組”推上同黨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平起平坐的高位。賀電說，號召全國的黨、政、軍、民各界，號召全國的工人、農民、革命學生、革命知識份子、革命幹部，學習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經驗：“一致行動起來，打退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反撲，使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沿著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勝利前進。”

1967 年 1 月 12 日上午，上海幾十萬人聚集人民廣場，舉行“上海革命造反

派歡呼徹底粉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新反撲大會”。

大會剛剛結束，王洪文就抓走了華東局第一書記陳丕顯，並把上海市長曹荻秋押上一輛卡車，讓他跪在車上在全市遊街!

奪權風暴刮遍全市。從 15 日起，三天內有 49 個機關被奪權。1 月 15 日凌晨三時，“工總司”二兵團司令耿金章，闖入上海市委機關大樓，奪了市委的大印! 各機關、團體也都捲入“奪印”的浪潮中來。有的造反派把奪得的一大堆木頭印章纏在腰間，邊走邊喊：“奪權!奪權!”

“一月革命萬歲”的標語貼遍全上海。1 月 19 日，張春橋在造反骨幹會議上說，上海的奪權，像法國的“巴黎公社”、蘇聯的“十月革命”一樣，有深遠的歷史意義。張春橋提出，成立“上海革命造反派政治聯絡總站”，代替上海市委。會上有人說，這個名字不響亮。張春橋經過同陳伯達商量，得知毛澤東正在考慮建立北京人民公社，他馬上找人商量改名為“上海人民公社”。

2 月 5 日下午，上海人民廣場變成了百萬人的海洋。張春橋、姚文元講話中對“公社”大加讚揚。大會不僅通過了“公社”的宣言——《一月革命萬歲》，而且宣佈奪舊上海市委、市人民政府一切權力。

大會宣告：“一切權力歸上海人民公社!”

上海人民公社臨時委員會在《一號通令》裏，要把一切大權“統統奪回來，完全、徹底、乾淨、全部地奪回來!”

2 月 12 日，王力在電話中向姚、張二人傳達了毛澤東不贊成“人民公社”名稱的指示，張春橋、姚文元急忙飛往北京。

在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策動指使下，上海市有 7 名市委書記、常委和市長、副市長，被分別定為叛徒、特務、反革命，市長曹獲秋、副市長金仲華迫害

致死。

第二節 工總司成立宣言

上海“工總司”宣言草案（1966）

最高指示：

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 …

根據這個道理，於是就反抗，就鬥爭，就幹社會主義。——毛澤東

當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進入一個新的歷史階段。我們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就在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與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大搏鬥中宣告成立了！

我們上海工人從來就有革命造反的光榮傳統。過去，我們在毛主席的領導下，起來造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反，打出了人民的江山！今天，一小撮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企圖在我國實現資本主義的復辟陰謀。上海市委也貫徹執行了一條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向各單位派出了大量“工作組”、“工作隊”，以及採取其他種種形式欺騙群眾，對抗十六條，給運動訂下了條條框框。他們抓住群眾運動中的某些缺點和錯誤，挑動工人鬥學生，挑動群眾鬥群眾，把革命群眾打成“反革命”，在有些地方造成了解放十七年來空前未有的白色恐怖，使上海的階級鬥爭蓋子至今尚未揭開，運動搞得冷冷清清，大大落後於全國各地，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決不能坐視不管！

因此，我們就要大造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反！大造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反！大造一切牛鬼蛇神的反！我們要奪權，就是要把人民的權力從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手裏奪回來牢牢掌握在無產階級的手中！我們要把那些企

圖篡黨，篡政，篡軍的赫魯雪夫式的修正主義分子一個不漏地揪出來，鬥臭！鬥垮！鬥倒！再踏上一隻腳叫它永世不得翻身！

要造反，當然不可避免地會有阻力，甚至會遭受迫害，遭受犧牲。革命，還能輕輕鬆松？造反，還能一帆風順？我們頭可斷，血可流，革命的造反精神不可丟！割掉我們的肉還有筋，打斷骨頭還有心，砍掉腦袋也不過碗口大個疤！過去，我們連國民黨的大刀水龍也不怕，今天，難道還怕你們小小圍攻和恐嚇嗎？！過去，我們連殺頭坐牢都不怕，今天難道還怕你們扣什麼“反革命”、“反黨分子”等等帽子嗎？！

老實告訴那些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老爺們，我們工人造你們的反是造定了！這個反是被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逼出來的。我們既然起來造反了，這場造反仗打多久，打到什麼地步，就由不得你們了！反正，不獲全勝我們決不收兵！

全市革命的工人，革命的小將、一切革命的同志們：讓我們團結在毛主席的周圍，集中火力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進攻，徹底剷除其流毒，使我們永遠立於不敗之地，從而對世界革命作出我們應有的貢獻！

敬愛的毛主席，我們上海工人革命造反隊全體隊員向您宣誓，我們對您永遠赤膽忠心，上刀山，下火海在所不辭！革命需要我們流血，我們決不皺眉，革命需要我們獻出生命，我們決不後退！我們要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猛烈開火！誓死保衛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堅決、乾淨、徹底地挖掉修正主義的根子，使人民江山永不變色！

我們的最高統帥是最最敬愛的領袖毛主席。

我們的戰鬥武器是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

我們的行動綱領是十六條。

我們的任務和目的是保衛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徹底批判、徹底打倒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並徹底清除其惡劣影響。鬥垮、鬥臭、鬥倒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萬歲！

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萬歲！

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

偉大的中國共產黨萬歲！

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毛主席萬歲！萬歲！！
萬萬歲！

（1966年11月9日）

第三節 上海文革《解放日報》事件紀實

繼上海工人造反總司令部成立之後，1966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上海市捍衛毛澤東思想工人赤衛隊總部籌委會”召開了成立大會。中共上海市委書記處候補書記王少庸出席了大會，向“赤衛隊”表示熱烈祝賀。

“赤衛隊”的隊伍迅速擴大。據說是光做袖章，就用去了幾千匹紅布，這氣派與“工總司”成立時完全不同，“工總司”當時沒有紅布，只好在晚上到協大祥布店裏留字條去“借”，而赤衛隊的紅布，是上海市委主動批給他們的。參加赤衛隊的人，一般都是由各基層領導做工作以後而加入的，有許多勞動模範、共產黨員、青年團員和老工人，他們在各單位都是聽黨的話的好工人。赤衛隊好像是赤壁大戰前的曹操，號稱有八十三萬大軍。除了隊伍龐大，人數眾多壓倒工總司，他們還得天獨厚，上海市委為他們提供的印刷廠，為他們日夜運轉。於是在

上海的大街小巷，到處都是他們鉛印的傳單，如《安亭事件真相！》、《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的一張王牌》、《一個造反隊員的血淚控拆》等等文章滿天飛舞。潘國平和王洪文翻閱著“赤衛隊”成疊的鉛印傳單，幾乎是同時憤怒地說道：“我們工總司也要有印刷廠，也要大造輿論！”

正當潘、王、耿等摩拳擦掌準備與“赤衛隊”大戰一場的時候，又一個突如其來的消息傳來：紅革會（紅衛兵上海市大專院校革命委員會的簡稱）已經進駐解放日報社，並完全封鎖了解放日報！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

十一月二十七日，因為在第九期《紅衛戰報》（是紅革會的機關報）的頭版，以醒目的大字標題刊登了一篇《解放日報是上海市委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忠實工具》的文章，紅衛兵小將要求將這期戰報與《解放日報》一起發行，他們提出的理由是：解放日報放毒到哪裡，第九期紅衛戰報就要消毒到那裏，紅革會要達到的目的是“徹底肅清《解放日報》在群眾中所施放的流毒”！但上海市委拒絕了紅革會的無理要求，理由是《解放日報》是黨報，是市委機關報，而《紅衛戰報》只不過是一張學生群眾組織的報紙，兩者豈能相提並論？因此絕對不能讓《紅衛戰報》與《解放日報》一起發行！

上海市委的決定激怒了紅衛兵小將，立刻有三百多學生前往《解放日報》社發難。開始時，他們還只有在郵電局駐報社的發行科和報社的傳達室裏進行交涉。但在門外圍觀的群眾越聚越多，裏裏外外的把漢口路、河南中路和山東中路這一塊地方擁擠得水泄不通。經過這塊地段的好幾路公共交通被完全阻斷，就連普通過路的群眾也無法走路。後來紅革會對立派的群眾也蜂擁而至，他們打著“我們要看解放日報”的旗號，與紅革會的學生展開激烈的辯論。為了控制這個局面，紅革會的人馬，就在當天半夜裏進駐報社。

正在雙方相持不下的時候，“工總司”宣傳部門的造反隊員也來了，他們為了對付“赤衛隊”所發出的鋪天蓋地的像雪片一樣飛舞的傳單，已經籌辦了《工人造反報》，但沒有印刷條件，他們要《解放日報》社的印刷廠排印《工人造反報》。馬上就表示堅決支持。學生們得到工總司工人的支持。三十日下午，“紅革會”在解放日報大樓裏，他們正式宣告成立“火線指揮部”。這個“火線指揮部”聲稱：

“我們革命的紅衛兵不忍看到華東地區的黨報如此墮落下去，我們有責任為恢復《解放日報》的革命青春而造反，有責任為使《解放日報》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上來而鬥爭。現在主要矛盾已經變化，不僅僅是發行《紅衛戰報》的問題了。我們現在就是要佔領《解放日報》社，徹底批判《解放日報》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直到它回到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上來為止。”

最近新成立的捍衛毛澤東思想工人赤衛隊總部籌委會，但對於紅革會覺得也不能坐視，於是立刻印發傳單。發表四點聲明：

一、《解放日報》是華東局和上海市委的黨報，“紅革會”因為《紅衛戰報》不能夾在《解放日報》內發行而封閉《解放日報》社的做法是完全錯誤的。

二、支持上海人民要看《解放日報》的要求。

三、希望“紅革會”立刻撤出解放日報社，撤出以後，關於《紅衛戰報》的發行問題，由華東局、上海市委、“紅革會”、“工總司”和“赤衛隊”會同一起協商解決。

四、“紅革會”如無視我們的聲明，我們將採取必要的革命行動。

這是赤衛隊成立後的第一次正式亮相，充分表明了它的政治立場，它是堅定地站在上海市和華東局黨委這一邊的。因此它就立刻遭到了工總司的攻擊，稱它為華東和上海市委的御用工具，是徹頭徹尾的“保皇派”！簡稱為“老保”！

“工總司”總部立刻再次召開擴大會議，商量對解放日報事件的行動方針，通過集體討論，頭頭們一致同意由潘國平提出的兩點意見：第一，堅決支持紅革會的革命行動，第九期《紅衛戰報》必須隨《解放日報》同時發行；第二，“工總司”的機關報已經籌備就緒，但沒有印刷的單位，一定要解放日報社的印刷廠負責印刷“工人造反報”。

三十日晚上，為了支援在報社奮戰的紅革會學生和已在報社的造反隊員，潘國平率領 500 多人也到了解放日報社，針對赤衛隊的聲明，代表工總司也針鋒相對地發表了四項要求：

- 一、 第九期《紅衛戰報》必須與《解放日報》同時發行，一定要發到每一個訂戶。
- 二、 責成《解放日報》社黨委交出文化大革命中的黑材料。
- 三、 責成《解放日報》社黨委公開檢查和交代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嚴重錯誤。
- 四、 《解放日報》事件所產生的一切嚴重後果，全部由上海市委負責。

繼安亭事件之後，工總司與上海市委之間的又一場大決鬥，圍繞《解放日報》事件展開了！

“十二月初的開頭幾天，在漢口路、山東中路和河南中路一帶地方，真是人山人海。赤衛隊通宵達旦地示威遊行，怒不可遏地叫喊著口號，呼喊聲匯成了一股嘈雜的雜訊，居民無法睡覺和休息。誰也不知道究竟有多少赤衛隊。

“他們有的手裏拿著木棍和鐵棒，有的使用了十幾磅重的大榔頭、一百多斤的三角鐵，還有的拿著大石塊和玻璃片等等，凡是能作為進攻用的東西都統統拿來當武器使用，他們拼命向守衛在報社裏的紅革會學生打來。赤衛隊還開來了工程急修車，使用了雲梯和鐵叉；還有人竟然學習諸葛亮，把汽油倒在報社的門板上，準備火攻，要把學生燒死在裏面。

“可是解放日報社就坐落在人口密集的居民區裏，周圍都是磚木結構的民居，這一下可嚇壞了附近的居民，居民也聯合起來，堅決反對赤衛隊用火攻，到最後，赤衛隊總算沒有把火放成。憤怒的赤衛隊包圍了解放日報社，對進駐報社的學生展開海潮般的猛烈攻擊。當圍攻達到高潮時，整個報社周圍的馬路都被人群擠得水泄不通，像瘋狂了的海洋，像爆發了的火山！赤衛隊不能放火，就切斷了附近的水源和電源，到晚上幾條馬路一片黑暗。可這一下是赤衛隊失了算，紅衛兵利用一片黑暗，悄悄地爬到報社的屋頂上面，在黑暗中扔下瓦片。大概他們的武器也只有瓦片，不過他們居高臨下，佔據了非常有利的地形，也打得許多赤衛隊員腦袋開花，赤衛隊才不敢走得很近的來進攻。

“其實我們附近的居民，原來都認為紅革會不講道理，硬要脅送紅衛戰報，這是古今中外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事情，虧他們也想得出來。你認為解放日報放毒有錯誤，你可以寫文章批判，但這批判文章要你自己去發行的，為什麼一定要脅在被批判的報紙裏一起發行呢？因此居民們都認為紅革會不講道理！

可是後來赤衛隊如此進攻，居民們反倒同情起紅革會來了，他們畢竟還是不懂事的學生，你們赤衛隊都是大人了，怎麼能這樣對待小孩子呢？到後來赤衛隊愈是進攻，居民們就愈是為裏面的學生擔心。特別是赤衛隊還想要用火攻，這不

但是要燒孩子，不是還要燒我們居民嗎？為了防止赤衛隊放火，我們里弄裏的許多老媽媽也出動了，老媽媽也組織起來，與赤衛隊員講理，不許他們放火！”

前回說到赤衛隊想放火燒學生，被附近的老媽媽阻止，他們不能放火，又不敢近前進攻，只能站在比較遠的地方，開動高音喇叭，整日整夜的高喊“我們要看解放日報！”和“解放日報是黨報！”等口號，才使裏面的學生轉危為安。學生們看見赤衛隊裝高音喇叭，也不知從什麼地方弄來許多喇叭，對著包圍他們的人群，展開了激烈的喇叭戰。弄得附近的居民不得安生。

被圍困在報社內的紅革會，他們的行動也不是完全孤立的，他們也得到了以工總司為首的許多造反組織的聲援和支援，除了已經在裏面由潘國平帶領的五百多人，大批援軍隨後紛紛趕到。王洪文帶領他國棉十七廠的親兵，雖然多數是女兵，但是柔能克剛，赤衛隊看見女工，就有點洩氣。他們都認為自己是英雄好漢，就儘量避免與女人爭鬥，這就大大削弱了他們的戰鬥力。後來等耿金章的隊伍趕到，造反派方面的人數，也有五千多人。對立的兩派群眾之間發生嚴重的衝突，他們除了用冷嘲熱諷的激烈言詞互相指責，還大打出手，一方要攻進報社大樓，一方則拼命守住大樓，木棍落下去的是鮮血飛迸，鐵棒落下去時後果更加嚴重，血，更加劇了彼此間的憎恨，進一步點燃了復仇的火焰，武鬥一步步的升級，兩派共有一百多人受傷，這是上海灘自文革以來的第一次大規模的武鬥流血事件。

除了報社周圍近距離的打鬥，幾乎上海所有的馬路上，都有遊行的隊伍，他們有的高喊“我們要看《解放日報》！”有的卻喊“《解放日報》是大毒草！我們要看《人民日報》！”對立的兩支隊伍如果狹路相逢，開始時彼此都想以聲音壓倒對方，誰都不肯讓步，結果雙方都喊破了喉嚨，於是就發起火來，馬上就大打出手。這種大大小小的遭遇戰，每天不知要發生多少次？

這樣的兩派對立一直到十二月五日下午才告結束，在中央文革小組強大的壓力下，上海市委不得不在紅革會的“三項決定”和工總司的“四項要求”上簽字。而且在十二月八日和十日兩天，上海市委又發出《通知》和《緊急通知》，要對那“三項決定”和“四項要求”進行廣泛宣傳和堅決貫徹。在有曹荻秋簽字的《通知》中說，上海市委公開承認解放日報事件是上海市委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嚴重事件，造成群眾之間的嚴重對立和分化。市委歡迎和支持革命造反派的學生和工人批判市委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認為任何人保市委的行動是完全錯誤的，圍攻造反隊更是錯上加錯。

12月5日，上海市委在中央文革的壓力下，向工總司和紅革會低頭，同意了紅革會的無理要求。當年通過上海市委頒發的紅頭檔：

第一份：紅革會提出的四點要求和上海市委負責人的同意簽字：

- 一、《紅衛戰報》第九期夾在十一月三十日的《解放日報》裏一起發行；
- 二、《解放日報》必須馬上全文轉載《紅衛戰報》上刊登的《解放日報是上海市委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忠實工具》一文；
- 三、把上海市委有關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問題，以及它對報社的全部指示告訴“紅革會”。

紅衛兵上海大專院校革命委員會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五日

同意 王一平 宋季文（簽字）

第二份是工總司提出的四項要求和市委負責人的同意簽字：

- 一、第九期《紅衛戰報》必須與《解放日報》同時發行，一定要發到每一個訂戶。

二、責成《解放日報》社黨委交出文化大革命中的黑材料。

三、責成《解放日報》社黨委公開檢查和交代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嚴重錯誤。

四、《解放日報》事件所產生的一切嚴重後果，全部由上海市委負責。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五日

同意 王一平 宋季文（簽字）

除了王一平和宋季文的簽字，到十二月十日，曹荻秋也被迫簽字。上海市委還不得不印發如下紅頭文件：

中共上海市委檔

滬委（66）第12號通知

現將曹荻秋同志十二月十日簽複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的四條印發，請按照執行。

中共上海市委員會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日

一、市委公開承認“解放日報事件”是上海市委的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嚴重事件，造成群眾之間的對立和分化。市委支持革命造反派批判市委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認為任何人保市委都是錯誤的，圍攻造反隊更是錯誤。

二、市委認為參加“解放日報事件”的造反派工人的行動是無產階級革命的行動。各單位對造反派人員佔用的生產時間以公假論。

三、曹荻秋要親自向傷患及其家屬公開道歉，傷患的一切醫療費用均由市

委負責。

四、市委支持“紅革會”的革命同學下廠同工人結合，參加工廠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曹荻秋（簽字）

經過王一平和宋季文簽字同意的紅革會、工總司的兩份四項要求隨同上海市委的紅頭檔一起發下來，層層傳達，在整個上海灘，幾乎是家喻戶曉，人人明白。

工總司和紅革會的頭頭們拿到中共上海市委簽發的紅頭檔，都高興得跳了起來，他們集體到錦江飯店，舉杯慶祝，齊聲高呼：“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勝利萬歲！”、“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勝利萬歲！”、“打倒上海市委！”、“打倒曹狄秋！”、“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他們飲酒歡慶，通曉達旦！

第四節 上海文革康平路事件紀實

康平路事件中上海開創了全國武鬥的第一例。由於工總司在解放日報事件中取得完全勝利，

根據張春橋的授意，王洪文聯絡了徐景賢、郭仁傑和朱永嘉等市委內部的造反派。這些人原來都是上海市委的秀才，市委發出的許多紅頭檔，多半出自他們之手。他們從市委內部發難，站出來揭發上海市委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嚴重罪行。為了與王洪文聯手對付華東局和上海市委，在徐景賢的牽頭和組織下，他們也組織了一支造反隊伍，因為他們都是知識份子；他們組織的名稱別具一格，“上海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以後簡稱“機關聯絡站”）”，原來上海市委

內部許多工作人員，大多數都參加了這個組織。陳丕顯、曹荻秋和魏文柏等幾個所謂的走資派，到這個時候才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

王洪文得到了這些造反秀才的幫助，實力大增。耿金章是看在眼裏，急在心裏。在王洪文周圍，有機關聯絡站、公革會（公安局革命造反委員會的簡稱）、上體司（上海體育戰線革命造反司令部的簡稱）、消革會（上海消防協會革命造反委員會的簡稱）等十幾個組織。不管發生什麼事情，這些組織就會無條件的站在王洪文這一邊。王洪文如果要發表什麼聲明、通告或者通令，這十幾個組織也會同時出來，聲勢非常浩大。

赤衛隊的頭頭們經過分析研究，得出如果繼續公開的保市委和曹荻秋，不但喚不起人心，而且可能要自取滅亡。所以他們改變鬥爭方法，也提出炮轟上海市委和打倒曹荻秋的口號。十二月二十三日，他們在上海市中心的人民廣場，召開了將近有百萬人參加的“批判市委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參加大會的人，不但擠滿了廣場，而且還把周圍的幾條馬路擠得水泄不通，光看這開會的聲勢，就比工總司的要壯大得多。他們也把曹荻秋“揪”過來，當場向他提出“八條要求”。曹荻秋當然也只好簽字同意。

對於赤衛隊的這個新動向，王洪文和潘國平馬上回應，他們在兩天之後，在上海文化廣場召開“批判上海市委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再次把曹荻秋

“揪”到鬥爭臺上，逼他宣佈“赤衛隊”的“八項要求”是“非法”的，宣佈完全“無效”，還要對“赤衛隊”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等等。這時候的曹荻秋，不知是前世作的什麼孽？每天被人揪來揪去，早已被鬥得七葷八素。但是有些事情，好像是很有規律的，每次鬥爭會過後，一定是要他簽字。人已經被鬥得如此

地步，哪裡還有自己的主意？你真的同意當然要簽，你不想簽也只好簽，所以以後每有什麼組織叫他簽字，他基本上不加考慮，一律同意。

“赤衛隊”聽到這個消息，大罵曹狄秋沒有誠信，出爾反爾，兩天前剛剛簽字同意的東西，兩天之後怎麼在造反隊的壓力下就推翻否定了呢？。赤衛隊的頭頭們馬上召開總部委員緊急會議，商量對策，準備要與工總司決一雌雄。上海灘的上空烏雲密布，工總司和赤衛隊雙方，劍拔弩張，又一場新的大戰已經醞釀成熟迫在眉睫了。

在西藏中路的人民廣場旁，北火車站南大門左右兩邊大面積朝南的牆面上，或者其他任何可以貼大字報的牆頭上，有一個赤衛隊員剛剛貼出了《赤衛隊的八點聲明：》；還不到兩分鐘，就被造反隊的《赤衛隊就是保皇隊！》的大標語覆蓋。又過兩分鐘，這條標語已變成《工總司一小撮懷頭頭就是流氓！》。再過兩分鐘，標語又變成《赤衛隊是上海市委的御用工具！》-----，這樣貼來貼去沒有一個完！在這種對立兩派永無休止的標語大戰中，使工總司和赤衛隊的頭頭們萬萬沒有想到，而且也最具有諷刺意義的是，他們這些所謂氣壯河山的革命行動，竟使一群撿垃圾的小癩三非常高興，而且還能夠從中漁翁得利。在夜深人靜之際，他們毫不客氣地扯下這一疊疊很厚而且面積很大的標語紙，不，應該說是標語板！第二天拿到廢品回收站，按照斤兩稱起來，一定可以賣個好價錢！

十二月二十八日晚上，天空中還有幾點濛濛細雨，上海市的政治中心康平路顯得特別寧靜。康平路之所以成為上海的政治中心，因為這裏有上海市委書記處，市里幾乎所有的封疆大臣，也都居住在這一條並不起眼的冷僻馬路上，不管是已故毛主席的好學生柯慶施的家，還是張春橋的家也都在這裏。突然之間，有

許多“赤衛隊”員向康平路悄悄湧來，他們嘴裏嚷著，說是要找曹荻秋“算帳”，要求重新承認他們的“八項要求”。

已經有數不清的“赤衛隊”員集中在康平路，他們有的站立在行道樹下，有的斜靠在路邊的牆壁面上，還有許多人，只好三、五成群的站立在馬路的中間。然而，還有更多的“赤衛隊”員要湧進來，他們像浩瀚無際的潮水一樣向裏面湧。赤衛隊此舉的目的，就是要向上海市委和曹荻秋施加壓力，他們聲討曹荻秋言而無信，這個老頭在二十三日剛剛答應他們的八點要求，可是只在兩天之後的二十五日，在“工總司”的壓力之下，又簽字否認了。今天他們集隊前來，就是要曹荻秋這個糟老頭重新承認二十三日答應的“八項要求”。

“赤衛隊”的行動，很快取得了成效。二十九日上午，曹荻秋在康平路上海市委機關大樓裏，接待了赤衛隊的代表，很快答應了他們的要求，再次認定赤衛隊的“八項要求”是非常正確的，完全是有效的。“赤衛隊”很快就取得了成功，王玉璽馬上傳達命令，叫赤衛隊員趕快回各自的原單位抓革命、促生產。

可是，集中在康平路的三萬多名“赤衛隊”員已經無法回去。他們已經陷入了重重包圍之中，與康平路相鄰的所有馬路出口，都已經被耿金章率領的“二兵團”大軍統統堵死。赤衛隊已成了甕中之蠶，只等耿金章的隊伍前來抓鱉。赤衛隊已經陷入了潘國平、王洪文、徐景賢和耿金章設下的天羅地網，再也跑不出去了。

與康平路旁邊的衡山賓館裏，以潘國平和王洪文的“工總司”和徐景賢的“聯絡站”為首，有上海紅革會等二十多個造反派組織參加，共同成立了“上海革命造反派聯合指揮部”。聯合指揮部的下麵還有一個“前線指揮部”，前線的總指揮就是赫赫有名的二兵團司令耿金章！

赤衛隊已經被耿金章的大軍包圍在康平路，但是如果要把它消滅，還得有一個冠冕堂皇的理由。大概是赤衛隊命該滅亡，許多赤衛隊員被包圍之後，進退無路，只能在康平路上到處亂篡亂闖。有幾個赤衛隊員在不經意之間，闖入了張春橋的家，隊員們遇見張春橋的老婆。一問情況，當知道這是張春橋的家，慌忙退了出來。因為他們也知道，張春橋的家是不好隨隨便便進進出出的。

可是就是因為有幾個人進了張春橋的家，這個事情就顯得麻煩了，工總司就一口咬定：赤衛隊抄了張春橋的家！據後來的《工人造反報》報導：

“就在十二月二十八日這一天，‘赤衛隊’竟沖入張春橋同志的家中，大聲叫嚷：‘我們就是要造張春橋的反！’說什麼：在‘安亭事件’上，我們早和張春橋有分歧，他也不一定沒有問題。可見他們‘威逼’曹荻秋是假的，造張春橋同志的反才是真的。這些傢夥中間少數人是別有用心的，大多數是受了陳、曹之流的毒害和蒙蔽，來造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反，走上了炮打中央文革的危險道路。”

“赤衛隊的一小撮壞頭頭仍然一意孤行。在十二月二十九日這一天，赤衛隊又沖了張春橋同志的家，恐嚇張春橋同志的愛人說：‘如果中央負責同志不來，到六點鐘問題還不能解決，那上海就要停水、停電、停車了！’真是不打自招，一語道破了以陳、曹為首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炮打中央文革的反革命計畫！”

於是，在上海的大街小巷，立即漫天飛舞著《赤衛隊抄了張春橋同志的家》和《赤衛隊抄了柯慶施同志的家》之類的傳單。在康平路上立刻卷起了新的狂瀾。王洪文、耿金章、徐景賢等斬釘截鐵地說：“赤衛隊抄張春橋和柯慶施同志的家，

大方向就是錯了，大錯特錯了！” 為了壯大聲勢，把赤衛隊抄張春橋家的消息傳遍全市，上海的許多馬路上迅速刷出如下大標語：

“赤衛隊抄張春橋同志的家，就是炮打中央文革！”

“赤衛隊抄柯慶施同志的家，罪該萬死！”

在當時，全國上下都好像都有這樣的共識：中央文革小組是毛主席親自挑選出來的，中央文革小組就代表無產階級司令部。現在赤衛隊居然敢抄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的家，那赤衛隊的大方向一定是錯了！再經過人為的加工、轉播和放大，赤衛隊簡直就變成了反革命組織，理應馬上消滅！造反派在大街小巷大力宣傳的同時，還用高音喇叭對包圍在裏面的赤衛隊員也反復廣播，使得許多赤衛隊員也信以為真，以為是真的有人抄了張春橋的家。

其實在那個時候，連耿金章也沒有搞清楚，赤衛隊到底有沒有抄張春橋的家。但是對於如此有利於造反派的消息，老耿總是抱著“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的態度。到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日凌晨，老耿認為各種條件具已成熟，赤衛隊抄張春橋家的消息不但成為造反派的共識，而且也有不少赤衛隊員相信。於是就在二時正，對他屬下的十萬造反隊員，下達最後的命令：“向赤衛隊發起總攻！立即徹底全部消滅赤衛隊！”

當處於重重包圍，又人心惶惶的三萬多赤衛隊員，正在困倦難熬的時候，耿金章的十萬精兵從四面八方衝殺過來，他們的精力非常旺盛，對著赤衛隊員高喊：“赤衛隊是上海市委的御用工具！”、“赤衛隊抄張春橋同志的家就是反革命組織！”、“赤衛隊員受蒙蔽無罪！趕快反戈一擊有功！”呼喊聲震天動地，搖晃著平日非常寧靜的康平路。一場文革來上海最大規模的武鬥，就在王洪文、續景賢等人的策劃之下，在耿金章的直接指揮下開始了！

由於聽信了高音喇叭的反復宣傳，加上絕對劣勢的戰略戰術地位，許多赤衛隊員早已沒有鬥志；再經過造反隊員義無反顧地衝擊，到早上六點多鐘，被包圍在康平路的赤衛隊員幾乎全部投降。七點鐘左右，三萬多赤衛隊員在造反隊員的押送之下，排成一路縱隊，分成六路從六個出口出來，到造反隊指定的地點集中。每一個出口處都有一群造反隊員牢牢把關，赤衛隊員必須手持紅袖章，雙手抱頭，口中不停地高叫“我是受蒙蔽的，受蒙蔽無罪！請同志們從寬處理！”到出口處老實交出赤衛隊紅袖章，造反隊員才肯放他們出去。經過這次大戰，工人造反隊繳獲幾百箱餅乾，還有數不清的紅袖章，作為戰利品運回各自的單位。

通過康平路浴血大戰，“赤衛隊”中的精銳部隊，最有戰鬥力的有生力量全部被殲。三十日下午五時多，經過苦戰而突圍出來的赤衛隊頭頭王玉璽，又組織殘存的數萬“赤衛隊”步行北上，聲言要到北京去找毛主席，控告王洪文等一小撮工總司的壞頭頭製造了空前的大冤案，栽贓誣陷赤衛隊，硬說赤衛隊抄了張春橋和柯慶施的家。

步行的赤衛隊還沒有到達昆山，就被耿金章率領的二兵團戰士追上，兩軍又在昆山發生一場混戰。可那時的赤衛隊員，早已是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看到造反隊追來，早已聞風喪膽，哪裡還有什麼鬥志？許多隊員趁機紛紛開小差逃跑，只有少數堅定的骨幹分子仍然勉強迎戰。戰鬥到後來，赤衛隊員愈戰愈少，王玉璽和少數骨幹，終因寡不敵眾，被耿金章的親兵當場活捉，其餘隊員全都四散亂竄，落荒而逃。

再說王玉璽是上海鐵路局的調度室副主任，室裏的八十多名員工，極大多數都是赤衛隊員。這些隊員跟隨著他去康平路，然後又步行北上。調度室的主任變成了光杆司令，手下無人可以指揮。造成上海鐵路局系統秩序大亂，中樞神經徹

底癱瘓。只有短短的兩天多時間，有幾百輛的客車停開，十多萬旅客無法上車和中轉；更有無數列貨車停開，由此積壓的貨物就有十餘萬噸。

王洪文和徐景賢等人立刻抓住這個把柄，就說赤衛隊的壞頭頭是破壞生產和破壞鐵路運輸的罪魁禍首，於是以工總司的名義，立即發出發出《緊急通知》，號召廣大造反隊員把各級赤衛隊的壞頭頭統統抓起來，押送到公安局法辦。於是，市、區兩級赤衛隊的頭頭一百多人同時被捕，赤衛隊立即土崩瓦解！

許多基層工廠的造反隊長也不含糊，他們把工總司的《緊急通知》進一步擴大化，為了清除自己的對立面，把各自單位裏的赤衛隊負責人，也統統送進公安局。如筆者所在的上海躍進電機廠，不但把正副隊長送進公安局，還把一些平日與造反隊爭論得比較激烈的普通赤衛隊員也送進公安局。有一個參加赤衛隊的邱姓女工，因為不肯交出赤衛隊的紅袖章，造反隊二話不說，立刻把她抓起來，一時找不到汽車，就在車間的門口攔了一輛過路的垃圾車，把她送進了楊浦分局。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真是無奇不有，用垃圾車押送人犯，大概也是其中的一個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偉大創舉！

那個時候的公安局，也是由稱為“公革會”的造反派掌權，凡是有造反隊送來的人犯，統統來者不拒，一律收下扣押。經過這一次浩劫，赤衛隊徹底完蛋。許多基層單位的赤衛隊員，紛紛自動向造反隊交出赤衛隊紅袖章，表示向造反隊投降，更有的還反戈一擊，要求參加造反隊。他（她）們參加造反隊後，其造反的精神，甚至還遠遠超過原來的老造反！

第五節 京西風雲

京西賓館曾是文革漩渦中心

京西賓館是 1964 年 9 月 14 日開業接待賓客的。京西賓館建成時，北京市除北京飯店、民族飯店、前門飯店、華僑大廈外，它的建築設備算是比較好的。所以開館伊始，1964 年國慶日，京西賓館就接待了阿爾及利亞、匈牙利、捷克、保加利亞、巴基斯坦、緬甸等六個國家的黨政代表團和來自其他 34 個國家的 61 個專業代表團，並接待了當年 10 月 20 日召開的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東北、中南、解放軍三個代表團和大會的 260 多名工作人員。

京西賓館屬於軍隊編制序列，歸屬總參謀部管理局領導，強調安全保密，有嚴格的警衛措施，主要為軍隊內部接待及外賓服務，以後又發展為為黨、政、軍召開各種內部會議服務，即為政治活動服務，根本排除商業行為。

京西賓館有秩序的正常工作只維繫了三年，到了 1967 年，由於國內“階級鬥爭”形勢的不斷升溫，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的爆發，京西賓館成了備受外界衝擊的焦點。

一、文革開始，在毛澤東同志“造反有理”、“革命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的“最高指示”引導下，在官方輿論宣傳的鼓動下，一場打、砸、搶、抄、抓、關、殺的“紅色恐怖”降臨中國大地，並很快從社會轉向黨內。

一股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之風，迅即刮遍全國。

1966 年 12 月 25 日，上海市市長曹荻秋被揪到文化廣場，召開萬人大會批鬥；

12 月 28 日，吉林省委代理第一書記趙林被揪出來，遊鬥示眾；

1967 年 1 月 8 日，雲南省委第一書記、昆明軍區第一政治委員閻紅彥在經受了“革命造反派”的追捕後，心煩意亂，口乾舌燥，端起桌上放的一杯水，一飲而盡，熄燈上床。當造反派沖進他的臥室後，他已經停止了呼吸；

1月21日，海軍東海艦隊司令員陶勇死在艦隊招待所的井中，死因不明；

1月22日，煤炭工業部部長張霖之在批鬥中被造反派活活打死，身上被傷32處；

與此同時，福建省委第一書記葉飛、江蘇省委第一書記江渭清、山東省委第一書記譚啟龍、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李葆華、浙江省委第一書記江華、江西省委第一書記方志純等，統統受到批判、遊鬥示眾，乃至關押。他們在得到中央保護後，1967年春天都住進了京西賓館。

在1月19日召開的軍委擴大的碰頭會上，就軍隊搞不搞“四大”的問題，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等軍隊高級領導幹部同中央文革小組的江青、陳伯達等發生了激烈的爭論，並且拍了桌子，這就是“大鬧京西賓館事件”。2月份，因為幾位老師、副總理反對對黨的幹部進行殘酷鬥爭，同中央文革發生了同樣激烈的鬥爭，這就是“大鬧懷仁堂事件”，即以後被稱為“二月逆流事件”。

鑒於造反派到處衝擊抓人，1月26日，中央軍委對京西賓館文化大革命做了專門決定。決定說：“京西賓館同中南海、人大會堂、釣魚臺一樣，屬於保護單位。京西賓館的文化大革命，要按照軍以下部隊的辦法搞正面教育，不搞四大，不搞戰鬥組織，不搞串連，軍隊和地方戰鬥組織不許衝擊。”但就在軍委的決定通告貼出去兩個小時後，新疆農學院“紅旗造反團”企圖強行進入京西賓館大樓揪人。賓館警衛人員耐心但強制地勸阻。“造反團”塗抹了軍委的決定，大罵賓館“保皇”。

1月28日，總參管理局“革命造反派”不顧軍委“不許衝擊京西賓館”的決定，為了給總參管理局領導人施壓（京西賓館為總參管理局的下屬單位），包圍賓館，封鎖出入口，還檢查了阿爾巴尼亞軍事代表團進出的車輛。致使在賓館開

會後的周總理、葉帥、聶帥無法離開賓館。王新亭副總長嚴責賓館領導出去做工作，讓他們撤走。

2月4日，新疆紅二司要強行把接見他們的王恩茂同志從賓館接待室劫走，引起公憤，被我館工作人員和家屬制止。

2月5日，駐京文體單位“紅色造反者”堵住賓館出入口，強行檢查進出車輛，他們抓人的目的沒有達到，就把我館警衛科長抓走。

時任北京衛戍區司令員的傅崇碧在其回憶錄中寫道：

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住在京西賓館，南京造反派來了六七百人抓他。負責京西賓館警衛的衛戍區部隊把造反派阻攔到賓館外面，使他們抓人未成。於是這幫南京造反派圍在賓館外面不走，而且得到北京造反派的支持，人越來越多。我們及時調整和加強了京西賓館的警衛力量。許世友同志看到形勢不好，就把住在京西賓館的福州軍區副司令員皮定均及張希欽（據本文作者所知是張震）等同志組織起來，把京西賓館的開水壺集中在七樓（據本文作者所知是十二樓）做“水雷彈”，把電梯關閉，準備在造反派沖上樓時，用開水壺往下沖。許世友自己隨身帶了槍，他是準備自衛的。對造反派的防範工作準備好後，許世友同志用電話報告周總理、林彪、葉劍英和徐向前元帥，並請轉報毛主席。許世友說：“今天，造反派來抓我許世友。我革命大半生，戰場上槍林彈雨都不怕，今天來抓我我更不怕。誰敢抓我，我就向誰開槍！”

周總理知道許世友的脾氣是敢說敢做，立即讓我跟徐帥到京西賓館做許司令的工作。與此同時，毛主席指示中央文革小組派關鋒到賓館做造反派的工作。我們到了賓館，見了許世友司令員。他見徐帥來了，情緒非常激動，說：“我出生入死為革命，我許世友犯了什麼錯誤？中央批評我可以改，為什麼要來抓我？為

什麼要污辱我？”那一天，如果沒有周總理及時處理，京西賓館就可能發生人命案。

周恩來總理對京西賓館的穩定和安全十分關心，2月7日零點，他向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傅崇碧作了以下重要指示：“京西賓館從1967年2月7日零點起，開始實行軍事接管，未經北京衛戍區允許，任何人不許進入。如果有人要進的話，講清道理。避免衝突，說明這些人（中央軍委首長、各軍區首長）來開會，是中央請來的。”“……京西賓館要設接待室，有問題到接待室談，……不許衝擊，不許進去抓人，不許把人揪走，衛戍區要絕對負責。”

1967年2月7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北京衛戍區發佈通告，對京西賓館實行軍事接管。通告廣貼賓館各出入口。

當天下午4時，周總理委派秘書周家鼎對京西賓館軍事接管問題進行了檢查，總理指示說：“接待室不能設在大樓，可以設在東小樓（即現在東大樓的位置），要把力量配備好。未經許可不能進入賓館，不但前門不能進，後門也不能進，一定要管好。”

當天晚間，總理親自到賓館查看了通告張貼的情況，並指示：賓館接待室安一部直通總理辦公室的電話。

二、雖說京西賓館已被衛戍區“軍事接管”，賓館警衛工作得到了加強，但是，賓館的安全仍然面臨著嚴重的隱患：一是批判“二月逆流”以後，“革命造反派”得勢更猖狂，根本不把衛戍區的通告放在眼裏；二是人民解放軍“罵不還口，打不還手”，實際上被解除了武裝。在造反派的衝擊中，他們只能組成人牆阻擋，無權同造反派平等地作你來我往的鬥爭。

一天我從總參管理局開會回來，見接待室外面緊緊圍著一群人在爭執，原來是廣西造反派要把來接待室接見他們的韋國清同志搶走。韋國清同志被一個大個子緊緊扼住脖子，他的警衛參謀和我館客房助理員陳回民同志竭力幫助他掙脫。在他們的外面圍著一圈造反派，在造反派外面又圍著一圈警衛戰士，互不相讓扭到一起，大約相持了 20 多分鐘，在週邊警衛戰士的接應下，韋國清同志終於脫離險境。

7 月 23 日，軍委辦事組傳達周恩來總理指示：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政治委員鐘漢華、獨立師師長牛懷龍、政治委員蔡炳臣、武漢市人武部長巴方亭等人秘密住進京西賓館，要求賓館“絕對保密”，加強安全保衛工作。我們那時已經知道武漢發生了“七·二〇”事件，理解為什麼應當“絕對保密”。除主任(老紅軍)、吳世昌同志、我、客房科長、警衛科長外，沒有告訴任何人，對客房、電梯服務員，也作了“絕對保密”教育。

那天，中央警衛局奉總理指示，直接派遣賓館警衛科長李生同志去機場迎接。24 日凌晨三點半鐘，他們乘大轎車到達賓館。從大樓東門(此門長期關閉，沒有使用過)進入賓館，乘坐賓館東部平時為客人送飯的電梯上到九樓東半部入住，九樓東頭會議室作為他們的臨時餐廳，不去餐廳用飯。等把客人安排好後，已經是凌晨五點多了。

那時北京正在修地鐵一號線，採用掘開式施工法，整個復興路形成了一條又深又寬的大溝，進出賓館只有一座臨時搭建的木架橋可以南北通行。大約六點左右，忽聽北面橋上人聲鼎沸，上萬人從橋北向賓館沖過來，高呼著“打倒陳再道，打倒鐘漢華！”的口號，我問沖在前面的人：“你們要幹什麼？”回答說：“我們要揪走反革命分子陳再道！”我心想，這事“絕對保密”，他們肯定並不知道

真情，便故作鎮靜地說：“笑話，陳再道在武漢，你們來京西賓館抓得什麼陳再道？！”那人反駁我說：“你別騙我們，首長說了，陳再道昨天晚上就到了北京，就住在京西賓館。”

人所共知，“首長”就是“文化革命的旗手”江青。我撒腿就往大樓跑。

我想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客人轉移到哪裡，但苦無良策。電梯服務員見狀出主意說：“楊(副)主任，別著急，先上電梯，我開到兩層之間，把信號關閉了，是不會被人發現的。”此法絕好。就這樣把陳、鐘二人藏起來後，我就急急下到一樓。

一樓大廳正在激烈的對陣，造反派人多勢眾，奮力往裏沖，口中念念有詞：“革命無罪，造反有理！”但因賓館預先作了防禦準備，除了值班人員外，大部分職工也都趕到，加入到“抵抗”隊伍，戰士、職工拼命阻擋當面之“敵”，一樓大廳已有安全保障。

“革命造反派”是中央和北京市文化系統的，他們人多勢眾，沖不進大樓一層，就把地下室窗戶玻璃打碎沖入地下室。

當得知地下室“失守”的時候，警衛部隊在大廳兩側通往地下室的東、西門，各派一個班防堵，死死抵住門，防止地下室的造反派往上沖。但終因力量懸殊，最終被造反派衝開，進入大廳。

此時，一個驚人的情況報告我：造反派上到了餐廳的屋頂，從那裏可以跨入三樓客房 317、319 的陽臺，雖然一樓大廳通往樓上各層客房的門被關死，但經過這兩套客房穿堂而進，可以走向任何一層樓，進入任何一個客房。更嚴重的是，造反派此時互相傳遞著一個資訊：說陳再道中等個子，圓臉，長有麻子，外號“陳麻子”，只要是“麻子”就是陳再道。我一下子驚呆了。317 的客人是昆明軍區

司令員秦基偉同志，他的長相與陳再道有近似的地方。造反派一旦把秦司令錯當陳再道施暴，問題可就嚴重了。後來知道我的擔心是多餘的，秦基偉同志一見造反派，就向他們亮明身份“我是秦基偉”，並且和藹地勸說造反派要守紀律，要文鬥不要武鬥。

傅崇碧後來回憶當時的情景時說：

幾千人衝破了門外的警衛線，有幾百人沖進一樓，情況非常緊急！

很明顯，如果陳、鐘、牛等被揪走，就會死在造反派手裏。當時，我正隨著周總理等人在天安門城樓上陪同毛主席接見紅衛兵。

緊急時刻，周總理寫了4條，前兩條是：一、陳、鐘、牛是毛主席請來的，不能抓；二、京西賓館是中央文革小組、中央軍委接見各省、各大軍區領導幹部談問題的地方，不能沖。

我趕到京西賓館時，裏外一片混亂，人聲鼎沸，大約上萬人，沖進一樓的造反派把窗戶都砸碎了，玻璃滿地都是。我立即(重新)宣佈總理的4條，造反派仍然不聽。

我很快回到天安門城樓上，把情況報告給周總理。……我根據我們的警衛幹部提供的情況，報告周總理：“衝擊京西賓館之事，謝富治、戚本禹他們很清楚。”周總理讓立即把謝富治、戚本禹找來，嚴厲地批評他們說：“衝擊京西賓館，抓陳再道的事我不管了，交給你們兩位。陳、鐘、牛出了問題，你們去向毛主席交待！”

謝富治、戚本禹看到周總理生了那麼大的氣，也不敢怠慢，就在天安門城樓上給(在)京西賓館造反派頭頭通電話。他們的電話很管用，造反派很快從京西賓館撤走了。

傅崇碧同志再一次到京西賓館處理善後時，在賓館辦公室接了總理給他打來的電話。總理嚴厲追查陳再道等到京情況，是什麼人泄了密？傅崇碧同志委婉地建議“不要追查了吧”！顯然，不是什麼人泄了密，而是“官方”指示造反派去衝擊京西賓館的。果然，總理又指示“不要追查了”。

其實造反派並不是無條件撤出京西賓館的，他們要傅司令員承認他們衝擊京西賓館是“革命行動”，傅崇碧同志答應了他們的條件，我委屈地向傅司令員申訴：“他們是進攻的，我們是防禦的，如果承認他們的行動是‘革命行動’，我們奮力阻擋他們豈不是……”傅司令生氣地反問我：“你說應該怎麼說！”

這批造反派撤出賓館，三軍造反派幾萬人很快又圍繞京西賓館遊行示威，並對準京西賓館不間斷地高呼“打倒陳再道！打倒鐘漢華！打倒牛懷龍！打倒蔡炳臣！打倒巴方亭！”那喇叭大的出奇，直徑少說也得有三米，據說這是專為從廈門向金門廣播設計製造的，發出的聲音震耳欲聾，把窗戶玻璃震得嘩嘩響。

我們其實不怕三軍造反派，他們的後臺就是軍委辦事組一些人。他們不敢超過京西賓館警戒線一步，更不敢衝擊京西賓館，不過虛張聲勢而已。

三、制止了造反派的衝擊以後，擴大的中央常委碰頭會開始批判鬥爭陳、鐘、牛、蔡、巴等人。在這次批判中，京西賓館在軍委辦事組一些人的教唆下，犯了一個極大的、嚴重損害京西賓館聲譽的錯誤——派賓館職工參加了擴大的中央常委碰頭會，參加了對陳再道等同志的武鬥。

關於那次會議，陳再道同志在他的《回憶錄》中寫過下面一段話：

吳法憲的發言，越說越不像話了。他簡直就像一條瘋狗，到處亂撲、亂咬一氣。在場的周恩來實在是聽不下去了，曾先後打斷吳法憲的發言，讓他講主要問題。

然而，吳法憲仍然信口雌黃，滿嘴胡說，又對徐向前發起攻擊，聲言徐向前早在二月份，就為陳再道打保票，說陳再道不是三反分子，有錯誤也打不倒。武漢問題，徐向前是要負責任的，這個責任應當追究！

在場的徐向前聽到這裏，實在是忍無可忍。他說，這個話我講過，是根據當時的情況講的，如果有出入，可以調查瞭解嘛！

說罷，徐向前寫了條子，遞給周恩來，便憤然離開了會場。

吳法憲並沒有因此而甘休。他窮兇極惡地竄到我的面前，伸手打了我一個耳光，以進一步證實他的立場堅定，態度鮮明。

在場的陳毅、譚震林等同志，實在看不下去了，也先後離開了會場。

在這次會議上，我據理進行了申辯。

我實事求是地說，如果搞“兵變”我總不能沒有幾個人，總不能不開個會吧？說我搞“兵變”，可以找人對證嘛！

吳法憲不等我把話講完，就領著武空的劉豐和幾個打手惡狼似的沖了過來，先是撕掉了我的帽徽、領章，接著又是一陣拳打腳踢，不准我們再講話。

在會議中間休息的時候，他們也不讓我們喘口氣。

一些不明真相的服務人員，由於受了他們的煽動、驅使，也向我們沖了過來，繼續對我們進行武鬥，你推過來，他推過去，讓人搞不清楚是誰的拳腳。

在休息室裏的周恩來聽到秘書周家鼎的報告，氣憤地說：“真是荒唐！”說罷，周恩來快步趕了過來，想制止他們的武鬥。可是，等周恩來趕到第一會議室時，那些服務人員已聞風跑光了。

吳法憲在會議上帶頭搞武鬥，曾受到周恩來的嚴厲批評。而江青卻表揚吳法憲說：“吳法憲是造反派，有造反精神。”

在擴大的中央常委碰頭會上搞武鬥，這在我黨歷史上也是絕無僅有的。

我們賓館的服務人員被人當槍使，派到擴大的中央常委碰頭會上搞武鬥，而且被鬥的是住在賓館的客人，這確實是我們賓館的恥辱，是我們賓館的一個污點。我黨高級幹部異口同聲地讚揚京西賓館在“文化大革命”中保護了他們，惟獨陳再道同志留下了這樣一段讓人痛心的話。

四、7月底，新人大、工業大學、民族學院、輕工學院、科技大學、工業學院等各千餘人分別衝擊了京西賓館，其中一次，一百多人砸破地下室玻璃，沖入樓層進行搜查。

8月19日晚11點30分，杭州一司等19個造反組織200多人，突然襲擊，砸碎樓門玻璃，沖入樓層進行搜查。

大約8月上旬，擁陳（錫聯）反宋（任窮）的遼寧革命造反聯絡站（簡稱遼革站）在京西賓館警戒線外安營紮寨，要揪宋任窮同志。當時陳、宋都住在賓館，他們既要揪宋，又不能傷及陳，以表示揪宋與陳毫無關係，因此只是虛張聲勢，不敢妄動。

但這畢竟是賓館安全一大隱患，大意不得。賓館大廳常有一個排守護門廳，夜間就地和衣而臥，一有動靜，可以隨時投入“戰鬥”。

遼革站數天“蹲點”，把情況摸得一清二楚：宋任窮住在幾層幾號，什麼時候衝擊最好，走什麼路線，用什麼方式進入室內，用什麼方法把宋劫走等等，做了詳細計畫。

鑒於賓館防守嚴密，他們就先設法麻痹賓館對他們的警惕。8月18、19、20連續三天，他們敲鑼打鼓進入賓館東警戒線內，聲稱他們組織了“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為賓館演出，麻痹了賓館對他們的警惕。

8月21日凌晨兩點，遼革站排除了哨兵的阻攔，突然發起衝擊，把大樓衛兵推開，沖上六樓619房間，砸碎門上面的玻璃，人踩著人進入室內，整個行動十分神速。他們的目的，是要把宋任窮同志用繩子從六樓陽臺上吊下去，由下麵的人接應劫走。

一樓大廳被驚醒的戰士立即跟隨造反派上樓，但前面的造反派已全部進入客房內並把房門鎖死。戰士們看到門上破碎的玻璃，受到啟發，也採取同樣的辦法想進入房間，但遇到房間內造反派的抵抗，他們用力把戰士往外推，後面的戰士卻奮力把前面的戰士往進推。經過幾個回合，房間裏的力量對比不斷變化，戰士們終於有可能把房門打開，一擁而入。宋任窮同志被解救。

周總理得悉遼革站衝擊賓館抓人後，嚴厲地批評遼革站，並指示軍委辦公廳：“今後對衝擊京西賓館處理要嚴格。打了人要賠禮，打了東西要賠償。”並指示賓館“要抓緊對幹部、職工的思想教育”。總理對“京西賓館接連發生問題沒有對策”表示不滿，指示門口“應該有一個排”。並且指示賓館立即修圍牆。

“八·二一事件”也驚動了毛主席，他指示北京衛戍區“常駐京西賓館兩個連”。

一天，軍委辦公廳通知：福州軍區第二政委劉培善、副司令員吳瑞山，乘南京到北京的列車到京，要賓館派人去車站迎接。賓館指定辦公室幹部汪書琴同志辦理。

那時，賓館同車站的關係非常好，賓館接站的汽車都是開到月臺上的。列車到達後，沒有在軟席臥鋪車廂接到劉、吳，卻發現他們從後面硬席車廂走來，他們被順利地接回賓館。

大約過了一個多小時，賓館東警戒線外人聲鼎沸，一群江西造反派要求京西賓館“還人”，說賓館把他們看管的劉培善、吳瑞山“搶”走了。

後來才知道，江西召開萬人“抓革命、促生產”動員大會。一派造反派組織沖上主席臺劫持了劉培善、吳瑞山，說他們支持“保皇派”，壓制“造反派”，要把他們押往北京找中央首長解決問題。為了避免走露風聲，他們不經鐵路、公路，而走水路。出湖口，下南京，轉車北上。劉、吳都是經過長期革命戰爭鍛煉的老戰士，豈能甘心當造反派的“俘虜”？將要到達南京時，劉培善“肚子疼”，要求看病，否則不走。不得已，造反派找到當地駐軍，醫生背著藥箱，給劉培善“看病開藥”，劉趁人不備，把一個小紙團扔進藥箱。醫生回去打開一看，上寫“我們是劉培善、吳瑞山”，醫生立即上報。南京軍區偵得他們將乘坐的車次，上報軍委。劉、吳已被劫持幾天，現在終有下落，故通知賓館去接。列車一到北京站，劉、吳就看見月臺上有汽車，憑他們的經驗，那一定是京西賓館的車，在混亂中他們鑽進汽車，脫離了造反派的視線。

造反派畢竟是一些年青人，他們先是對劉培善“肚子疼”不加懷疑，更沒有嚴密監視醫生，而到北京站也沒有加以防範。直到走失了劉、吳，才發現前面有一輛汽車開走了，頓感上當受騙。

劉、吳被誰接走了，幾經周折，經由北京造反派指點，才肯定是京西賓館所為，因為京西賓館是“窩藏”各地走資派的地方。所以，他們遲了一個多小時才趕到京西賓館“要人”。

我在一樓西廳小賣部遇到劉政委，我說：“江西造反派隨後追來，要求你和吳司令出去接見他們，否則，不離開賓館。”劉政委笑了笑說：“我現在要理髮、

洗澡，沒有時間接見他們。我已經解放了，要過正常的生活了，同他們共同生活的日子從此結束了。”

第二天早晨，兩個造反派把站崗的戰士糾纏住，幾十個人趁勢沖到大樓門前，見裏面嚴陣以待，只好圍聚在門前，造成客人出入不便。其中一個小夥子，竟當眾撒起尿來，激怒了賓館戰士職工，雙方爭執起來。大概他們自己也覺得嚴重脫離了群眾，幾個小時以後，撤出警戒線以外。

就這樣雙方僵持了好多天。一天上午，接待室打電話，說江西造反派要撤走了，要求撤走前同京西賓館的領導見一次面，我欣然答應了。

我一進接待室的門，他們就表現出了異乎尋常的“熱情友好”，兩位女將立即坐在我的兩側，這種陣勢顯然藏有殺機，我立刻意識到自己上當了。

“是這樣”，大概是個女頭頭對我說：“我們來到賓館好幾天了，賓館既不還人，劉培善、吳瑞山也拒絕出來接見我們，我們只得撤走了。但希望在撤走前，能見見劉培善、吳瑞山。然而門前有警衛，我們自己進不去，今天就有勞(副)主任同志給我們帶帶路，去見見他們。”不由分說，左右兩位女將把我架起，後面又有兩位女將推著我就往大樓走。說話間到了大樓門前，隔著玻璃看到裏面幾十個戰士嚴陣以待，她們傻眼了。她們哪裡知道，此時賓館已經有了嚴格的安全措施。就在他們把我推出接待室的時候，接待室已經按了暗藏的警鈴向樓內報了警。無奈，他們只得撤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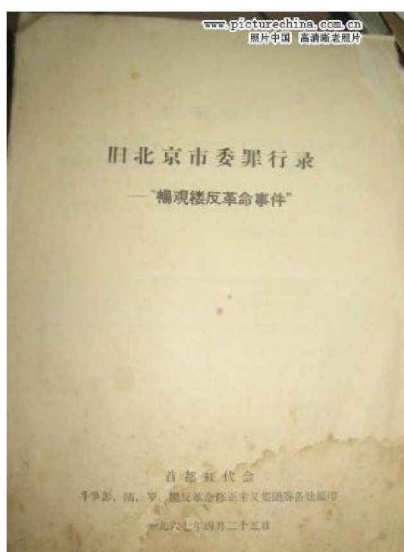
大約到 10 月底，賓館的院牆搶修起來了，東面還修了一個“正規”的門，賓館的警衛工作環境得到改善。

大約就在賓館修好圍牆以後不久，廣西“四二二”造反派要揪鬥韋國清同志。“四二二”的戰鬥力非常強，他們沖進了大門，衝垮了大樓門前警衛戰士組

成的盾牆，打碎了轉門側面的玻璃門，奮力往大樓內沖，賓館的職工則奮力抵抗，戰鬥場面十分激烈。造反派沖不進來，一些“勇士”就從人頭上往裏鑽。爬在人頭上面的是一個戴眼鏡的，於是有同志出主意：“摘下他的眼鏡！”這一手真靈，那人眼鏡沒了，就變成了瞎子，順手把他擒獲，成了賓館的“俘虜”。戰士們把他押到一個角落，強迫他跪下，向毛主席“請罪”。一人“被俘”，後面的人再不敢出頭，而大院又有解放軍增援，“四二二”深感形勢對他們不利，鬥志低落，最終被我館戰士職工驅逐出境。

第二天，“四二二”經過重新調整，傍晚又一次向京西賓館發起衝擊，不費力氣就衝開了大門，洶湧而入。但當其進入一半後，突然出現大批戰士阻攔，並把大門關閉起來。“四二二”進來的人出不去，外面的人進不來，院內院外都無所作為。那時已是深秋，廣西人來到北京，不曾帶來禦寒的衣物，就只能靠“革命熱情”禦寒了。

經過“談判”，“四二二”最終撤回廣西。



第六節 暢觀樓事件

北京市委在暢觀樓召開的一次會議距今已過去了 40 多年，當時的具體情況，鮮為人知。但是“文化大革命”初期，大字報、紅衛兵小報、《北京日報》連篇累牘地對這次會議進行“革命大批判”，這次會議一下子變成了“暢觀樓反革命事件”，成了以彭真為首的原北京市委的又一大罪狀，鬧得是沸沸揚揚、滿城風雨。“文化大革命”結束後，“暢觀樓事件”不見於正史，海外某些出版物，如臺北出版的京夫子著《中南海恩仇錄》、香港出版的師東兵著《夢斷秦城》對此有所涉及，但大多也是根據“革命大批判”而寫的。“暢觀樓事件”究竟是一次反革命事件，還是一項正常工作，成了遺留的歷史謎團。

“暢觀樓事件”的由來

暢觀樓原本是清朝的一個王府，現位於北京動物園內，“暢觀樓事件”發生的時候是個幽靜的地方，並無暢觀可言。1955 年 3 月，毛澤東曾親自到此看望西藏的十世班禪額爾德尼·確吉堅贊大師，並同他作了長時間的親切交談。“文化大革命”期間，因為對“暢觀樓事件”進行“革命大批判”，暢觀樓一時間出了名。

“暢觀樓事件”就發生在暢觀樓，時間是 1961 年 12 月。這一年，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反思“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號召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大搞實事求是，“暢觀樓事件”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發生的。

由於“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連續三年多的失誤，國家建設和人民生活都出現了嚴重困難。中央領導同志頭腦逐漸清醒下來，開始在一系列會議上總結教訓。1960 年 12 月 24 日至 1961 年 1 月 13 日，黨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

主要討論 1961 年國民經濟計劃，同時總結各地整風整社試點的經驗。毛澤東在這次會上號召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他說：“實行方針、政策，要有一種方法。你們有很好的方針、政策，而情況不明，決心不大，方法不對，就等於沒有。”緊接著，1961 年 1 月中旬召開的中共八屆九中全會通過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國民經濟八字方針，毛澤東在會上再次提出要調查研究、實事求是。這標誌著黨在經濟建設領域的指導思想再次轉向糾正“左”的錯誤，從主觀主義轉向實事求是。

1961 年五六月間在北京召開中央工作會議，毛澤東在會上指出，如果違背了客觀規律，就一定要受懲罰，我們就是受懲罰，最近三年受了大懲罰，土地瘦了，人瘦了，牲畜也瘦了，“三瘦”不是懲罰是什麼？這個社會主義誰也沒有幹過，未有先學會社會主義的具體政策而後搞社會主義的。我們搞了 11 年，先要總結經驗。

1961 年 8 月 23 日至 9 月 16 日在廬山召開中央工作會議（即第二次廬山會議），討論工業、糧食、財貿、教育等問題。會議第一天，毛澤東在會上講“對社會主義，我們有些瞭解，但不甚了了”，“搞社會主義，我們沒有一套，沒有把握”。會議期間，毛澤東在與有關人員談話時，多次談到要大搞調查研究，總結黨的指導思想和方針政策，以吸取過去的經驗教訓，糾正“左”的錯誤。他感慨地說，他有三大志願：一是下去搞一年工業，搞一年農業，搞半年商業，以便多做調查研究，瞭解實情，不做官僚主義者；二是騎馬到長江、黃河兩岸進行實地考察；三是寫一本書，把自己的一生寫進去，把缺點、錯誤統統寫進去，讓人民去評論。鄧小平作為主持中央書記處工作的總書記，在會上也表示中央書記處要負主要的責任。

1961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準備召開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即七千人大會。通知指出：1958年以來在中央和地方的工作中間“發生了一些缺點和錯誤”，並且產生了一些不正確的觀點和作風，妨礙了克服困難，必須召開一次規模較大的會議來統一思想認識。

根據中央通知的精神，為了準備七千人大會，總結1958年以來中央方針政策的經驗教訓，中央書記處決定委託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兼北京市委書記的彭真同志，在北京組織一個班子，查閱1958年以來中央書記處批發的中央有關部委上報的檔。於是在1961年12月份，北京市委召集了一些部門的負責同志，借用暢觀樓這個幽靜之處，執行中央交辦的任務。這就是“暢觀樓事件”的由來。

暢觀樓會議

1961年12月，北京市委副秘書長、辦公室主任項子明，在暢觀樓召集市委一些部門的負責人開會，要大家查閱1958年以來中央書記處批發給北京市的由中央有關部委上報的檔，以及少量的北京市委轉發給所屬區、縣的文件。根據會議的通知，北京市領導機關各口都要派人參加。當時來參加會議的主要是各口的副職領導，個別人還帶了一個助手。除項子明以外，還有市委工業基建委員會主任宋汝芬、市農辦主任常浦、市委文化部副部長韋明、市委大學部副部長宋碩、市委工業部副部長陸禹、市計委副主任萬一等。

項子明在會上說，這件事是由中央書記處交辦的，具體做法是把檔中你們認為有問題的段落摘錄下來，待匯總以後上交中央書記處。事情就這麼定下來了，參加會議的同志就開始工作。不過，當時這些人並不是每天都在這裏工作，畢竟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一大攤子事要做。具體的做法當時稱之為“流水席”，各口參

加這項工作的人“隨叫隨到”，看完指定的檔，做一個正式的發言以後，就可以回去了。一般來講，這些人大部分時間還在抓本職工作，只是被叫到時才到暢觀樓去，查閱摘錄文件。

項子明對參加會議的人傳達中央指示，說的是讓大家把中央報告中各自認為有問題的段落摘錄下來，並對相關的問題發表自己的看法，要求大家暢所欲言。但是，無論是在非正式發言的時候，還是在正式發言和做摘錄的時候，參加會議的同志都還是很謹慎，主要是根據當時中央堅決糾正“五風”（即“共產風”、浮誇風、強迫命令風、瞎指揮風、幹部特殊化風）的精神，對中央報告中一些浮誇和高指標的問題發表一些看法，將其中的一些段落摘錄下來。參加查閱檔的同志雖然也提出過一些批評，比如，對譚震林，說他壓指標，說北京是鍋底；對新華社有意見，亂放“衛星”。但是這些批評都還是在中央糾正“五風”的範圍之內，當時就公認的，並不尖銳，對黨中央、毛主席更沒有談任何看法。畢竟這些人的黨齡都比較長，經歷過多次政治運動，而且又剛剛經歷了 1957 年的反右派鬥爭和 1959 年的反右傾機會主義鬥爭，個個都是戰戰兢兢工作，夾著尾巴做人，即使有一些比較尖銳的意見，也不肯、不敢在會議上表露。而且當時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很厲害，大家普遍認為毛主席過去是正確的，今後也必然是正確的，現在出現一些困難，是下面執行中出了偏差，黨中央、毛主席關於“三面紅旗”的決策還是正確的。

暢觀樓會議的正式會期是 9 天。9 天的時間裏，參加會議的同志是“你方歌罷我登場”，輪流到暢觀樓查閱文件，發表看法。北京市政策研究室的同志對大家的發言，無論是非正式的討論，還是正式的發言，都做了記錄。正式會議結束以後，有關工作人員對摘錄的文件進行了整理匯總，時間稍微長一點，大概是十

幾天。這樣，經過二十多天的努力，在暢觀樓完成了中央交托的任務。

北京市委把查閱檔摘錄下來的段落匯總以後，寫了一個報告，上交中央書記處，同時也給北京市委的有關部門發了一份。該報告分農業、工業、基建、財稅、城市人民公社、教育 6 個方面，共有 29 項 110 多條，近 2 萬字，較為全面地概括了大家的檔摘要和發言，對七千人大會的準備發揮了一定的積極作用。

“暢觀樓事件”的經過就是這樣，在當時是很平靜、普通的一件事。當時沒有人能想到，這樣一次普普通通的會議，居然會成為以彭真為首的北京市委的一大罪狀。

“暢觀樓事件”遭到“革命大批判”的緣由

“文化大革命”爆發後，以彭真為首的原北京市委雖然已經是“頃刻瓦解”、“一朝覆亡”，但是這個“反黨集團”到底有哪些反黨罪行？老百姓並不清楚。不少人認為，《二月提綱》畢竟是出在中央的問題，《海瑞罷官》、《燕山夜話》也只能說是寫文章的人的問題。因此，製造出一個為做反對毛主席的赫魯雪夫式的秘密報告做準備，背著毛主席，攻擊毛主席的事件，就變得十分必要了。就是在這種背景下，“暢觀樓事件”遭到“革命大批判”，成了以彭真為首的原北京市委的十大罪狀之一。

《北京日報》、紅衛兵小報和許許多多的大字報，連篇累牘對“暢觀樓事件”進行“革命大批判”。一些當年參加暢觀樓會議的同志為此而多次被批鬥，專案組嚴令他們徹底交代參加這個反革命陰謀活動的罪行。

1967 年春，專案組還在動物園暢觀樓辦了一個“暢觀樓事件”展覽，裏面的會議桌上擺著“黑幫”的名牌，還畫了漫畫像。

對“暢觀樓事件”進行“革命大批判”期間，各種揭發材料很多，姑且舉出

一例。1967年4月，當時受到中央文革小組支援的首都紅衛兵組織散發了一份《暢觀樓反革命事件》的揭發材料。該材料宣稱：1961年11月，在劉少奇、鄧小平的庇護下，由彭真親自授意，劉仁等指揮，帶領市委內部各部委一幫“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在西郊公園暢觀樓密室“審查”中央發至縣級以上的檔和毛主席的黨內講話、批示，其直接目的是收集反黨材料，企圖在1962年1月召開的七千人大會上配合“劉、鄧黑司令部”，向毛主席倡狂進攻，妄圖一舉把毛主席推下臺來，實行其反革命政變陰謀。這就是聳人聽聞的“暢觀樓反革命事件”。

根據各種揭發材料，可以清楚地知道策劃者為了製造“暢觀樓反革命事件”，確實是費盡了心機，他們主要是從以下三個方面進行歪曲的：

第一，捏造查閱檔的範圍。根據項子明佈置的要求，查閱的是中央書記處批發的中央有關部委上報的檔，以及少量北京市轉發給所屬區、縣的檔。這個查閱範圍可以從匯總上報的檔中得到證明。中央書記處存有這份匯總上報檔，從北京市委的檔案裏也可以找到，北京市委有關部委的辦公室也有存檔。因此，這樣一個查閱範圍是很容易搞清楚的，但策劃者卻一口咬定，這次會議查閱的是“中央發至縣級以上的檔和毛主席的黨內講話、批示”。對查閱範圍的這種篡改，真是用心險惡。本來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但這樣一篡改，講成是查閱毛主席的黨內談話和毛主席批發的中央文件，這個問題就嚴重了。在當時，背著毛主席，審查毛主席的講話，從中找出問題，加以攻擊，顯然是居心叵測，肯定足以證明以彭真為首的北京市委幹這件事，是陰謀反對毛主席，為以後“做秘密報告做準備”。

第二，捏造攻擊毛主席、攻擊三面紅旗的言論。“革命大批判”文章裏專門

有一章，叫做“群魔亂舞”，說什麼暢觀樓會議上攻擊“毛主席和黨中央犯了路線錯誤”，“歷史上凡是犯了路線錯誤，都不能自己糾正”，說什麼會上攻擊總路線是違反了經濟規律，攻擊“大躍進”是萬馬折騰，攻擊人民公社辦早了。其實，到底有沒有這樣的言論，查閱一下上報給中央書記處的匯總檔和北京市委政策研究室所做的會議發言記錄，就可以一目了然，但是策劃者偏偏要對已經被隔離審查的“黑幫”進行逼供。誰堅持實事求是，誰就是“頑固不化”，就是抗拒，就得從嚴。

第三，捏造“暢觀樓事件”是在秘密狀態下進行的。這一點同樣是用心極為險惡的。暢觀樓當年是個幽靜之地，挑選這個地方不過是為了工作不受幹擾罷了。但是，“革命大批判”卻繪聲繪色地將這次會議講成是“行動詭秘”、“策劃於密室”，極力把這次會議誣陷成陰謀行動。其實，這件事並不難查清。會議的內容因為當時不允許隨便向外傳，知道的人確實不多，但暢觀樓會議本身，知道的人很多，一問就清楚了。

1979年2月17日，中共中央發出為彭真同志平反的通知。通知明確指出：“暢觀樓反革命事件”等強加給彭真的不實之詞，均予以徹底推翻。

第七節 典型的批判

一、 人物介紹

在整個文革期間，各級大大小小的官吏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批判、鬥爭，其中最典型的要數劉少奇、王光美。

劉少奇（1898年11月24日~1969年11月12日）湖南省寧鄉縣人。歷任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國人大常委委員長、中共中央副主席、

中華人名共和國主席等職。

1968年10月31日在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上通過“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並以中發(68)155號中共中央檔的形式發至全國“將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撤銷其黨內外一切職務，並繼續清除劉少奇及其同夥叛黨叛國的罪行”。

1969年5月17日在病重之中的劉少奇被押送到河南開封市內北土街十號“監護”。同年11月12日凌晨六時病逝，終年71歲。遺體就地秘密火化，火化中清單上填寫的是劉少奇早年的曾用名“劉衛黃”，職業“無業”，死因“病死”，申請人為劉少奇的兒子劉源。“文革”結束後1980年中共中央為劉少奇舉辦了平凡追悼大會。

王光美(1921年9月26日~2006年10月31日)終年85歲。曾用名董朴，祖籍天津人。1948年8月21日在河北省西柏坡成為劉少奇的第六位也是最後一任妻子。歷任全國婦聯第三屆執行委員、中共十二大代表、第三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五屆全國政協委員，第六、七屆全國政協常委。

二、 劉少奇、王光美“文革”中的檢查

在封建社會中，妻以夫貴，母以子榮的傳統下，劉少奇打倒了作為妻子王光美跟著倒楣。在“文革”中劉少奇、王光美批鬥過程的大字報、傳單有許多專著介紹了，這裏僅僅匯總劉少奇、王光美的正式檢查，從中就可以看出批判劉少奇、王光美的脈絡了。

- 1、劉少奇1966年12月14日在政治局會議上的檢查書。
- 2、劉少奇1967年4月12日向中南海衛東革命造反派的檢查。
- 3、劉少奇1967年7月9日向北京建築工業學院革命師生員工的檢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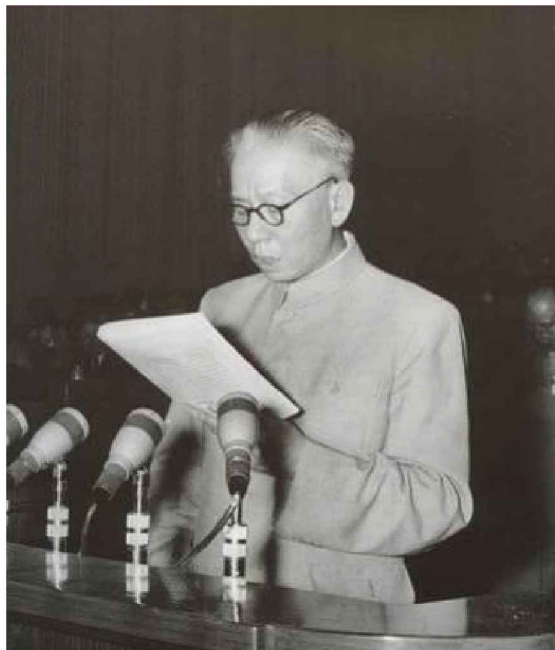
4、王光美 1967 年 8 月 8 日向中南海革命群眾的檢查。

在中南海的圍牆外，1966 年 12 月 27 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天安門城樓召開“首都徹底批判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誓師大會”上聶元梓作了“徹底批判劉少奇、鄧小平，將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發言。同時發言的還有清華大學蒯大富、北京師範大學譚厚蘭、北京師大附中陳永康。他們從各個不同側面憤怒控訴劉少奇、鄧小平。

1967 年 5 月 11 日，中共中央以中發（1967）153 號檔發至全國批判劉少奇所寫的《論共產黨修養》一書。

所有這一切為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將劉少奇定為“叛徒、內奸、工賊”“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並“永遠開除出黨”完成了輿論的準備工作。

劉少奇同志在 1966 年 12 月的檢查書



同志們：

我堅決擁護主席和林彪同志的指示，同意伯達同志的講話，我看了各小組的大部分簡報，瞭解到了一些地方和中央的一些部門在指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程度不同地犯了錯誤，許多同志都作了檢討，這使我的心情十分沉重，因為這同我以前一階段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錯誤是有關的。在今年6月1日以後的50多天中，我在指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發生的是路線方向錯誤，這個錯誤的責任應該由我來承擔其他同志的責任。例如：在京的其他中央領導同志，國務院各部委的領導同志，新市委工作組，地方的領導同志等。他們雖然有一定的責任，但第一位要負的是我。

在今年7.18以前的一段時間內，毛主席不在北京，黨中央的日常工作是我主持進行的，北京市各方面的文化大革命情況，經常是在我主持的中央會議上彙報的，在彙報中做了錯誤的決定、批准。我做了錯誤的決定，如派工作組，都要中央各部委和團中央要人，當時中央各部委和團中央都很積極，要各地派人由新市委介紹派往各學校，此外還向各機關派工作組，一開始就做出了限制群眾的方法，如：不讓群眾上街遊行，不讓學生上街，要內外有別等.....並批准了北大工作組的錯誤做法，以為學生的革命行動是反革命。這就給全國定了基調，還批准了給中央的報告，也發生了不好的影響。

在北京許多學校的所謂排除幹擾的鬥爭，因此，在許多工作組領導下發生了學生鬥學生的現象，圍攻革命派，壓制了不同意見。甚至將學生定為反革命分子、右派、假左派。這樣，就在不少學校造成恐怖氣氛，這是白色恐怖的。

我過問的光美參加過清華大學的一段運動中所犯的錯誤是這一錯誤路線的典型分子。我過問的北師大附中也進行了排除幹擾的鬥爭。解放北京市黨團員只

要在認識檢查後就可以積極參加文化大革命。這是不夠的，但過早同意北京過早恢復黨團活動的意見。工作組指定後，就把權力交給革委會，文革，這些是工作組指定的。他們的影響較深，北京市中學也程度不同地犯了以上錯誤。此外，還同意了團中央關於中學文化革命的計畫。使中學一、二年級放假參加勞動和軍訓以及教師集體集訓。現在看來是不應該派工作組的。

當時許多方面要求派工作組，特別是報紙報導了也大派工作組以後，要求更強烈了。這時沒有就派出工作組進行討論，也沒有就派工作組進入學校後怎麼辦，應當說我們對文化大革命很不瞭解的，但是群眾已經起來了，我們只要參加到群眾中去，聽取群眾的意見，向群眾學習，然後才能對運動中的問題提出我們的意見。這場是觸及靈魂的大革命，是無產階級大革命的新階段，我自己和許多同志都不理解，都沒有經驗。我只能在群眾中學習，不應當派工作組去包辦代替，去建立領導群眾文化大革命的機構。如果群眾一定要求派，也只能派些聯絡員去瞭解情況，對於群眾運動不要發表自己的意見，這樣雖然不能滿足群眾要求，最多也只樣處理，當時有些同志發現並提出工作組和群眾發生對抗，並提出不要工作組。例如伯達同志，當時就提出過。伯達是領會主席思想的。當然如果我們能夠去領會主席思想就撤走也不會發展到路線方向的錯誤。

當時有些地方對工作組的領導和某些成員發生懷疑，也懷疑某些黨領導人。由於工作組包辦代替，並規定了許多限制，這必然引起群眾的不滿。即使當時有些過激的言論，也屬於敢的言論，當時也有極少數右派言論出現，這本是正常現象。應拿出相當地間讓不同言論充分發表出來。恰在這關鍵時刻，由我主持中央工作會議，並作出了和增加了工作組犯錯誤的可能性。在有些實在堅持不下去的撤走後，又派出新的工作組。在工作組有許多同志很不理解，又不向群眾學習而

要群眾按他們的規定去走。這就違背了群眾運動的規律。實際上就站到了資產階級立場上去了，實行了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運動打了下去，顛倒事非、混淆黑白，長資產階級威風，滅無產階級志氣。既使在這個時候，我還是很不明白的，不知道這種情況是極不正常的，極不利於文化革命的，不利於黨和社會的利益。這是右傾機會主義錯誤。雖然才 50 天，但損失是很大的。這種後果直到現在還沒有肅清，有些地方變本加厲，造成了群眾的對立。我這次犯錯誤不是偶然的，我在歷史上就犯了一些原則性的和路線性的錯誤。如：1946. 2. 1。就政協會議開過後，我就中央寫過指示說：政協會即將實現，中國就走向和平的新階段。這是對時局估計錯誤，有和平幻想。雖然也談到練兵、減租、生產是不錯的。

此外，1946 年初，對東北戰爭的指導方針我有錯誤，當時對林彪同志的指導是不夠的。47 年我主持的土地會議沒有系統的全面的解決當時地主土地分配問題。沒有能及時糾正當時出現“左”傾錯誤。如殺人過多和侵犯中農問題。

49 年春，我對天津城市工作說過不少話。糾正當時資本主義工商業某些過份性急的做法。同時提出消滅城市的封建把頭，當時有些講話是有些右傾錯誤。沒有強調指出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的矛盾是以後整個歷史時期的整個矛盾。

51. 7，我錯誤地批評了山西省委把老區互助組提高組成農業合作社的決定。

55 年，鄧子恢同志縮掉 20 萬合作社的決定是我主持的中央會議說的，沒有反駁，實際就批准了他的計畫，他就在一次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大加發揮，縮掉 20 萬合作社。

62 年，我犯右傾錯誤。64 年又犯形左實右。我這次在無產階級革命中所犯的路線錯誤跟以前所犯的錯誤是有聯繫的。

62.4，召開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7 幹）用我的名義作了書面的報告，以後又作了發言。在書面和口頭發言中，都肯定五八年實行三面紅旗以來取得的偉大成績，同時也在工作中發生了一些缺點和錯誤。我們所獲得的成績是主要的，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是次要的。這缺點和錯誤都大部分已經改正，有些正在改正。……

更嚴重的是 62.2.21_23. 由我主持的中央工作會議，討論了 62 年中央財政預算。發現了 20 億的財政赤字。因此，對困難的估計錯誤。認為是處在非常時期。陳雲同志向國務院的講話是根據中央會議上講話加以發揮的，中央還核發了這個報告，還經省一級黨員幹部討論並鼓勵發表不同意見。因此，在會上鼓動歪風出籠，單幹風。有些人就根本否認三面紅旗。就把積極分子搞得灰溜溜的。並把不該下馬的大三線建設的重點專案也錯誤地下馬了，而有些應該減減的投資沒有減減。由於當時我過份相信陳雲，偏聽他的意見，在思想上有共同性。我向中央和主席推薦陳雲做中央財政小組組長。此時，主席不在北京。就到主席那兒請示報告。後來我才知道主席根本不同意我們對形勢的估計和作法的。

當時，鄧子恢在中央工作會上說過安徽責任田的好處。我們沒有加以批駁。因此，他就在幾次會議鼓吹包產到戶。有位中央領導提出分田到戶。還有一位提出三合一少的意見。這都是對國內外形勢估計錯誤的情況提出反對總路線的意見。其中分田到戶意見是我直接聽到的，沒有頂回去，這是很錯誤的。當時我已經感到很緊張，形勢嚴重。因此，急於請求主席回北京。

62 年到 62 年夏季北戴河會議犯了右傾路線錯誤。從主席回到北京就著手起草進一步發展鞏固集體經濟的決定和商業的決定。又在北戴河會議上提出階級鬥

爭矛盾。九月開了十中全會，通過兩個決定和公報，才把我的錯誤糾正過去，把形勢根本轉過來。

我 62 年犯了錯誤以後，64 年又犯了形左實右的錯誤。64. 4. 1 于主席親自制定的前十條後，9 月，中央的某些領導同志又制定了後十條。於 11 月 14 日發出。這後十條是怎麼制定的，我不知道。最近才知道彭真在前十條出來後走了六個月後向主席寫了報告。後十條就是這個報告的精神。64 年 9 月後我發現後十條有些不利於發動群眾，64 年夏，我到各省和北京講過話。強調各級領導到農村搞蹲點。這本來是對的，但強調過份，有些絕對化是錯的。此外，還說過：在這以後的四清是搞得不深不透的，有些是失敗的。對當時的階級鬥爭估計過份，對幹部犯四不清也估計過份。因此，對時工農業生產好起來的原因某些解釋也是錯誤的。還說過在發動群眾鬥爭中才能搞清情況，認為主席所說的開調查會的方法是不夠的，有時是說不適應了。這實際上是否認了主席的思想。這是極其錯誤的，影響極壞。當時又過份相信光美的經驗總結，向全國，北京推廣經驗。這就給許多同志極不好的印象。其實，光美經驗在當時是有錯誤的。在 64 年的中央會議上，我的錯誤沒有認識，又說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黨內外矛盾的交叉，正如二十三條所說的，這沒有說的本質，這不是馬列主義的。我正是在這個時候忘記了我們黨十幾年的關於階級鬥爭的論斷。因此，犯了形左實右的錯誤。我的錯誤也是主席親自主持制定二十三條之後才糾正的。二十三條上規定這次運動的重點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樣就把運動縮小到極少壞人身上。由於我在歷史上犯過錯誤，特別是在 64，62 犯了右傾錯誤。在次就犯了更為嚴重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錯誤。我在這次運動中所犯的錯誤，又是從我們黨和人民的四大，毛主席回到北京後親自糾正的。

7. 24 決定撤退工作組後，召集了工作會議。8. 1 召開了十一中全會會討論和通過了十六條和公報，在全會後期，討論了關於我的錯誤的問題，對政治局黨委進行了選舉，會議把林彪同志作為毛主席的第一位助手和接班人。決定公報以及對組織整編是必要的，對全國全黨有深遠的重義。對世界革命也將有深遠影響，我是擁護林彪同志在各方面都比我高明得多，黨的其他同志也比我高明得多。我決心遵守一個黨員應守的紀律，絕對不在任何人面前搞兩面派。

犯錯誤的原因是：1，不理解這場文化大革命是我國社會主義革命發展的更深入更廣泛的新階段，以後如果進行文化大革命的方法，為了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完全達到十六條中提出的各項任務，就必須認真走群眾路線，廣泛和深入地發動群眾，提倡群眾的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我的作法實際上是不相信群眾，不依靠，不敢放手發動群眾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面是迷信工作組的作用。是包辦代替群眾運動，怕亂，怕大民主，怕群眾起來造我們的反，怕反革命上臺。2，錯誤估計當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形勢，把革命的群眾運動出現的正常和不可避免的一些缺點看成是反黨，反無產階級專政的逆流。因而作出了錯誤的判斷。這就勢必站到資產階級立場，實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3，在思想上的資產階級世界觀還未完全轉變過來，還存在著許多唯心的形而上學觀點，因而在觀察問題和處理問題的時候，就常常站不穩立場，有時就站到資產階級立場了。在工作方面又表現自以為是，好為人師的態度。4，最根本的是沒有學好毛主席的思想；不能在工作 and 鬥爭中正確地運用毛澤東思想；沒有到群眾中去學習；向主席請示報告不夠，實際上有時違背了主席的思想，對同志中的正確意見不聽，反而接受了一些錯誤的意見。

這是我現在對錯誤的理解，當然還是很不夠的。我決心學習毛主席思想；向林彪同志學習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決心做些對黨對人民有益的工作。

這是我的檢討，請同志們批評並消除影響。

王光美寫給中南海革命群眾的檢查

王光美

中南海的革命群眾：

在八月三日批判鬥爭我的大會上，革命群眾要我就五個問題，做出檢查交代。現已寫出，送上請審閱。

由於我所犯的許多錯誤和嚴重錯誤（右傾機會主義路線錯誤），為革命事業造成很大的損失，我願再一次向革命群眾、向我們偉大的中國共產黨、向我們最敬愛的紅太陽毛主席請罪。

偉大的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

無產階級專政萬歲！

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大民主萬歲！

偉大的、光榮的、正確的中國共產黨萬歲！

偉大的光焰無際的毛澤東思想萬歲！

偉大的導師、偉大的統帥、偉大的領袖、偉大的舵手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

祝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最親密的戰友林彪付主席身體健康！永遠健康！

王光美

一九六七年八月八日

一、關於參加農村社會主義教育工作中的錯誤。

1963 年 11 月底到 1964 年 4 月底參加桃園大隊四清革命中的錯誤：

1、沒有在運動中號召和組織幹部、社員和其他工作隊員們大學習毛主席著作，而只是反復宣傳黨中央的“雙十條”（草案）、黨中央“關於鞏固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發展農業生產的決定”（即十二條）、黨中央關於人民公社六十條和發展農業生產綱要四十條。我們當時認為這些都是毛主席親自領導制定的。根本不知道也沒有敢想過第二個十條（草案）是彭真等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背著毛主席搞的。我們在運動中主要還是貫徹了第一個十條（草案）的精神，但，沒有隨著運動的進展組織大學習毛主席的其他著作，促使群眾和幹部思想革命化，把四清搞得更好，使經過四清革命，在群眾和幹部中真正紮下毛澤東思想的根子。

2、過分強調工作隊的作用。

我參加的河北省委試點工作隊人數很多，因它既有試點摸經驗的任務，又有培養幹部的任務。大工作隊必然會發生包辦代替的錯誤。我在桃園四清總結中，又加以宣揚，影響各地在 1964 年冬搞大工作隊的錯誤。

3、過分強調根子要紮正，基礎要打好，採用了第二個十條草案中紮根串連的錯誤作法，雖然我們是在向群眾、幹部大講雙十條（草案）時，同時物色根子的，仍有神秘化的作法。在一個被壞分子把持的黨支部領導的大隊中這樣做有一定的必要。我在桃園總結中對紮根串連講得很具體，對錯誤的紮根串連作法加以宣揚，造成了壞的影響。

4、我個人在“三同”方面有特殊化，有的方面不如其他組員的地方，造成

不好影響。

偉大的領袖毛主席在八月五日“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這個偉大的革命文獻中，批評了 1964 的形“左”實右的傾向。我理解是指 1964 年冬至 1965 年 1 月毛主席親自主持制定的二十三條下達的一段時間發生的問題。那段時期在全國四清運動中較普遍地存在著形“左”而實右的傾向，主要應由劉少奇負責。

其中受桃園經驗錯誤影響的部分，我負責。我認為，桃園經驗不是形“左”實右的典型，也不是破壞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試點。

我去河北參加四清革命是劉少奇叫我下去鍛煉的，並沒有要我下去摸經驗的意思。離京前，我問過劉少奇下去該怎麼做，他簡單地答復我幾句，就是桃園總結中引的那幾句，“除了要有馬列主義的立場、思想、方法，要貫徹黨中央的政策以外，不要先帶框框，一切從實際出發，有什麼問題解決什麼問題”。我當時因不理解這句話的意義，也沒有向工作隊負責人傳達，直到總結時，才講出。劉少奇沒有指示我好好貫徹毛澤東思想是他的最大錯誤，但，我不認為他所說的不要帶框框的意思是不要毛澤東思想，因為他要我貫徹黨的政治，而四清中的主要政策檔，即雙十條（草案）等，我們當時，都認為是符合毛澤東思想的，而第一個十條（草案）明明是毛主席親自主持制訂的。而我們在桃園時，也主要是貫徹了第一個十條（草案）的放手發動群眾，以徹底革命精神進行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我理解劉少奇講的不要帶框框，是要我不要先想好下去會遇到什麼問題，要從實際出發，是反對主觀主義的。我在八月初，在清華大學工物系一個班參加批評工作組的辯論會上，也曾講過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不是框框。

以後，我又搞四清的幾個地方，基本上是貫徹了毛主席親自制定的二十三條和第一個十條（草案）的。但，我沒有完全否定第二個十條（修正草案），有時

還採用了其中的一些有關政策界限規定。在我參加的一些討論四清工作佈署的會上或我修正定稿的工作計畫或檔中，大都講是以二十三條為綱，以“雙十條”的有關部分和其他檔和隨著運動的進展大學主席其他有關著作來武裝群眾和幹部。因為，我當時只知道第二個十條太長、有形而上學和繁瑣哲學等錯誤。不知道黨中央已否定這個檔，而二十三條前的通知中有一句：“過去發出的關於社教運動的檔，如有同這個檔抵觸的，一律以這個檔為準”。我一直認為第二個十條中，還是有些不與二十三條抵觸的部分，仍有用。這是我的錯誤。

在 23 第下達前，1964（年）冬季河北新城的四清，確有形“左”實右傾向。大工作隊搞人海戰術，片面強調根子要選正，而使工作組員不敢接觸中農，不敢接觸幹部，領導上反復強調沉下去，再沉下去，以致缺少革命聲勢。宣講 23 條，都是給貧農、中農、幹部分別宣講的，而且要幹部（除由少數幹部同工作組和貧下中農組成生產班子抓生產外）集體學習二十三條，普遍檢查自己的錯誤和缺點，給幹部很大壓力，等錯誤做法。我因有外事任務，下去較晚。我曾向保定地委總團反映並研究了改進的辦法。以後，我立即回北京向劉少奇彙報了新城情況（因那次下去以前，他曾要我兩個月內不許提意見），他同意了我們打開局面的一些辦法，但，新城發生的問題，並沒有太引起他的注意。到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中央工作會議時，他還認為保定地委工作團的這一段錯誤原因來自華北局的某個領導同志的指示，而直到一九六五年一月毛主席親自主持制定的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二十三條，才扭轉了那時在全國四清運動的形“左”而實右的傾向。在看了毛主席寫的大字報“炮打司令部”這個光輝的歷史文獻以後，劉少奇才認識到 1964 年的形“左”實右的錯誤傾向，主要來自他的錯誤指導思想。

新城的四清在毛主席批評後，立即召開了幾次萬人大會貫徹二十三條的精神

並將工作隊一分為二，分出一半去涿縣搞四清。以後的幾次四清我認為基本上是遵照二十三條進行的，但，仍存在工作隊大，有包辦代替等錯誤。我個人在三同方面較之在桃園有些方面做得更差些（如：因我生了浮腫病，查不出原因，去社員家吃飯時，我自帶了碗筷等），影響很不好。

關於 1966 年初，人民日報發表的江蘇省方巷大隊在社教中如何大學毛主席著作的報導和短評。我對這兩篇文章的看法，上次就做過檢查。我認為是關於如何在四清革命中大學毛主席著作的方法問題之爭論，也就是如何貫徹林彪付主席關於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指示的問題，卻造成我反對在四清革命中大學毛主席著作的錯覺，我不想再辯解。

二、關於在清華大學文化大革命的嚴重錯誤。

在這次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在我參加北京市委清華大學工作組期間，忠實地推行了以劉、鄧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把清華大學的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了下去，鎮壓了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首先我一參加工作組，就站在工作組的立場上，想各種方法鞏固工作組的領導地位，以一些不適合的框框條條限制群眾運動，以我們主觀設想的搞法去要求群眾運動，自然遭到革命闖將們的抵制；接著又錯誤地估計了形勢，看不到問題的本質方面，把一些非主流的事情當為主流；提出“排除幹擾”的錯誤口號，把一些革命小闖將當做“假左派”，並提出與之辯論，必要時反擊的完全錯誤的決定。這樣，就發生嚴重的學生鬥學生的事件。從 6 月 24 日到 7 月 12 日一段時間犯了方向性、路線性錯誤，我要負主要責任。特別對三次全校性的辯論和批判學生的大會，我親自參加了組織領導工作。（對蒯大富同學六月二十七日的辯論會和七月八日批判會，對王鐵成同學七月十二日的批判會）由於這三次全校性大會，在全校群眾中造成極不正

常的壓力。我在七月初參加組織批判蒯大富同學的準備工作時，向工作組領導和當時的文革籌委會主任等都講過要通過我們在運動中揪出的黑線人物和跳出來的“假左派”做為活靶子，通過對他們所反映的資產階級思想和言行進行批判，通過批判極少數以團結、教育、提高大多數（群眾、幹部和我們工作組自己）。這樣就把當時懷疑工作組，要向工作奪權的蒯大富同學當成了活靶子去批判。這些嚴重錯誤的主要責任在我。由於我片面強調提高辯論和批判的水準，層層選拔大會發言人，並在大會前召開了練兵會，既造成各系各單位大抓“蒯”式人物，又對群眾施行了國民黨的“訓政”辦法，發生了嚴重的包辦代替錯誤，是不相信群眾自己能解放自己，又沒有虛心去當小學生向革命群眾請教。由於這三次批判大會所造成的極不正常的壓力，不僅傷害了被批判的蒯大富、王鐵成、劉泉、陳繼芳（後二者是在他們本系批判的）等人，並發生了不允許蒯大富同學半夜時到中央辦公廳接待室而逼得他絕食抗議。在這段時期內還發生了一位青年教師史明遠自殺身死和學生朱德義軋（臥）軌自殺傷一腿的嚴重事件，更為嚴重的是壓制了革命群眾的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我應向革命群眾請罪、向我們偉大的黨請罪、向我們最最偉大的領袖毛主席請罪。我在這段時間內所犯的錯誤確象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在去年八月五日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中所嚴厲批評的是：“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清華大學的“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了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志氣，又何其毒也！”在這段時期，完全是違反毛澤東思想之道而行之，犯了嚴重的路線錯誤，是右傾機會主義的路線錯誤。

清華工作組所犯的嚴重錯誤我負重要責任，上述那些重大錯誤我負主要責

任。我們工作組是屬北京新市委直接領導的，北京新市委的主要負責人，也有一定責任，但第一位要負責的是劉少奇。因為：

（一）是劉少奇所主持的中央常委彙報會議上決定匆匆忙忙地派出大批工作組，而又沒有對工作組派出後如何工作給以正確的指導，並同意了一些錯誤彙報和意見，做了不少錯誤指示。

（二）在大批工作組派出後，在去年六月九日至十三日向毛主席彙報時，毛主席曾指示“不要匆匆忙忙地派出大批工作組，不要怕亂，亂了以後，再一分為二”。（這個指示我是離開清華大學以後，從揭發某些工作組領導的錯誤時才知道的，原話可能不準確）劉少奇當時為什麼不請示主席，已派出工作組應如何辦？為什麼回北京後，劉少奇不在他主持的常委彙報會上研究如何貫徹主席這個指示。在工作組受到革命小將較普遍的抵制以後，還不考慮是否工作組的工作有問題，反而同意了“排除幹擾”的極端錯誤的意見。如果是對毛主席的上述指示的意義不理解，為什麼不能按林彪付主席所指示的那樣，對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以後，陳伯達等同志一而再地提出撤銷工作組的正確意見，劉、鄧又根本聽不進去，未加考慮，即給回絕了，這又是怎麼樣的不尊重中央文革領導同志的不同意見啊！直至偉大的領袖毛主席回到北京，才親自決定有問題、沒問題的工作組一律撤銷，並在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親自扭轉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航道，親自寫出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最光輝的革命文獻“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和親自主持制定了偉大的革命的綱領“十六條”決定。

（三）劉少奇叫我去清華大學看大字報是六月十九日，那時他的意見是讓我去先看一次大字報，再參加工作組，補辦手續，如可以住，當晚可住女宿舍。我當晚沒住成，六月二十一日參加了工作組。雖然，他叫我去是為到第一線去鍛煉，

當時交代我：（1）下去同群眾一齊搞好文化大革命，經受鍛煉；（2）聯繫一個班或一個系；（3）反映些情況。但是，他為什麼在主席講過不要匆匆忙忙派工作組的指示以後，還同意我參加工作組，而又沒有向我傳達主席的指示。在七月二十左右，陳伯達同志曾找我談了一次話，除談了些別的問題以外，著重談了對外文委和廣播學院發生情況，說他們鬥了第一批揭校黨委的學生，並把他們訂成現行反革命分子還把他們的後臺追到林傑同志等人身上，並說這不是個別現象。我當時，不僅不覺悟到清華大學也犯了類似的錯誤，反而講了清華大學的情況與那兩個單位不一樣。我講了：我們工作組在不讓蒯大富同學上中央接待室，和以保護為名限制了他的自由，是錯誤的；但，蒯不是反校黨委的，對他進行批判還是必要的，而且我們也沒有把他訂為反革命分子，現在我們已進入批判校黨委等等。我堅持了我的錯誤看法，辜負了伯達同志對我的幫助。而在我後來簡單地向劉少奇報告了伯達同志找我談話後，劉少奇也沒有告訴我伯達同志曾提出過撤工作組的意見。

（四）在我參加清華工作組的四十多天裏，我幾乎是每夜回家住。我常常零碎地把我在清華大學接觸到的情況和意見和我個人的意見告訴劉少奇。劉少奇發表意見較少。除在一些具體問題上，劉少奇確實批評過我們，並鑒於我們在辯論中發生的問題，要我們擬出個辯論手冊，以保護少數有不同意見的人。但，他在我們搞“排除幹擾”，批判蒯大富同學等重大原則問題上，都沒提出不同意見，實際上，劉少奇是同意我們的基本做法的。直到知道中央文革有些同志對蒯大富同學的問題有不同意見時，他還集中看了清華工作組編輯的一些大字報選、清華工作組長的幾次講話，和清華工作組寫給周總理的關於蒯大富問題報告草稿，七月二十日左右還去清華大學看過一次大字報。直到七月二十四日，毛主席決定撤銷

工作組時，劉少奇和我還認為清華工作組是屬於錯誤不大那類的工作組，根本就沒認識到是他經過我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一個典型。

我講上面這四個方面，來說明對清華大學工作組在文化大革命犯嚴重錯誤中，劉少奇所負的責任，並不是想推卸我的責任。因為，我所經常反映的情況，多來自工作組領導、當時我們所依靠的積極分子和我個人的意見，而我反映的錯誤情況和意見，恰恰同劉少奇在當時他所主持的中央常委彙報會上聽到的情況和意見比較一致，因而使他同意和批准了一些重大的錯誤意見。在這方面，我是起了壞作用的。

關於我犯嚴重錯誤的根源，幾次檢查已講過，根本的是資產階級世界觀沒有得到改造。沒話可以再講，只有今後進行脫胎換骨的改造。

三、關於戚本禹同志“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那篇文章的看法。

我上次已寫過材料。

戚本禹同志是個很好的同志、是一個堅定的革命左派，我讀過他幾篇非常出色的文章和報告。“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這篇文章對反動影片“清宮秘史”批判得非常好，從三個根本方面：怎樣對待帝國主義的侵略、怎樣對待義和團的革命群眾運動、怎樣對待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批得深、批得透、擊中要害。文字寫得非常生動。

關於劉少奇是否說成反動影片“清宮秘史”是愛國主義的問題，我過分地相信了我自己和劉少奇。覺得他不可能說過這個話或給過這樣的評語。這是我的錯誤。

劉少奇看這部影片時，是已在北京上映完畢，據動員他看的人說第二天就要拿走。我怎麼也想不起是什麼人動員他看的了，而看前和看時也沒有人向他反映過對這部影片有爭論，更不知道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的江青同志對這部影片

已提出嚴厲的批判。現在我仍然想是否有可能是讚揚和欣賞這部反動影片、反對江青同志正確批評的人，故意動員劉少奇看的。而劉少奇看了沒講話，他們也就用劉少奇來抵制江青同志。

即使劉少奇沒講過反對影片“清宮秘史”是愛國主義的，劉少奇在這個問題上也是有嚴重錯誤的。

（一）雖然只看了前半部，為什麼沒有看出這是部反動影片，和不應讓這樣壞的香港影片在全國上映、毒害人民。他過去看電影和看其他文娛節目，很多次都是別人或我和孩子們在他因病休養時或工作較多時要他休息一下而動員他看的。這種情況下確實我講過選些輕鬆愉快的片子給他看，而不是讓他審查片子。對一些很壞的影片他也提出過批評，但，大多數他都不發表態度。而鑒於他當時在黨內工作的身份，他一看過，別人就可以說劉少奇看過或審查過，而造成不好影響。在這方面，我認為有兩大錯誤：（1）對於電影、戲劇……是很重要的階級鬥爭的武器，不是無產階級政治掛帥，就是資產階級政治掛帥，不是無產階級的宣傳武器，就是資產階級的宣傳武器，長期認識不夠。在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後，雖認識有所提高，卻沒有引出應有的教訓。（2）我曾長期有過這種想法，對我們一般黨員、群眾和我的孩子們應多看受無產階級教育的片子，而對我們的一些負責幹部，他們似乎不會受不好的文藝節目的壞影響和腐蝕。他們看看各國、各種影片和文藝節目，可以幫助他們瞭解各國的、各階級的動態。好象看“內部參考資料”一樣。劉少奇可能也有這種錯誤想法。

（二）在毛主席“關於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中，明確提出“被人稱為愛國主義影片而實際是賣國主義影片的《清宮秘史》在全國放映之後，至今沒有被批判。”以後，為什麼劉少奇不找當時主管文藝電影方面的負責人調查是誰稱讚了這部反

動影片，並阻撓了對它的批判。為什麼不請示毛主席是誰稱讚了這部影片，並就應該如何對這部影片進行批判請主席指示。據揭發材料講，毛主席以後還講過這個問題，劉少奇一直未領導和組織對這部影片的批判，確實到了雷打不動的程度。對待毛主席的指示，採取這樣不認真的態度，不管他講有什麼理由，也是不能容忍的。

劉少奇在許多報告和講話中，雖然也多次講過思想戰線上社會主義革命的重要性，宣傳工作是一條非常重要的革命戰線；但，他對文藝戰線的階級鬥爭不僅不抓緊，反而由於我上述他的種種錯誤態度造成了文藝界資本主義思想大氾濫，這裏也可以看出劉少奇的資產階級世界觀也是沒有得到根本、徹底改造的。

四、關於“和平民主新階段”。

劉少奇曾在一九四六年初，做過一個關於“和平民主新階段”的報告，這個報告，我沒有聽過，也沒有聽過傳達。根據揭發，和八月三日鬥爭我的大會上，一位革命群眾叫我念一些內容來看，劉少奇對當時形勢的估計是極端錯誤的，說什麼一個“和平民主新階段”將要到來，鼓吹議會道路，散佈對國民黨匪幫的和平幻想，說要對我們的軍隊採取整軍，並改變我黨對軍隊的領導形式等等。我現在認識到劉少奇的報告是極端錯誤的，造成了很壞的影響，不僅是講錯話的問題，整個講話的精神是極端錯誤的，是右傾投降路線錯誤。而過去我曾認為這是一篇分析當時國內外形勢、和對我黨當時面臨的形勢和整個工作的安排的報告；而這樣重要的報告，關係到我們全黨工作形式的改變，劉少奇怎麼可能不經過黨中央討論，而只講他個人的意見呢？當時，舊政協才開完，停戰協定剛發表，我黨和國民黨匪幫均分別發表了停戰命令。我曾想是否在多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結束後，國內外均有許多國要求和平，我黨為了爭取政治上的主動，抓住和平、民主

的旗幟。如果，由於國內的因素和國際的因素，由於國際國內大勢所趨和人心所向，經過我黨的努力，使蔣匪幫還不敢發動全面內戰，或拖延內戰爆發時間，或只限於局部的範圍內，這種可能性是有的。如果，經過我們努力而國民黨匪幫仍膽敢發動全面內戰（這是它的本質決定的，而且它對反共內戰從來沒有停止過），將更清楚地在全中國人民和全世界人民面前暴露了它們的反動面目。所以，當時，我黨曾提出和平、民主、團結三大口號，並分析國民黨在內外壓力下，可能在談判後，有條件地承認我黨的地位，我黨也有條件地承認國民黨的地位，造成兩黨合作、和平發展的新階段，並準備如果這種可能出現，我黨應努力學會合法鬥爭的一切方法。而且準備做一些讓步，如讓出一些解放區、公平合理地整編全國的軍隊，……。在我黨採取了這些妥協後，如果，國民黨還要發動內戰，它就在全世界面前輸了理，我們黨就有理由採取自衛戰爭，擊破其進攻，堅決徹底乾淨全部消滅它。我們偉大的毛主席赴重慶參加談判是取得巨大勝利的，在全中國人民和全世界人民中間，毛主席和我們黨的威信大大上升。在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著作中，在講到國共談判時，除了講“反對中國內戰，主張和平、民主的，不只是我們解放區的人民，還有大後方的廣大人民和全世界的廣大人民，”從來都強調蔣匪介石和國民黨匪幫的本質就是要堅持獨裁和消滅共產黨的。“他來進攻，我們把他消滅了，他就舒服了。消滅一點，舒服一點，消滅得多，舒服得多；徹底消滅，徹底舒服”。“人家打來了，我們就打，打就是為了爭取和平”。“人民的武裝，一枝槍、一粒子彈，都要保守，不能交出去”。“絕對不要依靠談判，絕對不要希望國民黨發善心，它是不會發善心的”。那個時期，為了爭取全國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同情，在公開的講話、協定、命令……中，我們黨著重表示我們堅持和平、民主的願望，是正確的，對革命事業是有利的。劉少奇做內部報告卻

只講談判、議會道路一種可能性，而不講兩種可能性；而把工作部署和工作方式完全按可能存在一段“和平民主新階段”去安排；既散佈了和平幻想，又給我們的實際工作造成嚴重損失；在政治上是完全錯誤的，是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如果，他做這個報告，並沒有經過黨中央的討論和批准，那麼，在組織上也是極端錯誤的。怎麼能對這樣關係全域的形勢分析和全部工作安排的報告，擅自去講呢！也太膽大妄為了。

基於上述我曾存在一些錯誤的看法和認識（即這樣重要的報告，不可能不經過中央討論等），在革命群眾追問我時，我的答復，必然起了為劉少奇辯護的作用，這是我的嚴重錯誤。

五、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

（一）在一九五零年或一九五一年初，山西省的王謙有個“把老區互助組提高一步”的報告，劉少奇看後，加了個極端錯誤的批語，發給了馬列學院第一班畢業生。批語中說“把農業互助組提高到農業合作社，以此做為新因素，去戰勝農業的自發因素。這是一種錯誤的、危險的、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這個批語是完全違背了毛澤東思想的。據我回憶，他當時的工作和思想情況。他正組織和領導廣大新解放區的土地改革運動，強調打倒地主，有的地方搞的是清匪反霸鬥爭，使貧下中農翻身，保護農村資本主義——富農，以穩定中農，有利於農業發展，並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以孤立最主要的敵人：美帝為首的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他那時滿腦子廣大新區的情況，而且贊成保護富農。使他完全忽視了在老解放區把互助組提高到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極重要的示範作用。他的這個批語是典型的右傾機會主義思想。

（二）在組織合作社問題上，一九四九年——一九五二年他比較注意強調先

組織供銷合作社。強調了在流通環節上的合作化的重要，而忽視組織生產合作社是錯誤的。強調農業社會化的步驟，必須和以國有企業為主體的強大的工業的發展相適應，有了強大的重工業，有了農業機器，才能組織集體農莊，搞農業社會化，因而對農業社會化曾認為需要很長的時間和細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因而，對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發展計畫一直是保守的。

(三)在一九五五年上半年，廣大農民群眾走合作化道路的積極性空前高漲，合作社的發展速度大大地超過了原定計劃。在這種新鮮事物的大大發展中免不了出些偏差，也是不難糾正的。而當時有些輿論反映認為合作社發展太快了，引起不少問題。在一次劉少奇主持的西樓的中央常委彙報會上鄧子恢集中了反映了這種意見，認為合作社的大發展“超過了實際可能”、“超過了群眾的覺悟水準”、“超過了幹部的經驗水準”等等錯誤論調，劉少奇不僅對此沒有痛加駁斥，反而同意了對農業合作社“適當收縮，停止發展”的錯誤方針，因而就發生了砍掉二十萬個合作社的嚴重情況。大大挫傷了廣大貧下中農和農民群眾的社會主義積極性。這是劉少奇要負責的。

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在各省、市、區黨委書記會上做了“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這是馬列主義關於農業改造方面的第一部最完整、最系統、最正確的天才的偉大著作，狠狠地批判了右傾機會主義思潮，提出了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一整套理論、路線、方針和政策。大大推動了農業合作化的發展，具有極偉大的意義。過去，我學過主席這篇光輝著作，以為主要是批評鄧子恢等的，並曾以主席指示，在支部檢查了我們自己的糊塗認識。最近，我又重讀了主席這篇光輝著作，結合大字報上的揭發和批判，才認識到主要是批判劉少奇為代表的在農業合作化問題上的右傾機會主義思想的。毛主席尖銳地批

判了某些同志過多的評頭品足，不適當的埋怨，無窮的憂慮，數不清的清規戒律，是指導農村中社會主義群眾運動的錯誤方針。對五億農村人口的大規模的社會主義的革命運動，“應積極地熱情地有計劃地去領導，而不是用各種辦法去拉它向後退。”並指示“要大膽指導運動，不要前怕狼，後怕虎。幹部和農民在自己的鬥爭經驗中將改造他們自己。要讓他們做，在做中間得到教訓，增長才幹，這樣，大批的優秀人物就會產生”。並批評了“超過了群眾的覺悟水準”是看見了較少量的富裕農民，忘記了最大量貧農和非富裕農民的錯誤思想。批評了“超過幹部的經驗水準”的論調，指出幹部的社會主義革命經驗，是要“用走進社會主義革命的鬥爭中去、在鬥爭中學習的方法去取得”。主席尖銳地批評了劉少奇等“不去看問題的本質方面、主流方面，而是強調那些非本質方面、非主流方面的東西”，“以致迷失了方向”。在這篇光輝著作中，偉大的毛主席發展了馬列主義，第一次提出，在農業方面，在我國的條件下，則必須先有合作社，然後才能使用大機器，對於農業社會化的步驟應當同社會主義工業化的步驟想適應的問題，有了很大的發展。毛主席並尖銳地批評有些同志從資產階級、富農、或者具有資本主義自發傾向的富裕中農立場出發，錯誤地觀察了工農聯盟這樣一個極端重要的問題。他們認為當時合作化運動的情況很危險，他們勸我們從當時合作化的道路上“趕快下馬”，“我們認為恰恰相反，如果不趕快上馬，就有破壞工農聯盟的危險，這裏看來只有一字之差，一個要下馬，一個要上馬，卻是表現了兩條路線的分歧”。這裏毛主席提出了路線的分歧。過去我一直以為是批評以鄧子恢等直接提出下馬的人，現在我認識到，那次西樓常委會，即是劉少奇主持的會上，未批駁鄧等謬論，而決定“適當收縮、停止發展”，就使鄧子恢等大加“發揮”而砍掉了二十萬合作社，造成了在農業合作社問題上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錯誤，應由劉少奇負指導思想上

的責任。我過去在革命群眾向我進行的面對面鬥爭時，說過砍二十萬合作社是鄧子恢幹的，而在一九五五年前，和主席關於農業合作社問題指示後，劉少奇對發展農業合作社還是積極的。這就是起了為劉少奇辯護的惡劣影響，是我的嚴重錯誤。

至於“剝削有功”的話，不論在什麼情況，在什麼地方，劉少奇講了這個話或有這個想法，都是極端錯誤的，是喪失無產階級立場和喪失共產黨立場的。

過去，有革命群眾置（質）問我時，我曾講過，劉少奇沒有直接講過這個話，而講過近於這句話的許多錯話。而且強調，他講這類話的時間、條件和作用。一九四九年黨中央搬進北京不久，大概是四月初，有同志反映，在天津有一種急於消滅資產階級的傾向，黨中央派劉少奇去解決。因當時，我們正大軍南下，京津剛解放不久，經濟上接收的是國民黨反動派留下的爛攤子，經濟上困難不小，所以，決定保存城鄉資本主義經濟。劉少奇在天津工作了一個月時間，在批評急於消滅資產階級的傾向和有一種不敢接觸民族資產階級，並講對國計民生有利的資產（本）主義允許發展時，講了許多錯話，做了錯事。有些話，孤立地摘錄來看，是喪失無產階級立場和喪失共產黨員立場的。

當有革命群眾置（質）問我時，我根據我的瞭解作過上述說明和解釋，似乎劉少奇天津之行是根據黨中央的委託，總的還是解決了當時的一些重要問題，只是說過錯話，做過錯事，起了為劉少奇辯護的作用。這是我的錯誤。

《揪劉戰報》首都各界無產階級革命派揪鬥劉少奇聯絡站

《揪劉戰報》編輯部增刊 1967 年 8 月 27 日 劉少奇檢查

1967年4月和7月，針對造反派的質疑浪潮，劉少奇曾有過兩次公開的書面“答辯”。這應該是劉少奇兩次絕無僅有的最後申辯，也是他生命死亡進入倒計時之前所做的最後抗爭！公開信答復北京建築工業學院“新八一戰鬥團”

1967年7月4日，中央辦公廳主任的汪東興，到中南海福祿居劉少奇住地，當面向劉少奇傳達了中央要他給北京建築工業學院師生寫一份檢查的意見。

劉少奇認識到，現在是要面對學生，徹底檢查在“文革”初期“形‘左’實右”的路線錯誤的時候了。7月9日，劉少奇給北京建工學院“新八一戰鬥團”寫了一份“檢查”，經汪東興交給了北京建工學院。當日“新八一戰鬥團”就在該校的校報上全文公佈了劉少奇的這個三千字的“檢查”，隨後傳抄至全國各地。

劉少奇在這個“檢查”中寫道：“1966年7月底，毛主席號召中央所有負責同志及各地來北京的負責同志都去親自參加北京各學校的文化大革命，我就是毛主席的這個號召下，在去年8月1日到李雪峰同志處同北京新市委的同志一起研究，我到哪個學校去。經過研究後，一致確定，我到建築工業學院去，李雪峰同志也決定一起去……”

劉少奇在“檢查”中說：“8月5日，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出來了，我才知道我在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犯了嚴重的錯誤。這時候，我已經感到我再不能過問建工學院的事。當天下午，我用電話告訴李雪峰，我以後不再去建工學院，也不再過問建工學院的事了。”

劉少奇在這個“檢查”中回顧了一年前毛澤東不在北京期間，他和鄧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時向北京大學派工作組的問題。劉少奇說：“毛主席不在北京時，是毛主席、黨中央委託我主持黨中央日常工作的。由於我在去年八月五日以前還不

理解我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犯了路線錯誤、方向錯誤，所以我到建工學院幾次講話中，都沒有主動承擔責任。……當時，我只是籠統地說，工作組在你們學校是犯了錯誤的。……在這裏，沒有說明我自己應負主要責任，也沒有說明，當時黨中央是毛主席不在北京，由我主持日常工作的黨中央。這樣，就模糊了當時所犯錯誤是誰應負主要責任……”

劉少奇這次“檢查”，雖然並沒有把他想說的心裏話都說透，不過，他還是向外透露了主持中央工作的隱衷，起到了廓清內幕的作用。





據實反駁戚本禹的“八個為什麼”

1967年4月1日，戚本禹在《紅旗》雜誌第七期上發表了一篇當時被稱為“討劉戰鬥檄文”的長篇文章《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反動影片〈清宮秘史〉》。

戚本禹在這篇長文的最後部分，提出了“八大質疑”，即後來被造反派稱為“重磅炸彈”並進而逼迫劉少奇公開表態的“八個為什麼”。這“八個為什麼”是：

一、為什麼你要在抗日戰爭爆發前夕，大肆宣揚活命哲學、投降哲學、叛徒哲學，指使別人自首變節，要他們投降國民黨，叛變共產黨，公開發表‘反共啟事’，宣誓‘堅決反共’？

二、為什麼你在抗日戰爭勝利以後，提出‘和平民主新階段’的投降主義路線？

三、為什麼你要在解放以後極力反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反對農業合作化，大砍合作社？

四、為什麼你要在社會主義三大改造完成以後，竭力宣揚階級鬥爭熄滅論，積極主張階級合作，取消階級鬥爭？

五、為什麼你要在三年困難時期，與國內外牛鬼蛇神遙相呼應，惡毒攻擊三面紅旗，鼓吹‘三自一包’、‘三和一少’的修正主義路線？

六、為什麼你要在一九六二年還重新出版過去那種不要革命、不要階級鬥爭、不要奪取政權、不要無產階級專政，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反對毛澤東思想，宣揚腐朽的資產階級世界觀，宣揚反動的資產階級唯心主義哲學的、欺人之談的大毒草《論修養》？

七、為什麼你要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提出和推行形‘左’實右的機會主義路線，破壞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八、為什麼你要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勾結另一個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提出和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4月6日晚，中南海一些造反派一路高呼口號地沖進劉少奇的辦公室。他們要求劉少奇必須馬上改變作息時間，勒令他必須自己做飯，自己打掃衛生和洗衣服，還把一張緊急通令送到了劉少奇面前。在這份通令中，造反派嚴厲要求劉少

奇必須在限定的時間內對戚本禹文章中提到的“八個為什麼”，作出明確的答復。

劉少奇接到緊急通令後，於4月14日作出如下回應：

你們一九六七年四月六日給我的緊急通令，限劉少奇在四月八日以前寫出書面檢查，具體回答戚本禹的文章中所提出的“八個為什麼”問題，現答復如下：

“一、一九三六年三月，我作為黨中央代表，到達天津（當時黨的北方局所在地），當時北方局組織部長柯慶施同志向我提出一個問題，說：‘北京監獄中有一批同志，他們的刑期，多數已經坐滿，但不履行一個手續，就不能出獄。’柯問我：‘是否能履行一個手續？’我當時反問柯：‘……你的意思如何？’柯說：‘可以讓獄中同志履行一個手續。’我即將此種情況寫信報告給陝北黨中央，請中央決定。不久就得到中央的答復，交由柯慶施同志辦理。當時黨中央的日常工作是張聞天處理，據張聞天交代，他當時沒有報告毛主席，也沒有在會議上討論，就由他擅自做了答復。當時我知道獄中有殷鑒同志，其餘的人都不認識，也不知道有多少。以後如何辦理的，我也不知道。殷鑒同志出獄後，已是一九三七年春，我在柯慶施同志家裏見過一次。不久，殷鑒同志因病去世了。他們具體履行了什麼手續，我沒有過問。最近我看了造反報，才知道他們登了‘反共啟事’，對於這件事，我負有一定的責任。”

“二、抗日戰爭勝利後，一九四六年一月，我黨同國民黨達成了停戰協定，以後又召開了舊政協會議，通過了‘和平建國綱領’，在一月十二日，我黨在停戰命令上就提出了‘和平民主新階段’。二月一日我根據中央討論的意見，寫了一個‘關於和平民主新階段’的指示，這個指示是有錯誤的。”

“三、在解放後，我極力主張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沒有反對。一

九五一年，我批了山西送來的有關農業合作社的幾個檔，批是錯誤的。一次中央會議上，聽過鄧子恢關於合作社問題的報告，沒有批駁他的錯誤意見，他就大加發揮，砍掉了二十萬個合作社，以後毛主席批評鄧子恢的錯誤，發表了關於農業合作化的很重要的文章，掀起了農業合作化的高潮。”

“四、一九五六年黨的八次代表大會，我代表黨中央向大會做了政治報告，是講了國內階級鬥爭的重要形式，是反映國內主要階級矛盾……進行‘三反’、‘五反’鬥爭，是因為有許多資產階級分子進行有害于國計民生的非法活動，不能不堅決加以制止。但是在這個報告的另一個地方說：‘我國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已經解決了’，這句話是錯誤的。八大關於工作報告的決議也說：‘現在這種社會主義改造已經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這是說明我國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矛盾已經基本解決，幾千年來的階級剝削制度的歷史已經基本結束。社會主義制度在我國基本建立起來……我國國內主要矛盾就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決議的這些說法毛主席當時就反對，但已經來不及修改。此外，在八大政治報告和決議中都沒有提出毛澤東思想是全黨的指導思想，是全黨全國的指導方針，這是錯誤的，是同七大的立場遲了一步。”

“五、三年困難時期我沒有攻擊三面紅旗，在一次中央會議聽見鄧子恢說安徽‘責任田’有許多好處的話，我沒有批駁他，他就到處亂講。‘三和一少’是個別同志提出初稿，尚未提到中央會議上來，當時我尚不知此種意見出籠，事後是從那個同志保險櫃裏拿出來的。”

“六、一九六二年，《論修養》再版是有人推薦，有人替我修改的。我看過在《紅旗》和《人民日報》上發表了，我應負主要責任。”

“七、一九六四年夏，我在幾個城市作過講話，其中有形‘左’實右的傾向。在去年七月二十三日我在檢查中已作詳細說明，不必重複。桃園經驗當時是較好的，不是形‘左’實右的典型。”

“八、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我為什麼提出和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我現在也還不知道為什麼，也沒有看到一篇能夠完全說清楚為什麼犯錯誤的文章。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批判了我的錯誤之後，又有人犯同樣性質錯誤，可是他們也不知道為什麼。我將努力學習毛主席著作，閱讀毛主席指定我要讀的其他書籍和報刊的有關文章，以便能夠完全在思想上弄清楚這個問題，並且認真地在革命群眾實踐中加以檢驗。那時我才能答復我為什麼在這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犯了路線錯誤，又如何改正這個錯誤。”

“答辯”材料寫好後，劉少奇要工作人員儘快把“答辯”原件送交中南海造反派，還特別叮囑一定要讓更多群眾瞭解“八個為什麼”的事實真相。這樣，工作人員就按劉少奇的意思，把他的“答辯”抄成了幾張大字報，然後在中南海的大字報棚裏張貼出來。

三個小時後，劉少奇這份大字報就被一群造反派當場撕得粉碎。（本文摘自黨史博覽）

向南海衛東革命造反隊的檢查

劉少奇（1967年4月14日）

南海衛東革命造反隊的同志們：

你們一九六七年四月六日給我的緊急通令中第二條限劉少奇於四月十日以前寫出書面檢查，具體回答戚本禹同志的文章中所提出的八個“為什麼”的問題。

現答復如下：

1·一九三六年三月，我作為黨中央的代表到達天津（當時黨的北方局所在地），當時北方局的組織部長柯慶施同志向我提出了一個問題，說：北京監獄中有一批同志，他們的刑期多數已經坐滿，但不履行一個手續，就不能出獄。柯問我是否可以履行一個手續？我當時反問柯，你的意見如何？柯慶施同志說，可以讓獄中的同志履行一個手續。我即將此種情況寫信報告陝北黨中央。請中央決定。不久就得到中央答復，並接到由張聞天簽字的獄中幹部提出的三個請求條件。獄中同志看了，知道這是中央同意這樣辦的。我將中央的答復交由柯慶施同志去辦理。當時黨中央的日常工作是張聞天（又名洛甫）處理，據張聞天交待他當時沒有報告毛主席，也沒有在會議上討論，就由他擅自作了答復。當時我只知道獄中的殷鑒同志，其餘的人都不認識，也不知道多少人。以後如何辦的，我也不知道。殷鑒同志出獄後，已是一九三七年春，我在柯慶施同志家裏見過一次。不久殷鑒同志因病去世了，他們具體履行什麼手續，我未過問，最近看到造反報才知道他們登了反共啓事。對這件事，我負有一定的責任。

2·抗日戰爭勝利後，一九四六年一月我黨同國民黨達成了停戰協定。以後又召開了舊政治協商會議，通過了和平建國綱領。在一月十日我黨的停戰命令上，就提出了“和平民主新階段”。二月一日，我根據中央討論的意見寫了一個關於“和平民主新階段”的內部指示。這個指示是有錯誤的。

3·在解放後，我極力主張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沒有反對。一九五一年我批了山西送來的有關農業生產合作社的一個文件，批是錯誤的。以後在一次中央會議上聽過鄧子恢關於合作社問題的報告，沒有批駁他的錯誤意見，他就大加發揮，砍掉二十萬個合作社。以後毛主席批評了鄧子恢的錯誤，發表了關於農業合作化的很重要的文章，掀起了農業合作化的高潮。

4·一九五六年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我代表黨中央向大會作政治報告，是說了國內階級鬥爭的，例如說：限制和反限制的鬥爭是近幾年來，我國內部階級鬥爭的主要形式，它反映著我國國內主要的階級矛盾——“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矛盾”……進行“三反”“五反”鬥爭，是因為有許多資產階級分子進行了有害於國計民生的非法活動，不能不堅決地加以制止。但是，在這個報告的另一個地方說：“我國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誰戰勝誰的問題，現在已經解決了。”這句話是錯誤的。八大關於政治報告的決議也說：“現在這種社會主義改造已經取得決定性的勝利，這就表明，我國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已經基本解決，兒千年來階級剝削制度的歷史已經基本結束，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在我國已經基本建立起來。”“我國國內的主要矛盾……就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後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決議的這些說法，毛主席當時就表示反對，但已來不及修改，就這樣通過了。至今未改。此外，在八大的政治報告和決議中，都沒有提出毛澤東思想是全黨的指導思想；是全黨全國一切工作的指標。這是錯誤的。是從七大的立場上退了一步。

5·三年困難時期，我沒有攻擊三面紅旗。在一次中央會議上聽見鄧子恢說安徽實行的責任田有許多好處的話，我沒有批駁他，他就到處亂講。“三和一少”，是個別同志提出初稿，尚未提到中央會議上來，當時我尚不知有此種意見出籠。是後來從那個同志的保險櫃中拿出來的。

6·一九六二年“修養”再版，是有人推薦，有人替我修改的，我看過，在《紅旗》、《人民日報》上發表了，我應負主要責任。

7·一九六四年夏，我在幾個省市作講話，其中有形“左”實右的傾向，在去年十月二十三日我的檢查中已作了詳細說明，不必重復。桃園經驗在當時是比較

好，不是形“左”實右的典型。

8·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為什麼提出和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我現在也還不知道為什麼？也沒有看到一篇能夠完全說清楚為什麼犯路線錯誤的文章。在八屆十一中全會批判了我的錯誤之後，又有人犯同類性質的錯誤，可見他們也不知道為什麼。我將努力學習毛主席著作，閱讀毛主席指定我要讀的其他著作書籍和報刊的有關文章，以便能夠完全在思想上弄清楚這個問題，並認真地在革命群眾實踐中去加以檢驗。那時我才能答復我為什麼在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犯了路線錯誤，又如何改正了這個錯誤。

此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敬禮！

偉大的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

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毛主席萬歲！萬萬歲！

劉少奇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四日

中共中央關於批判劉少奇《修養》的通知

中發〔1967〕153號

各革命委員會，各軍區，各級黨委，各革命組織：

五月八日，紅旗雜誌編輯部和人民日報編輯部發表的“《修養》的要害是背叛無產階級專政”，是經過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討論通過，並經過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批准的重要文章。這篇文章擊中了《修養》一書的要害，也擊中了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要害。通篇用擺事實，講道理的方法，在一個革

命的根本問題上，大破修正主義，大立毛澤東思想。希望各單位的革命同志，認真地組織學習和討論，進一步深入地開展對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大批判運動。

中共中央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一日

第八節 三審王光美

1967年4月10日，清華大學召開三十萬人的批鬥王光美大會。是日清晨，清華大學紅衛兵驅車入中南海把王光美押到清華園主樓七層的一間會議室裏。王光美一進去，數十名紅衛兵高聲朗讀毛主席語錄，並伴以一陣陣高聲質問。

因為王光美陪同劉少奇訪問印尼時穿過旗袍，戴過項鍊，被定為“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紅衛兵強迫王光美穿上顯然瘦得不能穿的旗袍，套上用乒乓球特製成的一串“項鍊”在批鬥會上亮相。當王光美被押上會場時人群譁然。從北京各處趕來參加大會的人爭相擁看王光美。

批鬥會結束後，“紅代會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的《井岡山》小報出了專刊，登載了一篇《三審王光美》的文章。以下是這篇文章的部分摘錄。

第一次審問

地點：清華中央主樓。

時間：1967年4月10日晨6點半左右

問：劉少奇為什麼說《清宮秘史》是愛國主義的？

答：我從來沒有聽少奇同志講過這個片子是愛國主義的。少奇同志肯定沒有講

過。我相信毛主席，毛主席總會調查清楚的。

（同學們要她穿上去印尼的衣服鬥，王光美不幹。）

問：這衣服你一定要穿上！

王：就不穿！

問：穿也得穿，不穿也得穿。

王：反正我不穿。

問：告訴你，今天是鬥你。不老實，小心點。

王：我們好好談談好不好？

問：誰跟你談？告訴你，今天是鬥爭你。

王：反正你們不能侵犯我的人身自由。

問：（哄堂大笑）你是三反分子老婆、反動的資產階級分子、階級異己分子，別說大民主，小民主也不給，一點也不給，半點也不給。今天，是對你專政，沒有你的自由。

王：這是綢子的，太冷了。

問：“凍死蒼蠅未足奇。”

王：如果我真的反毛主席，那凍死就活該。

問：你就是反對毛主席。

王：我現在不反，將來也不反。

問：不行！都穿上。

王：你們沒有這種權利。

問：我們就有這個權利！今天是鬥爭你，我們要怎麼鬥就怎麼鬥，沒有你的自由。你那套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臭理論收起來吧。我們是革命群眾，你是反革

命臭婆娘，你混淆不了階級陣線。

（時間到，捉鬼隊員給王光美穿妖衣。）

王：你們武鬥。你們違反毛主席指示。（眾念：“革命不是請客吃飯……”）

王：誰反對毛主席指示就……（被打斷。）（眾念：“頑固分子，實際上是頑而不固……”）

王：你們用強制手段。

問：胡扯！是你侮辱我們。你穿上這套衣服去印尼與蘇加諾吊膀子，丟盡了中國人民的臉，你侮辱了全中國人民。你還想倒打一耙？對你這個反動的資產階級分子、清華園的頭號大扒手，對你就是要強制。

王：希望你們好好調查一下。

問：我問你，“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是誰幹的？

王：真正的革命者是勇敢的，是勇於正視事實的。……反正“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肯定不是我，也不會是揚天放。誰是真革命的，誰幹的誰自己承認。是誰說清華園是黑窩的，是誰說寧可懷疑 99 個也不放過一個黑幫……真正的革命者就要敢於站出來，誰幹的誰自己承認。

問：你說，為什麼打擊基層幹部？而何東昌倒在香山休養，劉冰、胡健在北京飯店，蔣南翔，同學們提了多少回，你們就是不鬥。

王：問我不知道，北京飯店是在開會。蔣南翔的情況我是反映了，中央有同志批示（我不能說是誰）不讓拉回來鬥。

問：派工作組的目的是什麼？

王：同意派工作組是當時中央常委會決定。當然毛主席不在，劉少奇在負主要責任。但真正他派的，只有我一個人。

問：就你一個人就打多少革命群眾成反革命？害了多少人？

王：我們沒有定一個反革命。

問：你賴不了“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的事實。

王：事實總是事實，應該根據事實得出結論，這才是毛澤東思想。

問：不對。立場是主要的。你們站在反動的立場上就是看革命群眾的陰暗面，反對文化大革命。我們看的事實，收集到的事實就是和你不同。

王：現在有人推卸責任……。如果是真正的革命左派應敢於承認事實。懷疑一切是錯誤的，是誰提出的？

問：你們懷疑一切，打倒一切革命群眾幹部。

王：反正“懷疑一切”不是我的思想，更不是劉少奇的思想，我們是反對懷疑一切的。

問：（氣急、罵）大扒手、反動資產階級分子，給中國人民丟臉！揭事實。

（給蘇加諾點煙）

王：我認為我沒丟臉。那天是告別宴會，他坐在我旁邊，我是女主人……應尊重印尼習慣。

問：你說，你把多少同學打成反革命。我們這裏就有不少。

王：我們只批過，沒有打成反革命。

問：誰讓你反“假左派”的？

王：不是劉少奇。是工作組問我，是葉林，揚天放，他們說蒯大富寫了一個奪權的批語，還有反映了與現在根本不同的片面情況，我就根據這些同意了。

問：劉少奇做了什麼指示？

王：劉少奇對清華的指示很少。

問：那你賣菜是誰讓幹的？撈政治資本。

王：那是毛主席對劉少奇說：“王光美為什麼過去四清時‘三同’，現在不‘三同’啦？”主席說：“可以參加勞動，這樣可以接受批評。”我聽了很感動，就去勞動了。

問：那你老老實實勞動啊！為什麼三個飯廳去賣菜？

王：走三個飯廳，不是因為接觸面更廣嗎？

問：你回答：“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到底是誰推廣的？

王：的確不是劉少奇。

問：蒯大富是誰定的反革命？

王：與劉少奇無關，也肯定沒定反革命。

問：你交待，保蔣南翔是誰指示的？

王：蔣南翔性質未定的話是我講的。但你們前後的話都不講，只講這句是斷章取義。

問：同學們對蔣恨死了，你卻說性質未定，不讓鬥，這不是保他是什麼？你知道不知道？

王：我不知道。你們試試看，將來你們的工作中不要犯錯誤。

問：你對批判《修養》怎麼看？

王：這本書是唯心的，不談階級鬥爭。我同意報上發表的《紅旗》評論員文章的幾句話。至於反毛澤東思想，主觀上我是不同意，是世界觀沒有改造好。

問：你對戚本禹同志批《清宮秘史》的文章怎麼看？

王：這部片子是徹頭徹尾的賣國主義的，戚本禹同志批得很深很對，這部片

子劉少奇沒有說是愛國主義的。我和他一起看的，當時只看了一半，以後天亮了看不清了，他什麼也沒說。這是肯定的，他沒說過。我和他一起看的，我知道肯定沒說過。

問：照你這麼說戚本禹同志在造謠了？

王：是不是另外有人假借劉少奇的名義說過這些話？

問：你覺得這篇文章說得對不對？這是毛主席看過的！

王：是嗎？毛主席看過的嗎？我覺得還是從革命利益出發，從事實出發，如實向毛主席彙報情況。

問：戚本禹同志文章針對的誰你清楚嗎？

王：那他提的的確是劉少奇。

問：你對戚本禹同志提出的問題怎麼看？

王：有的是劉少奇的責任，有的不是劉少奇講的。

問：那麼《紅旗》上在造謠？劉少奇不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

王：相信毛主席，相信群眾，過去就是相信不夠才犯了錯誤。我在劉少奇身邊工作了十幾年，我覺得有出入，反正有許多不是劉少奇的事。說他是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我直接沒感到這一點。

問：那叫叛徒集團自首是怎麼說的？

王：這不是他指示的，是一個負責同志提議他同意過的。

問：是誰？

王：我不說。

問：你包庇！快說。

王：（沉思一會）是柯慶施建議的，劉少奇同意的了。

問：（氣憤）不許你污蔑柯老！

王：反正我說話你們不相信，你們可以去調查好了。

問：王光美你說，你對劉少奇是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怎麼看？

王：我主觀上還認識不到這個水準。反正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以前主席許多事情委託劉少奇、書記處處理，發生的事他要負責，但現在他靠邊站了，不負責了，不當權了。在反動路線時他是走過一段資本主義道路的。

問：就是反動路線這一點？

王：當然不止。凡是犯路線錯誤都走資本主義一段道路。

問：就按你的這種說法，你說說看，劉少奇走過那些資本主義道路？

王：山西老區互助組的批示，是錯的，是他批的。合作社發展太快，他求穩，說要慢一點。1962年他對困難的估計過份。“三自一包”、“四大自由”謬論他是不贊成的，單幹也是不贊成的。他那時許多時刻還是堅持社會主義的。

問：劉少奇宣揚“紅色資本家”，說剝削好，也是主觀上走社會主義道路嗎？

王：劉少奇是講了很多錯話，你們是指他1950年在天津的講話，當時我也在，我知道的，有許多話是很錯誤的。當時天津有一種過“左”情緒，不少人要消滅剝削階級，是毛主席派他去糾偏的，他一些話是糾偏講的。現在大字報上的話與他講的有出入。

問：這麼講，說“工人就得剝削”是對嗎？

王：有些是錯的。有的這樣講是對的，有的這樣講不好。這不能脫離環境。比如一個資本家與他座談，說剝削是罪惡，那開一個工廠就大罪，再開一個工廠罪就更大了。劉少奇說只要對國富民強有好處，開廠剝削，這樣的剝削是需要的。

工人也需要這樣的剝削。這是在特定條件下講的，現在有人砍頭去尾地講這句話。

問：那鼓吹和平民主新階段，散佈對蔣介石的迷信是誰呢？

王：那不只他一個人。根據報紙上的報導，絕不是一個人的責任，停戰協定（決議）上寫“和平、民主”很明顯嘛。他現在把責任擔起來，勇於承擔責任。

（眾笑：這麼說他還是英雄了？就是勇於承擔責任嗎？）

問：那你說，還有誰？

王：不用說了吧？

問：不行！迷信蔣介石的人要查出來。

王：我是中央工作人員，要保密。你們可以去查查報紙，有公開文章的！

問：那劉少奇貪汙金皮帶圈、金鞋拔呢？

王：金皮帶圈、金鞋拔子是有這麼回事。他做白區工作，隨時有被逮捕危險，是應該身上帶些東西的。

問：“紅色資本家”是誰提的？

王：不知道！反正不是劉少奇，他只說進步資本家。

問：你是否說過王光英這個大資本家好，還要拉他入黨？

王：王光英不是大資本家，最多是中產階級，民族資本家。他剝削是剝削，可是……你們可以調查一下，他是否可以起進步資本家的作用。他不願當資本家，說資本家名聲太臭，要求入黨，黨給他任務，讓他做資本家的工作。

問：你現在對劉少奇怎麼看？

王：說他一輩子反革命，不反資本主義，我沒有充份材料。

（同學們要她戴上項鍊。）

問：你說！江青同志叫你出國不要戴項鍊，你為什麼非要戴上？

王：江青同志是要我不要帶別針，沒說戴項鏈的事，但問題是一樣的。

問：那你說紅旗調查員的文章怎麼樣？

王：紅旗調查員的文章……（不語。同學吵，逼後，大聲嘶叫。）有很大的片面性。

問：好，記下來。

王：記就記，我說的，怕什麼！“懷疑一切”肯定不是工作組搞的，更不是劉少奇搞的。清華，我們的問題肯定是右傾主義，是路線錯誤，我們是右傾不是形“左”實右。反正這“懷疑一切”不是工作組搞的，我沒有這個思想，劉少奇也沒有這個思想。

問：那你說是誰？

王：反正有人。

問：無恥！矇騙人家還誇耀。現在誰都看透你這個反動的資產階級分子的本質了。

王：我不是反動的資產階級分子，我是毛主席的共產黨員。真理就是真理，可能是有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影響。

問：你敢否定革命小將？

王：真正的愛護小將，應該是什麼就說什麼，不能歪曲事實來愛護革命小將……（被打斷。眾：你放毒！）如果你們擺事實講道理，就讓我把話說完。毛主席說：壞話，好話，反對的話都要聽，要讓人把話說完，你們要不擺事實不講道理，那我就不講了，你們鬥吧！

問：我們就是要鬥你這個反動的資產階級分子，清華園的大扒手。

王：我不是。我是共產黨員。

問：你不要給我們的黨臉上抹黑了。幹的醜事不少啦！桃園四清你幹了些什麼？

王：對四清材料你們瞭解多少？你們都找什麼人瞭解？你們下去五天，我待上一年了，比你們瞭解，你們要認真調查。

問：去你的。桃園經驗臭透了。一會兒你聽聽。

王：桃園經驗是好的，不是壞的。但有缺點有錯誤。

問：（大夥恥笑她）有功，有功。那麼“後十條”看來也是好的，有缺點、有錯誤吧？

王：“後十條”是劉少奇改的，有些清規戒律，但精神是好的，是毛主席叫他改的。

問：這麼說“後十條”棒極了？

王：“後十條”有好的部份，但有形而上學，繁瑣哲學，一些政策界線強調得過多，成了清規戒律，束縛了群眾運動。

（群眾氣極，給她打扮後照相。）

王：謝謝你們。你們不應該侮辱我。

問：劉少奇是鎮壓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禍首，你認為怎麼樣？

王：（避而不答）他是要負主要責任的。六、七月份是他幹的，但以後就不能歸他。

問：歸誰？你說！

王：他路線錯誤有影響，不能全歸他，他有責任。

問：蒯大富反革命案很久翻不過來，誰負責？

王：蒯大富反革命不是劉少奇定的，劉少奇沒跟我說過蒯大富是反革命。

問：他在《修養》中大罵有人要全黨尊重他……是指誰？

王：那是什麼時候出版的？他不是罵主席，那是指洛甫。

問：那 1962 年再版時為什麼不修改？反而把史達林都刪了？

王：那不知道。他是堅決反修的。他改的地方有檔案在，你們有條件就去查。毛主席說要出“劉選”，他不積極，後成立編輯委員會，要他修改出書，他看過一遍，有的是編輯委員會改的，他沒注意，你們可以去查嘛。我知道，他是不反史達林的，“***”，“兩論”，他都參加起草的。

問：戚本禹同志的文章你怎麼看？

王：批這電影很對，該批。

問：不對，要害是揭開了“老革命”的畫皮，暴露了假革命、反革命的本質。

王：“言者無罪，聞者足戒。”

問：胡說！你頑固到底死路一條。我們就是要把劉少奇拉下馬！

王：拉下馬我同意，別人領導比他對黨更有利。

問：王光美，你對戚本禹同志提出的幾個問題怎麼看？（念戚本禹文章最後幾個問題。）王：一，沒講過。我不知道。（指老革命遇到新問題、瘋狂進行資本主義復辟、倡狂反對毛主席三個問題。）二，我等待毛主席講話，等毛主席講最後一句話。劉少奇並不是夢寐以求資本主義，他想搞社會主義的，說倡狂復辟不是那樣，願意搞社會主義的。他特別談了防修、反修、反資本主義復辟的問題，他經常想，但想不出辦法，無辦法，沒有水準，無魄力象毛主席那樣搞文化大革命。他是考慮避免修正主義復辟的。我認為他最大的錯誤是沒有提倡全黨全民大學毛澤東思想，從他的地位、重要性、毛主席對他的信任來看，應很早就提出的，

但他一九六六年才提出，這是他最大的錯誤。三，他沒有反對毛主席，更沒有什麼倡狂。他有違反毛澤東思想的地方，有不少是世界觀問題。四，他沒有大肆宣揚。他是想保存革命有生力量。當時白區損失極大，日本人又要進攻，因為一些人不知名，影響又不大，就讓他們自首了。北京 61 人，天津幾十個人。至於自首書的措詞，什麼“堅決反共”，他不知道的。五，起草的檔，中央是看過的，當然他要檢討，但同一個檔他提出過積極練兵。當時這些是可能造成不好的影響。六，他反對資本主義改造？沒有！在天津講話是錯誤的，但改造資本家他是積極贊成的。合作社問題他是同意過一些同志的意見，主要是鄧子恢幹的。七，八大報告有缺點。但是這並不是他一個人的問題。八大決議好像也有錯誤。……主席沒看過？……這是很匆忙的，劉少奇決議好像也看得很匆忙。不過檔出來很久了，毛主席、黨中央未表態。八，這不是劉少奇說的。他只是對困難估計過份了。可能是會助長歪風滋長。九，劉選編委會叫他審查的，他對此不積極。十，他是過份強調了階級鬥爭，過份強調了紮根串連。有些話使人感到農村漆黑一團。十一，對六、七月份之前我同意毛主席大字報的觀點。六、七月份後他也要負責。是不是都要他負責，那我就不瞭解情況了。

（王光美準備坐牢，將毛巾、牙刷……什麼都帶來了。）

問：王光美，你怕不怕？

王：我怕什麼？我不怕。

第二次審問

時間：4 月 10 日下午 1 點

地點：清華主樓 803

問：你對戚本禹同志的文章怎麼看？

王：戚本禹同志文章寫得很好，旗幟鮮明。根據我所知道的事實，劉少奇是假革命、反革命的結論我得不出。1950年我同劉少奇一起去看這部電影時，他沒有講什麼。主席說要批判，他沒批判，這是錯了。反正我沒有聽他說過這部片子是愛國主義的。戚本禹同志文章出來後，我很氣憤，也很關心。毛主席說要我們關心國家大事麼。我又問了劉少奇一次，與他回憶了很久，他也說沒說過。我們相信毛主席，偉大的毛主席會弄清楚的。

問：照你這麼說劉少奇還是老革命？文化革命也只是“老革命遇到了新問題”？

王：劉少奇在文化大革命中犯錯誤不是偶然的，他自己也說不是偶然的，他的世界觀沒有根本改變，不可能不違背毛澤東思想，他是要負主要責任。他沒有毛主席的膽量和魄力來發動領導這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過去，我的錯誤是相信黨、相信毛主席不夠，相信群眾不夠。現在，我願意交真心給你們。我對“假革命”、反革命的確沒有認識到。

問：問你，你對今天鬥爭大會怎麼看？

王：今天大會表現了群眾的憤怒。我個人受一些委屈也沒啥。毛主席教導我們也要經風雨見世面嘛。我希望你們給我錄音，我聽到的太少了，我應知道自己犯了什麼錯誤。也應讓劉少奇知道。

問：狡辯！我問你，桃園經驗到底怎麼樣？

王：我認為桃園經驗是成績多缺點少。

問：呵，還成績呢！你倒成了有功之臣了。

王：成績不是王光美的，是毛主席的，是毛澤東思想的。

問：不許你污蔑毛主席。

王：我去桃園，許多人都不支持。劉少奇是主張我去的，那時就只有毛主席支持我去。

問：可是你呢，大整社員，大整同學，毛主席支持嗎？

王：那，人的認識有個過程，這是符合毛澤東思想的，不然正確的思想從哪裡來？

問：再問你，劉少奇在天津講的反動話你怎麼看？

王：天津講話，有好的，有不好的，有錯誤的。他是毛主席派去的，是針對一些人“左”傾情緒去糾正的，他說的話有些是很不好的。但“紅色資本家”不是他講的，我知道，我不說是誰。劉少奇只講過進步資本家，資本家是有先進的，落後的。

問：誰說的“紅色資本家”？

王：我是中央工作人員，要保密。

問：不行！你是專政物件，說！

王：還是不說的好。我知道你們要揪。

問：算了吧，誰不知劉少奇是老機會主義者。

王：是的，是有人批評他老右傾，立三路線時批評他右傾，王明路線時也批評他右傾……（打斷）

問：惡毒！你說現在是什麼路線？不許賴！

王：我是說過去。

問：你對《論修養》怎麼看？

王：我同意紅旗評論員的話。

問：戚本禹同志的文章呢？

王：（避而不答）

問：趕快交待你和劉少奇攻擊中央文革的罪行。

王：劉少奇沒有罪行，叫我交待什麼？

問：少耍賴！你對中央文革到底怎麼看？

王：越是做工作多的，缺點錯誤是不可避免的。真正的革命者要自我批評，中央文革是經常檢討自己的工作的，我從講話上看到過。大字報上邊也有提意見的嘛。

問：三反分子的臭老婆，我們早定你……（被打斷）

王：中國的婦女中國的女共產黨員是獨立的，不能因為丈夫錯了，老婆就一定錯，老婆錯了丈夫就一定錯。

問：你們倆本來就是臭味相投，你是什麼共產黨員？你是劉少奇拉入黨內的階級異己分子！

王：我入黨不是拉進來的，我有手續的。

問：你介紹人是誰？

王：反正不是徐冰，外面是謠言。

問：誰？

王：一個姓孫，一個姓賴。

問：叫什麼名字？在哪兒工作？

王：（不說）我的歷史，我全部向組織彙報過了，你們可以通過組織調查，這些沒必要說。

問：我們就要你說！誰看你檔案。說，劉少奇對戚本禹同志文章怎麼看？

王：文章發表後，他很仔細地看了兩遍，我想他不會承認假革命，反革命。

劉少奇說他從來沒說過是愛國的。我們一起回憶過這件事，那回是誰推薦的，什麼過程，我都忘了，反正是演到一半天就亮了，看不清，我們什麼也沒說。

問：你是不是說戚本禹同志，《紅旗》在造謠？

王：戚本禹，我一直認為是好同志。是不是有人造謠，我不知道。反正劉少奇沒說過。

第三次審問

時間：4月10日5點40分—10點5分

地點：主樓803

問：劉少奇是反黨頭子，知道嗎？

王：毛主席十一中全會上沒有這麼說。十七年來成績是毛主席的，劉少奇是第一線，有錯誤是他的。

問：你說《紅旗》文章你同意，那劉少奇是否修正主義那一套？

王：《論修養》是唯心的還可以，否認無產階級專政等，我想不通。

問：《修養》和赫魯雪夫是否一樣？

王：有某些方面一樣，也有合乎馬列主義的。

問：哈！這不是修正主義嗎！打著紅旗反紅旗，你自己回答這個問題。1962年大量印發出版是誰定的？

王：可以查麼，不是劉少奇親自抓的，不知道。

問：戚本禹文章好得很還是糟得很？

王：從批《清宮秘史》和肅清劉少奇影響是好得很，但有些事實我有保留。是假革命反革命我還未認識到。劉少奇從來沒講過是愛國主義。

問：難道《紅旗》文章不符合毛澤東思想嗎？

王：我不知道毛主席親自看過。

問：你相信不相信中央文革？

王：中央文革在文化大革命中建立了不朽的功勳，總的說來相信的，每個成員是否都相信，那我有保留。……

問：戚本禹文章的結論是中央文革的，你擁護中央文革嗎？

王：那為什麼不以中央文革的名義發表呢？

問：劉少奇看了戚本禹文章什麼態度？

王：反正，劉少奇不是反革命。

第九節 “桃園經驗”

關於一個大隊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經驗總結

——王光美同志在河北省委工作會議上的報告（節錄）

（一九六四年七月五日）

一九六三年冬，我到河北省參加了一個大隊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試點。經過五個月的革命實踐，我才真正理解了黨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這次社會主義教育是一次偉大的革命運動，是一次比土地改革更為複雜的大規模的群眾運動。它涉及的問題很多，牽連的面很廣，鬥爭也很尖銳。的確是這樣，這次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確實是一次比土地改革運動更尖銳、更複雜、更艱巨的階級鬥爭。

我是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底下鄉，一九六四年四月底回北京的。地點是唐山專區撫甯縣盧王莊公社桃園大隊。從我所接觸到的地方看，農業生產的恢復和發展，情況大好；其他的好事情也很多。但是，今天我專門講農村階級鬥爭的情況。

……

我們進村以前，先在秦皇島學習了一個星期，我也參加了。在這個公社裏有一個蒲藍大隊，去年夏天，省委已經在這個大隊搞過了“四清”試點。省委給我們的任務是摸索在一個公社範圍內，公社、大隊、生產隊三級同時展開“四清”，上下推動，互相配合的經驗。根據蒲藍大隊試點瞭解的情況，這一帶是和平土改區，階級陣營混亂，幹部“四不清”問題很嚴重，多吃多占、鋪張浪費、貪汙盜竊、投機倒把，都是比較多的。群眾非常歡迎“四清”，非常歡迎“四清”工作隊。我們工作隊根據省委的指示，參照蒲藍大隊試點的經驗，擬定了工作計畫，大體分了幾個步驟：先搞紮根串連，講“雙十條”，初步組織貧下中農的階級隊伍；然後搞“四清”，洗澡放包袱；再搞對敵鬥爭；最後搞組織建設，掀起生產高潮。河北省其他地方的試點也是按這個步驟進行的，先搞“四清”，再搞對敵鬥爭。看來這個作法好。因為在敵人的活動不是特別明顯的地方，一下子搞不清誰是敵人，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交織在一起，而且有大量的人民內部矛盾掩蓋著敵我矛盾，必須經過較長時間的工作，在大量的人民內部矛盾解決以後，才摸得清真正的敵人是誰。除非那個地方敵我矛盾很突出，很明顯，一下子就弄准了誰是敵人，那當然可以也應當先處理敵我矛盾。工作隊在秦皇島訂的初步計畫是三個月，想用三個月把這個工作搞完。可是越搞越複雜，實際上我們搞了五個月，才算基本上搞徹底。

(一)

……

進村以前，公社向我們介紹，桃園大隊是一類隊，一類支部，生產還好，徵購任務完成得也好，支部書記吳臣是貧農，忠實可靠，“四不清”的問題大概沒什麼，因為他家人口少，生活富餘。這個人不識字，很能幹。副書記趙樹春有工

作能力，如果書記不在，可以依靠他。公社還提到，去年春天，支部領導搞過一次“四清”，只有一個民兵連長、治保主任關景東清出大概是二百塊錢的問題。當然，也講了一些迷信、賭博等一般性的問題。他們說群眾非常歡迎“四清”，現在已經磨了米，砍了肉，準備接待“四清”工作隊。

進村以後，支部書記吳臣給我們介紹情況，他說，“小小不言的，有些多吃多占和浪費。貪汙盜竊、投機倒把保證沒有。如果有了，你們就開除我的黨籍。”說得乾脆得很。這個人不是不識字，也識點字，不會寫倒是真的，可是真能講話，記憶力好極了。他說：“春天我們搞了‘四清’，經過縣和公社驗收了。現在主要問題是，關景東的二百塊錢，到現在只退了一百元，那一百他不願意退，一直拖著。”他總覺著就這麼一個問題。我們的工作組長比我們先到一天，他是縣委委員，原來曾在這個地方做過工委（現在改稱區委）的副書記，來過這個村子，熟悉這裏的幹部。他說，這個村子的幹部和群眾，都特別講人情，這個支部書記聽話。只簡單地介紹了這兩句。先遣組先進村十來天，也向我們介紹了情況，他們講：這個大隊幹部團結比較好，沒有兩派的問題，支部書記吳臣，有一定的威信，他沒有什麼“四不清”，就是有點用人不當，有點家長式領導。

……

離開北京以前，曾請示少奇同志，我應該注意些什麼，工作怎麼做法。他簡單地講了兩句。他說：“不要先有框框，一切從實際出發，有什麼問題解決什麼問題。要有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要理解黨中央的基本政策，除此以外，不要先有框框，一切從實際出發。”當時還覺得他講得很原則，經過這幾個月的事實，越琢磨越覺得這幾句話重要。就是說，馬列主義和黨中央的精神一定要把住不放，可是，不能有別的框框，一切從實際出發。是從實際出發，還是從定義

出發，是從實際出發，還是從主觀願望，或從人家給我們介紹的情況出發，這是區別我們是唯物主義者還是唯心主義者的標誌之一。出發點根本不同。要從實際出發，可是，桃園的實際情況是怎麼樣呢？我們一定要弄清楚。吳臣認為，我們不瞭解情況，也瞭解不了情況。他完全估計錯了。我們一定要把真實情況瞭解清楚。可是，怎樣才能瞭解真實情況呢？必須直接到群眾中去，認真發動群眾。各方面的意見都聽，卻又不能完全相信。要有調查，有分析。要從不同意見裏找差別，從差別裏發現問題。把群眾真正發動起來，真實情況就能瞭解清楚。要真正發動群眾，真正發動起貧下中農，要在貧下中農中間真正把根子紮正，真正做到“三同”，並不容易，而且是有尖銳鬥爭的。

我們是怎樣發動群眾的呢？黨中央的政策“雙十條”，是我們發動群眾的有力武器。我們就大講“雙十條”，先黨內後黨外，使黨中央的政策直接跟廣大群眾見面。對地、富分子，公安廳的同志還專門給他們講了一次。我們第一次向群眾講“雙十條”，到了三百七十多人，據說是解放以來到會人數最多的一次。……群眾開始動起來了。不過還是：敢說話的不大瞭解情況，瞭解情況的不敢說話。我們就採取分組討論的辦法，把黨員、團員、幹部分開單獨討論，群眾按隊分組討論。這樣，我們以為可以談啦！可是黨員、幹部主要是談認識和體會。群眾會上，大家還是不吭聲。我們分別去問根子：“你們為什麼不講話呀，是怎麼回事？”他們說：“一肚子話，象茶壺裏煮餃子，有嘴吐不出來！”為什麼呢？“有幹部的親信在場，給幹部通風報信。你們解決不了問題，意見白搭了，空傷了人”；“了不得呀！人家都是上邊的紅人，熊瞎子打立正，一手遮天，我們怎麼敢提呢！”“你們一走，我們是八寸的腳要穿七寸的鞋！”原來如此。怎麼突開呢？我們就先組織少數根子開會，逐漸擴大範圍，從小到大。每次開會我們都聲

明，我們是貫徹“雙十條”來的，誰的“四不清”都要清，這是黨中央的政策，省委派我們來的，工作不搞徹底，工作組就不出村。鼓勵他們提意見，不要怕報復。他們開始揭露了一些人的具體材料。根子開會，一會跑出去一個人，一會又出去一個人，說是解手。我想，這麼重要的會為什麼他們的精神不集中呢？其實不是解手，是自動出去放哨。真有人偷聽。這些情況我們都估計不足。群眾要求搞意見箱，我們說好，立刻釘了意見箱，每個隊一個，掛在工作組門口。群眾說最好掛在公共廁所裏，為了便於群眾投放，公共廁所也安了意見箱。

這樣背靠背開會，基層幹部不知道群眾提了什麼意見，開始感到有了壓力。這個時候，我們就分頭找幹部談話和開會，啟發教育的推動他們自我革命。我們的態度是滿腔熱情地說服他們，要認識到必須徹底革命，不要錯不加錯，如果破壞“四清”就變成了大錯誤。因為有了群眾壓力，談話有收穫，有些幹部開始交代問題。這時，發現幹部有幾類：一類是真勞動者出身，只要能談透，敢於自我革命，如關景東就屬這一類。經過談話，他談了不少事情。還有一類，出身也還好，本人上過幾年學，好象比較純潔的，就是不敢講，講話躲躲閃閃，明顯地是有人控制他們，袁秀英、盧彥來就是這一類。

第三類，見了我們滿不在乎，說話嘻嘻哈哈，說：“我沒有什麼大問題，檢討檢討就過去啦！”裝著若無其事的樣子，實際上出有些慌張，越到後來越慌張，他們對“四清”抵觸很大。

象支書吳臣，副支書趙樹春都是這一類。這些人說是貧農，卻不是農民出身，根本就沾不上“農”字，也不是工人。有的在東北做生意，有當店員的。也可能還有股金。他們能說會道，都是解放軍圍困長春時跑回來的。一般說來，真正勞動者出身的幹部，工作好做一些。變壞了，經過教育，可以變回來。有的幹部向

我們說，這幾年就一直往個人生活怎麼搞好上使勁，坐在一塊就是談什麼樣的手錶好，什麼牌的自行車好，這些東西什麼價錢；就是沒往把集體經濟搞好上使勁。

他們是怎麼變壞的呢？開始就是不勞動，老琢磨著吃點好的，越吃越饞，想吃又沒有，手就長了。吃了人家的嘴軟，拿了人家的手短，政策就沒法貫徹了。人家殺了豬給他送個豬腿吃，他吃了，怎麼能說人家私殺豬不對呢！從沾小便宜，多吃多占，逐漸發展到不分敵我界線，誰給吃的誰就是好人。他們變壞的規律，確是象毛主席所說的是：懶——饞——占——貪——變。開始都是由於不參加勞動，這就使我們更加理解黨中央、毛主席再三指示要幹部參加集體生產勞動的偉大革命意義。

問題逐漸暴露，鬥爭日益尖銳，“四清”和“四不清”的鬥爭，確實是包含著嚴重的階級鬥爭。

根子能不能紮正？是這場革命能不能搞好的關鍵。要自己訪，要多方瞭解。選什麼人當根子，是有鬥爭的。開始，得先聽支部的介紹。我們把選根子的條件告訴支部，讓他們給我們推薦，他們就利用這個機會安排他們的親信。他們給我們提了二十六個根子，其中有九個是幹部的親信，還有富裕中農，喪失立場的人，這樣的，我們都沒有用，只選用了十四個。我們自己又發展了十一個。開始時，根子不好找，老實的貧下中農不敢講話，選他們做根子，他卻躲著我們。支部說我們找的根本，是“雞頭魚刺”，挑他們的小毛病。而他們確實有點小毛病，比如偷過幾斤玉米之類。這幾年幹部貪汙幾百斤，貧下中農偷幾斤就不叫他做根子嗎？我們黨的多年的幹部還有毛病，貧下中農在覺悟提高以前哪能一點毛病也沒有。我們選定的根子，幹部就分配他們“好活”做，把掙工分多的事讓他們做。如三隊的根子安福海，吳臣讓他負責賣掛麵，早出晚歸，根本使我們和他見不著

面。他本人也願意幹，因為一天掙十二分，每天還獎勵一斤掛麵。在紮根上，支部不是幫一手，共同搞革命，而是同我們唱對臺戲。

……

在我們進村以前，這個公社的蒲藍大隊已搞過“四清”試點，群眾知道“四清”好，日夜盼“四清”。可是，“四不清”幹部也有準備。後來，我們才瞭解到：在我們進村以前，吳臣對如何對付“四清”工作組早有佈置，有分工。支部的幾個人，誰管問寒問暖，誰管拉攏工作組，又是下棋，又是送白薯、送被子的。還佈置了由哪些人給工作組出難題，出什麼難題，他都計畫好了。如果我們不搞革命還可以，如果搞到他頭上，他就出難題，把隊與隊之間的土地糾紛問題向我們提出來。我們根本不瞭解那些土地的情況，這不是難題嗎？他們計畫了在什麼時候拿出這一手。他的佈置，我們剛進村哪曉得呀！為什麼我把這一段講這麼細？因為聽說你們都有決心去蹲點。我說細些，也許有好處。開始，對一個好支部，不可能懷疑它是不好的，可是一件事一件事教育著我們。這是個什麼問題呢？省委派的工作隊，來貫徹中央的“雙十條”，支部卻對我們採取這麼個態度。從我們碰到的事情來判斷，他們硬是有一套影響和抵制我們的辦法。先影響我們，影響不了就抵制我們。不是老說鬥爭尖銳嗎，是怎樣的尖銳呢？不僅是階級敵人千方百計地破壞“四清”運動，有嚴重“四不清”問題的幹部，在沒有覺悟以前，也是不斷地千方百計地設法來抵制、抗拒甚至破壞“四清”運動。對於某些人來講，“四清”是你死我活的問題。

……

怎樣對待基層組織，怎麼樣對待支部呢？……我們對支部採取的態度是：又依靠，又不完全依靠；又依靠，又要獨立思考，全面分析。我們對基層組織，不

是一腳踢開，是教育他們自覺革命，由支部領導生產。我們工作組自己直接搞紮根串連，發動群眾，也常常聽取支部的意見和建議。支部如果是好的，是不是我們也應該采這個態度呢？我看也應該。

因為，支部好，也會有缺點的，發動群眾提提意見，改進改進，不就更好了嗎？如果真是好支部，它會同我們一起發動群眾的。就是好的支部，群眾中可能還有些傳言傳語，其中有對的，有錯的。如果是錯的，我們幫它查清楚，給它去掉一個包袱，也沒有壞處吧！所以，在支部是好是壞還不清楚的時候，就決定“一切經過基層組織”是錯誤的。

（二）

經過半個多月的工作，我們有了二十多個根子，各生產隊組織了貧協（貧下中農協會的簡稱）小組，大隊建立了貧協籌委會，革命的階級隊伍初步形成了。這時，我們就宣佈了“四清”正式開始。我們採取邊洗澡、邊揭發、邊查帳、邊查證的辦法。同時和基層幹部談心，指明前途，我們到底還是希望他們能自覺革命；自覺洗澡、放包袱，自覺下樓。……這時，我們認真研究了桃園大隊的鬥爭形勢。二十幾個主要的大小隊幹部，他們由共同的“四不清”利益聯結在一起。而我們工作組的二十個人，來自各部門，主觀上都是想把工作搞好的，但是，在一些重大的帶根本性的政策問題上，實際上有不同的意見，看法不一樣。再加上群眾還不完全信任我們，對敵人的活動，我們又不大摸底。所以當時當地的力量對比，我們“四清”工作組的力量，就不如“四不清”幹部的力量大。在這種情況下，他們當然不怕我們。他們怕的是敢於貫徹黨中央“雙十條”的精神，敢於放手發動貧下中農，敢於放手發動群眾的工作隊。可是，恰恰在如何理解黨中央“雙十條”的精神，要不要放手發動貧下中農，要不要放手發動群眾，敢不敢放

手發動群眾這個問題上，工作組的同志有不同的認識，不同的看法。所以，對這些問題，非討論不可了。

……

我們把要不要放手發動貧下中農、放手發動群眾和敢不敢放手發動貧下中農、敢不敢放手發動群眾的問題討論以後，基本上統一了認識。我們就響亮地提出：敢不敢放手發動貧下中農，取不敢放手發動群眾，是敢不敢革命的問題。只有領導有決心，又採取了正確的方法，革命形勢才能夠形成。正如廬王莊有人所總結的那樣：“群眾看骨幹，骨幹看核心，核心看工作組，工作組看領導。”看領導上有沒有徹底革命的決心。

……

桃園大隊的“四清”，曾先後掀起了三次放包袱高潮。

第一次放包袱高潮。“四清”開始時我們開了公社三級幹部會。這次會是三級幹部加上貧下中農代表。原計劃讓公社幹部在這個會上放包袱，開個好頭，可是，公社書記講得一般。這個公社，大的貪汙盜竊，投機倒把，沒有搞出什麼來。

不過，問題也比較嚴重，就是吃吃喝喝，糊裏糊塗，姑息“四不清”幹部，工作飄浮。工作隊隊部把它們總結為新“五風”（吃喝風，糊塗風，護短風，散漫風，老爺風），的確是這樣的。……公社三級幹部會，對桃園的“四清”有推動作用。幹部開始洗澡交代問題，也互相搓澡，互相揭發。一般性的錯誤，大家都有份的事交待了。大的問題，有攻守同盟的，還沒有交代。吳臣開始洗澡，但不老實，先說沒打過人，後來又說打了兩個三個，一點一點往上加，嚴重的問題都不交待。有的幹部在開過這次會議以後，就偷著來找我們，揭露吳臣。以前，一直都不敢講。現在他們偷偷來找。可是，吳臣也發現了這一點。他知道幹部一

開始揭他，壞事就要暴露出來了。加上關景東在三級幹部會上檢查得比較好，他自己在會上講了幾句，不受歡迎，這樣，吳臣就估計到可能要追他的問題了。

他怕關景東這些人揭他，就想轉移目標。於是，他就到處散佈民兵連長關景東的問題嚴重，說了很多事，還叫大隊長盧彥來以四隊社員的名義，給我們寫匿名信。……我們採取的態度是，誰的意見都聽，吳臣說關景東如何如何，我們也聽。

後來我們才知道，這完全是給我們製造麻煩，混淆是非，企圖引導我們搞個亂七八糟。我們採取了正面、反面意見都考慮，有魚沒魚淘幹了看，誰問題多就是多，少就是少，一定查個水落石出，誰的“四不清”，都要弄清楚。

……

“四清”中期，在撫寧縣城召開了工作隊會議，傳達了華北局太原會議精神和省委要堅決搞徹底的指示，工作組回村後組織了第二次放包袱高潮。這一階段的特點是：大量的細緻的思想工作同大規模的查證相結合。雖然以前我們是搞邊查帳邊查證，但是，查證工作到底還是落後了一步。查證工作很重要，不經過查證，很多揭露的材料，和查帳時發現的問題都不能肯定。沒有確鑿的證據，就不能促使幹部承認錯誤。這個時候，就特別抓緊了查證工作，又注意了隨洗澡隨解放。有一些幹部“四不清”問題不嚴重，交代差不多了，就把他們解脫了。……爭取了多數，逐步壯大了“四清”革命隊伍。力量對比，發生了顯著變化。群眾和幹部揭露出吳臣的不少問題，也突破了一批一般性的攻守同盟，犯有一般“四不清”錯誤的幹部大體都交代清了問題，貪汙比較多的，也有一部分人交代清了，剩下的都是一些難搞的，群眾叫做“釘子”，就是死不交代的人。

……

原來不是說吳臣是貧農出身嗎！不是的。他父親是小商小販，他自己是搗動小買賣，賣破爛，跑單幫，一貫吃嫖賭博，無所不為，同一些流氓分子混在一塊。政治上的“四不清”嚴重，一貫重用地、富、反、壞，許多好差使，副業裏的重要位置，多掙工分的活，都安排給地、富、反、壞。他到底打了多少人？我們查清楚的，有人證的，是三十一個人，三十九次，其中有一個貧農被他打了七次。他打的這些人，除了一個曾參加過軍統，一個是富農的兒子，其餘都是貧下中農。他為什麼專打貧下中農呢？很值得深思。

……

在這時候，我們又掀起了第三次放包袱高潮。這是在太和寨又開的一次公社三級幹部會以後，掀起來的。這次三級幹部會，林鐵同志親自參加了。在這次會上，林鐵同志講了省委的決心，要我們一定把“四清”搞深、搞透、不亂、不漏；號召幹部自覺革命，號召群眾幫助幹部洗澡。這次會上一些有嚴重問題的幹部放了一些大包袱。雖然有嚴重錯誤，只要徹底交代，決心改的，大家都是抱著歡迎的態度。變壞的可以改回來。吳臣的問題，經過再三查對，實在嚴重。貧下中農、社員群眾、其他的基層幹部和工作組的同志，對吳臣的問題都非常氣憤。他打了這麼多人，胡作非為，敲詐勒索，貪贓枉法。這樣的人是否可以當共產黨的支部書記呀？該不該撤職呀？以前沒弄清楚，不好說撤，現在已經知道了，該怎麼辦？……公社黨委在會上宣佈接受桃園貧下中農的要求，決定撤了吳臣的職。……開完這個會，貧下中農代表真是高興極了，回村後，奔相走告。……“四不清”的幹部呢？真是“爹死娘出門，各人顧各人”了，靠山靠不住了，攻守同盟，也守不住了，就各顧各了，紛紛找工作組，找貧下中農來檢討和交代。有的是幹部自己來，有的是幹部的家屬來。這時候的革命形勢，是急轉直下，幾個大

案子都是這時候突破的，四隊的糧食問題，二隊的關家門樓問題，都突開了。還突開了大隊木業組、米麵加工廠的問題。整個大隊（包括大隊幹部和小隊幹部）一共搞出了兩萬二千多塊錢，三萬四千多斤糧食的問題。一千塊錢以上的是五個人。

……

真正發動了群眾，真正掌握了這個火候，才能既把問題搞清楚，又少出後遺症。所以，這時候，我們就提出要敢於實事求是，主動核實。本來大家也開始搞核實工作了，但認識沒有提到這麼高的水準。如果有假，我們就主動翻案，遲翻不如早翻，與其將來翻案，不如現在我們自己主動翻案。只有真正實事求是，才能使幹部心服口服，挽救他們。如果搞過了，有了假案，那還不是有後遺症，將來別人要來搞平反的。“四清”搞不透那是保護修正主義根子，是個大錯誤。但是要搞過分了，也要犯錯誤。人家沒那些事，給人家弄成那些事，弄假了，也是錯誤吧？這就使人為難了。

……

該強調實事求是了，經過討論，統一了認識。我們就搞了三次核實。第一次是三定：定事實，定時間，定性質。在定的當中發現一些不符合實際的，我們都主動作了糾正。第二次搞了三允許：允許翻案、允許補充交代、允許別人來給他申辯。我們還允許當事人自己找證人。比如二隊有個副隊長關希英，他有一千多塊錢的事。他說：“別的事我都記得清楚，就有一筆賣薯秧子錢一百一十二元，我總覺得模糊，好象沒有經過我的手”。問他有證人沒有，他說能找。我們叫他自己去找證人。……第三次，搞了個三對口：把個人檢查的材料，別人揭露的材料，和我們的調查報告，三部分東西對了一下。經過這麼一核實，“四不清”幹

部心服口服，退賠很快。對於那些交代徹底的，退賠積極的，經過貧協提議，和群眾討論，是不是應該給他們減免點。根據中央的政策，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以前的，問題的性質不很嚴重，退不退，該算什麼價錢。對於交代問題和退賠積極的，也別讓他們太困難。群眾很實事求是，說那二年錢毛，那時貪汙那麼多錢，現在退，得賣不少東西才賠得上。因此，貧下中農就主動提出給他們減免。這一減免，幹部感動得不得了。……“四清”，只留下兩個專案，一個是支部書記吳臣，他到底是什麼人，是什麼性質，還沒有最後弄清。還有一個就是副書記趙樹春，他開始不是躺倒了麼，所以他沒洗完澡，也沒有下樓。其他的都結束了。於是各生產隊和大隊都開了退賠團結大會，會開得很好。把“四清”勝利果實分了，除了地、富，反、壞本人以外，其他人都有一份。這樣一分，對很多人又是一次教育。“四不清”幹部本人分不分？也分了。

其中有的幹部退賠了三十塊錢，分回來的是一百多塊錢，以後他向我們講：“貪汙了點，我總覺得占了便宜，不曉得實際上是吃了虧，因為別人貪汙得更多。‘四清’搞得清清楚楚，就是好。”在會上，幹部群眾發言很熱烈，一致表示要團結對敵，幹群關係一定要搞好，爭取一九六四年的大豐收，情緒都很高。……這時，我們分析經濟上的“四不清”問題，基本上差不多了。標誌是什麼？第一，群眾所提出來的很多問題，弄清楚了。第二，貧農下中農的覺悟提高了，貧協的大旗樹立起來了。貧、下中農的態度，從開始的觀望不滿、後來到敢於揭發“四不清”，最後做到敢於當家作主。第三，大多數的“四不清”幹部放下了包袱，從開始抵觸，以後發展到認錯，到最後是感激而且積極參加生產和工作。如果我們工作作到家了，他們是真感激的。當然這其中不包括吳臣、趙樹春兩個專案。

……

現在，我把前一段工作中遇到的問題，簡單地重述一下。

第一、不要先有框框，一切要從實際出發，要有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要理解黨中央的基本政策，除此以外，不要先有框框，一切要從實際出發。有什麼問題，解決什麼問題。少奇同志的這個指示很重要。我們不是講總結過去運動的經驗嗎？這就是很重要的經驗。有的時候沒弄清情況，聽到別人奪權我也奪，不管該奪不該奪，都是奪。現在的情況是明明該奪，有些單位和地方，階級敵人已經掌握了領導權，又不敢奪了，如果該奪又不敢奪，就是沒從實際出發。

“不要先有框框，一切從實際出發，有什麼問題，解決什麼問題。”從我們這段工作看，非常重要。

第二、要從實際出發，但是，如何才能弄清實際情況？只有放手發動貧、下中農，放手發動群眾，大膽依靠貧、下中農，才能弄清實際情況是什麼。要正確地理解黨中央“雙十條”的精神。黨中央“雙十條”的精神是徹底革命的精神。搞群眾性的革命運動，第一條政策就是放手發動貧、下中農，放手發動群眾，大膽依靠貧、下中農，不要有清規戒律。

第三、要正確地掌握革命的群眾運動的火候。在群眾沒有發動起來的時候，要強調敢不敢放手發動貧下中農，放手發動群眾，是敢不敢革命的問題；在群眾已經充分發動起來以後，又有過激情緒時，就要很好地掌握火候，要強調敢不敢實事求是，是敢不敢革命的問題。在開始，“雙十條”要總的講一下，要講好，讓群眾瞭解中央“雙十條”說的什麼，總的精神是什麼。但是，有些政策是不應該在開始時就強調的，開始強調這些，就會限制了群眾，但是，在群眾發動起來以後就應該強調貫徹政策，強調政策界限。領導革命的群眾運動的過硬本領，就是要既敢於放手發動貧、下中農，放手發動群眾，又會掌握群眾運動的火候，在

群眾充分發動起來以後，又有了些過激情緒時，能夠及時地轉入強調實事求是，強調貫徹政策。只有這樣，才能達到中央所要求我們的高標準，既搞深搞透，又不出亂子或少出亂子。

第四、工作隊應該清醒。有個誰影響誰、誰改造誰的問題。“四清”改造“四不清”，還是被“四不清”所影響和改造。“四清”工作隊應該是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黨中央的政策精神去改造一切封建勢力、資本主義勢力，以及它們在勞動者（包括幹部和群眾）中間的影響；並且在改造世界中，改造我們自己，在改造客觀世界的過程中也改造我們的主觀世界。……（三）……春節後，我們開始集中地和系統地進行階級教育。發動群眾憶苦思甜，通過寫家史、村史、登記階級成分，轉入揭露地主、富農的活動。幹部集中到一塊座談“四清”收穫，挖“四不清”錯誤的根源，怎麼變壞的，受了誰的影響，搞思想歸隊，然後轉入揭露敵人和反擊敵人。

……

經過普遍憶苦，群眾和幹部的階級覺悟提高了，真正苦大仇深的人出來講話了。階級敵人活動的材料大量地揭發出來了。……趙家三兄弟中有一家叫趙學瀚，一九四六年他有八十五畝地，僅一九四七年就賣了六十五畝，土改時只剩十八畝六分地，全家七口人，按二畝七算恰恰不進不出，還欠一點，給他定了個中農。一定成中農，從初級社時他就作了會計。我們進村的時候，他是大隊的現金保管兼四隊的會計。……其實，趙學瀚從土改前三年算，有八十五畝地，全部出租，全家住在長春，家裏沒有一個人參加過農業勞動。一九四七年聽說東北解放區搞土改，趙學瀚回了一趟桃園，佈置他的伯父等趕緊賣地。……實際上趙學瀚鑽進幹部隊伍以後，他是吳臣的後臺，大隊的經濟帳他起碼掌握了百分之九十

五，所有弄虛作假都是他出的主意。表面上裝窮賣傻，迷惑群眾，實際上出謀劃策，出壞主意的就是他。一直到“四清”時，幹部交代哪個，不交代哪個都是他提醒。指揮棒就在這兒！吳臣壞，可是吳臣後邊還有人。吳臣作檢查，不會寫，就找趙學瀚替他寫。我們讓趙學瀚揭露問題，他從來沒揭露過一件事。他卻常向大隊長說，那次借的還有多少錢沒還，還借了多少棉花。這是提醒，實際上也是通知大隊長交代。我們進村前，吳臣安排如何對付工作組的辦法時，都有他參加。真正掌事的是個地主。後來我們就把這些情況，還有他貪汙九百多斤糧食，二百多塊錢，每天給四隊記完工分都偷一捆柴禾回家等等問題，都交給群眾討論，把地契給大家看，人們大吃一驚。群眾說：“過去根本不曉得他有這麼多地，只知道他叔叔家、伯父家有地，搞不清他搞了那麼多名堂，不提高階級覺悟可不行啊！幾次運動趙學瀚都滑過去了，這一回差一點又滑過去。”……桃園大隊一共查出了漏劃的地主五戶，富農兩戶。……大家覺悟提高了以後，不僅揭露出了漏劃地主、富農，而且揭露出地、富、反、壞大量的破壞活動。比如反攻倒算，變天帳，挑撥幹部與幹部，幹部與群眾之間的關係，破壞生產等等。這樣的事情都有。但，主要的，最突出的是什麼呢？是隱瞞了成分，自己鑽到幹部隊伍裏，或者拉攏幹部，使幹部成為他們的代理人。用影響幹部的辦法，使幹部代表他們的利益，這一著更高、更鬼。他們幹什麼要自己出頭露面呢！他們在那裏出主意，又不出面。用各種辦法，腐蝕了很多幹部，使幹部貪贓枉法。

這個時候，有了敵情，也有了敵人，我們就開展對敵鬥爭。開了幾個小型批判會，既訓練骨幹，又教育群眾。根據地、富、反、壞有沒有破壞活動，和破壞活動的情節，決定對待他們的辦法，嚴重的就開了說理鬥爭會。……這時，根據地主、富農交代的，根據大家揭發的，好多地富活動和隱瞞地富成分的這些事，

都跟吳臣有關。證明吳臣的政治“四不清”問題非常嚴重。我們本來是一再讓他自己查上當，給他揭露和反擊敵人的機會，那怕在以前階級覺悟不高，喪失立場，現在檢討出來，向黨交代也可以。他不查，一直沒講。是群眾揭發，地富交代，把他扯出來了。比如說他給偽保長蓋房這個事，就是發生在國民黨叫囂反攻大陸的那個時候。他曾說過：“我們這時候管人家叫頑偽夥會，將來人家叫我們什麼呀！”所以他積極給偽保長蓋房，不僅是感恩問題，他是想同偽保長拉好關係。還有，他管事的時候，放走了一個叫潘其昌的，也是個偽保長。這個人同他關係密切，鎮反以前跑了，在東北一個城市被公安人員發現，那個人被鎮壓了。這樣的事兒不少。……所以吳臣到底是個什麼樣人呢？我們腦子裏一直劃著這個問號，不知道怎樣下結論。

原來說是個好支書，後來又發現那樣不好；又說是完成任務好，完成任務的方法不好；後來看看也不是完成任務好，上邊的政策到他那裏就變了樣；而且，他同地、富、反、壞的關係也越搞越清楚了，他不是一般的喪失立場問題。所以吳臣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呢？我們當時沒有給他下結論。

……

（四）

原來以為做了這麼多工作，經過了群眾性的“四清”鬥爭和對敵鬥爭，組織建設會順利的。實際上組織建設這一段，依然不是風平浪靜的，從桃園大隊看，我們又進行了一次很嚴重、很尖銳的階級鬥爭。

……

……在醞釀大隊幹部名單和支委分工時，出了問題，吳臣來了個反攻。原來吳臣在支部裏還有很大的發言權，他一說話，還有些人自覺不自覺地跟著他的樣

辦。要是不知道情況的人，來參加支委會，還會以為吳臣仍然是支部書記哩！他在支部裏還是挺神氣的。在討論大隊管委會名單和支部委員名單的時候，吳臣借機反對犯過嚴重“四不清”錯誤，但是，積極參加“四清”運動，又肯於改正錯誤的幹部當選。他一講，就有些人跟著群起而攻之。吳臣和他的一夥人攻的是什麼人？就是在“四清”階段揭露他最痛的那些人。對於過去有“四不清”錯誤，真正徹底交代，堅決退賠，以後又積極工作、積極勞動的人，我們是支持他們當選的，群眾也願意選他們，包括那個關景東。關景東是七百斤糧、七百塊錢，這個錯誤不算小。原來我們是準備讓他勞動兩年，考驗考驗再說。後來又安排了他，主要是因為他能把生產拿得起來，而且確實表現了堅決改正錯誤。人家真改正錯誤，我們總不能不歡迎吧！重要的是，群眾願意讓關景東當幹部。但是，吳臣不同意。還有人附和他。這說明吳臣在支部裏還很有市場。

支部委員醞釀好了以後，選得很順利，票也很集中，但是，在分工時，又出了問題。我們原想讓趙品三任支書，他是三人領導小組裏的一個成員，是我們一直在培養的。這個人“四不清”問題不多，勞動確實很好，人很耿直，就是倔。

等到分工時，他提出堅決不幹。……

後來我們考慮，趙品三在關鍵時刻發生動搖，不適合當支部書記，不是他自己當不當的問題。只要群眾發動起來，人才很多，有人能扛這個大旗。黨員中就有一個很好的雇農，他的名字叫盧倫。這個人“四不清”問題不多，一直參加勞動，群眾很擁護。因為過去他不是支委，是管委會委員，我們覺得一下提成支部書記恐怕不行。後來看，這個人很好。他民主，肯徵求別人意見。就是文化水準低，聽了報告，回來傳達有困難，記個什麼事也困難。可是，他真正是好莊稼人，忠實可靠，立場堅定。他幾次和我談話，對我教育很深。他三言兩語，能抓住關

鍵，講到刀口上。後來我們就推薦盧倫當支部書記。……吳臣敢搞反攻，就是由於外邊有人支持他。他搞反攻，這是個大好事。要不，有些事情我們還弄不清楚，他一反攻，就逼著我們想一想了，得搞徹底呀，不要馬馬虎虎。他一直在反對“四清”，我們工作組還沒有出村，他就集中火力反對想要改正錯誤的幹部當選，這證明什麼？吳臣想把持桃園的領導權，想要復辟，他要推翻“四清”和對敵鬥爭的革命成果。

他企圖仍然回到臺上統治群眾，要那些有嚴重“四不清”錯誤而又不想改正的貪汙盜竊分子，同敵人勾結用暴力統治群眾的分子，重新復辟、掌握領導權。這是堅決不能允許的。不搞破壞可以，搞破壞不行。所以，我們看到了工作還沒作透，必須補課。從吳臣這次反攻看來，他的是非善惡的標準不是黨的標準，不是貧下中農的標準，不是人民的標準。我們說好的事他就說不好，貧下中農說好的事情他就說不好。別人把工作搞好了，他就不高興，而且是仇恨的。這時，他就是要把桃園的工作搞亂搞爛，才稱心。我們工作組對他的反攻問題，進行了認真的討論。吳臣到底是怎麼回事呢？是他堅持“四不清”的立場，發展到同黨對立？因為有宗派鬥爭發展到反黨程度，由人民內部矛盾轉為敵我矛盾？還是這個人本來就是壞人呢？因為他與地、富、反、壞有那麼些密切關係麼！我們討論來，討論去，不敢下結論，只好交群眾討論。

……

過去群眾和幹部講話是話還到嘴邊留三分，現在什麼都講出來了。根據大家敞開講的情況看，吳臣是鑽進黨內的壞分子。過去他所領導的桃園支部，確實就象貧農所說的是：“打著共產黨的旗號，辦的國民黨的事。”吳臣實際上是鑽進共產黨內的一個國民黨分子。直到我們走，還沒查出他和國民黨有組織聯繫，也

沒有查出他與反動組織或特務組織的聯繫。不過，也不能排除這種可能性。我們沒查出來，並不等於就沒有這種可能性。吳臣把持的桃園支部，過去基本上不是共產黨。他把持的這個政權，基本上是一個反革命的兩面政權。他多少也做過一點好事，總得交點徵購，搞點生產，不然，他隱藏不了這十好幾年。桃園這個支部，我們原來也考慮，是不是變了顏色了？經過討論，我們認為不是變顏色的問題，根本它就不是紅色的。後來公社黨委同意桃園黨員的意見，批准把吳臣清洗出黨，而且同意定他為壞分子。可是，據說到現在，我們已經離村兩個多月了，還沒有正式檔批下來，原因是什麼，我不知道。

……

這個問題是這樣：當問題涉及到公社、區、縣的幹部時，我們一個大隊的工作組要不要管？我覺得是非管不可。既然黨派我們去工作，我們就要對黨負責。我們是革命者，不能怕犯錯誤，也不能怕和地方黨委搞壞了關係。我們應該把材料搞確實，報告上級黨委，積極建議上級黨委調查處理。不然，四清就搞不徹底。一個大隊真正搞徹底了，是可以發現一些公社幹部、區的幹部、甚至縣的幹部的問題。比如桃園大隊就是這樣。根據桃園群眾和幹部的揭發，我們就挖出來了一個副區長蘇長吉，一個有十幾年黨齡的爛透了頂的蛻化變質分子。這就是說，區長一級的幹部，有的已經和平演變到變了顏色。區裏搞了五反，他混過去了，這次四清發動了群眾，他就混不過去，被挖了出來。所以四清搞好了，又可以幫助五反搞徹底。當然，是不是僅僅涉及到一個蘇長吉呢？

不是，還有。吳臣的行賄、拉攏，還涉及到一些縣裏的幹部。

前邊我講了，縣委辦公室的主任，縣人委辦公室的一個副主任，他們曾在一塊吃吃喝喝，賭博，借錢也搞過。這樣一來，他們下來檢查工作，怎樣個檢查法

呀！他們會贊成搞四清嗎？

又比如縣的水利科長那樣的人，有一筆水利費，這是黨交給他們的，投資應該用在最需要而又有條件，最能發揮效益的地方。可是他們是個什麼思想呢？老子有這筆錢，誰請吃點好的，就恩賜給那個地方。誰給送大米，這個地方就能上馬，錢就能撥。黨信任，才交給他們這部分錢，應該負責使用好，分配好。……

一些犯嚴重“四不清”錯誤的幹部，一追他們的事就聯繫到上邊，有人包庇。這就提出一個很值得注意的問題：幹部犯嚴重“四不清”的錯誤根子在哪裡？我們說根子是封建主義、資本主義勢力的腐蝕和影響，如一般所說的“錯在幹部，根子在地、富”。這是下面的根子，也是基本的根子。可是，群眾還提出有上面的根子，上面有靠山，有人保護。我們進村不久，群眾就提出不敢給吳臣和關希顏提意見，他們上面有副區長保護，是上面的紅人。我們說要挖下面的根子，群眾卻提上面也有根子。到底犯嚴重“四不清”錯誤的幹部，上邊有沒有根子？如果要有，要不要挖？值得我們深思。上面的根子，包括上級機關裏的蛻化變質分子，和一些幹部的不良作風的影響。這就是說，地主、富農的影響，不僅僅在下面幹部中發生作用，也對我們上級和高級機關的一些幹部發生作用。犯嚴重“四不清”錯誤的基層幹部，大體上在公社、區、縣都有靠山、有根子。送禮，請吃，甚至發展到相互勾結，上邊就有人保護他了。有很多事實證明，如果沒有上邊的保護，下邊就不敢犯那麼嚴重的錯誤。科員不拉科長下水，他就不敢胡搞亂搞。科長不拉處長下水，他也不敢胡搞亂搞。拉上級幹部下水也很簡單，只要送一個手錶，多少糧食就行了。生產隊的幹部沒有大隊幹部的撐腰，他就不敢胡搞亂搞，他不放心。大隊幹部沒有公社幹部給他撐腰，他也不敢胡搞亂搞。如吳臣，就已經成為壓迫群眾的統治者。為什麼呢？有上面的保護，沒有群眾的監督。在群眾

沒有發動起來以前，他就用上面的根子壓群眾，群眾就不敢給他提意見，結果由小錯誤就變成大錯誤，甚至蛻化變質。當然吳臣的問題，還有些特殊性，他原來就是壞分子。凡是蛻化變質分子和有嚴重“四不清”錯誤的幹部，都有一個或幾個享腐化福的窩子。蘇長吉在桃園有，在別處也有享腐化福的窩子，難道只有蘇長吉一個人？所以，必須加強群眾的監督。要群眾監督生產隊的幹部、大隊的幹部、公社的幹部和區、縣的幹部，上面的幹部也都要接受群眾的監督，沒有群眾的監督是不行的。只要上面不變，下面變了，問題不大，好辦。因為上面沒有變，發現了下邊的問題，就可以下決心整好，敢於革命，沒有什麼顧慮。只要敢於發動群眾，真正發動了群眾，就一定能整好。……毛主席最近提出社會主義教育搞深搞透的五條標準：即貧下中農是否真正發動起來；幹部中的“四不清”問題，是否徹底解決；幹部是否參加了勞動；是增產還是減產；發現有破壞活動的地、富、反、壞分子是將矛盾上交，還是發動群眾，認真監督、批評、說服，以至於展開恰當的鬥爭，並留在那裏就地改造。根據這五條來看，我們的桃園大隊是基本上達到了要求。當然還有很多工作沒有做完，主要是非常需要摸出如何鞏固“四清”革命成果的經驗，我們現在留下了幾個人的一個鞏固組，主要負責研究這個問題。我們的工作是有缺點和錯誤的，我們採取的態度是，發現了，立即改正。不足之處，隨時補課。當然，可能還有缺點和錯誤到現在還沒有暴露出來，要經過一段時間才能暴露出來，我們歡迎同志們指出。發現缺點、錯誤是好事，我們可以改正，可以把工作搞得更好。我們的工作，要經得起檢查，也要經得起時間的考驗。

（五）

當我們做好了上面介紹的那些工作以後，絕大多數群眾高興極了。真是興高

采烈。人的精神面貌發生了變化。幹部從“四清”中期就參加勞動了，後來越參加越積極，哪裡困難，哪裡最艱苦，幹部就到哪裡去幹活了。大隊部不再留專人聽電話了，有事幹部們在地裏商量著辦，有什麼問題及時在地裏同群眾商量著解決。幹部和群眾都心情舒暢，幹勁很足，出勁率非常高，所有能出勤的都出勤了。支部書記盧倫出身好，民主作風好，參加勞動好。只要他這樣帶頭搞，群眾自然就跟著上。困難的地方幹部上了，群眾沒有話說。有身教，不光是言教，以身作則。過去有人說怕“四清”妨礙生產，從我們那個地方看來對生產沒有妨礙，而且生產大有進步。就是冬天搞“四清”的時候，基本建設也搞了很多，搞了一個揚水機站，搞好了兩個機井，還拉了高壓電線，等等。

今年要搞上百畝水稻田，還有七百畝水澆地。挖渠，平整土地，都做了，也沒影響“四清”，基本建設比每年冬天還搞得多。有人說，運動會妨礙生產，不是這樣，也解放了生產力，調動了大多數群眾和幹部的積極性，搞得人們心情舒暢。

……

現在桃園有了革命化的貧下中農，有了革命化的領導核心，這給桃園今後的工作，打下了基礎。可是，這種局面是不是能夠長期堅持下去，還要看我們今後能不能做好經常性的政治思想工作，還要看有沒有革命化的公社，革命化的區委，革命化的縣委的領導。要不然，頂不下去的呀。我們估計，那裏的鬥爭還可能有反復，因為階級鬥爭是複雜的，不是萬事大吉了。

……

在我剛剛回到北京時，因為大家都關心農村階級鬥爭的事，有些同志就問我到底農村階級鬥爭矛盾的焦點在哪裡？根據我們接觸的情況看，主要的是階級敵

人千方百計地搞和平演變，有些是鑽進革命隊伍，用各種各樣的形式，潛移默化，使我們的一些幹部，舒舒服服地演變過去了，代表了敵人的利益。不是一下子收買，一下子給大魚大肉吃，是逐漸逐漸地影響，這最不容易引起我們的警惕。在戰爭時期，階級敵人是搞武裝反革命，配合帝國主義。在和平時期，和平演變是階級敵人向我們進行鬥爭的主要形式。這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的階級鬥爭的新形式。我們的身份是清楚的，而敵人卻躲在後面，出面的是戴著“黨員”和“幹部”帽子的人，所以鬥爭是更複雜了。“四清”中階級鬥爭非常尖銳和複雜。現在我們搞的“四清”的內容，已經不止是保定地委原來提的那樣，清工、清帳、清財、清庫。現在是政治上的“四不清”、經濟上的“四不清”、思想上的“四不清”和組織上的“四不清”，反正一切不利於社會主義的事情都要清。所以，河北省的群眾和幹部，都把農村的整個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簡稱為“四清”。“四清”的內容廣泛了，意義深遠了。確實是比土改的規模更大，範圍更廣，而且更尖銳、更複雜、更深刻的一場大革命。根據我們那兒的情況看，我覺得包括這麼幾項任務：一個是土改不徹底，民主革命不徹底，要補課；一個是社會主義革命不徹底，有的地方就沒有好好搞社會主義革命，也要補課；還有一部分更艱巨的任務，就是無產階級掌握了領導權以後，有些黨的幹部又蛻化變質了，變壞了，我們要解決怎麼把他們變回來這個問題，就是社會主義革命勝利以後的革命問題。社會主義革命勝利以後還有沒有革命任務？還有。就是當無產階級掌握了領導權以後，它還有可能腐化變質，資本主義還可能復辟。我們黨要解決這個問題。這個問題是世界上還沒解決的。這個革命是史無前例的。我們現在作的這件事情，是我們黨的偉大事業中的一部分。黨中央和毛主席就指出了“四清”、“五反”的嚴重的深遠的意義，我們一定要下決心解決這個掌握領導權以後不貪汙腐化的問題，

不和平演變的問題，演變了的，又如何變回來的問題。解決這個問題是很難的，我不好作的，是史無前例的呀！可是，我們黨一定能解決。……

1964年9月1日，中共中央轉發《關於一個大隊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經驗總結》的批示，現將批示抄錄如下：

中共中央轉發《關於一個大隊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經驗總結》的批示

（一九六四年九月一日）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中央各部委，國務院各部委、各人民團體黨組，軍委總政治部：

《關於一個大隊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經驗總結》，是王光美同志在河北省委工作會議上的報告記錄，是在農村進行社會主義教育的一個比較完全、比較細緻的典型經驗總結。文字雖長，但是好讀，各地黨委，特別是農村和城市的社會主義教育工作隊，急需瞭解這種材料和經驗。現特發給你們，望你們印發給縣以上各級黨委和所有社會主義教育工作隊的隊員閱讀。

這僅僅是一個大隊的經驗。在許多問題上有普遍性，但在另外的許多問題上又有很大的特殊性。例如：中央“雙十條”的基本精神是徹底革命的精神；必須放手發動貧下中農和其他農民群眾才能解決幹部的“四不清”和對敵鬥爭中的各種問題，把社會主義教育搞深搞透，形成新的生產高潮；在群眾充分發動起來以後，要掌握群眾運動的火候，適時地提出實事求是地對待問題，強調貫徹中央各項具體政策的規定；縣、區、公社、大隊、生產隊的許多幹部以至工作隊的許多成員對於放手發動群眾有無窮的顧慮，不把團結百分之九十五的群眾作為基礎和前提條件，而片面地強調依靠基層組織和基層幹部，不把貧下中農作為我們黨在農村中唯一的依靠；“四不清”嚴重的幹部和他們上面的保護人要用各種辦法

抵抗“四清”運動；等等。都是帶有普遍性的問題，即是在許多地方都要遇到同樣的問題，因此，桃園大隊的經驗是有普遍意義的。但是，各個地方、各個大隊的情況，又是各不相同的，都有它的特殊性，所以主觀上不要先有框框，一切要從實際出發，有什麼問題解決什麼問題。所以桃園大隊的經驗只能作為參考，不要把它變為框框，到處套用。到底各個地方、各個大隊有些什麼情況，有些什麼問題，這些問題又如何解決，都要領導運動的同志在放手發動群眾的過程中，進行艱苦的調查研究工作，並且認真地同貧下中農商量和討論，才能真正瞭解，並且找出比較最好的解決辦法。這是不能偷懶的，沒有什麼捷徑可走或其他取巧的辦法的。桃園大隊的經驗，只是給我們指出了進行工作的一些方法和處理某些問題的方法，並不能使我們順利地去解決各個地方、各個大隊的問題。這是各地同志閱讀這個檔時必須注意的。

中央 一九六四年九月一日



批判“四不清”幹部



批判劉少奇



四清工作隊訪貧問苦



某生產隊的幹部和社員正在清理帳目

第十節 “桃園經驗” 批判

劉少奇王光美的“桃園經驗” 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之前的所謂的“四清”運動（開始叫“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乃是其前奏曲，而最積極的發動者，就是在“文革”中被徹底打倒的劉少奇，還有其夫人王光美。為此，有必要回顧一下“四清”以及當時曾經紅極一時王光美創立的“桃園經驗”。

1963年2月11日至28日，中共中央召開了中央工作會議，決定發動“四清”運動，其中12日到13日的會議由劉少奇主持。在這次會上劉宣稱：“八屆十中全會講階級、階級鬥爭，現在就要部署一個行動，搞一個階級鬥爭。物件是投機倒把、貪汙盜竊，還有一些嚴重的鋪張浪費，嚴重的蜕化變質、違法亂紀，嚴重的分散主義。總是口裏講階級鬥爭，不辦事情，不好。”

在 2 月 25 日的會上劉少奇作了《關於反對現代修正主義的鬥爭問題》的報告。他特別強調：“我們需要在經濟上，在政治上，在思想上，在黨和國家的組織上，包括軍隊的組織上，保證不蛻化變質。因此，就要想一種辦法來保證，不只是一要保證我們這一代，而且要保證我們的後代不蛻化變質。這個問題，是生死存亡的問題，是亡黨亡國的問題，使人民當權還是少數剝削者當權的問題。”劉在中共領導人中首次把防止“蛻化變質”的政治運動提高到“亡黨亡國”的高度，這種觀念恰恰是“文革”得以順利展開的意識形態基礎。三個月後毛澤東在一份材料上寫下了與劉少奇上述說法非常相似的批語：“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現全國性的反革命復辟，馬列主義的黨就一定會變成修正主義的黨，變成法西斯黨，整個中國就要改變顏色了。請同志們想一想，這是一種多麼可怕的情景啊！”

毛澤東不僅把當時的“四清”運動定位為“關係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修正主義誰戰勝誰的問題”，此後又從這一論斷出發，延伸出一系列發動“文革”的“理論”觀點。

於是，在 1964 年 5 月到 6 月的中央工作會議後，中央書記處於 1964 年 8 月 5 日決定，中央成立“四清”、“五反”指揮部，由劉少奇掛帥。劉少奇在第一線領導“四清”運動期間，中共通過中央文件樹立了三個“四清”樣板，即甘肅白銀有色金屬公司的經驗、河北省的“桃園經驗”以及天津的“小站經驗”。這三個檔的起草者和最後簽署者是劉少奇。今天再來閱讀這些“四清”經驗，特別是劉少奇及其夫人王光美一手樹立的“桃園經驗”，便會驚訝地發現，它們竟然非常像“文革”的預演。

首先是劉少奇樹立的“桃園經驗”主張通過“群眾運動”（其實是“運動群眾”）另組“階級隊伍”，實施“奪權鬥爭”。王光美創立的“桃園經驗”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通過在貧下中農中秘密“紮根串連”而重組“階級隊伍”。劉少奇批示的這幾個“四清樣板”檔一再強調，運動的目的是“把領導權從階級敵人手中奪回來”，“一下決心進行奪權鬥爭，局面就迅速打開，群眾立即發動，表現了我們料想不到的革命熱情。”

二是通過體罰逼供等殘酷手法大批地打擊鬥爭對象，是劉少奇總結的“四清”經驗的一大特色，“文革”中對人的批鬥體罰其實不過是繼承了這些手法。

“文革”期間，有青年學生到桃園去調查這個“四清”樣板時發現：“在王光美的指使下，工作隊大搞逼、供、信。對幹部實行跟蹤、盯梢、罰站、彎腰、低頭、燕飛、拘留。連敲帶詐，讓幹部脫了衣服到外面凍著。工作隊動不動就掏出槍來威脅幹部……王光美住的四隊武鬥最凶。在鬥爭四隊隊長趙彥臣時，王光美到場見趙彥臣正在罰跪，就鼓動說：‘你們搞得好，搞得對’；‘堅決支持你們，就用這個辦法搞下去’。在王光美的唆使下，體罰之風，越演越烈。”這裏提到的“燕飛”就是“文革”中批鬥人時極為流行的“噴氣式”，看來它是通過“桃園經驗”推廣開的。

國內有學者指出：“四清運動期間，在部分地區開展了奪權鬥爭，大搞懷疑一切，無限上綱，把任何問題都歸結到階級鬥爭上來認識，上升到政治問題來處理。搞人人過關，‘有魚沒魚淘幹了看’，鼓動群眾都領導，認為不鬥，就顯不出革命的樣子。於是，在運動中刮起了一股非法鬥爭的歪風，什麼抓人，打人，戴高帽子，搞逼供信等等。這些做法，無疑為文化大革命期間的打、砸、搶提供了直接或間接的經驗”。

有報導稱，劉少奇掛帥的“四清”運動共逼死幹部群眾七萬七千五百六十人，在城鄉共整了五百三十二萬七千三百五十人；地方機關、企業、基層、學校清查出“反黨反社會主義”性質的“聯盟”、“集團”共五千七百六十個；組織結論中定性為“敵我矛盾”的二十七萬六千二百五十六人，“定性敵我矛盾作人民內部矛盾處理”的五十五萬八千二百二十人。毫無疑問，劉少奇要對此負主要責任。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對這些在劉少奇指導下判定的“四清”案件作了復查，結果發現絕大多數案件都是冤、錯、假案，因此予以平反。

1963年11月劉少奇派遣王光美（化名“董樸”），以河北省公安廳秘書的名義到唐山專區撫甯縣盧王莊公社桃園大隊任“四清”工作組副組長，在劉的直接指示下創立了所謂的“桃園經驗”。然後，王光美又在劉的安排授意下，在中共河北省委工作會議上作了“關於一個大隊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經驗總結”的報告。接著劉少奇又安排王光美到各地作報告，傳播他們夫婦共同樹立的“桃園經驗”，以此作為全國“四清”運動的樣板。

當時的江蘇省委第一書記江渭清只不過說了一句“不能盲目執行”，劉少奇便大發脾氣。1964年8月19日，劉少奇又以中共中央的名義擬了批語，並直接寫信給毛澤東，要求把“桃園經驗”作為“四清”樣板批發給全國。8月27日，毛批示“同意”。9月1日，“桃園經驗”便作為一個“有普遍意義”的樣板由中共中央正式行文介紹到全國各級黨政機關。

1964年底劉少奇與毛澤東就“四清”問題發生過爭論。那麼，具體原因何在呢？據國內歷史學者尚冬連介紹，情況是這樣的：

1964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原想趁三屆人大會議期間，請各地與會的領導人討論一下社教問題，帶有工作性質。會議由劉

少奇主持，鄧小平認為一般工作彙報不必驚動毛澤東。他在向毛澤東報告此事後說：如果工作忙，可以不必參加了。在一次會上，毛澤東在劉少奇講話時插話，劉少奇不知毛有很多話要講，毛澤東只講了幾句，就被劉少奇打斷了，這兩件事使毛大為惱火。會議沒開幾天，毛澤東沒有出面就結束了。毛澤東忍無可忍，終於爆發了。會後，江青請陶鑄、曾志夫婦在人民大會堂小禮堂裏看《紅燈記》。

毛澤東在休息室問陶鑄：“你們的會開完了嗎？我還沒有參加就散會啦？有人就是往我的頭上拉屎！我雖退到二線，還是可以講講話的麼！”陶鑄、曾志愕然，誰敢在主席“頭上拉屎”？

曾志回憶說：“我和陶鑄，已隱約感覺到了，主席說的‘有人’二字，這個‘人’恐怕是劉少奇，但是我們不敢相信，也不願相信。”

毛澤東又問陶鑄：“你們開會的人是不是已經走了？”

陶鑄答：“有的走了。”

毛澤東斬釘截鐵地命令道：“告訴他們走了的趕快回來！”參加中央工作會議的各省書記們，又都被召回來，繼續開會。”

於是，按照毛澤東的指令，中央政治局的工作會議繼續開了下去，從1964年12月20日斷斷續續地開到1965年1月14日。

雖然毛澤東想對劉少奇發難，找碴洩憤，但毛不備用自己插話被打斷、未被邀請出席會議閉幕式之類的藉口，所以他就從政治上“挑刺”。在這一系列會議中，毛澤東先是抓住劉少奇關於“‘四清運動’的主要矛盾是黨內外矛盾、敵我矛盾，四清四不清的矛盾，各種矛盾交叉”的提法，提出了更“左”的判斷，“首先抓敵我矛盾性質的問題，重點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由於劉少奇的上述提法先前是經過毛澤東同意的，而且已經寫入下發的中央文件，劉少奇一時不願意否定自己，便耐著性子辯解，主張“還是有什麼問題解決什麼問題”。

面對劉少奇的這種態度，毛澤東大發其火，於是“上綱上線”地開始了對劉的全面批判。

毛先是批判劉領導的社教“打擊面太寬”，接著批判劉主張的“蹲點”，繼之又在1965年1月3日的會議上批判劉的“打殲滅戰”和“紮根串連”，最後在1月5日批了劉少奇的工作隊實施“人海戰術”，也批了王光美的“桃園經驗”。需要說明的是，毛澤東所批判的這些劉少奇的觀點和方法，其實都是毛本人批示同意並大力提倡的。與其說毛是因為與劉有“重大理論分歧”而對劉不滿，還不如說是毛因為對劉不滿而製造出了這些“重大理論分歧”。

更為戲劇化的是，在1964年12月28日下午的會議上，毛澤東還拿出《黨章》和《憲法》，向劉少奇和鄧小平興師問罪：為什麼在12月15日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沒有給他“言論自由”？在黨的高層會議上毛甚至象小孩吵架似地對劉少奇說：“你有什麼了不起，我動一個小指頭就可以把你打倒”。這才是1964年底至1965年初毛、劉之間突然出現分歧的真正原因。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其實，毛、劉的矛盾在建國後就逐步形成並不斷發展。就說1956年，蘇聯的赫魯雪夫在蘇共二十大發表了反史達林的“秘密報告”，劉少奇也就借此提出反對“個人崇拜”和“個人迷信”，在1956年的中共“八大”不提“毛澤東思想”（而這恰恰是劉少奇1945年黨的七大在延安召開時所作《關於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劉少奇指出，新黨章的一個前所未有的歷史特點，是以毛澤東思想來貫穿。他的報告設專節論述毛澤東思想，對毛澤東思想“是

我們黨的唯一正確的指導思想”。第一次對毛澤東思想作出闡釋)。毫無疑問，毛當然是大為不滿。

於是，毛就於 1956 年 11 月接著想借“全黨整風”向劉少奇施加壓力。劉自然對此極為敏感，便故意問毛：這樣的“大鳴大放”，右派跳出來，怎麼辦？毛就隨口說：把他們打下去就是了！可我國廣大善良的知識份子和人民群眾，懷著熱愛祖國的強烈激情，從各個方面提出許多很好的意見或建議。而劉少奇就認為，這是右派翻天！以此來激怒正在青島療養的毛。毛隨即撰寫了《1957 年的夏季形勢》等號召“反右”的文章，又在青島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確定立即在全國開展“反右”運動。致使許多人身敗名裂，家破人亡。可以說，劉少奇也是這場運動的始作俑者。在“四清”後期，毛乾脆一股腦兒地把劉少奇制定的“前十條”和“後十條”統統廢除，專門發佈了《二十三條》，並非常顯著地點明：“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鬥爭矛頭直指劉少奇。以至於，1966 年 5 月毛發動“文革”，在《5·16 通知》提到了“我們身邊的赫魯雪夫”，更是直截了當指向劉少奇。可“文革”開始不久，劉少奇與王光美還要派“工作組”到北京的清華、北大等院校，繼續在師生中抓“右派”。以此，來轉移毛要打倒他的大方向。

毛澤東通過“文革”打倒了劉少奇之後，曾在 1970 年 12 月 28 日與美國記者斯諾談話時坦承：早在 1964 年底他就下決心“必須把劉少奇這個人從政治上搞掉”。

第十一節 鄧小平檢查

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的檢討

鄧小平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三日)

我完全擁護主席和林彪同志在會議中間所作的指示，完全贊成陳伯達同志十月十六日的講話。

這次會議深入的檢查全黨在文化革命運動中的方針和政策，以便於進一步肅清以劉少奇同志和我為代表的資產階級階級錯誤路線的影響，更好地貫徹執行八屆十一中全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貫徹執行毛主席親自製訂和領導的代表無產階級的文化大革命的正确路線，是十分重要的。

現在可以更清楚的看出，在這場偉大的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同過去所有重要階段的革命運動一樣，始終貫徹著兩個階級和兩條路線的尖銳鬥爭，即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正确路線和代表資產階級的反動的錯誤路線的鬥爭。而在這場文化大革命中，代表資產階級反動錯誤路線的，在中央領導同志中，在全黨範圍內，就是少奇同志和我兩人。為了貫徹十一中全會的決議和毛主席的正确路線，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就必須徹底批判我們兩人所犯的錯誤，肅清以我們兩人為代表的錯誤路線的影響。因為我們兩人不但對十一中全會以前一段負有完全的責任，而且對十一中全會以後各地各部門由於我們所代表的錯誤路線的影響，也負有直接的責任。

在十一中全會中，毛主席的一張大字報，就是炮轟劉少奇同志和我兩人的司令部。毛主席在這張大字報中，一針見血的指出我們所犯的錯誤的性質是“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

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志氣，又何其毒也！”毛主席這一炮打得很准，打中了我的要害，在五十多天錯誤中，由於派工作組的結果，實際上起到了壓制左派、打擊左派，壓制不同意見，扼殺了剛剛起來的，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的群眾運動，把運動搞得冷冷清清，普遍地發生學生鬥學生，群眾鬥群眾的現象，把運動引導到了邪路上去。這種群眾對立的狀況，主要是派工作組的結果，而在工作組撤離之後，還難於扭轉，特別是在十一中全會之後，我們所犯的錯誤，仍然在全國範圍內繼續產生很壞的影響，可見其後果之嚴重。這說明，我們所犯的不是什麼簡單的錯誤，而是方向的錯誤、路線的錯誤。

當時的情況是，在北京大中學校革命師生員工普遍起來之後，直接目標對準資產階級當權派，許多學校黨委和領導人壓制革命群眾，被批判被推翻，當時我們把派工作組當作萬應靈藥，對大中學校普遍派，有的學校的工作隊人數很多，而工作組一去就取得了黨和行政的領導地位，加之又普遍用農村或工廠四清運動中曾經主席批判過的方法工作，有的甚至用錯誤的舊思想方法去工作，實際上是讓工作組去控制群眾運動，把群眾當做阿斗，把工作組當做諸葛亮，結果扼殺了已經起來的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普遍地發生打擊左派、學生鬥學生，反而放鬆了甚至放棄了一鬥二批三改的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務。特別嚴重的是，六月中旬，上述的嚴重現象已經明顯的表現出來，理應及時得到糾正。當時中央會議上就有陳伯達等同志正確地分析了運動的情況，反復提出了撤銷工作組、由群眾自己幹革命的主張，可是我們頑固的拒絕了這個指導運動的大方向的正確的主張，一再堅持保留工作組，延續了五十多天，結果發展成為路線錯誤。由於我們犯了路線錯誤，使許多工作組同志遭到了很大的困難，跟著犯了一些缺點和錯誤。因

此，必須講清楚，工作組的絕大多數是好同志，在這段工作中所犯的錯誤，除了個別人外，主要責任不應由他們來負擔，而應由我和劉少奇同志來負擔。不少工作組同志感到委屈，也有不少同志受了委屈，特別是由於我們錯誤的影響，使一些部門一些地方的同志犯了程度不同的錯誤，對此，我感到非常抱愧。

由於派工作組，還在學生群眾中產生了對工作組態度上的嚴重對立，不少師生員工擁護工作組，或者又擁護有批評工作組，有的甚至在我們的錯誤思想指導下，提出了“反對工作組就是反對黨中央、反對毛主席”的極其錯誤的口號。但是，這些師生員工絕大多數是革命的，積極擁護和參加文化大革命的，不能責怪他們，不能說他們是保皇派。名符其實的保皇派，主要是我和少奇同志。

在北京兩個多月運動中，中央常委經常在京主持工作的主要是少奇同志和我兩人，當時毛主席不在北京。派工作組之後，不久就出了壓制打擊左派，群眾鬥群眾，群眾反對工作組的情況，前面提到，六月中旬在中央同志中，以陳伯達同志為代表，就提出了撤銷工作組的正確意見，但是我們聽不進，而對另一方面適合自己主觀需要的錯誤情況和錯誤主張，卻又很聽得進，積極支持。陳伯達等同志的正確意見是從群眾中來的，是符合毛主席的群眾路線的，是緊跟主席思想、抓住運動主流的，而我們卻脫離主席思想，對運動的主流認識錯誤，完全是違反毛主席的群眾路線的，完全是主觀主義，官僚主義的。特別嚴重的是，對於運動中的重要情況，對於指導運動的不同意見，沒有及時向毛主席報告，取得指示，以致這個錯誤延續了五十多天，發展成為路線錯誤，給運動造成了嚴重的損害。

可以肯定地說，如果當時我們虛心一些，善於聽取不同意見，特別是向主席隨時提出報告和請示，是一定會得到主席的指示和幫助的，是可以使錯誤得到及

時糾正的，因為主席早就有少派或不派工作隊的意見。我們對這個指示沒有體會，而且違背了主席的指示，反其道而行之，當然只會犯嚴重錯誤而不能自拔。

我在這次文化大革命中，犯了方向、路線的錯誤，當然不只是派工作組的問題，派工作組不過是錯誤的一種表現方式。我所犯錯誤的實質是，在群眾路線問題上，不是站在信任群眾、支持群眾革命的一邊，而是站在反對群眾革命的一邊；在階級鬥爭問題上，不是站在革命的無產階級一邊。總之，這一條嚴重的錯誤路線是完全違背毛澤東同志的指導方針的。

無產階級階級文化大革命是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提出、親自領導的。正如十一中全會指出的，這“是一場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是我國社會主義革命發展的一個更深入、更廣闊的新階段。”這場偉大革命的目的，不但在於大中學校實現一鬥二批三改的任務，他的更深遠的意義還在於“迎頭痛擊資產階級在意識形態領域裏的一切挑戰，用無產階級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來改變整個社會的精神面貌。”“批判資產階級和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改革教育，改革文藝，改革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以利於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

這是一個興無滅資，保證我國永不變色、避免修正主義、資本主義復辟危險的偉大革命運動。這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偉大壯舉。這樣偉大的革命運動，如果不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導，不是“敢”字當頭，而是“怕”字當頭，不是無限信任群眾，充分發動群眾，依靠最廣大的革命師生員工、革命工農群眾、革命幹部來自己動手地進行這場革命，讓群眾在大風大浪中教育自己、解放自己，是不可能達到目的的。破四舊、立四新的偉大任務，只有依靠他們的革命熱情和智慧才能實

現，因為只有他們熟悉情況，具有這種才智和本領，而我們這種人，是既不瞭解情況，也沒有這種本領的。本來，北京大中學校運動起來之後，形勢極好，群眾普遍運動起來，衝擊著一切牛鬼蛇神，衝擊著黨內的資產階級當權派，聶元梓等七同志的一張大字報，起了北京巴黎公社的偉大的號召作用。當時看起來有些“亂”，這是造牛鬼蛇神反的“亂”，是好得很的“亂”。而我們呢，把這種好的很，看成是糟得很，被所謂“亂”嚇昏了，怕字當頭，亂下藥方，急於讓工作組去控制運動，名為加強領導，實際起了扼殺運動的破壞作用，其結果是把轟轟烈烈的運動變得冷冷清清，群眾鬥群眾，打擊了左派，牛鬼蛇神暗自高興。毛主席說這是實行白色恐怖，是長資產階級志氣，滅無產階級的威風，是一點也不冤枉的。現在看得很清楚，我們所犯的錯誤，一經主席和中央糾正，就出現了非常廣泛的大規模的群眾運動，出現了紅衛兵這樣旗幟鮮明的革命戰鬥組織，革命師生員工氣勢磅礴，由學校發展到社會，由本地發展到外地，以雷霆萬鈞之勢，破四舊，立四新，衝擊一切牛鬼蛇神，戰果輝煌，立下了豐功偉業，無疑這對教育和鍛煉年輕一代，引導全國人民革命化，保證我國不變顏色，不但對中國，而且對全世界，都具有劃時代的極其深遠的偉大意義。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反動派對我們的文化大革命如此恐慌，就證明我們在毛澤東思想的光輝照耀下，由毛主席親自領導的文化大革命，完完全全做對了。而我們呢，身居中央領導工作的高位，對毛主席的戰略思想，對毛主席的群眾路線，沒有學好，沒有領會，在自己的工作中，不理解毛主席的戰略思想，不信任群眾，反而壓制了革命群眾，損害了偉大的文化大革命的群眾運動，這不但是沒有舉起毛澤東思想紅旗，而且直接違反了毛主席的教導，違反了毛澤東思想。

我這次犯這樣嚴重的路線錯誤，當然不是偶然的，這是有思想的根源，也有作風的根源。在思想方面，最根本的一條是，長期以來，不但沒有高舉，簡直可以說沒有舉起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按理說，我的工作崗位是接近毛主席的，可以經常地道毛主席的教誨和指示，但我卻對毛澤東思想學得最差，宣傳最少，用得也最不活。毛澤東思想是我們一切工作的靈魂，掌握毛澤東思想多少，是鑒別我們究竟有多少馬列主義、多少無產階級思想的標準。不進則退，既然學得很差，非無產階級的東西就會多起來，就必然在這個問題那個問題上，脫離毛澤東思想的軌道，犯這樣那樣的錯誤，一直發展到這次犯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錯誤，這是必然的。回想起來，這些年來，我的思想和工作，都是退步的，由於學習不力，沒有跟好主席思想，犯了不少錯誤。我主持的中央書記處的工作，是做得很不好的，書記處直接管轄的中央各部門，問題也最多。在對待階級鬥爭問題上，在對待黨內鬥爭問題上，我的思想是偏右的。在毛主席炮轟司令部的大字報中所說的一九六二年的右傾錯誤，我是有份的，對於一九六四年的形左實右的錯誤，我雖然有些不同的意見，但也不是完全符合毛澤東思想的，不是完全站在毛主席的正確路線方面的。至於一九六二年以前，還有不少錯誤，應該利用這次機會，嚴肅地加以檢討和清理。沒有跟好主席，學習毛澤東思想很差，是與我的嚴重脫離群眾、脫離實際的作風，密切相連。長期高高在上，做官當老爺，下去的少，同群眾接觸少，同幹部接觸少，同負責同志之間接觸也少，對待工作不夠勤謹，沒有認真地向群眾做過調查研究，日常解決問題的方法又很簡單，有時還很生硬，這就只能把自己置於非常閉塞的地位，發展了主觀主義和官僚主義，這樣，在我的思想和工作中，不可避免得常常犯嚴重的錯誤，常常脫離毛澤東思想的軌道，必然要發展到同毛澤東思想相抵觸的地步。而我自己，有長期不自覺，產生

並發展了驕傲自滿、自以為是的情緒，結果處理事情往往不夠認真，向同志、向群眾請教很少，特別是向主席的請示報告很少，這不但是錯誤的重要原因，在組織紀律上也是不容許的。一九六四年底，毛主席曾批評我是一個獨立王國，這個嚴肅的批評，對我有所震動，但以自己不是一個擅權的人來寬解自己，並沒有找到病根所在，我的錯誤思想和錯誤作風，沒有得到改正，這次犯路線錯誤當然是不可避免的，這次不犯以後也必然要犯的。總之，我的思想和作風，同毛澤東思想是格格不入的。沒有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沒有緊跟毛主席，這就嚴重地脫離了領導，加之又嚴重地脫離群眾和脫離實際，完全暴露了我這個人，不是一個毛主席的好學生、是完全不適合擔任重要領導工作的。這次犯路線錯誤，是一次自我大暴露，證明我是一個沒有改造好的資產階級小知識份子，是一個資產階級世界觀沒有得到改造的人，是一個沒有過好社會主義關的人。現在初步用鏡子照照自己，真是不寒而慄。以我現在的思想作風和政治水準，擔任中央領導工作，對黨對人民的事業是不利的，我自己應該深刻反省，努力學習毛主席著作，努力改造，努力改正錯誤，保持晚節力求做一點有利於黨和人民的事情，以求補過於萬一。我有這樣的信心，在自己的積極努力和同志們積極幫助之下，在一個相當時間內，錯誤是會得到改正的。在毛澤東思想的光輝照耀下，自己跌了跤子，應該自己努力站起來。

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確定林彪同志作為主席的助手和接班人，並且選拔了一些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的同志到中央的主要崗位上來，這是非常必要、非常重要的措施，對我國對世界都具有極其重大的意義，我衷心地表示擁護。林彪同志是我們學習的典範，正是他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正是他把毛澤東思想舉得最高，學得最好，用得最活，正是他善於吃透兩頭，對重大問題即時想主席請示報告，

既最瞭解主席的思想和意圖，也最瞭解群眾和下面的情況，所以他的思想水準和領導水準很高，成為毛主席最親密的戰友，他領導的人民解放軍成為全國學習的榜樣。對於我這樣犯錯誤的人，應該老老實實地象林彪同志學習，學習他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學習他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這是我改正錯誤，力求做一點對黨對人民有益工作的唯一可靠的途徑。

我的上述檢討，當然只是初步的，不深刻的，希望得到同志們的批評和指正。

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

偉大的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

偉大的導師、偉大的舵手、偉大的領袖毛主席萬歲！我的自述（摘錄）

鄧小平

（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日至七月五日，鄧小平同志向中央寫了《我的自述》，全文約三萬言。他在這個材料中，比較全面地敘述了他的政治歷史和工作經歷，檢查了他的錯誤。以下為該自述的摘錄。）

紅七軍工作時期

一九二九年夏，蔣桂戰爭之後，俞作伯任廣西省政府主席，李明瑞任廣西督辦公署主任。俞極力表示進步，要求我黨派幹部去他部隊工作，黨中央即派我作為中央的代表同俞接洽。在南寧過了一個多月左右，情況發生了突然變化，我們決定舉行南寧起義，報告了中央並得到批准。九月的一天，我們帶領第四、第五兩個大隊和教導團的一部份舉行了革命兵變。第四大隊由張雲逸同志率領開往百

色，我是同四大隊一道走的。第五大隊由俞作豫同志率領開往龍州，李明瑞是隨五大隊行動的。後以四大隊為基礎成立了紅七軍，以五大隊為基礎成立了紅八軍。

廣西右江地區，是一個比較有群眾基礎的地區，這裏有韋拔群同志那樣的優秀的、很有威信的農民群眾的領袖，東蘭、鳳山地區是韋拔群同志長期工作的地區，是很好的革命根據地，這給紅七軍的建立與活動以極大的便利。我們一到百色，準備打紅旗，決定於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七日起義。起義前夕，在十月下旬，突得上海中央電報，要我去報告工作。我在同張雲逸等同志作了佈置之後，於十一月初由百色去龍州，到龍州後，對李明瑞、俞作豫作了一些工作，並開了黨員幹部會，大家同意打起紅旗，成立紅八軍。我在佈置之後，即由龍州動身，於一九三〇年二月初到了上海，向中央作了報告。中央批准了我們的行動，令我回廣西任七軍政委和區委書記兼八軍政委。一九三〇年三月間，我回到龍州紅八軍，向李明瑞、俞作豫等幹部傳達了中央指示。當時左江形勢日益困難，我同他們商定，不能立足時，可向七軍靠近。紅八軍成立不久，被敵襲擊，損失大部，俞作豫去了香港，後被國民黨逮捕殺害了。紅八軍剩下幾百人（約半個團）由袁振武等同志帶到了右江，合併到七軍裏面了。紅七軍回到右江，大約是七、八月間，我同張雲逸等同志匯合了。

大約在一九三〇年十月中下旬，突然來了中央代表鄧剛（又名鄧拔奇〔？〕），向我們傳達了立三路線，大講全國革命高潮已經到來，指令紅七軍立即出動，其具體任務是三句口號，即“打到柳州去”，“打到桂林去”，“打到廣州去”。全軍聽了都很興奮，於是在十一月初誓師，留韋拔群同志和不多的地方武裝堅持右江根據地（韋英勇地堅持了多年，後被叛徒殺害，光榮犧牲），主力約七千人就向東出

發了。這時我的思想情況是，聽到全國革命高潮到來，確很興奮，但同時感覺依靠這幾千人，百色都未打下，李宗仁、白崇禧已在廣西恢復了統治，要想打下柳州、桂林，是沒有把握的，因是中央命令，只有堅決執行。鄧剛還傳達了中央的批評，說我們在右江的土地政策（這是我在中央時從紅四軍報告中學得的平分土地的政策）是執行右傾的富農路線，我對此也感到不快。

對於立三路線，聽了中央代表的傳達，確實是興奮的，並未覺得有什麼不對，只是從以七軍本身力量來執行那樣大的三個口號的任務，是困難的，又只是從打柳州這樣的具體問題上提出了意見，那時根本沒有什麼路線問題的認識和覺悟。經過一番爭論，我終於全部接受了立三路線，結果使紅七軍脫離了右江的根據地，又錯誤地決定了打武岡，進行梅花戰鬥，使部隊受到很大損失，我作為前委書記，對此要負主要責任，這是無可推卸的。

紅七軍在立三路線的影響下，連打了幾仗，部隊損失很大。過樂昌河時，部隊被敵人截斷了。張雲逸同志率領的軍直和一個團同我們失去了聯絡。我同李明瑞、許卓等同志帶領的一個先頭團，擺脫了敵人，繼續前進，大約在一九三〇年底到了江西崇義。從當地特委處得悉，中央開了四中全會，王明等人上臺，我內心有所震動（這點沒有向別的同志談，我對王明向無好感），同時崇義敵情並不嚴重，我即動了到上海向中央報告工作的念頭。當時前委只有許卓、李明瑞和我三人，我的想法得到了許、李的同意，並商定我離開期間，由許卓代理前委書記。隨後，我同許離開崇義城，去特委佈置建立根據地的工作，不料在回崇義途中，得悉有了敵情，聽到崇義方向的槍聲。那時我因為到上海向中央報告工作，是前委已經決定了的，敵人來後部隊就會轉移，特委機關也會轉移，就同許卓商議，

由他回部隊，必要時可向井岡山靠近。我就動身於一九三一年初到了上海，很快向中央報了到。

關於我離浚紅七軍到中央報告工作的問題，在一九三三年博古的中央反對江西羅明路線時，曾對此事提出正式審查，令我寫了書面報告。我在報告中提請向當時在中央軍委機關工作的許卓詢問，以後再沒有要我進一步寫報告了。現在我認識到，當時失去聯繫的兩部份部隊還沒會合，立足未穩，作為主要負責人的我，在這種情形下離開部隊是絕對不應該的，是嚴重的政治錯誤。

在中央蘇區的三年多

一九三一年八月間，我們到了瑞金，這時正值紅軍主力反對敵人三次“圍剿”的時期。瑞金是中央蘇區的後方，但當時被反革命社會民主黨份子篡奪了縣的黨政領導，殺了不少革命幹部和革命群眾，弄得全縣群眾不滿，幹部情緒低落，全縣面貌是死氣沉沉的。這時在紅軍工作的謝唯俊同志在瑞金，由上海來的余澤洪等同志也到了瑞金，大家商議推我擔任瑞金縣委書記（其時與上級沒有連系），謝餘等都幫助我作了一段工作。我們迅速地懲辦了反革命份子，為被冤屈的幹部平了反，開了縣蘇維埃代表大會，幹部（幾乎全是本地農民幹部）群眾積極起來了，全縣局面大為改觀（關鍵在於有了大批與群眾有聯繫的本地幹部）。三次“圍剿”粉碎後，開了幾萬人的祝捷大會，熱情是很高的。我擔任瑞金縣委書記一年多，大約在一九三二年的冬季，由省委（省委書記是李富春同志）調任會昌中心縣委書記，領導會昌、尋鄔、安遠三縣的工作。三縣都是中央蘇區的邊區，赤白對立很厲害，我們自己的武裝，每縣只有百幾十人的獨立營，人民武裝（赤衛軍）的槍枝很少，由於“左”的經濟政策，商店大都關了門的，財政經濟也很困

難。我在會昌工作半年多一點的時間，未能打開局面。在博古臨時中央進入中央蘇區不久，大約在一九三三年三四月間，我被調離了這個工作到江西省委當了一兩月的宣傳部長，隨即由臨時中央開展了反對以鄧（小平）毛（澤覃）謝（唯俊）古（柏）為代表的“江西羅明路線”。鬥爭後，撤銷了我的省委宣傳部長職務，給了我以最後嚴重警告的處分，派到樂安縣屬的南村區委當巡視員。我到樂安後不足十天，又令我回到省委（據說樂安是邊區，怕出問題），不久，即調到總政治部當秘書長。當時總政治部主任是王稼祥，副主任是賀昌。我當了兩三個月秘書長後，要求另調工作，於是分配我為總政治部宣傳部的幹事，除了一般宣傳工作，還主編總政機關報“紅星”（小報）。這個工作我一直擔任到長征途中遵義會議的前夕。

在太行工作時期

一九四〇年前後，我們碰到兩個問題，一是對國民黨頑固派的反摩擦鬥爭，一是百團大戰。當時彭德懷奉行王明路線，叫我們在反摩擦鬥爭中，要盡量避免摩擦專家張蔭梧、石友三等向蔣介石告狀。我有很短一段時間受了所謂“避免告狀”的影響，未能放手進行反摩擦鬥爭，這雖未更多地影響我們的反頑鬥爭和抗日鬥爭，但不能說不是受了彭德懷所奉行的王明路線的影響。關於百團大戰，我當時不知道未經中央軍委、主席同意，也未過問，而是堅決執行了彭德懷的命令的，執行了錯誤路線（當時不瞭解這是路線錯誤）。隨後我曾在寫文章中讚揚過百團大戰，也是很錯誤的。

大約在一九四三年春，在太行分局開的一次幹部會議上，彭德懷到了，講了很多謬論，就是他那一套所謂平等、自由、博愛的資產階級民主觀點，口氣也是

訓人的，對這對那都批評，引起到會其他人特別是薄一波等人的批駁，雙方爭論很激烈。當時我對彭德懷的一套是不同意的，但對波一波等人的觀點也有不少是不贊成的。我作為分局書記，在作結論時，完全採取了調和立場，避免觸及雙方的爭論，只正面說了根據地建黨、建政、群眾工作、對敵鬥爭等問題。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說：“折衷主義即機會主義”，回想起來（過去不是這樣認識的），這是一個重大的政治性質的錯誤。在一九四五年五、六月間我到延安後，向主席報告了這次會議的情況，並把我在這次會議的結論原文呈交主席了。

在北京工作時期

一九五二年我到北京工作以後，特別是被“八大”選為中央總書記的十年中，我的頭腦中，無產階級的東西越來越少，資產階級的東西越來越多，由量變到質變，一直發展到推行了一條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變成了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之一。

一九五五年劉少奇砍掉二十幾萬個合作社，據揭發我也是三與者之一，我當時沒有管農村工作，在討論時我講了些什麼記不起來了，但思想上對農業合作社發展過快，怕不鞏固的想法是有的。

準備黨的“八大”時，指定我主持修改黨章。在修改的黨章中，刪去了“七大”黨章中以毛澤東思想為黨的指導思想的內容，這個重大原則問題雖然不是我提出的，但我是贊成的。我的這個罪過，對於黨和人民，對於社會主義事業，帶來了極大的損害。“八大”會上，我代表中央作的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中，錯誤地評價了蘇共二十大的作用，錯誤地提到反對個人崇拜問題。這個報告是幾個人集體起草的，這一段也不是由我寫的，似乎記得還是參照一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

驗寫的，但作為主持起草的我應負不可推卸的主要責任。這是一個喪失原則立場的錯誤。

在考慮“八大”中央委員人選時，對過去曾有叛變行為，以後又在長期工作中有所表現的人，是否可以當中委的問題，我當時認為，對某些人可以作特殊情況處理，提為中委候選人。隨即由安子文等人起草了一個檔，這個檔是完全違反黨的組織原則的，是極端錯誤的，它給一些混入黨的各級領導機關，大開方便之門。我是籌備“八大”的一個重要負責人，我是贊成這個檔的，應負嚴重的責任。回想日本投降後，我和薄一波違反黨的組織原則，介紹叛徒劉岱峰入黨，雖然此事在組織上是經過上級批准的，回想起來，也是犯了與上述問題同一性質的政治錯誤。這直接違反了主席一九四零年十二月在《論政策》這個指示中規定的“對於叛徒，……如能回頭革命，還可予以接待，但不准重新入黨”這樣明確的原則的。

我在擔任總書記的十年中，最根本、最嚴重的罪行，是不突出無產階級政治，不傳播毛澤東思想，長期不認識毛澤東思想在國內和國際革命中的偉大意義。沒有認真學習，認真宣傳，還講過在宣傳毛澤東思想中不要簡單化這類的話。

一九五八年實現人民公社化，我確實高興，但在我的思想中，從此滋長了階級鬥爭減弱的觀點，所以在後來的長時期中，我在處理階級鬥爭的問題上，總是比較右的，無論在兩條路線和兩條道路的鬥爭方面，或者在黨內鬥爭（階級鬥爭在黨內的反映）方面，都是如此。

一九六一年我三與制定了工業企業管理條例（草案）七十條，這個檔不是強調政治掛帥、即毛澤東思想掛帥的，是包含許多嚴重錯誤的東西，我對此要負主要責任。

一九六二年刮單幹風的時候，我贊成安徽搞“包產到戶”這種破壞社會主義集體經濟，其實就是搞單幹的罪惡主張，說過“不管黃貓黑貓，抓得住老鼠就是好貓”等極其錯誤的話。這幾年，還存在著高估產、高徵購的錯誤，每年徵購任務的確定，我都是三與了的。基本建設項目，有些不該退的也退了。我作為總書記，對這些錯誤負有更多的責任。

一九六三年開始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有了主席親自主持制定的前十條，明確地以階級鬥爭、兩條道路的鬥爭為綱，規定了一套完整的、正確的理論、方針、政策和方法，完全沒有必要再搞一個第二個十條。第二個十條是完全錯誤的。在杭州搞這個檔的時候，我是三加了的，我完全應該對這個檔的錯誤，負重大的責任。

我主持書記處工作十年之久，沒有系統地總結問題和提出問題，向毛主席報告和請示，這在組織上也是絕不允許的，犯了搞獨立王國的錯誤。一九六五年初，偉大領袖毛主席批評我是一個獨立王國，我當時還以自己不是一個擅權的人來寬解，這是極其錯誤的。近來才認識到，獨立王國不可能沒有政治和思想內容的，不可能只是工作方法的問題。既是獨立王國，就只能是資產階級司令部的王國。書記處成員前後就有彭真、黃克誠、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等多人出了問題，這是與我長期不突出無產階級政治，不突出毛澤東思想的錯誤密切關連的，結果我自己最後也墮落到這個修正主義份子的隊伍中了。在書記處裏，我過份地信任彭真，許多事情都交給他去處理，對楊尚昆安竊聽器，我處理得既不及時，又不認真，對此我應負嚴重的政治責任。在處理對羅瑞卿鬥爭的問題上，我同樣犯了不能容忍的嚴重錯誤。

大量事實表明，在每個重要關節，在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鬥爭中，我不是站在無產階級方面，而是站在資產階級方面；不是站在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和社會主義道路方面，而是站在資產階級路線和資本主義道路方面。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初期

文化大革命一開始，我就同劉少奇提出了一條打擊革命群眾、打擊革命左派、扼殺群眾運動、扼殺文化大革命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出來後，我才開始感到自己問題的嚴重。接著，革命群眾大量揭發了我多年來在各方面的錯誤和罪行，才使我一步一步地清醒起來。我誠懇地、無保留地接受黨和革命群眾對我的批判和指責。當我想到自己的錯誤和罪行給革命帶來的損害時，真是愧悔交集，無地自容。我完全擁護把我這樣的人作為反面教員，進行持久深入的批判，以肅清我多年來散佈的流毒和影響。對於我本人來說，文化大革命也挽救了我，使我不致陷入更加罪惡的深淵。

我入黨四十多年，由於資產階級世界觀沒有得到改造，結果墮落成為黨內最大的走資派。革命群眾揭發的大量事實，使我能夠重新拿著一面鏡子來認識我自己的真正面貌。我完全辜負了黨和毛主席長期以來對我的信任和期望。我以沉痛的心情回顧我的過去。我願在我的餘年中，悔過自新，重新做人，努力用毛澤東思想改造我的資產階級世界觀。對我這樣的人，怎樣處理都不過份。我保證永不翻案，絕不願做一個死不悔改的走資派。我的最大希望是能夠留在黨內，請求黨在可能的時候分配我一個小小的工作，給我以補過從新的機會。我熱烈地歡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

鄧小平給毛澤東的信

(一九七二年八月二日)

主席：

前天，（八月一日）我第四次同全體職工一塊，聽了關於林彪反黨反革命集團陰謀叛亂的罪證，和關於陳伯達反共份子、託派、叛徒、特務、修正主義份子的歷史材料，使我更加感到，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和廣大深入的群眾運動這面無比巨大的照妖鏡，這樣迅速地把這幫牛鬼蛇神的原形顯照出來，特別是如果不是主席這樣從他們的世界觀以及他們的政治觀點和陰謀活動，及時地查覺出他們的反動本質和極大的危害性，並迅速地把他們暴露於光天化日之下，如果一旦他們完全掌握了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那不但我們的社會主義祖國會變到資本主義復辟，而且會使我們的國家重新淪入半殖民地的地步，更不知會有多少人頭落地。沒有疑問的，那時，革命的人民和真正的共產黨人最終會起來把他們打倒，恢復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制度，但是這要經過多長的痛苦的歷史反復啊！言念及此，真是不寒而慄。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打倒了劉少奇反革命的資產階級司令部之後，又打倒了林彪、陳伯達這個反革命集團，再一次為黨和國家消除了最大的危險，使我不禁歡呼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

對於林彪和陳伯達，我沒有什麼重要材料可揭發，特別是對於他們的歷史我一無所知，只能回憶一下平時對他們的感覺。

對林彪，我過去覺得他很會打仗，我不相信什麼百勝將軍，不打敗仗的將軍是沒有的，事實上他也不是每戰必勝的，但認為他畢竟是一個軍事能手。他的沉

默寡言，我也覺得是一個長處。在歷史上，我知道他犯了兩個錯誤，一次是在長征時，他同彭德懷搞在一塊，反對毛主席的領導，他歷來標榜自己是反對彭德懷的，但在這樣非常困難的關頭，卻同彭德懷結成同盟，搞秘密串連，如果沒有主席的威望和堅強的領導，不知會成什麼局面。再一次是抗美援朝，這也是一個嚴重的政治關頭，他又出面反對主席的極端重要的政治決策，並且拒絕到朝鮮作戰，按說他是比彭德懷要適當的人選，而他竟拒絕了，在實質上說，他是怕美國，不相信會打敗美帝，不相信自己的正義立場和自己的力量。這兩件事，一直到八屆十一中全會，在大家的自我批評的空氣中，他才輕描淡寫地說了一下。

在全國解放後，我從一些事情中，逐漸覺得他是一個懷有嫉妒心和不大容人的人。這我是從他對羅榮桓、劉伯承等同志的態度中看出的。劉伯承同志在軍事學院的教學方針中是有缺點和錯誤的，批判是應該的，但是林彪和彭德懷一塊，對劉的批評不是與人為善的，林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更是聲色俱厲的，他們甚至說劉在二野沒起什麼作用，似乎只有我在那裏起作用，當時我曾為此說過，沒有那樣能夠很好合作的司令員，我這個政治委員也起不了什麼作用的（我記得在常委也說過），對我這個態度，林彪當然是不高興的。羅榮桓同志同林彪是老戰友，按說他們應該是很好的，羅榮桓同志為人的樸實、誠懇和厚道，是大家所知道的，羅在幹部中是很有威信的，林彪就說過，四野幹部有事都找羅，不找他。記不得是在一九五幾年，羅榮桓同志曾指出林彪在宣傳毛澤東思想中，只強調老三篇，是把毛澤東思想庸俗化，林彪非常不高興，從此對羅的關係很壞。至於對賀龍的關係，大家是知道的。

對於羅瑞卿問題的處理，我是有錯誤的。在羅瑞卿問題出來前，我一直認為羅瑞卿同林彪的關係是不會壞的，我一直覺得羅是林的老部下，羅當總長又是林推薦的，應該沒有問題，所以，當一九六六年初（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林彪提出羅瑞卿問題時，性質是那樣嚴重，我的感覺是很突然的。而在葉群向我敘述羅瑞卿如何反對林彪，如何企圖奪權時，又夾著一些羅如何輕視我的話，我聽了並不舒服，我總覺得其中包含了一些個人的東西，在方式上多少帶一些突然襲擊的性質，這多少影響我在處理羅的問題犯下那樣不容寬恕的錯誤。

對於林彪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現在看來，他的確是為的打著紅旗反紅旗，是準備奪權、顛覆無產階級專政、復辟資本主義的步驟，但是過去我一直認為他抓得對，抓得好，比我好得多。我過去的最大錯誤之一，就是沒有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但是，過去在兩點上我一直是不同意的一是林彪只強調老三篇，多次說只要老三篇就夠用了，我認為毛澤東思想是在一切領域中全面的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只講老三篇，不從一切領域中闡述和運用毛澤東思想，就等於貶低毛澤東思想，把毛澤東思想庸俗化；一是總感覺林彪的提法是把毛澤東思想同馬列主義割裂開來，這同樣是貶低了毛澤東思想的意義，特別是損害了毛澤東思想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反對國際修正主義運動中的作用，我從阿爾巴尼亞同志的態度瞭解到這一點，我是贊成強調毛澤東思想對於馬列主義的繼承、捍衛和發展作用的。

對於軍隊建設，我過去一直肯定林彪在這方面的作用。過去我只覺得他在強調人的決定因素的時候，忽略了軍事技術和戰術的訓練。林彪多次說，只要人不怕死就會打勝仗，這是正確的，又是片面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見到“毛主席

締造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揮的”這樣的提法，覺得有點刺眼，只覺得這是提高林彪威信的提法，不敢有別的想法，現在原形畢露，才恍然大悟了。

對於陳伯達，他的歷史我一無所知，甚至在延安寫的三民主義概論我也不知道。我對陳的印象是，這個人很自負，很虛偽，從來沒有自我批評。他會寫東西，我從來沒有聽到他讚揚過別人寫的好東西。對於能寫的別人，他是嫉妒的，例如對胡喬木。他經常的口頭禪是“我是個書生，不行”，這就是他唯一的自我批評。他看不起沒有他參與過的文章或檔。如果他提出過什麼不正確的意見，而後來被批判了，他不再說就是，從來沒聽他說他在那件事搞錯了。例如，他對工業七十條說過不好，他究竟對哪些不同意呢？沒聽他說過。我只知道他在工業方面提出了兩個主張，一個是搞托拉斯，一個是要搞計件工資制。搞托拉斯，我們試驗過，這意味著工業的更加集中，對於發揮地方積極性的方針是有很大矛盾的。搞計件工資制（他為此專門在天津搞了個調查材料）是意味要進一步地搞物質刺激，這肯定不如“計時工資與計件工資相結合”的制度好。以後他不說這兩個東西了。因為他提出七十條不好，中央曾指定他負責修改，後來我還催問過他幾次，他始終遲遲不搞，不知他葫蘆裏賣的什麼藥。寫批判蘇聯修正主義一批文章時，由於是在康生同志那一個班子寫的，陳伯達一直沒有興趣參加。只在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二十五條時，由於指定他主持修改，才積極起來。總之，這類的事，還有不少，只是細節記不起來了。陳伯達多年沒有主持過什麼工作，對他這樣一個握筆桿子的人，總要原諒些，所以我對他的印象只是一般的。至於他在主持文化大革命中的事情，特別是九屆二中全會的事情，只是在聽了中央文件的傳達後，才知道像他這樣一個壞蛋，以往那種表露不是什麼奇怪的。

主席知道，林彪、陳伯達對我，是要置之死地而後快的。如果不是主席的保護，我不知會變成什麼樣子的了。

我同全黨全國人民一道，熱情地慶祝在摧毀了劉少奇反革命資產階級司令部之後，又摧毀了林彪反黨反革命集團的偉大勝利！

關於我自己，我的錯誤和罪過，在一九六八年六七月間寫的“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認識到的，作了檢討。到現在，我仍然承認我所檢討的全部內容，並且再次肯定我對中央的保證，永不翻案。

我歷史上最大的錯誤之一，是在一九三一年初不該離開紅七軍，儘管這個行為在組織上是合法的，但在政治上是極端錯誤的。

在抗日戰爭時期和解放戰爭時期，我基本上執行了毛主席的正確路線，當然也犯過一些個別的錯誤。

我另一個最大的錯誤，是在到北京工作以後，特別是在我擔任黨中央總書記之後，犯了一系列的錯誤，一直發展到同劉少奇一塊推行了一條反革命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總書記的工作，我作得很不好，沒有及時地經常地向主席請示報告，犯了搞獨立王國的錯誤。在六〇、六一年困難時期，我沒有抵制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資本主義的歪風，沒有遵照主席指示抓好三線的基本建設，使不該下馬的也下了馬，推延了具有十分重大的戰略意義的三線建設。在工業建設方面，我主持搞的工業七十條，沒有政治掛帥，沒有把主席的鞍鋼憲法作為指標，因而是一個錯誤的東西。在組織上，我看錯了和信任了彭真、羅瑞卿、楊尚昆這些人。特別重大的是我長期沒有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揭露

我和批判我，是完全應該的，它對於我本人也是一個挽救。我完全擁護主席的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時的。

我犯的錯誤很多，在“我的自述”中交代了，這裏不再一一列舉。我的錯誤的根源是資產階級世界觀沒有得到根本改造和脫離群眾脫離實際的結果。

在去年（一九七一年）十一月我在呈給主席的信中，曾經提出要求工作的請求。我是這樣認識的：我在犯錯誤之後，完全脫離工作，脫離社會接觸已經五年多快六年了，我總想有一個機會，從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錯誤，回到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上來。我完全知道，像我這樣一個犯了很大錯誤和罪過的人，在社會上批臭了的人，不可能再得到群眾的信任，不可能再作什麼重要的工作。但是，我覺得自己身體還好，雖然已經六十八歲了，還可以作些技術性質的工作（例如調查研究工作），還可以為黨、為人民作七八年的工作，以求補過於萬一。我沒有別的要求，我靜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衷心地敬祝

主席萬壽無疆！

鄧小平

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

鄧小平 1972 給毛澤東的信,鄧在信中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時的--我對中央的保證，永不翻案。

鄧小平給毛澤東的信（1972）

主席：

前天（8月1日），我第四次同全體職工一塊，聽了關於林彪反黨反革命集團陰謀叛亂的罪證，和關於陳伯達反共份子、託派、叛徒、特務、修正主義份子的歷史材料，使我更加感到，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和廣大深入的群眾運動這面無比巨大的照妖鏡，這樣迅速地把這幫牛鬼蛇神的原形顯照出來，特別是如果不是主席這樣從他們的世界觀以及他們的政治觀點和陰謀活動，及時地查覺出他們的反動本質和極大的危害性，並迅速地把他們暴露於光天化日之下，如果一旦他們完全掌握了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那不但我們的社會主義祖國會變到資本主義復辟，而且會使我們的國家重新淪入半殖民地的地步，更不知會有多少人頭落地。沒有疑問的，那時，革命的人民和真正的共產黨人最終會起來把他們打倒，恢復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制度，但是這要經過多長的痛苦的歷史反復啊！言念及此，真是不寒而慄。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打倒了劉少奇反革命的資產階級司令部之後，又打倒了林彪、陳伯達反革命集團。

對於林彪和陳伯達，我沒有什麼重要材料可揭發，特別是對於他們的歷史我一無所知，只能回憶一下平時對他們的感覺。

對林彪，我過去覺得他很會打仗，我不相信什麼百勝將軍，不打敗仗的將軍是沒有的，事實上他也不是每戰必勝的，但認為他畢竟是一個軍事能手。他的沉默寡言，我也覺得是一個長處。在歷史上，我知道他犯了兩個錯誤，一次是在長征時，他同彭德懷搞在一塊，反對毛主席的領導，他歷來標榜自己是反對彭德懷的，但在這樣非常困難的關頭，卻同彭德懷結成同盟，搞秘密串連，如果沒有主席的威望和堅強的領導，不知會成什麼局面。再一次是抗美援朝，這也是一個嚴

重的政治關頭，他又出面反對主席的極端重要的政治決策，並且拒絕到朝鮮作戰，按說他是比彭德懷要適當的人選，而他竟拒絕了，在實質上說，他是怕美國，不相信會打敗美帝，不相信自己的正義立場和自己的力量。這兩件事，一直到八屆十一中全會，在大家的自我批評的空氣中，他才輕描淡寫地說了一下。

在全國解放後，我從一些事情中，逐漸覺得他是一個懷有嫉妒心和不大容人的人。這我是從他對羅榮桓、劉伯承等同志的態度中看出的。劉伯承同志在軍事學院的教學方針中是有缺點和錯誤的，批判是應該的，但是林彪和彭德懷一塊，對劉的批評不是與人為善的，林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更是聲色俱厲的，他們甚至說劉在二野沒起什麼作用，似乎只有我在那裏起作用，當時我曾為此說過，沒有那樣能夠很好合作的司令員，我這個政治委員也起不了什麼作用的（我記得在常委也說過），對我這個態度，林彪當然是不高興的。羅榮桓同志同林彪是老戰友，按說他們應該是很好的，羅榮桓同志為人的樸實、誠懇和厚道，是大家所知道的，羅在幹部中是很有威信的，林彪就說過，四野幹部有事都找羅，不找他。記不得是在一九五幾年，羅榮桓同志曾指出林彪在宣傳毛澤東思想中，只強調老三篇，是把毛澤東思想庸俗化，林彪非常不高興，從此對羅的關係很壞。至於對賀龍的關係，大家是知道的。

對於羅瑞卿問題的處理，我是有錯誤的。在羅瑞卿問題出來前，我一直認為羅瑞卿同林彪的關係是不會壞的，我一直覺得羅是林的老部下，羅當總長又是林推薦的，應該沒有問題，所以，當一九六六年初（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林彪提出羅瑞卿問題時，性質是那樣嚴重，我的感覺是很突然的。而在葉群向我敘述羅瑞卿如何反對林彪，如何企圖奪權時，又夾著一些羅如何輕視我的話，我聽了並

不舒服，我總覺得其中包含了一些個人的東西，在方式上多少帶一些突然襲擊的性質，這多少影響我在處理羅的問題犯下那樣不容寬恕的錯誤。

對於林彪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現在看來，他的確是為的打著紅旗反紅旗，是準備奪權、顛覆無產階級專政、復辟資本主義的步驟，但是過去我一直認為他抓得對，抓得好，比我好得多。我過去的最大錯誤之一，就是沒有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但是，過去在兩點上我一直是不同意的，一是林彪只強調老三篇，多次說只要老三篇就夠用了，我認為毛澤東思想是在一切領域中全面的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只講老三篇，不從一切領域中闡述和運用毛澤東思想，就等於貶低毛澤東思想，把毛澤東思想庸俗化；二是總感覺林彪的提法是把毛澤東思想同馬列主義割裂開來，這同樣是貶低了毛澤東思想的意義，特別是損害了毛澤東思想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反對國際修正主義運動中的作用，我從阿爾巴尼亞同志的態度瞭解到這一點，我是贊成強調毛澤東思想對於馬列主義的繼承、捍衛和發展作用的。

對於軍隊建設，我過去一直肯定林彪在這方面的作用。過去我只覺得他在強調人的決定因素的時候，忽略了軍事技術和戰術的訓練。林彪多次說，只要人不怕死就會打勝仗，這是正確的，又是片面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見到“毛主席締造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揮的”這樣的提法，覺得有點刺眼，只覺得這是提高林彪威信的提法，不敢有別的想法，現在原形畢露，才恍然大悟了。

對於陳伯達，他的歷史我一無所知，甚至在延安寫的三民主義概論我也不知道。我對陳的印象是，這個人很自負，很虛偽，從來沒有自我批評。他會寫東西，我從來沒有聽到他讚揚過別人寫的好東西。對於能寫的別人，他是嫉妒的，例如

對胡喬木。他經常的口頭禪是“我是個書生，不行”，這就是他唯一的自我批評。他看不起沒有他參與過的文章或檔。如果他提出過什麼不正確的意見，而後來被批判了，他不再說就是，從來沒聽他說他在那件事搞錯了。例如，他對工業七十條說過不好，他究竟對哪些不同意呢？沒聽他說過。我只知道他在工業方面提出了兩個主張，一個是搞托拉斯，一個是要搞計件工資制。搞托拉斯，我們試驗過，這意味著工業的更加集中，對於發揮地方積極性的方針是有很大矛盾的。搞計件工資制（他為此專門在天津搞了個調查材料）是意味要進一步地搞物質刺激，這肯定不如“計時工資與計件工資相結合”的制度好。以後他不說這兩個東西了。因為他提出七十條不好，中央曾指定他負責修改，後來我還催問過他幾次，他始終遲遲不搞，不知他葫蘆裏賣的什麼藥。寫批判蘇聯修正主義一批文章時，由於是在康生同志那一個班子寫的，陳伯達一直沒有興趣參加。只在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二十五條時，由於指定他主持修改，才積極起來。總之，這類的事，還有不少，只是細節記不起來了。陳伯達多年沒有主持過什麼工作，對他這樣一個握筆桿子的人，總要原諒些，所以我對他的印象只是一般的。至於他在主持文化大革命中的事情，特別是九屆二中全會的事情，只是在聽了中央文件的傳達後，才知道像他這樣一個壞蛋，以往那種表露不是什麼奇怪的。主席知道，林彪、陳伯達對我，是要置之死地而後快的。如果不是主席的保護，我不知會變成什麼樣子的了。

我同全黨全國人民一道，熱情地慶祝在摧毀了劉少奇反革命資產階級司令部之後，又摧毀了林彪反黨反革命集團的偉大勝利！

關於我自己，我的錯誤和罪過，在一九六八年六七月間寫的“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認識到的，作了檢討。到現在，我仍然承認我所檢討的全部內容，並且再次肯定我對中央的保證，永不翻案。

我歷史上最大的錯誤之一，是在一九三一年初不該離開紅七軍，儘管這個行為在組織上是合法的，但在政治上是極端錯誤的。在抗日戰爭時期和解放戰爭時期，我基本上執行了毛主席的正確路線，當然也犯過一些個別的錯誤。

我另一個最大的錯誤，是在到北京工作以後，特別是在我擔任黨中央總書記之後，犯了一系列的錯誤，一直發展到同劉少奇一塊推行了一條反革命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總書記的工作，我作得很不好，沒有及時地經常地向主席請示報告，犯了搞獨立王國的錯誤。在六〇、六一年困難時期，我沒有抵制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資本主義的歪風，沒有遵照主席指示抓好三線的基本建設，使不該下馬的也下了馬，推延了具有十分重大的戰略意義的三線建設。在工業建設方面，我主持搞的工業七十條，沒有政治掛帥，沒有把主席的鞍鋼憲法作為指標，因而是一個錯誤的東西。在組織上，我看錯了和信任了彭真、羅瑞卿、楊尚昆這些人。特別重大的是我長期沒有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揭露我和批判我，是完全應該的，它對於我本人也是一個挽救。我完全擁護主席的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時的。

我犯的錯誤很多，在“我的自述”中交代了，這裏不再一一列舉。我的錯誤的根源是資產階級世界觀沒有得到根本改造和脫離群眾脫離實際的結果。

在去年（一九七一年）十一月我在呈給主席的信中，曾經提出要求工作的請求。我是這樣認識的：我在犯錯誤之後，完全脫離工作，脫離社會接觸已經五年

多快六年了，我總想有一個機會，從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錯誤，回到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上來。我完全知道，像我這樣一個犯了很大錯誤和罪過的人，在社會上批臭了的人，不可能再得到群眾的信任，不可能再作什麼重要的工作。但是，我覺得自己身體還好，雖然已經六十八歲了，還可以作些技術性質的工作（例如調查研究工作），還可以為黨、為人民作七八年的工作，以求補過於萬一。我沒有別的要求，我靜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衷心地敬祝主席萬壽無疆！

鄧小平

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

我同全黨全國人民一道，熱情地慶祝在摧毀了劉少奇反革命資產階級司令部之後，又摧毀了林彪反黨反革命集團的偉大勝利！

關於我自己，我的錯誤和罪過，在一九六八年六七月間寫的“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認識到的，作了檢討。到現在，我仍然承認我所檢討的全部內容，並且再次肯定我對中央的保證，永不翻案。

我歷史上最大的錯誤之一，是在一九三一年初不該離開紅七軍，儘管這個行為在組織上是合法的，但在政治上是極端錯誤的。在抗日戰爭時期和解放戰爭時期，我基本上執行了毛主席的正確路線，當然也犯過一些個別的錯誤。

我另一個最大的錯誤，是在到北京工作以後，特別是在我擔任黨中央總書記之後，犯了一系列的錯誤，一直發展到同劉少奇一塊推行了一條反革命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總書記的工作，我作得很不好，沒有及時地經常地向主席請示報告，犯了搞獨立王國的錯誤。在六〇、六一年困難時期，我沒有抵制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資本主義的歪風，沒有遵照主席指示抓好三線的基本建設，使不該下馬的也下了馬，推延了具有十分重大的戰略意義的三線建設。在工業建設方面，我主持搞的工業七十條，沒有政治掛帥，沒有把主席的鞍鋼憲法作為指標，因而是一個錯誤的東西。在組織上，我看錯了和信任了彭真、羅瑞卿、楊尚昆這些人。特別重大的是我長期沒有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揭露我和批判我，是完全應該的，它對於我本人也是一個挽救。我完全擁護主席的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時的。

我犯的錯誤很多，在“我的自述”中交代了，這裏不再一一列舉。我的錯誤的根源是資產階級世界觀沒有得到根本改造和脫離群眾脫離實際的結果。

在去年（一九七一年）十一月我在呈給主席的信中，曾經提出要求工作的請求。我是這樣認識的：我在犯錯誤之後，完全脫離工作，脫離社會接觸已經五年多快六年了，我總想有一個機會，從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錯誤，回到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上來。我完全知道，像我這樣一個犯了很大錯誤和罪過的人，在社會上批臭了的人，不可能再得到群眾的信任，不可能再作什麼重要的工作。但是，我覺得自己身體還好，雖然已經六十八歲了，還可以作些技術性質的工作（例如調查研究工作），還可以為黨、為人民作七八年的工作，以求補過於萬一。我沒有別的要求，我靜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衷心地敬祝主席萬壽無疆！

鄧小平

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

鄧小平第三次上臺前寫給華國鋒的兩封信

鄧小平寫給華國鋒的第一封信

1976年10月10日，兩報一刊發表社論《億萬人民的共同心願》，這篇社論因洩露了中共“最大機密”而引人注目，它公開出現了“團結在以華國鋒同志為首的黨中央周圍”這樣的提法，這表明，中共中央已經“群龍有首”。就在1976年兩報一刊發表社論《億萬人民的共同心願》的時候，鄧小平給華國鋒主席寫了一封親筆信，表達了自己對於粉碎四人幫的歡悅之情。按照當時的慣例，信的開頭是寫“華國鋒、黨中央”。

東興同志轉呈國鋒同志並中央：

我衷心地擁護中央關於由華國鋒同志擔任黨中央主席和軍委主席的決定，我歡呼這個極其重要的決定對黨和社會主義事業的偉大意義。不僅在政治上思想上華國鋒同志是最適合的毛主席的接班人，就年齡來說可以使無產階級領導的穩定性至少可以保證十五年或二十年之久，這對全黨全軍全國人民來說是何等重要啊！怎不令人歡欣鼓舞呢？

最近這場反對野心家、陰謀家篡黨奪權的鬥爭，是在偉大領袖毛主席逝世後這樣一個關鍵時刻緊接著發生的，以國鋒同志為首的黨中央戰勝了這批壞蛋，取得了偉大的勝利，這是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勝利，這是社會主義道路戰勝資本主義道路的勝利，這是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勝利，這是鞏固黨的偉大事業的勝利，這是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革命路線的勝利。

我同全國人民一樣，對這個偉大鬥爭的勝利，由衷地感到萬分的喜悅，情不自禁地高呼萬歲、萬歲、萬萬歲！我用這封短信表達我的內心的真誠的感情。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萬歲！黨和社會主義事業的偉大勝利萬歲！

鄧小平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日

鄧小平的信，沒有提及他自己的問題。但是，他寫這封信給華國鋒，言外之意是很明白的：四人幫已經被粉碎了，“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也該結束了！

但是，華國鋒看了鄧小平的信，摺在一邊。

10月24日，下午3時，百萬群眾雲集天安門廣場，“雙慶”大會在這裏舉行。這是華國鋒作為中共領導人，第一次在萬眾歡呼聲中登上天安門城樓。

和華國鋒一起登上天安門城樓的中共領導人之中，沒有見到鄧小平的身影。這個時候，華國鋒仍然遵照毛澤東親筆給他所寫的“照過去方針辦”的指示，要“深入批鄧，繼續反擊右傾翻案風”。

鄧小平給華國鋒的又一封信

1977年4月10日，鄧小平又給華國鋒寫了一封信。這一回，鄧小平破例把葉劍英的名字也寫上去，一開頭寫著“華主席、葉副主席並黨中央”。鄧小平這麼寫，另有用意：因為1976年10月10日他寫的那封信，只寫給華國鋒，被華國鋒摺在一邊；這一回寫上葉劍英的名字，那麼，華國鋒看了之後，不能不轉給葉劍英看，華國鋒也就無法一手遮天。

華主席葉副主席並黨中央：

我完全擁護華主席最近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完全擁護華主席抓綱治國的方針和對當前各種問題的工作部署。

我在七五年的工作雖然也作了一些有益的事情，但在工作中確有缺點和錯誤，我對偉大領袖和導師毛主席對我的批評和教導再一次表示誠懇的接受。

我感謝黨中央弄清了我與四人幫沒有關係這件事，我特別高興在華主席的講話中肯定了廣大人民群眾去年清明節在天安門的活動是合乎情理的。

至於我個人的工作問題，做什麼，什麼時候開始工作為宜，完全聽從中央的考慮和安排。

在偉大領袖毛主席逝世的時候，我曾向中央用書面表達我內心的悲痛和深切的悼念。我們必須世代地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把黨和社會主義的事業，把國際共產主義的事業，勝利地推向前進。

在黨中央決定由華國鋒同志擔任黨中央主席和軍委會主席的時候，我知道了以華國鋒為首的黨中央以最英明果敢、最正確的方式戰勝四人幫的偉大勝利的

時候，我在七六年十月十日曾向國鋒同志和中央用書面表達我的真誠擁護和歡欣鼓舞的感情。

如果中央認為恰當，我建議把我這封信連同去年十月十日的信印發黨內，究應如何處理，完全聽從中央的考慮和決定。

順致誠摯的敬禮！

鄧小平

一九七七年四月十日

5月3日華國鋒同意以中共中央名義轉發了鄧小平的兩封信。中共中央轉發鄧小平的信，成了向全黨發出了鄧小平第三次複出的訊號。

第十二節 首都批判刘邓资反路线大会聶元梓發言

徹底批判劉少奇、鄧小平，將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同志們、紅衛兵戰士們：

我們偉大導師、偉大領袖、偉大統帥、偉大舵手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洶湧澎湃、席捲全國，震撼了整個世界，敲響了一切反動階級的喪鐘，革命人民揚眉吐氣，歡欣鼓舞。但是，那些混進黨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卻手忙腳亂、驚慌失措、嚇破了膽。為了維護他們的統治，保住他們的獨立王國，他們與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相對抗，泡制了一條反對文化大革命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企圖把這場

轟轟烈烈的偉大的文化大革命鎮壓下去。他們的用心是多麼惡毒，多麼陰險！

在毛主席的親自領導下，廣大革命人民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展開了鬥爭。但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還在繼續頑抗，以新的、更加隱蔽的形式進行新的反撲，掀起了一股反革命逆流，刮起了一陣陰風。革命群眾奮起反擊，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進行了堅決鬥爭，大長了無產階級志氣，大滅了資產階級威風。現在我們一定要乘勝追擊，追根究底，把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徹底批倒、批臭，徹底肅清。

水有源，樹有根。誰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總根子、總指揮、總頭目？誰是反對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總統帥？這就是劉少奇、鄧小平這兩個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劉少奇、鄧小平，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制定者、指揮者，是鎮壓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禍首。他們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下了種種罪行，進行了一系列罪惡勾當：

他們公開支持反黨叛國分子彭真親手泡制出來的反革命的“二月提綱”，並把它作為中央文件，散發各地、流毒全國。劉少奇、鄧小平是反革命“二月提綱”的支持者和庇護者。

他們竭力反對和企圖扼殺北大的“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對支持這張大字報的康生等同志施加“壓力”。這個陰謀由於被毛主席戳穿了才未得逞。

他們還背著毛主席，大派工作組，一度“控制局面”，顛倒是非，棍澆黑白，鎮壓革命群眾，圍剿革命派，妄圖扼殺文化大革命，達到繼續實行他們修正主義統治的目的。

他們又一手策劃制定所謂“中央八條”，想把所謂“內外有別”、“注意洩密”等八條枷鎖，套在革命群眾的脖子上，想把蓬蓬勃勃的革命群眾運動打下去。劉少奇、鄧小平是扼殺革命群眾運動的總指揮。在群眾運動的烈火撲滅不下去時，他

們就撕去了假面具、露出凶相，竟然命令工作組鎮壓革命群眾，把革命群眾打成“反革命”，實行白色恐怖。他們的得力打手北大工作組組長張承先，把北大革命的“六·一八事件”，污蔑成“反革命事件”，把革命群眾打成“反革命”。劉少奇、鄧小平對此不僅大加誇獎，而且命令他立即總結成所謂的“經驗”刊登出來。這還不夠，他們居然還在這個反革命的“經驗”之前，加了一個所謂的“中央批示”。在全國推廣，說什麼“別處發生類似情況也要照此處理”。這樣，就在北大、清華和全國各地掀起了一陣鎮壓革命的白色恐怖。劉少奇、鄧小平就是這樣的鎮壓革命群眾、實行資產階級專政的大劊子手。

請大家看一看，劉少奇、鄧小平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已經發展到了怎樣嚴重的地步，他們竟象國民黨反動派一樣，對革命群眾採取公開鎮壓、實行白色恐怖、製造流血事件的反革命手段！

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劉少奇、鄧小平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受到了嚴正的批判。但是，他們並不甘心自己的失敗，而是採取新的形式，更隱蔽、更惡毒、更陰險地來和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相對抗。他們挑動群眾鬥群眾，企圖繼續欺騙人民，維持統治，扼殺革命。在北京大學，他們就繼續玩弄花樣，通過王任重，想拉攏一批人，打擊革命左派，想繼續控制北大局面。多少年來，北京大學一直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激烈爭奪、鬥爭的重要陣地。

劉少奇、鄧小平不到黃河心不死，他們死死拉住北京大學這塊陣地。陸平倒了，就派親信張承先來；張承先倒了，又想通過王任重來統治北大。但是，你們這套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把戲，再也欺騙不了革命群眾。我們有毛澤東思想這個顯微鏡、照妖鏡，一切陰謀詭計，都逃脫不掉，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在我們這裏破產了。你們必須徹底交代在全國和在北大所犯的一切罪行，你們必須徹底向人民

低頭認罪。

為什麼劉少奇、鄧小平職位這麼高、資歷這麼長，卻如此惡毒地制定和頑固地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處心積慮地鎮壓革命群眾、反對文化大革命？原來是這樣：劉少奇、鄧小平從來就不是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家，而是資產階級革命家。他們代表的是資產階級利益，是黨內資產階級的最大的代表，是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他們反對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不自今日始。他們一直是和毛主席的方向、道路針鋒相對，背道而馳的。

早在 1942 年民主革命時期，劉少奇就在新四軍內胡說過：“不應該放棄三民主義的旗幟”，“共產黨的旗幟拿不出去，對群眾沒有號召力”。在他看來只有三民主義的旗幟對群眾才有號召力。

在 1945 年劉少奇、鄧小平就走上了右傾機會主義的道路。在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上，王明的機會主義路線剛得到清算，但劉、鄧背著毛主席在黨內又伏下了一條新的右傾機會主義的黑線。他們站在資產階級反動立場上，維護資產階級的利益，竭力要把中國引向資本主義道路。一九四六年曾幻想政協實現，走向和平、也即妥協的道路；並且在土改中實行形“左”實右的資產階級路線。

全國解放以後，他們一直念念不忘，夢想中國走向資本主義道路。一九四九年入城後，就一步步走向向資產階級妥協、投降的道路，閉口不談整個過渡時期的主要矛盾是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矛盾，竭力阻止工商業改造。

一九五一年他們公然阻止把老區互助組提高到合作社，一九五五年，他們更支持砍掉二十萬個合作社。隨著社會主義革命的深入，他們和社會主義革命的抵觸、矛盾就愈來愈大。他們在民主革命時期就是和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相對立的，當社會主義革命深入時，他們就更加和這個革命格格不入，和國際上的

修正主義反動思潮和國內資產階級右派勢力相呼應。在一九五六年的八大上，他們就公然扯起了反毛澤東思想的黑旗，提出一系列修正主義理論，鼓吹階級鬥爭熄滅論，胡說什麼“我國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誰戰勝誰的問題，現在已經解決了”，以此來與毛主席的階級鬥爭學說相對抗；還給資產階級塗脂抹粉，大搞階級調和；又胡說什麼“在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後，民族資產階級和上層小資產階級的成員將變成社會主義勞動者的一部分。各民主黨派就將變成這部分勞動者的政黨”，這是為“全民黨”作輿論準備。更不能容忍的，他們居然把七屆二中全會上規定的黨員義務第一條“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學習毛澤東思想”，篡改成“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不斷提高自己的覺悟程度”。他們是如此害怕和仇視毛澤東思想，他們就是要反對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二年我國經濟困難時期，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各國反動派掀起了反華大合唱，國內也掀起了反對三面紅旗的妖風。劉、鄧就是國內這股逆流的總指揮。那時刮起的“三和一少”、“三自一包”、單幹風、翻案風，就是在他們的支持和慫恿下刮起來的。一直到一九六三年，他們居然反對毛主席提出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制定了一條反對毛主席的正確路線的形“左”實右的機會主義路線，來和毛主席對抗。劉少奇、鄧小平又是扼殺北京大學社教運動的罪魁禍首，他們與反革命修正主義大黑幫彭真、陸平勾結在一起，打擊革命左派。鄧小平盜用了中央的名義，親自主持了1965年3月3日的中央書記處會議。這是一次黑會，完全背著毛主席，惡毒地攻擊毛主席，指揮了一場極其殘酷的反攻倒算。劉少奇還親自批示了革命左派給毛主席寫的控告信，指揮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彭真公開印發，並組織反革命打手，對革命左派進行反攻倒算，血腥鎮壓。到了文化大革命時期，他們又陰謀泡制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已經公開出來鎮壓革命群眾，搞白色恐怖，製造流血事

件，他們把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發展得更為完整、更為公開、更為反動了。這是他們一貫實行的右傾機會主義的必然發展，是他們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在新的條件下的表現。正是這樣，他們也就走向了末路。

實踐證明，劉少奇、鄧小平從來就不是無產階級革命家，而是資產階級革命家，因此必然走向和毛主席背道而馳的反動道路上去。

劉少奇、鄧小平是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是中國現代修正主義的祖師爺、資產階級司令部的黑司令。他們是這幾十年來所有反黨集團的包庇者、大黑傘。高崗、饒漱石反黨集團、彭、黃、張、周反黨叛國集團和最近的彭、陸、羅、楊反革命叛國集團，都受到了劉、鄧反動路線的保護，他們之間有著密切的聯繫。這些反黨集團都是在劉、鄧的保護、包庇、掩護下才形成、發展起來的。因此，我們要徹底粉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就必須徹底批判劉少奇、鄧小平。只有徹底批判他們，肅清他們的影響，才能徹底鬥倒彭、陸、羅、楊反革命叛國集團，才能徹底鬥倒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也只有徹底批判劉、鄧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才能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只有徹底批倒、批臭劉、鄧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才能使中國不變顏色、不出修正主義。

毛主席教導你們：“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這也和掃地一樣，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劉、鄧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雖已破產，但還沒有徹底打倒、徹底肅清，有些地方還在垂死掙紮，妄圖反撲。我們必須乘勝追擊，全國人民群起而攻之。我們對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鬥爭，是你死我活的尖銳的鬥爭，這是關係到我國和世界革命的命運的重大問題，我們決不能等閒視之。現在正是這場鬥爭的關鍵時刻，我們一定要象毛主席教導的那樣，奮起千鈞棒，澄清萬裏埃，徹底肅清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我們也要嚴正警告

劉少奇、鄧小平，你們必須徹底繳械，拋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否則，矛盾就會轉化，人民將會審判你們，歷史是無情的。

最後讓我們高呼：

徹底批判以劉、鄧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勝利萬歲！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

我們最偉大的領袖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

（在 1966 年 12 月 27 日首都徹底批判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誓師大會上的發言）

首都“徹底批判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通電

徹底批判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

全國廣大的工農兵、革命師生同志們：

革命的紅衛兵戰友們：

當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形勢大好。巨大規模的群眾運動波瀾壯闊、洶湧澎湃！

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取得了偉大勝利，以劉少奇、鄧小平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已宣告破產。

但是，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極少數頑固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並不甘心自己的失敗。他們上下串通、重新集結，掀起一股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反革命逆流。他們打著“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幌子，攻擊革命左派，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聲嘶竭力地發出一聲聲狂吠。什麼“要

踢開中央文革”呀，什麼“林彪同志靠邊站”呀，等等，等等。

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叫囂歸結到一點，就是要為劉少奇、鄧小平大鬧翻案，就是要叫修正主義在中國重演。這是我們決不答應的！

兩條路線的鬥爭，歸根到底，就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個階級，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

為了徹底批臭劉、鄧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為了擊潰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瘋狂反撲，為了從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徹底肅清劉、鄧在全國人民中的影響，我們——首都的革命造反派召開了“徹底批判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

這個大會是戰鬥的大會，是勝利的大會。它大長了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志氣，大滅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反動氣焰！開得及時，開得好！

通過這個大會，一切革命的人民更加清楚地看到了劉少奇、鄧小平的反革命修正主義真面目。

劉少奇、鄧小平是最大的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他們一貫反對毛澤東思想，反對把毛澤東思想作全黨的指導思想，反對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他們反對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抵制合作化運動，鼓吹單幹，大刮資本主義陰風，他們抗拒深入發展的社會主義革命，制定形“左”實右的機會主義路線，扼殺城鄉“四清”運動，他們泡制和推行“兩種教育制度，兩種勞動制度”的修正主義教育路線。他們是中國修正主義的總根子！

劉少奇、鄧小平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代表人物。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寫得何等好啊！可是，劉少奇、鄧小平卻反共道而行之。他們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壓制革命派，圍剿革命派，實行白色恐怖，妄圖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他們是鎮壓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劊子手！直到現在，他

們還頑固地堅持這條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不肯向革命的人民低頭認罪！

不徹底批判劉、鄧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就不能肅清其影響，蕩除其流毒，就不能貫徹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就不能大立毛澤東思想！

全國革命的工農兵同志們，革命的紅衛兵戰友們，讓我們高高舉起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發揚大無畏的革命精神，大造劉少奇、鄧小平的反，徹底揭露他們的反動面目，徹底批臭他們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

打倒劉少奇、鄧小平！

誓死捍衛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

偉大的、光焰萬丈的毛澤東思想萬歲！

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毛主席萬歲！萬萬歲！

徹底批判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北京

（原載人大三紅大字報選編輯部編《徹底批判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二）》，

1967年1月6日）

附件： 中央專案組“劉少奇罪證”

第八节 刘少奇罪证

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罪证

一九二五、一九二七、一九二九年叛卖活动的主要罪证

中央专案审查小组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八日

刘少奇一九二五年在长沙 被捕叛变的罪证

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后，阶级斗争更加激化。正当上海工人同英、日帝国主义、北洋军阀和买办资产阶级进行紧张搏斗的时候，窃据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上海总工会负责人职务的刘少奇，借口养“病”，躲开上海总工会。军阀邢士廉于九月十八日查封了上海总工会，十九日下令传讯李立三、刘少奇等人。刘少奇畏惧斗争，于同年十一月私自从上海潜逃长沙。

当时，湖南省省长、军阀赵恒惕正在厉行白色恐怖，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六月发布了“四斩”反革命布告；十月杀害了工人运动领袖黄静原等同志。十二月十六日，刘少奇在长沙文化书社被长沙戒严司令部逮捕。经过审讯，赵恒惕亲批将刘少奇“斩决”。

这时，刘少奇的后台，纷纷出动。刘少奇的把兄弟、长沙禁烟局长洪旻随和省府会计、赵恒惕至亲杨剑雄，伙同军阀叶开鑫、贺耀组和刘少奇的胞兄刘云亭出面，进行反革命政治交易。屠杀共产党人的大刽子手赵恒惕，向刘少奇这个“要宰的人”提出了活命的条件。刘少奇完全接受，投降了敌人，背叛了革命。

接着，刘少奇于一九二六年一月十六日，奉赵恒惕的旨意，捧着赵恒惕赏赐的“四书”，离开湖南前往广州，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重新钻进党内来。

(3) 许文煊关于刘少奇一九二五年藏在长沙文化书社
被军阀赵恒惕逮捕的证明

关于刘少奇被捕的问题

我在1925年春到1926年冬在长沙文化书社做
会计工作。1925冬刘少奇从上海回湖南，住在文化
书社楼上，大约一个多月。有一天来了几个穿便衣的人，
找刘少奇。见到刘少奇后，就把他抓走了。没有抓
其他人。当时湖南省长是赵恒惕

许文煊 1968.10.15.

1307

注：许文煊原在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现退休。

(4) 反革命分子黎泽泰关于军阀赵恒惕要将刘少奇
“斩决”的交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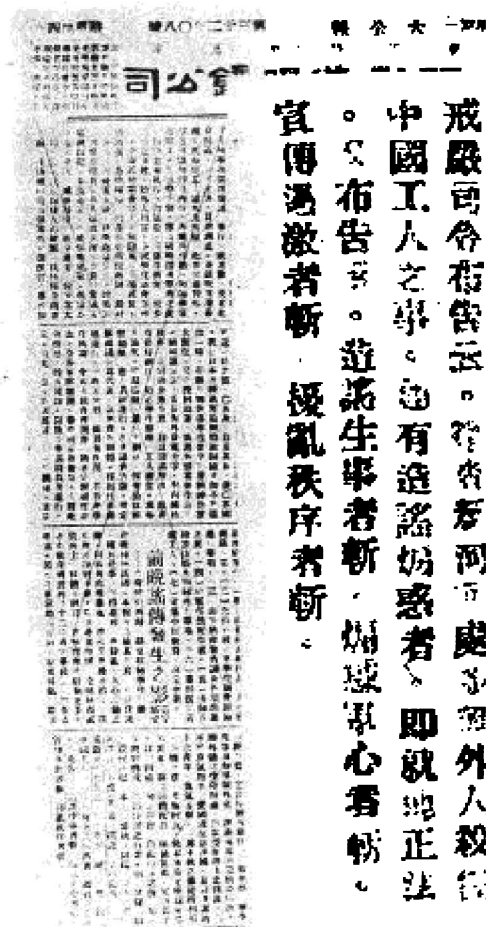
1925年起恒惕抓了刘少奇并要特刘“斩决”
1925年我在湖南省长署秘书处当文员正是反动军阀反共刽子赵恒惕当湖南省长的时侯。赵恒惕是对共产党怀着刻骨仇恨毫不留情。所以先后颁发了“十斩”“四杀”的布告。就包括共产党人在内。即所谓“过激派分子刘少奇就是在赵恒惕血腥镇压共产党人这个紧急时刻被捕入狱的。当时据湖南省长署会计科会计科对种俊”亲眼看到赵恒惕在审问刘少奇卷上批有“斩决”字样。特为揭发证明这一确凿事实。

黎泽泰
1967.8.23。

注：一九二五年军阀赵恒惕在广东省港罢工，广东革命政府酝酿北伐，湖南出现倒赵运动的情况下，为了镇压革命运动，发布了“四斩”的反革命布告。黎泽泰的笔供证实，刘少奇被捕后，赵恒惕要将其“斩决”。

黎泽泰一九二五年是军阀赵恒惕省长署文牍，后任国民党上校军法处长，县长等反动职务，原任我某省参事室参事。

(5) 一九二五年六月八日长沙《大公报》关于军阀赵恒惕发布“四斩”反革命布告的报导



影印件原文：戒嚴司令布告云。查省河百處。恐外人殺害中國工人之事。如有造謠煽惑者。即就地正法。又布告云。造謠生事者斬。煽惑軍心者斬。宣傳過激者斬。擾亂秩序者斬。

(6) 一九二五年十月十八日长沙《大公报》关于安源工人俱乐部副主任黄静原同志被军阀赵恒惕杀害的报导



(8) 反革命分子楊劍雄一九五二年關於劉少奇被捕叛變的亲筆供詞。此人以後被劉少奇擅令槍斃，此事足以證明劉少奇做賊心虛，殺人滅口

(一)

楊劍雄反看

我於民國三十三年在軍閥趙恒惕所組織的偽省長署會計股當會計員。某月的一天，我出席趙恒惕和他的各偽處長合官辦公的時候，聽到偽軍法處趙處長報告昨晚有長令我拿的某月某日到少奇，我比派衛隊營的某於文化書局捕獲來了，請示如何處理。趙恒惕答你提問一下，送陸軍監獄看收押，並對陸軍監獄着李德著未字一個手令任何人不得接見。我聽了之後，就想這個人不是我。唯前同字後在育才中學畢業去過俄國的劉銜堂嗎？一俟下辦，趙恒惕先走出時，我即在偽趙處長手中備業卷一看，註明係軍閥人，我更想到像他了。下了辦之後，我就去軍法處去偷看提問。我在隔天井階都看見一個着灰

(二)

布長袍，手向後靠，拿了一頂博士帽，背對着我，在室內踱步。然，是我想像的。他一刻半沒處站，他這五陸軍監獄官，我回到我的辦公室，料想一切後，即驅車趕去陸軍監獄署，去看他。但儲李署長以奉有任何人不能接見之令，不讓我會他。這位李署長原與我有口實場中的回音，應酬甚也。晚，我像種焦急的相信人，我和李說了許多話，他連聽的話，并沒提出問題，但急責備你這事，我負責。李終於允許了我會他，在進入監獄，閱讀的深獄中，佛柵與他相見，我的模樣，有些比在讀書時不同，並掛有傷者，甚密的物到評章，他似不認識我的樣子，我報了名字給他，「腦子裡轉一下，就連聲答記以不，我問他，你為甚么來到這裡，他答我，也不曉得為甚么，他講時，聲意，我的評章，似有顧慮的樣。

子。我就很忠實很在廠的對他說。我現在某處做事。就
的你的事。極嚴重。你有甚公事。甚公話。還不對我講。還
不相信我。那就恐怕沒有人能進這裡來會你。他聽了
我這翻話。沉思了一下。就對我說。我的內人何嘗不信任有
山青祠。而外。某舞。請你去問他。就不知道在這裡。我不便講。
我又問他。你要錢用。不要其池東西。不他答。我不要錢。我祇
要一床被。請你娶我的內人。送一床被來。我就要娶了他。翻
連忙跑到青山祠去會何夫人。何夫人不在家。我滿了一
個名氏字。所住地址。要何遠來我家。我回到家。住幾日。法久。何
印來我家。憑注持傷。不已。我要娶了她。許久。她才咽唾。手舞下
來。我問她。街坊。看甚公。社捕。我今天。已。在。下。巡。微。署。會。見。了。他。
妻。我。來。會。你。就。知。道。的。何。答。道。這。次。他。是。回。到。湖。南。接。他。的。兒。子。

(四)

那末他所做的事楊先生你也是曉得的。他在上海住不住，所以回到湖南不幹在這裡被捕去。我同我和他的關係及知道案情的前後，並願竭力幫助他。他表示感激和付託，我已着人回鄉去叫他老兄來省，他的老兄看如何進行。我又告訴他，他在獄裡要一床被，她印的被送去，而信陸軍監獄署人是不予收轉。我又寫信給李若長，連被着人送去，先收轉。這兩天他的老兄劉六公到省，商量些方法。那時有芳儲御住的洪慶場在某處做事，與他係鄰里同業，因訊品參加整政，於是我和洪分途進行。請寧鄉當日所謂首要人物葉開森、賀耀祖、譚潤生、次要人成、袁、林、楊等，並等共同具稟担保，保葉由劉六公寫作好，再由劉六公

(五)

和我及洪三人出名清董贺茅到天津后，怕保董二加盖私章，他们并叫保董交付给我，要我当面送交赵恒惕，我当场承担这任务，并与董贺相约如赵问你们将请你们切实担保，我比回到省长署，就持保董送至赵恒惕，赵恒惕在室外，连声恭喜，要见省长，也不顾自己的人气，喊小雅我进入时，赵正任地因二文，赵问了我一餐，有甚事，我即叫保董递文说，董师名贺师名贺等要任，刘少奇，赵叫保董看了一下一，即置茶旁，一面批阅文件，一面说道，这是要董的人，你也未保，我呆了好久，一身冷汗，汗流襟袖，不敢动，保赵的公文，因定董，再来，说是要达成我的任务，赵问我你与他有甚么关系，我答

任同卿同志，蒙魏秋会负责保他吗？我答：他们都能负责。如果有去不信任，可打电话问他们。魏即叫马开樵电话与董，我不便再介入。我即走去的电话，魏好，要董师名说谈，董说：这是我，常按明白这四事。魏接了电话，魏说：我问了，问某某你负责吗？后应了，我即就排了问题，回到中位上想了一阵，对我说：你负责？我答：看省表，如有吩咐我就如何做。魏说：你要他迅速离开，而不要在这里乱搞，要他动股去，买一册四音五经送给他，好去读。我答：这些事，我都能负责。魏到，魏印的保京上批，要保开樵四家，我印的送董修送王。

(七)

借军法处解押手續。空了兩天他就出監了。出
監後他和何夫人到了我家。道謝了我。何夫人并
說我們這一生不會忘記你。他最後提出問我說
你願意入黨不。我那時拿了一物。問他這口。沒有認
識。這步。回答他不入。這後我想這恐怕是他考
以答謝我。以此來當作禮物。奇怪我接受不了。別
以他苦我他在右少還看幾天。就這就會去上海。

注：反革命分子楊劍
雄系大惡霸地主，一九二
五年任湖南省長署會計。
趙恒惕是楊的姨表姐夫，
因而楊成為參預策劃劉少
奇叛變出獄的重要人物。
楊犯一九五二年被我政府
逮捕後所寫的筆供，雖然
足為表“功”保命，但也道
出了劉少奇一九二五年被
捕後，完全接受了軍閥趙
恒惕提出的活命條件，投
降了敵人，背叛了革命。民
十三年應為民國十四年。
劉六公系劉少奇胞兄劉云
亭（已死），叶開鑫（已死），
賀耀組（已死），均系趙
恒惕手下的師長。洪濤燭
（已死）一九二五年任長沙
禁烟局局長，是劉少奇的
把兄弟。何夫人即劉少奇
前妻何家珍。

(9) 地主分子刘作衡关于刘少奇接受了军阀赵恒惕提出的活命条件，叛变出狱的亲笔供词

民國十四年刘少奇被趙恒惕拘
捕押在監獄外十多天趙恒惕
送他一部書並要刘少奇出獄
后不在湖南搞离佳开湖南刘少奇
答应不在湖南搞出外就后就
走了
刘作衡
1927年十一月十九日

注：刘作衡的笔供证实，刘少奇接受赵恒惕提出的活命条件，捧着赵恒惕赏赐的“四书”，“迅急离开湖南”前往广州。

刘作衡系刘少奇的胞兄，被刘少奇安插在我湖南省参事室当参事，现被本乡革命群众监管。

(11) 刘少奇的简历底稿

1925年冬 长沙被捕，二月，多方营救，驱逐出境去广州。
1925年春 主要职务：全国总工会外
1926年秋 调任：湖北总工会外

注：刘少奇在一九五二年要王光美抄写刘的简历底稿中，承认一九二五年冬在“长沙被捕”（此四字是刘少奇亲笔），但将接受赵恒惕提出的活命条件，投降敌人，离开湖南，写成“多方营救，驱逐出境去广州”，以掩盖其叛徒面目。

(12)一九五三年一月二十六日宁乡县公安局给刘少奇的信

美用局安公府政民人縣鄉寧

劉副主席：
據我縣忠地犯楊劍雄供稱有元二
四斗當 主席至長沙文化書店家
魏匪陸卓監獄時楊犯以 主席因
其關係努力邀請貸銀祖及葉開
金等三名向趙匪担保其係姪行保
救 主席亦獄一事。
楊犯一黃橫分鄉裡強盜人命詳
家痛恨入骨業經我縣呈奉 湖南

寧鄉縣人民政府公安局用箋

省人民政府批准死刑書，我們為了慎重起見特備此請示上項案款主席事是否確實以便處理等語批發是幸。

此致

李亨的敬禮

羅烈民 啟

一九五二年十月十日

羅烈民 啟

羅烈民 啟

注：反革命分子楊劍雄一九五二年被逮捕后，供出了一九二五年曾“救”过刘少奇的命，宁乡县公安局为此将判处杨犯死刑之事直接报告刘少奇，请示处理意见。

(13) 刘少奇一九五三年一月二十九日给宁乡县委转公安局的亲笔电报原稿。这是刘少奇杀人灭口的铁证

發 明碼器等項果。 附註
批發 內容

湖南寧鄉縣委轉公安局霍建國
同志：

一月廿六日來函悉。楊劍在佳和我
在小學同過學，以後卅多年未見過，
過任何關係，他既稱一九二四年
在長沙營救我出獄等語，在
無其事。我一九二五年在長沙被
捕，^因有很多人營救，^但沒人在

獄兩個月^後得以出獄，但匪徒楊
劍雄毫無關係。楊犯罪惡
仍應按你的判決處理。

劉少奇，八月廿九日

注：楊劍雄是劉少奇一九二五年被捕叛變的重要知情人。劉少奇接到寧鄉公安局的報告後，作賊心虛，十分害怕，竟迫不及待地不經任何手續私自電復寧鄉公安局。劉在復電中，利用報告中寫錯了年份（將一九二五，寫成一九二四），對楊劍雄所謂“救”他出獄一事，矢口否認，並要公安局將楊犯照原判死刑處理。寧鄉公安局復建國按照劉少奇授意會同縣法院於一九五三年二月八日將楊犯處決，殺人滅口。

劉少奇在復電中詭稱同楊犯“在小學同過學，以後三十多年未發生過任何關係”，出獄之事“與楊劍雄毫無關係”，這完全是撒謊。事實是：劉在一九二七年包庇楊劍雄逃避了農民鬥爭；楊不但與劉有來往，而且與劉少奇前妻劉寶珍也很熟悉；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八日楊犯給劉少奇寫信稱兄道弟，十分親熱；一九五一年土改時楊劍雄到北京找過劉少奇。

劉少奇這種殺人滅口的惡毒用心，昭然若揭！

(14) 反革命分子杨剑雄关于刘少奇一九二七年包庇他
逃避农民斗争的亲笔供词

(八)
又民十一年正月，我在柳间住不住，去上海过汉口，在全
國总工会旁边一个巷内，会见了他和何夫人，我告
诉了我在柳间的情形，他替我拍了一个电报，并寄了
一封信给李淑芬党部，我家得以无恙。

注：这是“杨剑雄反省”的结尾部分。

(15) 右派分子杨少岩关于刘少奇一九二七年对杨剑雄
“帮过忙”的交代

1927年刘少奇说杨剑雄曾帮过他的忙

1927年刘少奇在汉口总工会工作，我当时在汉口二中教课。27年三月间我的堂弟杨剑雄任官僚要霸地主，其时湘中农民运动正进入高潮，成立乡农会，乡农会要捉捕杨剑雄，杨剑雄便逃至汉口。想去会刘少奇，又怕去会，要我先去见刘一下。我便到友益街总工会去会刘少奇，会见了。我把来意说明后，刘少奇对我说：“杨剑雄以前帮过我的忙，现在他有事，我也要^帮他的忙。”我说：“那他就会感谢不尽，他本想跑来会你，恐有不便之处，所以没有来，不是要他来亲自和你谈谈。”刘说好。次日杨剑雄亲自到总工会（会晤）刘少奇。

1967年6月22日 杨少岩写

注：杨少岩是反革命分子杨剑雄的堂兄，右派分子，原为某省师范学院教员，现被革命群众监禁。

(16) 反革命分子杨剑雄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八日给刘少奇的信。此信证明，他们解放后还有来往，并且还向刘少奇介绍了两个所谓“国术专家”

少奇同志：弟于解放前在天津工作，自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八日给刘少奇写信，此信证明，他们解放后还有来往，并且还向刘少奇介绍了两个所谓“国术专家”

弟在天津工作时，曾向刘少奇同志介绍过两个所谓“国术专家”，即：郭凤鸣、郭玉麟。郭凤鸣，河南光山人，曾担任过天津市政训委员会主任，天津市武术协会会长，广州市武术馆馆长，日本进藤中佐、北部长佐、德国顾问、名震一时。郭玉麟，曾任长沙国术馆馆长及湖南商专工专教授等职。弟向刘少奇同志介绍这两个所谓“国术专家”，目的是为了向刘少奇同志介绍两个所谓“国术专家”，目的是为了向刘少奇同志介绍两个所谓“国术专家”。

杨剑雄 于八月八日

通信：天津太平桥转



影印件原文：

少奇哥兄副主席惠鉴议举一别忽忽廿有二年地所天拆无时不神魁

左右数十年坚苦卓绝不断奋斗新中国建立宇宙改观

吾兄之功伟矣今民庆幸故人庆幸弟于十七年破该大厦后与时不合流尔乡居从事教育又为国民党所束后事生产小圃农场与多人改进栽培培植森林悉心研究果蔬园艺以劳动生产十余年来未敢稍懈怠与当代各公之主张全民劳动相吻合而多人亦畏弟为孝悌新安享著此间主持党务为政治平且杨厚吾何逸先。诸兄间有接触妄谓弟为开明多所照顾堪堪告慰耳倘得

吾兄一纸书为弟招呼则更幸矣顿促推我

朱总司令出席全国体育会讲谈对全国体育将大有改进国术各门均煥番遍训练兹有友人郭凤鸣郭玉麟两君河南光山人为国内唯一之到击家郭曾任天津市武术协会会长广州市武术馆馆长山数日本进藤中佐北部长佐德国顾问名震一时彩曾任长沙国术馆馆长及湖南商专工专教授等居

会间有年深知技术精湛思想颇能与时俱进进得

政府提拔为人民服务必有更大贡献望祈

并兄为之推举举国内之逸材罗致之公私两利不附并排之至专此奉达敬候

均安全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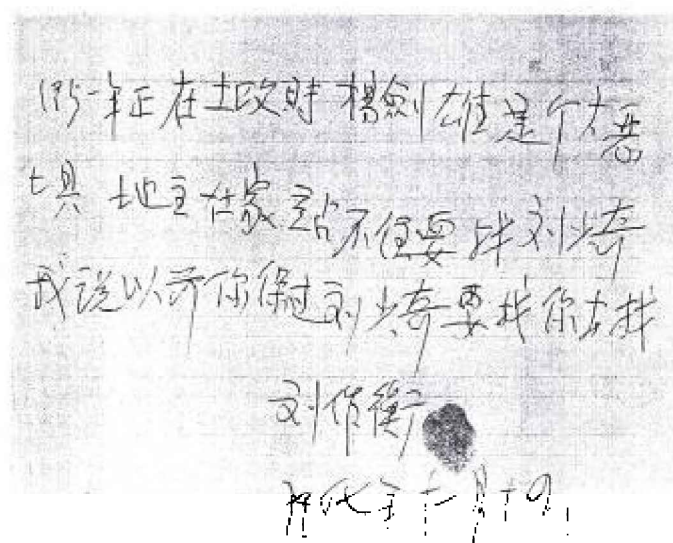
杨剑雄

弟杨剑雄谨启 十一月八日

通信：天津太平桥转

注：信封左上角批注的“杨剑雄介绍二位国术专家”，系王光美亲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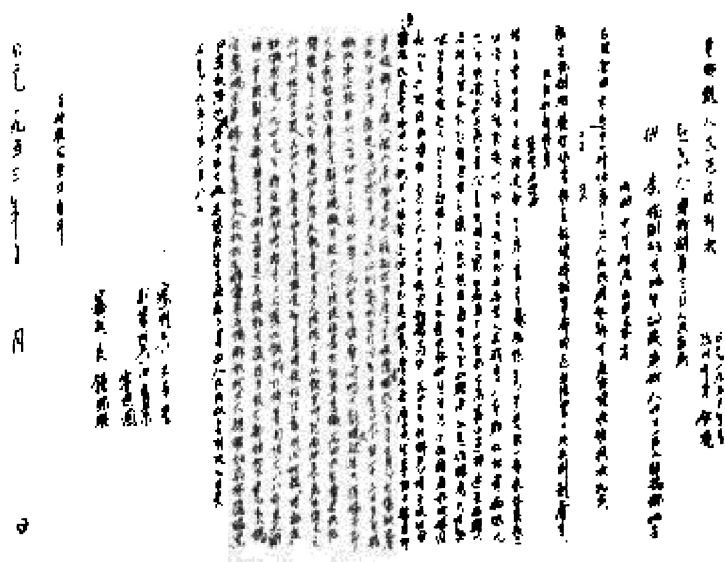
(17) 地主分子刘作衡关于杨剑雄一九五一年到北京
找过刘少奇的交代



1951年正在土改时杨剑雄是个大恶
棍地主作家说不但要斗刘少奇
我说以你保刘少奇要找你斗我
刘作衡
1951年1月19日

注：刘作衡的笔供证实，反革命分子杨剑雄当年“保”过刘少奇，并自恃
“保”刘有功，一九五一年来北京要刘少奇包庇逃避土改斗争。

(18) 宁乡县法院根据刘少奇授意一九五三年二月八日
将杨剑雄处决的判决书



影印件原文 (节录):

公元一九五三年度

宁乡县人民法庭判决

法 刑 字 第 14 号

起 诉 人: 宁乡县第三区人民政府

被 告: 杨剑雄, 男, 现年 52 岁, 宁乡人, 住三区七福桥乡, 地主成分, 中学程度 (注: 实际就读过上海大夏大学), 出身豪劣。

右被告因恶霸案件经第三区人民政府起诉本庭审理终结判决如左

主 文: 被告杨剑雄横行乡里称王称霸残害革命同志血债累累处死刑剥夺其政治权力终身

注: 宁乡县公安局霍建同接到刘少奇电报后, 迅即按照刘少奇的授意, 会同县法院将杨犯列为恶霸案件, 于一九五三年二月八日立即处决, 以实现刘少奇用杀人灭口的办法隐蔽自己叛变革命罪行的目的。

刘少奇一九二七年在武汉、庐山 等地贩卖革命的罪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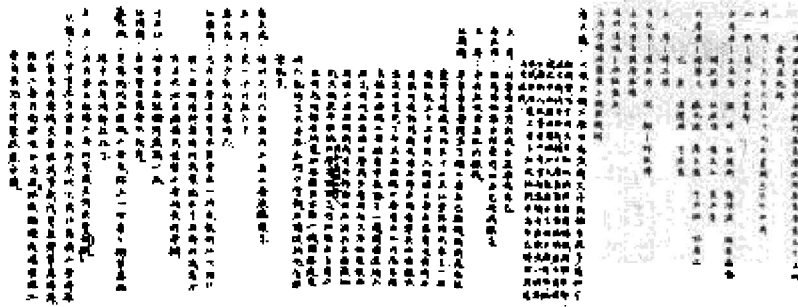
一九二七年三月，正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革命与反革命大搏斗的紧要关头。伟大领袖毛主席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发出建立农民武装的伟大号召，湖北的工人革命运动，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反帝斗争蓬勃发展。当时窃据湖北省总工会秘书长的刘少奇，对工农革命群众运动高潮，心惊胆战，迫不及待地破坏工人、农民的革命斗争。日本帝国主义在武汉屠杀革命群众的“四·三”惨案发生后，全国人民群情激愤，刘少奇却要工人“严守纪律”，“万勿骚动”，“不要打日本人”，为日寇保镖。蒋介石在“四·一二”发动反革命政变，何键部下许克祥在长沙实行“五·二一”事变（马日事变），夏斗寅部队在湖北实行反革命军事政变以后，刘少奇为适应国民党的反革命需要，与汪精卫、陈公博进一步秘密勾结，被指定担任国民党中央“工人运动小组长”，充当特务，提供“工运情报”，人造反革命舆论，调走工会骨干，使“干群脱节”，

解散工人纠察队，“防止暴动”。于六月二十九日上午，把枪支弹药全部拱手交给了国民党管理武汉卫戍事宜办事处。

刘少奇为掩盖其内奸面貌，蒙蔽群众，与汪精卫、陈公博密谋，演出了一场假逮捕的“苦肉计”。六月二十八日晚，汪、陈将刘少奇等公开逮捕，次日上午，将刘少奇一人秘密接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密谈，然后“释放”。刘少奇还按照汪、陈旨意，亲自到国民党中央工人部二次工运会议上做《自动解散工人纠察队意义及经过》的叛卖报告，遭到广大工人的强烈反对。

汪精卫为使刘少奇“留在共产党内”不致暴露，在武汉“七·一五”公开反共大屠杀之前，指使他躲往庐山，先住在白鹿洞书院，后同丁觉群一起，住在牯岭军阀朱培德的公馆里。当我党中央把武装起义的决定通知他，要他到九江去开会时，他根本不理，继续进行叛卖勾当。他向陈公博提出“改组工会意见书”，密告我党在“国府”警卫团、中央军校和汉阳兵工厂内的情况，并要汪、陈“速除”，部分地破坏了南昌起义的准备工作。刘少奇出卖革命，充当内奸、工贼，充当帝国主义、蒋介石、汪精卫的走狗，死心塌地地反共反人民，双手沾满了革命同志的鲜血，十恶不赦！

(1) 国民党中央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九日会议记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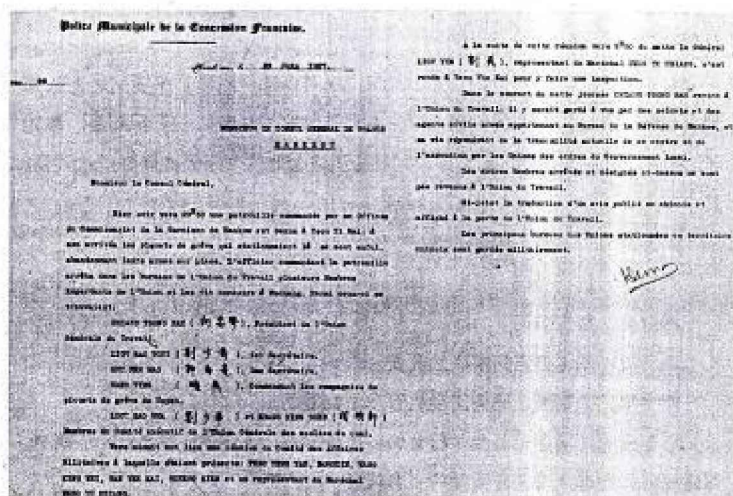
注：会议记录的重要部分见下面放大的节录。

(2) 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九日《汉口民国日报》关于
刘少奇自动解散工人纠察队的报导



注：这些借口“避免制造謠言，挑撥工兵，影响工兵联合战线”的投降“布告”、“通电”、“函件”等等，据叛徒成柱周交代早在六月二十七日由他起草好，后经刘少奇亲自修改，签发的。

(3) 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九日法租界巡捕房给法国
驻武汉总领事的信原文和译文



注：刘少奇在六月二十七日作好了一系列自动交枪的准备之后，为了掩盖其内奸面貌，蒙蔽群众，与汪精卫、陈公博密谋，演出了一场假逮捕的“苦肉计”。六月二十八日晚，汪、陈将刘少奇等公开逮捕，次日上午，将刘少奇一人秘密接到国民党中央党部进一步密谋反革命活动，然后“释放”。

信中许白昊同志是革命烈士。一九二七年任湖北省总工会财政部长，反对刘少奇向敌人交枪。后调任上海总工会常委。一九二八年二月被上海巡捕房司令逮捕，五月牺牲。

注：刘少奇在六月二十七日作好了一系列自动交枪的准备之后，为了掩盖其内奸面貌，蒙蔽群众，与汪精卫、陈公博密谋，演出了一场假逮捕的“苦肉计”。六月二十八日晚，汪、陈将刘少奇等公开逮捕，次日上午，将刘少奇一人秘密接到国民党中央党部进一步密谋反革命活动，然后“释放”。

信中许白昊同志是革命烈士。一九二七年任湖北省总工会财政部长，反对刘少奇向敌人交枪。后调任上海总工会常委。一九二八年二月被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逮捕，五月牺牲。

法租界巡捕房

第六十六号 一九二七年六月廿九日于汉口
法国总领事先生
汉 口

总领事先生，

昨晚近二十时三十分，一支由汉口卫戍司令部一名军官率领的巡逻队来到友益街。在他们到达的时候，原先在那里的罢工纠察队员丢下武器，逃走了。巡逻队的指挥官在总工会办公处逮捕了该会的几个重要成员并解送武昌。其中有：

向忠发 总工会主席
刘少奇 第一书记
许白昊 第二书记
项 英 湖北罢工纠察队总队长
刘少华、关明轩 码头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

近午夜时，军事委员会举行会议，出席的有：邓演达、鲍罗廷、汪精卫、谭延闿、程潜以及冯玉祥元帅的一名代表。

会后，约凌晨二时，冯玉祥元帅的代表刘骥将军去友益街进行视察。

向忠发于今日白天返回总工会，在总工会，她可能为汉口保安局的上兵和武装粮衣人员所监视，其生命作为本地区当前安宁和各工会执行地方政府命令的担保。

上述其他被捕人员没有回总工会。

现附去张贴在总工会门口的中文布告的译文。

中国地界内各工会的主要办公处都已军事看管。

戴 孟 岩 (Hemm)

- (4) 叛徒丁觉群关于刘少奇勾结汪精卫、陈公博充当内奸的亲笔供词。丁觉群是刘少奇在武汉、庐山等地进行反革命叛卖勾当的重要伙伴

- 1 -

对刘少奇一九二七年在汉口庐山所犯罪行的交代

刘少奇于一九二六年十月中旬由广州到武汉任湖北省总工会秘书长当时我是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的执行委员兼工人部长总工会有关汉口的工人运动是受汉口市党部工人部领导的十一月上旬总工会成立劳资斗争委员会(对外叫经济争议委员会)刘少奇兼任主席我是委员之一在共产党内我是受他领导的十月底成立湖北省劳资问题仲裁委员会我被选为主席,更须与总工会劳资斗争会密切联系,所以我和刘少奇往来更密,刘少奇在一九二七年七月八日左右离汉到庐山在白鹿洞书院,我于七月三十一日搭车,八月中旬刘少奇向宝珍和我同住在我在牯岭河南路一所房子里这房子是九江警备司令参谋长之妹贺淑祖的地下室,由朱培德公馆的宋嘉晋无代价让给我们住的直到十月初离开牯岭到上海因此我对他的许多事是了解的,兹就我所知道刘少奇的罪行交代如下:

一、受资本家贿赂,出卖工人阶级利益。自一九二六年十月下旬经市党部介绍,总工会请我代表与刘少奇见面后,大家就周星棠、周颢、徐荣斌等时常请刘少奇和我吃酒,一次在热月楼吃酒,周星棠送刘少奇人参两盒,徐荣斌和又送燕窝一合。十一月上旬刘少奇制订湖北省劳资斗争条件时,因受了周星棠五百元贿赂,将工人增加工资的条子降得很低。十月底周颢劝我受了刘少奇的二百元,又说刘少奇交了一千元与徐荣斌

兄弟烟草公司五百元。刘少奇在审批各基层工会所提出的劳资条件时，就可将条件压低。

二、刘少奇在汉口勾结汪精卫陈公博出卖工人纠察队。

一九二七年三月下旬陈公博获悉刘少奇很受资本家赞扬，召我到中央工人厂了解刘少奇，我向陈汇报后，陈对我说：“刘少奇是真正服从本党领导的是按照本党的方针和政策办事的这个人用处很大，我还要和他详谈。”此后刘少奇与陈公博的关系日益密切，刘遇事向陈请示汇报，唯命是从。“四一二惨案”日帝屠杀中国工人死伤四五十人，刘少奇根据陈公博不要扩大事态的指示，一面劝凡在日厂的工人不要罢工，一面劝码头工人不要扩大事态，并到日租界劝群众退出日租界，另一方面用总工会名义发了一个宣言，要“四一二事变”后陈指示不要集会游行，宣传活动召集工人不要太多，刘开了一次小会，要“四一二事变”后刘用密件向陈请示，由我送去，陈当即打电话给刘，叫刘不要举行任何活动，对工人也不要进行宣传，刘对提议游行示威和集会宣传的，一概拒绝。

五月中旬，陈公博从海峽探悉刘少奇在处理劳资问题时，曾受资本家贿赂，陈对我说：“一个有资本主义思想的人，贪财是必然的，我要证明这一点，才敢大胆地重用他。”五月底，刘少奇告诉我：“陈公博想进一步掌握

工运动态扩大解围将有更重大的任务交给你们两人陈公博对我说：只要你身在共产党心向国民党就行了。

汪精卫既得路易德浦第三国际给中共中央密报的消息后借此决心共力防止武汉工人总罢工武装暴动乃由陈公博于六月三、四号晚上召刘少奇和我到他的公馆谈话组织了一个“工人运动小组”陈指定刘为组长我是组员担任工运情报工作。刘向陈献策：一将武汉工会干部调走由外地调新干部来组织地下工会这样干部脱节掌握不了群众就不会发生总罢工；二遣散工人纠察队将枪缴还政府就可防止暴动。刘又与陈详细研究了进行的办法采取内外结合。陈公博在社会上扩大兵士与纠察队的冲突制造谣言并借此制造舆论要求遣散纠察队将枪缴还政府刘少奇则在工会内进行了一系列反动宣传与活动。

刘少奇为了掩盖他与汪精卫陈公博勾结出卖工人纠察队的犯罪行为将来更好地为汪精卫效劳于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五日写了一封密信要我递给陈公博并说：“在这里我提请陈公博考虑在完成任务后来一次若能在纠察队缴械的头一天逮捕刘少奇等（次日与汪精卫打电话给卫戍司令利用信车递送到中央党部）设法决定下一步活动。”

刘少奇在六月二十八日解散了五千人的纠察队二十九日将三千枝枪及金弹药交给管理厂军事汉口办事处，并将武汉总工会所有干部调到外地工作。七月二日刘在国民党中央工人二次运动会上作了“自动解散工人纠察队意义及经过”的报告。

七月六日晚上刘少奇对我说：“我在中央党部见了汪主席我向他提出将来愿在主席领导下为国民革命尽力。汪说：将来重用你是不成问题的。现在还不是时机你还是在共产党内影响它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作用还大些。我当即表示主席指示我竭尽全力以赴。”刘又说：“我们今后还是要脚踏两支船。现在党内对陈独秀很不满，正在酝酿斗争。为避免卷入斗争漩涡，我已借病请假到庐山疗养。刘少奇在七月八日左右离汉到庐山，住在白鹿洞书院。”

三、刘少奇在庐山的反革命活动

七月二十八日陈公博命我送密信给刘少奇。八月初我到白鹿洞会见了刘少奇交信，并将我在九江观察的情形告诉他。刘回汉向陈公博提供了武汉工厂清共线索。几天后刘寄给工会意见书给陈公博又提供了如下情报：一、据觉悟在汉观察集中南昌者为叶挺、贺龙、王匡、彭警卫因此国平官多係共党如：彭警卫、国符珠

危險。請速派之，三中央學校則將更須多派清除。三、漢內共工，共
黨不少，請注意。

八月中旬劉少奇由白鵝潭到韶峯和我住在河南路一所
房子里。劉說：我在白鵝潭會見了汪主席，我對汪說我本想到漢口
幫助陳隊長改組工會，又怕被共黨發現。汪說：你還是留在共
產黨內好，不要暴露。劉少奇到韶峯的第二天遇見了汪精衛的秘
書褚民誼。劉說：褚說，寧漢合作後，汪主席將出任國府主席或
行政院長，你有什么意見可寫書面條陳。於是，劉少奇和我討論了
條陳內容，大意是：我要千方百計使共產黨走失敗路線，主法單搞
工人運動，不搞農民運動，使工人階級處於孤立地位；建議政
府對共產黨採取鎮壓與策反相結合的政策，号召共產黨員反水，
從內部破壞共產黨，建議政府實行改良主義奪取群眾，削弱共
產黨對群眾的影響等。劉少奇寫成呈文後，親送汪精衛辦
事處。

一九二七年十月初，劉少奇獲悉寧漢合作後汪精衛垮台
消息後，就到了上海。

丁覺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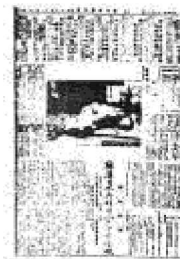
一九六八年十月六日

注：叛徒丁覺群原系漢口公共汽車公司教員已退休。現在北京監禁。

(5) 一九二七年四月四日《汉口民国日报》关于
“四·三”惨案的报导



注：上面影印件是《汉口民国日报》关于“四·三”
惨案报导的放大部分。



(7) 叛徒董锄平关于刘少奇充当英、日帝国主义的“代言人”、“保镖”和内奸的亲笔供词

刘少奇大奸细，一九二六年到武汉的，象全国总工会的付委员去，同时把黑手伸入到湖北总工会，为省总秘书长，成为省总的当家人。出卖工人阶级，出卖党，做各个帝国主义者的代理人，作蒋介石的帮兇，保护资本家，破坏革命，干出了种、派恶滔天，择要列于下：

一、贩卖帝国主义的工贼黑货。刘少奇到武汉后，就摆出工运理论家，工运策士架势，如党的负责人各业工会的长工，召集到省总听他讲工会组织的课，据刘少奇回忆，他基本是贩卖的帝国主义的“产联”、“劳联”的那套黑货，假经济主义来搞工人革命运动。他培植了一个工人运动训练班，地真是美轮美奂，也是那套黑货去毒害子弟，要把中国工人运动引入帝国主义的轨道，把中国永远拖入殖民地。

二、作帝国主义的代言人。一九二七年一月三日，中国工人阶级、武汉革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自己的武装力量——工人纠察队，一举夺回了英帝国主义租界的英租界，开创了国共合作斗争史的创举。英租界被夺回时，汉口英总领事向国民党求援，要求派军队前往保护，由于革命群众强大的压力，国民党因此拒绝，说英总领事认为若再坚持下去，英租界的反革命武装势必被革命的武装歼灭，万不得已，通知国民党，把英租界托出临时托管，不承认英租界为工人阶级、革命人民自己夺回。于是帝国主义主义的半殖民地武器，已被我完全砸毁，英海陆军队赶快上江，赶快军舰，英行政人员，惊魂丧魄，纷纷上高轮，乘船连夜逃往上海，我工人纠察队夺回汉口完全打英租界，建立革命秩序。直至一月

之日，国民党才以军警入驻占领“英租界”。刘大奇这个工贼，把全工人纠察队逼出“英租界”给国民党军警接管。甚至湖北全省总工会也奉命提出七项要求，大意是“英租界”当局向我方请愿道歉，“英租界”当局将刘大奇死伤人及“英租界”当局保证以后不再生类似事件，要求政府收回“英租界”。这是把“英租界”事同一腔调，承认“英租界”已为工人所取，革命人民自动夺回。为蒋破介石复的“英租界”再度出英给帝国主义作舆论准备的基础。

三、为日本帝国主义作保。自汉口“英租界”为工人阶级革命人民自动夺回后，汉口“日租界”、“法租界”、“德租界”当局，均以向我方作保证，是否要同样夺回，并表示要自取。因此，国民党人也正式要求英领导将“德租界”交回中国。9月2日，日本水兵在“日租界”打死我人力车夫，日一方表示，为工人阶级革命人民抄家，马上奔赴“日租界”，给以还押，又形成一月三日夺回“英租界”为案。刘大奇吓倒在滚来流，赶赴现场，利用革命人民热爱党，相信老舍的恩情，相率职工家属，要求革命群众，交出“日租界”，把“日租界”当局置于死地，以表歉意，为他的日本主子作保。

李御平

一九二七年十月十日

刘少奇一九二七年在武汉的罪行

刘少奇调走工会骨干。刘少奇替国民党缴去工人纠察队武器，甚至连牙粉童子团的木棍也收缴了。随即把工会党员骨干五十人调离武汉，另调新人接替工会工作。刘少奇说：“这是保存党的力量”，实质是迎合汪精卫的需要。用这些被调走的党员骨干，都有社会基础，为汉口总工会的张计德等同党完全转入地下，继续同蒋介石作斗争。^{——调走。}显然，是为了削弱工会的力量，调来的新人，人地不熟，无法开展斗争，如唐总的赵敏就被牺牲，刘少奇一箭双雕之计甚毒。

刘少奇在革命紧要关头潜入庐山。刘在汪精卫“七·一五”叛变前，我看到他身体很健壮，说没有病。刘在庐山“养病”，任在大军鹿走培德的公路，显然是有政治阴谋，与汪精卫党羽进行政治勾当。

董勤平 一九二七年九月十四日

注：刘少奇于一九二七年任湖北省总工会执行委员，武汉店员工会委员。一九五九年一月任我武汉哲学研究所副所长，现在拘留中。

(B) 叛徒成柱周关于刘少奇充当内奸的亲笔供词

刘少奇在一九二七年六月廿七日前作好了解除工人武装的准备：六月廿七日晚，刘少奇叫刘察总队长、总队长朱菊和分队长周存到刘察总队长把枪枝登记好了，准备交给国民党。刘少奇在六月廿六日拿了一个电报稿，即《要求自动停止工人纠察队的武装》的勒令，叫刘察根据电报内容拟草出布告，致军事委员会、致汉口工成办事处信，告工友如告单士河老夏宣传部李恩起草的，都经过刘少奇亲自审查修改的。上述文告，于六月廿七日就搞好了，六月廿九日交枪前后都公开发布了。

刘少奇在缴械工人械前的言论：

刘少奇在缴械前经常说：我在安外，工人没有武装，照样搞工会，现在不缴械的大危险了，这样下去迟早要闹到不缴械斗争好，不然，会影响全局。六月廿九日刘少奇对我说：若不交枪，一定要造成流血事件，引起冲突，同共要合作到底，只有交枪，有枪而无危险，革命是要革命，有可能把自己的脑袋弄掉，但是我们要保护脑袋。

刘少奇在缴械后的言行：

六月廿九日缴械后，在一个晚上，刘少奇在总办公室对我说：现在把武装解除了，枪枝交了，我也放心了，没有日掉了，军队也不会找我的麻烦了，危险也上了。

成柱周

一九二七年六月廿七日

注：叛徒成柱周一九二七年任湖北省总工会秘书，是刘少奇的反革命“投降书”的起草人。现在拘留所。

(9) 反革命分子张登平关于刘少奇充当内奸的亲笔供词

刘少奇缴枪后向汪精卫作报告，1927年
六月及七月初刘少奇在上午缴枪后下午三时、
左右刘少奇亲自到钱新街华商总会，向汪精卫
作缴枪经过汇报。刘少奇去的时候，我亲眼
看到他夹着公文包去的。

张登平

1968.5.13.

注：反革命分子张登平一九二七年任湖北省总工会候补执行委员，是刘少奇出卖革命的同伙和见证人。现在上海市在押。

(10) 一九二七年七月一日《汉口民国日报》关于刘少奇解除工人武装后进行欺骗宣传的报导

報日國民口漢 五期星 號一月七年六十年國民華中

省工會努力兵聯合

▲派隊宣傳兵聯合之意義

▲並解釋自動解除武裝之理由

湖北全省總工會前以反動派藉工一必多，自轉通令各工會火速督促宣傳隊，出發演說自動解除武裝之意義，並將最近工兵聯合戰線之事實，如協助北伐勝利，幫助北伐軍，對勞苦僱傭士等，詳為報告，俾一般民衆得以瞭然云。(人民聲)

省工會代表會

省工會努力兵聯合

▲本會為宣傳自動解除武裝之意義，特派各區宣傳隊，分赴各工廠，向工人宣傳，並解釋自動解除武裝之理由。本會特派各區宣傳隊，分赴各工廠，向工人宣傳，並解釋自動解除武裝之理由。本會特派各區宣傳隊，分赴各工廠，向工人宣傳，並解釋自動解除武裝之理由。

▲本會特派各區宣傳隊，分赴各工廠，向工人宣傳，並解釋自動解除武裝之理由。本會特派各區宣傳隊，分赴各工廠，向工人宣傳，並解釋自動解除武裝之理由。本會特派各區宣傳隊，分赴各工廠，向工人宣傳，並解釋自動解除武裝之理由。

▲本會特派各區宣傳隊，分赴各工廠，向工人宣傳，並解釋自動解除武裝之理由。本會特派各區宣傳隊，分赴各工廠，向工人宣傳，並解釋自動解除武裝之理由。本會特派各區宣傳隊，分赴各工廠，向工人宣傳，並解釋自動解除武裝之理由。

注：刘少奇交枪后，为了欺骗群众，掩盖内奸罪行，于七月一日通令各基层工会派宣传队“演讲自动解除武裝之意義”。

(12) 刘少奇包庇叛徒丁觉群的两封亲笔信

中央组织部。
丁觉群，1926-1927年时是共产党员，在
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工作，为要员。国民党
党叛变时，我受到了特（在狱中我常写他
卷，后来丁也到特卷。我们住在一起
房子内，约一月余。我先到上海，后来，
丁也到了上海。丁在湖北和上海工作
时，表现是好的。后来被捕，也没有
听说有反党行为。丁出狱的详细
情形我不了解，但我听说过，丁觉群
是写了自首书不出狱的。丁出狱后，直
到现在，没有找我，以后也没有找过我。
刘少奇 1952年6月

是中大组织部

王克敏一般认识他，1928年以前
在汉口和上海工作时，一般表现是
好的。他到后，1928年被捕以前
的作风是真实的。但是他在被
捕以后是叛变投敌了，所以坐
牢四年后就释放回国，出狱后
和国民党^{政府}组织部^{地方}联系，^{后来}
^{反动的}有找过党的关系。他
手没有当过特务，没有参与过反党的
活动。

刘少奇 1952年六月六日

(13) 刘少奇包庇叛徒董锄平的亲笔信

董锄平，1925年同我在中山路组织支部的上海外灘工作过，表现不佳。1925年东渡河以叛工失败，董锄平曾汇报被捕，北平军政府对我们的工作加管。在这以后，董锄平即离开工作，跑到菲利宾。

1926年北伐胜利，武汉解放，董锄平逃菲利宾回国，到武汉湖北路工作。

领导工作，表现也不佳。

1927年革命失败，董锄平跑到上海，我看见过他，但从未听到他被捕过。他说：被捕是朝出才说，就我不相信他的话，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当时找党是很困难的。他到菲利宾去。

董总是革命，没有得到党的信任。
全国解放后，董总又回到北京，
后来找过我，又提到他的党籍问题。
当时我批评了他，说他不能恢复党
籍，因为他几次表现在革命困难
危险的时候就逃跑，^{所以}不能参加工作。

董总在革命顺利时作过一些工作，
在反动派残酷不定时，也没有听到他
作过什么，但他不是一个坚强的革命者，
在有危险的时候就自己逃跑组织。
作为一个革命者他是不符合条件的。
刘少奇、邓小平、朱德

(14) 刘少奇一九五〇年包庇叛徒成柱周的亲笔信

徐冰同志：
成柱周同志以前和北
一造二作过，叛变党的
的性质，请你介绍他
到你任办的政治研研
习班去。
刘少奇 九月五日

成柱周同志：
来信收到。你可拿此信
到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
去，请刘少奇同志分
配你工作。你
过去的经历及你有限
的才能，可考虑他向
中央组织部提出。祝
进步。
刘少奇 九月五日

(15) 刘少奇包庇反革命分子张登平的亲笔信

张登平同志：
你的来信收到。关于你的党籍问题，请直接向党的中央组织部请示，将你的历史以及你在党内的情况，向中央组织部在党内公开的情况，将对你的提出的问题，给以明确的答复。
敬礼！
刘少奇，十一月十二日

注：这是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刘少奇写给张著早（即张登平）的亲笔信。

刘少奇一九二九年 在东北贩卖革命的罪证

一九二九年七月十四日，刘少奇（当时化名赵之启）到奉天（今沈阳）任满洲（即东北三省）省委书记。八月廿一（或廿二）日，与省委组织部长孟用潜（当时名孟坚）在奉天纱厂被大军阀张学良逮捕。

刘少奇被捕后，不仅立即供认自己是满洲省委书记，孟用潜是省委组织部长，还供出了省委委员唐宏经、王立功、张聿修、丁君羊、饶漱石和省委秘书长廖如愿，出卖了满洲省委所属东满、北满、旅大、抚顺等十多个特（县）委（支部）和奉天市的六、七个支部。当敌人要刘少奇带着特务去抓人时，他积极出谋献策说：省委负责人已经隐蔽起来，现在抓不到，反而会打草惊蛇，如果将他“释放出狱”，他就可以“搜集共产党的情报”，大规模破坏满洲省委和东北三省地方党组织。

张学良对刘少奇的献策颇为赞赏。于是将“共产党案”改为“工潮案”，并以“煽动工潮证据不足”，将刘少奇“释放”。刘少奇奴颜婢膝地给张学良写信说：“张长官是我的再生父母，将来我有生之日，就是我戴德之年。”由于刘少奇积极地给张学良提供情报，使满洲省委及其所属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许多共产党员被捕、被杀。

刘少奇还按照帝国主义、国民党和张学良的旨意，利用中东路事件，配合进行反苏反共，罪恶至极！

(1) 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五日《满洲日报》关于刘少奇
在奉天纱厂被捕的报导



译 文

共产党员潜入奉天纺纱厂秘密接头时将其一伙逮捕

(奉天专电八月二十四日) 支那(中国)时局困难以来, 似有许多共产党员趁中央、奉天间的诸问题正在谈判而陷于忙乱之机, 潜入奉天纺纱厂, 故当局预先已有警惕。八月二十一日下午五点左右, 该厂职工王绳一等几人下工后, 来该厂里院与南方职工打扮的支那人(注: 系指刘少奇)秘密接头, 正在递交共产党传单及其他材料费用等时, 被警戒者发现, 当即押送支那方面公安局审讯。

王系三年前招收的该厂职工, 至今趁机便进行共产党的宣传, 是一直受当局监视的人物。

(2) 满洲省委一九二九年八月三十一日给中央的报告

(节录)

影印件原文

纱厂斗争问题，奉天纱厂两月来即以五成开支，而且是奉票，我们经过支部的讨论在群众中提出要八成现洋的鼓动，并要求立刻开支群众情绪异常兴奋，我们更继续不断一再进行鼓动工作，一面准备召集各部工人会，八月十八九的时候，群众情绪已确实到了可以行动的时候，而且八月廿七日又是开支的关头，据当时情形没能在组织上积极准备，八月廿七日不按照工人要求开八成现洋，群众行动确已不成问题。不料在召集第一次群众会时，支部书记即遭拘押，其他同志一人被开除（前数日）致会不能开成，叛徒崔某（过去是同志）与厂中阴谋勾结，即以陷害常张同志，又向省委报告谓群众会仍可召集，省委为其言所欺，竟不疑而到（此次是赵孟二人去，上次是全总代表及丁孟三人去的）随被捕。

注：赵即刘少奇，化名赵之启，孟即孟用藩，当时名孟坚，叛徒崔某即崔凤鸾，全总代表是张崖第，丁是丁若羊。

29
已抄送中央
奉天纱厂斗争问题，奉天纱厂两月来即以五成开支，而且是奉票，我们经过支部的讨论在群众中提出要八成现洋的鼓动，并要求立刻开支群众情绪异常兴奋，我们更继续不断一再进行鼓动工作，一面准备召集各部工人会，八月十八九的时候，群众情绪已确实到了可以行动的时候，而且八月廿七日又是开支的关头，据当时情形没能在组织上积极准备，八月廿七日不按照工人要求开八成现洋，群众行动确已不成问题。不料在召集第一次群众会时，支部书记即遭拘押，其他同志一人被开除（前数日）致会不能开成，叛徒崔某（过去是同志）与厂中阴谋勾结，即以陷害常张同志，又向省委报告谓群众会仍可召集，省委为其言所欺，竟不疑而到（此次是赵孟二人去，上次是全总代表及丁孟三人去的）随被捕。

（3）满洲省委--一九二九年九月十九日给中央的 报告（节录）

满洲报告 1929.9.19. A49 00102

1. 奉天 现因天字经过一支部... 支部完全溃散... 原和少、孟同时被捕之某工人同志... 判罚四十天拘役... 该同志十分简单，咬出许多秘密，决定开除其党籍。告密之崔某当然开除。

注：少即刘少奇，孟即孟用潜，“某工人”系叛徒常宝玉。

注：满洲省委这两个报告的内容，记载了奉天纱厂党组织被破坏和刘少奇、孟用潜被捕的问题。刘少奇和孟用潜是由于叛徒崔凤藻与敌人勾结，支部书记常宝玉叛变出卖而被捕的。事实戳穿了刘少奇在他的简历底稿中所称“在罢工中被捕”，“敌人找不出证据”等彻头彻尾的谎言。

(4) 叛徒孟用潜关于刘少奇一九二九年充当内奸的亲笔供词

刘少奇和我一九二九年以内奸被捕的经过。原稿。

一九二九年八月，我和刘少奇到晋中推行“三三制”时，在榆次工厂里工作，被古晋古的密探王出堂被捕。当晚奉古的厂警讯，刘少奇承认他在榆州老家已说，出卖了谁，已出卖了晋中工人李景芳、唐宝廷、王立功、明军峰、潘致石、晋中工人李如恩，晋中工人王成月、潘瑞天、王又敬、王又成、晋中工人王成、刘少奇进一步出卖了在本地方的党徒，包括北满、东满、关东州特委和特委书记，以及大连、营口、清原、辽中、辽东、抚顺、延吉等五个城市和平津市出现的。被捕后，刘少奇还在“自首书”上签字押押。

古晋古的密探王出堂被捕，刘少奇又供了他所知道的晋中工人（住址和姓名）晋中工人。古晋古的厂警讯，刘少奇和我带着晋中工人。刘少奇说晋中工人是工人之民，隐藏起来，现在抓不到，反而在打草惊蛇。他于是在所供工人名单，要求把刘少奇和我提前释放出狱，给晋中工人搜取党的情报，以便能摸破破坏榆州晋中工人地方党徒做准备工作，集团的晋中工人。

及后，晋中工人对刘少奇叛党表示同意。刘少奇和刘少奇和我在清原州说明晋中工人地方

院。对这一案件，刘少奇原案属重刑，不做死刑，二刑
等案，不取死刑，二刑，证据不足，即可取等案
罪状。可在地方法院，也可由检察院，自拟判决书。

出狱后，刘少奇用化名几个名字，说这一案件
二刑开始，原不取死刑，二刑，证据不足，取等案
而信，二个二刑，案，不足完全完全，毫无问题。这样他
他的姓名，说明在重刑，案件，证据，即行上，原在
地方，重刑。

一九四一年一月，刘少奇到哈尔滨。他用化名
梁厚，在哈尔滨，他也在哈尔滨，他用化名
行，他化名，哈尔滨，他用化名，哈尔滨，他用化名
哈尔滨，他用化名，哈尔滨，他用化名，哈尔滨，他用化名

一九四二年，刘少奇到哈尔滨，四月，他用
化名，哈尔滨，他用化名，哈尔滨，他用化名

一九四二年四月十日

注：叛徒孟用藩即孟坚，一九二九年任满洲省委组织部部长时，同刘少奇
在奉天纱厂一起被捕投敌，充当内奸。
原任我外交部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现押北京监狱。

(5) 叛徒丁基实关于刘少奇一九二九年自首叛变的
亲笔供词

关于张麻子所谈的刘孟罪行材料
在刘孟出狱后约三天,我正在街上
走,张麻子赶上喊我要我到 he 家里坐。
到了他家以后,他就向我:“老刘老孟
出来啦?”我说:“出来啦”。他说他
听到一些消息,“听说他们都承认了共
产党,并且出来以前,还写了悔过去。”
“听说刘还把孟望供出来啦,刘另外
还供出一座房子,不要随便谈。”我向
他从什么地方得到的消息,他说
从警察方面得到的。

丁基实 1967.9.10

注: 叛徒丁基实即丁君羊,一九二九年与孟用潜同管满洲省委组织工作,
刘少奇、孟用潜被捕后为满洲临时省委负责人。

张麻子(即邵麻子,邵扶民,已死),当时是我党特科工作人员。

丁基实原劳改就业人员,现押北京监狱。

(6) 反革命分子关辅金关于刘少奇一九二九年自首叛变的亲笔供词

198 年 月 日写

现将奉天纺纱厂一九二九年的建新共产党情况交代如下

我一九二九年向奉天纺纱厂做技师。七、八月间在厂内进行发展共产党组织，协助王德恩等人的活动。并用恩威手段，收买了工人党员崔凡奇。他给中文信称一共产党支部，其中姓常的是刘少奇党头头王即把他看管起来。在一天下午五点钟左右，由警察和特务在厂门外逮捕了三个共产党。当晚警察局司法主任曹凤鸣、厂里徐建奎、董天华、孔令铨和郝审视。经一、二刑讯，他们都承认是共产党员。

先审的是厂里那个姓常的，第二个是中平个面貌黑一点的。第三个审的是高个子，傅一初问，他承认是湖南人，今年六月来东北，是共产党员，是辽宁地区负责人，是前长级，地下组织设在沈阳工区西下堡子。审完后，他们三人都在清河长谷各划了押。第二天上午由厂办刘公来，将他们三人送交警察局，事后听警察厅秘密子祥坏人刘公说，因他们坦白悔过的好而快释放。

关辅金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注：关辅金一九二九年任奉天纺纱厂副技师，是收买叛徒崔凡奇，并参与逮捕、审讯刘少奇的当事人之一。现由辽宁省监护。

(7) 徐廉奎关于刘少奇一九二九年自首叛变的交代

一九二九年八月奉天纺织厂逮捕共产党的经过

一九二九年我奉天纺织厂当庶务主任。六月厂内发现共产党传单，纺织厂总理程祖恩协理王广恩要我们马上查清付技师关辅金收买共产党员崔凤章告诉了厂内共产党头头以玉我们怕的共产党头头以玉抓起来。程祖恩引说，他承认是共产党，承认与厂外有联系，供出明天下午所边谁在厂开会。程祖恩即在警察厅派员警察来厂调查布置。在九月末一天下午五点钟在厂一个高个子白脸的和矮个子黑脸的，由厂内共产党头头以玉暗中指点，只派各端把他们送住，当晚警察厅在工厂对他们审讯。是和张辅金乱令陈董文培等人参加。

先审黑脸的，一劝利就承认是共产党，是陈绍真，是来不会搞党的，是白脸的是同事关系，住沈阳工业区，是年分月生，河北人。

后审白脸的，前一劝利，跪倒在地，什么都说，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是有崔凤章领导，是来搞宣传组织共产党，搞同盟党的，审完后，他俩人和厂内共产党头头以玉签字押押，第二天得一案三人押在警察厅。

这个案子办完后，工人党员崔凤章告密有功，厂里发给他奖金百八十元。

徐廉奎 一九二九年十月十四日

注：徐廉奎一九二九年任奉天纱厂庶务主任，是参与逮捕、审讯刘少奇当事人之一。现由辽宁省监护。一九二九年奉天纱厂参与逮捕、审讯刘少奇的敌伪人员有十五人，其中已死九人，活着的除徐廉奎、关辅金外，还有纱厂协理王广恩、会计关恩厚、卫队正日杨明襄、卫队队员王清怀四人，他们分别提供了刘少奇被捕自首叛变的罪证。

(8) 陈元桢关于刘少奇一九二九年自首叛变的交代

对一九二九年春在时野厂
案件在产党未作时交待：
我曾在时野厂任班长，在一二九年春
天参加产党三分局差遣班。五、六月间
我们整队时，分局处理这个时野厂二起共产
案件，外心以时野厂为据，工人闹罢工，我们去了，
厂里二股把时野厂到一室中在春着，杨树德也在，
这时时野厂有刑兵进室，第一进室的是个姓王的人
叫王德，随之又进一个姓王的人叫王德，第二进的
是个姓王的人叫王德，第三进的姓王的人叫王德，
是去产党，并承认。他王德的姓，王中一个承认是担
任都县，一个承认是在时野厂，二个姓王是文都县也
是。一天下午八点多时，时野厂二起共产案件，
分局，杨树德的公文和笔，王进的时野厂，被
告的人给王德表上刘少奇。后把王德犯人送有王德
局已法押了。
此材料是我亲口提供。
陈元桢 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三日

注：陈元桢一九二九年任奉天商埠警察三分局差遣班班长，系参加审讯刘少奇的见证人，现由长春市监护。

(10) 刘青第关于刘少奇一九二九年充当内奸的交代

关于一九二九年我承办奉天纺织厂破获共产党一案的交代

一九二九年我任辽宁高等法院检察处代理主任书记官，九月间警察所送来纺织厂破获共产党一案三人，有厂内的，有厂外的，首席检察官朱树声和主任检察官沈廉審訊，我记录。经警察所一審訊都承认是共产党员，为首的承认是负责沈阳地区党的书记，並供出几十间党员十几间组织，在沈阳有麻袋厂，兵工厂，纺织厂等。在外地有大连、营口、辽阳、抚顺、哈尔滨等。还写了自白书，承认领导工人罢工是犯罪的，流入歧途，现在悔过自新，坚决以后不作非法活动，要求宽大。经检察处复審，事实与在警察所供认的相同。三人都在自白书上签了字。

根据他们三人自白从宽，检察处起诉，即送高法審理。起诉书大意是：被告三人係共产党员，煽动罢工，为首的是负责沈阳地区共产党书记，深知改悔，並提供了组织关系及散布情况，是悔过自新的具体表现，应从宽处理。……不久高法开庭審判。由高检处将他们交保釋放。

这一案处理后，朱首席对我说：过去共产党说我们对于共产党人孤一網打尽。这回这么大的案子，这么大的头头，判的这么轻，共产党都感到意外，这是政治攻势。这样可以收买，可以瓦解，可以为我们工作，在政治上的价值是不应该算的。

刘青第
一九六八年五月

注：刘青第一九二九年任奉天省高等法院检察处代理主任书记官，是敌伪审讯刘少奇时的记录人。现由辽宁省监护。

(11) 刘多荃关于刘少奇一九二九年充当内奸的亲笔供词

我所知道的一九二九年在奉天防务被
破獲一起共產黨案件情況
一九二九年我是張學良衛隊上校團長時幸跟隨張學
良。一九二九年八月底警察行在奉天防務被破獲一大共產黨集
关系到東北三省的事當時警察行長白錫鎮和蓋共司長許世
長程演道告訴我捕了三十人經审讯其中一人供認是中共滿洲
省黨書記。供出了滿洲省黨委和沈陽、哈爾濱、本溪、胡梅
順及鐵路沿線黨組織和活動計劃。張學良與我密謀從張學良
和白錫鎮處這個黨的負責人達成了政治交易條件要他徹底
交出東北活動計劃，地點參加人員名單等。今後不再在東北
搞政治破壞和顛覆活動，對中東鐵路有關工人運動
雙方事先取得聯繫，相機配合……。這就要求張學良與我
不登報，雙方聯繫委派人員到指定地點會晤。
張學良親口對我說：這個共產黨負責人給他寫信表
示感激，張學良是我的再生父母。將來我有生之日，就是我戴
德。這孩子連投帶放共廿天在釋放時我們和他有秘密
密口計，對外宣布破獲非共產黨人，共不別研究記錄由警察
行批准無罪取保釋放。

劉多荃
一九二九年八月十一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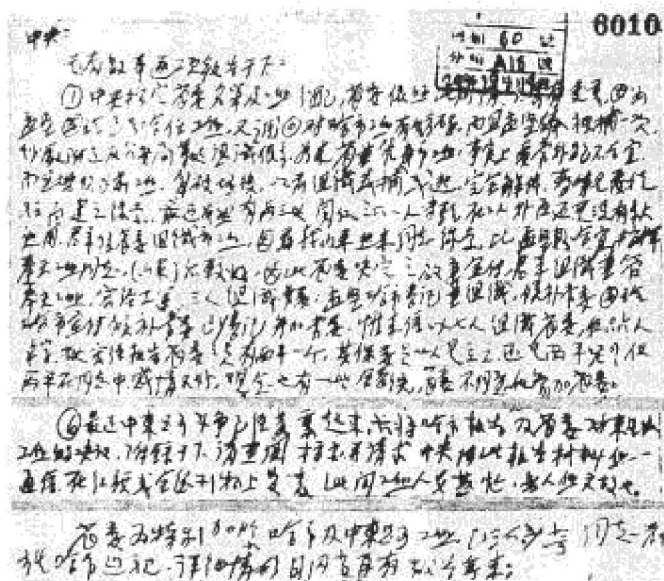
注：刘多荃又名刘芳坡，一九二九年任大军阀张学良卫队上校团长，后任中将军长（与原我水电部副部长刘澜波是同乡，关系密切，互称“兄弟”），是刘少奇在东北充当内奸的重要知情人，原任我辽宁省交通厅长。现由辽宁省监护

(12) 刘少奇的简历底稿

1929年夏 任湖南省委书记，~~到~~到长沙，
有到省自到溆浦。
1930年春 ~~叛~~叛徒中 ~~被~~被捕于溆浦
在狱中
在狱中 ~~不吐实~~，~~到~~到长沙，~~被~~被
出狱。 第一次

注：这是一九五二年刘少奇要王光美抄写的简历底稿。刘少奇为掩盖其叛徒罪行，蓄意将一九二九年八月说成一九三〇年春，将“被一叛徒出卖”投敌，东笔涂改成“在罢工中”被捕。

(14) 满洲省委一九二九年十月十九日向中央的
报告（节录）



注：刘少奇向中央的报告，以惯用的反革命两面派的手法，欺骗中央。他和孟用潜被捕投降大军阀张学良而获得所谓“释放”之后，即派孟用潜往北满任特委书记，他以假借巡视工作为名，到哈尔滨同敌人进行勾结，配合大军阀张学良镇压工人、学生运动，进行反苏反共。

影印件原文

中 央：

兹有数事逐项报告于下：

(1) 中央指定省委名单及工作分配，省委依照此间情形略有变动，因为孟坚、国珍已去哈任工作，又调回对哈市工作有妨碍，而且孟坚在奉被捕一次，纱厂附近及公安局等处认识很多，如来省兼管奉市工作，事实上要常外跑不合宜，而且抚顺目前工作，自破坏后，以前组织或捕或逃，完全解体，暂时是要从各方面建立线索，最近虽然有两三处关系派一人专驻在工人外面还是没有多大作用，若羊往省委组织部工作，因寻找山东逃来同志线索，比孟坚较合宜，指挥奉天工作同志，(山东)亦较好，因此省委决定之启兼宣传，若羊组织兼管奉天工作，宏经工运，三人组织常委，孟坚哈市书记兼组织，候补常委国珍哈市宣传候补常委CY书记参加常委，惟来信以七人组织省委，但只六人名字，翊宏经报告省委委员有西平一个，其余委员一人是立功，还是西平呢？但西平在同志中感情不好，观念也有一些错误，省委不同意他参加省委。

.....

(6) 最近中东路斗争已经发动起来，兹将哈市报告及省委对东铁工作的决议，附录于下请查阅指示，并请求中央将此报告材料作一通信，在红旗或全总刊物上发表。此间工作人员甚忙，无人作文故也。

省委为特别加紧哈市及中东路工作，已派少奇同志前往哈市巡视。详细情形日内当再有报告寄来。

(15) 一九三〇年一月十六日《盛京时报》关于东铁总工厂华工罢工问题的报导



注：这是内奸刘少奇根据蒋介石和张学良交给的反苏条文修改的十二条，以“哈工会”名义送报馆发表，煽动反动工潮，攻击苏联的罪证。

(16) 重要知情人刘多荃关于刘少奇叛卖革命的亲笔供词

一九二九年冬葉德誠在中東路事件時說明許許多多滿
洲省委書記做這種事很有利。一九三〇年二月由王德林對我說中
東路問題我們吃了虧為了挽回面子讓那個地下黨負責人協
助如國民黨反蘇罷工搞了許多經濟條件送給他。看他這能
够增加了幾條并以哈爾濱名義讓報館發給我們印了大中央。
張學良說那滿洲省委書記在哈有許多事情全按照地政府
去辦。一九三〇年四月黎天才和我說那個滿洲省委書記從哈爾
濱去上海路過沈陽時說在沈陽你們救了我的命在哈爾濱
對我也很好東北好像我第一家鄉。

劉多荃

一九六八年八月五日

注：刘多荃的笔供证实，内奸刘少奇在中东路事件中，完全按照帝国主义、国民党和大军阀张学良的旨意，煽动工潮，反苏反共，罪恶至极！

“中东路事件”说明

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七日，大军阀张学良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蒋介石匪帮的策动下，非法武装搜查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逮捕苏联籍人员三十九人。蒋介石匪帮七月十日单方撕毁中俄（合办铁路）协定，挑起“中东路事件”。八月十七日蒋介石匪帮发表与苏联交战宣言。九月八日发生武装冲突，经过绥芬河、满洲里、黑河、扎兰诺尔、同江等战斗，大军阀张学良惨遭失败。十二月二十二日中苏互派代表签订了“伯力协定”，中东路恢复原状。

大军阀张学良为了挽救失败残局，利用刘少奇在哈尔滨煽起反动工潮，反对苏联。刘少奇根据蒋匪介石和大军阀张学良提出的反苏反共罢工条件，亲手修改成十二条总要求，在《晨光报》发表，组织假请愿，威胁苏联局长，阻挠“伯力协定”的实施。当时的苏联是革命的，刘少奇伙同蒋匪介石、大军阀张学良进行反苏反共的反革命活动，真是罪恶至极！

